

張永 著

# 銀造組織

紅軍與蘇區史新探

1927 —— 1934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张永，生于1971年，辽宁沈阳人，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1989—1993年就读于浙江大学机械工程系，获工学学士学位；1993—1996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获理学硕士学位；1996—2000年在北京做房地产估价师；2000—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博士学位；2003年至今在北京大学任教（2014—2015年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访学一年）。主要研究方向为民国政治史、中共党史、中国近现代环境史，在《近代史研究》、《史学月刊》、《中共党史研究》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题论文二十余篇，出版专著《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梁启超与护国运动》。

# 锻造組織——紅軍與蘇區史新探(1927—1934)

張永 著

責任編輯：章 明

封面設計：石慶華

ISBN 978-988-31266-0-1

2023年3月第1版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All rights reserved

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2023

Copyright China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ess

香港新界粉嶺安全街33號豐盈工貿中心5字樓G座

Unit G 5/F, GOOD HARVEST CENTRE, 33 ON CHUEN STREET, ON LOK TSUEN,  
FANLING, NEW TERRITORIES, HONGKONG

Tel: 00852-3921 6033

Fax: 00852-2528 5333

發行：中國文化傳播出版社

字數：372千字

開本：710mm×1000mm 1/16

印張：27.65

定價：HK\$ 175元

## 目录

自序：列宁主义革命党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	4
一、清王朝、民初议会制和北洋军人政权的先后失败.....	5
二、列宁主义革命党和苏联道路.....	6
三、建党——共产党的组织成长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	8
四、以党建军——国民党派系战争与红军的崛起.....	11
五、以党建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挑战南京政府.....	14
六、1927 年与 1934 年的异同.....	18
第一章 国际指示、工农运动与中共的转型困境.....	20
——1927 年“右倾机会主义”新探.....	20
一、共产国际指示争夺领导权——尝试理解斯大林.....	21
二、工农运动自发争夺政权，中共无法建立有效领导 .....	29
三、中共接受国际七次全会指示，但在剧变中犹豫动摇.....	39
四、决裂之际——中共中央妥协退让，拒绝国际八次全会指示.....	46
五、小结.....	58
第二章 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	60
一、最后的合作——初期红军多出自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60
二、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吸收‘暴徒分子’入党.....	67
三、南昌起义——中共第一次武装暴动中的组织混乱.....	75
四、十一月会议强化党的组织力.....	78
五、中共在残酷斗争中的换血与转型.....	86
六、小结.....	90
第三章 红军对土匪武装的收编、改造和清洗.....	92
一、民国初期的土匪与政治.....	92
二、收编土匪武装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手段.....	94
三、改造土匪武装——中共六大严厉政策和红军实践中的变通 .....	104
四、清洗——信仰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	111
五、小结.....	119
第四章 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的集中趋势.....	122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民主制度及其弊端 .....	122
二、1929 年朱毛之争与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的挫折.....	136
三、中共中央对民主的认识和对毛泽东的强力支持.....	147
四、古田会议与政治委员权力的上升.....	152
五、政治委员与士兵委员会的消长——红军的权力集中趋势 .....	158
六、小结.....	162
第五章 红军崛起与革命重心向苏区转移.....	164
一、红军在组织中地位演变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165
二、革命形势好转，红军集中整编，从边缘走向中心 .....	174
三、立三路线挑战共产国际，六届三中全会确定战略转变.....	181
四、革命重心移向苏区：加强联系、派遣干部、建立中央局 .....	188

五、小结.....	199
第六章 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201
一、反对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续压制.....	202
二、党内民主爆发，反对派争夺领导权.....	211
三、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	220
四、罗章龙等成立“非常委员会”及其对各地影响.....	227
五、小结.....	238
第七章 红军争论、黄陂肃反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	241
一、红一方面军统一指挥权过程中的激烈争论.....	241
二、黄陂肃反与富田事变.....	249
三、苏区中央局的初建与中央肃反政策的实施.....	263
四、小结.....	275
第八章 中央苏区集中体制的全面建立.....	277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建立集中政治保卫制度.....	277
二、共产国际远程操控，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	290
三、博古推动反罗明路线，李德执掌苏区军事大权.....	300
四、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和苏区的紧张状态.....	311
五、小结.....	315
第九章 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白雀园肃反.....	317
一、中央分局发现鄂豫皖红军存在严重纪律问题.....	318
二、红军公开对抗中央分局引发白雀园肃反.....	322
三、当时政治派系极为复杂也是肃反诱因.....	327
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并非 2500 人.....	332
五、地方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335
六、小结.....	337
第十章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夏曦四次肃反.....	339
一、中央分局成立前的湘鄂西初期肃反.....	339
二、万涛等推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尝试及失败.....	341
三、夏曦领导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	353
四、红军退出洪湖地区后的第二、三、四次肃反.....	359
五、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干预下结束肃反.....	365
六、夏曦肃反被杀人数考辨：几百人被杀，大多是干部.....	371
七、小结.....	373
余论：弹性集中体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375
参考文献.....	378

# 自序：列宁主义革命党与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

中国近现代政治史激烈动荡、纷繁复杂，研究者从不同视角出发，建立了不同的理解框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革命”模式、“现代化”模式、“冲击——反应”模式等，笔者尝试探索的研究思路姑且可以称之为“崩溃——重建”模式。不过本书并非概念先行之作，实际上在最初几项研究先后进行时，笔者主要着眼于重建历史事实，并没有写成一本书的想法。只是在完成了四篇相互独立的论文之后，随着思考的深入，贯通的感觉忽然降临，几项独立的研究产生了关联，本书的核心思想在混沌之中逐渐浮现——革命不仅是破坏旧秩序，也是建立新秩序，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成长同时就是现代中国的政治重建，当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起源于这个历史过程。

亨廷顿认为，政治秩序崩溃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化中的重大危险，因此他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提出发展中国家需要强大政府的观点，并详细比较分析了建立现代政府的几种模式，包括：欧美议会民主制、传统君主制、军人政权、列宁主义革命党等。亨廷顿虽然是一个美国人，但他清醒认识到，美国自治传统中形成的政治制度，未必适合需要强大政府的发展中国家，美国人局限于自己的政治经验，往往难以理解发展中国家在后发现代化的急剧变革中建立政治秩序的艰难。他甚至说，“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政治体制面临着权威的集中、机构的分离和参与的扩大等三方面的需求。看来最适合于同时实现三方面目标的制度是一党制”，进而认为发展中国家要学习政治经验，最好去莫斯科或北京，而不是华盛顿。<sup>1</sup>

近现代中国经历了彻底的政治崩溃，长期陷于战乱之中，中国近现代政治史就是一部政治崩溃和试图重建的痛苦挣扎的历史。从建党、建军到建国的政治重建道路是现代中国的历史出口，在这一过程中以民主集中制为原则的列宁主义革命党发挥了关键作用，而这一模式最终胜出，前提就是其他几种模式的先后失败。中国先后尝试亨廷顿提到的几种主要模式，清王朝、民初议会制、北洋军人政权都试图应对现代化挑战，但都没有成功。

---

<sup>1</sup> 萨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第 124-125 页。

## 一、清王朝、民初议会制和北洋军人政权的先后失败

传统君主制很难适应现代化转型，事实上只有英国、日本等少数国家的君主制经过重大变化后幸存，法国、德国、俄国以及中国等多数国家的君主制都在现代化过程中覆灭。自 1840 年鸦片战争打破清王朝的封闭以后，古老中国就被卷入到现代世界的残酷竞争当中，清王朝虽然通过洋务运动迎来了所谓“同光中兴”，但日本的迅速崛起使中国生存的外部环境大大恶化，1895 年甲午战争失败引来列强跟进的瓜分狂潮。清政府未能通过戊戌维新走上自强之路，反而在庚子之变中招致八国联军入侵和屈辱的《辛丑条约》。在弱肉强食的现代世界，大英帝国这样屡战屡胜的强国有给王室带来荣耀，而落后国家的君主制只能在列强不断羞辱中失去权威，更何况清王朝还是一个孤悬在主体民族之上的少数民族政权。在自救式的新政中苟延残喘十年之后，丧权辱国的满清帝国在 1911 年辛亥革命中土崩瓦解。

1912-1913 年议会民主制的短暂尝试也难有成功的希望。民主制需要广大人民全面深入的参与，在多数人缺少民主理念的情况下，民主制很难运行，即使勉强运行，也很难担当落后国家迅速追赶发达国家的历史使命。民国初年的议会民主制只是几种政治力量的脆弱平衡的产物，并没有社会基础。辛亥革命以后全国陷于分裂状态，参与推翻清王朝的北洋派、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实力派都没有能力武力统一全国，只好接受议会制度作为分享权力的妥协机关。一旦平衡被打破，北洋派镇压二次革命后取得军事优势，议会制就会被轻易推翻，建立起袁世凯的独裁统治，民初议会政治很难逃脱昙花一现的命运。<sup>1</sup>

军人政权或许是机会较大的政治重建模式。袁世凯在民国初年成了很多人瞩目的救星，他是当时中国最大军事力量——北洋集团的领袖。在 1913 年镇压二次革命后，袁世凯确实在 1914-1915 年基本恢复了国家统一，各省的税款开始上缴中央。梁启超等人对袁世凯寄予很大希望，期待他领导中国通过开明专制道路走向富强。表面看来，袁世凯似乎有机会像土耳其的凯末尔将军或者韩国的朴正熙将军一样，通过军人集团的力量建设现代国家政权。但是，军人政权在土耳其或韩国这样较小的国家重建秩序相对容易，要在中国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建立秩

<sup>1</sup> 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第 383 页。

序则更加困难。<sup>1</sup>《史记·韩信卢绾列传》中记载刘邦把从小一起长大的密友卢绾封为燕王，不料卢绾从长安到燕国后，竟很快起了异心，走向反叛。<sup>2</sup>袁世凯复辟帝制后，蔡锷在遥远的云南起兵反抗，以冯国璋为首的北洋众将大多在各地坐观胜败，不肯出力，结果袁世凯在各派力量群起反对中身败名裂而死。

袁世凯死后，最大的军事力量北洋集团分裂，中国在政治上彻底破碎，陷入黑暗的军阀混战。政治规则倒退了几千年，回到丛林部落时期，暴力成为主要的政治语言，有几千条枪可以占据一个省，有百条枪可以占据一个县，有几条枪也可以占山为王、横行乡里。土匪消灭不了就收编为正规军，正规军打了败仗也可以变成土匪，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攻占北京后，竟自称国家元首。虽然名义上有国会、省议会、县议会，但都不过是军阀手中的玩物。这些军事势力缺乏现代思想和组织能力，控制范围最大只能到几个省，再进一步扩张就走向分崩离析，在大大小小军阀的厮杀之中，看不到恢复国家统一、重建政治秩序的希望。

## 二、列宁主义革命党和苏联道路

正当中国在军阀混战、土匪横行的政治崩溃中痛苦挣扎时，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布尔什维克党革命成功，创建了红军，短短几年就在残酷内战中统一了广袤国土，建立了强大的国家——苏联，于是一条新的道路出现在中国人面前。俄国是相对落后的大国，国情与中国比较相似，这是俄国政治道路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基本原因。列宁面对的问题是：如何在沙皇退位后的政治崩溃中重建政治秩序？如何让俄国迅速摆脱贫落地位？如何同时避免严重贫富分化？他试图通过激进的社会革命一举解决这些问题，而实现目标的组织工具就是列宁主义革命党。

二十世纪初，俄国各地出现了不少列宁这样的社会革命者，但是他们很分散，形不成很大的政治力量。列宁在 1902 年发表《怎么办》，主张建立统一组织。1903 年俄国各地代表聚会布鲁塞尔，会上在讨论党章时，列宁主张党员应受严格的纪律约束，和好友马尔托夫发生激烈争论，最终引发社会民主工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

<sup>1</sup> 张永：《梁启超与护国运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53 页。

<sup>2</sup>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 2009 年版，第 556-557 页。

当时俄国社会革命者群体只是一个小圈子，彼此都很熟悉，列宁固执己见、引发分裂，让很多人不理解。1904年列宁在《进一步，退两步》中又进一步阐发了中央集权的革命党理论。列宁批评某些人“力求自下而上地来行动，因此在凡是可能的地方和凡是可能的程度内，都坚决主张实行自治制”，主张实行达到“无政府主义地步的‘民主主义’”，认为他们“到处拚命维护自治制，力图削弱党的纪律，力图把党的纪律化为乌有，他们的倾向到处都在导向组织的瓦解”。列宁自己“坚决主张扩大中央机关对于部分的权力”，中央机关应该“是一个由于自己的活动和自己的革命彻底性而享有极大威信的小组”，“在恢复党的真正统一并在这个统一的基础上解散各个过了时的小组的时代，这种上层机关必然是党的代表大会，即党的最高机关”。<sup>1</sup>

很显然，列宁主义政党思想的核心是：革命党必须有执行力，只有权力集中、纪律严格才能有执行力，否则就只是知识分子的清谈俱乐部。列宁不仅提出理论，还实际领导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人数不多，但组织非常严密。一次大战期间，俄国连吃败仗，沙皇被迫退位，国家陷入政治崩溃，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都积极争夺政权，此时布尔什维克虽然只有几万人，却具有极强的执行力，最终赢得群众，建立红军，统一国家，创建了苏联。

需要指出的是，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虽然强调集中和纪律，但也尊重党内民主，党在决议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等领导人经常与列宁公开争论，在是否十月革命、是否与德国签订和约等重大问题上都发生过激烈对抗，列宁通常可以依靠多数票通过自己的想法，但有时也会遭遇挫败，他并不能凌驾于组织原则之上。可以说，列宁主义革命党是一种兼顾两方面的现代政党，民主是其现代的一面，集中又使其适应相对落后的社会环境，这种富有弹性的制度在发展中国家很有竞争力。

亨廷顿对列宁的政治创新评价很高，他认为：“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没有一场革命在政治上是全面的，因为还没有哪位革命领袖系统地形成过一种能够阐明如何组织政治参与的扩大并使之制度化的理论，而这正是政治的本质。列宁解决了这个问题，从而完成了20世纪最有意义的政治创新”。“许多不同类型的集团——宗教的、民族主义的、阶级的——都能把新的参与者带入政治，但是只有

---

<sup>1</sup> 列宁：《进一步，退两步》，《列宁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92、495页。

共产党人才一贯表现出有能力去组织和规划这种参与，共产主义运动对现代政治的突出贡献，不是革除和摧毁现存制度，而是组建和创造新型的政治制度。”<sup>1</sup>

值得一提的是，英国著名思想家和民主社会主义者罗素于 1920-1921 年到中国讲学。他经过一年的观察和思考，在离开中国前夕的临别讲演中提出：中国很难走欧美道路，苏联道路更适合中国。罗素认为中国不具备直接实行民主制度的条件：“中国政治的改革，非经若干年后，不能摹拟西方的模型，采用德谟克拉西的体制。德谟克拉西以为，一国国民是能读书写字且能略具政事知识的”，“若在俄国和中国这些地方，这类条件全都缺乏，人民既没有教育，又不熟悉实业的方法，所以俄国式的手段，是最适宜最可能的。”他认为中国需要一个勇敢坚强的革命团体：“只要有一万有决心的人，为一种理想所激动，而志愿冒着自己性命危险”，“这一万人必须是正直的，勇敢的，不沾腐败气习的、工作不倦的”。<sup>2</sup>

在现代中国政治重建的过程中，出现了很特别的情况，1921 年建立的共产党和 1924 年改组的国民党，都试图走列宁开创的建党、建军、建国的道路，都采用了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两个政党、两支军队、两个政权为争夺重建中国的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竞争，以至于如果不把两者放在一起对比分析，就很难揭示出现代中国历史演进的深层逻辑。

### 三、建党——共产党的组织成长与国民党的派系纷争

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很快认识到苏联道路的价值，他虽然不接受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学说，但对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模式却极为推崇。事实上，早在 1913 年二次革命惨败之后，孙中山就痛感国民党一盘散沙，所以他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的时候，要求党员按手印宣誓服从他，但黄兴等民主革命家认为这种近于会党的形式有损人格，因而拒绝加入。列宁主义革命党的民主集中制显然更符合现代原则，孙中山听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解之后，大为钦佩，请鲍罗廷帮助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按照列宁主义革命党模式改组国民党。

<sup>1</sup> 萨缪尔·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307 页。

<sup>2</sup> 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1921 年），《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年，326-327 页。

孙中山在 1924 年 1 月国民党一大上反复强调，改组的目的是要建立权力集中、纪律严格的党，党员要牺牲个人自由，党要象军队一样。他在 1 月 20 日开会词中说：“如果个人能够牺牲自由，然后全党方能得自由”，“等到全党有了自由，有了能力，然后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本党以前的失败，是各位党员有自由，全党无自由，各位党员有能力，全党无能力。”<sup>1</sup>他在 1 月 30 日闭会词再次强调：“本党党员从前看见政纲有不对的地方，做事就立刻和政纲相矛盾，这是本党自乱的大毛病”。“党员的奋斗是和军队的奋斗一样，军队在奋斗的时候，如果司令官的命令一时不对，当士兵的都要服从，照原来的命令去共同前进。若是都能前进，或者将错就错，也能打胜仗”。“本党党员，从前常有自以为是的，便要独断独行，所以弄到全党的精神非常涣散，革命事业不能成功。以后要我们的革命事业完全成功，便要大家一致行动”。<sup>2</sup>蒋介石也认为：“苏俄帮助我们，不只是物质帮助，并且是知识的帮助。最大的帮助，是要我们纪律严重，使同志有纪律行动。这才是最大的帮助”，“没有纪律，团体便没有用。各种帮助中，最好是这一种。”<sup>3</sup>

但是，国民党改组刚刚一年，孙中山就于 1925 年 3 月去世。国民党失去领袖，立刻陷入分裂状态。虽然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号称重新建党，但实际上国民党的核心 1905 年成立同盟会时就形成了，早期的财政基础是海外华人，很多元老如邹鲁、谢持等对学习苏联并不认同，孙中山在世时就有争论。孙中山刚刚去世，国民党内就出现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到 1927 年又出现南京蒋介石政府和武汉汪精卫政府的分裂，国民党第一步建立组织严密的党就没有实现，长期陷于派系纷争。

共产党没有历史包袱，没有像国民党西山会议派那样不认同列宁主义原则、闹分裂的派系。共产党从 1921 年建党开始，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是完全按照列宁主义原则建立的。但是，民主集中制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事物，即使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新青年，要想学会如何组织和运作这种政党形式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的问题是：何时需要民主？何时需要集中？民主和集中之间的平衡如何把握？如何建立铁的纪律，同时又保持党的活力？

<sup>1</sup> 《广东文史资料第 42 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8 页。

<sup>2</sup> 《广东文史资料第 42 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第 80-81 页。

<sup>3</sup> 《鲍罗廷在华工作经过——汪精卫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6 年 1 月 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21 页。

共产党成立之后，一直发展比较迅速，特别 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党员从不到一千人在一年多时间增加十倍，1926 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到 1927 年五大前后中共党员猛增到约六万人。但是，党员的迅速增加并不等于组织的强大，甚至可能带来组织的混乱，短时间内蜂拥入党的新党员难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寻找个人出路，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和组织训练。

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发现大批涌入的党员中有很多不合格，于是连续发动清党，1919 年清党开除 14 万党员，占总数五分之二；1921 年清党开除 17 万人，占总数四分之一。<sup>1</sup>中共成立之初，党组织一直比较宽松，纪律要求并不严格，党员中知识分子比重很大，在民主和集中之间还是更偏向民主。党组织从未大规模清党，党也很少处罚党员，很多党员并不严格执行党的决议，这在 1927 年国共分裂的混乱局势中造成了严重后果。

当时党中央认为有些地方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过于激进，要求地方干部纠正，但很多干部都自行其是，拒绝服从中央。比如赣州著名工人领袖陈赞贤，“党已发觉陈赞贤同志和赣州工潮的‘左’倾错误，决定要分别解决。但是，陈赞贤同志固执己见。虽然陈赞贤为工人阶级利益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肯执行党的决定，使结果适得其反。当时党要陈离开赣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陈不接受省委意见，又私自回到赣州去。”<sup>2</sup>1927 年 3 月陈赞贤在赣州被杀害，是国共冲突激化、蒋介石走向反共的重要标志。

1927 年党组织的混乱是很明显的，整肃党纪成为中央十一月会议的重要议题。周恩来说：十一月会议“规定了政治纪律，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sup>3</sup>连周恩来都觉得新鲜，说明以前很少整肃纪律，会议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处罚被认为违反政治纪律的高级领导人。“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sup>1</sup>陈锡华：《浅谈列宁时期的清党经验》，《理论战线》第 195（1983 年）。

<sup>2</sup>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4 页。

<sup>3</sup>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35 页。

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sup>1</sup>

自此以后，中共的党纪日益严格，陈独秀、彭述之等先后被开除党籍。到了苏区和红军肃反时期，违反组织原则就不仅是开除的问题，甚至有可能失去生命，党纪之森严几乎到了不近人情的程度。在以党建国的模式中，是先建立党内政治秩序，然后通过党来建立国家的政治秩序。在建立党内秩序方面，共产党远比国民党成功。

#### 四、以党建军——国民党派系战争与红军的崛起

建党、建军到建国三部曲中，建军是关键的一步。在军阀混战、暴力充斥的政治环境里，没有军队就没有政治话语权，就等于退出政治舞台。孙中山饱尝没有军队的痛苦，在 1924 年国民党改组之后，立即着手建立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大还不是中央委员，在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甚至不如毛泽东，但依靠黄埔军的崛起，他在几年内上升为国民党领袖。那些没有军队的政治派别，比如脱离共产党、称红军为土匪的陈独秀派，还有胡适等人的自由派，则在政治上很难有所作为。

但是，国民党的主要军事派系中，只有黄埔系是国民党改组后建立的，算得上以党建军，称得上“党军”。其他军事派系都形成于改组之前，陈铭枢、张发奎等的广东军队和孙中山关系较深，革命性较强，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军队就要差一些，唐生智的湖南军队就差得更多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阎锡山的晋军、张学良的东北军都起源于北洋时期，东北军在北伐战争中甚至是敌对一方。这些军事派系主要以私人关系结合，军队效忠于派系领袖，党只是一块招牌，党纪更无从谈起，所以常被称为新军阀。国民党自称“党国”，其实“军国”色彩很浓，但又不是统一的军人政权，而是各军事派系合作的联合军人政权。

国民党的作用，是为各派军队提供一个上层政治结构，因为没有一个派系强大到足以消灭所有其他派系，真正统一中国。北伐战争期间，本来蒋介石是以军权挑战党权的代表，甚至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但在 1927 年 8 月，他在

<sup>1</sup>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82-483 页。

徐州战败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宣布为了党的统一、为了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的合并，愿意牺牲个人权位，主动下野。

这是蒋介石的高明之处，说明他不是简单的军人，很有政治头脑。蒋介石明白，单靠南京政府的军队，不仅难以消灭其他军队，统一国家，反而可能遭到各派军队围攻而失败。当时白崇禧说，南京政府的骨干部队，只有黄埔系第一军的八个师和桂系第七军的六个师，总共六万多人。<sup>1</sup>蒋介石刚宣布下野，孙传芳就率五万多人过江猛攻南京，形势一度极为险恶，南京政府办事人员已经开始逃亡。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率第七军和第一军经过血战，勉强消灭了孙传芳部队，但要靠这六万多人统一中国，短期内是绝不可能的，何况桂系和黄埔系本身也矛盾重重。

蒋介石认识到，党仍然是很有用的，只有依靠党的结构才能号令其他军队，进而统一全国。即使他后来驱逐苏联顾问、甚至与苏联断交，但从未放弃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蒋介石为了国民党的统一，表面上牺牲自己、主动下野，实际上却可以在党内赢得更高的声望。他知道自己虽然暂时下野，但还会以更高的姿态归来，国民党离不了他。汪精卫、胡汉民等政治领袖虽然资历很高，但是他们没有自己的军队，很难得到其他军队领袖的敬畏，而蒋介石有自己的黄埔系军队，这支年轻的军队正越来越强。李宗仁、白崇禧、唐生智、冯玉祥等虽然有自己的军队，但他们在国民党中资历很浅，不可能超越蒋介石，他毕竟是追随孙中山多年的老党员。《大公报》报道 1927 年蒋介石下野准备去日本之前，白崇禧、蔡元培、孙科、朱培德、何应钦等都到上海“恳切挽留，但蒋行意甚坚，无可挽留”，<sup>2</sup>报刊上也纷纷发表挽留蒋的文章，其声望比反而比下野之前更高。蒋介石在 1927 年、1931 年和 1949 年三次下野，但总能复位，他以黄埔系军队为后盾，挟国民党中央以令诸侯，在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陈铭枢等军事派系的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

国民党军队的派系战争给红军崛起创造了机会，中国共产党早期是个知识分子为主的团体，并不重视军队，但自从在 1927 年的血雨腥风中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后，建立红军成为最重要的任务。1936 年主力红军四万人汇聚陕北的时候，

<sup>1</sup> 白崇禧：《招待上海各界茶会致词》（1927 年 8 月 18 日），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版，第 133 页。

<sup>2</sup> 《蒋必出洋，汪刻在汉》，《大公报》1927 年 9 月 25 日。

苏区地方组织和白区党组织损失殆尽，此时几乎整个党都在红军当中，绝大部分党员都是红军。

红军是共产党一手创建的，其组织系统始终统一。大多数主力红军都是中共中央直接派人建立的，这和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先有自己的军队、后加入国民党完全不同。中央派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失败后余部由朱德率领，成为中央红军的一个来源；中央派毛泽东到湖南发动秋收起义，余部成为中央红军的另一个来源；中央先后派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到鄂豫皖整编游击队，创建了鄂豫皖红军；中央派贺龙、周逸群到湘鄂西，创建了湘鄂西红军。

当然，红军中也有所谓“山头”，但红军的山头和国民党军的派系不可同日而语，国民党蒋、冯、阎、李、张之间发生了你死我活的血战，而红军的山头之间最多只是闹意见而已。中央红军一、三军团之间，鄂豫皖红军的 31 师和 32、33 师之间，湘鄂西红军的二军和六军之间，都闹过意见，但也都比较容易就克服了。即使一方面军和四方面军 1935 年在草地分裂之际，双方情绪非常激烈，徐向前仍然脱口说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sup>1</sup>双方只是各自走路，并没有发生真正的武装冲突。

红军是彻底的党军，各级党组织是红军的灵魂，党的组织原则也就是红军的原则，红军在运作民主集中制方面的探索，在中共政治制度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创建初期，红军的权力结构还是偏于民主的。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而五四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毛泽东直到晚年都认为井冈山红军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sup>2</sup>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的民主气氛。

但是，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过度民主也会带来副作用，特别是红军中多数是不识字的农民，运行民主制常遇到难以预料的困难，有时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这决定了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保持。毛泽东等人逐渐认识到红军中分权式民主制的弊病，开始倾向于集中权力，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民主气氛。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刘安恭、林彪等的激烈言论，终于在 1929 年春夏之交引发了红军历史上著名的“朱毛之争”。当时

---

<sup>1</sup> 徐向前：《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35 页。

<sup>2</sup> 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 1965 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 年第 3 期，第 22 页。

红四军民主气氛很浓，支持朱德的人占有优势，结果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实际上被赶出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

但是，在红四军选举中失败的毛泽东却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通常认为周恩来是作风民主、平易近人的领导，但在这一时期，周恩来比毛泽东更坚决、更旗帜鲜明地反对过度民主。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8月周恩来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它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sup>1</sup>

在中央的支持之下，毛泽东重回红四军，1929年12月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这是红军走向权力集中的关键一步。政治委员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枪”的原则大大强化了。于此同时，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却逐渐缩小，后来被中央命令取消，1930年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sup>2</sup>1930年以后，随着红军规模的扩大，权力集中于政治领导人的趋势不断加强，政委获得了超越集体领导的“最后决定权”。在集中权力的过程中，有时会带来激烈冲突，甚至引发代价高昂的肃反。经历血与火的锻造之后，红军成为高度集中统一、具有铁的纪律和强大精神力量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 五、以党建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挑战南京政府

孙中山在1924年国民党一大上指出，建党的目的是以党建国，甚至一段时间内还要“党在国上”，并形象地把党比作建国工人的临时工棚，这就是国民党“党国”思想的来源。他在1月20日发言中说：“俄国完全以党治，比英、美、

<sup>1</sup> 周恩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84页。

<sup>2</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61页。

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他”。“俄之革命事实上实是三民主义，其能成功，即因其时党放在国上。我以为今日是一大纪念日，应重新组织把党放在国上。但此说初听之，似甚骇人听闻，其实现在我们何尝有国，应该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以后再去爱之（鼓掌）。如今日上海、广州常见之青草地上起洋楼，必先经过一棚寮时代，此棚寮即用以储置建筑材料与工人聚居之所，由此乃可以建筑洋楼。中国现有好多人不明革命党之用意，即如羡慕洋楼者，见棚寮而厌之，不知无此棚寮以储工具材料等物，则所羡慕之洋楼，只是空中楼阁，永不能实现，故当洋楼尚未造成之前，此棚寮实为至可宝贵之物（鼓掌）。党之于国家，即如棚寮之于洋楼，党有力量可以建国，故大家应有此思想与力量，以党建国（鼓掌）。”<sup>1</sup>

孙中山这段话，只有结合中国历史和他的军政、训政、宪政思想才能理解，他实际上是把“党国”看作是从“家国”到“民国”之间的过渡阶段，所以把党比作建国工人的临时工棚。中国历史上政权是属于私人的，即所谓“家天下”，唐朝属于李家，宋朝属于赵家，明朝属于朱家，清朝属于爱新觉罗家，人民从不是国家的主人，从来没有执政的训练。孙中山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实行民主制是不可能的，需要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先建立一个党，然后依靠党建立“党国”，通过军政、训政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这是一个过渡时期，条件成熟以后再实行宪政，建立完善民主制的“民国”。

但是，以党建国的道路，是先有党纪，后有国法。国民党只有一个表层机构，是不同军事和政治派系的松散结合，难以建立真正的党纪，也就难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制度。于是，广西是李宗仁、白崇禧的地盘，广东是陈济棠的地盘，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东北是张学良的地盘、山东是韩复榘的地盘，四川是刘湘等的地盘，贵州是王家烈的地盘，云南是龙云的地盘，等等。名义上他们都是国民党员，都服从党国，但实际上他们都是各自独立王国的国王，实行不同的制度，甚至发行不同的货币，只有长江中下游的几个省是蒋介石南京政府能够真正控制的。

当然，经过多年苦战，中央军取得了明显优势，南京政府的控制力越来越强，1935年法币发行是一项重大成就。蒋介石依靠国民党这一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形式，依靠以黄埔军这支“党军”为核心的中央军，努力削平各路诸侯，建立

<sup>1</sup> 《广东文史资料第42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货真价实的“党国”。但是，他必须面对两大挑战：一个是日本侵华的步步深入；另一个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兴起。

从 1929 年到 1931 年，红军利用国民党各派军队激烈混战的机会，迅速发展壮大，主力发展到十几万人，控制了中央苏区、鄂豫皖、湘鄂西等几片不小的区域。苏区人口达到上千万，中共在各苏区建立起革命政权，成了执政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1931 年 11 月在江西瑞金宣告成立，毛泽东当选政府主席。

建国的决策实际上来自共产国际，当时中共并没有很成熟的领导集体，无论是陈独秀为核心的中央，瞿秋白为核心的中央，还是向忠发、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央，都没有很高的威望，共产国际发挥了很大作用。1929-1930 年红军和苏区迅猛发展，1930 年初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出了农村武装斗争的要素，半年以后斯大林也认识到这是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当面指示前来汇报工作的周恩来，要把红军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sup>1</sup>并通过共产国际的一系列指示要求中共把重心从城市转移到苏区。此时，李立三等却命令红军脱离苏区，进攻武汉等大城市。

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改组中央以后，中共中央开始把革命重心向苏区转移，同时加强了对各苏区的领导和控制，先后派项英、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成立中央局，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成立中央分局，派夏曦到湘鄂西成立中央分局，大批干部被派往苏区。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干部与苏区地方干部发生了激烈冲突。中央苏区的项英、任弼时与毛泽东之间，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与曾中生、许继慎之间，湘鄂西苏区的夏曦与万涛、贺龙之间都出现了严重分歧，中共组织结构遇到了严峻挑战。

苏区地方干部在创建红军和苏区过程中，积累了独特、丰富的经验，往往感觉中央派来的干部是外行领导内行。比如 1931 年 7 月鄂豫皖苏区的方英提到了红军干部对新成立的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干部“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在实际上是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说国焘同志不懂军事，泽民同志太书生不能领导等等，所以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sup>2</sup>估计毛泽东对项英、贺龙对夏曦也会有类似的感觉。

但中共的力量来自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来自党指挥枪、下级服从上级、全

<sup>1</sup>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183 页。

<sup>2</sup> 《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7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党服从中央这几项组织原则，地方干部与中央干部的分歧被认为是对组织体系威胁。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由于他比较遵守党纪，没有受到进一步打击。但是，鄂豫皖红军的曾中生、许继慎等1931年9月召开鸡鸣河会议，领导全军干部公开对抗中央分局。万涛等在1932年1月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围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力图推翻中央分局，据贺龙回忆：“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像死人一样。”<sup>1</sup>在中央的支持下，鄂豫皖、湘鄂西先后展开肃反，对抗中央分局的干部大多在肃反中被杀，中央取得了对各苏区和红军的绝对控制。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政治秩序的能力是惊人的，虽然中央苏区与其他几块苏区被国民党军队分隔包围，但仍能实现中央对地方的有效领导。苏区内部，几乎每个村庄都建立了党支部、民兵、贫农会、妇女会、儿童团，党组织深入基层每个细胞。土匪是近代中国政治崩溃的标志现象，但在苏区很快被消灭。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提到，“闽西土地革命胜利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在这一年中工农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上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生产上大大增加，真是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sup>2</sup>《智取威虎山》中老土匪座山雕的原型张乐山，15岁当土匪，在东北横行数十年，清朝、张作霖、伪满政权都拿他没办法，却在中共建立北满政权的第一年即被剿灭，虽然此事并不在红军时期，却可以说明中共政权拥有恢复农村秩序的超强能力。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南京政府，是在中国重建政治秩序的两个竞争性政权，它们的执政党共产党和国民党在组织形式上都是列宁主义革命党，虽然国民党有点名不副实。南京政府在中国东南部城市的政治秩序建设上取得了进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则更擅长在农村重建政治秩序，而当时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这一点最终决定了成败。

当苏区只有上千万人口时，即使共产党能够通过强大组织把资源动员到极限，也很难抵消国民党军事力量上的巨大优势，几块苏区先后失败。但共产党通过长征把组织和军队的核心保存下来，在抗日战争中利用其在农村重建秩序的能力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抗战胜利时中共根据地的人口已到达一亿人。虽然国统区有四

<sup>1</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654页。

<sup>2</sup>《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15页。

亿人口，但这些人口大部分都在农村，国民党在农村缺乏根基，控制力和动员力很弱，它能动员的力量已经不及共产党。

中共高度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体系也是国民党难以比拟的。毛泽东能在不知名的小村庄里，靠几部电台指挥全国数百万大军，这一强大的指挥体系是红军时期通过严厉手段锻造出来的。而蒋介石在解放战争最后的大决战中，忽而乘飞机飞到沈阳，忽而在葫芦岛登上军舰，到处召开军事会议，顿足捶胸、赌咒骂街，但是卫立煌、傅作义、白崇禧这些将领还是自行其是。最终共产党把解放军发展到数百万人，消灭了国民党的数百万军队，统一了中国大陆，结束了辛亥革命以后的国家分裂，重建了政治秩序，创建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扩大升级版——中华人民共和国。

## 六、1927 年与 1934 年的异同

回顾中国共产党完成中国现代政治重建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可以发现从 1927 至 1934 年是非常关键的阶段。表面上看，这一阶段的起点和终点似乎有相似之处，1927 年中共遭受重大挫折，在国民党的血腥镇压之下，党员从 5.8 万人锐减到 1 万多人，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1934 年中共再次遭受重大挫折，三大苏区先后失败，三支主力红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中陷入苦战，再次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似乎经过 7 年奋斗，一切又回到了原点。

但实际上，1934 年与 1927 年相比，共产党已经发生了脱胎换骨的组织演变。1927 年的中共，还是在共产国际扶持下的幼稚政党，领导机构是不脱书生气的知识分子群体，发动群众运动却不能真正领导，没有自己的军队，更没有自己的政权，到争取政权的紧要关头，就暴露出缺少经验、犹豫不决的弱点。而 1934 年的中共，已经创建过纪律严明的十几万主力红军，在上千万人口的区域建立过强大政权，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已经从激进知识分子成长为经验丰富的军事家和政治家，并且探索出不同于苏联的独特革命道路。在 1927 到 1934 年血与火的残酷斗争中，中共组织在血与火的锻造中成长为极具竞争力的军事政治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发展壮大，在解放战争中击败国民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终在长期战乱的中国完成了政治重建，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组织原则也由此成为当

代中国的政治传统。

本书关注重点不在中共对外部敌人的斗争，而是紧扣内部的组织问题，包括：第一，上级与下级的关系；第二，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三，党和军队的关系；第四，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第五，党和军队的组成成分；本书的取材和论述主要围绕着这些问题展开。

# 第一章 国际指示、工农运动与中共的转型困境

## ——1927年“右倾机会主义”新探

1927年国共合作破裂，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变。国民党在这一年建立了南京政府，而共产党在血雨腥风中走上了武装争夺政权的道路。关于这段历史，中国大陆长期占主流的叙述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大革命失败，这是当年共产国际定下的调子，显然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近些年来，国内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似乎转变为：共产国际的错误指导责任更大，从七次全会到八次全会，共产国际既要中共推动激进土地革命，又要维持国共合作，这种自相矛盾的政策让中共无所适从，最终导致了失败。比如影响很大的《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在第三卷前言明确提到“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sup>1</sup>但这同样是一种简单化的理解。

笔者认为，北伐战争引发了全国性的政治动荡，腐朽的北洋政权走向崩溃，新兴的国民党派系纷杂，正所谓天下无主，群雄并起，出现了一个争夺政权的窗口期。如果中共不能勇猛进取，等到北伐成功后国民党逐步建立稳定政权，中共可能错失竞争政权的机会。共产国际自上而下的指示，农民运动自下而上的压力，都要求中共迅速转型，积极争夺政权。但是，文弱书生很难变为勇猛战士，知识分子群体不容易转化为武装革命党，中共经过动摇、分化以至大换血才实现艰难转型，具体来讲：

第一，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参考了俄国革命经验，虽然由于信息滞后、国情差异，发生了不少战术性误判，但在战略大方向上、甚至时机选择上仍是老练的。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斯大林强调不失时机抓军队、布哈林强调农民运动，指示中共开始争夺领导权，这奠定了中共后来建立红军和苏区的基础，其认识深度超过当时以书生为主的中共领导群体。同时，为了充分利用国民党，共产国际指示维持国共合作，尽量拖延决裂，争取时间发展壮大，这是一种策略。

第二，南方数省几百万农民被发动起来，成为气势宏伟的新兴政治力量，冲击了整个政局，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造成巨大压力。革命农民自发夺取基层政权，

<sup>1</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3页。

收集枪支建立农民自卫队，农民协会虽然名字不叫苏维埃，但事实上已经是县以下政权，挑战了刚建立的国民党政权。但中共由于组织力量不足，加上认识模糊，难以对广大革命农民建立有效领导。

第三，幼稚的中共组织在从书生时代到铁血时代的转型中，难免出现犹豫不决和组织混乱。面对血腥暴力的战斗，书生为主的中共领导层难以适应，各级干部中有不少人临阵逃走。虽然可以说毛泽东、任弼时、罗易、瞿秋白、蔡和森等比较激进，鲍罗廷、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张国焘等比较保守，但任何人都不是始终如一、毫不动摇的，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可以说，“犹豫动摇”或者说“右倾机会主义”是中共突然进入全新危急环境的必然现象，不少坚定的党员最终闯过了转型难关，与奋起的广大革命农民相结合，走上了创建红军、开辟苏区的道路，成为中国政权的有力竞争者。

## 一、共产国际指示争夺领导权——尝试理解斯大林

### （一）共产国际“一次半革命论”与俄国革命经验

从 1921 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 1943 年共产国际解散，中共在组织上一直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各种帮助。特别是在成立初期的幼稚阶段，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如此。

列宁、斯大林、罗易等的理论是共产国际指导世界落后地区革命的主流理论。这种理论不像陈独秀温和的“二次革命论”或托洛茨基激进的“一次革命论”那么清晰，带有一定的模糊性，或许可以称为“一次半革命论”。这种理论很有弹性，强调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尽量把民主革命向社会革命推进。1920 年 7 月共产国际二大的时候，列宁对落后国家革命还没有成熟看法。最初列宁更倾向于二次革命论，但来自印度的罗易提出质疑，认为上层资产阶级革命性不足，下层群众才是革命主力，落后国家民主革命可以超越阶段，表现出社会革命的特点，无产阶级政党要争夺领导权。

当时苏联在国际上最主要的敌人是大英帝国，落后国家革命的重要目标是打击大英帝国，而印度是其最大的殖民地。共产国际二大代表大部分来自欧洲，列

宁本人也不了解殖民地国家，因此拥有印度经验的罗易很受重视，会议通过的列宁报告提到：“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sup>1</sup>列宁还让罗易起草一个补充提纲，并且亲自“把委员会讨论的情况，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作了报告，并建议同时采用那两种提纲。”<sup>2</sup>这说明，列宁基本接受了罗易的想法，斯大林后来也大致延续了列宁确立的政策。

斯大林指导中国革命也依靠他自己的经验积累。革命夺取政权是冒险的事业，从没有必胜的把握，这一次机会没抓住，下一次可能要等很久，甚至可能永远不会再。俄国革命是在 1905 年和 1917 年出现了两次机会，中间则是长达十二年的沉闷时期。1905 年，日俄战争失败引发全国骚乱，初建的布尔什维克在彼得堡和莫斯科参与创立苏维埃，尝试夺取政权，虽然失败，但积累了宝贵经验。斯大林本人正是因为在 1905 年高加索革命中表现出色，进入了布尔什维克领导层。1917 年，一次大战中的连续战败导致沙皇退位，旧体制彻底崩溃，布尔什维克抓住机会，通过武装暴动一举夺取政权。这是斯大林关于革命的主要经验，也是他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依据。斯大林在中共六大之前与周恩来等谈 1927 年暴动时说：“1905 年 11 月也干了（采取了行动），虽然暂时取得了胜利，但终究还是失败了”<sup>3</sup>，很明显他是把中共的 1927 年看作是俄国革命的 1905 年。

1926 年初，北方国民军遭遇失败，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进入低潮。此时中共力量很小，距离夺取政权还很遥远，依附于国民党的势力才能求得发展，应该尽量维护国共合作。如果发生冲突，只能妥协让步，因此斯大林认可了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对蒋介石的妥协政策。当时广东“掀起了疯狂的反共反苏俄运动”，<sup>4</sup>国民党中派、右派掌握着军队主力，右派广州公安局长吴铁城已经策划按名单搜捕共产党员。如果不做退让，中派蒋介石与右派联合，也许四一二政变会提前一年发生于广东，中共可能在北伐之前即遭镇压，连在两湖发动大规模农民运动的机会都没有了。蒋介石获得来自共产国际和中共的让步后，

<sup>1</sup> 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1920 年 7 月 26 日，《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第 336 页。

<sup>2</sup> 罗易：《罗易回忆录》下册，商务印书馆，1978 年版，第 397 页。

<sup>3</sup>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 年 6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79 页。

<sup>4</sup> 《维尔德给维经斯基的电报》（1926 年 4 月 2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 209 页。

把吴铁城解职，表示和右派划清界线，政变的危机暂时过去了。

## （二）共产国际政策的激进化与中共五大

斯大林认为 1926 年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本来并不看好北伐。但 7 月北伐战争开始之后，却极为顺利，北伐军势如破竹，9 月攻占武汉。在北伐军占领的湖南、湖北等地区出现了规模巨大的农民运动，武汉、上海等城市的工人运动也高涨起来。这时斯大林突然意识到，革命高潮来了，出现了争夺政权的机会。他转而乐观地认为，有了苏联的强大援助，中国革命可能不经过“1905”的挫折，直接取得“1917”的胜利，中共在 1927 年就应该尝试争夺领导权。

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 1926 年 11 月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确立了斯大林、布哈林对共产国际的领导。在这次会议上，迅猛发展的中国革命成为中心议题，兴奋情绪推动共产国际政策趋于激进化。斯大林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中，提出中国可能不会“一点一滴的同样重演俄国一九〇五年的革命”，他特别强调军队的作用：“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亦其优点之一。中国革命的军队具有特别的重要性，也在乎此”。“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应特别注意军队的工作”，而且还要“经过革命军队去推动农民”，“帮助农民反对地主”。<sup>1</sup>斯大林经历过俄国革命夺取政权的过程，亲身领导过革命战争，他在这篇演说中指出了中国革命的两个关键：军队和农民，而当时的中共领导层还没有这样清楚的认识。

布哈林在发言中更强调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方向和土地革命：“我们在中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针”，“我们应该在农民这个革命的同盟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争夺政权意味着与资产阶级决裂，因此必须通过土地革命争取人数众多的农民。“我完全赞成斯大林同志关于军队的讲话。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一无所见。我们认为农民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他们现在就“具有一定武装力量”，在作战需要时可以把他们组织成军队。<sup>2</sup>虽然布哈林也谈到要非常小心谨慎，不要破坏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但是七次全会政策与 1923 年《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显然大相径庭。斯大林特别派出激进的罗易到中国指导

<sup>1</sup>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 年 1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三册，第 425、427、429 页。

<sup>2</sup> 布哈林：《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1926 年 12 月 1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17-22 页。

中共召开五大，传达最新政策，说明共产国际根据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抛弃了原来比较保守的协议，这也预示着国共合作将很快走到尽头。

### （三）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论战

在苏联的领导人当中，托洛茨基对中国革命的看法更为激进。“一次革命论”（不间断革命论）是他的独特理论，有人认为十月革命本身就是不间断革命论的胜利。这种理论认为，落后国家资本主义不发达，资产阶级很弱，甚至连领导民主革命的能力也没有，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期间就应该争夺领导权，民主革命胜利后无需等待资本主义发展，可以不间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样两次革命合并成了一次革命。具体到中国革命上，托洛茨基主张共产党不应受国民党束缚，应建立工农苏维埃，建立自己的军队和政权。

自 1926 年以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结成反对派联盟，攻击斯大林的中国革命政策软弱右倾。虽然斯大林在组织上击败了反对派，把两人赶出最高领导层，但是托洛茨基并不屈服，不断写文章与斯大林争论。1927 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暴露了斯大林的误判，托洛茨基加强了攻势，5 月 7 日写了《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对斯大林通过妥协来维护国共合作严厉批评，提出直接建立苏维埃。托洛茨基认为“中国革命 4 月间的失败，不仅是机会主义路线破产，同时也是官僚主义指导方法的失败”，指责斯大林要求中共“服从了将军和政权都握着在自己手里的大资产阶级所领导的国民党，他在政治上完全服从了蒋介石的纪律”，他提出应立即武装工农，建立苏维埃。<sup>1</sup>他在 5 月 10 日、16 日又先后写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和《中国革命的苏维埃问题》，虽然在共产国际执委会 5 月 18 日召开第八次全会上，季诺维也夫和拉狄克都没有获准参加这次会议，托洛茨基和武约维奇始终处于少数地位，但他的雄辩仍然是有力的，造成了一种激进气氛。

虽然托洛茨基在最高领导权的争夺中失败，但他的理论影响了不少人，比如少共国际驻中国代表达林。1927 年春他对张国焘明确表示，“他赞成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认为运用之于中国革命也是很恰当的”，“主张中共退出国民党；独立发展工农运动，使之成为工农苏维埃，到适当时期取武汉的左派政权而代之；

---

<sup>1</sup> 托洛茨基：《中国革命与斯大林大纲》（1927 年 5 月 7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第 85、92、97 页。

决不要做那些纠正工农运动过火这种不名誉的勾当。”张国焘还觉得：“中国少共书记的任弼时，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会议上，发表一些左倾的言论，也许就是受了达尔的影响。”<sup>1</sup>

斯大林顶住了托洛茨基的攻势，拒绝立刻建立苏维埃，反对退出国民党，要求维持国共合作。斯大林当然不会幼稚到对蒋介石、汪精卫毫无警惕，事实上苏联曾援助土耳其的凯末尔大量军火和金钱，后来凯末尔却镇压共产党，以致早在 1924 年加拉罕就提到：“我们被土耳其的牛奶烫过以后，在中国见到凉水也要吹一吹。”<sup>2</sup>蒋介石 1926 年发动过包围苏联顾问的“中山舰事件”，斯大林早就知道蒋的政治倾向，他反对退出国民党，是认为中共仍可以利用这种合作。他在 1927 年 4 月 5 日莫斯科讲话中形象地说：“像右派这样一些人，应该利用到底。从他们身上能榨多少就榨多少，然后才将他们像榨干了的柠檬一样扔掉。谁不这么做，谁就是笨蛋”。<sup>3</sup>

在 5 月 24 日共产国际八次全会上，斯大林做了题为《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的演说，认为在与蒋介石决裂之后，应维持与武汉政府的合作：“反对派建议在中国立即成立工农兵代表苏维埃”，但苏维埃“首先而且主要是反对现存政权的起义机关”，“反对派是否懂得现时在中国成立工农代表苏维埃，就是造成苏维埃和武汉政府这两重政权，而且必不可免要提出推翻武汉政府的口号呢？”斯大林还批评托洛茨基低估农民的作用，认为这个错误“从 1905 年起就和托洛茨基形影不离，它在 1917 年 2 月革命前夜表现得特别明显，并且直到现在也没有离开托洛茨基。”<sup>4</sup>

斯大林虽然反对立刻建立苏维埃，但是认为如果形势发展，条件成熟时就可以建立苏维埃。1927 年 5 月共产国际八次全会决议提出：“在革命的继续发展，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已经开始，则成立工农兵代表委员会即成必要，这时，成立苏维埃的口号便成了党的中心口号”。<sup>5</sup>从 1926 年 11 月共产国际

<sup>1</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27-228 页。

<sup>2</sup> 《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 年 2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 415 页。

<sup>3</sup> 斯大林：《在联共（布）莫斯科机关积极分子会议上关于中国大革命形势的讲话》（1927 年 4 月 5 日），《党的文献》2001 年第 6 期，第 69 页。

<sup>4</sup> 斯大林：《中国革命和共产国际的任务》（1927 年 5 月 2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第 229、223 页。

<sup>5</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608 页。

七次全会到 1927 年 5 月中共五大和共产国际八次全会，中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政策也日趋激进，越来越强调发动土地革命，建立独立军队，争夺领导权。

#### （四）共产国际八次全会强调建立独立军队

蒋介石 4 月发动政变之后，中国革命的形势明显恶化了。斯大林的基本倾向是，在争夺政权的决斗中，只能勇往直前，后退没有出路。5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次全会比七次全会更加激进，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是 6-7 月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的总方针，5 月底那封著名的指示信就是决议的具体化。决议案中建立新军队和争夺领导权的意向更为坚决，一方面要推进土地革命，不惜抛弃资产阶级，争取农民，建立自己的军队；另一方面也要尽量推迟决裂，充分利用国民党左派武汉政府来发展自己，这确实需要很高的政治技巧。

决议案首先强调土地革命和建立工农武装：“要想引导群众加入斗争，只有在乡村实现土地革命”。“农民革命（没收土地和国有土地包括在内），这是中国革命中新阶段之主要的社会经济内容。使千百万农民从下面以‘平民式’的直接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共产党站在前线，指导这个运动，在目前最为重要”。“另一方面，只有在这种从上面和下面协同实现土地革命的政治之原则上，才能在坚固的革命的基础上，造成真正可靠的武力，改编一切旧有的军队”。“必须迅速，大胆，果决的实施武装工农群众之政策。最先武装那已经有组织的觉悟的部分”。<sup>1</sup>

决议案同时要求维护国共合作，认为“如果看轻国民党这个革命运动的特殊组织形式，实际上便是助成右派攫得国民党的旗帜”，“共产党的策略，万不可为蒋介石的机变作保障（退出国民党路线，便不能免这种结果）”。<sup>2</sup>为了利用国民党的旗帜，暂时就不能打出苏维埃旗帜，“在中国革命进展目前的阶段中，即刻成立工农兵苏维埃，必然被认为是两个政府，是推翻武汉政府的路线，是越过国民党这个群众的组织及国家的政权”。<sup>3</sup>

决议案认为共产党不可轻率暴动，需要运用“纵横的策略。负责武汉政府政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601-602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604 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608 页。

策的共产党，如果永远而且在一切条件下，反对妥协的策略，这就是说，共产党要无条件的同时向各方作战，这是大愚特愚”。“何时应该妥协，何时必须转守为攻，这要就具体条件决定。共产国际特别以为，有些同志在蒋介石上海政变时建议实行暴动的策略，十分谬误”。“须知暴动的策略乃是暴动既发，便要采取攻势。所以有了相当胜利的希望存在，才可着手暴动。暴动是‘玩’不得的”，“假使上海工人发起了广大的武装行动，则必被蒋介石帝国主义联合武力扑灭，中国无产阶级的鲜血，在一个毫无胜利之望的战争中，便会平白洒尽。”<sup>1</sup>

根据斯大林的经验，革命高潮创造了革命夺权的机会，必须勇敢抓住，如果错过一个机会，可能要等待多年。但是，在发起暴动之前一定要小心，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 7 月也不得不退让，列宁暂时躲到了芬兰，等到 10 月更有利的时机一举成功。在本身力量有限的情况下，一定要尽量利用各种合作关系，十月革命是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合行动，革命胜利之后双方才走向决裂。但斯大林明显高估了武汉政府的革命性，将其与俄国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做了类比，国民党左派确实一度表现得相当激进，但其依靠的大部分军队却是很保守的。

仔细研究共产国际当时的决议和指示，可以发现共产国际两个相互矛盾的指示是有所偏重的，推动土地革命、建立军队、争夺领导权是真实目的。共产党的革命目标与国民党根本不同，分手是早晚的事，1924 年 6 月鲍罗廷就曾对谢持、张继说：“两者本互相利用。国民党利用共产党。共产党利用国民党。”<sup>2</sup>国共合作并非是永久的合作，延迟最后决裂的时间，是为了做更充分的准备。实际上，列宁谈到与阿富汗国王的合作时就说过，他对阿曼纽拉不报幻想，“但革命的策略要求我们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sup>3</sup>

但国民党并不愚蠢，事实上国民党领导人比中共干部年龄更大，政治经验也更为丰富，比如像谭延闿、唐生智这样的军人，当面说话非常动听，涉及实际利益则寸步不让。他们当然也知道合作只是暂时相互利用，他们与鲍罗廷合作的目的是想得到苏联的军火和经费支援，中共要在这种相互利用中占优势需要老练手腕。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是教授出身的思想家，他在 1927 年 3 月毫无城府地对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09-610 页。

<sup>2</sup> 《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3 页。

<sup>3</sup> 《罗易回忆录》下册，商务印书馆 1978 年版，第 435 页。

吴稚晖坦白说 20 年后就要共产革命，连年轻的罗亦农都感觉不妥，国民党当然不会等共产党发展壮大，将来推翻自己。陈独秀的话引发吴稚晖 4 月 2 日的《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这实际上就是蒋介石 4 月 12 日政变的政治宣言。吴稚晖说：“现在拥汪倒蒋，过些时又必拥鲍倒汪，再过些时，又必拥列宁倒孙文”，“规规矩矩是二十年；痛痛快快起来，二年二个月，只要有机会。但他们种种丧失信用的利用别人，他们终有给人觉悟的机会。苏俄的阴谋，施诸土耳其而不效，还要拿同样失败的方法，再来中国试验”。<sup>1</sup>到 6 月初，罗易竟然天真地把共产国际密电拿给汪精卫看，给了对方提前决裂的借口。中共其他领导人瞿秋白、蔡和森、彭述之等也都年轻气盛，书生气十足，执行这种需要高超技巧的政策十分笨拙，常被国民党先发制人。

斯大林在当时算是经验相对丰富的政治家，但他对蒋介石 4 月政变和汪精卫 7 月分共都出现明显误判。这里除了对中国国情不熟悉外，还有信息滞后的原因，斯大林远在莫斯科，而 1927 年中国形势发展可以说是瞬息万变。当时电报很贵，一个字大约要两元钱，而且要靠英国等敌对国家的机构，保密性也存在疑问。共产国际与中共的通讯更多靠信件，当时上海到莫斯科的信件要“三四个星期”才能到达，<sup>2</sup>送到最高领袖斯大林手上还要一些时间。也就是说，斯大林常常是根据一个月以前的信息做判断。

在形势发生紧急变化的时候，莫斯科和上海、武汉之间也通过电报联系。电报快得多，一般可以在一两天内到达。但是由于电报费用很高，一般都比较简短，很难把复杂多变的形势描述清楚，而且当时电报也不很可靠。鲍罗廷后来说：“事情常常糟糕到这种地步：莫斯科完全收不到我们的电报，或者只收到结尾部分，而开头部分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截住了，被弄乱了，因为电报都是通过帝国主义的线路拍发的。反过来，从莫斯科向汉口拍发的电报，也经常只收到结尾部分，没有开头部分。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什么消息都得不到，特别是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遭到袭击之后，更是如此。”<sup>3</sup>很明显，在这种通讯状况下，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很难跟上急速变化的中国形势。

<sup>1</sup> 《弹劾共产党》（1927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第 312-313 页。

<sup>2</sup>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斯基的信》（1927 年 2 月 2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130 页。

<sup>3</sup>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2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504 页。

## 二、工农运动自发争夺政权，中共无法建立有效领导

### （一）工农运动自发争夺政权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勇敢发动群众，争夺领导权，此时工农群众运动也日趋激进，自发起来争夺政权，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基本一致。但是，中共领导层犹豫动摇，党的组织力也很有限，群众运动虽然是中共参与发动起来的，但中共在当时还无法建立有效领导。

工人运动早就对国民党城市政权造成了冲击，1925-1926 年广东省港罢工委员会就有“第二政府”的名声，委员会设有八个部，其中财政委员会和纠察委员会权力很大，还成立了约 2000 人的工人纠察队，几乎拥有警察部队的权威。<sup>1</sup>北伐军攻占武汉后，苏联顾问巴库林 1926 年 12 月底观察到：“武汉工人建立了三百多个各自为政的工会。这种分散状态是工人组织的主要缺点。湖北省总工会迄今不起什么作用：群众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独立采取行动，缺乏自上而下的领导。”<sup>2</sup>1927 年 1 月 4 日，群众不顾武汉政府的劝阻，强行冲击占领了汉口英租界，成为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有一点可以完全肯定：无论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者是国民政府官方，都没有料到事情会这样发展。”<sup>3</sup>

刘少奇后来也提到：“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轮船火车，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通的”。“这等事在小城市如汀州干起来问题还小，在武汉那样的城市，那样多人干起来，问题真有点骇人”。<sup>4</sup>

农民运动的规模和力量远远超过工人运动。当时中国工业不发达，工人数量有限，革命工人数以十万计，而革命农民则数以百万计，成为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力量。随着北伐军的前进，农民运动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大规模展开，农民

<sup>1</sup> 萨坡什尼柯夫：《1924-1927 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第 15 页。

<sup>2</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28 页。

<sup>3</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44 页。

<sup>4</sup> 刘少奇：《关于大革命历史教训中的一个问题》（1937 年 2 月 26 日），《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23.8-1944.10），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1967 年版，第 205-206 页。

在帮助北伐的过程中组织起来，缴获了不少武器，也得到了北伐军的支持。“在北伐军所占领的湘鄂赣等省的民众运动，的确是已走入革命道上，革命已深入到乡中去，每个小县每个小村中的人民，均感到一种新的映象，充满着新的企图，打倒土豪劣绅的口号，在乡村中非常普遍，群众自动枪杀劣绅土豪的事数见不鲜。”<sup>1</sup>“湖南的农民正在把农民协会变为权力机关”，但中共中央却在实行“刹车”方针，因此“现在有一个很大的危险是，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区委，在紧急关头都没有能力领导民众，”<sup>2</sup>“湖南农民已经自行夺取地主的土地了，就连农民协会也制止不了这种夺地行为。”<sup>3</sup>

毛泽东这时敏锐地认识到，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根本改变了政治力量对比，革命者不得不在农民和绅士之间作出抉择，这与布哈林的说法基本一致。毛泽东虽是农家出身，但1925年以前并不重视农民运动，据周恩来说：“恽代英同志看到陶行知他们搞乡村工作，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回信说：我们现在做城市工人工作还忙不过来，哪有空去做乡村工作。一九二五年他回家养病，在湖南做了一些农村调查，才开始注意农民问题。”<sup>4</sup>1926年5月国民党中央通过《整理党务案》，毛泽东被迫辞去代理宣传部长职务，开始把主要精力投入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重要农运领导人。

1927年初毛泽东在湖南做了一个月实地调查，结束调查的第一天他就急切地向中央报告湖南农民已经要求从民主革命进到下一个阶段的革命：“在湖南的许多县，农民在乡村已经完成了民主革命，农民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行到另一个革命了。这样千万贫农大群众（根据长沙调查：贫农占十分之七，中农占十分之二，富农占十分之一）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依我的考察，是无论如何抑制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sup>5</sup>在正式报告中。他更兴奋地写到：“目前农运的兴起是一个极大的问题。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及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多么大的力量压抑不住”。“一切革命的党，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

<sup>1</sup>《中央政治报告》（1927年1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页。

<sup>2</sup>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63页。

<sup>3</sup>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140页。

<sup>4</sup>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240页。

<sup>5</sup>《毛润之同志视察湖南农运给中央报告》（1927年2月6日），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208页。

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sup>1</sup>

湖南农民运动自发建立起基层政权，颠覆了农村传统权力结构。毛泽东写到：“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落花流水。他们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绅士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连两公婆扯皮的小事，也要到农民协会去解决。一切事情，农会的人不到场，便不能解决，农会的人在会场里放个屁也是灵的。农会在乡村中简直独裁一切”。<sup>2</sup>亲身领导湖南农民运动的柳直荀叙述更加生动：“从前一切的乡政，都是由少数穿长衣的大人老爷们把持着。他们有时也开会议，但这是大人老爷们的会议，赤脚草鞋、带着牛屎臭味的农民们，只能站在门外听讲”。“现在世界翻了底：农民开会来管理大人老爷了。大人老爷们非服从不可。”<sup>3</sup>1927年春季的湖南“的确是一个革命的湖南”，“城市中的工会，乡村中的农民协会，简直是当时的第二政府，政府的命令非经过工农两会，简直无法执行。”<sup>4</sup>

湖北农民运动虽然兴起稍晚，但也迅速夺取了基层农村政权。据当时人的观察，“农民协会对于政权的获得很是急剧，如保卫团的收回也自动地解决了。各种纠纷的解决，从前是由乡绅办的，现在也移到农民协会的手中了。一部分的农民协会，在乡村中，有相当的权力；尤其是下层农民协会，至于接受夫妇争吵的仲裁了，如农民运动稍发达的阳新县，民事案件也少，司法委员颇为闲散。官厅多年不能解决的悬案，由农民协会解决了的也不少”。<sup>5</sup>

苏联顾问洛佐夫斯基认为，这时的农会实际上就是苏维埃。“共产党是打着‘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进入农村的。应当说，这个口号对于农村来说是最成功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农会在其实践活动中实际上就是苏维埃”。“随着农会政权的巩固，随着它的权力的扩大，随着农村的这个政权占领越来越多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农会将开始变为具有特殊职能的苏维埃。”<sup>6</sup>

<sup>1</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28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毛泽东集》第二版，苍苍社1983年版，第208页。

<sup>2</sup>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3月28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毛泽东集》第二版，第209-210页。

<sup>3</sup> 柳直荀：《湖南农民运动的追述》（1928年1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77页。

<sup>4</sup>柳直荀：《湖南马夜事变之回忆》（1928年5月），《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560页。

<sup>5</sup> 田中忠夫：《北伐军占领武汉后的湖北农民运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四册，第190页。

<sup>6</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讨论中国问题速记记录》（1927年10月1日），《共产国际、联共

在 1927 年 5 月马日事变前夕，湖南工农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与国民党争夺高层政权了。据当时长沙工人领袖袁福清回忆：“事变前，全省各县、区、乡农民协会会员和团结在农协会周围的农民群众，已达二千万人，部分地区运动发展到要求政权、要求土地的阶段了。在长沙城里，更有工农训练班，有带着红星镰刀斧头帽徽的工人武装纠察训练队、农民自卫军等组织。在事变前夕，五月中旬还召开了长沙工、农、商、学、兵的代表会议，准备成立市政府！”<sup>1</sup>

群众运动有自发的激进倾向，工农一直被压在社会底层，从来没有执掌政权的经验，初尝权力滋味，很容易有幼稚过火的政策，造成混乱失控。工会在赣州发动工潮，开始是布店工人与店主的劳资纠纷，然后扩展到理发、钱业等其他行业。“钱业店罢工获得胜利，从每月十几元工资增加到十倍以上，变成每月一百四、五十元”，“资本家对工人道：‘你来当老板，我来当工人’”，“这工资水准突出的高，影响到其它工会工资不能解决。这种弊从利生的过左政策当时是不自觉的”。<sup>2</sup>胡礼贤在《两湖一瞥》中提到，当时“湖南工人的气焰，真是不可向迩”。“工资则天天要求增加，事情必要等他高兴的时候才肯去做”，“罢工更是一件极平常的事”。农民运动更加激烈，“说杀就杀，说打就打，有些还经过特别法庭最简单的审判程序，其余糊里糊涂送了性命的，更不知道有多少。”<sup>3</sup>

当时的中共领导层对农民运动出现了明显分歧，瞿秋白、毛泽东等表示支持，觉得群众受压迫多年，矫枉必须过正，过火一些是难免的。但陈独秀等却认为应该限制农民运动：“军队用来作为借口的，不是没收土地，而是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如：军官们家里的土地和财产被没收，亲属被拘禁，一些平民被扣留和罚款；禁止运粮；强迫商人摊款；农民私分粮食，吃大户；士兵寄回家乡的小额汇款被农民没收和瓜分。这些过火行为迫使出身于中小地主阶级的军人与土豪劣绅结成反共反农民的联合战线。那些家中遭到冲击的军人，更是愤怒”。<sup>4</sup>换句话说，在激进的农民运动与国民党军队发生冲突，难以避免决裂时，陈独秀等希望站在中间，而不是站在农民一边。

<sup>1</sup> (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104 页。

<sup>2</sup> 《为马日事变访问袁福清同志》(1950 年)，《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76 页。

<sup>3</sup>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3 页。

<sup>4</sup> 胡礼贤《两湖一瞥》，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 1981 年版，第 314 页。

<sup>4</sup>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 年 6 月 1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467 页。

## （二）国民党感觉政权受到威胁，转向镇压工农运动

国民党自称为革命政党，也表示要扶助工农，但当工农运动威胁其刚取得的政权，态度逐渐发生变化。1926年秋唐生智为了挑战蒋介石，不断找中共寻求支持，双方达成合作条件。唐生智承诺：“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绝对支持湖南的工农运动，并即电告湖南代主席张翼鹏，要接受中共湖南省委所提出要撤换的和所推荐的县长”；“赶走蒋派来的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由共产党员接替，以后各部队都成立政治部，由共产党员主持”。<sup>1</sup>负责谈判的彭泽湘到唐生智总指挥部担任政治部主任，负责中共与唐的联络，唐生智的支持是湖南、湖北农民运动能够大规模兴起的重要原因。

1927年初，群众运动虽引起国民党右派不满，但国民党左派和唐生智仍表示支持。唐生智2月5日在长沙发表讲话：“目前的阶级争斗，与其说是劳资冲突，毋宁说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冲突。几千年的历史，农民都伏在统治者之下忍气吞声，现在革命的呼声将他们唤起了。他们从被治的地位，渐渐要爬起来了。”<sup>2</sup>

3月以后，工人武装起义冲击了上海城市政权，农民运动冲击了两湖国民党政府，各地国民党都感到工农运动可能夺走其刚取得的政权。无论是上海四一二政变，还是湖南马日事变，核心都是对政权的争夺，他们把工农群众自发夺权的行为都说成是共产党的阴谋。5月3日白崇禧发布《敬告武汉政军同志书》称：“共产党徒，盘踞湘鄂两省，凌乱我政纲，窃我党权，悖总理容彼各个分子加入我党共为国民革命之教言，公然厉行彼党所谓社会革命之实，以地痞土匪团结之暴力，肆行捕杀我党同志及良善农工”。“湖南全省，自去冬以来，即只有共产党而无国民党矣。湖北本年以内，亦只有共产党而无国民党矣。中央迁鄂后，尤只有共产党之政令，而无国民党之政令矣。”<sup>3</sup>

湖南农民运动的冲击也很快超过了唐生智政府的容忍限度，湖南代省长、唐的参谋长张翼鹏6月给武汉政府的《马日事变报告书》中提到，省政府的政令在农运冲击下无法实行。“去岁省党部政府议决谷米流通，并颁布去六留四，不意

<sup>1</sup> 彭泽湘：《自述》，《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9页。

<sup>2</sup> 唐生智：《革命任务》（1927年2月5日长沙讲话），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52页。

<sup>3</sup> 白崇禧：《敬告武汉政军同志书》（1927年5月3日），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版，第80、83页。

县区农运，极力阻禁，甚至甲乡不准购运至乙乡，虽经政府屡次命令，视若具文”；“土地问题，政府尚无明令，农运恃其威力，随意没收，其或不从，非目为土豪，即加以反动，人人自危，莫敢偶语”；“农工私擅逮捕，穷乡僻壤，遍设囹圄，法律由心，刑戮在口”；“武装同志，牺牲于外，家屋被其没收，妻室被其诱惑，父兄饮泣，亲族含羞，函电纷驰，无一得请”。<sup>1</sup>唐生智最初接到马日事变消息，还表示愿意与中共继续合作，但从河南北伐前线回到湖南后，发现农民协会挑战了他的政权，立刻转向反共、镇压农民运动。

外国势力对两湖工农运动冲击政权的形势也看得很清楚。中共文件提到：“过去在湖南完全表现两个政府：一为唐生智的军阀政府，一为农民的农会政权”，“当省港罢工的时候，帝国主义即说罢工委员会是第二政府，当湖南农民协会力量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农民协会是第二政府，当武汉民众势力非常之大的时候，帝国主义又说湖北省总工会是第二政府。帝国主义对于此第二政府之危险性是看得很清楚的。”<sup>2</sup>

孙科一度表现得相当激进，反对蒋介石也很坚决，但当出现对武汉政权的威胁时，也改变了对工农运动的态度。他在 6 月 20 日演讲中把政权问题说的非常透彻：“革命政府的政权，自然应统一在国民政府，绝不许有其他机关的侵占。但照前几个月的两湖情况来说，总工会、农民协会可以自由捕人，可以封没财产，可以执行刑律，可以罚人款项。这些都是政府特有的权力，却变成一切团体所共有，结果弄到政权分裂”。“我们今后一定要纠正这种错误，在国民政府之下，政权必定要统一起来，无论何种人民团体，都不能僭行政府特有的权力”。<sup>3</sup>

很明显，国民党政府可以居高临下做出扶助工农的姿态，制定一些保护工农的相关法令，但当工农运动威胁其政权时，必然转向镇压。政权问题上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中共要么站在国民党一边压制工农运动，要么站在工农运动一边与国民党决裂，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 （三）中共组织力量不足，难以有效领导大规模工农运动

<sup>1</sup>张翼鹏：《马日事变报告书》（1927 年 6 月 20 日在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报告），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 314 页。

<sup>2</sup>《中共中央政治报告》（1927 年 9 月 15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32 页。

<sup>3</sup> 孙科：《革命政府最近两月的经过》（1927 年 6 月 20 日），《马日事变资料》，第 305 页。

中共按其政治理念必须站在工农一边，支持农会成为乡村政权。6月14日《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明确提出：“农民协会之组织，一开始便含有与乡村中旧政权对抗之第二政府的性质”。“乡村政府建立之过程中，他居于领导地位。乡村自治政府既成立之后，他是政府的中坚。事实上等于指导政府的组织”，“在中国之政治民权化的过程中，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sup>1</sup>

但中共不想和国民党过早决裂，希望通过纠正工农运动过火维持国共合作，为自己赢得更多时间，这也是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过中共当时组织力很有限，无法做到这一点。中共农运骨干不少出自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到北伐战争时共有六期学员毕业。前五期重点在广东，共毕业454人，其中三分之一派往广东各地，三分之二回到各省。<sup>2</sup>第六期放眼全国，人数最多，有318人毕业，其中：湖南36人，湖北27人，江西22人。<sup>3</sup>虽然后来南方各省又办了一些短训班，但受过训练的农运干部仍非常有限，他们分散到数百万农民之中，象星星之火撒进干燥草原，能够凭着一腔热情，把饱受压迫广大农民发动起来，可一旦烧起燎原大火，却根本无力掌控。

中共当时的组织力量，相对于农民运动的巨大规模，人数实在太少，经验也不足。1926年下半年广东农会会员达到80多万，基层农会有上万个，广东区委负责农运的上层工作人员不过35人，“已不够应付种种临时发生事件之用，至说到下层干部人材更为危险，纵使在农村工作和现在耕作的农民同志都算起来也不过八百余，还是不够以区农会为单位而分配之。”<sup>4</sup>八百多党员分散在八十多万人农会会员中，平均一千个农会会员才有一个党员。1927年初，中共有大约2.5万名党员，正如维经斯基说的：“党的骨干还非常年轻。党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前才开始有广泛的政治生活。这期间党大约壮大了10倍。没有足够的力量用来改造最近几个月涌入党内的群众。”<sup>5</sup>

到5月中共五大时，党员激增到5.8万人，其中工人占53.8%，农民占18.7%，知识分子占19.1%，军人占3.1%。可以看出，主要生活在城市的工人和学生合计

<sup>1</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1927年6月14日），《马日事变资料》，第457页。

<sup>2</sup> 《全国农民运动概观》（1927年1月），《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6-7页。

<sup>3</sup> 《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办理经过》（1926），《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67页。

<sup>4</sup> 《农民运动议决案》（1926年中共广东区委扩大会议通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360页。

<sup>5</sup>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97、99页。

占 72.9%。但即使是占比较大的工人党员也只有 3.1 万，工会会员却有 280 万，工会会员中党员比例大致是百分之一。农民党员只有约 1.1 万人，而农会会员却有 972 万之多，党员占农会会员的比例只有约千分之一。<sup>1</sup>另据 1927 年 5 月湖北各县农民协会的统计表，当时全省农会会员已达约 270 万人，而表中对应的党员总数不过约 2500 人，不到千分之一，如果算上农会会员家属，就是平均几千个农民中才有一个党员。在有些地方，比如黄陂 8 万农会会员才有 4 个党员，孝感县 9 万多农会会员才有 8 个党员，随县 2 万农会会员中只有 1 个党员。<sup>2</sup>极少的党员、弱小的党组织漂浮在农民运动的汪洋大海上，只能任凭巨浪翻滚，根本无法贯彻政策、控制局势。

必须指出的是，以上这些动乱中调查得来的数字未必准确。6 月 1 日《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承认，党组织没有能力真正领导农民运动，甚至连农运的真实情况也不能准确掌握。“农民协会现时最危险的病象，便是本党在许多时机中，欠缺党的指导。各级党部对于各地斗争的形势，农民协会组织的成份、农协机关的成份，都缺乏精确的考查，对于各阶级农民的趋向，亦没有明晰的观察，对于农民协会会员的数目，武装农民的数目，亦不能够详细知道。任何地方都没有正确的整理材料”。“有些指导农民运动的负责人员，往往惯于虚报农民组织的数目，夸大农民斗争的事实，——这简直难于有正确的实际的指导，而且妨碍政治方针之确定。”<sup>3</sup>

虽然统计数字未必准确，但农民运动中党员很少是毫无疑问的，而且这很少的党员大都还是未经训练的新党员。平江县党组织批评省委派来的农运干部“既不知农运的方法，又无农运经验，在乡村中三十里路尚要乘轿，怎能与农民接近？”<sup>4</sup>在这种情况下，党组织很难建立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农民运动很大程度是处于自发状态，顺利的时候一哄而起、行动过火，遭到打击又很容易溃散。《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承认：“党在农民中的组织，过去是没有能够相当的尽其领导责任的，许多地虽然能有十万几十万的农民群众的争斗，但每每只是几个同志在那

<sup>1</sup>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 4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360 页。

<sup>2</sup> 《一九二七年五、六月湖北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第 457-460 页。

<sup>3</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五号》（1927 年 6 月 1 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161-162 页。

<sup>4</sup> 《平江报告》（1927 年 9-10 月间），《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 1989 年，第 3 页。

里活动，而不是党的组织在那里尽其领导责任，有些地方虽然有党的组织，但没有深入群众（都只在区协，没有到了乡协），或者虽有组织而不起作用”。<sup>1</sup>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和鲍罗廷都承认中共无力领导农民运动，甚至说农运是哥老会领导的。罗易“承认农民运动的过火，但不是中国共产党做出来的，乃是农民自己做出来的，便是说共产党不负此过火的责任”。鲍罗廷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同志太幼稚，不能真正领导农民运动，领导湖南农民的是‘地痞’与哥老会，而不是我们。”<sup>2</sup>他在5月会议上又抱怨：“主要的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和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sup>3</sup>农民运动是哥老会领导的说法几乎成了中共向国民党解释的官方说法，连最支持农运的毛泽东也只能跟着说。马日事变以后，汪精卫在6月13日讨论中提到，“据毛泽东同志报告，才晓得农民协会有哥老会在内把持。他们既不知道国民党是什么，也不知道共产党是什么？只晓得作杀人放火的勾当”。关于马日事变的解决方法，“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方法是对的，”也就是说不能严厉惩罚屠杀工农的许克祥。<sup>4</sup>

当时中共组织还处于松散、幼稚阶段，甚至对各级干部和党员都难以建立有效领导，他们经常违背中央政策，按照自己的想法自行其是。罗易给斯大林的报告说：“党的活动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加以组织，各地的共产党员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工作。”“共产党人常常在毫无准备、没有党的指示的情况下出席这样或那样的联席会议，他们每个人都各行其事，他们的行动败坏了党的声誉。”<sup>5</sup>当时在中共各级干部中有不少干部态度激进，对中央妥协政策不满，基层群众更加激进，妥协政策实际上很难执行。“党已发觉陈赞贤同志和赣州工潮的‘左’倾错误，决定要分别解决。但是，陈赞贤同志固执己见”，“不肯执行党的决定”。“当时党

<sup>1</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21页。

<sup>2</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25、526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1927年12-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50页。

<sup>4</sup> 《中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速记录》（1927年6月13日），《马日事变资料》，第279、280页。

<sup>5</sup> 罗易：《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1927年5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90、291页。

要陈离开赣州城，到江西省委去。然而陈不接受省委意见，又私自回到赣州去。”<sup>1</sup>

<sup>1</sup>中央后来公开承认，“湖南农民运动发展成了强有力的土地革命，其他各省亦有极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反对豪绅地主。然而这都不能算是中央所提示指令的，乃是违背中央的指示指令而做出来的”。<sup>2</sup>

方志敏当时担任江西省农民协会秘书长，同时兼任江西省委农委书记，但是他说除了《向导》以外，“其他的党内文件，就一本都没有看到，连党的五次大会决议，也未见过”。<sup>3</sup>南昌距离武汉并不远，连方志敏这样的省级干部都没有见到五大决议，可见当时党组织陷入了混乱。方志敏感觉“既无明确的政治路线，又无一定的工作方针，虽然也是一天忙到晚，但是并没有忙出一个什么好名堂来！那时的工作，可以说是上层的而不深入下层；是空洞洞的而不实际化；是带着腐化享乐的倾向，而没有艰苦地去进行工作”。<sup>4</sup>

因此，中共中央公开的妥协政策和农运的猛烈形势完全背离。就在中央发表一系列通告要求限制农运，保护小地主及军官的土地时，农民运动发展到了更激进的阶段，有的地方已完成土地的重新分配，进而要求分配其他财产。<sup>5</sup>5月24日来自湖北黄冈县的农运干部说：“绝大多数大中地主和一部分小地主，从农村逃进了城市”，“佃户们普遍认为，秋季不必交地租了，因为东家不在家。他们认为土地问题已经不存在了，所以现在很少提什么没收土地的要求。留在农村的小地主，往往为了保住性命自愿把土地交给农民协会”。“农民认为土地已经属于自己了。现在的突出问题时农民想抓钱花。这次罚款和没收逆产的发起人，一般都是农民协会中的积极分子——贫农”。<sup>6</sup>江西万安干部张世熙在六大发言中谈到，农运起来后，地主和农民“往往发生武装斗争，每次双方都有死伤。上级机关得到这些消息，便严厉的下命令批评万安工作太过火，不许再继续的这样干。可是党无论如何拉后脚，终不能抑制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sup>6</sup>

工农群众运动的规模如此巨大，冲击力如此之强，幼小的中共组织还没有力量有效领导。革命工农与国民党的决裂在所难免，中共想站在中间妥协调和是不

<sup>1</sup>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4页。

<sup>2</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66页。

<sup>3</sup>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0页。

<sup>4</sup>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第30页。

<sup>5</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248-249页。

<sup>6</sup> 《张世熙在“六大”讨论政治报告的发言》（1928年6月25日），《江西党史资料》（5），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8年，第55页。

可能的。按中共的政治本性，只能坚决站在工农一边，不惜与国民党决裂，同时依靠革命群众的巨大力量，在残酷血腥的斗争中与国民党争夺政权，这也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指示的核心思想。但问题是，以书生为主的中共各级干部准备好了吗？

### 三、中共接受国际七次全会指示，但在剧变中犹豫动摇

#### （一）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

共产国际自上而下发来了争夺领导权的指示，农民运动自下而上起来争夺政权，但两者之间的中共领导层却出现了明显的犹豫，其理论上的原因就是二次革命论。这种理论认为落后国家应有两次革命，第一次是民主革命，完成民主革命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资本主义发展，第二次革命才是社会主义革命。1922年陈独秀主持中共二大确定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的划分，大致就是这个意思。陈独秀等认为在民主革命阶段，中共的主要使命是传播革命思想和组织发动群众，争夺政权是很久以后的事，他们没料到革命形势发展这么快，书生突然面对夺权的血战，难免犹豫动摇。

二次革命论强调两次革命的清晰划分，与俄国的孟什维克比较接近，陈独秀、谭平山、彭述之、张国焘等大致倾向于这一理论，后来蔡和森说陈独秀是孟什维克并非没有道理，<sup>1</sup>这几个人最终都脱离了中共，也不是偶然的。张国焘在与少共国际代表达林的讨论中，“表示革命是应该分清阶段的”，达林很失望地称他为“革命的阶段论者”。<sup>2</sup>谭平山后来登报脱离中共时，明确说“认为中共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超时代的。”<sup>3</sup>所谓“阶段论”、“超时代”的说法大致源于二次革命论，他们认为当时是民主革命，不应该采用社会主义革命的政策。

不敢争夺领导权是二次革命论的主要表现，即认为民主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中共应等待多年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再去争夺政权。这在1926年初就有表现，中共在国民党二大上联合汪精卫获得不少权力，据周恩来说，当时还计划“把我们

<sup>1</sup>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年9月10日），《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04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版，第228页。

<sup>3</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41页。

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很久，中央来电不同意。”<sup>1</sup>布勃诺夫观察团 1926 年 3 月会见陈独秀得到的印象是：“陈认为革命胜利、取得重大革命成果的前景还非常遥远，捉摸不定”，而且觉得陈独秀对农民运动和土地问题极为淡漠。<sup>2</sup>很显然，陈独秀认为当时只是民主革命的开始，社会主义革命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他还在 7 月发表文章质疑北伐战争，引发了很多争论。

二次革命理论的另一个表现是对土地革命没有决心，担心会导致国共合作破裂。1926 年 11 月在共产国际七次全会讨论布哈林报告时，谭平山就委婉地谈到担心激进路线威胁国共联盟：“中国需要有一个包括一切革命阶层的反帝反封建残余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一方面，我们必须保证农民的利益；另一方面，我们要保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这种相互矛盾的情况下，很不容易执行正确的策略路线。”<sup>3</sup>在 1926 年底的争论中，陈独秀认为鲍罗廷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鲍罗廷当时说：“赞成解决土地问题的，才是真正左派，现在国民党中央无左派”。陈独秀在中央特别会议上，不客气地批评“鲍同志这种错误见解”，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农民群众所争的还是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捐杂税这些问题，而不是根本的土地问题”。<sup>4</sup>

鲍罗廷在 1925-1926 年对土地革命比较积极，与陈独秀有很大差别，他批评书生气十足的“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sup>5</sup>批评“上海的陈独秀实行的是反帝、反军阀斗争，根本不提土地革命”。<sup>6</sup>“鲍罗廷还充分运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通过汪精卫抽调各军部队（每军一个团），调动直属军委会的装甲车队，在花县、四会、广宁等地，协助农民的卫队对地主武装进行镇压。”<sup>7</sup>同时，鲍罗廷很重视农民势力和农

<sup>1</sup> 《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1943 年)，《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 1980 年版，118 页。

<sup>2</sup>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382 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7-158 页。

<sup>4</sup> 陈独秀：《政治报告》(1926 年 12 月 13 日中央特别会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2)，第 563-564 页。

<sup>5</sup> 鲍罗廷：《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1927 年 10 月 2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509 页。

<sup>6</sup>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13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2-63 页。

<sup>7</sup> 郑秀山、邓演存、尹时中、欧树融、陈锦松：《鲍罗廷在广东》，《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第 264 页。

村游击战争，甚至说“职工运动没有什么前途，唯一重要的是农民游击战争。中国全体共产党都要加入游击战争”<sup>1</sup>。虽然鲍罗廷在 1926 年 5 月主张对蒋介石妥协，也对张国焘说过“中共似乎是命中注定要做中国革命的苦力”，<sup>2</sup>但是他到 1926 年底已经开始布置反蒋。在 1927 年夏天与罗易的争论中，鲍罗廷和陈独秀因对具体时局认识接近而暂时结盟，其实他们的思想是有很大差别的。

远东局书记维经斯基与陈独秀思想比较接近，鲍罗廷 1926 年批评维经斯基时说，“不能允许这样的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当时瞿秋白对陈独秀、维经斯基很不满，出现了“分歧和摩擦”，瞿秋白明确表示“不同意右倾方针”。远东局成员拉菲斯在报告中指责维经斯基有“半孟什维克倾向”，明确要求共产国际撤换他，“派一名中央委员来中国领导远东局的工作”。<sup>3</sup>谭平山在莫斯科与罗易谈话时，认为中共“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他建议“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sup>4</sup>在北伐战争胜利掀起的革命高潮中，陈独秀、维经斯基因落后于形势的保守倾向逐渐失去领导威信。

虽然托洛茨基和陈独秀都提出过退出国民党，表面上相似，但其实恰好相反，前者来源于一次革命论，而后者来源于二次革命论。托洛茨基是进攻性的，主张建立苏维埃，夺取政权；而陈独秀是保守性的，把中共当做独立清高的在野党、甚至知识分子小团体，不敢争夺政权。虽然后来两人因批评斯大林而结成同盟，但他们在 1927 年的政见大相径庭，史华慈的评论可谓一针见血：“托洛茨基提出的大胆的行动方针和陈独秀的谨慎小心的‘自我保护主义’一点相似之处也没有。”<sup>5</sup>

## （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与四一二政变前后的争论

1927 年初，国共分裂的危险还不严重，中共中央受革命形势鼓舞，一度表现出超越二次革命论、积极执行共产国际指示的姿态。收到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决议案后，政治局讨论后认为：“在此次国际提案中，自然未曾说将来中国不会有第

<sup>1</sup> 蔡和森：《论陈独秀主义》（1931 年 9 月 10 日），《蔡和森文集》，第 826 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 119 页。

<sup>3</sup>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报告》（1926 年 12 月 1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44、46、48 页。

<sup>4</sup>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 年 1 月 1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68 页。

<sup>5</sup>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3 页。

二次无产阶级的革命”，“只是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对于现在的革命遂以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自限，一步也不肯超越，一切都等待到第二次无产阶级革命再说，这便是我们过去方针和战略上根本错误。革命是活的，不象演剧和做影戏，必须演完这一幕才能开演那一幕。”<sup>1</sup>

当时农民运动在初期阶段，政治局似乎并不担心国民党反对激进政策，认为可以在国民政府的领导下，也就是在国共合作的框架下，完成从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的跃进。政治局认为：“中国国民革命前途之发展，得超过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应该“在现有的国民政府政权之下，继续发展国民革命，以达到革命的民主独裁制，将国民革命发展到超越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以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从民族解放到工农解放，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看做整个的中国革命”。“我们的革命方针和战略上，必须抓住这两种革命的连锁，使之一气呵成，不能够机械的将他画为截然不相衔接的两个时期。”<sup>2</sup>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是中共中央积极进取的高潮。在北伐军迫近上海的时候，罗亦农、周恩来、赵世炎等3月21日组织工人发动起义，缴枪上千，组织起两三千人的纠察队。在武装起义的过程中，甚至陈独秀都很积极，参加了三十多次会议，这说明在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多数人都有超越个人局限的可能。但在起义的紧要关头，陈独秀和彭述之又表现出决心不足，周恩来在中共六大说：“最后五分钟的决心问题，在这上海的江苏省委对于这次暴动没有一点动摇，而我们可说中央是动摇的，彭述之他跑去看了一下，看见许多时没有攻下敌人，于是他就发出了一个‘是否还可以支持下去呢？’晚上独秀又写了一封信给罗亦农，好像是叫可以停一下，他们是动摇的”。<sup>3</sup>

起义胜利之后，上海工人成为重要政治力量，纠察队也很有实力，积极参与组织上海市民政府，这是中共争夺城市政权的初步尝试，但立刻引起了蒋介石的嫉恨。在吴稚晖、蔡元培等文人的声援之下，他联合桂系白崇禧等军人，4月12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2页。

<sup>2</sup>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1-22页。

<sup>3</sup> 《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军事报告》（1928年7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82页。

日突然发动政变，镇压了上海工人武装，而中共中央犹豫动摇，并没有组织有效的抵抗。周恩来在 4 月 18 日会议上愤怒地说：“中央政策动摇，指导无方，对于前次广东与上海都如此，中央对于争领导权没有决心”。“起头是模糊，后来是妥协。如蒋介石完全代表资产阶级，事实很多，如汪来后不免蒋职，工人避免与蒋冲突，完全是让步，以致于失败”。<sup>1</sup>

瞿秋白、毛泽东等也对领导层日益明显的动摇犹豫十分不满。为了回答关于农民运动过火的议论，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激烈地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权力的暴烈的行动”。“一切过分的举动，在第二时期都有革命的意义。质言之，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派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sup>2</sup>这个报告不仅在湖南，而且在共产国际都产生了一定影响，毛泽东也由此成为湖南农民运动的代言人，深得湖南农运骨干的信任，6 月底蔡和森在武昌毛泽东家养病时，看到每天都有从湖南“逃亡的同志及农民到毛家来”。<sup>3</sup>

像陈独秀一样，鲍罗廷和维经斯基也因不能适应激进形势，引起了其他共产国际代表的不满，他们的领导威信动摇了。鲍罗廷已经着手策划对抗蒋介石，但他的方法仍是外交家式的上层路线，拉拢唐生智和国民党左派徐谦、孙科、谭延闿等人，不相信工农运动的力量。阿尔布列赫特认为鲍罗廷和维经斯基都落后于急速发展的中国革命，愤怒地写信给共产国际领导人：“为什么要让格里高里（维经斯基）和鲍罗廷这样不合适的人来领导这一事业。前者什么信念也没有，把这一事业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他象松鼠蹬轮子似的来回瞎折腾”。“后者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万分需要有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而不是官吏来领导一切。难道伟大的十月革命不能提供这样的人吗？”<sup>4</sup>知识分子

<sup>1</sup> 《特委会议记录》（1927 年 4 月 18 日），《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第 466 页。

<sup>2</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3 月 28 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毛泽东集》第二版，第 213-214 页。

<sup>3</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544 页。

<sup>4</sup>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斯基的信》（1927 年 2 月 2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130、131 页。

子型的维经斯基<sup>1</sup>和外交家型的鲍罗廷，或许能胜任前一时期指导中共的任务，但到了争夺政权的残酷搏斗阶段，他们越来越难以适应，中国革命新形势需要勇猛的革命家。

### （三）中共五大激烈争论，勉强接受国际指示

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后不仅给中共发来新指示，还派激进的罗易为共产国际代表，指导中共接受新政策。但是罗易 4 月初到达武汉的时候，很多中共领导人已对日趋激进的工农运动感到担心，对是否接受新政策产生了怀疑，领导层中的分歧加大了。陈独秀 4 月 10 日到达武汉，标志着中共中央迁到了革命中心。但仅仅两天之后，蒋介石 4 月 12 日在上海血腥镇压中共，紧接着李济深于 4 月 15 日在广东反共，北方军阀张作霖也于 4 月 6 日派兵进入使馆区捕获李大钊等共产党员。十天之内，北京、上海、广东三个重要地方组织连遭重创，大批党员和群众遭到杀害。

在这种情况下，罗易说服中共接受激进政策的难度大大增加。罗易说：“中共中央无法判明新的环境，党的领导和全体活动分子仍旧受到自己的旧政策的束缚，无法执行时局所要求的新政策”；“不存在渴望充当新领导的成熟的新核心”；“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没有很好理解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新提纲。”<sup>2</sup>陈独秀、张太雷、彭述之等有很大疑虑。张太雷认为，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的“国民革命的土地纲领太左了，小资产阶级将不能接受，革命联盟将因而瓦解。”<sup>3</sup>

罗易批评“认为在中国进行土地革命为时过早”的观点，指出“陈独秀同志的观点与共产国际的提纲是矛盾的”。<sup>4</sup>他强调“土地纲领的基本要求是没收部分土地——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这个建议不是由我们首次提出的，事实上农民已在这样做了”，“或者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或者为了同小资产阶级保持良好关系而延迟土地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不能为了同小资产阶级联合而背叛农民。”他还提出：“怀疑共产国际提出的政策的正确性，认为这个政策有‘激进主义’的危险，就意味着怀疑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斗争中能够行使领导权。”<sup>5</sup>

<sup>1</sup> 维经斯基回苏联后，取得经济学博士，当上大学教授，写了很多文章。

<sup>2</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334-335 页。

<sup>3</sup>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07 页。

<sup>4</sup> 《罗易赴华使命》，第 174 页。

<sup>5</sup> 《罗易赴华使命》，第 207、208、209 页。

五大政策意味着站在农民一边，很可能与国民党决裂，对此陈独秀和鲍罗廷等人都没有决心。陈独秀“正面的不文饰的”表示不同意，罗亦农和彭述之“则用声东击西的伎俩，从侧面来反对五次大会完全与资产阶级决裂的政策。”五大开会期间，武汉店员和童子团又有过火行动，封闭了两个小工厂和线店，陈独秀“大为惊怒”。<sup>1</sup>鲍罗廷虽然不反对土地革命，但认为时机还不成熟，提出应继续北伐，占领西北并接通苏联后，再和国民党决裂，因土地革命提前决裂很危险，这在当时被称为“西北学说”。罗易说：“中共领导人仍在疑神疑鬼，害怕与国民党关系破裂”。“中国共产党在形式上接受了新的路线，但却是半心半意的，在鲍罗廷的领导下，这种新的路线只能遭到破坏”。“鲍罗廷是苏联政府的代表，掌握着各种资料，控制着通讯机构”，“我就是在这种极度困难的情况下，站在这个由鲍罗廷操纵的中共领导集团的对立面，说服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符合共产国际提出的新路线的决议。”<sup>2</sup>

由于共产国际的权威，虽然有很多疑虑和争论，1927年4月27至5月10日召开的中共五大还是接受了罗易的主张。针对鲍罗廷的所谓“西北学说”，五大政治议决案说：“第五次大会认为共产党应当竭力执行深入革命的职责，以巩固革命的根据地”，“东南诸省是经济上最先进最富饶的地方，我们不能拱手让给资产阶级。”<sup>3</sup>土地议决案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大会以为必须要在平均享用地权的原则之下，澈底将土地再行分配”，“土地国有确系共产党对于农民问题的党纲上的基本原则。”具体政策上，中共一方面提出无代价没收公地和出租土地，另一方面还是对国民党做了妥协，提出“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sup>4</sup>

中共五大基本上接受了共产国际政策，强调推进激进的土地革命，又试图维持国共合作。斯大林、布哈林和罗易显然都高估了国民党左派的革命性，误以为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能够接受土地革命。鲍罗廷在中国已经三年，他对中国政

---

<sup>1</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12、519页。

<sup>2</sup>《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1938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7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79页。

<sup>3</sup>中共五大《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4-55页。

<sup>4</sup>中共五大《土地问题议决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66、70页。

治实际更为熟悉，知道国民党军队中反对土地革命的势力很大，担心过早推动激进政策带来决裂危险。鲍罗廷并不反对土地革命，也认为和国民党早晚要分手，在广东的时候他就对中共领导层说：“国共是要分家的，不过分的愈迟愈好；北伐打到北京的时候，可能就要实行分家”。<sup>1</sup>1926年12月到武汉之后，他又修正了自己的说法：“现在看来，分家之事已经大为提早了。”<sup>2</sup>但是，真正到国共分裂迫在眉睫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犹豫，觉得中共过于弱小，很可能遭到惨败。鲍罗廷虽然是老布尔什维克，但他长期生活在美国，十月革命前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是才智卓越的外交家，并不是在决裂之际领导武装暴动的革命家。

#### 四、决裂之际——中共中央妥协退让，拒绝国际八次全会指示

##### （一）5月分裂危机加剧，中共中央妥协退让

罗易在中共五大上主持通过了激进政策，但是面对日趋恶化的危急形势，这个夸夸其谈的理论家却毫无办法。中共中央的决策还是受鲍罗廷影响更大，他的实际经验比较丰富，总能针对具体情况拿出办法。此时政治局会议参加者包括陈独秀、瞿秋白、谭平山、张国焘、蔡和森、李立三、周恩来，任弼时也经常以少共书记身份参加，会议上分歧往往非常大。罗易和鲍罗廷的争论占据中心，陈独秀、瞿秋白等也各持己见，张国焘形象地说：“从莫斯科以及上海来的那些共产党人们，竟是各有一套想法，这就走到‘艄公多了会翻船’的境地了。”<sup>3</sup>

罗易在墨西哥受鲍罗廷影响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始终把鲍当做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但此时他们的观点却针锋相对。<sup>4</sup>中共中央“会议开始时，往往是由鲁易（罗易）大发一番议论，接着便是鲍罗庭起而反驳；于是陈独秀、瞿秋白、威金斯基等也就卷入了这个争辩的漩涡，相互辩难，喋喋不休。而众多的具体问题，反是在为理论争辩了几个钟头之后，出席的人们也已听得倦态毕露之时，才草草的作出决定”。瞿秋白“觉得鲁易的空谈误事，其为害是有过于陈独秀先生的”。陈独秀对四一二政变毫无警觉，在政变几天前还和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领导威

<sup>1</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24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169页。

<sup>3</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26页。

<sup>4</sup> 《罗易回忆录》上册，第203页。

信大为动摇，瞿秋白已有推翻陈的意图，但鲍罗廷“以不应动摇现有领导为理由，主张少检讨一些过去，多策划一些未来”，阻止了他。<sup>1</sup>蔡和森也说：“鲁易同志所说的一切原则都是很对的，很可宝贵的，只可惜没有说出办法，每次开会都象上课一般，只总空空洞洞的教我们一些原则”，“老鲍是有办法而无原则，鲁易是有原则而无办法”。<sup>2</sup>

为了维持国共合作，安抚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中共刚在五大上确立激进政策，就不得不出台一系列措施限制群众运动，造成了自相矛盾的混乱。5月10日五大刚刚闭幕，5月13日政治局就做出《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议决，提出限制职工运动，保护小资产阶级利益，还具体规定：“劳工部下设立仲裁厅解决雇主和店员间的冲突”，“调和店员过分的要求，规定营业管理权，保证店员不干预营业。”<sup>3</sup>

但群众运动不受控制，国民党军队也开始武力镇压了，幼稚的中共组织缺乏应对危机的能力。当时武汉政府的主力部队张发奎部和唐生智部在河南抗击奉军，5月17日，驻扎湖北的14师师长夏斗寅发动叛乱，声称支持南京政府，乘虚进攻武汉，情况十分危急，叶挺率留守部队和军校学生勉强击退叛军。5月21日，长沙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马日事变”，屠杀中共党员和工农干部，湖南党组织几乎瓦解。事前湖南省委得知国民党军队可能动手，竟提前一天于5月20日晚开会决定各自逃走，省委书记夏曦的理由是他和郭亮、戴晓云、李维汉等公开活动，很难在长沙隐蔽，决定由薛世纶、王则鸣、林蔚成立秘密临时省委。<sup>4</sup>谢觉哉后来回忆：“二十日晚我接到电话，叫我走。为什么走？走向何处？走了怎么办？均问不出，无计划各走各的。”<sup>5</sup>柳直荀也说：“事变之前，我们知道事变之将到，原有一个反攻的计划。但是当时的党虽则组织尚好，但只是一个太平时代的党，没有斗争的经验，不能应付这个斗争的环境”，“因此事变临头，手忙足乱一切计划全归失败”。<sup>6</sup>

湖南省委9月给中央的报告称：“湖南的党经过五月事变的打击，差不多完

<sup>1</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233页。

<sup>2</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27页。

<sup>3</sup> 《关于小资产阶级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1927年5月13日中央政治局议决），《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17-118页。

<sup>4</sup> 《关于我在马日事变过程中一些情况的说明》（1979年12月），《马日事变资料》，第580页。

<sup>5</sup> 《谢觉哉日记》，《马日事变资料》，第572页。

<sup>6</sup> 柳直荀：《湖南马日事变之回忆》（1928年5月），《马日事变资料》，第562页。

全瓦解了”。“省委会及一部分地方领导机关不能担负它应担负的责任”，“不但完全失了指挥力，并且不顾党的生死，负责人首先各自逃走了，有许多还是未闻风而先自溃”。“负责同志多半是书生，没有战斗经验，一般同志亦多不能战斗，因之省委失指挥力而后各地多不能独立发挥其战斗力”。“事变发生之前，全湖南党员已达二万以上，现在已收集的不过五千左右”，“大约已恢复的不能超过原有人数的三分之一”。<sup>1</sup>

数百万人规模的湖南工农运动，竟然在少数敌对军队突袭之下瓦解，党组织的幼稚以及群众组织的松散自然是基本因素，但中共中央犹豫动摇，导致各级干部缺乏血战的决心也是重要原因。鲍罗廷得到湖南“马日事变”的消息后“大发雷霆”，不过他的愤怒却是针对中共湖南干部的。他对罗易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他本人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共产党省委领导人、政治局委员），把共产党人通通逐出该省，解除所有纠察队的武装。”<sup>2</sup>鲍罗廷选择的显然不是狭路相逢勇者胜的斗争政策，而是妥协退让的政策。但他也很无奈，军队的叛乱只有更强大的军队才能镇压，但中共却没有这样的军队。

斯大林在 1926 年 11 月的七次全会就强调中共要重视军事工作，准备建立军队，但鲍罗廷、维经斯基、陈独秀等并不擅长这项工作。<sup>3</sup>1927 年 5 月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报告说：“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我们共产国际委员会代表，都对党的军事工作重视不够”；“中央军事部的人员组成薄弱，经常只有一名成员，而且是缺乏经验的同志”；“纠察队和农民游击队的武器问题难以解决”；“由于打入军队的指示很晚才由中央下达给军事部，所以向国民军的渗透工作做得很不够。”周恩来后来在六大上也说：“在武装工人和士兵方面，我们没有明确而坚定的方针”，“没有军事工作重心，也没有对这项工作的相应态度。我们把在其他工作中不好使用的较差的同志派到军队中去。结果在军队中我们没有联系，没有受过训练的军人党员。”<sup>4</sup>

反共浪潮席卷全国各地，共产党的处境越来越危急。险恶的形势在中共领导

<sup>1</sup> 《湖南省委给中央的组织报告》（1927 年 9 月 5 日），《马日事变资料》，第 511-512 页。

<sup>2</sup> 罗易：《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1927 年 5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283 页。

<sup>3</sup> 《赫梅廖夫就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27 年 5 月 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241 页。

<sup>4</sup>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28 年 6 月 27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502 页。

层引发了明显的慌乱，他们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定继续采取退让政策。中共中央极力拉住国民党左派，力图巩固与小资产阶级、小地主等“中等阶级”的同盟。夏斗寅叛变后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声明“中国共产党反对在乡村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和士兵的土地，更主张没有土地的军官及士兵分得土地”，甚至说“中国共产党关于小地主的政纲已明白规定，农民幼稚的行为，决非共产党的行动。”<sup>1</sup>

中共接连出台了一系列让步政策，限制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5月22日，湖北总工会与汉口商会代表召开联席会议，议决“在工作时间内，店员不得自由离店”，“工会及店员，不得强迫店家加用店员”，“工人向店东提算总帐事，已由湖北全省总工会通告制止。”<sup>2</sup>5月25日政治局《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要求工人武装纠察队调动“须得卫戍司令部同意”；“政治停工必须得总工会命令，总工会应极慎重，非十分重大政治示威，决不下停工令”；“工会无政府命令不得拘捕非工人”。<sup>3</sup>政治局5月25日通过《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承认“贫农幼稚行动，如均分土地、均分财产、对于土豪劣绅之逮捕罚款以及关于宗教道德革命等，引起了小资产阶级、小地主尤其是军人之剧烈反对”，认为“这些纠纷已引起极严重的政治问题”，“乡村中农运问题，一切非本党政策所规定的幼稚行动，立须依本党的领导力量，切实矫正。已没收之军人产业一概发还”。<sup>4</sup>

5月26日，政治局仍在讨论如何寻找中间道路，而不是站在工农一边坚决斗争。会议通过的《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称：“今天党所面临的问题，不是立即推翻敌人或者我们彻底投降，这里有一条中间道路，必须找出这条中间道路”。“冒立即同敌人发生武装冲突之险，对于我们党来说是不可取的。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时间，保存自己的力量，为不可避免的战斗作准备”。“同左派国民党的领导人，特别是同汪精卫建立更密切的关系，以便结成一个联盟去反对名义上是在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民党内的军阀反动势力”。<sup>5</sup>

罗易反对让步政策，但他得不到中央多数支持，也提不出有效的替代方案，

<sup>1</sup> 《中国共产党对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1927年5月1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29、130页。

<sup>2</sup> 《工商联席会议议决案》（1927年5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19、124页。

<sup>3</sup> 《工人政治行动议决案》（1927年5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4-135页。

<sup>4</sup> 《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6页。

<sup>5</sup> 《关于湖南事变以后的当前策略的决议》（1927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38、139页。

只能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抨击“鲍罗廷实行的是葬送革命的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策。他处事独断专行”，“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不符合他的政策的报告不能发出”，“拒绝发我的电报”。<sup>1</sup>他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认为“过去的根本错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没有把农民武装起来”，“这种政策的结果是灾难性的”。他还批评“党太年轻，没有传统和经验”，中共中央“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而鲍罗廷则认为“中国革命10年内不可能取得成功”，“谈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幻想”。5月27日政治局会议上通过的仍是“实行策略性退却。”<sup>2</sup>

政治局确定了安抚武汉政府的方针，于6月初连续向全党发出控制农民运动的通告。6月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央通告农字第5号》，认为国民革命军的军官“皆是地主阶级出身，大多数自己是小地主。贫农力争改革土地制度的斗争，打击了军官的利益”，“如果现时在军队中的军官，完全离开革命，那就足以使整个革命运动发生很大的崩裂，甚至于破灭”。“平均田地甚至于平均佃权，以及均分财产，强迫捣毁祖宗牌，没收兵士邮寄回家之款等，都是不正当的政策”。<sup>3</sup>

中央紧接着又在6月6日发出《中央通告农字第7号》，要求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此等无组织之行动，如下列各事，目前尤当绝对迅速纠正！”“自由逮捕，罚戴高帽子，游街示众，吃排家饭等行动，往往殃及小地主，引起军官及小地主的反动”。“禁米出境，勒写捐款，铲除烟草，禁止酿酒等事，足以使商业停滞，妨碍城市与乡村之交通，引起中小商人之反动，更可以使政府借阻止军米妨碍税收的口实，实行压迫农民运动”。“反对旧礼教，拜祖教及一切迷信菩萨等束缚农民的恶俗，改革男女关系的运动等，自然都有进行的必要，但是这些都是文化运动，只能用宣传而不能用鼓动方法，更不能用强迫方法”，“不可以强迫捣毁其神像祖宗牌等”。“各级农民部，须知农民运动已至极严重的时期，我们如果不能切实执行党的政策，以改正过去的错误，万难挽救目前的危机。换言之，即将使整个农民运动，受致命的打击，亦即使整个革命运动受极大的创伤。所以，各

<sup>1</sup>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1927年5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74页。

<sup>2</sup> 罗易：《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1927年5月2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87-292页。

<sup>3</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5号》（1927年6月1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56-157页。

级农民部，务须指导各级农民协会党团，严格执行，至要！至要！”<sup>1</sup>

## （二）共产国际八次全会指示坚决进攻，中共中央拒绝执行

1927年5月18-30日召开了共产国际八次全会，5月30日苏共政治局会议决定给中共发一封要求坚决进攻的指示电。这封电报不仅加快了国共分裂，而且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引发了激烈对抗，中共拒绝执行这封电报，是被斯大林指责为“右倾机会主义”的重要原因。

电报虽然也提到通过农会纠正过火，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但主要的倾向是进攻性的，认为“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电报关键内容是要求“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人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sup>2</sup>十月革命后大批苏共党员参与创建红军是革命胜利的关键，斯大林本人正是红军南线察里津血战的主要领导人。中共全部党员不到六万，斯大林要派两万党员去参军，就是要中共不能心存侥幸，应下定决心迎接即将到来的血腥残酷的国内战争。电报也提出了一些不现实的要求，比如改组国民党中央、审判反动军官等，说明斯大林对半个月来夏斗寅叛乱和马日事变的巨大冲击不了解，出现了信息滞后。

国内战争单靠两万党员当然不够，还需要争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因此不仅不能压制农民运动，还要通过土地革命来发动农民，为此应不惜与地主及资产阶级决裂。6月3日，苏共政治局根据最新报告召开紧急会议，再次发出要求坚决进攻、反对退却的电报，并明确表达了不满，认为“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要以伤亡减员为借口将张发奎的部分部队，如若可能，则将其所有部队作为比较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我们没有得到关于收到最近的电报的确认。这是不能容忍的。”6月6日，苏共政治局再次发出电报：“为答复陈独秀的电报，再次重申

<sup>1</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七号——纠正农民无组织行动》（1927年6月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74-176页。

<sup>2</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298-299页。

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sup>1</sup>

但中共中央多数领导人的想法完全不同，陈独秀、谭平山等害怕决裂，没有准备好面对即将到来的残酷战争，认为只能退却。罗易 6 月 5 日给斯大林的电报说：陈独秀是“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向农民进攻。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在目前革命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导对党是极其有害的”。“党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但不是它的领导成长壮大了”。 “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sup>2</sup>

6 月 7 日，中共政治局开会讨论莫斯科来电。陈独秀直率地表示拒绝：“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谭平山也明确反对电报：“如果我们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还主张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更糟糕了”，“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莫斯科的电报。它们是想让我们振作精神。” 罗易支持共产国际电报，认为依靠陈独秀等人无法执行进攻政策，需要立刻改组中共中央，他在 6 月 8 日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若彻底揭露旧的政策，实行坚强的领导，则还可以挽回局面。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sup>3</sup>

6 月 15 日，陈独秀代表政治局致电共产国际，明确拒绝莫斯科的指示。他强调“整个军队对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都抱有敌意”，“这种情况下，不仅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也必须采取让步政策”。“否则，将立即引起与大部分反动军队的冲突，与国民党发生分裂，而我们将变成一个反对党”，“在最近的将来，继续留在国民党内客观上大概是不可能的”。“中国共产党设法要建立民主政权，但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实现”。“当我们还不能实现这些任务的时候，必须与国民党和国民党军将领保持良好关系”，“我们的迫切任务是要纠正‘过火’行为。”<sup>4</sup>

苏共政治局 6 月 16 日会议决定重申既定政策，严厉批评中共不执行国际指示，同时决定派以勇猛著称的罗明纳兹去中国，代替罗易和鲍罗廷。指示电称：

<sup>1</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 108 号（特字第 86 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306-307 页。

<sup>2</sup>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1927 年 6 月 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303 页。

<sup>3</sup>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27 年 6 月 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308-311 页。

<sup>4</sup> 《陈独秀根据政治局意见致共产国际电》（1927 年 6 月 1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468-469 页。

“我们没有任何新方针，而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机构民主化的决定”。

“答复陈独秀的电报，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sup>1</sup>

莫斯科毫不动摇地坚持进攻政策，让犹豫不决的中共领导层陷入混乱之中。在 6 月 26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感觉走投无路的陈独秀悲叹道：“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含糊地说：“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张国焘则激烈地表示：“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该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谭平山、瞿秋白、周恩来、张太雷的发言模棱两可，只有任弼时坚决支持莫斯科：“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应该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当鲍罗廷反问“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时，任弼时回答：“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sup>2</sup>

任弼时在这次会上表现很坚决，但在国共正式分裂后发表宣言的时候，他却坚持不要点名批评汪精卫，给苏联顾问留下了“很不稳定，政治上不大可靠”、“害怕进行真正的斗争”的印象。<sup>3</sup>毛泽东在这一时期也写过迷茫沉郁的《菩萨蛮·黄鹤楼》，后来批注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sup>4</sup>的确，当时几乎每个人都有过犹豫动摇的时刻，每个人都在挑战自己的极限，从激进书生转型为勇猛革命家绝非易事。

### （三）最后决裂——湖南暴动计划夭折与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

6 月中上旬，蔡和森曾提出一个湖南暴动计划，得到了罗易的支持，但在犹豫动摇之中又取消了计划。当时鲍罗廷、陈独秀、李立三、瞿秋白主张借唐生智、

<sup>1</sup> 《政治局 1927 年 6 月 16 日会议第 111 号记录》，《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349 页。

<sup>2</sup> 《西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1927 年 6 月 2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357-363 页。

<sup>3</sup> 《西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 年 8 月 2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27 页。

<sup>4</sup> 张仲举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第 12 页。

张发奎的力量东征蒋介石，罗易、谭平山主张借张发奎的力量南伐广东，蔡和森主张在湖南暴动，他尖锐地说：“北伐是冯玉祥的事，东征是唐生智的事，都与我们无关，我们不要再为他人做嫁衣裳，伐来伐去，依然两袖清风，一无所得！这便是说现在我们必须坚决地自觉地来干我们自己的事，来找我们的地盘和武力”。“武力”和“地盘”的提出，确实是一个大突破，这就是建立红军和苏区的思想。蔡和森提出的湖南决议案包括建立五万以上农军、没收土地、赤色恐怖、反攻长沙，这与国际来电相符，罗易表示支持，于是组织了“湖南特别委员会，专为指挥湖南暴动”，派了不少军事同志去湖南。但后来罗易听了一个报告，认为湖南革命势力已经瓦解，决定取消暴动，军事部负责人周恩来白忙一通，气得“与罗易大闹一场”。<sup>1</sup>

这一阶段，罗易确实是莫斯科进攻政策的主要支持者，但他也不是成熟的革命家。6月5日，他竟然把莫斯科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个幼稚举动显然加快了国共分裂的进程。在鲍罗廷等的攻击之下，共产国际6月22日决定召回罗易，“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sup>2</sup>蔡和森评论道：“鲁易（罗易）始终不失为一个书生，原则是在纸上维持着，实际问题一个也未见到”。“鲁易既始终要拉住汪为中心，又始终要提出汪所不能接受的政纲，这是老鲍始终有力制胜鲁易之点”。“鲁易是想扩大张发奎的势力，此事老鲍坚决反对，因此共产党中央军部负责同志及中央政治局多数亦坚决的反对，以为这个意思一露出，唐生智等马上就要和我们翻脸，何键马上即会暴动政变。但是鲁易终不死心，卒把此意完全告知汪精卫。”<sup>3</sup>

对罗易泄密的处罚也说明，莫斯科坚持国共合作只是暂时的策略，就像十月革命时与左派社会革命党的合作一样。斯大林一方面要求维持国共合作，另一方面要求土地革命和建立军队，两者显然矛盾。但其实前一方面只是掩护，重心在后一方面，在国民党的掩护下通过土地革命和建立军队壮大自己。罗易竟然幼稚到把汪精卫当做自己人，显然是误解了斯大林的本意，所以莫斯科“对这种行为

<sup>1</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29-530页。

<sup>2</sup>《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0号记录》（1927年6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4页。

<sup>3</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38-539页。

感到吃惊”，立刻决定召回罗易。<sup>1</sup>布哈林一年后在中共六大作报告时，特别批评罗易“将共产国际之秘密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种人完全是做得糊涂，愚笨”，明确说“狡猾的政策，欺骗的政策，外交式的奸诈”，“对待我们阶级的敌人是完全可以用的”。<sup>2</sup>

中共中央没有行动决心，不过还是发了一个通告，尝试把农民运动的巨大力量组织起来，通过农民自卫军建立军事力量，甚至对会党武装也积极争取。6月14日《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要求“各省军部须派有军事工作能力及经验的同志训练农民自卫军，使其有野战与迅速集中的能力”，要求建立“乡村自治机关的保安队，并须实行民兵制，使每个农民都能获得军事训练，并使有一批复一批的武装训练与补充，这个问题非常严重，各省军部及农民部，均须积极切实准备，同时必须号召农民加入军队。”通告还提出联络会党：“农协中不应用任何方法，任何形式排拒会党。可介绍会党分子加入国民党，会党中有阶级觉悟的应介绍加入本党。”<sup>3</sup>

在共产国际强调建立军队的时候，却发生了武汉工人纠察队缴枪事件，此事也是后来共产国际批评中共“右倾机会主义”的例证之一。唐生智、张发奎军队在河南打败奉军以后回师武汉，唐军驻汉口、汉阳，张军驻武昌。6月下旬，唐的部将何键将要在武汉发动叛乱的传闻风声鹤唳。6月底，中共中央为消除武汉政府的疑虑，明令宣布解散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本来是想秘密调纠察队过江到武昌进入张发奎军队，结果纠察队听到传闻后抛弃枪支、一哄而散，这也说明没有严格训练和实战经验的工农武装战斗力很差。<sup>4</sup>总工会布告称：“现在武汉反动派，企图挑拨工兵之感情，制造种种谣言，中伤本会纠察队，以致飞短流长，淆乱外间闻听，影响工兵联合战线。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二十八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并经交存政府”。<sup>5</sup>

关于纠察队缴枪事件，蔡和森对其前因后果有更详细的记述：“自上海失败

<sup>1</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2号（特字90号）记录》（1927年6月18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348页。

<sup>2</sup> 布哈林：《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1928年6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182页。

<sup>3</sup> 《中央通告农字第八号》（1927年6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185、189页。

<sup>4</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39-540页。

<sup>5</sup> 《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1927年6月29日《汉口民国日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621页。

之后，‘纸老虎’的工人纠察队迅速发展”。“五次大会后，则以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改编入正式军队之论极占优势。夏斗寅叛变时，湖北全省总工会纠察队有逃走怯懦之现象，遂益愈确定了这种‘改编入正式军队’的方针”。<sup>1</sup>6月底，邓演达出走前警告共产党何键将在汉口发动叛变，“太雷提出纠察队、童子团问题今日一定要解决，恩来报告中央军部与省委军部业已决定于今日下午将总工会纠察队调过武昌入张发奎军，并已与张交涉好，但为避免耳目计，过河时不着纠察队衣服，也不携枪。和森说：‘这实际是解散纠察队了，何不率性公开宣布，以消灭何键暴动之借口？’大家遂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实际编入张军”。“不意省委及总工会处理纠察队之事，手忙脚乱，未向负责同志说明，以致一时大形混乱，纠察军及办事人弃枪弃职，逃走一空。”<sup>2</sup>

中共领导层中不少人陷入慌乱之中，几百万农民夺取土地的革命已经无法控制，国民党已经转向用军队镇压农民。农民与国民党已经决裂，到底是站在农民一边？站在中间？还是站在国民党一边？这是中共必须回答的尖锐问题。选择站在国民党一边等于背叛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成为国民党的附庸；选择中间立场等于回避重大政治问题，失去政治影响力，像后来的陈独秀派、胡适派一样；选择站在农民一边，则意味着立即与掌握军队的国民党决裂，面对血腥残酷的镇压，经历过苏联建国血战的斯大林发出了强硬指示，但外交家鲍罗廷、学者陈独秀以及知识分子为主的中共领导层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斯大林在7月9日批评道：“现在的中央（它的上层领导人）是国民革命时期锻炼出来的”，“但它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sup>3</sup>从后来武装暴动、建立红军和苏区的历程来看，莫斯科指示强调建立军队和发动农民的战略方向无疑是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关键。

在国共破裂的最后关头，斯大林一方面坚持强硬指示，另一方面也不放弃对国共合作的利用，力争把柠檬完全榨干。在7月8日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他提出利用国民党下层反对上层，这一策略在布尔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的合作中有过成功经验。他说：“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

<sup>1</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39-540页。

<sup>2</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43-544页。

<sup>3</sup>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年7月9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407页。

弃他们。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对立”。“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sup>1</sup>在这一时期，正在索契度假的斯大林，显然对武汉政府产生了误判，没料到汪精卫这么快就转向反共，误判蒋介石之后又误判汪精卫，必定又要遭到托洛茨基的嘲弄。在 7 月 9 日信中，斯大林的情绪失控，竟对布哈林和莫洛托夫怒骂起来：“你们两个人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的）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sup>2</sup>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斯大林的粗暴性格。

7 月 8 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指示“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但“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各个组织中和拥护国民党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领导机关进行坚决的斗争”。“共产党的领导机关应该真正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心。否则，党就会毁灭自己。”<sup>3</sup>7 月 13 日，中共中央根据莫斯科指示，公开宣布退出武汉政府。

7 月 14 日，共产国际在《真理报》公开发表了与武汉政府决裂的决议：“最近几周，事态发展得特别快”，由于“军事将领和军官团公开转入反革命营垒，并宣布与农民为敌”，“武汉政府已成为反革命势力”。“中国共产党人毫不迟疑地退出武汉政府，以示抗议”。“不退出国民党。尽管国民党领导在开展将共产党人清除出国民党的运动，要留在国民党内。要同国民党基层建立更密切的联系，由基层作出决议，坚决抗议国民党中央的行为”。<sup>4</sup>7 月 15 日，汪精卫在武汉国民党中央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分共，不过仍表示“和平分共”，并且在 7 月 16 日《汉口民国日报》公布了《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sup>5</sup>

7 月 28 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以俄国革命的经验为国共合作辩

<sup>1</sup>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7 年 7 月 8 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400 页。

<sup>2</sup>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1927 年 7 月 9 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405 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电》（1927 年 7 月 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487-488 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1927 年 7 月 1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491-494 页。

<sup>5</sup>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07 页。

护：“在十月革命时和十月革命后，直到 1918 年春，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革命联盟是否正确呢？我想，还没有人敢于怀疑这个联盟的正确性。”<sup>1</sup>的确，在蒋介石控制的地区，国共早已分裂，而共产党遭到的损失更大。即使在与武汉政府决裂的最后关头，对于相对弱小的中共来说，每一点值得利用的合作机会仍然是可贵的，所以当中共终于在南昌发动八一武装暴动时，仍然打出了国民党的旗帜。

## 五、小结

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还处于幼稚时期，政治理论未经实践，领导机构缺乏经验，各级干部意见分歧，无法有效领导数量巨大、情绪激动的工农群众，也无法制定出成熟的政策，即使有政策也很难贯彻执行，当面对夺取政权的血战时，难免要遭受挫折。一个政党只有经过严重挫折的考验，才能实现深刻的转型，真正走向强大。

斯大林 1927 年 7 月底的评论是有道理的：“以为中国共产党能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一下就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那就可笑了。只要把我们党经历过的一系列的分裂、脱离、变节、叛卖等等历史回忆一下，就能明白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党并不是一下子就能产生出来的。”<sup>2</sup>罗易 1929 年的回顾也颇为中肯：“党太年轻，在完成所面临的艰巨任务时，难免不犯错误。党缺乏必要的政治经验”。“中国共产党从一个主要是知识分子的小组织，突然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着参加这场大规模革命斗争的 250 万有组织的工人和大约 900 万有组织的农民。然而党的领导仍然主要是知识分子；他们被事变的发展弄的不知所措，不能驾驭局势。”<sup>3</sup>莫斯科指导外国革命同样没有经验，共产国际 1919 年成立，1920 年才制定在落后国家革命的理论，连列宁都承认对中国、印度了解不多，理论很不成熟，有待实践的检验。

<sup>1</sup>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 年 7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第 268 页。

<sup>2</sup>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 年 7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第 265 页。

<sup>3</sup> 罗易：《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的结论》（1929 年），《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6），第 396-397 页。

中国共产党 1921 年成立，最初只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小团体，在 1925 年五卅运动以后迅猛发展，党员从几百人很快超过万人，成为有影响的群众性政党，但各级干部仍以知识分子为主。1926 年下半年北伐战争节节胜利，新党员大批涌入中共组织，武汉第一纱厂“十月革命九周年纪念的前夕，一夜之间就发展了七八十个党员”，<sup>1</sup>到 1927 年五大时中共党员已经猛增到五万八千多人。但是，党员的迅速增加并不等于组织的强大，甚至可能带来组织的混乱，短时间内蜂拥入党的新党员难免泥沙俱下，很多人只是在革命形势顺利的情况下寻找个人出路，并没有坚定的信仰和组织训练，这种组织上的弱点在面临复杂局势和严峻考验时必然会导致挫折。失败不是某些人的具体“错误”造成的，而是组织在特定阶段的内在弱点决定的，在面临全新环境、需要脱胎换骨的转型时，无论多么“正确”的政策，都很难避免中共在斗争初期遭受挫折。正如毛泽东 1936 年对斯诺说的，“即使共产党在分裂以前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政策，从工人和农民中创建了党的军队”，他也“并不认为反革命在一九二七年会被打败”。<sup>2</sup>

中共组织虽然由于年轻幼稚遭受失败，但在逆境中表现出很强的生命力。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恽代英等一批中共精英经受住了失败的考验，开始发起暴动、创建红军、开辟苏区，领导残酷的革命战争。在那个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的时代，中共有了自己的军队和革命根据地，就有了继续竞争政权的机会。

---

<sup>1</sup>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141 页。

<sup>2</sup>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 1979 年版，第 140 页。

## 第二章 中共在武装暴动中的组织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既取得了巨大发展，也遭受了严重挫折。在国共分裂后的血腥镇压中，李大钊、陈延年、赵世炎等喋血刑场，许多知识分子离开了中共，但很多精英骨干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恽代英等闯过了这一关，他们从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分化出一部分军队，勇敢发起武装暴动。中共失去很多知识分子的同时，大批革命农民以及贺龙等勇猛战将在武装暴动中加入进来，中共的组织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初步实现了向武装革命党的转型。

### 一、最后的合作——初期红军多出自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斯大林反对中共过早退出国民党，要求维持国共合作到最后一刻，是希望从中获得好处，特别是获得建立军队的机会。虽然斯大林早在 1926 年 11 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上就强调中共应重视军队，但他在 1927 年 5 月 13 日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中，明确反对立刻建立独立的红军，他认为比较现实的是在国民党的框架下，“使现有的军队改善并且用种种可以用的手段使它革命化，现在就奠立新的革命团队和师团的基础，这些部队由革命的、经过农民革命学校的农民和由革命的工人组成，建立几个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这些军团就将为那个新的、后来发展为红军的军队”。<sup>1</sup>

中共部分实现了这个设想，在与武汉政府最后决裂之前，从国民党左派手中获得了不少军队，汪精卫在军队里的主要支持者是张发奎，他的第二方面军成了初期中共军队的重要来源。

#### （一）国民党左派的激进倾向是合作基础

在 1927 年 3 月二届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左派表现出相当激进的革命倾向，

---

<sup>1</sup> 斯大林：《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 年 5 月 13 日），《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合出版社 1949 年版，第 55 页。

这是中共与其合作的政治基础，但也使斯大林、罗易等发生误判，以为国民党左派能够接受激进土地政策。鲍罗廷联合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等主导了这次会议，蒋介石和张静江没有出席，会议强调集体领导，取消主席制，蒋介石失去了中常会主席、组织部部长、军人部部长等重要职务。二届三中全会对农民宣言相当激进，认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的目标，在于使农民得到解放”，主张超越减租减息政策，重申孙中山以前提过的“耕者有其田”，声称“本党决计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sup>1</sup>苏联顾问巴库林 3月 19 日写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会会议已经结束。整个来说，它标志着国民党武汉派领导集团的政策向左转了”，“同蒋介石决裂是在所难免的了”，“这次全会还使共产党人现在进入了国民政府”。<sup>2</sup>可以说，会议基本上恢复了 1926 年 3 月 20 日中山舰事件之前国民党左派与中共紧密合作的局面。

汪精卫是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他在“请假”一年之后，取道苏联回到国内，他在莫斯科会见了斯大林等领导人，很可能达成了合作的谅解。汪精卫到上海后，拒绝了蒋介石、吴稚晖等人分共的要求，4月 4 日与陈独秀发表维护国共合作的联合声明，并且在 4 月 6 日给好友李石曾的信中说：“五日谈话会散后，痛苦万分。弟深信弟意见，决不能得吴先生等之赞同。而吴先生之意见，弟亦决不能赞同”。“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政策绝不可牺牲”。<sup>3</sup>很明显，汪精卫为维持与共产国际及中共的合作，不惜与蒋介石等人决裂，罗亦农在 4 月 6 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说：“汪精卫的态度非常之好，政治观念很稳定，与 C.P.可以合作下去，甚至于到建设社会主义，他绝对赞同共产国际给我们的训令。”<sup>4</sup>

汪精卫刚到武汉两天，蒋介石就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4月 15 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宣布蒋介石十二大罪，认为他“自绝于党和人民，自甘堕落为一个新军阀”，将其开除党籍。<sup>5</sup>5月 4 日，汪精卫受邀列席中共五大，并且在发言中说国民党可以接受中共五大的激进政策，走向非资本主义道路。他说：“鲁依（罗易）同志解释第三国际第七次扩大会议”，“中国革命的特质，应当往

<sup>1</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229-232 页。

<sup>2</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114 页。

<sup>3</sup> 汪精卫：《寄李石曾书》（1927 年 4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第 314 页。

<sup>4</sup> 罗亦农：《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会议记录》（1927 年 4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三册，第 509 页。

<sup>5</sup>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开除蒋中正党籍发表的声明》1927 年 4 月 15 日，见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296 页。

非资本主义那一条路上走”。“照这个决议案的大意看来，中国国民党是可以采用的”。“本席觉得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国民党的政纲可以互相帮助，并无冲突”，“国共两党是可以携手合作的。”<sup>1</sup>可以看出，汪精卫一度思想相当激进，顾孟余甚至说过，汪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论述一切。”<sup>2</sup>

邓演达是国民党左派中最激进的，他对土地革命非常支持，武汉国民党中央成立土地问题委员会就是他的提议。他4月2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发言中说：“农民问题，其焦点就是土地问题，所以本席今天特提出组织问题委员会，由此会确定一个实行分给土地与农民的步骤，将来实行起来，必定得着农民真实的拥护。农民起来，做成乡村间普遍的革命现象，然后可以推翻社会的封建制度，否则必不能真正成功”。邓演达提议“请指定徐谦、顾孟余，谭平山，毛泽东四同志”为土地问题委员会委员，顾孟余提议“并请指定邓演达同志”，提议获得通过。<sup>3</sup>

武汉政府重要人物汪精卫、顾孟余、徐谦等一度都对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表现出一定热情，甚至投机的军官唐生智、何键等也说过赞成的话。邓演达后来谈到，武汉中央注意土地问题是从四月初土地委员会成立开始，“徐谦、顾孟余，军官领袖如唐生智，甚至刽子手何键，都先后发过赞成‘急切解决土地问题，要没收大地主的土地交给贫农’的议论和其他好听的话，当时在场赞成的更是所谓左派领袖，汪精卫格外热心。”<sup>4</sup>事实上，孙中山生前确实说过：“我在农民问题上的政治路线是：我决心将所有现在掌握在地主（出租土地的人）手里的土地转交给农民掌握和所有”，<sup>5</sup>所以汪精卫自命为孙中山思想的忠实捍卫者。

但国民党左派是动摇的，当两湖农民运动形成巨大社会冲击时，汪精卫等人在多数军队可能叛变的威胁下，很快改变了态度。6月，汪精卫在反共浪潮的裹挟下，“很明白的发表了许多痛骂农民运动的言论，他的信徒们且有谓‘农民蠢如鹿豕’，并指农民配不上说自身解放，根本反对民众的要求。当时汪氏一切的

<sup>1</sup> 汪精卫在中共五大的列席发言（1927年5月4日），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正中书局1981年版，第246-247页。

<sup>2</sup> 《维经斯基同顾孟余谈话记录》（1926年8月17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3），第401页。

<sup>3</sup> 邓演达：《在国民党二届常务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的报告和发言》（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5页。

<sup>4</sup> 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莫斯科），《邓演达历史资料》，第158页。

<sup>5</sup> 《就中国农民问题与孙逸仙和廖仲恺的谈话》（1924年8月10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第515页。

气力都集中于军阀的拉拢勾串，只要是高级军官说的，就俯首听命。”<sup>1</sup>邓演达后来谈到，“武汉首都的危迫与著名的许克祥反叛快来了。这个光景就是在武汉中央日夜讨论轰轰烈烈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场中，所以许多‘煞有介事’的口说先生们一次比一次沉默，最后至于藉词推宕反对的理由了”。“马日事变（五月二十一日）这个爆发的信号，是叫起了一班投机依附模棱两可的先生们，叫他们‘再不要跟着共产党失败，因为这个失败是永远的失败，我们要做我们的。’（顾孟余六月中旬给汪精卫的警告电报中的话。）这样，土地委员会的生命就上了十字架，武汉中央就心惊胆落蹲伏在封建地主的枪头底下了！！！”<sup>2</sup>

邓演达虽然思想很激进，但在政治上并不成熟。他批评汪精卫屈服于唐生智、何键等军人，自己却没有充分意识到军队的重要性。郭沫若后来说，邓演达“虽然是军人出身，但他却不喜欢自己带兵，在后期武汉政府时代，他是有可以带兵的机会的，我们劝过他自己率领一军以作为革命的保障，他不肯听从。他说：‘我才将老虎皮脱掉，又要披上吗？’为着这件事情，我始终替他可惜。”<sup>3</sup>

## （二）初期红军多出自张发奎第二方面军

斯大林在这一时期给中共的指示中，反复强调建立军队的重要性。1927年5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八次全会关于中国革命的决议提出：“武装革命的工农，编成绝对可靠的队伍，在军队内确立共产党及坚决不拔的国民党左派之影响，肃清军队中反革命分子，组织工团军，尤须特别注意。”<sup>4</sup>

中共在1927年4月就发动党团员参军，以期扩大在军队中的实力。党组织在武汉号召五百名党员参军，但因为很多工人党员有家庭负担，计划没有完成，倒是共青团的年轻人顾虑较少，超额完成了指标，参军达一千人。<sup>5</sup>中共五大《职工运动议决案》继续号召工人去拿枪：“现在的军队，多半是游民无产阶级的分子，很难使他革命化，所以我们要使军队革命化，和建立真正的革命军队，必须有多数的工人去当兵。因此到军队中去、拿枪去的口号，应该很广大的在工人群

<sup>1</sup> 邓演达：《南京统治的前途及我们今后的任务》（1930年11月10日），《邓演达历史资料》，第243页。

<sup>2</sup> 邓演达：《中国革命最近的严重局势之由来》（1927年8月17日莫斯科），《邓演达历史资料》，第158-159页。

<sup>3</sup> 郭沫若：《纪念邓泽生先生》（1946年11月20日），《邓演达历史资料》，第324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1927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608页。

<sup>5</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143页。

众中去宣传，打破一般不愿意当兵的观念！”<sup>1</sup>

张发奎与汪精卫关系密切，他的第二方面军与中共关系最好，成为中共初期军队的重要来源。这支军队是由号称“铁军”的第四军发展而来的，出自广东，革命精神比较强。张发奎本人虽然后来坚决反共，但在北伐期间他很“钦佩共产党员的热忱与战斗精神”，“从不怀疑共产党员是勇敢善战的”，“不辞劳苦”，他主动“把共产党员安排到不同的岗位，因为他们都很能干”，认为“共产党员用不同的方法帮助了我，因为他们工作勤奋。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无疑是认真负责、表现良好的。”<sup>2</sup>

1927 年 4 月，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决裂，“一些偏右的高级军官却离开武汉，跑到南京蒋介石那边去了。第十一军军长陈铭枢、第十师师长蒋光鼐、第二十四师师长戴戟，还有一些团长都离队而去”。“在这种情况下，武汉政府就对铁军的高中级军官，进行了一次调整”。这时中共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反蒋，相互信任，汪精卫和张发奎提拔了不少共产党员将领，“不少共产党员和左派掌握了指挥权”，叶挺升任 24 师师长、许继慎任 72 团团长、蒋先云任新编 77 团团长。<sup>3</sup>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为中共培养了很多军事干部，改编为 25 师 73 团，团长周士第。<sup>4</sup>75 团也由叶挺负责筹建，派入孙一中、练国梁、袁也烈、蔡晴川等担任营级干部。<sup>5</sup>这时张发奎任用共产党员相当积极，“河南进军结束时，张发奎的部队里有 8 名团长是共产党员，也就是说有 30% 的共产党员，营长也大致占这个比例”，“有些团里共产党员军官的数量相当可观。”不过，即使是共产党势力最大的第 25 师 75 团，士兵中党员的比例也只有 10-12%。<sup>5</sup>

6 月，张发奎部在河南打败奉军后回师武汉，扩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第四军、十一军和二十军，需要大规模招兵以弥补河南战役的重大伤亡。在周恩来等人的组织下，湖南、湖北很多工农运动骨干踊跃参军，使得共产党在这支部队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在夏天全国反共高潮中，第二方面军仍然对中共很友好，收留了各地逃亡出来的很多共产党员和工农干部，共产党在这支部队中势力很大，这样才有了武装暴动、创建红军的机会。

<sup>1</sup>中共五大《职工运动议决案》（1927 年 5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83 页。

<sup>2</sup>夏莲瑛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年，第 79-95 页。

<sup>3</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60 页。

<sup>4</sup>《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99-100 页。

<sup>5</sup>《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 年 9 月 14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38、41 页。

萧克说：“南昌、秋收、广州三大起义，是人民军队创建的起点，这三大起义军事力量的主要部分都来自铁军”。南昌起义几乎拉走了二方面军一半的部队，包括二十军全部、第十一军 24 师和 10 师、第四军 25 师等；广州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第四军教导团；秋收起义主力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出自该团的萧克说：“这个团是 1927 年 6 月下旬在武汉建立的，是我党根据叶挺的建议，帮助张发奎组建的。党派许多党团员骨干，担任警卫团的各级干部，使这支部队像独立团一样，成为我党直接掌握的部队。在委派团长时”，叶挺请资格比较老的张云逸去同张发奎谈，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当团长，“张发奎同意了。卢德铭赴任前，中央军委负责派遣工作的聂荣臻亲自向他作了交代，要他‘掌握好这支部队，不断扩大党团员数量，提高全体官兵的革命觉悟’。那时，团长有委派连排长之权，由共产党员任团长，这个团基本上就被我党掌握了。”<sup>1</sup>

甚至在南昌起义之后，中共还把张发奎、黄琪翔列入领导名单，而他们也没有放弃和中共合作的可能，对第四军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仍比较宽容，不然就没有发动广州起义的机会。12 月 10 日，汪精卫给陈公博的电报提到：“黄琪翔同志掩护共党，例如著名共党廖尚果竟为第四军政治部主任，《灯塔》第三、四期容共有据”。<sup>2</sup>第二天，第四军教导团就发动了广州起义。萧克说：“张发奎到广州后，还派人去潮汕同南昌起义军联系，走到惠州，得悉起义军已失败便作罢了。如果我们打胜了，他还有可能与我们联合打李济深，至少分化要迟一点。南昌起义时，我党还想争取张发奎，继续承认他为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他是七个主席团成员之一，还任命黄琪翔为前敌总指挥，他们未到职前，分别由贺龙和叶挺代理。当时我们的政策，是争取更多的同盟者留在革命阵营里”。<sup>3</sup>

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陈独秀曾两次提出退出国民党，但负责军事工作的周恩来表示反对，认为“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sup>4</sup>的确，假如中共过早退出国民党，汪精卫、张发奎势必要求叶挺、卢德铭等中共党员退出军队，这样中共就失去了发动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机会，创建红军将会更加艰难。

<sup>1</sup>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 171 页。

<sup>2</sup> 《汪兆铭致陈公博等蒸电》（1927 年 12 月 10 日），《广州起义资料》下，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482 页。

<sup>3</sup>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 165 页。

<sup>4</sup>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212 页。

共产国际一直批评中共领导人热衷于和将领搞外交，不重视士兵工作，比如罗易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党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把很多时间花在先串通这个将领反对另一个将领上，然后又串通另一个将领反对这个将领上，而不是群众工作上。”<sup>1</sup>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也有把俄国经验简单套用在中国的倾向。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在军队废除死刑，新成立的士兵委员会有权否决军官的命令，这导致军队领导体系瓦解。军官丧失了领导力，有时士兵委员会竟要求军官交出武器。因此，布尔什维克可以自由深入士兵群众进行宣传，绝大多数士兵都是工农出身，他们大批加入了革命阵营。

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旧军队的领导体系并未瓦解，而且军队不是统一的国家军队，而是效忠私人的军队，军官对军队有很深的个人影响。由于军队是军官的命根子，军官对士兵控制很严，共产党员不可能自由宣传。从中共建立军队的过程看，无论是 1927-1928 年叶剑英、贺龙、彭德怀等出身旧军队的军官加入革命阵营，还是后来争取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发动宁都起义，争取俞作柏、李明瑞发动百色起义，争取军官都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周恩来的分析很精辟：“中国雇佣式军队的特点，军官在军队中是有很大作用的。‘六大’认为在官长中进行工作就是军事投机。后来事实证明，敌军大部队的哗变和投降红军，都是由于我们在军官中进行了工作。如广西李明瑞的一个师变为红军，江西第二十六路军的起义，都是由军官领导的。”<sup>2</sup>相反，在没有军官支持的情况下，单靠士兵群众发动兵变成功的很少，在这里俄国经验很难应用到中国。

但国民党左派很难接受中共建立独立军队，最终双方必然走向决裂。鲍罗廷和罗易大约 6 月 1 日收到共产国际关于创建独立军队的电报，书生气十足的罗易竟然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就于 6 月 5 日把电报拿给汪精卫看，这成了促使他转向反共的理由。在汪精卫看来，1923 年越飞和孙中山商谈合作时，说中国共产革命在两百年之后；<sup>3</sup>1924 年 6 月鲍罗廷安抚国民党右派元老谢持、张继时，说共产革命在一百年之后；<sup>4</sup>1927 年 3 月陈独秀回答吴稚晖时，共产革命一下子提前到

<sup>1</sup> 罗易：《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1927 年 5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 290 页。

<sup>2</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 244 页。

<sup>3</sup> 《吴敬恒致中央监察委员会请查办共产党函》（1927 年 4 月 2 日），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第 362-363 页。

<sup>4</sup> 《谢持、张继与鲍罗廷问答纪要》（1924 年 6 月 25 日），《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15 页。

了二十年之后，<sup>1</sup>这造成与蒋介石的决裂，但汪精卫还能接受。共产国际 6 月 1 日电报要求中共立刻创建独立军队，显然意味着共产革命已经开始发动。汪精卫认为共产国际和中共这样步步紧逼，合作已经无法继续，双方走向最后决裂。7 月 13 日，中共宣布退出国民政府。7 月 15 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宣布分共。

## 二、八七会议决定武装反抗——吸收‘暴徒分子’入党

在 7 月 12 日鲍罗廷主持的临时政治局会议上，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陈独秀已经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组成的临时政治局常委会。共产国际让陈独秀去莫斯科，但他拒绝服从。这次中央改组是由鲍罗廷一手操办的，据蔡和森说：“老鲍提议独秀、平山去莫斯科与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秋白、和森赴海参崴办党校，新指定国焘、太雷，维汉、立三、恩来五人组织政治局兼常委。自此独秀即不视事。”<sup>2</sup>但鲍罗廷此时威信已经不高，他的计划没有落实，陈独秀、谭平山没去莫斯科，瞿秋白也没去海参崴。

新任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 7 月下旬到达武汉，他是与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完全不同的人，是一个真正的铁血革命家，这说明斯大林认为中国革命进入武装暴动新阶段后，需要不同以往的指导者。罗明纳兹 15 岁参加革命，“很早就进入了斯大林的核心集团，在后者的支持下，24 岁时就成为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他是一个“性格强硬的人物”，“以其对死亡的轻蔑而令每个认识他的人感到震惊，不管是他自己的死还是别人的死，他都毫不在乎，”<sup>3</sup>这样的人显然不会在残酷斗争中犹豫不决，铁血时代开始了。

### （一）八七会议决策武装暴动

八七会议由罗明纳兹主持召开，会议的缘起是“国际方面又电令来召集全党

<sup>1</sup> 《弹劾共产党》（1927 年 4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四册，第 313 页。

<sup>2</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546-547 页。

<sup>3</sup> 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261 页。

紧急的正式会议，以审查旧政策及指导机关，而决定新的政策。”<sup>1</sup>“电令”两个字清楚地表明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组织关系，8月4日中央致广东省委的信中提到：“新国际代表已来，决定开紧急会议。此会议批评过去中央的机会主义及决定新的政策，广东太远而工作紧张，无法参加此会”。“过去中央对湘事，及对国民党政策之动摇，因而致于失败，并且一定亦感觉到新的指导与方针之必要。”<sup>2</sup>

8月7日，中央紧急会议在武汉召开，只有三项日程：1.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报告；2.中央代表瞿秋白报告；3.改选临时中央政治局。中共五大选出的中央委员有31人、候补中央委员14人、中央监察委员7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3人，共计55人，但实际出席八七会议的只有15人，出席比例只有27%，加上共青团中央、中央军委、湖南省委、湖北省委代表以及中央秘书也只有22人，所以只能称为紧急会议，改选出来的政治局也只能称为临时政治局。这是白色恐怖下迫不得已的特殊形式，共产国际的认可是其合法性的来源。

罗明纳兹解释了紧急会议和临时政治局的合法性：“国际中央决议认为，此次紧急会议不仅是论过去错误，还应实行改组指导机关，现在的问题，是否此会有改组指导机关（中央）的权力。因为中央与各地的隔离，今天的会仅有两个地方的代表参加。但因现处于秘密环境中，故可以叫此会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可以选举临时中央政治局。”<sup>3</sup>

在报告一开始，罗明纳兹就明确提出，错误不在上层的共产国际和下层的工农群众，而在中间层的中共领导机关。“过去的错误是在指导机关，国际对于群众方面的英勇的行为仍是非常满意的。党的指导与国际的指导及群众要求差得如此之远，是非常奇怪的。”<sup>4</sup>改组中共中央，就是要陈独秀等承担失败责任。罗明纳兹说：“至于过去错误的责任问题，中央的领袖独秀同志有许多问题虽决议后，他仍要以个人的意思来改变此决议。但此责任应政治局大家来负。”<sup>5</sup>

会上罗亦农对共产国际用人不当直率批评：“大家都说国际是无错误的，我要公开的批评国际：国际的政治指导不成问题，是对的，但在技术工作问题非常

<sup>1</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小引》（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47页。

<sup>2</sup> 《中共中央致广东省委信》（1927年8月4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sup>3</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2页。

<sup>4</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2页。

<sup>5</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年8月7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4页。

之坏。既认中国革命非常重要，但同时又派魏金斯基，罗易来指导，他们都是无俄国革命经验的。魏金斯基在 1917 年以后才入党，我们在上海要暴动时他要反对，并且不帮助。至于罗易谁也知道是国际犯了左派理论幼稚病的人，这种人如何能指导中国的革命。国际的决议是好的，但派来的人不好使人不满意。这是国际要负责任的。”<sup>1</sup>

不少与会者提出，中共需要根本转型，不能再作绅士、书生的党。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发言给人深刻印象：“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也要革命，但上层的党部则不同了”。“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生了影响，对中央则毫无影响”。“这个意见是农民指挥着我成立的。我素以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结果我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总之，过去群众对于党的领导的影响太少”。“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sup>2</sup>

湖南代表彭公达的发言更加激烈：“过去中央完全是一个和平的、不革命的党，不是一个争斗的党。乡村农民已经起来夺取政权了，党反而阻挡，党对农民运动完全与顾孟余一样的见解”。“五次大会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决议政治局完全抛弃了”，“过去党的指导不好，有绅士气概。过去曾有群众忿怒欲杀上层同志的事实，如湖南都许多同志要杀夏曦，把夏曦也当做一个劣绅看待。党对这些现象不能解决，只能当书生坐在屋中决定政策。”<sup>3</sup>瞿秋白在报告中也说“革命的指导机关犯了绅士的毛病”。<sup>4</sup>

八七会议提出了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暴动的计划，选举了临时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 9 人（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向忠发、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澎湃、任弼时），候补委员 7 人（周恩来、邓中夏、毛泽东、彭公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sup>5</sup>在选举过程中，不少人表示不愿在中央工作，要求下到地方去组织暴动，其中毛泽东态度最为坚决。

<sup>1</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6-7 页。

<sup>2</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5 页。

<sup>3</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6 页。

<sup>4</sup> 《“八七”中央紧急会议》（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8 页。

<sup>5</sup>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第 71 页。

候选名单公布后，蔡和森要求不要选自己进政治局，表示自己“已决定去湖南”，要求选毛泽东为政治局正式委员。毛泽东则明确反对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李维汉也主张政治局加入毛泽东，自己退出。毛泽东仍不同意，再次坚决表示“自己非外面去作工不可”。顾顺章也说“自己适宜作下层工作，不要挂一虚名”。陆沉也主张毛泽东进政治局，不要选自己。<sup>1</sup>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等人确实表现出结束空谈、深入群众去组织暴动的勇敢实干精神。

中共党内对八七会议新方针的不同态度反映出这是一个大分化的时代，有人对彻底转变犹豫害怕，有人却兴奋迎接新的铁血时代。蔡和森说：“国际训令初到时，党的上层之间发生一种悲观的空气，以为国际训令这样一来，一切旧指导机关和指导人的信任打得粉碎”，“一定要各不相下，四分五裂。因为有这些顾虑，以致对于接受新方针非常犹豫，非常害怕。”但另一些人，则认为八七会议新方针挽救了党，北方有好些党员说：“假若新方针迟来一月，我们都散了”，蔡和森认为：“这不仅北方为然，全国莫不如此，尤其在两湖、上海及广东。我们仗着新方针，不仅挽回了工农群众的恐慌和悲观，而且兴奋了广大范围内几百几千万的群众”。<sup>2</sup>方志敏在江西鄱阳遇到省委特派员，听到八七会议消息，顿觉“满心欢喜”，立即着手收集枪支，组织秋收暴动，准备进攻弋阳县城。<sup>3</sup>

## （二）筹划武装暴动，吸收“暴徒分子”入党

八七会议后发布的告党员书对原中央提出严厉批评：“党的指导机关里绝大多数是智识份子及小资产阶级的代表”，“湖南农民开始积极的斗争，甚至于已经实行分地的时候！我党指导机关口头上承认某几种错误，然而始终继续阻滞土地革命的方针到底。我们党实际上是跟着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领袖，尽力的在那里反对农民运动中的‘过火’”。“中央在农民暴动的关头，表现这样没有争斗的决心，简直是等于出卖革命，这是无论如何不能辩护的，的确是我们党历史上的一个污点。”<sup>4</sup>

告党员书透露出中共的新方向，重点在武装斗争。“军事问题很重要，然而第

<sup>1</sup>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 12 页。

<sup>2</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 年 9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551 页。

<sup>3</sup>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第 37 页。

<sup>4</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 年 8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265、267、270 页。

五次大会没有特别去讨论”，“这实是我党第一等重要的责任”。<sup>1</sup>8月21日政治任务议决案再次强调最重要的任务是建立军队：“这种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革命的经验，已经证明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坚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sup>2</sup>

中共的紧迫任务是重整全国组织，特别是从公开政党向秘密政党转型。在大革命时期，中共在南方是公开参与政权的政党，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先后反共后，中共党员和群众骨干遭到追捕、杀害。在白色恐怖中，中共组织受到严重破坏，很多党员逃亡，和组织失去联系，全国组织面临溃散的危险。中共必须以秘密方式重建组织，八七会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提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当建立全国的秘密交通机关”，“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现时主要之组织问题上的任务，就是造成坚固的能奋斗的秘密机关，自上至下一切党部都应如此。各级党部委员会，省委，市委，县委，区委都应当在最近期间改造”，“每一党部都应严格的与其上级及下级党部建立极密切的极秘密的联系。极严格的安全规律，是秘密状态中党的工作之基本条件”。“严守党的纪律尤其为秘密党之必要条件。党部机关之一切决议及决定，调遣等等，应当绝对的服从，一切党员，不论其地位如何都应如此。凡破坏纪律者，都应从严惩办”。<sup>3</sup>

中央向关键地区派出重要干部，力图重整地方组织，实行暴动计划。毛泽东受命出任湘南特委书记，准备发动秋收暴动。当时蔡和森和毛泽东政见一致，也想回湖南领导暴动，甚至被怀疑要成立小组织，蔡和森辩解道：“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1926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和森请求回湘工作，绝不是企图与毛泽东等组织什么左派，只因两湖暴动和森是提议之一人，又彼时湖南工作实须要加人。”<sup>4</sup>但蔡和森身体很差，又

<sup>1</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1927年8月1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85、287页。

<sup>2</sup> 《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1927年8月21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11页。

<sup>3</sup> 八七会议《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1927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302-304页。

<sup>4</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主要长于理论，中央决定派更熟悉农民运动的毛泽东去湖南。

中央在 8 月 9 日致湖南省委信中指示：湘南特委“以毛泽东，任卓宣，郭亮及当地工农同志若干人组织之，泽东为书记”。“湘南工农会中在马变以来，旧的领袖大部分被压迫去了或被枪毙，此刻只有赶紧的坚决的提取在这几月斗争中表现的积极的‘暴徒分子’到各工会领导机关做领袖，同时我们党便也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这些‘暴徒分子’入党，以建立党与工农群众的关系，就是会匪之富于革命性的也要多多介绍加入。必如此党在国际指导之下新的路线方能实现，秋收暴动才能胜利”。<sup>1</sup>当时湖南党组织思想激进，认为革命已经从民主革命跃进到社会革命阶段，何资深在六大上说：“参加八七会议的毛润之同志，他对中央和湖南同志说现在是社会革命。”<sup>2</sup>

湖南、江西党组织在新时期提出了新组织原则，对于不敢参加暴力斗争的党员一律清除，大量发展勇猛的工农入党。《湖南九、十两月组织工作计划》称：“事变发生以来，同志之革命与否，忠实与否，勇敢或畏缩”，“皆如量表现，暴露无余。同志中投机的，逃避斗争的，怠工的，对党不忠实的，革命观念根本动摇的，无论其在党中的地位历史如何，一概毫不姑息的严格的洗刷出去”。“很可惊的数量的积极前进的新的革命战士，较之太平时候高谈革命高谈主义的好多了，都是我们很好的革命分子”，“即日开始尽量吸收这些革命分子入党。尤其是工农分子，应毫不犹移的来着不拒”。<sup>3</sup>1927 年底，党组织已经在实践中认识到，只有在暴动中才能大批吸引农民入党，江西省委 12 月 25 日给赣南特委的信中说：“党的组织，必须在各种斗争中去发展”，“只有斗争才能吸收大批的革命工农分子，洗刷一些怯懦投机分子，以树立党的真实基础”。<sup>4</sup>

### （三）长江局的成立及其对各地组织的整顿

中共中央迁往上海之后，长江局成立于武汉，在七省范围内代行中央职权，力图在群众基础最雄厚的地区发起暴动。10 月 1 日《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规定：“长江局所辖范围为湖北、湖南、河南、江西、四川、安徽、陕西

---

550 页。

<sup>1</sup> 《中央致湖南省委信》（1927 年 8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308-309 页。

<sup>2</sup> 《湖南代表何资深的发言》（1928 年 6 月 24 日），《党的文献》1988 年第 4 期，第 31 页。

<sup>3</sup> 《湖南九、十两月组织工作计划》（1927 年 9 月 5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第 121-122 页。

<sup>4</sup> 《江西省委致赣南特委的信》（1927 年 12 月 25 日），《江西党史资料》（4），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7 年，第 83 页。

七省”，“长江局不是中央在上列七省的通讯机关而是代行中央职权”，“江局的第一个最大任务便是坚决的发展土地革命”，“须普遍的发展游击战争与没收地主的土地及杀戮土豪劣绅等工作。依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以发展各地的农民暴动”。“因现有各级党部多不能领导各地的革命运动，长江局负责同志须不断的巡行各地”。<sup>1</sup>

长江局书记为罗亦农，主要干部为王一飞、任旭、陈乔年等，他们本想在两湖地区大干一场，但刚成立就遇上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于是所谓单纯军事冒险的“毛泽东主义”成了 10 月 2 日长江局第一次会议的批评对象。代表中央办理移交的李维汉说：“湘省现完全屈伏于毛泽东主义之下，须加以纠正”。<sup>2</sup>10 月 29 日第十次会议上，罗亦农又批评湖南的“毛泽东主义，枪杆上出政权”，“其实毛泽东之主义并不成其为主义，他常互相矛盾，他虽主张军队，但不懂军队”。“湖南暴动不是群众运动，而是军事冒险”。“他们下乡并不召集群众大会，不杀土劣等，派毛泽东到湘南却作了师长”。“农民是可以起来的”，“醴陵暴动一起，杀土劣，农民有六百人要求入党”。结果受到批评的湖南省委被长江局改组，由王一飞担任书记兼军事部、组织部。<sup>3</sup>

江西省党组织在南昌起义后的白色恐怖中一度陷入困境，省委书记汪泽楷束手无策，他 10 月 15 日到长江局汇报时说：“南昌过去有四百多同志，‘七三一’事变（即南昌起义）以后，差不多有百人随军队去了，一部分自由回家去了，现在除省委外只剩下十余人；牛行车站过去有八十余同志，现在只有八人；农村原有四十余人，最近曾找到二人，已正式恢复关系，但又被土劣报告而跑了，所以南昌市的组织好像无形解散了”。<sup>4</sup>吴振鹏报告中也提到，“贺叶军队一走，党的组织完全瓦解，省委与各级关系断绝，工作停顿，此时只是从事建立秘密机关”。<sup>5</sup>

一位江西省委干部的描述更为生动，当时“常委会及各部工作人员虽有，然一点工作都没做，甚至在四、五个礼拜中，一次会议都没开。干什么呢？天天躲

<sup>1</sup> 《中央对于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 年 10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376-377 页。

<sup>2</sup> 《中共长江局第一次会议记录》（1927 年 10 月 2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中央档案馆 1985 年，第 7 页。

<sup>3</sup> 《中共长江局第十次会议记录》（1927 年 10 月 29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 63、64 页。

<sup>4</sup> 《中共长江局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 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 16 页。

<sup>5</sup> 吴振鹏：《江西党组织的发展与现状》（1928 年 1 月 7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6 年，第 159 页。

在房子里面，抄麻将”，“江西省委的工作，即是每天八圈或二十圈，陪爱人，找爱人”，“江西省委的精神，消极、悲观、幻想”。9月20日以后，江西省委接到八七会议文件，也只是在房子里“大写准备秋收暴动的通告，在地图上把全省划做六个秋收暴动区”。<sup>1</sup>

长江局对江西省委非常不满，罗亦农在给中央信中说：“江西的党，简直不成话，决根本改造”。<sup>2</sup>10月16日，长江局第六次会议决定改组江西省委，新省委书记为陈潭秋，组织委员李铁良，宣传委员宛希俨，其他委员还包括袁孟冰、刘士奇、吴季冰、林修杰、冯任等。<sup>3</sup>江西省委改组以后，对各地暴动的领导才得到加强，“对于组织工作，亦有相当的注意，改造了特委县委的指导机关，提拔了一些工农干部，恢复了三十余县的组织，实行了全省清党运动，增加了大批的农民同志”。<sup>4</sup>

江西新省委积极策划暴动，万安是中共影响较大的地区，省委12月却对万安党组织提出了严厉批评，认为“党的工作非常幼稚，在群众中没有一点基础，一般同志的心目中，都只认识少数活动的个人（所谓老师）而不认识党。一切党员的活动，都在几个老师的指挥之下，而不是党的领导。故虽有县委的组织，只不过是空有其名”。“万安县委目前唯一重要的工作，可说便是造党。县委以下各级党部应立即改组，实行清理组织，整顿组织，建×党的纪律，铲除一切投机畏怯不进步的分子”。<sup>5</sup>

万安农民运动逐渐高涨起来，“全县农民均在农民协会组织之下，农协在农民中有极大的威权，已成为乡村中事实上的政府”。从11月到12月，大批农民三次进攻万安县城，有一次“相持半日之久，群众死伤四十多人，卒不能胜，但群众绝无退去。此次群众攻城，完全是自动的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万安共产党县委与农协事先不知，至是始前来指挥，见群众牺牲太大，城内反动武装力量甚厚，命令群众退却，群众仍不肯退。责称须共产党一星期内决定攻城计划并实行

<sup>1</sup> 《红刃：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年（一））》，第61-63页。

<sup>2</sup> 《罗亦农给中央的信》（1927年10月17日），《中共长江局第四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30页。

<sup>3</sup> 《中共长江局第六次会议记录》（192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28页。

<sup>4</sup> 《红刃：三个时代的江西省委》（1929年3月3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九年（一））》，第63页。

<sup>5</sup> 《中共江西省委致赣西南特委信》（1927年12月4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10、113页。

攻城”。<sup>1</sup>1928年1月9日万安农军第四次攻城获胜，占领了县城，成立了江西第一个县苏维埃。在暴动过程中，万安党组织有大的发展，1928年1月江西全省有党员约4000人，其中万安2300人，占一多半。<sup>2</sup>虽然暴动很快在敌军反攻下失败，数百名党员被杀，但暴动播下了革命种子，到1929-1930年形势好转时，这里又成了发展红军和苏区的根据地。

### 三、南昌起义——中共第一次武装暴动中的组织混乱

八一南昌起义是中共第一次大规模军事暴动，标志着中共武装斗争时代的开始。一直以来，国民党依靠军队的力量，发动广州中山舰事件、上海四一二事变、广州四一五事变、长沙马日事变。中共没有军队，不得不妥协退让，始终被动挨打，这次终于迈出了勇敢反击的第一步。

但是起义过程中，中共组织不成熟的弱点也充分暴露出来。起义领导层非常混乱，谭平山原来是妥协倾向比较强的，7月12日会议之后就不再是中央核心领导成员，这时他却忽然变成了暴动的急先锋，依靠个人影响成为起义的主要领导。李立三说：“八一革命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完全在党的指导之下，实际上不过是许多C.P分子的个人指导，最后几乎变成平山同志的个人指导。”<sup>3</sup>

起义领导人之间意见分歧严重，特别是张国焘态度动摇，反对与张发奎决裂，以中央代表身份固执己见。蔡和森说：“南昌暴动之失败不是偶然的，主要是因为前敌主要负责人之主观没有根本改变，平山同志不必论，国焘同志自从主持五人政治局及常委以来，开始表现他政治上弱点，尤其怀疑土地革命，不甚相信群众势力，而对于张发奎发生幻想。”<sup>4</sup>李立三也说：“三十日早特立同志到南昌，当开前委会，特立（即张国焘）报告中央意见宜慎重，国际电报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所以目

<sup>1</sup> 《江西工农革命的记录》（1928年1月到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98-199、202页。

<sup>2</sup> 《中共江西省委王××同志关于江西组织的谈话》（1928年2月1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187页。

<sup>3</sup>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19页。

<sup>4</sup>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51页。

前形势，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恽代英、李立三、澎湃、谭平山“都一致反对此项意见，谓暴动断不能迁移，更不可停止，张已受汪之包围，决不会同意我们的计划。在客观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争论数小时，因特立系代表中央意见，不能以多数决定，故未解决。到三十一日晨，再开会议，又辩论数小时之多，特立最后表示服从多数，始决定于是晚二时举行暴动。”<sup>1</sup>

谭平山的突出地位是在和张国焘的斗争中建立起来的。张太雷说：“南昌开会的时候，平山同志主张干”。“中央已决定对张发奎的态度，如张不与汪精卫联络则到东江之后始解决之，否则在浔便解决他。故赞成南昌的决定，并派恩来去主持”。“不料国焘假传圣旨，说国际不主张干，他亦极力反对干，此时反而平山主张成为拥护新政策的一个人，国焘这不仅损失个人的信仰，而且是损失中央的威信，因为他是中央派去的。故此次国焘的行动，实应受处分。因为这样结果致使这次行动成为平山所领导”。<sup>2</sup>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候，领导人之间甚至差点自相残杀，谭平山想派人杀掉反对起义的张国焘，幸亏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说：“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sup>3</sup>

南昌起义的领导机构最初是前敌委员会，后来是革命委员会，但组织相当混乱，领导人常常各自为政。李立三说：“前委的组织原照中央命令，没有平山同志，但是当时平山在政治负了很大的责任，中央并未将他撤换，所以前委商量的结果，只好要平山参加前委会议”。“同时负责的几个人，都是前后左右分途而走，很难集合一块开会。因此除掉几个重大根本政策以外，许多重要的问题都由负责同志随意办理，甚至违反已定的政策，也不能纠正或制裁。可以说前委本身组织非常之弱，在政治上，几乎完全失掉了指导。譬如在汕头再与张发奎联络，和滥委陈炯明部为师旅长等事，有几个参加前委的同志当时全不知道”。<sup>4</sup>

刘子谷在报告中也谈到失败的重要原因是“无党”，“行动中间只有个人的活动，并没有党的活动，一切事件及决定仅少数中央委员知道，其余同志都是被动”。

<sup>1</sup>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07页。

<sup>2</sup> 《张太雷报告——“八一事件”之经过，失败原因及其出路》（192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2-423页。

<sup>3</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235页。

<sup>4</sup>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19页。

前委“仅在瑞金开始组织支部，汀州召集同志开会，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报告，此外并没有什么，一切同志的行动都是政府机关的行动，并不是党的行动”。<sup>1</sup>可见，南昌起义虽然是几个重要中共干部领导，但下面并没有各级党组织，更没有深入部队基层的支部，党无法严密掌控部队，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很容易溃散。

起义过程中对蔡廷锴的态度，也暴露出中共领导人虽决心反击，仍不脱书生气。蔡廷锴的第 10 师是驻南昌的精锐部队，10 师 29 团团长张一德、30 团团长范荩、28 团参谋长徐石林等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在部队中的影响很大，本来是起义的主力之一。起义领导人轻信蔡廷锴支持起义的表态，允许他继续领导部队，甚至早已受到怀疑的 28 团团长陈芝馨也没有撤换。结果 10 师刚离开南昌就叛变了，蔡廷锴扣押了部队中的中共干部，公开宣布已经枪决，实际还是留有余地，把他们偷偷放走，自己则带军队投奔蒋介石。这导致南昌起义后仅几天，就白白损失了五千人的精锐部队，也是后来在潮汕失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周恩来在抗日战争中谈到此事仍后悔不已。<sup>2</sup>朱德后来也说，第 10 师 9 个营里有 5 个营是受中共领导的，由于抓得不紧，结果整个师都送给了蔡廷锴。<sup>3</sup>

当时中共的组织体系已经被打散，各级组织之间往往失去了联系，下级得不到上级的指示，上级不知道下级的实际情况。起义军和中央也失去了联系，中央 9 月 23 日致广东省委信中说：“叶贺军队不知已达到什么地方？此时广东全省应不等待叶贺之达到，即行发展普遍的暴动”。<sup>4</sup>而起义军“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蒋介石下野，我们到汀州看见上海的《申报》才知道”。“经过各地党部的组织，都异常幼稚，并且充分表现机会主义。在赣东一带不必说简直全无党的组织，就是在粤东一带所有各地的党部，不过是一些共产分子的集团，全不是群众的斗争的组织”。<sup>5</sup>

当时起义军中党的组织很混乱，难以形成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在上层，军部与前委往往各行其是；在基层，党代表只在团一级，士兵得不到政治指导，不知

<sup>1</sup> 《刘子谷同志关于南昌起义部队于潮汕失败经过情形的报告》（1927 年 10 月 19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 48、49 页。

<sup>2</sup> 徐石林：《“八一”起义片断》，《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第 242-244 页。

<sup>3</sup> 朱德：《朱德自传》手抄稿本，转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1），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03 页。

<sup>4</sup> 《中央致广东省委函》（1927 年 9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374 页。

<sup>5</sup>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 年 10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419、420 页。

道起义的目的，大批逃亡，纪律难以维持。军部“与前委的关系很坏，因为军部在组织上是独立的，就是一切政治的指导都须完全经过军部，同时军委亦很弱，所以党的政治的方针很难深入到军队中的同志去。这是党的组织上一个很大的弱点。”<sup>1</sup>张国焘说：“从南昌到抚州一路甚为狼狈，大炮丧失殆尽，机关枪亦失掉不少，枪枝二三千枝，子弹更不知其数。行军毫无精神，从军官一至兵士不知为什么到广东去”。“这些都代表逃亡失败的现状。南昌起义是对的，可是在起义中党的作用实在很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毫无准备”。“十一军尚不能说是 C.P.军或工农军，只能说包括很多 C.P. 分子之有纪律的国民党军，二十军只说是表同情于我们之旧式军，革命委员会则甚复杂，党的组织极松懈，党亦无职权，军事上政治上均甚幼稚，毫无夺取政权之准备。如此溃败，实堪痛心”。<sup>2</sup>

中央听取了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等的报告之后，总结南昌起义的经验教训，迅速指示加强党代表制度。**10月 24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指出：“在这总的武装暴动工农革命政策之下，党的作用高于一切。必须有党的指导”，“这次委任杂色军队，及与张发奎接洽等，都是前敌各个人的任意行动。政治指导集中于党是非常之重要。再则工农革命军中，必须有党代表的制度。”<sup>3</sup>这说明中共虽然年轻幼稚，但很善于在挫折中学习。

南昌起义和秋收暴动最大的失策，就是军队和农民运动结合不够，这说明当时武装斗争的思路很模糊，中共也很快认识到这个问题。**10月 29 日《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称：“两湖秋收暴动与广东的失败，因为本党土地革命的策略未能深入群众，下级党部未坚决的执行以至未能唤起广大的（广东与湖北有几处不在此例）群众的行动，在群众的本身方面除了少数地方，并未受如何的打击，他们的观念至多不过是大势改变，还须等待新的时期”。<sup>4</sup>当时湖南农民遭到血腥镇压，报仇雪恨之心很强烈，如果南昌起义军能够与湖南秋收暴动农民结合起来，结果可能会好得多。

#### 四、十一月会议强化党的组织力

<sup>1</sup> 《李立三报告——八一革命之经过与教训》（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0页。

<sup>2</sup> 《张国焘报告》（1927年10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27、429页。

<sup>3</sup> 《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04-405页。

<sup>4</sup> 《长江局最近政治决议案》（1927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24页。

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决策前可以民主讨论，执行时必须集中权力。当时中共组织上还很幼稚，既不够民主，也不够集中，下层的意见难以反映到上层，上层的决策也无法在下层贯彻，实际处于各自为战、松散无力的状态。周恩来在六大上对此有极尖锐的批评：“五次大会后的中央，他的工作是很混乱的，各部都是独立起来，常务委员会从没有开好，中央本身工作也毫无头绪”。“中央与各省的联系，更为混乱。各地区完全由各地区自行处理，中央是没有指导的。广东方面，中央从没有管过，北方彭述之逗留各地，中央也不管，政治指导更说不到了。湖南虽相接甚近，也是调遣混乱，毫无指导的系统。四川、河南也没有联系，就是上海也无经常的指导。总之，中央与各省可以说完全表示断绝”。<sup>1</sup>

1927年下半年，中共面临关乎生死存亡的危急形势，首先要强调的是集中，甚至要通过清党来整肃纪律。蔡和森说得很透彻：“组织问题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我们本是民主集中制。然八年以来，只有从下至上的民主。最近三年以来，党的组织像暴发户一样地发展：1925年以前是不满500人的知识分子小团体，1925年以后，却发展至5万人以上的大群众。”<sup>2</sup>鲍罗廷也说过：“造党不是一天一日所可做得到的”，“一个党的造成要经过多少训练与奋斗，才能得到好的结果。党员要好，宁可少，党员多而坏那就不如无党。我们的党曾经有一次肃清党内五分之一的党员，那时我们有五十万党员，开除了十万人。”<sup>3</sup>中共的清党不全是自己完成的，血腥的白色恐怖把很多不够坚定的党员吓跑了，留下来的、新加入的则是坚定革命者。

中央政治局11月中旬召开扩大会议，努力重整在白色恐怖中被打散的组织。出席会议的主要是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员十多人和各省代表，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会议由瞿秋白主持。议程中除了例行的政治报告外，接下来的组织问题、召集六大问题、政治纪律问题都是关于重整组织的。会议通过《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强调“组织问题更加占了第一等重要的地位，中国共产党组织之布尔塞维克化，以及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的组织之革命化，都是当前最迫切

<sup>1</sup>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年6月30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3期，第21页。

<sup>2</sup>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1927年9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554页。

<sup>3</sup>《鲍顾问与白崇禧之谈话》（1926年2月3日），《鲍罗廷在中国有关资料》，第78页。

最重要的问题”。“没有正确的布尔塞维克式的组织，中国共产党决不会成为群众的力量，决不能尽他在工农革命里的领袖及领导者的历史使命。”<sup>1</sup>

### （一）工农干部替代知识分子干部

会议决议认为领导机关工人太少，知识分子太多，带来了自由散漫、犹豫动摇、不够勇敢等问题。“中国共产党组织上的主要缺点：一、有很大的政治意义的——就是本党领导干部并非工人，甚至于非贫农而是小资产阶级智识分子的代表”。“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渗入了我们的党。这种成份形成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干部”。“他们不但没有能改造（成）澈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在政治上不坚定，不澈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种种非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革命者所特有的习性，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里来。”<sup>2</sup>

工农干部替换知识分子是当时重整党组织的主要办法。“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将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智识分子之干部”，“使党的指导干部之中无产阶级及贫民的成份占最大多数。支部书记，区委，县委，市委，省委的成份，各级党部的巡视指导员的成份，尤其是农民中党的工作员的成份，必须大多数是工人同志或贫农同志。”<sup>3</sup>广东省委书记李立三甚至说：“知识分子的作用完了，今后只有依靠工农干部”。<sup>4</sup>山东有的党组织甚至对收入较高的工人都要排斥，规定月工资 10 元以上的不许入党。<sup>5</sup>江西省明确指示，县委中工农分子应过半数，而“知识分子仅可派做技术工作”。<sup>6</sup>

的确，不少知识分子在思想传播阶段很有热情、很有能力，但是到了暴力革命阶段，表现出犹豫动摇，甚至大批脱离革命。比如在 1927 年 2 月上海第二次武装起义中，有人观察到：“在公开的巷战中，知识分子都逃跑了。在街头巷尾，在民众之中只留下了工人领袖，结果他们大多数遭到了杀害。”<sup>7</sup>中央通告描述了

<sup>1</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468 页。

<sup>2</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469-470 页。

<sup>3</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471 页。

<sup>4</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 242 页。

<sup>5</sup>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 年 6 月 30 日，《党的文献》2008 年第 3 期，第 23 页。

<sup>6</sup> 《中共江西省委致赣南特委信》（1927 年 12 月 25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 144 页。

<sup>7</sup>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110 页。

1927 年下半年的情形：“党不能成为铁一般的无产阶级战斗的党，而只是小资产阶级浪漫的集团，一切党内生活和日常工作都只是自由的浪漫的不规律的，反动势力的压迫一来，整个的党即完全瓦解：逃亡的逃亡，消极的消极，怠工的怠工，反叛的反叛。武汉反动至今，由五万而降至不及两万，不及两万的党员中，积极的分子至多不过五分之一”。<sup>1</sup>

毛泽东、周恩来等知识分子干部在严峻考验中正成长为卓越的革命家，但是从十一月会议到中共六大，工农干部替换知识分子的政策始终占支配地位。这不仅引发了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之间的矛盾，而且直接造成中共六大选出的新中央能力严重不足，发生了后来“立三路线”的严重偏差，然后又用王明等毫无经验的年轻留苏学生来补救。1921-1927 年，陈独秀无论有怎样的缺点，在党内还是很有威望的领导人，但从 1927 年到 1935 年八年时间，中共始终没有成熟稳定的、有能力、有威望的领导核心，这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共产国际在 1928 年中共六大把向忠发这样一个码头工人提拔为中共总书记，或许还有另一层想法。实际上，苏共主要领导人列宁、托洛斯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是知识分子。共产国际似乎认为，斯大林、布哈林等经验丰富的领袖替中共完成了研究形势、制定政策这些需要知识的工作，中共领导人只要坚决执行国际指示就行了，不需要很多知识，码头工人更适合这样的角色，像陈独秀那样知识太多，反而是缺点。

## （二）强化支部建设，建立秘密工作规则

十一月会议决议中关于支部建设不足的分析是很深刻的，这是中共组织松散无力、无法有效领导群众运动、无法把政策贯彻到基层的根本原因。“党的组织上的第二个弱点，便是许多大工厂、大商店尤其是乡村和军队之中，至今几乎没有党的支部。乡村之中，严格的说起来简直没有党的组织，各地乡村中，至多只有特派员或者极少的知识分子的党部委员会，他们之下并无支部，甚至并无党员”。

“没有先进的贫民分子所团结而成的党的组织，本党便很难指导农民斗争”，“农民暴动便成了完全自然爆发的无政府主义的性质”。<sup>2</sup>

---

<sup>1</sup>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关于党的组织工作》（1927 年 12 月 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534 页。

<sup>2</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 年 11 月 14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472-473 页。

决议提出加强支部建设，保证支部定期开会，通过支部严格管理党员。“支部工作在党的组织现状之下，占极重要的位置，过去因为支部工作不好，以至本党不能在群众中起广大的作用，而党员之散漫，党的政策不能深入群众，甚至不能深入党内群众，都由此而生。今后须特别注重支部工作，经过支部起群众的作用，至于支部的经常组织工作如按期开会等要严格的执行，这些都是树立党的基本组织的工作。”<sup>1</sup>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决定把支部建在连队，与十一月会议的思想一致，这大大加强了党组织对军队的掌控能力。

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共产党员到处受到追杀，党组织按照旧的方式已经无法生存，必须转型成为有严格秘密工作纪律的地下党。决议提出：“严格的整饬纪律和建立党的秘密组织，实在是党的工作成效之最必须的条件之一”。“秘密机关的地址绝对只准在工作上必须知道的党员知道。保存秘密文件的数量应当减到最少限度，绝对不容保存党员的名单和地址单。通信上必须用密码的方法。各级党部的常务委员会不得超过五人至七人。五人以上及两点钟以上的集会，非极端的必需不得举行，凡是稍稍破坏党的秘密组织纪律的，立刻应当停止他的工作，或者简直开除党籍。”<sup>2</sup>

### （三）严肃政治纪律，处罚重要干部

党组织必须赏罚分明，严格执行纪律，才能有效运转。此前中共大批招收党员，却很少处罚不守纪律的党员干部，这是危急关头陷入混乱的重要原因。会议根据罗明纳兹的建议通过了《政治纪律决议案》，处罚被认为违纪的高级领导人，虽然处罚未必都公正合理，但这确立了强化组织的新方向。决议提出：“只有最严密的政治纪律，才能够增厚无产阶级政党的斗争力量，这是每一个共产党所必须的最低条件”。<sup>3</sup>周恩来说，“这也是国际代表提出的。我们当时觉得这一条很新鲜，”<sup>4</sup>共产国际当时在帮助中共建立组织原则上发挥了关键作用。

谭平山受到的处罚最重，他被开除党籍。决议认为谭平山“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

<sup>1</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3页。

<sup>2</sup> 《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6页。

<sup>3</sup>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78页。

<sup>4</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235页。

联络主张取消中国 C.P. 而另组织第三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莫，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展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多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sup>1</sup> 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更加积极策划成立第三党。

在南昌起义前态度动摇的张国焘也受到很重处罚，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决议认为：“张国焘同志受中央常委委托赴南昌指导暴动，但国焘同志到九江南昌后不执行中央命令，反怀疑暴动主张，甚至反对暴动，南昌事变以后的主张联络张发奎，并反对没收一切土地的政纲，这些违抗中央政策和派其往前敌指导使命之结果，反给前敌同志以更坏更右的影响，前委亦因之更加摇动。国焘同志应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sup>2</sup>

湖南秋收暴动失败，毛泽东被认为应承担领导责任，但处罚不重，只是退出政治局，仍保留中央委员资格。决议称：湖南省委领导农民暴动过程中，只与土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发动农民群众，没提出土地革命、没有屠杀土豪劣绅。“湖南省委委员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应撤消其现在省委委员资格，彭公达同志应开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资格，并留党察看半年。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sup>3</sup>

党内比较宽松的气氛消失了，凡是与国民党关系不清楚的都要被开除党籍。二十五号通告“命令同志一律退出国民党，并绝对实行反国民党的工作，如有对此犹疑的分子，即断然开除其党籍”。“绝对退出国民党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如有犹疑不退出的开除党籍”。“在党的组织上，党员中如有国民党反动领袖的子侄和戚友，如党部认为工作有不便时，须令其退出党籍（十二月十日的长沙暴动事前被市党部反动分子之儿子 C.Y. 同志向其父亲泄露了）。”<sup>4</sup>

<sup>1</sup>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2-483页。

<sup>2</sup>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3页。

<sup>3</sup> 《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1月1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483-484页。

<sup>4</sup> 《中央通告第二十五号——对国民党的工作》（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88-590页。

十一月会议精神传达后，各地党组织开始严格执行纪律。河南省党组织也效仿中央于十二月通过《政治纪律决议案》，批评“豫南特委蔑视省委命令，不发展工农群众”，给全体委员警告处分；河北特委“根本不发动工农斗争”，予以解散，特委书记杜工全留党察看一年；杞县县委吴殿祥“与劣绅酒宴谈欢”，开除党籍；省委委员胡俭到武汉“一去不返”，永远开除党籍；许昌铁路工会秘书李长夫“不受指挥，骗取工会款项”，永远开除党籍。<sup>1</sup>福建省委通告要求所有党员立即与国民党划清界线：“所有同志不马上退出国民党者，以反革命论，立即开除党籍”；“各种民众运动如农协工会等，如再用国民党招牌，张贴国民党旗帜标语者，以反动机关论。该负责同志予以最严厉处分，直至开除”；“各级党部接到此通告后不切实执行者，以违抗命令论，决予以最严厉处分”。<sup>2</sup>

这次清党是中共的自我净化，很多党员离开了中共，也有不少党员思想动摇，其中包括中共创始初期最重要的党员，他们是第一阶段革命中的风云人物，却不能适应革命的新阶段。谭平山被开除党籍后，登报脱离中共，认为中共政策过于激进，超越了时代。陈独秀辞职以后，拒绝共产国际要他去莫斯科的指示，实际上已经处于半脱离状态。张国焘受到处分后很不服气，甚至产生了分裂中共，另行组党的想法。张国焘对瞿秋白的暴动政策不满，1928年2月下旬“与瞿秋白有过一次摊牌性的谈话”，张国焘提出如果不停止暴动政策，“我将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在中共第六大上，“瞿秋白曾声称他虽然犯了错误，但没有另行组织一个工农党的意图”，就是针对张国焘的。<sup>3</sup>张国焘曾和陈独秀讨论过另行组党的计划，主张“这个党仍以原有的同志为基础，扩大其政纲要点仍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实现土地革命，但不再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陈独秀对张国焘的想法虽然“大感兴趣”，但是觉得困难太多，尤其是经费难于解决，没有付诸行动。<sup>4</sup>不过后来陈独秀脱离中共，成立中国托陈派，张国焘1935年在四川另立中央，1938年最终脱离了中共。

在整肃纪律的过程中，也难免地出现偏差。湖南有些地方出现过分严厉的倾向，甚至有死刑的处罚。醴陵县委在1928年2月报告中列出“执行政治纪律”

<sup>1</sup> 《中国共产党河南代表大会政治纪律决议案》（1927年12月），《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4年，第367-369页。

<sup>2</sup> 《中共福建省委通告第十一号》（1928年1月2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1983年，第91页。

<sup>3</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54页。

<sup>4</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364-365页。

一项，其中称“西南两乡各区委支部大多数都能执行纪律，对于泄露秘密，临阵退却，犹疑未定，屡次不到会，不愿参加实际工作，怀疑党的新政策和土地革命的，均用党的名义宣布死刑的约有二十多人。若某同志开除之后，马上执行死刑，毫不姑息，就是谁为过去的领袖或老同志都不宽待”。<sup>1</sup>1929年平江党组织仍有所谓“十二条铁纪”的规定，其中七八项都是死刑，甚至有“全家抄洗的规定。许许多多的同志，为了几块钱或几十块钱的数目不清，或作战时失掉了枪支而惨死了”。<sup>2</sup>蒋长卿在巡视湘鄂赣的报告中说：“虽然省委迭次的指示，但是在九月以后铜鼓六区处决了区委刘志远，浏阳一、二、五、六、八各区都杀了些同志，这点我在浏阳的区联合会上，已详细批评杀的纪律不好，最近二区又杀一个支部书记”，<sup>3</sup>这显然会在党组织内部造成不正常的恐怖气氛。

#### （四）严肃纪律的同时，也强调扩大党内民主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当时认为，基层党员和群众的革命热情很高，领导机关压制了群众，所以在严肃纪律的同时，也主张扩大党内民主，把中共建成既民主又集中的列宁主义革命党。

会后发出的十七号通告提出废除设部制度，改为常委会集体领导：“党的另一个主要缺点，就是各级党部指导之不集体化。从中央以至县委甚至于大的区委，都是分成几部几委，各部各委可以独立派人独立指导工作，部和委之主任自然而然成为分业的专门家，党的组织自然而然分裂成数多的独立系统，特别是军委、工部、农委”。“本来中国的党是封建社会之产物，很容易流于首领个人的独裁形式”，“因此党的指导集体化亦为改造党的主要问题之一”。“中央，省委，县委，市委以至大区委，废止设部制度，集权于常委”。<sup>4</sup>

十天之后，中央又发出二十号通告，强调“扩大党的民主化到最高限度”，必须通过各级选举来改造组织。“各级党部的指导机关从小组以至省委，必须经过全体会议或代表会议的选举，重新改组一次”。“无论选举代表或选举指导机关之会议，在选举前，须提出中央扩大会议之决议及全国党的问题材料特别是当地

<sup>1</sup> 《中共醴陵县委关于暴动经过的报告》（1928年2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第62页。

<sup>2</sup> 《夏尺冰巡视湘鄂赣边境各县工作的总报告》（1929年7月2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181页。

<sup>3</sup> 《蒋长卿巡视湘鄂赣边境的报告》（1929年12月20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408页

<sup>4</sup> 《中央通告第十七号》（1927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534-536页。

党内的问题，在会议中引起群众的激烈的辩论，使群众了解党内组织上的一切缺点和改造的意义，然后开始选举”。“扩大党的民主化至最高限度，激发党员群众对党内问题的讨论，一切实际斗争的策略上的决定，尽可能经过党员群众的讨论，务打破党员群众对党之政策不敢讨论或不懂得怎样讨论的成习”。除有特殊必要情况，“上级党部不要派人去作书记，或常务委员”。<sup>1</sup>

## 五、中共在残酷斗争中的换血与转型

中国共产党在 1927 年下半年实现了意义深远的换血和转型，这是在国民党残酷镇压中完成的。周恩来在六大会上说：“中国的白色恐怖可以说是全世界历史上所绝无仅有的残酷”。“第一从陈赞贤被杀到东南遍地的大屠杀。在这个时期大概死了十二万以上”。“第二从夏斗寅叛变到马日事变，以及武汉政府叛变、冯玉祥叛变和其他各地大小的屠杀，统计被屠杀的约十七万以上”。“第三由广州暴动到现在”，“被屠杀的约在五万以上”。“总括的计算，被杀的有 31 万到 32 万左右，此外在监禁的尚有四千六百多人”。<sup>2</sup>

白色恐怖威胁下，大批知识分子离开了中共，比如周恩来最小的弟弟周恩寿。他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一直追随大哥，到广东入黄埔军校四期，成为中共党员。但到南昌起义前夕，周恩寿的黄埔同学文强问周恩来：“你这个哥哥怎么把老弟也甩掉了？”周恩来无可奈何地说：“不是我甩他，是他甩我，他不跟我走嘛。”<sup>3</sup>周恩寿脱离了革命队伍，改换姓名，过起了平民生活。著名共产党人于树德是李大钊的好友，国共合作时期是地位很高的国民党中央执委，此时也公开声明“退出一切政团，从事著述”，<sup>4</sup>做出类似选择的还有施存统等人。共青团员多数是青年学生，苏联顾问西塔罗夫说，他在 1927 年 7 月离开中国的时候，长沙原来的 3000 名共青团员，只剩下大约 100 名，“有些团委简直是四处逃散”。<sup>5</sup>9 月 12 日《申

<sup>1</sup> 《中央通告第二十号——关于组织工作》（1927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 559-560 页。

<sup>2</sup>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 年 6 月 30 日），《党的文献》2008 年 3 期，第 19 页。

<sup>3</sup> 文强、刘延民：《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29 页。

<sup>4</sup> 《共党到沪者多》，《大公报》1927 年 9 月 12 日。

<sup>5</sup> 《西塔罗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7 年 8 月 26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28、30 页。

报》报道，长沙朱谷君等六名被捕共青团员向卫戍司令部出具誓词：“余等因年幼学浅，受环境影响，误入共产主义青年团，现值政府除暴安良，百度维新，对于青年学子，准其改过自新，自愿从此脱离该团关系，永不再入”。<sup>1</sup>诸如此类的声明在当时的报刊上经常出现。

城市工人也大批脱党。罗亦农 1927 年 12 月报告：“武汉三镇号称八千同志，在八月二日总罢工之前三、四天仅存三千，罢工后则减少至二千，九日十日减少至一千二百六十九人，其中尚有些靠不住，后来听说更少了”。<sup>2</sup>武汉硚口区原来有党员 1500 余人，到 1928 年 1 月只剩下 50 多人。<sup>3</sup>上海党组织在高潮时期有 12000 人，但是到 1928 年初，“就连正式的数字 1500 人，都是令人怀疑的，因为谁也说不出有超过 20 人的支部”，“暴动前的广州有 1800 名党员，现在据最乐观的估计不超过 100 人”。<sup>4</sup>

与此同时，革命农民却在暴动中大批涌入，中共组织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福建省工作大纲中明确提出：“勇敢之工农份子无条件的大批介绍进来，尤其是在某一处斗争之后，那些勇敢的暴徒，可以介绍入党”。<sup>5</sup>1927 年 12 月，湖北黄安 18 岁的农会骨干李先念加入了党组织，他在黄麻暴动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组织起游击队，黑夜里袭击杀掉了当地民团首领陈芝斌。<sup>6</sup>湖北麻城同样 18 岁的陈再道也入了党，他和 72 个人一起带着 53 支枪撤往黄陂县木兰山，他们火攻地主堡垒罗家大院，缴获 19 支长枪；<sup>7</sup>在湖南醴陵，刚满 18 岁的耿飚从共青团员自动转为党员，他从党组织得到了一支老掉牙的驳壳枪，成了 7 人游击队的队长，他们不断袭击地主团防，很快发展到 30 多人，有 20 多支枪；<sup>8</sup>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高涨的地区，红色游击队与地主武装的生死决斗在成千上万个村庄里上演。李先念、耿飚、陈再道等年轻农运骨干大批入党，成了中共武装斗争的主力。

<sup>1</sup> 《湘省破获共产党阴谋续讯》，《申报》1927 年 9 月 12 日。

<sup>2</sup> 《罗亦农对于湖北问题的答辩》（1927 年 12 月 21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1984 年，第 192 页。

<sup>3</sup> 《中共湖北省委关于武汉三镇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 月 5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第 57 页。

<sup>4</sup>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8 年 2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356 页。

<sup>5</sup> 《福建政治现状及目前工作大纲》（1928 年 2 月 9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117 页。

<sup>6</sup> 《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3-37 页。

<sup>7</sup>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66-79 页。

<sup>8</sup>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第 90-97 页。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生动描述了这场大换血。“上海郊区一家纺织厂的女工的情绪受到极大的压制，她们被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吓坏了，她们说她们希望过几个月安宁的生活，得到一口饭吃”。“大批工人共产党员干部在白色恐怖影响下脱离了党，不再在会议上出现，回避见面”。“知识分子开始退党，甚至成立自己的新党（谭平山）”。“与此同时，我们在农村，党的组织正在大大发展”，“例如在广东，我们党现在大约有 3 万人”，“在湖南和湖北，随着农民运动的发展，有大批农民入党”。<sup>1</sup>八七会议后的《中央通告第二号》也提到：“成千万的工农会机关的领导者，最大部分是由知识分子充当。屠杀一来，尽先跑掉的多是这些分子，然而这些分子跑掉之后，却有许多工农起来代替了他们”。<sup>2</sup>

对比中共六大和五大党员统计，可以发现：从 1927 年 4 月到 1928 年 6 月一年多时间，农民在中共党员中的比例从 18.7% 猛增到 77.6%，而工人则从 53.8% 下降到 10.9%，知识分子也从 19.1% 下降到与其他合计只有 6.9%。中共虽然遭受严重挫折，很多人被杀，很多人脱党，但由于农民在暴动中大批涌入，党员总数却从 5.8 万增加到 13 万。六大以后，中共党员中农民比例继续上升，据湖北省 1928 年 10 月底的统计，全省 5252 名党员中，工人只占 6%，而农民占 90%。<sup>3</sup>湖南醴陵经过 1927 年底到 1928 年初的农民暴动之后，全县党员约 4200 人，其中工人 1.5%，知识分子 1.5%，而农民占比高达 95%。<sup>4</sup>而在湖南平江县，在彭德怀 1928 年 7 月领导军队起义之后，全县各乡农民大举暴动，短时间竟发展了七万五千党员，<sup>5</sup>比五大时全国党员还多，虽然这些党员并不巩固，但预示了中共在农村的巨大发展潜力。

中共五大和六大党员成分对照表

	工人	农民	士兵	中小商人	知识分子	其他	党员总数
五大（1927 年 4 月） <sup>6</sup>	53.8%	18.7%	3.1%	0.5%	19.1%	4.2%	5.8 万
六大（1928 年 6 月） <sup>7</sup>	10.9%	77.6%	0.8%	—	6.9%		13.0 万

<sup>1</sup> 《米特凯维奇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8 年 1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286、289 页。

<sup>2</sup> 《中央通告第二号》1927 年 8 月 1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1），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第 20 页。

<sup>3</sup> 《湖北全省各县组织状况一览表》（1928 年 10 月 30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5），第 596 页。

<sup>4</sup> 《中共醴陵县委工作报告》（1928 年 4 月 11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第 96 页。

<sup>5</sup> 《滕代远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 年 1 月 12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 12 页。

<sup>6</sup> 《陈独秀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27 年 4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 360 页。

<sup>7</sup> 周恩来：在中共六大的组织报告（1928 年 6 月 30 日），《党的文献》2008 年 3 期，第 20 页。

中共当时最缺乏的是军事人才，贺龙、叶剑英、彭德怀等的加入作用很大。绿林出身的贺龙曾多次提出入党申请，但都被拒绝，直到他带领二十军参加南昌起义后才被接受入党。他显然是与陈独秀、彭述之、谭平山等知识分子完全不同的人，苏联顾问戈列夫说：“贺龙是个精力充沛、英勇果敢的小伙子”，“是个很会打仗的人”。契赫伊泽认为，贺龙有不少“对于一个革命领袖来说令人怀疑的嗜好：好女色，好赌博，好酗酒”，但是“他与中国的富裕阶层没有任何联系，他出身于贫苦农民”，“意志坚强，英勇果敢，奋不顾身”，“按其社会出身来说，经过改造以后他是跟我们一起走的很远的将领”。<sup>1</sup>贺龙没有让他们失望，南昌起义失败后，他没有去苏联留学，而是只带几个人回湘鄂西重新投入血战，据当地党组织 1928 年 3 月的报告：“云卿此行备受危险，但其精神极振作，决心极坚，对党只恐不孚信用，绝无犹疑。据他常常表示，始终愿受党的指挥及服从一切决议案。此次各役，他本人均同士兵在前线，毫无畏怯。”<sup>2</sup>

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方志敏、陈毅、粟裕等知识分子经过血与火的考验，完成了从激进知识分子到革命家的转化，他们成为最坚定、最有才干的革命精英。恽代英参加南昌起义后，在南下途中一直拒绝骑马，酷暑之中和战士一起步行。他是深度近视，眼镜框断了就用绳子系在耳朵上，这种艰苦卓绝的风范鼓舞了部队士气，难怪毛泽东后来说恽代英是可以代替自己领导红四军的人。<sup>3</sup>方志敏逃回家乡以后，把潜伏各地的同志，一个一个叫出来，秘密开会，决心重起炉灶，“乃分头到各村去活动，在七天内，居然组成了二十几个党员的支部”，接着发动农民暴动，开辟了赣东北苏区。<sup>4</sup>二方面军教导团是广州起义的主力，由原武汉中央军政学校学生组成，他们在武汉打夏斗寅时还很稚嫩，经过半年险恶环境的锻炼已经大有进步，聂荣臻说：“教导团方面千多人仅有百多个同志，动作起来都能领导一致的动作，而且都勇敢，比之打夏斗寅时相去天渊”。<sup>5</sup>

粟裕当时只有 20 岁，本来是湖南的激进学生，马日事变后逃到武汉，与湖

<sup>1</sup>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记录》（1927 年 9 月 14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41、42、49 页。

<sup>2</sup> 《中共湘西北特委史书元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3 月 13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9），第 137 页。

<sup>3</sup> 胡毓秀：《第一批女兵》，《南昌起义资料》，第 312-313 页。

<sup>4</sup> 方志敏：《方志敏全集》，第 36 页。

<sup>5</sup> 《聂荣臻对广州暴动的意见》（1927 年 12 月 15 日），《广州起义资料》上册，第 358 页。

南、湖北逃避追捕的一千多学生和工人编入叶挺为师长的第四军 24 师教导队。这些人绝大部分是党团员，但是自由散漫、没有军事经验，他们在血的教训中懂得了军事的重要，在严格艰苦的军事训练中开始了脱胎换骨的转型。粟裕说：“经过一两个月以后，我们开始习惯甚至喜爱起军队生活了，身体锻炼的异常结实。青铜般的面孔，鼓起肌肉的臂和腿，我们手执武器，再也看不出一、二个月以前那种自由散漫的学生样子了。当然，这样严格的军事训练，确实使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人动摇了，他们吃不了苦，偷偷地开了小差”，“当时坚持下来的同志，则绝大部分都成了坚决的革命战士。”<sup>1</sup>

中共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军队，从这个意义来讲，1927 年不仅不是失败之年，甚至可以说是成功的起点。1955 年授衔的中将以上高级将领共 254 人，他们是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核心力量（10 元帅、10 大将、57 上将、177 中将）。这些将领的籍贯分布与 1927 年农民运动最强大的区域完全吻合，湖南以 73 人高居第一，湖北以 49 人位列第二，江西 41 人第三，第四安徽就陡降到 14 人，<sup>2</sup>他们多数曾是工农运动的骨干。中共 1927 年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了上千万人的工农运动，虽然在国民党军队的残酷镇压下损失惨重，但成千上万暴动农民为中共军队提供了雄厚的人力基础。

红军创建苏区的地方多是农运中建立了党和群众基础的地区。在 1930 年红四军报告中提到，红军在没有农运基础的地方建立苏区很难，“下很多功夫，努力发动群众，创造群众组织建立党”，但是“只要红军一走，靖卫团一回来，仍旧是白色恐怖政权，红军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响，其次就一切都没有了！”而有农运基础的地方就大不一样，“四军到南康、信丰只有数日，因为他原先有党有群众，四军一去配合起来，一礼拜的工夫，简直分配了土地，创造了小块苏维埃”。<sup>3</sup>1927 年南方农民运动是中共创建苏区的基础，红军先在有农运影响的偏僻山区建立小的地方政权，然后才有机会逐渐发展壮大，最终夺取全国政权。

## 六、小结

<sup>1</sup> 粟裕：《南昌起义前后片段》，《南昌起义资料》，第 128 页。

<sup>2</sup> 江林平：《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地域分布》，《珞珈史苑》2015 年，278 页。

<sup>3</sup>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 1927 年 7 月——1930 年 4 月》（1930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317 页。

1927 年的中共组织仍然很幼稚，在巨大革命浪潮中比较被动，难以领导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也难以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屡次遭到国民党先发制人的打击，损失惨重。但是在与国民党左派汪精卫、张发奎等的合作中，中共也掌握了一些部队，特别是在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里，有很多军官是共产党员，党组织在部队中影响很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的主力都出自这支部队。

从八月开始，中共奋起反击，在南昌发动两万多人的起义，八月七日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立武装暴动的政策，拉开了铁血时代的大幕。这样根本的转变是非常艰难的，书生并不容易成为战士。最初的武装暴动都不成功，中共干部并不擅长此道，南昌起义的组织很混乱，失败难以避免，四省秋收暴动也是一样。中共在失败中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和教训，十一月会议对整顿党的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稳住了阵脚，确立了向秘密地下党转型的方向，强调了政治纪律，但是也出现了过分打击知识分子干部的偏差，引发了很多不良后果。

在白色恐怖的考验中，中共发生了深刻的换血和转型。周恩来在中共六大上把这称为“党的改组”。他说：“许多不好的分子出去，新的工农分子进来”，“党的改组是革命势力重新结合的一个总表现，意义是非常重大的”。<sup>1</sup>很多不坚决的革命者离开了中共，知识分子和城市工人大批脱党，但在大规模暴动中，贺龙等革命军人和大批革命农民加入，党员中农民比例从中共五大时不到 20%，到六一大时达到近 80%。

中共领导层不再是知识分子群体，坚持革命的知识分子逐渐洗去书生气，成长为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朱德、陈毅等人在惨败后的恐怖形势中继续顽强奋斗，把中共残存的组织和军队保存下来，进而创建了红军和苏区。中共不但没有灭亡，反而在小区域里第一次成为拥有军队的执政党，成为参与争夺中国政权的新兴军事政治力量。

---

<sup>1</sup>周恩来：《革命的性质和形势》（1928 年 6 月 27 日），《党的文献》1988 年 1 期，第 16 页。

### 第三章 红军对土匪武装的收编、改造和清洗

土匪问题是红军创建初期的重大问题。国共分裂后，共产党遭到血腥镇压，残存的力量撤退到偏远山区坚持武装斗争，这些蛮荒地区通常有众多的土匪。当时中共军队很弱小，收编土匪武装可以迅速壮大革命军队，土匪成分在早期红军中占不小的比重。但收编的土匪武装只有经过艰难的信仰和组织改造，才能成为真正的红军，而对难以改造的部分则不得不严厉清洗。

本章主要把土匪问题当作红军创建中的内部问题。在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中，显示出共产党能够依靠信仰和组织的力量，把动荡农村中复杂、落后的庞大人力组织起来，创建具有坚定信仰和严格纪律的新型军队。依靠这样一支军队，共产党在广大农村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并最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主宰了中国的命运。

虽然土匪问题主要存在于建军初期，在后来发展壮大的主力红军中影响有限，但土匪武装是红军吸收的最落后、最野蛮的成分，通过研究土匪问题的解决过程，能够充分表现革命军队“大熔炉”的作用，进而揭示红军是明显不同于当时中国其他军队的新型军队。

#### 一、民国初期的土匪与政治

在清王朝时期，中国人口从 1 亿多人猛增到 4.5 亿人。到清末，人多地少的矛盾极为尖锐，大多数农民生活困苦。辛亥革命后形势更加恶化，民初十几年军阀混战不休，陷入大动乱，连基本的社会秩序也难以维持，大量破产的农民和散兵游勇流为土匪，土匪暴力活动成为农村的普遍现象，“几乎所有的报纸和杂志都充斥着有关盗匪在乡村制造骚乱和伤人的报道”。<sup>1</sup>

土匪武装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地方势力，各个政治派别都不得不应对这种局面。在北洋时期，政府无力根本上消灭土匪，大致采取剿抚结合的策略，这期间像张作霖、陆荣廷、张宗昌这样土匪出身的军官甚至有机会成长为称霸数省的势

<sup>1</sup> 菲尔·比林斯利（美）：《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第 15 页。

力。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很快分裂，丧失了控制全国的威力，各地军阀争夺地盘的战争此起彼伏。军阀们为迅速扩张军力，大肆收编土匪，很多土匪被改编为军队，而军队战败或哗变之后又常常成为土匪，军队和土匪的界限逐渐模糊，出现了兵匪一家、军队土匪化的趋势，这表明落后的军阀政权不但无力肃清土匪，反而受到了土匪的渗透和影响。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反清起义中很重视联络会匪，在辛亥革命中土匪武装曾发挥重要作用，但革命后土匪武装扰乱社会秩序，革命派不得不在其执政的地区（比如广东）严厉镇压包含很多土匪成分的民军。到 1913 年反袁失败后，国民党从分享权力的政党回到革命党的地位，联络土匪又成为反抗北洋军阀的重要策略，在震动北方数省的白朗军中就有孙中山的使者。在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等历次军事行动中，国民党都有联络土匪武装的尝试，福建的卢兴邦、陈国辉、郭鸣凤等土匪首领在这一时期与国民党建立了联系。

1926 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各路北伐军都曾收编土匪武装，不过在兵力比较雄厚的湖南、江西战场，收编土匪武装的作用不大，湖南著名的土匪首领陈光中不过被委任为营长。但在兵力不足的福建战场，何应钦大力收编土匪武装，顺利地驱逐了北洋军，卢兴邦、郭凤鸣被委任为师长，陈国辉被委任为团长。何应钦率北伐军进军浙江以后，收编的几支土匪武装成为福建重要的军事力量。国民党对土匪武装的收编基本上只是拉拢土匪首领，颁发委任状，并不进行深入整顿，收编的土匪武装往往反复无常，其行为方式中仍保留着野蛮任性的作风，所以在国民党控制的区域，土匪活动即使有所收敛，也难以得到根本的解决。

中国共产党是当时新兴的政治力量，主要以城市知识分子和工人群体为基础，工作重点是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1925 年 1 月中共四大的时候，农民运动受到了更多关注，制订了《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其中涉及到土匪问题，认为“土匪与农民之关系是一个重要问题”，并根据广东农民运动的经验把土匪分为三类，分别提出不同的对策：一、“有帮助农民反抗压迫的，这类土匪当予适当的联络”；二、“有被地主利用压迫农民的”，“我们一面以武力对抗，一面须极力向他们宣传并揭破地主利用他们的阴谋”；三、“对于拥戴土豪专以鱼肉农民为业的土匪，自然只有训练农民自卫军以防御之。”<sup>1</sup>

---

<sup>1</sup>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363-364 页。

1926 年北伐军打过长江，共产党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土匪和农运之间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有的土匪与地主勾结，捣毁农会、杀害农会干部；有的土匪武装同情农运、甚至参加农运，比如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部先后被编为宁冈县、遂川县农民自卫军。总的来说，敌对土匪只能压迫一盘散沙的农民，并不能抵抗组织起来的农民运动。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热情赞颂了农运肃清土匪的威力：“从尧舜禹汤起吧，一直到清朝皇帝，民国总统，我想没有哪一朝代的统治者有现在农民协会这样肃清盗匪的威力”，土匪在“各县全然绝了迹，哪怕从前是出土匪很多的地方”。“农会会员漫山遍野，梭镖短棍一呼百应，土匪无处藏踪”；“农民禁阻谷米，谷米价值极廉”，“民食问题不如从前之严重”；“会党一概加入农民协会，在农民协会里头公开的逞英雄，吐怨气”；“农会一起，匪患禁绝。对于这一点，绅富方面都同情于农会”。

<sup>1</sup>

但是，土匪成分渗透进农会，“逞英雄”，“吐怨气”，难免会加剧农民运动中固有的暴烈倾向，加之建党不久的共产党组织力还在幼稚阶段，不能有效掌控大规模群众运动，以至于鲍罗廷认为“湖南农运不是我们的领导，而是地痞与哥老会的领导。”<sup>2</sup> 鲍罗廷的看法固然偏颇，却也反映出会党与土匪因素在农民运动中确有影响。

## 二、收编土匪武装是扩大红军的重要手段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中，大批党员脱党，继续战斗的革命者也被迫撤离城市，他们与南方各省遭到追杀的众多农运骨干结合，在农村勇敢发起武装暴动，创建红军和苏区。在 1927 年开始武装暴动时，由于军力薄弱，收编土匪成为壮大革命武装的重要手段。当时中共中央很重视在暴动中吸收土匪武装，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控制和改造，这个策略最初发挥的作用有限。暴动失败后，红军和游击队向敌军薄弱的偏远山区寻求生存机会，这些地区常常有土匪武装盘踞。

<sup>1</sup>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 年 3 月 28 日发表于《中央副刊》第七号），《毛泽东集》第二版（1），第 245 页。

<sup>2</sup>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第 215 页。

在国民党军队的压力下，土匪也往往倾向红军，很多土匪武装被收编充实到红军中，壮大了革命力量。在创建初期的红军中，土匪武装占有不小的比重，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红军的很多游击战术也来源于土匪武装多年积累的经验。

### （一）从国共分裂到建立井冈山根据地——“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

1927年7月国共分裂以后，中共在八七会议决定转入武装暴动，联络土匪武装在暴动计划里占有重要地位。对武装斗争态度坚决的毛泽东明确说：“土匪问题是非常大的问题”，“会党土匪非常之多，我们应有策略”，认为通过土地革命能赢得土匪武装的支持，批评有些同志像孙中山只想利用土匪，提出对土匪武装应以诚相待，应该“当他们是我们自己的兄弟”。<sup>1</sup>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肯定了毛泽东的意见：“我们不但不利用，并且还应确定其经济地位”<sup>2</sup>。所谓确定经济地位，就是在阶级划分中把土匪定为“破产的农民”，既然是农民，当然是阶级兄弟。八七会议在中央层面明确了联络土匪武装的政策，在选举中毛泽东提出不要选自己进政治局，希望到地方搞暴动，他说：“我现在担任土匪工作，不能加入”，可见收编土匪在他的暴动计划里份量很重。<sup>3</sup>

其实早在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党组织在危急形势下已产生了“当大王”的想法。郭静筰到浏阳组织第一路指挥部，见平江、浏阳兵力薄弱，主张“退到浏阳及江西边界去当大王”。<sup>4</sup>7月《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也提出上山学习土匪是军事上长期斗争的方法。<sup>5</sup>在湖南省委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到：“中央最近所示的军事三步办法，即：（一）设法改编挨户团，取得合法地位，以图自保；（二）上山学匪准备长期奋斗；（三）上二者都办不到则埋枪。”湖南省委比较认同“上山学匪”的办法，并且实际上已经开始实行这一方法，“潭部已收集了一百二十四支枪上了山，兵极可靠，负责同志郭咏泉来省请示，即坚嘱其负险固守，正式作匪”。湖南省委的结论是：“湘虽失败，然收集流亡，两千支枪尚或可得，经时整理上山作匪亦有可能。”<sup>6</sup>当然，这里只是提出学习土匪的生存策略，保存现有的力量，

<sup>1</sup>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10页。

<sup>2</sup>《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关于农民斗争决议案的发言》（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页。

<sup>3</sup>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四册，第12页。

<sup>4</sup>潘心源：《湘东各县工作报告》1929年7月2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121—122页。

<sup>5</sup>《中央通告农字第九号》（1927年7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3），第220页。

<sup>6</sup>《中共湖南省委给润兄并转中央的信》（1927年7月2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92-95页。

还不是通过收编土匪壮大力量。

在震动全国的八一南昌起义中，收编土匪武装成为军事工作的重要方面，起义领导机关曾经大规模改编土匪武装，但是实际效果有限。当时深入土匪的联络员报告说：“叶贺军队南昌举义之后革命委员会成立，我即于此时受前敌军委命令赴抚州接洽土匪工作”。“抚州六县原属平原之地，无高山险阻，大股土匪不能容身，只有小股土匪，每股为数十人不等”。联络员“遍访他们的首领”，提出收编条件为：遵从命令和政策，保护贫农利益，掩护起义军主力后方安全。土匪首领要求供给枪支弹药，革命委员会慷慨同意提供 2000 多支枪、50 万发子弹。土匪 300 多人到抚州搬运枪支，虽然搬运未完即被国民党军队击败，只运出 1200 支枪、10 多万发子弹，但招集了 2000 多人的队伍开赴江西、福建山区。不过这支队伍遭到失败，在埋枪 700 余支后分散，60 名土匪首领在抚州被斩首示众。<sup>1</sup>南昌起义中虽然拨出大批武器弹药改编土匪武装，但来不及改造和训练，这些队伍战斗力薄弱，很快溃败。

八七会议以后，秋收暴动成为南方四省武装反抗的工作中心，由于军事力量不足，联络土匪武装受到高度重视。在 1927 年 9 月《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中，联络会匪形成了比较系统清晰的思路。省委首先承认会匪是农民的一部分，“是失业农民另一种的生活形式，他们‘劫富济贫’的口号即是土地革命的精神”，所以“我们进行暴动工作，须与当地会匪联络，派人到他们中去工作，向他们说明土地革命的意义是劫富济贫更彻底的办法”。计划要求联络会匪要抱有诚意，“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系，不要存利用的心理，不是希望他们来帮助，而是要他们与农民一样为暴动的主体”；同时要注意“联络会匪要拉住群众，不要仅拉他们的领袖”。<sup>2</sup>中共与江西土匪武装建立了初步联络，八一起义后不少中共党员遭到搜捕不得不隐藏在土匪中，到秋收暴动时期正好担任收编土匪的工作。江西省委报告提到：“在‘八一’后赣东各县的同志大都被政府通缉跑到土匪里面去了。迄听到各处暴动，也回来接头而大干特干了。”<sup>3</sup>

湖南秋收暴动是各省暴动中影响最大的，湖南农民运动势力非常雄厚，暴动中还有正规军队的参加，但收编土匪武装同样受到重视。1927 年 9 月湖南省委

<sup>1</sup> 《关于抚州土匪问题的报告》（1927 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 年甲），第 35-38 页。

<sup>2</sup> 《中共江西省委秋收暴动计划》（1927 年 9 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 甲），第 21 页。

<sup>3</sup>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目前政治状况及各地工作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 年甲），第 342 页。

给中央的信中提到“由此间加派人前往湘南加紧土匪运动及暴动”<sup>1</sup>。《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明确提出土匪是暴动中的重要力量，“对于土匪的政策应当以我们的口号去宣传他们，组织他们于农民协会之下或革命委员会之下，使他们在暴动的时候成为一部分重要的副的力量，在暴动成功之后，予以改编”<sup>2</sup>。湖南省委中提出要在土匪中发展党员：“土匪红会等必须在事实上理论上去批评其错误，改造其组织，使之加入农民协会，与农民一致，其中有阶级觉悟的急进分子，不妨吸收入党。”<sup>3</sup>但是湖南秋收暴动中对土匪的收编却并不成功，师长余洒度收编了平江土匪邱国轩部，在一、二、三团之后编为第四团，结果起义过程中邱部叛变，与敌夹击最精锐的主力第一团，造成起义军惨重损失，被迫放弃进攻平江的计划。

<sup>4</sup>邱部的叛变是湖南秋收暴动很快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sup>5</sup>

任弼时在秋收暴动失败后的报告中，提出要对土匪武装提高警惕，必须先有革命行动才能收编。“过去军事工作，多与各地土匪领袖接头”，现在湘南有土匪“自称有枪七千余，愿意与我们合作，并赞成土地革命政纲和屠杀土豪劣绅政策，惟要求一千元开办费。其他预备受正式军队收编的军队，也时常向我们要求津贴。据我的观察，这些军队势力都不可靠，并且又含有极大的危险，结果必定我们被他们所利用欺骗，并且我们也没有这多钱供给接济，因此决定对于这些军事势力，必须令他先做出成绩，然后谈到经济上的接济。并须承许我们派人进去工作担任下级干部为条件。现预备派人南去要唐某廖某实行土地革命政纲”，“以测验他合作的真意。”<sup>6</sup>

在平江、浏阳，收编不成功引发了地方干部对土匪武装的敌视。潘心源说：“现在平、浏所取的政策，完全是一种杀的政策，不论他们是否反动，只是要稍有一点错误，便捉去枪决”，“土匪借我们的名义组织赤卫队，虽有不少的盲动，但当地土豪劣绅却已被他们打跑了，也未尝不可利用他们做过革命的助力，如果专门去杀，便只有增加自己的敌人，无意中帮助了敌人”。<sup>7</sup>

<sup>1</sup> 《中共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1927年9月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20页。

<sup>2</sup> 《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载1927年9月12日出版的《中央通讯》第4期，《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133页。

<sup>3</sup> 《中共湖南省委组织部局工作计划》（1927年11月2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75页。

<sup>4</sup> 余洒度：《余洒度的报告》（1927年10月19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页。

<sup>5</sup> 后来邱国轩部被平江游击队击败，邱被活捉处决，见《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第15页。

<sup>6</sup> 《弼时报告（二）》1927年10月4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195-196页。

<sup>7</sup> 《潘心源关于“秋收起义”前后浏、醴、平革命斗争情况的报告》1929年7月2日，《平江革命历史文

但是在井冈山，收编袁文才、王佐部却给困境中的红军很大帮助，在创建根据地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江西宁冈县党组织的龙超清等人早就与袁文才、王佐有联系，两部曾被编为农民自卫军，但他们实际上还是独立活动，党组织不能真正掌控。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带领不足千人的队伍在三湾改编后向井冈山撤退，在古城文昌宫会议上讨论了如何对待井冈山土匪武装的问题。当时不少人主张武力消灭，但毛泽东认为这种意见“太狭隘了，度量太小了”，“三山五岳的朋友”是消灭不完的，“他们大多数是贫苦农民，与地主阶级矛盾很深”，应当“教育改造他们，把三山五岳联合成一个大队伍”。会后毛泽东亲自和袁文才交朋友，送给袁部 100 支枪。<sup>1</sup>袁文才深受感动，也送给红军七八百元钱，并帮助筹集粮食、安置伤病员，进而同意率部参加红军。当时红军正处于失败后的困境中，军心涣散，“逃跑的很多”，“甚为危险”<sup>2</sup>，袁部的参加使红军得到了休整，壮大了革命武装，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红军编为第一师，共两团：一团是秋收起义余部，约一千人；二团即为土匪武装袁文才、王佐部编成，约六百人。1928 年 4 月朱德带领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起义农军共约一万人上山，与毛泽东会师成立第四军，编为六个团：28、29、30、31、32、33 团，其中 32 团即是由袁王部编成的。但是 4 月到 8 月间，由湘南起义农军编成 30、33、29 团先后返乡溃散，红四军只剩下 28、31、32 三个团约四千余人，袁王部 32 团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sup>3</sup>

红军在探索游击战术的过程中，也从土匪经验中学到了不少东西，“上山学匪”是有真实内容的。井冈山原来有个土匪首领叫朱聋子，政府军和地主武装多年也无法消灭他，他的秘诀是“不要会打仗，只要会打圈”，意思是不要和对手硬碰硬，而要灵活的游击。毛泽东对这个口诀很欣赏，反复向部队干部解说，并且把它改造为“既要会打仗，又要会打圈”，逐渐形成了红军的游击战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钻，钻不赢就化（化装成老百姓）”，常让强大的敌军毫无办法。<sup>4</sup>毛泽东甚至把“打圈子”这个词写进了给中央的正式报告，在

献资料集》，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编辑出版 1983 年，295-296 页。

<sup>1</sup>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6 页。

<sup>2</sup> 《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1928 年 6 月 15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6，第 37 页。

<sup>3</sup>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第 2—4 页。

<sup>4</sup> 《何长工回忆录》，第 104—106 页。

1929 年红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中明确提到“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sup>1</sup>。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也谈到“打圈子脱离敌人包围与穷追”，“大敌前来，我不能与之作战，则利用打圈子的办法向没有敌人的地方跑”。<sup>2</sup>可见，来自土匪的“打圈子”成了红四军的口头禅，在红军游击战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 （二）收编土匪武装，创建赣西南红军

赣西南苏区 1929 年以后逐渐成为中央苏区的中心，土匪成分在赣西南初期革命势力中占有相当比重。土匪问题在整个江西都很普遍，在赣西南尤为突出，赣西南土匪主要是受会党控制的会匪，三点会在某些地区已经成为群众性组织。由于国民党军队和民团的压迫，也由于革命势力的兴起，会匪往往倾向于共产党。泰和县仙槎清卫团任意捉杀仁善乡农民，甚至有病在床的 70 多岁的老头子、4 岁的童养媳、路上的挑夫、江边的瘸子都被杀害，激起了群众的公愤，“尤其是洪家兄弟，自动的召集千余人的示威大会，一面用群众的力量，驱逐仙槎清卫团，另一方面，派代表到东固搬请红军援助”。<sup>3</sup>1929 年江西省委报告中提到：“赣南有同志二千余人，群众在他们自称有十万人，但实际确有二万余”，另外“七、八万是土匪群众”，可见会匪势力在整个赣西南革命势力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sup>4</sup>1930 年巡视员张怀万在报告中也提到：“赣南的土匪极多，现在因为革命发起，很多土匪（三点会）都归顺革命”。<sup>5</sup>

由于经验不足，收编政策最初遭遇了不少挫折。吉安县委“在暴动的准备中，只注意联络东固的会匪，派人到会匪中去工作，从没想到怎样发动群众”，“又怕会匪不能受我们的指挥，扰害地方——不敢进行，所以结果还是一哄而散”。<sup>6</sup>赣南地方武装八纵队的前身是北洋军残部流散形成的土匪，大多是河南人，党组织派吉安师范的革命学生把它争取过来，但是派进去的人太少，不能充分改造，这支部队最后垮掉了。<sup>7</sup>

<sup>1</sup>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56 页。

<sup>2</sup>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一）》（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军事文选》，第 15 页。

<sup>3</sup> 《中共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29 年 7 月 18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二甲），第 25 页。

<sup>4</sup> 《中共江西省委关于各地党的工作状况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7 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二甲），第 47 页。

<sup>5</sup> 《张怀万巡视赣西南报告》（1930 年 4 月 5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183 页。

<sup>6</sup> 李干生：《江西省委致中央信》（1927 年 12 月 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9—10 页。

<sup>7</sup> 李挺：《回忆红二、四团的前身》《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第 36 页。

但地方组织的艰苦努力逐渐收获了成果。兴国县委派出黄家煌、肖以佐、陈赤峰、陈奇涵等干部加入三点会，因这些革命者大多是富家子弟出身，以至于当地人议论说，“这些人不愁吃不愁穿，好事不做跑去当土匪”。<sup>1</sup>于都县也派丘倜、刘为美、李骏等六名党员入三点会，与会党头目“喝血酒，跪拜天地为誓”。<sup>2</sup>不少土匪武装被改编为红军，壮大了革命队伍。赣西游击第一大队是二团东渡时留下来的，“当时仅有步枪八支，后来与当地一班土匪联合，渐渐淘汰他的、分配他的，领袖驱逐出去，得了四十多杆枪，渐渐发展得九十多枝，总共有一百卅枝”。<sup>3</sup>赣西特委领导下的游击第一大队、第二大队人数 500 多、枪 400 支，其成员相当部分也是来源于土匪<sup>4</sup>；上犹、崇义以及湘赣边境的土匪和三点会一批一批投奔红军，“诚恳的接受红军的领导”。<sup>5</sup>

在早期赣西南红军中，收编的会匪武装占很大比重。红二、四团主力是七纵队、九纵队、十五纵队和十六纵队，四个纵队中有三个纵队长曾是会匪首领。第七纵队的前身是段起凤领导的绿林武装，后来由赖经邦通过亲戚关系争取过来，又收编一个姓孙的领导的土匪武装，逐步淘汰不纯分子，吸收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1928 年 2 月成立七纵队，段起凤担任纵队长（吴江只担任很短时间）；十五纵队以兴国县三点会首领管开炳的部属为骨干发展而来，1928 年 6 月成立，管开炳为纵队长；十六纵队以兴国县三点会首领曾老四的部属为骨干发展而来，1929 年 1 月成立，曾老四为纵队长。1928 年 9 月七纵队和九纵队合并成立独立第二团，段起凤担任二团副团长；1929 年 2 月，二团抽调 100 多名骨干与十五、十六纵队合编为第四团，段起凤担任团长。二、四团是赣南红军的主力，1929 年 11 月，赣西南苏区以二、四团为基础创建了红六军（后改称红三军），成为红一方面军一军团的主力之一，在第一次反“围剿”战争中立下大功。<sup>6</sup>

### （三）闽西苏区土匪势力特别强大，土匪问题更为突出

<sup>1</sup> 陈奇涵：《赣南党的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 5—6 页。

<sup>2</sup> 丘倜：《关于于都暴动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 28 页。

<sup>3</sup> 《江西军事工作报告》（1929 年 5 月 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428 页。

<sup>4</sup> 《中共吉水县委书记刘作扶关于赣西情形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29 年 9 月 6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二甲），第 157 页。

<sup>5</sup>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会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 年 6 月 16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 年），第 85 页。

<sup>6</sup> 李挺：《回忆红二、四团的前身》，《回忆中央苏区》，第 39-40 页；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6-38、54-56 页。

1929年初，红四军为避开湘赣两省联合重兵围攻，主动撤离井冈山，一路与追兵苦战，经赣西南辗转到达闽西，开辟了中央苏区的另一个主要部分——闽西苏区。闽西苏区是红军走出困境、转危为安的重要根据地，同时闽西山区也是土匪势力非常强大的地区，福建省委提到“闽西土匪特别多，对土匪的问题比较严重”<sup>1</sup>。

闽西地区的突出特点是，大的土匪武装控制了地方政权，成为红军的主要敌人。在湖南、江西，国民党政府军的力量比较强大，土匪一般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往往倾向红军。但在闽西，由于远离全国政治军事要冲，国民党正规军队力量薄弱，北伐战争中被何应钦收编的郭凤鸣、卢兴邦、陈国辉等土匪武装控制了地方政权。**1929年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初次进入福建，首要的敌人就是这些割据闽西的土匪武装，3月一战击毙郭凤鸣、占领长汀，6月又在龙岩消灭陈国辉部的主力，奠定了闽西苏区的基本局面。

但是，闽西不仅仅有这些大股土匪，部分地区已成为遍地皆匪的野蛮世界。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不能维持最基本的秩序，他们本身就胡作非为、战斗力也有限。各种土匪多如牛毛，不少地主、士绅为求自保也不得不加入土匪，同时为抵抗土匪，地方上大刀会等民间自卫组织也极为发达。在某些地区抢劫成为重要的生存方式，甚至普通农民也卖田买枪，土地大片荒芜，社会几乎倒退到部落争斗的原始时代。比如永定县，土匪数量十分惊人，“掳人勒索成为常事，往往仅有数里之路，本地人亦行不得。小乡村之小姓农民耕牛农具被掠，无以耕作，多流离别处或亦当匪，因此有许多田地无人耕种。”<sup>2</sup>军队下乡来剿匪时，同样祸害农民，所谓军队不过是被收编的大股土匪而已，“有用的、值钱的、搬得去的东西抢去”，还要“罚款赎罪”，把很多无辜农民绑走，要拿钱才能赎回。军队还常常半夜对农民突然袭击，以至于当军队临近驻扎时，常常吓得“全乡农民晚上不敢在家睡觉”。<sup>3</sup>

中央巡视员赵亦松（即周肃清）在报告细致生动地描绘了闽西土匪横行的恐怖场景。很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不得不当土匪，“无论那一乡那一村，都有土匪的组织，大小头目，不计其数。他们或则互相关联，或则互相对峙、冲突，造

<sup>1</sup> 《中共福建省委报告》（1929年4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9页。

<sup>2</sup> 《中共福建临时省委报告》（1928年4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7-1928年上甲），第197-198页。

<sup>3</sup> 《照化巡视莆田的报告》（1929年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第30-31页。

成剧烈的斗械”。“他们最主要的条件是不离故乡，就地极野蛮的剥削劫掠，或三五成群，或大股公开劫掠，拦路抢劫、绑人、抢牛、洗劫乡村。最大的匪股，利用时期，勾结军阀与豪绅，盘踞一区、一县或数县，形成土匪与豪绅相勾结的政权，极残酷的剥削农民，私造土枪，收买枪弹，扩充实力”。“现在的永定、武平、连城等县，差不多都是流氓土匪，一般的知识分子都在如何变为匪头。因为土匪、流氓、豪绅有不可分离的联系，真正的农民，除少数的男子外，耕田、劈材，都是妇人充任。一般说起来，男子尤其是有枪的男子，都是压迫者、剥削者，女子才是真正生产的农民！”<sup>1</sup>“永定土匪的数量是怪惊人的，坎市、武溪两区的人口不下三四万，土匪占了大半。尤其是武溪，除了土匪，什么也没有。土地都荒芜得无人耕种，尚以抢劫龙岩、南靖一带为生”。“农民最痛苦的是土匪与豪绅的压迫，没有田耕，而且不能耕田”。“他们共同的表现是要求枪支，要求与豪绅土匪决死战。他们许多都卖田买枪，好象不要土地，这实在是革命要求最迫切的图画。”<sup>2</sup>

土匪给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但他们的活动有时却有利于红军。国民党军队杨树庄部“因泉州的土匪扰乱”，卢兴邦部因“古田的土匪时常扰乱”，“时常感觉到自顾不暇”，“不能安心前进”，无力来进攻闽西苏区。泉属一带土匪遍地皆是，少数留守的国民党军队常为土匪缴械。<sup>3</sup>福建省委 1929 年 9 月提到，由于泉属土匪的纷扰，加上内部矛盾和财政困难，使福建国民党军队“对闽西的进攻发生了很大的困难”。<sup>4</sup>

不少小股土匪主动要求加入红军，多数土匪与国民党军队有矛盾也不愿对抗红军。赵亦松报告提到，永定的土匪“大半受豪绅的领导”，不过他们要把持税收，与国民党军张贞部是有冲突的，不太敢与共产党作对，“但是真正加入农协或共产党的，大半系小股与受大股压迫者”。<sup>5</sup>1929 年福建省委给红四军前委信提

<sup>1</sup> 《赵亦松关于福建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1928 年 7 月 29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 年下甲），90-91 页。

<sup>2</sup> 《赵亦松关于永定工作概况报告》1928 年 7 月 29 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 年下甲），127、129 页。

<sup>3</sup> 《中共福建省委给中央报告》（1929 年 6 月 8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上甲），第 251 页。

<sup>4</sup> 《中共福建省委致闽西特委及前委信》（1929 年 9 月 6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下甲），第 205 页。

<sup>5</sup> 《赵亦松关于永定工作概况报告》（1928 年 7 月 29 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 年下甲），第 132 页。

到，“漳、泉一带土匪已在蠢动。漳州土匪多希望我们收编”<sup>1</sup>。在地方组织报告中也提到，莆田、仙游、福清三县“土匪除有背景的向我们进攻，大多数是表示好感，并且要求收编”，“仙游最近土匪要求我们派人去领导及派人去拿武装，莆田同样也有几股。”<sup>2</sup>

闽西特委认识到收编土匪武装是壮大红军的机会，1929年“匪运”已经上升为与“工运”、“农运”、“兵运”并列的重要工作。特委检讨以前的工作，认为“二月杀土匪八人，招致土匪群众之反对，是不对的”，“过去闽西一般的说都不注意土匪运动，并大部分都是仇视土匪，如蛟洋杀七匪等，尤其对城市流氓的取仇视态度，这在客观上是把土匪流氓群众让与豪绅阶级，使之进攻我们”。<sup>3</sup>很快，“匪运”取得不小的收获，相当数量的土匪武装被收编入革命队伍。武平有土匪五六十人加入农会，永定一带土匪有几十人在共产党指挥之下，还有十余名土匪投到八支队，溪口有一部分土匪被编为赤色游击队，后编入红四军四纵队。龙岩的刘烈波部有土匪80人，经军部委为赤色游击队，后来红四军前委决定将长汀赤卫队、永定湖雷溪南游击队，与一部分土匪及北四区五九团都编入四纵队，包含许多原土匪成分的四纵队逐渐成为福建地方红军的主力。<sup>4</sup>

1932年在上海抗战的十九路军调入福建后，雄心勃勃要整顿地方秩序，消灭各地的武装割据，对土匪武装造成很大压力。很多土匪“觉得找红军是他们的出路”，有的找不到红军，“却自持起红旗冒充红军”，他们并不了解红军，结果闹出带三角型帽徽的笑话。惠安党组织一方面揭破他们的假冒，另一方面也派人做他们的工作。<sup>5</sup>安溪党组织报告说，德化土匪张凤南部“被十九路军打击，没有出路，派代表到我们有组织的地方来找，要求我们收编他们。我们对他们这样说，苛捐什税不准派，无产阶级劳苦群众一个钱不准拿，不准压迫士兵，他们接受”。

<sup>6</sup>闽南党组织认为“土匪应该分别看待”，“发许多《告绿林兄弟书》给土匪。土匪

<sup>1</sup> 《中共福建省委致前委信》（1929年5月26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第239页。

<sup>2</sup> 《于洁关于莆田、仙游、福清三县情况的报告》1933年9月1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1933-1934年），117-118页。

<sup>3</sup> 《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之政治决议案》（1929年7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117、119页。

<sup>4</sup>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11月6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69、170页。

<sup>5</sup> 《中共厦门中心市委关于工人运动及蔡协民问题等给中央的信》1933年1月3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年），第27页。

<sup>6</sup> 《林琼关于安溪县工作情况的报告》1933年2月27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年），44页。

要求我们收编的”，有王观兰的两连，有百七、八十人，枪五十多枝，安溪中心县委将其编成闽南游击队第二支队的第三大队。”<sup>1</sup>这段时间是福建红军收编土匪武装的又一个小高潮。

### 三、改造土匪武装——中共六大严厉政策和红军实践中的变通

但是，野蛮的土匪武装要想成为真正的红军，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经过深刻的改造。对于如何改造土匪武装，1928年夏天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制定了粗糙严厉的政策，提出对土匪首领要“完全歼除”，而红军在实践中则表现得更为灵活和耐心。六大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其决议主要反映了共产国际领导人的想法，他们从俄国革命经验出发，宏观上并不认为农村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对来自农村的革命成分持怀疑态度。斯大林在接见中共领导人时说：“农民游击战争并非暴动，有些地方取得政权，组织红军，但不能持久”。<sup>2</sup>很显然，斯大林此时认为中国革命的前途也应是十月革命式的城市暴动，农村武装斗争只起次要作用，他的看法到1930年以后才发生较大转变。

虽然共产国际领导人也注意到中国作为落后农业国的特点，强调土地革命和农民运动，但是比较担心农民的落后性给革命带来危害。当然这种担心也是有道理的，近代以来，代表先进技术和先进思想的是城市，革命运动通常以城市为主要动力，比如法国历次革命中的巴黎、俄国十月革命中的彼得堡和莫斯科，而农村常常是落后反动势力的基地。因此共产国际一方面承认在革命武装力量不足的情况下，在农村武装斗争中收编土匪是必要的，同时也非常警惕土匪武装成分引起革命军队的堕落变质。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要注意土匪领袖的危害：“强盗队伍（土匪、红胡子）有时有成千累万的武装，有时能够打败正式军队，所以在农民中的工作人应对他们加以注意。强盗是社会经济恐慌的产物，其中大部分有倾向革命的可能；土匪队伍第一就须改组，改组时首要的必须注意军官成份的选择，因为大半的土匪领袖是真正的强

<sup>1</sup> 《包野关于闽南组织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3年8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年），72-73页。

<sup>2</sup>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478页。

盗，他们只是妨碍革命的事业。”<sup>1</sup>

共产国际很多工作人员对农村武装表示怀疑，苏联顾问叶夫列莫夫甚至对贺龙也很不信任，他说：“贺龙当了 20 年的土匪，而你现在想把他变成共产党人，变成为社会主义而斗争的我们的游击队员。这是极大的错误。”<sup>2</sup>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阿尔布列赫特对毛泽东的红军也有疑虑：“这些军队没有根据地和供应来源，所以它就成了农民的很大负担。更有甚者，一部分军队是半土匪出身，例如毛泽东的队伍，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开始瓦解并遭到农民的反对。”<sup>3</sup>共产国际执委会指导员斯卡洛夫明确提出红军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在许多部队中，特别是在不大的部队中，职业土匪占很大比例，他们一起加入军队并在自己的头目领导之下”，“在红军的一些部队，有时是主力部队的社会成分如此纷杂的基础上，红军队伍中发生盗匪活动的危险性在增强”。<sup>4</sup>

正是由于共产国际对中国农村武装斗争落后性的怀疑，中共六大提出了对土匪问题的严厉政策。《农民运动决议案》第十项“对民团土匪的策略”认为，土匪的社会成分与贫苦农民有联系，是“因无法为生而去当土匪”，“所以党应当加紧在里面的工作，宣传土地纲领，成立秘密的组织与党的支部，来吸引这些武装群众”。<sup>5</sup>而在《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第十项“对土匪的关系”中则提出，仅在暴动前才可以与土匪联盟，“暴动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的镇压他们”，并认为“这是保持地方秩序和避免反革命死灰复燃之必要的先决的前提”，“他们的首领应当作反革命的首领看待，即令他们帮助暴动亦应如此。这类首领均应完全歼除。土匪而浸入革命军队或政府中，便危险异常。这些份子必须从革命军队和政府机关中驱逐出去，即其最可靠的一部分，亦只能利用他们在敌人后方工作，绝不能位置他们于苏维埃政府范围之内。”而在第十一项“对迷信与半迷信的农民武装组织（红枪会等）之关系”中提出的政策是“夺取其群众，孤立其首领，并乘机改编之”。<sup>6</sup>

<sup>1</sup>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军事工作的训令》（不晚于 1928 年 5 月 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439 页。

<sup>2</sup> 《工农红军参谋部第四局关于南昌起义会议速记录》（1927 年 9 月 14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56 页。

<sup>3</sup> 《阿尔布列赫特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1928 年 2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7），第 357 页。

<sup>4</sup> 《斯卡洛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和东方书记处的书面报告》（不晚于 1930 年 12 月 2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56 页。

<sup>5</sup> 《农民运动决议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364 页。

<sup>6</sup> 《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1928 年 7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399、400 页。

这种严厉政策在原则上虽有一定道理，但太过粗糙，明显脱离实际。首先，两个决议本身就有矛盾，前者似乎把脱离生产的土匪和一般农民自卫武装混在一起，笼统提出“吸引这些武装群众”；而后者把职业土匪和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明确区分，提出不同的政策，对土匪是严厉镇压，对红枪会等是乘机改编。其次，对土匪武装暴动前利用、暴动后镇压，对土匪首领“完全歼除”，这样的政策完全脱离实际。因为暴动不止一次，土匪武装也不止一支，一次暴动采取了这种“过河拆桥”的政策，就足以把其他土匪武装推向对立面。

红军创建初期的实践中对政策做了灵活的变通，否则将很难通过改编土匪武装迅速发展壮大。当时红军处于敌人围攻之中，与中央的联系时断时续，有很大的自主权，红军面对危急复杂的形势，只有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才能生存发展。1929年9月，陈毅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红四军对于投诚的土匪，“均欢迎其加入红军，红军是一个大炉子，可以把他们熔化，常常是首领不干，群众自愿干，结果首领为他的群众所推翻。前委不主张硬性的消灭首领的办法，夺取了群众，首领自然成了废物。”<sup>1</sup>

八七会议以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红军都强调对土匪武装要真诚相待，要当成阶级兄弟，而不仅仅是利用他们。虽然在1929年初柏路会议已经传达了六大决议，但红四军的《告绿林弟兄书》还是体现出对土匪武装的友好态度：“土豪劣绅为你们取一个名字叫土匪，土匪成了极恶劣最下贱而凶恶的东西”，但是“共产党与红军并不以为你们可恶”，“因为你们与我们都是无田耕、无工做、无衣穿、无饭吃、无居住的穷朋友”。土匪生活痛苦危险，是没有希望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与红军齐心合作，受共产党指挥”，“又能长进学得政治军事的本领，又能够有帮助不致单独孤立受压迫”，“家里也可以分得田地”，最后是热情地召唤，“弟兄们快来啊，我们红军欢迎你！”<sup>2</sup>

不过，六大决议也是有深刻依据的，初期以开放态度收编的大量土匪武装含有很多毒素，必须通过深刻的改造才能消除，否则将危及红军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导致红军堕落变质。土匪和革命者虽然同是现存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两者有很大不同。土匪的反抗是消极的，并没有建立新社会的宏伟理想<sup>3</sup>，因此虽然人数众

<sup>1</sup>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786页。

<sup>2</sup> 《告绿林弟兄书》（1929年），《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473-476页。

<sup>3</sup> 法国学者毕仰高对自发的农民反抗有比较细致的研究，见 Lucien Bianco: Reflection on Chinese Peasants and Revolution ,Peasants without Party ,New York: M.E.Sharpe,Inc.,2001,p16—p35。

多，却很难成为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土匪活动是破产农民自发反抗的一种，他们斗争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身的物质需求，凭借着武装从事抢劫、奸淫等暴力活动，受害者既有地主、富商，也有普通的农民，他们很少遵循什么原则，往往随心所欲，具有很大的野蛮性和破坏性，“一般土匪虽前身是个农村失业的农民，但做起土匪来便没有了农民意识，不管三七二十一要抢之。”<sup>1</sup>由于他们并没有新的建设性理想，因此并不从根本上反对现存制度，只要统治者表现出宽容，他们很容易接受招安，摇身一变成为现存制度的捍卫者，如闽西大土匪郭凤鸣、陈国辉、卢兴邦等。

红军是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集团，信仰上摒弃私有观念，有着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宏伟理想，对现存制度毫不妥协，其思想和组织与当时中国一般军队有极大不同，更不是挣扎图存的土匪武装所能想象的。然而，依据新的信仰和组织原则创建一支新式军队决非易事，甚至直到 1929 年夏，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创建的红四军仍很不满意，在《给林彪的信》中说：“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范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sup>2</sup>“斗争”的结果就是在红军建设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古田会议”。红四军尚且如此，收编的土匪武装要成为真正的红军，更要经历思想和组织改造的过程，这是艰难曲折的信仰传播过程，也就是陈毅所说的在红军大熔炉中熔化再造的过程。

土匪武装有长期劫掠生涯中形成的恶习，也有特有的组织结构，因此改造土匪武装是相当艰巨复杂的工作。比如赣西南红军中土匪成分很多，“二、四团红军大部分吃鸦片，打仗要发饷，二十五纵队是大部分老弱与流氓吃鸦片烟的，于都游击队多半是由收编土匪成立的，有三分之二是三点会份子，信仰大哥，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作战和解决内部问题，时常向大哥要把打反动派的胜利四六开分红发用钱。”<sup>3</sup>湖南省委逐渐认识到：“若没有群众的革命势力与革命环境来熔化土匪的根性，对雪峰山的队伍，是没有保证他们不叛变的”。“土匪是不易变为革命游击之可靠的纪律化的战士”，“他们的生活解决后，他们没有政治的认识，

<sup>1</sup> 《中共福建省委巡视员练文澜巡视莆田工作报告》1929 年 4 月 26 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 年上甲），186-187 页。

<sup>2</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70 页。

<sup>3</sup> 《黎日晖关于赣南工作的综合报告》（1931 年 10 月 6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1 年），第 181 页。

因此便没有其他的目的与需要了”，“习惯嫖赌吃喝的浪漫生活，也就没有迫切革命的要求了。并且他们很可以把很多的不坚定性与浪漫性带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因为他们过惯了浪漫生活，决不能过艰苦的长期革命纪律性生活。所以到了危险难苦交加的时候，便要发生叛变的行为。”<sup>1</sup>闽西党组织也发现：“土匪流氓虽是失业及豪绅刮民党剥削所形成，但脱离生产日久，没生产能力，生活特殊化，破坏力极大”，“收编后，应即将其分数，或调其离开原驻地，但在政治主张及政治影响上党绝对不能对他让步”。<sup>2</sup>

要改造土匪武装，使之变为真正的红军，首先要打碎其原有的组织结构。土匪武装的组织结构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第一种是匪首专制，匪首有绝对的权威，这是发育到比较高级的组织，往往是大股土匪；第二种是比较平等的合伙制，权力分散，通过商量决定行动，抢劫所得按照枪支等来分成，如湖南雪峰山土匪，“领袖是以枪之多少为标准推选的”，“军事行动是以会议式的决定，经济的分配，除有枪阶级提出枪费外，余则平均分配”<sup>3</sup>；第三种是从传统的宗族演化而来，通常是在那些土匪化的地区，如闽西某些地区的土匪“是一种氏族组织，一房的土匪，团结在一房的豪绅势力之下，一姓的土匪，团结在一姓的豪绅势力之下”<sup>4</sup>，第四种是会党土匪，在赣南很普遍，前面提到土匪成分较多的于都游击队，只有三点会的大哥才能指挥。

关于改造土匪武装的细节，保存下来的资料不多，总的来说红军在实践中表现出更大的耐心。以改编井冈山王佐部为例，何长工 1928 年初奉毛泽东之命只身进入王佐的部队，当时王佐部虽然打起了红旗，但还是为所欲为，“一下山就发洋财、杀人”，“我们在山下发动群众，他们却到处搞老百姓的东西，破坏老百姓的利益。他们不听共产党的话，人要往东他偏往西，你实行这个政策，他给你破坏。这样山上山下就发生了尖锐的矛盾。”毛泽东叮嘱何长工：“要快，但是又不能犯急性病，要讲究艺术”，“你是打前站，以后还要派。你的工作能做到请求派人去，就是做到家了。现在如果派人多了，会引起人家怀疑的。”<sup>5</sup>

<sup>1</sup> 《中共湖南省委对益阳工作的指示》（1929 年 11 月 26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362、368 页。

<sup>2</sup>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日刊》1930 年 7 月 8-20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304-305、308 页。

<sup>3</sup> 《中共湖南省委通告（第七号）》（1929 年 11 月 5 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335 页。

<sup>4</sup> 《赵亦松关于福建工作情况的综合报告》（1928 年 7 月 29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 年下甲），第 90 页。

<sup>5</sup> 何长工：《井冈山的星星之火》，《星火燎原未刊稿（1）》，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89、90 页。

何长工上山进入王佐部队后，发现“事情要比预料的困难得多”。王佐戒心很重，把他安排在离司令部较远的一处小房子里，还派了一个“颇不简单”的勤务兵负责监视，并警告何长工不要随便走动，实际是暗示他“不许私下活动，不准与士兵接近”。何长工只能耐心地先接近王佐亲属和心腹部下，逐渐取得信任，动员王佐的母亲劝他不要乱杀人。民团头目尹道一是王佐最害怕的死敌，何长工借红军之力帮助王佐消灭了尹道一，这给王佐很大触动，此后改造工作才真正开始。何长工先提出王佐的部队唱歌不齐，派出一些士兵下山到红军中学唱歌。通过唱歌、演戏向王佐部传播革命道理，这是野蛮抢劫生涯中闻所未闻的，引起了士兵们浓厚的兴趣。然后，何长工又组织军官和士兵到红军部队参观，官兵平等、经济公开的红军制度让他们觉得新鲜和羡慕，“甚至有的士兵参观后，都不想回来了”。很快，“士兵们开始了新的生活，剃去了长发，换上了新军衣，学唱歌，学演戏，茨坪山上充满了新的气象”。改造工作中比较困难的是克服军官的阻力，在部队中组织士兵委员会和废除打骂现象，在士兵的群体压力下，新的制度逐渐建立起来，王佐、袁文才部改编为32团，成为红四军三个主力团之一。<sup>1</sup>

首领在队伍中影响很大，也是改造土匪武装的关键。毛泽东亲自做井冈山袁文才、王佐的工作，他利用一切机会找袁、王谈话，给他们讲政治形势。袁、王对毛泽东很信服，有一次毛泽东和王佐谈了多半夜，事后王佐兴冲冲地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跟他谈上一次，真是胜读十年书啊！”王佐原来长年困居深山，连电灯都没有见过，下山到湘南参加迎接朱德部队的征战，才见了世面，打破了蒙昧的精神状态，似乎看到了革命的远大前途，“内心起了很大变化”，主动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sup>2</sup>

对土匪武装的改造最后还要落实在组织和成分上，也就是派入革命干部和增加淳朴农民成分。在取得袁文才的信任后，毛泽东不失时机的派得力干部到袁部担任连长、副连长、排长职务，帮助练兵，“培养革命干部”，“传播革命种子”。<sup>3</sup>王佐初步接受革命思想后，也主动要求派遣干部，先后有二十几位干部奉派到袁、王部工作，游雪程任政治处主任、徐彦刚任参谋长，其他同志分别担任各营、连长和党代表，“部队建立了党的组织，党员的人数一天一天增多”。<sup>4</sup>在湖南省委

<sup>1</sup> 《何长工回忆录》，第122—132页。

<sup>2</sup> 《何长工回忆录》，第128、130、131页。

<sup>3</sup> 陈伯钧：《毛委员率领我们上井冈山》，《星火燎原》（1），第163页。

<sup>4</sup> 何长工：《改造王佐部队》，《星火燎原》（1），第211页。

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中也谈到，32团士兵成分“多土匪与流氓无产阶级，因军队整理的严，这些分子多逃跑，参加了一些新的农民进去，有同志二百余人”<sup>1</sup>，这支部队逐渐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军队。毛泽东对袁、王的评价是：“这两个人虽然过去当过土匪，可是率领队伍投身于国民革命，现在愿意向反动派作战。我在井冈山期间，他们是忠实的共产党人，是执行党的命令的。”<sup>2</sup>

红军改造土匪武装取得了相当的成功，来源于土匪武装的力量成为红军建军初期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红四军的主力，除了秋收起义部队编成的31团和南昌起义部队编成的28团，就是袁、王部队改编的32团。**1929**年初湘赣两省敌军3万余人围攻井冈山，红四军主力下山向赣南、闽西游击（袁文才随队），王佐部协同留守的彭德怀红五军与敌军殊死战斗。井冈山失守后，红五军突围，王佐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并未动摇，仍率余部坚持在山上与敌人周旋。当时“敌人对王佐也进行了很多分裂活动，叫王佐投入国民党，给官做，发大财。王佐和王佐部队经过改造和锻炼，此时表现得很坚决，很能打。”<sup>3</sup>湘赣边特委的报告中提到：“五井破后，王佐部队仍埋伏于五井山上，分散力量减少目标。后来敌人数次搜山，王佐曾与敌人斗争，无大损失，惟其旧部历史甚久的绿林弟兄反水者甚多”，“王对特委尚表现信服，对革命亦尚有决心”，<sup>4</sup>可见32团在保卫井冈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赣西南红军主力二、四团中土匪成分也很多，但**1929**年春与红四军会师后，二、四团的组织纪律性给毛泽东留下深刻印象，甚至认为连红四军都比不上。他在《给林彪的信》中提到：“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sup>5</sup>绿林首领出身的段起凤是赣西南红军重要将领，先后担任二团副团长和四团长，陈毅**1929**年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段月泉很有进步，能懂得政策，受党之指挥”。<sup>6</sup>李文林**1930**年在他的履历上写到：“以前是个赣南的洪家首领，**1927**他曾领导武装群众（土匪）来参加土地革命”，对于党“非常忠实，工作能力很好，

<sup>1</sup> 《中共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的报告》（1928年6月15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6，第39页。

<sup>2</sup>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43页。

<sup>3</sup> 《何长工回忆录》，第216页。

<sup>4</sup> 《湘赣边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1页。

<sup>5</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7页。

<sup>6</sup> 陈毅：《关于赣南、闽西、粤东江情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07页。

并且绝对的服从党的命令”。<sup>1</sup>

#### 四、清洗——信仰力量转化为组织力量

红军以宽容的态度吸收土匪武装，以很大的耐心进行改造，但随着红军日益强大和走向正规化，纪律要求越发严格，红军领导者逐渐发现温和的改造并不总能成功，难以改造的成分不得不通过严厉清洗解决。一般而言，长期形成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不易改变。土匪的作风是极端的自私，是抢劫他人财物据为己有，而共产党的信仰是摒弃私有观念。长期土匪生活留下的烙印，使不少人难以转化为合格的共产党员，有些人在艰苦的斗争中叛变投敌；还有人虽未叛变，却经常破坏纪律。内心信仰是否真诚难以考察，但是外在纪律却有严格标准。铁的纪律是共产党和红军战斗力的来源，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绝不会有任何宽容，红军中不能融合的土匪成分只能严厉清洗，信仰力量也由此转化为组织力量。

在闽西苏区，地方红军中某些土匪成分逐渐显露出危害性，不少收编的土匪如永定黄豺狗、龙岩刘烈波等先后叛变，造成很大的损失，原来比较宽松的收编政策不得不改变。1930年3月，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布了更为严格的政策：“集团土匪要求收编者，要有革命事实表现，如打土豪、枪毙反动等，始得予以收编”，“集团土匪收编后，应遵守红军纪律，听从政府指挥”，“集团土匪收编后，由政府派政治军事人材指导其工作”，“帮助土豪打工农的土匪，政府应解除其武装，惩办其首领”。<sup>2</sup>

由于土匪成分的影响，闽西某些地方组织竟出现了“土匪化”倾向，这也说明共产国际的担忧是有道理的。闽西特委提到在永定县太平里“曾做土匪工作，但无成绩。现在还有一部分同志土匪化了。”<sup>3</sup>福建省委指出，为了解决经济上的困难，“闽西各县都有一种‘视绑票为我们唯一的工作’的倾向”，引起“我们就

<sup>1</sup> 《赣西南特委代表李文林关于特委干部履历的报告》（1930年6月4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609—610页。

<sup>2</sup> 《优待士兵条例》（1930年3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下册，第79页。

<sup>3</sup> 《中共闽西特委报告》1929年5月1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1928-1936年），51页。

要变成土匪党”的危机。<sup>1</sup>罗明在报告中指出：“永定、龙岩、平和等地的党中，绑票和暗杀的风气很普遍，这一问题很觉得严重。特别是绑票工作，可以使党受很大的危害”。“绑票取款是土匪的方法，我们做起来有两种恶影响”：容易使党员腐化，脱离群众工作；“使群众对党的认识模糊”，“群众会把我们当作土匪”。<sup>2</sup>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报告提到，连江县“游击队的行动那不过是土匪而已。他们整天就是计划去打某一地方的目标，并不是单纯站在铲除这里群众斗争的障碍，帮助群众自动斗争，相反的他们的前提是要看弄得多钱，因此公开绑票和拦途劫掠的行为也有（如县委郑同志为着县委要他负责在某限期筹一千元钱，他就指挥队员在丹阳到县城的路上，去搜掠行路人的腰包）”。<sup>3</sup>福建省委对龙岩县委的绑票活动提出严厉警告：“绑票不是党的工作，是土匪的工作。省委前信已严厉的指出，并警告你们，以后的胡乱行为，定予以严重的处分。”<sup>4</sup>

土匪成分和土匪作风对于党内关系也有严重的危害。福安中心县委书记詹如柏与福安、寿宁、霞浦、宁德等地土匪都有来往，“一些土匪头子认为他仗义豪侠，还同他结拜把兄弟”，这还是符合联络土匪政策的。但是他把很多土匪作风带到党内，“如在寿宁，他对范浚有意见，便推举范铁民，而把范浚夫妇给暗杀了。陈亮也是被他当成反革命杀掉的。施霖与他有矛盾，他也曾扬言要干掉施霖”，试图暗杀叶飞的刺客也与他有牵连。<sup>5</sup>以土匪手段处理党内关系，危险不言而喻，共产党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并发展壮大，就是靠由铁的纪律维护的党内团结统一，土匪作风对党组织危害极大。

1930年6月，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前委<sup>6</sup>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做出关于“流氓问题”的决议案，指出“与流氓意识争取领导权是现在红军中最严重的任

<sup>1</sup> 《中共福建省委对平和县今后工作的指示》（1928年12月25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8年下甲），第352页。

<sup>2</sup> 《罗明关于闽西情况给福建省委的信》（1928年10月10日收），《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闽西）》（1928—1936年），第25页。

<sup>3</sup>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巡视连江工作报告》（1933年11月10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1933—1934年），第148页。

<sup>4</sup> 《中共福建省委对龙岩县委意见的答复》（1929年1月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29年上甲），第11页。

<sup>5</sup> 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66页。

<sup>6</sup> 1930年5月4日毛泽东代表前委给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特委写了一封指示信，提出对土匪流氓的策略：既要积极争取他们，把他们的力量用于对统治阶级的斗争，又要防止他们的消极因素，在红军赤卫队及苏维埃中不能占多数、不能居于领导地位。（见《毛泽东年谱》，第306页）此信与6月关于“流氓问题”决议案提出的“洗刷”政策精神上略有不同，主要因为安远、于都、会昌、赣县四县边界是新开辟的游击区，还在创建初期，所以要积极争取各种武装。

务”，进而提出严厉的“洗刷”政策。虽然决议中列出了多种流氓职业，不专指土匪，但其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土匪。决议中罗列了多达九种流氓的恶劣特性，包括“反组织的（反纪律的、反团结的、个人自由的）”、“个人享乐主义（大嫖、大赌、大吃、大着）”、“雇佣性重”、“破坏性重”、“阶级意识模糊”、“反群众”、“反社会主义”、“盲动主义（大烧、大杀、大抢）”、“流寇主义（没有政权观念）”。因此，“可以断定流氓是没有积极的革命性的，反之，一般说来他们具有充足的反革命性。他们在不得已时可以投机加入革命队伍，但他们始终是动摇的，随时有叛变作反革命走狗的可能”。“他们是破坏纪律最厉害的。他们的利益与整个斗争群众的利益是违反的。他们在作战上亦畏缩不前，虽有时表现勇敢，但他们是为了个人出发而勇敢”。“游击战争中的盲动主义和流寇主义都是他们的表现。每次拖枪逃跑的也都是他们。这些分子如不洗刷出去，把工农革命分子参加红军、赤卫队以代替他们，改变红军赤卫队的组织，则这样的红军、赤卫队是很危险的。只有把他们洗刷出去，才能健全红军、赤卫队，执行伟大的阶级任务”，“必须有计划的以工农斗争分子来代替流氓”，“特别在党内要洗刷流氓成分”。<sup>1</sup>

1930年7月，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检讨对土匪成分过于宽容的政策，提出“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至全部”的严厉措施。决议认为“过去闽西党对流氓阶级的经济背景及其在革命中的动摇性认识不清楚，过分估量他们的革命性”，“只是一味拉拢土匪，无条件的收编为赤卫队”，“甚至收编以后已在地方上干出‘打农民保土豪’的反革命勾当来”，“还依旧对他敷衍，不采取断然处置”，“有些土匪调到前方去的已经表现了动摇，也不先发制人，甚至被逃跑留为祸根”。“这是由于过分估量土匪的革命性，尤其是过分看重他们的武装力量”，“客观上是放去了当地广大群众之发动，如龙岩先后收编刘烈波、谢老妈、谢田狗，永定收编黄豺狗等”，“结果，有些地方因土匪对于群众的压迫，丧失了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土匪因过惯了抢掠生活，不能受革命的纪律，终于投到反革命方面去，向我们进攻。以后应打破对于流氓土匪的幻想，虽然有时可利用，但须在不妨碍党争取群众的条件之下，在政治上不可有丝毫的让步，必要时可解决其土匪领袖甚

<sup>1</sup> 《流氓问题——红四军前委闽西特委联席会议决议案》（1930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513—515页。

至全部。”<sup>1</sup>

土匪成分影响严重的主要地方部队，在“洗刷”斗争中上级党组织的帮助发挥了重要作用。巡视员许依华发现安溪、永春的党“用拉夫式的拉进许多流氓、土匪”参加党和游击队，这些人“在内面破坏党的工作”，使得安溪游击队“宁可说是变相的土匪和流氓。队员十一人，四人是土匪和流氓，而有破坏游击队的阴谋，二人有土匪意识而受土匪的煽动，一人是有土匪意识的贫农分子”，只有四人是党团员，而且“几个土匪把游击队所有的驳壳枪把持在他们手里，我们好的队员，通是坏枪”。这些土匪出身的队员勾结反动武装、辱骂团省委巡视员、煽动不满情绪、主张有钱大家分。几个党团员“不敢向土匪斗争”，“甚至党的会议为怕土匪嫌疑我们，不敢开了”，“游击队成为土匪领导的游击队，而不是共产党的游击队”。针对这个严重问题，巡视员与当地党团干部“会议上决定”，“尽量引进积极的贫农入党，对所有的土匪完全淘汰”。通过秘密计划，最终成功淘汰了土匪分子，收缴了土匪把持的枪支，游击队也发展到 15 支枪，“安溪游击队从此才正式在党的手里”。<sup>2</sup>

1932 年 4 月红军攻占福建漳州后，帮助漳州中心县委建立了地方红军独立三团，期间收编了不少土匪武装。但实际上，这些人只是认为红军势力大，有升官发财的机会，红军主力撤走后，形势非常严峻。土匪首领王奕修煽动队员说：“我们辛辛苦苦的去打土豪，所得的经济，都是外江人与海南人所保持，我们每月只得到八元的生活费，这样的替人家做奴隶有什么用处。”<sup>3</sup>漳州中心县委书记蔡协民警惕性不够，“投机与土匪分子还要提拔为连长、副团长。因此一般的投机与土匪分子更乘机大活动，整个第五连几乎都被反革命土匪把持”，他们“勾结豪绅地主民团，企图暗杀县委团部负责同志，准备带队伍叛变”。这时党组织才警觉起来，“决定召集靠得住的红军同志分配到各连”，将怀疑参与阴谋的人扣留，包括副团长王奕修、第五连连长洪振龙、副连长侯法、班长大笨、队员牛焕、陈烟桢、负责守土豪的黄盛、清粮等，除洪振龙押解途中逃跑外，上述七人被士

<sup>1</sup>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 年 7 月 30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213-214、225 页

<sup>2</sup> 《许依华巡视泉属报告》（1932 年 5 月 25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29—1932 年上），第 204-208 页。

<sup>3</sup> 《厦门市委巡视员老黄关于漳州中心县委工作的报告》（1933 年 11 月 9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 年），164-165 页。

兵代表公审判处死刑。<sup>1</sup>但是，土匪出身的漳州第五区常委叶火是被处决的王奕修的结拜兄弟，他与逃脱的洪振龙联络，煽动五区游击队叛变，杀死了游击队政委和五区所有负责同志，可见当时清洗斗争的尖锐和残酷。<sup>2</sup>

在闽东地区游击队中，肃清土匪成分成为一场纯洁内部的严重斗争。建瓯、莆田、福安、连江等县招兵买马建立的游击队中，混进了不少土匪流氓等坏成分，打仗时难以调动，却常发生抢劫、强奸、队员带枪跑等恶劣事件。1933年1月，在连江游击队“以李德标为首的八九个人被透堡民团所收买，以‘反对经济不公开’等口号蛊惑人心，竟将县委书记和支队长拘押，图谋率队投敌”。<sup>3</sup>市委领导陶铸闻讯后采取果断措施，“征调最好的同志组织一特务队”，将叛乱的土匪成分“一网打尽”，“解决八人，被捕七人，一人在逃，组织革命法庭，在庆祝肃反胜利群众大会中，为首三人执行枪决，其余逐出游击队”。<sup>4</sup>连江党组织逐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游击队中的原土匪成分胆大妄为，很有破坏能量。叶飞认为：“一支百把人的游击队，只要有五六个‘土匪’分子，就能控制这支队伍，改变政治方向，发生变质为土匪部队的严重危害”。1933年10月连江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清洗游击队中的土匪成分，有的领导人“只见到他们敢冲敢杀的一面，对纯洁内部有不同看法”，但多数同志认为“能不能纯洁内部，这是能不能保证游击队不变质、牢牢掌握在党的手里的关键问题”，县委最后统一了思想，决定对原土匪成分中“比较好的可以酌情留下”，品质不好的坚决清除。<sup>5</sup>经过清洗的游击队成为坚强的队伍，在苏区失败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坚持下来，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骨干。

1930年3月井冈山错杀袁文才、王佐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事件。袁、王虽然是绿林出身，但不同于一般的收编土匪，他们早在秋收起义前就已经参与了宁冈地区的革命活动，1927年迎接秋收起义部队上山，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二人先后入党，成为红军高级将领。处决袁、王事件解放后被定为错杀，但这一事件的发生也并非偶然。实际上，由于长期绿林生活的影响，袁、

<sup>1</sup> 《中共厦门市委巡视员黄关于漳州红军第三团肃反的报告》（1933年8月14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年），79-81页。

<sup>2</sup> 《厦门市委巡视员老黄关于漳州中心县委工作的报告》（1933年11月9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厦门）》（1933-1935年），160页。

<sup>3</sup>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35页。

<sup>4</sup> 《陶铸关于福州的工作报告》（1933年5月1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福州）》（1933—1934年），第64页。

<sup>5</sup> 《叶飞回忆录》，第35-36页。

王虽然投身革命，并且经历了许多斗争的考验，但是最终还是难以达到共产党员和红军将领的标准，这是错杀悲剧发生的重要原因。共产党员的基本要求是对共产主义的信仰，首先体现在对私有观念的批判。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有信仰的军队，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具有铁的纪律，与私人军队有根本的不同。袁文才、王佐参加革命后，虽然发生了不小的转变，但是仍然没有完全摆脱私人军队的观念，不能完全融入革命队伍。

1929年陈毅到上海向中央汇报时就提到，1928年4月朱毛红军会师后，“袁王为保存自己的老巢，很不愿朱部及湘南农军这样多人在宁冈”。<sup>1</sup>1929年初红四军为摆脱敌人围攻出击赣南时，毛泽东做了很多工作，说服袁文才随军下山。临行之际，毛泽东对留守井冈山的彭德怀说：“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sup>2</sup>可见毛泽东也不得不把袁文才当做一个问题人物。

在1929年初转战赣南过程中，时任红四军参谋长的袁文才竟然私自逃回井冈山，他的逃归不是战斗中冲散，而是精心策划的离队。红军有严格的纪律，开小差是严重违反纪律。红四军下井冈山后，遭到敌军围追堵截，连战不利，为摆脱敌军，在冰雪中昼夜行军，甚至司令部遭敌袭击，毛泽东、朱德险遭不测，处境十分险恶。红四军前委报告中说：“第四军从井冈山出发以来，总计损失约二百余枪、六百人”，“此次困难为自有红军最大之困难”，但是虽然困难，“士兵开小差的极少”，只有“干部袁文才等数人脱离队伍”。<sup>3</sup>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点到了袁的名字，可见毛泽东对作为高级将领的袁文才擅自离队极为愤怒，因为这清楚地表明：在最困难的局面下，袁的革命立场已经动摇。

袁文才回到井冈山后，对王佐产生了不良影响，与地方党组织发生尖锐矛盾。据说袁看到了六大决议中对土匪首领的严厉政策，由此产生了离心倾向。何长工当时留在井冈山担任湘赣边特委常委，王佐说袁文才“开小差逃回来了，怕上级知道后会杀头，所以躲着不敢出来”，何长工为了继续争取袁，批评之后还让他担任宁冈县委副书记。<sup>4</sup>在红四军离开井冈山以前，由于红军的力量以及毛泽东

<sup>1</sup>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二）》（1929年9月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776页。

<sup>2</sup>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43页。

<sup>3</sup> 《红四军前委关于攻克汀州及四、五军、江西红二、四团行动方针等问题向福建省委和中央的报告》（1929年3月2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68页。

<sup>4</sup> 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98页。

等领导人的威望，袁、王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还不突出。随着红四军和红五军相继离开，袁、王部队成为井冈山主要武装力量，他们对地方党组织比较轻视，加之传统的土客籍矛盾，“党指挥枪”原则逐渐难以实行，引起湘赣边特委对袁、王的不满加剧。

1929年2月，杨克敏在湘赣边特委报告中提出了“土匪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得不到适当解决，也是一桩阻碍进展的障碍，比如我们过去用外交手段拉拢袁、王，而没有同时注意去夺取其群众，以此长久的和他办外交，有许多政策为了要迁就他而不得实行，或者至少要转许多周折才能够实行，这样的瞻前虑后去做事，又怎能畅行顺手呢？”。在分田问题上，客籍聚居的第四区由于“客籍领袖袁文才出面反对”，分了两次，“终以土客籍的纷争很难解决”。报告还认为袁、王虽名义上入党，但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袁、王二人都非常狡猾，且有能力，对党的认识很薄弱”，“二人根本无改变之可能，因为一则不接受批评，二则不看党的书报（王不识字），只相信自己万能，枪杆子万能而已，对我们的政策，常常是面是而心非”，“我们与他们利益的冲突，终久是要爆发的”。<sup>1</sup>

1929年夏，邓乾元在《湘赣边工作报告》中反映出党组织对袁、王武装的更加怀疑，正式提出解决袁、王的三方案。报告认为，“本来边界的政权并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权，而是与土匪合作的联合政权”，“袁、王现在对我们处处怀疑，袁有另找出路脱离我们的象征，王在袁的影响之下，亦与我们的关系日趋恶化”，然后提出“对此问题，边界原有三策，第一是调开，此为上；二是敷衍以图安为中；三照六次全会的指示解决之，此为下策”。<sup>2</sup>彭德怀率红五军回到井冈山，形势得到一定控制，王佐特务营在与红五军协同作战中表现尚好。不过，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即江汉波）提到：“第三纵队，原定将袁王部编五百枪，但我离开赣西时，尚未编成，则以袁王多问题故也”。<sup>3</sup>

彭德怀在1929年10月给湖南省委的报告中也对袁、王提出严厉批评，提到袁、王的队伍“不管自耕农、小商人，甚至佃农，都不分皂白的捉来，罚一二石米谷或数十元后释解，以致弄成有所谓米土豪，谷土豪之讥笑”。“还有更好笑的，

<sup>1</sup> 杨克敏：《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45、47、50-51页。

<sup>2</sup> 邓乾元：《湘赣边工作报告》（1929年5—8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123、131页。

<sup>3</sup>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巡视赣西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930年（一）甲），第99页。

什么‘牵牛政策’，即是某乡的农民被豪绅利用而不革命的，他们令其赤卫队率领赤色区域内的农民将那胖猪、耕牛、白羊以及鸡、鹅、鸭、兔等物一概拿个干净，打成大包给牛驮回，甚至有人捉来，‘有钱见父母，无钱见阎王’，使一般工农群众多说是土匪，而不认为是赤卫队和红军。这种‘抢产主义’的来源，就是王佐、袁文才二人所赐，也是他二人造成井冈山土匪化和个人信仰惟一的良策。因他两在井冈山当大王已年深日久了，现在各个有经常老婆四五个，生活非常舒服”。“袁王二人老奸巨猾，守山成性，受不过劳苦，打不破恶习，为私人利益的结好，消除旧意见，结成新团体。至五军来湘鄂赣边时，他更利用湘鄂赣边地方主义，造谣五军回平，不得来了，反被袁王的老部下拖回枪支近百数（内有一大队党代表乘打仗时拖去六十多支枪），他仍旧独立行动，党无法制裁和指挥”。<sup>1</sup>

五军政委滕代远对袁文才、王佐更加不满，早有杀袁王之心，最初只是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才没有实施。他在报告中说：“五军与四军在井冈山会合时，对袁王问题主要负责人提出讨论，我主张很急坚决处（理）他们，经毛多方解释，还是取容纳训练态度。朱毛离开井冈山时，并令袁文才同走，袁畏苦且倾向改组派，故在东固开小差回井冈山。据袁对特委负责人说，我要杀袁是毛告给他的，故对我们很害怕，不敢会谈。并造谣红军将消灭了，离间红军与工农的感情，派其党羽来红军拖枪开小差，还是向外如关背、拿山、大浣、车坳、新城等处大杀大烧大抢，自美其名曰：‘打米土豪’，‘牵牛政策’，‘巩固大小五井’（即王佐的巢穴），肃清动摇分子和反动派（凡反对袁王的就是），任意屠杀工农分子或同志，公然在湘赣边特五次扩大会议上，手持卜子枪，口叫独立等。”<sup>2</sup>

虽然地方党组织以及彭德怀、滕代远对袁、王的评价可能有个人意气成分，但是“党指挥枪”的原则难以实行却是毫无疑问的，这在中共党内是必须解决的严重问题，在当时斗争残酷复杂的形势下，解决问题的方法常常是十分严厉的。1930年3月，地方党组织对袁王长期积累的不满爆发了，袁文才对此责任很大，影响了本来表现较好的王佐。一次彭德怀到王佐处，晚上传令兵来接彭，竟使王紧张得拔出手枪来，而“袁未逃回以前”，王佐“对五军是不怀疑的”，这当然也

<sup>1</sup>彭德怀：《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313页。

<sup>2</sup>《红军第五军军委滕代远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4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50页。

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sup>1</sup>袁文才捉到茶陵靖卫团头目罗克韶，不但未杀，反而待若上宾，说是为了办兵工厂，但这却不能不引起党组织的怀疑。更有甚者，在永新县城举行的联席会议上，袁、王与湘赣边特委及中央派来的巡视员彭清泉（即潘心源）发生激烈争吵，王佐甚至把手枪拍在桌上，这样的行为在共产党和红军中是不可容忍的。袁、王不服从纪律，蔑视党组织的行为被视为叛变，当夜边区特委书记朱昌偕等亲自到红五军驻地请彭德怀派兵，结果袁、王及其亲信数十人被处决。事后赣西南特委通告称“袁文才、王佐反对分田，反对建立苏维埃，并勾结茶陵靖卫团扰害永新赤色政府，大会正式批准西路行委枪决袁、王两个叛徒”<sup>2</sup>。袁、王当时并未叛变投敌，因此处决他们确实是错杀，但他们不能严格服从党和红军的纪律，甚至仍把军队当成自己的私人武装，是他们不能融合于革命队伍而最终遭到清洗的重要原因。

严厉的清洗是红军成为一支强大军队的重要保证，不能因为苏区几次肃反扩大化造成惨痛损失而否定这一点。红军在动荡野蛮的农村中成长起来，在创建初期大力扩军之后，必然吸入大量野蛮落后的因素，其中包括很多恶习难改的土匪成分，通过温和的改造并不能解决全部问题，以严厉手段把信仰不坚定、不遵守纪律的分子清洗出去，才能创建信仰坚定、纪律严格的新型革命军队。事实上，共产党和红军中对内部不良分子严厉清洗是其战斗力的重要源泉，共产党军队高度集中统一，严格遵循党指挥枪的原则，而国民党军队常在派系纷争中离心离德，这种差别最终成为决定国共战争胜败的关键。虽然从现代法律和政治文明的角度来看，这种清洗是常常是相当残酷的。

## 五、小结

在共产党人通过收编、改造、清洗三个步骤解决土匪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共产党和红军中的信仰力量，以及由信仰力量转化的强大组织力量。在红军和苏区创建时期，共产党为了迅速壮大革命军队，以开放的态度大量收编土匪武装，土匪成分在红军中一度占不小的比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之后，红军对收编的

<sup>1</sup>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 142 页。

<sup>2</sup> 《赣西南特委通告》（1930 年 4 月 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 191 页。

土匪武装进行了深刻的思想和组织改造，对难以改造的成分则通过严厉的清洗加以解决。随着中央苏区逐渐巩固，红军走向正规化，除了苏区边缘的游击区，红军中的土匪成分越来越难以辨认了，红军逐渐成长为具有坚强信仰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同时，整个苏区的民众也被严密组织起来，土匪再也没有生存的空间，在当时全国很多地区土匪仍旧肆虐的时候，苏区的土匪问题却得到了相当彻底的解决。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提到，“闽西土地革命胜利已经有了一年的历史，在这一年中工农得到了很大的胜利，社会上盗匪绝迹、烟赌肃清，生产上大大增加，真是实现了夜不闭户、野无游民的现象”。<sup>1</sup>苏区中央局决议也提到：“中央苏区已有了贯通闽赣二十五县疆土，在这疆土上普遍的成立了苏维埃政权，有了相当的地方武装，没收了地主土地，并实行平分土地，消灭了土匪和乞丐。”<sup>2</sup>

这初步说明，在当时动荡的中国农村，共产党和红军已经成为最有能力恢复秩序的政治军事力量。通过在偏远农村中的艰难奋斗，中国共产党使得原本产生于城市的新政治信仰在落后的农村扎根，并把农村中的巨大人力资源严密组织起来，从而使动乱的广大农村获得了新的政治秩序，同时也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取之不尽的力量源泉。虽然这一时期红军和苏区规模仍然有限，但在艰苦奋斗中生成的组织核心和农村工作方法却有着不可限量的前途。在抗日战争初期混乱的广大敌后、在日本投降后动荡的东北和华北，这个精悍的核心依靠久经锤炼的农村工作方法，迅速成长为巨人。共产党和红军所遵循的是不同于旧党派和旧军队的道德观念和组织原则，是动荡的旧中国社会中的新型政党和新型军队，有着巨大的战斗力和生命力，所以才能屡经挫折却越战越强，最终击败国民党军队，成为主宰中国命运的力量。

从更广大的世界革命的范围来看，革命军队通常具有信仰和组织的优点，但是中国革命军队的创建又有其显著的特殊性。法国、俄国、中国的革命常被称为世界三大革命，法国大革命的国民自卫军是由城市市民特别是巴黎市民在革命热情鼓舞下组织的，他们早就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俄国十月革命后创建的红军是由受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工人在共产党领导下创建的，其力量中心是最先进的

<sup>1</sup> 《中共闽西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0年7月30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215页

<sup>2</sup> 《目前政治形势的分析与苏区的紧急任务》（1932年2月1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中册，第337页。

大城市彼得堡和莫斯科；而中国革命军队却主要是在落后的农村，甚至是农村中蛮荒的偏远地区创建成长的，士兵主体是保守落后的农民，其中包含不少农民中最野蛮的土匪成分，先进的革命思想和落后的农村环境形成了巨大的矛盾，中国红军的创建在这种深刻矛盾的搏斗中，带有特殊的复杂性和残酷性。

## 第四章 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的集中趋势

红军在创建初期非常弱小，其中最强大的朱毛红军也不过几千人，而当时全国各派军队总数近二百万，主要派系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各有数十万军队，很难想象小小的红军能在二十年中发展壮大，击败强敌，最终夺取天下。中共军队为什么成为胜利者？这是历史研究者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是中国近现代史的核心问题之一。笔者尝试给出的答案大致是：红军是新式军队，遵循独特的建军原则，使这支军队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 一、红军初创时期的民主制度及其弊端

民主——是这支新型军队最为独特之处，或者说在红军创建初期，权力结构是高度分散的。众所周知，军队的权力结构通常很集中，即使民主制度完善的国家也是如此。军队一般等级森严，权力高度集中于上级，下级对于上级只能严格服从，普通士兵被训练无条件服从命令。但是初创的红军却与众不同，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一批五四青年，新文化运动的核心理念就是民主，毛泽东直到晚年都认为井冈山红军是“一场枪杆子青年运动”，是“五四青年运动的继续和发展”。<sup>1</sup>因此当这批五四青年着手创建军队时，民主理念就被带到红军中来，使得创建初期的红军有着浓厚热烈的民主气氛，是军事史上少有的独特军队。

红军民主制改变了传统军队中士兵的消极被动角色，每一个成员都成为军队的主人，受到尊重、享有权力，这种主人翁地位使各级干部战士发挥出更大的热情和主动性，增加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但是，分散的权力结构也带来严重弊端，常常造成众说纷纭、决策困难、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危及生存，这使得建军初期的民主气氛难以长期维持，最终逐步走向集中。

#### （一）官兵平等

<sup>1</sup> 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 1965 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 年第 3 期，第 22 页。

在红军对白军的宣传攻势中，官兵平等被当作红军的重要优点加以强调。国民党军队等级森严，军官可以随便打骂士兵，上级享有无上的权力，下级只有服从的义务。这甚至成为共产党发动兵变的有利条件，百色起义重要领导人张云逸说：“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因此，首先我们就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于是各级的领导权也迅速地落在我手中。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sup>1</sup>宁都起义也是只靠很少的党员，由于争取到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等高级将领，就发动了近两万人的大兵变。可见，在政治环境复杂的情况下，等级森严的军队反而是脆弱的，蒋介石也靠收买叛将击败李宗仁、冯玉祥等对手。

红军则反其道而行，实行官兵平等，官兵在政治权利上平等，反对军官打骂士兵，士兵的人格得到尊重，下级对上级不是盲目服从，使得军队更加巩固。在艰难时期，毛泽东和朱德的部队都发生过军官带队叛逃事件，但都因下级抵制而失败。1927年12月，第1团（31团前身）团长陈浩伙同参谋长命令部队向湘南撤退，企图投靠国民党三十一军军长方鼎英，但是遭到宛希先、张子清等干部战士的抵制，后来毛泽东赶到，揭发了叛变阴谋，陈浩等被处决。1928年8月，28团2营营长袁崇全试图带两个连叛逃，但“各连官兵不受欺骗胁迫，忠实于革命，自动脱离袁之羁绊归回大队”，“袁逆只身逃去”。陈毅感叹道：“计袁逆叛变至各部回来，前后经过两周之转折，卒得恢复旧观。此皆官兵忠实革命，出于自动，此点实一般雇佣军队所绝不能有的。”<sup>2</sup>

红军的平等气氛使士兵获得尊严和精神解放，增加了部队的凝聚力。当年的新战士朱良才提到：“毛党代表给我们这些新参加红军的同志讲话，提到缴获的现洋时，他说：我们是工农的军队，不是军阀、资本家的军队。他们的钱都归上级装腰包，我们从上到下都是一样，一块都是一块，一毛都是一毛”，“第二天在永新点名发钱。第一名点朱德，第二名点毛泽东，以后点大家。每人发的都是一块现洋。”<sup>3</sup>江华也提到，大柏地之战“缴获许多枪支弹药，所以动员红军全体干部战士，凡是能背枪的都背上枪，有的战士一人背两三支，毛泽东同志也背着一支大枪同战士们走在一起。”<sup>4</sup>朱德更以和士兵同甘共苦、打成一片著称，“群众及

<sup>1</sup> 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星火燎原》（1），第475页。

<sup>2</sup> 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3页。

<sup>3</sup> 朱良才：《井冈山上的故事》，《星火燎原》（1），第250页。

<sup>4</sup>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7页。

敌兵俘虏初次看见鼎鼎大名的四军军长那样芒鞋草履，十分褴褛，莫不诧异。若不介绍，至多只能估量他是一个伙夫头，同时到现在‘伙夫头’三个字恰成了四军军长的诨号。”<sup>1</sup>

毛泽东对自己亲手开创的红军民主制度非常自豪，在给中央的报告中重点介绍：“红军的物质生活，如此菲薄，又如此苦战不息，仍能维持不疲者，党的作用外，就是彻底的民权主义之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言论之自由，繁缛礼节之废除，经济之彻底公开”。“这些办法，使士兵特别满意；尤其是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前日的营垒中与今日的营垒中完全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比较不如白军的好，但精神得到解放，所以尚能相安。同时一个兵，前日替敌军打仗不如今日替红军打仗之勇敢，乃是这种民权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座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熔化，这是一种事实。中国不但工农群众需要民权主义，军队需要民权主义更切”。<sup>2</sup>

官兵平等对士兵的精神世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杨开明说：“红军中最好的现象，就是在民权主义的施行。士兵有士兵委员会参加军事管理，官长士兵的穿吃一样，待遇平等，废除肉刑”，“官长有不是处，士兵可以开会反对之，所以士兵的生活虽然苦，而看到官长也与自己没有丝毫的差别，也感受到精神安慰，他们的人生观因此也相当的受了影响而改变了些。每每俘虏过来的士兵，他们常常有感觉现在生活满意的表示。他们感觉虽然在军阀底下物质生活比较好些，可是精神上实在痛苦，官长的生活与士兵对照，截然两样，官长有小厨房，官长可以去赌钱打牌，讨小老婆快活。士兵呢？每月几块钱的饷还没有发，有时还要被官长拳打足踢的侮辱，打了你还不许你叫屈，完全过的那供人驱策的牛马机械生活。他们一到我们军中来一看，完全别有天地，与他们原来的社会，完全两样，好似在黑暗中找到了一线光明，他们的精神上当然是愉快的。”<sup>3</sup>

红军的检讨会制度也给人深刻印象，检讨会上坦诚直率的批评精神正是这支新军队朝气蓬勃的独特气质。“检讨会大约是每个星期举行一次，每次作战后亦必开检讨会。这种检讨会，由全体官兵混合分组举行，士兵在检讨会上可以批评、检讨每一个士兵，而且可以批评和检讨每一个官长，受批评者得申述理由，经过

<sup>1</sup>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8页。

<sup>2</sup>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41页。

<sup>3</sup>《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64页。

检讨以定其情节轻重，由连长、党代表予以适当的处分。处分的方法：有劝告、警告、做苦工等，犯错误严重者，呈报上级处置。这就是所谓军队民主的内容。”

1

## （二）士兵委员会

士兵拥有分享权力的常设机构——士兵委员会，这是红军民主制的重要体现。红四军在军、团、营、连都设有士兵委员会，“军士执委选五人或七人为常委。团举五人或七人为常委，营举三人或五人为常委，连无常委机关。军、团常委均设机关于政治部内日常办公，营常委不设机关。各级士委的任务规定是下：1、参加军队管理。2、维持红军纪律。3、监督军队的经济。4、作群众运动。5、作士兵政治教育。”<sup>2</sup>

士兵委员会类似北伐时期的工会和农会，是发动群众的组织，也是群众的权力机关，它还承担了很多政治宣传工作。杨开明提到：“红军中的士兵委员会成立有一年的光景”，“它参加了军事管理，不过是在军事长官和党代表的指导之下的，而不是本行的机关。有了士委而军中才有民众，官长有不是处，他们可以开会说话反对，甚至处罚之（士委会中官长也参加在内）。有了士委会可以解决军中许多的麻烦问题，如经济公开（军中的经济由士兵委员会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之）可以知道官长士兵同等待遇，没有什么差别。管理上，士委会可以负担相当之责。有了士委会，兵士都有工作的，如写标语，贴标语，发传单，演讲宣传，组织群众，由士委督促自动的去干，比设政治部由政治部去督促的要强得多。士委会是由兵士选出代表，由代表会议产生出之代表士兵利益的政治组织”。<sup>3</sup>

士兵委员会也是发动士兵、改变军队风气的重要形式。方强被派到新组建的连队担任政治干部，连长是旧军人，不但经济上有问题，而且暗中通过帮会控制连队。方强改造连队的方法就是组织士兵委员会，士委会成立第二天就开大会讨论帐目，“经济委员宣布伙食帐上亏空了三十多块钱，要大家讨论。许多战士都积极发言，有的说这是经济手续不清，有的直接地说这是贪污”，最后连长不得不在战士的要求下退赔贪污款，从此士兵委员会威信建立起来。连长通过洪帮拉

<sup>1</sup>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 1978 年，166-167 页。

<sup>2</sup>陈毅：《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军事文选》，第 9 页。

<sup>3</sup>《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 2 月 25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263 页。

拢一、二排长，企图控制连队，方强不顾连长的反对，由几个秘密党员在士兵委员会提出改编建议，并召开士兵大会通过了改编的决议。“士兵委员会的权力很大，决议谁敢不执行？这样一来，连长再没敢说什么。战士们从这次大会中又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认识到士兵委员会的民主权力确实是很大的。”就这样，连队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连长感到约束太多，与一、二排长密谋带队叛逃，结果被抓回枪毙，这个连被改造成为真正的革命军队。<sup>1</sup>

士兵委员会在红军中的权威很大，有时甚至会超越权限，左右作战计划，著名的大柏地之战就有士委会的影响。江华回忆：“这一天是2月9日，正是农历除夕。敌人也未来骚扰。当夜即在大柏地宿营。第二天清晨，朱德同志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时担任前卫的三十一团三营不走了。那时，部队内的民主还是相当大的。三营的士兵委员会到各处联系，坚决表示不能让敌人赶着跑了。要走，你们走，三营是决心不走了，在这里决一死战，打垮尾追的敌人。前卫部队不走，其他部队也无法行进。三营党代表罗荣桓同志、营长陈明同志（一说叫陈正春）见此情景，即向毛泽东、朱德同志报告。前委紧急研究”，认为地形有利，可以伏击敌人，于是发生了大柏地之战，红四军从此摆脱了濒临覆灭的危险处境，转入大发展时期。<sup>2</sup>

士兵委员会在有的部队甚至掌握了选举各级军官的大权，比如在广州起义余部组建的红四师中，师长由士兵委员会民主选举产生。红四师官兵主要是原武汉中央军校学生，知识分子气质浓，民主精神更强。据当时巡视员报告：“四师师长（叶镛）则毫无实权，一切受师委之指导”。<sup>3</sup>陈同生回忆：“部队攻占了花县，进行整编，并自己命名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师”，“这支刚刚诞生的红军非常民主，师长叶镛是由士兵委员会选出来的，党代表王侃予是由党员代表大会选出来的，其他负责同志也是经过群众的选举”。朱道南也说：“红四师的领导人，是民主选出来的。官兵平等，薪饷一律，上自师长，下至士兵，都亲如手足，团结友爱。战士可以随时找师长谈话，找党代表提意见”。<sup>4</sup>

红军干部对于士兵委员会的作用评价很高。罗荣桓说：“士兵委员会有很大

<sup>1</sup> 方强：《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星火燎原未刊稿》（1），第176-184页。

<sup>2</sup> 江华：《追忆与思考》，第65-66页。

<sup>3</sup> 《中共中央巡视员陆更夫给中央的报告》（1928年9月14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2），中央档案馆、广东省档案馆1984年，第269页。

<sup>4</sup> 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87-188页。

的权力，军官要受士兵委员会的监督，做错了事，要受士兵委员会的批评，甚至制裁”。“只有这样做，才能更彻底更有效地肃清军阀残余。有了民主，才能提高群众觉悟，才能建立巩固的集中”。<sup>1</sup>李志民也认为：“士兵有了士兵委员会的组织，就感到自己是连队的主人，官兵平等，有话敢说，有意见敢提，民主空气很浓”。“这样，士兵的主人翁思想和积极性都能充分调动起来，平时完成任务好，打仗时士气高昂，人人奋勇争先，多杀敌人多缴枪，又有奖赏又光荣。尤其是刚从国民党军队解放过来的士兵，对红军中士兵委员会感触更大，认为这是红军区别于白军最明显的一个特征。”<sup>2</sup>

### （三）党内民主：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红军是共产党创建的军队，虽然当时军中党组织是秘密的，但各级党支部是红军组织结构的骨干，即使士兵委员会也渗透着党组织的影响。红军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实行委员会形式的集体领导，称为前委、军委、师委等，各级委员会中都必须包含普通士兵党员。军中经常召开党的代表大会，选举领导人，决定重大问题，党内民主是红军民主分权的重要结构。

中央 1927 年十一月会议之后给朱德发去指示信，特别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一切党的政策均须拿到支部会议或小组会议中讨论，使每个党员都能表示意见，有些并可向非党的群众宣布”，“师委会的组织以五人为合式，除指定朱德同志为书记外，余四人可由全体选举，但必须有个士兵同志被选。”<sup>3</sup>

1928 年 4 月毛泽东和朱德两部会合成立红四军，5 月即在宁冈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sup>4</sup>11 月，红四军又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战争期间会期比较短，但重大决策都要代表大会通过。“六次大会于 11 月 13 日开预备会，14 日开正式会，15 日闭会，计到代表 79 人。四军全军的支部除三十二团一营远在永新派代表来不及外，均有代表参加。各代表所携提案计 30 余种，经一度整理将意见相同者合并计得 17 种。大会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党务各重要问题，尤其对于中国革命性质问题有长时间之辩论，这是六次大会的特点”。“新军委选举，最初由

<sup>1</sup> 罗荣桓：《秋收起义与我军初创时期》，《星火燎原》（1），第 130 页。

<sup>2</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第 99-100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 年 12 月 21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59 页。

<sup>4</sup> 关于前四次代表大会记录很少，情况不详。

大会主席团提 49 人候选名单，经大会选定 23 人为六届军委委员，组织执委会进行一切工作。”<sup>1</sup>决议案还规定“军委对内是军中党的最高机关。隶属于前委；对外即是边界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指挥红军及地方武装。”<sup>2</sup>

1928 年夏天中共六大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这是那一时期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主要倾向。六大议决案提出“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秘密条件之下尽可能的保证党内的民主主义；实行集体的讨论和集体的决定主要问题”。<sup>3</sup>1929 年 12 月广西百色起义后建立起红七军，前委通告要求“注意集体领导：1. 党内一切重要问题均应召集各级委员会讨论决定。2. 临时问题及日常细小问题可由书记解决，但解决后应向各委员（或干事）报告。”“实行民主化：1. 党内一切问题如无极端秘密性者，均交各级指导机关及各支部讨论。2. 指导机关争执之问题可请上级决定，但尽可能召集党员大会解决。”<sup>4</sup>这个通告也反映出中共六大前后党内的民主气氛。

当时红四军各单位都由委员会实行集体领导，各级委员会中规定包括士兵和基层干部，基层党员代表参加高层领导机构的讨论和决策。红四军的最高领导机构是军委，军委领导之下，师、团、营都有委员会，连设党支部。在师一级作战单位，“凡是带有原则性的重大问题，必须经过师党委会讨论决议后方能生效”。<sup>5</sup>唐亮担任连指导员的同时也是师委委员，参与师一级的领导，那时各级党委开会都有决议，会后发给各支部讨论，各级党委和支部之间保持着频繁顺畅的沟通，保证了党组织的活力。<sup>6</sup>

支部是党组织的基层细胞，在连队建立支部是红四军的成功经验，是贯彻党指挥枪原则的重要措施。毛泽东在 1928 年 11 月报告中说：“军队中的党，现分连支部、营委、团委、军委四级。支部建在连上，小组建在班上。四军之所以艰难百战而仍不溃散者，‘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两年前，我们在国民党军中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叶挺部犹是每团一个支部，真是岂有此理！现在军中党员与非党员之比，约为一与三之比，即平均四个人中有一个

<sup>1</sup> 《红军第四军第六次党代表大会决议案》（1928 年 11 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199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29 页。

<sup>3</sup>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议决案》（1928 年 7 月 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320 页。

<sup>4</sup> 《红军第七军前委通告（第二号）》（1929 年 12 月 20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330-331 页。

<sup>5</sup> 倪志亮：《三战三捷》，《星火燎原》（1），第 461 页。

<sup>6</sup> 唐亮：《古田会议后的一个连队》，《星火燎原》（1），292 页

党员。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以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sup>1</sup>

三个月以后，毛泽东基本完成了发展党员到半数的计划，建立了党组织对军队基层的牢固掌控。杨开明在 1929 年 2 月报告中提到：“作战大部以连为单位，每一个作战单位有一个支部，去处理和指挥一个作战单位的事，很觉便当。我们的军队其所以打败仗而不致于溃散，这个组织的好处应为主要的原因。红军中党的历史已有一年，有些支部还能作用，能在群众中做核心，使群众受我们的影响而团聚在我们的周围去工作。党的会议除作战外，小组会有每星期一次，各级代表会，也能常开并能按期开。对党员还有相当的训练，由党代表负其责”。“现在党在军中的成分比较，普遍为 1/2 弱，三十一团党的成分约 3/5，二十八团约 1/2 尚不足，三十二团（袁王部）约 1/3”。<sup>2</sup>

#### （四）军政分权

在委员会集体领导中，政治首长和军事首长常因突出才能和历史威望居主导地位。政治首长就是各级党代表，党代表的设置在北伐时期已经开始，国民党在苏联顾问的指导下，模仿苏联红军在国民革命军中建立了名义上“军政平等”的党代表制度。1926 年 11 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规定：“党代表之权能与军队长官同，其所发命令，凡部属人员一律执行之”，“党代表有会同指挥官审查军队行政之权”。<sup>3</sup>

但是，国民革命军多来源于旧军队，军事长官独裁的传统很深，实际上党代表并没有取得平等权力，地位远低于同级军事长官，常被取笑为“卖膏药的”、“姨太太”。国共分裂之后，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被驱逐，政治领导制度虽未完全废除，但改称政治干事后，地位更加低微。政工干部周上凡回忆：“不管是政治指导员，或政治干事，这里的军官毫不例外地叫我们‘膏药’。有次我碰见一个同学好友李福田（西沅阵亡），他刚刚调来第五十九师当营长，见面互叙离别后，他说：‘你也来卖狗皮膏药啦！你为什么要钻进这个死胡同？！’他舌头一舔继续说：‘你去找个旧长官，搞个带兵官是不难的，或者当个参谋也好啦！这

<sup>1</sup>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41-42 页。

<sup>2</sup>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 2 月 25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263 页。

<sup>3</sup> 《修正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油印件，党史馆藏：一般 465/100.1。转引自：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 2009 年，第 197 页。

里对政工看不上眼，比带兵官不止低下一等，士兵也不听你吹，你为啥要干这玩艺儿！”好友直言关注，使我无限苦闷，什么‘七分政治’，不过是鬼话骗人的把戏。不干不行，一天挨过一天，混日子。”<sup>1</sup>

在共产党创建的红军中，却恰好出现相反趋势，信仰坚定的政治干部在艰险斗争中地位越来越高。陈毅没赶上南昌起义，追上南下的起义军后，周恩来任命他担任 73 团政治指导员。起义军在潮汕失败后，朱德带余部退入山区，情况非常艰难，部队濒临溃散。粟裕回忆：“我们这支队伍，人是愈走愈少了，到信丰一带时只剩下七、八百人。不少人对革命悲观动摇，离队逃跑，特别是那些原来有实权的带兵的中、高级军官差不多相继自行离去，给部队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使部队面临着瓦解的危险”。“在师、团级政工干部中，只剩下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同志了。他挺身而出，积极协助朱德同志带领部队。陈毅同志是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和坚持工作的。那时候他来到部队不久，上下关系都很陌生，职务也不很高，再加上他是搞政治工作的，当时政治工作人员是不被人们所看重的。尤其是潮汕失败之后，部队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处境。在这一系列的不利情况下，陈毅同志完全以他坚强的革命精神和实际行动，逐渐在部队中建立起威信。”<sup>2</sup>但在朱德部队中仍有较多旧军队传统，虽然陈毅的地位显著上升，但仍无法与朱德比肩，所以陈毅在给中央报告中说：“四军未成立前”，“党在军队中不能起领导作用，军权高于党权。”<sup>3</sup>

1928 年 4 月红四军成立后，政治领导的影响继续上升，逐渐取得了和军事长官同等的地位，毛泽东和朱德基本是平起平坐，有时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还略占上风。杨开明报告也特别强调党代表的核心作用：“事实告诉我们，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党代表好，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就好，就会作战，问题也少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代表弱些，哪一连、一营、一团的士兵也要坏些，作战也不行些，问题也多了”。“党代表的职责是，军中政治训练，党的工作，督促士委会工作，帮助军事长官工作，如军事长官在火线上打死了，党代表可以代行指挥军队。<sup>4</sup>

<sup>1</sup>周上凡：《陈诚部在第四次“围剿”中被歼记》，《“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4 页。

<sup>2</sup>粟裕：《激流归大海——回忆朱德同志和陈毅同志》，《星火燎原》（1），第 88-89 页。

<sup>3</sup>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军事文选》，第 22 页。

<sup>4</sup>《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 2 月 25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 33-34 页。

虽然党的各级委员会是集体讨论决策，但书记常由政治干部担任，这也加强了政治干部的地位。政治干部一般是信仰最坚定的党员，具有献身精神和道德感染力，常能成为部队的灵魂。李志民曾担任红五军基层部队党代表，他根据自身经验说：“红军初创时期党代表制度的建立，彻底破除了旧式军队的‘一长制’，确定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员同为部队的首长”，“正因为党代表在部队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级党代表在干部、战士的心目中便成为党的领导的化身，党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无声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负责任的重大，决心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团结、带领部队去冲锋陷阵”。<sup>1</sup>

中共中央在 1928 年六大前后决定模仿苏联，将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设立专门的政治部。六大军事工作决议提出：“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叶挺与贺龙部队的遭破坏，其重要原因之一，即在于他们军队中未设法肃清反动的官长，未实行政治委员，未设立政治训练机关。”<sup>2</sup>在同时期的军事工作大纲也提出：“政治委员即为党的代表，最好由工农分子充任，能了解军事更好。”<sup>3</sup>

但是，红四军领导人还是习惯党代表这个名称，没有执行改名的指示。毛泽东说：“党代表制度，依经验所得，认为还不能废除”。“特别是连一级，此时不可废，因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党代表对全连督促士兵委员会执行政治训练，指挥民众运动，在党内即是支书。事实表现，哪一连的党代表较好，哪一连就较健全些”。“朱部在湘南曾经取消了党代表，后来感觉不好，不能维持，到边界才又恢复过来。若改称指导员，则与国民党指导员相混，俘虏兵大都厌恶他们的指导员。且易一名义，于制度的本质无改，故此间决定不改。党代表死伤太多，除自办训练班外，望中央和两省委派可充党代表者至少三十人来。”<sup>4</sup>党代表在红军中有很高威望，发挥着重要作用，与军事长官平等分享领导权，这是初期红军权力结构的重要特点。

## （五）民主分权的副作用

<sup>1</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75 页。

<sup>2</sup>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491 页。

<sup>3</sup> 《中央通告第五十一号——军事工作大纲（采用广东省委扩大会议军事问题决议内容）》（1928 年 5 月 25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101 页。

<sup>4</sup>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38-39 页。

红军上下级之间、军政之间的分权和集体领导制，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但在残酷战争环境中也出现了很多弊端。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高明的见解不易通过，杰出的领导人难以发挥才能，毛泽东在会场上有时难免垂头丧气；上下级之间的分权使下级有较大发言权，常使决策难以执行，甚至下级批评不得，导致纪律松弛；军政之间平等分权会引发政治领导和军事长官的争论，没有统一的重心，有时甚至会使军队分成两个派别。

陈毅报告提到了军中民主的副作用：“政治组织与军事组织时常发生职权上的纠纷”，“士兵委员会的运用不好，有时士委超出职权的范围”。“上级的命令未经下级讨论，下级便不执行或者说上级包办，说上级是家长制。军事机关的命令也常有托故不执行的毛病”。“政治工作人员与军官常常发生纠纷”，这种“结发夫妻”式的军政平等分权，“结果是天天要吵嘴”。<sup>1</sup>

海陆丰苏区也很快发现，教育不足的工农同志运用民主制问题不少。“实施民主制之观察：自从党反对机会主义之后，对党之组织上采取民主制，至今已有五个月矣。在这颇短的时间中表现了许多好与坏之现象，好的使工农能对党负责人加以批评、督促，每个同志都能尽量发表意见，党之策略主张能使党员明白。坏的方面，误将事事都要由大家决定，如党下一命令下去，要十个党员干一件事，有六人反对，因而反对命令——以农工同志居多”。“本来民主制是来反对人包办的，不过在事实上各区本有工农分子之常委，打理日常事务时流于散漫，所谓秘书长者包办一切，无形中代替了从前书记之职务，甚至来支配常委。”<sup>2</sup>

军事决策需要实战经验和特殊才能，只要有一丝一毫的偏差，就可能带来严重后果，用开会表决的民主方式来指挥战斗显然并不合适。1929年1月大庾之战是红四军下井冈山以后的第一场重要战斗，当时“敌人就要追来了，怎么办？军领导在大庾县城的一个天主堂开活动分子会，大约有六七十人参加，有的主张打，有的主张退，何挺颖等主张打。结果采取了在游击战争时期也很少用且不该用的举手表决方式，由于同意打的占多数，就决定在大庾迎敌”。<sup>3</sup>结果红四军首战失利，陷入被动，被敌军追击一个月，几乎到了全军覆没的边缘。1929年7月，湘赣边特委召开联席会议，特委书记邓乾元想让红五军进攻安福，彭德怀力陈攻

<sup>1</sup>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年9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19、25、24页。

<sup>2</sup>《中共海陆丰县委关于二月至六月的斗争情况给省委报告》（1928年），《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58页。

<sup>3</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3页。

城的困难，“但邓乾元不听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要求红五军攻取安福的决定，彭德怀只好服从多数的意见”，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重要干部纵队长贺国中、军参谋长刘志治牺牲，十一个大队长，九个负伤。<sup>1</sup>

上下级之间分权，特别是士兵委员会权力过大，有时造成下级不服从命令，军官难以执行纪律、管理部队。李志民提到：“现在连队士兵委员会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比如，军官在行政管理上严格一些，操课的时间长一些，有的士兵委员会就提意见；个别连队甚至有士兵委员会举手通过打连长、排长屁股的事，这样下去会使连队干部不敢大胆管理，把连队的正常秩序搞乱，削弱党的领导。”

<sup>2</sup>龚楚也说：“自军队民主推行以后，红军内部发生了很多问题，主要的是：连以下干部及士兵对上级发布的命令，常常不切实执行，甚至发生反抗事件，他们要求上级一切行政措施，甚至军事决策均须以‘民主集权制’由下而上的经过讨论决定”。<sup>3</sup>

委员会集体领导制在激烈动荡环境中常常难以实行，有时凑不够开会的人数，开会又常常争论不休，委员能力参差不齐，有些委员只会乱发议论，干扰决策。当时委员会的书记或秘书长并没有决策权，但是由于集体领导的无效，能力强、敢于负责的书记常常实际起到领导作用，这在民主气氛高涨时期又常常被认为是“书记独裁”。杨开明报告谈到：“特委于 1928 年 5 月 23 日在宁冈开第一次边界党代表会产生，当时书记毛泽东”，后来杨开明、谭震林、邓乾元相继担任书记。“特委的事总是书记一个人处理，个人专政，书记独裁，成为边界的痛弊。首先毛泽东为书记时，特委就在泽东一个人荷包里，后来开明代理书记，特委又是开明一个人的独脚戏。”<sup>4</sup>

苏区地方政权民主实践中也遇到类似问题，习惯专制传统的民众短期内难以学会运用民主制。毛泽东说：“乡、区两级乃至县之一级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都是用一种群众会选举的。一哄而集的群众会，不能讨论问题，不能得到政治训练，又最便于知识分子或投机分子的操纵”。“一些地方有了代表会，亦仅认为是对执行委员会的临时选举机关，选举完毕，大权揽于委员会，代表会再不谈起”。“所

<sup>1</sup>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95 页。

<sup>2</sup>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99-100 页。

<sup>3</sup>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166-168 页。

<sup>4</sup>《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 年 2 月 25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269 页。

以如此，就是因为缺乏对于苏维埃这个新的政治制度的宣传和教育。封建时代独裁专断的恶习惯深中于群众乃至一般党员的头脑中，一时扫除不净，遇事贪图便利，不喜欢麻烦的民主制度”。“民主集中主义，在政府委员中也用得不习惯。”<sup>1</sup>

在红四军实践中，民主分权的种种弊端汇集起来，在 1928 年引发了损失惨重的“八月失败”。其实问题早在朱、毛会师不久就有所显露，原来毛泽东的井冈山红军只有约 1600 人，朱德领导湘南起义后带来的红军、农军总共有约 8000 人，这是迅猛壮大红军的重大战略机遇。毛泽东本想把红四军一举扩编为三个师，但是由于湘南农军乡土意识太强，而朱德迎合了这种群众意识，毛泽东的宏大计划被否决。龚楚回忆：“红军整编问题，原决定编为三个师”，但“耒阳、郴州两县负责同志均提出反对”，他们认为赤卫队只能打游击，策应主力红军，“将来一有机会即须返回原籍各县游击”。“各县负责人并强调：若前敌委员会强迫改编，则必招致不良后果。毛泽东当时垂头丧气，一言不发。朱德是精兵主义者，他倒同意各县负责人的意见”。“毛泽东虽很不满意，但又不能强迫改编，他乃起来说：这次改编可照各位的意见进行，但各位须要明白，我们是革命者，红四军是现时中国主要革命武装队伍，应以加入红四军为荣，你们部分同志的反对意见，完全是农民意识、地方主义在作祟，此后必须要纠正。”<sup>2</sup>

由于井冈山给养困难和湘南干部要求，后来大部分湘南农军返乡打游击，只保留了 29 团。但是回到湘南的农军在严酷环境下无法坚持，很快溃散，事实证明少数派毛泽东是对的。时任农军干部的黄克诚痛惜地说：“拉到井冈山上的湘南八千子弟兵，除保留下来少量干部和第二十九团少数部队外，其余都损失掉了，没有能形成一支武装力量”，“让各县武装返回湘南打游击的决定，过于匆忙，欠缺周密的考虑”。<sup>3</sup>陈毅给中央的报告也谈到：“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sup>4</sup>

1928 年 7 月，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发动会剿，红四军决定分兵拒敌，毛泽东带 31 团活动于江西一侧、朱德带 28 团、29 团活动于湖南一侧，32 团留守井冈山。不料在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的鼓动下，湘南农军编成 29 团士兵 7 月

<sup>1</sup>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51-52 页。

<sup>2</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153-154 页。

<sup>3</sup>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6-47 页。

<sup>4</sup> 陈毅：《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1929 年 9 月 1 日），《陈毅军事文选》，第 27 页。

12日召开士兵委员会，竟擅自议决返回湘南，朱德劝阻无效，“毛泽东使专人送信来，他预料到我们必同意杜修经提出的湖南省委的计划，他认为绝不可行，希望我们幸勿冒险，致遭损失。但军中各级军事干部均不以为意，坚决照既定计划准备行动”，<sup>1</sup>最终导致惨重失败。

杨开明报告对整个过程有极为生动的叙述：29团过不惯井冈山艰苦生活，思乡心切，到酃县后“突然于12号晚士兵纷纷开士委会，一不通知上级官长及党代表，竟决定13号由酃县去湘南，私自找好带路的人，出动的时间都决定了。军委（四军党的最高机关）得讯即召集军委扩大会，士兵代表会，多方面解释阻止，无效。后又由朱德召集士兵演讲，亦无效”。“军队当时负责的同志都感觉到非常棘手，后来经过千言万语的解释，说暂时回去解了井冈之危，再行回湘南不迟，勉强将军队开动”。“一天只走了30里，兵士垂头丧气，似行不行，三五成群，步伍凌乱，军心涣散，组织解体，如果途中遇着敌人定是不能作战，马上溃散。二十九团在四军中枪支虽较少，作战能力颇强，党亦较好，可是这一次党完全失去了作用”。“军至沔渡后，二十九团士兵仍要求回去。军委看了这种情形，觉得如果勉强留住他们，不能作战也是无用”。“向湘南进发，24号到达郴州，与范石生部激战，初胜后败。二十九团系湘南农民，全部溃散。二十八团当时也打垮了”。<sup>2</sup>这次失败导致井冈山红军损失一半，根据地几乎垮台，事后朱德没有检讨自己的责任，也引起毛泽东的不满，为后来的朱毛之争埋下了伏笔。

综观上述各种弊病，我们可以看到，在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中国、在以农民为主体的红军中，来自西方的民主分权制度必然会遇到很大困难，最主要是缺少民主制运行所必须的法治基础。具体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谈，

一、分权制中各机构的权力界限必须清晰，有明确的运作规则——也就是“法”，各权力机构严格依法运作，才不至于产生冲突和失效。本来士兵委员会并没有参与军事指挥的权力，但在中国传统中，法仅仅约束弱者的，强者向来为所欲为。在“八月失败”事件中，强势的29团士兵委员会越权擅自议决回乡，无视毛泽东来信和朱德讲话，使红四军指挥系统完全瘫痪，导致惨重失败。

二、在法治的体系中，法高于人，即使在特殊时期授权给个人，以后仍能收

<sup>1</sup>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190-191页。

<sup>2</sup>《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53-254页。

回授权。比如二战时期，邱吉尔作为英国战时首相获得极大权力，但战争刚结束，他就被英国人民选下台，失去了权力。很多决策需要特殊的才能和经验，盲目的集体领导使很多没有资格的外行参与决策，导致严重失误。比如在红五军进攻安福问题上，邓乾元为代表的多数否定了彭德怀的意见，强行表决通过，结果攻城失败，红五军损失惨重。又比如在红四军整编问题上，朱德和湘南干部缺乏毛泽东那样深远的战略眼光，导致红军丧失了迅猛扩大的极好机会，八千湘南子弟绝大部分回乡溃散，红军又只剩下三、四千人。在这些需要特殊才能和经验的问题上，确实需要授权给拥有特殊才能和经验的人。

但是，由于中国有深厚的人治传统，缺少法治传统，人高于法，一旦授权给强力人物，就很难有效监督，更难以收回授权，往往最终走向个人崇拜和独裁。这个问题在红军初期还不严重，但也已经显露出一些迹象，杨开明报告中已经提到：“党员崇拜领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认得党的组织。”<sup>1</sup>这一问题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又有很大发展，给近现代中国带来深远巨大的影响。

## 二、1929年朱毛之争与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的挫折

红四军一些干部逐渐认识到民主分权的问题，开始尝试一些调整，特别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倾向于权力集中和严格管理，但朱德为代表的多数人仍坚持分权和保障民主气氛。两派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再加上一些个人因素的影响，终于在1929年春夏之交引发了著名的朱毛之争，结果在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实际上被赶出了他亲手创建的红四军。

### （一）朱、毛的原则分歧和个人差异

1928年4月底朱德率军与毛泽东会合成立红四军后，两位志向远大的革命家总体合作良好，两支部队也逐渐趋于融合，但是毛泽东和朱德在领导原则和个人风格上都有明显差别，也逐渐产生分歧，积累矛盾。在原则上，分歧主要集中

<sup>1</sup> 《杨克敏关于湘赣边苏区情况的综合报告》（1929年2月25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274页。

在两点，一、民主分权与集权的矛盾；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这同时也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在个人风格上，毛泽东严厉细致，让下属畏惧，有独立见解，对上级不完全服从，生活上有些特殊化；朱德慈祥宽厚，有时粗心大意，对下属宽容，对上级完全服从，生活上和士兵打成一片。

毛泽东能力很强、责任心也很强，较早感觉到分权制的弊端，痛感他的很多好想法由于意见纷杂无法实现，他的出众能力无法充分发挥，认为如果在关键决策上失误就将导致惨重失败，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加上当时能力强的干部少，毛泽东更喜欢独断专行。杜修经在报告中就谈到：“现在边界特委工作日益扩大，实际上一切工作与指导都集中在泽东同志身上。”<sup>1</sup>朱德虽然是旧军人出身，但后来在西欧游学多年，对民主制信仰很深，认为民主是革命理想的核心，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不能牺牲民主原则。龚楚认为：“毛泽东处事独裁，一切军政措施均由他个人决定，不想他人干预，而且个性固执，不接纳他人的意见；朱德则有民主作风，凡事都和大家商量决定”。<sup>2</sup>

在军事上，朱德是红四军威望最高的领袖，此时文人出身的毛泽东还处于学习时期，中央也认为“毛在政治上强，军事上朱强。”<sup>3</sup>军队毕竟是要在战场上决生死的，军事能力自然极受推崇，朱德是久经沙场的战将，早在 1916 年护国战争期间已经成名，当时正值壮年（43 岁），那些后起的名将如林彪（22 岁）、粟裕（22 岁）等当时还是经验不足的毛头小伙子。1928 年保卫井冈山的龙源口之战险象环生，朱德亲临火线打败了杨池生、杨如轩带领的五个团，使井冈山转危为安。当 1929 年 2 月初军部在圳下村遭突袭朱德失散时，粟裕“觉得像天塌了似的”，<sup>4</sup>可见朱德当时在红四军威望之高。

毛泽东是擅长写文章的知识分子，原来完全不懂军事，1927 年秋收起义后才开始领导军队，在建军初期还只是军事上的学徒，也没有带兵打赢过什么真正的硬仗，军事威望有限。1928 年 3 月周鲁到井冈山误传中央开除毛泽东党籍，只能当师长，毛泽东向干部战士承认“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希望大家帮忙。<sup>5</sup>毛泽东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还说：“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

<sup>1</sup> 《杜修经给湖南省委的报告》（1928 年 6 月 15 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131 页。

<sup>2</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207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朱德年谱》，第 157 页。

<sup>4</sup> 粟裕：《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82 页。

<sup>5</sup>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71 页。

军事”，<sup>1</sup>可见那时他在军事上还没有自信。萧克也谈到，毛泽东当时“指挥作战方面没有那么多经验，在井冈山时很多大仗都是朱老总指挥的。”<sup>2</sup>毛泽东的军事威望在 1930 年底全歼张辉瓒师的龙冈大捷后才建立起来，这也是 1929 年毛泽东与朱德矛盾激化以后，陈毅等人倾向于朱德留下，毛泽东离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朱德长于军事，担负军事领导责任，难免主要从军事观点来考虑问题，这也是长期职业军人生涯养成的习惯。毛泽东长于政治，担负政治领导责任，当然更多从政治观点考虑问题。这就产生了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的矛盾，同时也就是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矛盾。具体说，军事观点就是以打仗为中心，对于宣传工作、发动组织群众工作相对就比较轻视，只要能打胜仗，其他不考虑那么多，只要是勇猛善战的干部战士，纪律方面有些毛病就不强求了。政治观点则要尽力争取广大民众的支持，以壮大革命力量，这就必须制定并严格执行能够得人心的政策，通过严肃的纪律加以保证，比如不能侵犯农民，这样才能得到占人口多数的农民的支持；不能侵犯商人，这样才能保证苏区的货物供应；不能侵犯俘虏兵，这样才能瓦解敌军斗志，补充兵员、缴获武器。

毛泽东抓工作很严格也很细致，虽然表面好开玩笑，但实际性格刚烈强硬，如果达不到要求就要遭到严厉批评、甚至严重打击，常常让下级感到畏惧。后来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谈到：“毛主席是很严格的，制定了的政策就要执行，看起来讲话风趣，实际上处理事情很严格。”<sup>3</sup>赖毅也谈到毛泽东的细致和严格：“行动委员会三、五天就要检查一次工作，例如进行了几次宣传，组织了多少群众，打了多少家土豪，没收和分发了多少东西，筹了多少款；工作中的经验、优缺点，以及附近的敌情等等，都要作详细的汇报，并按级上送，直到毛委员那里。”<sup>4</sup>毛泽东严格细致的工作作风，从他后来为制订土地政策在寻乌、东塘、兴国、长冈乡、才溪乡等地进行的农村调查也可以看出来，这些精密细致的调查报告至今仍是有价值的社会史研究资料。

朱德性情宽厚，爱兵如子，深受下属爱戴，但几乎没人怕他，而且常常大而化之，不够细心。这样军队纪律、甚至军事行动有时会出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

<sup>1</sup>毛泽东：《在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56年9月10日），见《党的文献》1991年第3期，第7页。

<sup>2</sup>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年第2期，第11页。

<sup>3</sup>萧扬整理：《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年第8期，第32页。

<sup>4</sup>赖毅：《毛委员教我们发动群众》，《星火燎原》（1），第185页

“八月失败”中，朱德本人就在军中，却没办法用强硬手段控制部队，不得不迁就 29 团士兵委员会，结果铸成大错。1932 年周恩来在关于红军指挥权的电报中也提到朱德的缺点：“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sup>1</sup>

毛泽东有雄才大略，也有唯我独尊的倾向，要求下级严格服从，但自己却并不严格服从上级，认为上级不对就不执行。他还有一些特殊的生活习惯，需要别人来适应他，比如喜欢夜晚工作，起床很晚。据胡乔木说，在长征途中担任总书记的张闻天曾下令：“所有人都要几点钟起床，到时候吹号”，毛泽东勃然大怒，说：“哪里来的新兵？朱总司令也没有禁止过我！”<sup>2</sup>可见，毛泽东的习惯从井冈山就开始了，延续了一生，大家都得适应他。从后来朱毛之争中朱德对毛泽东特殊化的批评来看，不少人对这一点是很不满的。

朱德打仗的时候是刚毅的将领，平时与人交往中却很谦虚，对上级严格服从，对下级也很平等，喜欢和战士们一起打球，甚至帮助战士补草鞋，这种朴素博大的人格得到了全军的爱戴。朱德很守纪律，在井冈山和伍若兰结婚后，周六要过夫妻生活，竟来找支部书记何长工请假，倒把何长工搞得很尴尬，让他以后不要再请假了。<sup>3</sup>28 团干部何笃才认为“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黄克诚也认为“毛泽东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sup>4</sup>这也是朱毛之争中朱德得到更多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

## （二）“吃猪事件”和军委问题引发的争论

1929 年 1 月，红四军主力为避开两省敌军重兵围攻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和闽西，但是遭到江西敌军的持续追击，处境非常危险，矛盾开始显露，朱德旧部 28 团和毛泽东旧部 31 团差点分家。2 月上旬，红军在大柏地之战打败追兵，转危为安。3 月以后，国民党爆发蒋桂战争，红四军处境显著改善，在闽西击败郭凤鸣，占领长汀，4 月又相继占领瑞金、于都、宁都。红军在连战获胜的情况下，军事观点抬头，和毛泽东坚持的政治观点发生冲突，加上中央派来的高级干部刘安恭的挑动，朱毛之争在 5、6 月间爆发了。

<sup>1</sup>周恩来：《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1932 年 7 月 29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 页。

<sup>2</sup>萧扬整理《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 年第 8 期，第 32 页。

<sup>3</sup> 《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下册，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554 页。

<sup>4</sup>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 100-101 页。

朱毛之争的导火索之一是“吃猪事件”，此事突出体现了政治观点与军事观点的矛盾，大概发生于5月中旬从宁都回瑞金途中。当时在朱、毛身边工作的江华和曾志都有回忆，两人的叙述有所差别，但此事引起毛泽东和朱德直接冲突上是一致的。江华的版本是这样的：“毛泽东同志听说，有一猪贩子从石城赶着十几头猪到广昌，被三十一团军需处截留下来，给部队宰杀吃了。他立即派人把三十一团军需处长杨立三同志找来，问明了情况，严厉批评说：‘这哪里是革命军队，简直是绿林，这样的军队还能打胜仗？还能战胜敌人？’并且让连夜出布告，四处张贴，公开检讨错误，赔偿猪款。这次毛泽东同志真是气愤极了，还接连说要撤杨立三同志的职。我们在一边都不敢说话，朱德同志忙讲情说：‘猪已经吃了，就算了。’毛泽东同志一听这个话，很严肃地说：‘哪有这样的事，吃了还能就算了？这么大方！’”<sup>1</sup>

曾志的版本细节更多：“在红四军回师瑞金的行军途中，我和朱军长走在一起。那天傍晚，部队快到宿营地的时候，我们看到田野不远处有四只很大的肥猪在觅食。我听到军长身边的一个战士惊讶地说：‘哇，这么大的肥猪，一头足有三百多斤。这一定不是穷人家养的’，‘我们把它没收了’，”“到了晚饭的时候，我们果然就吃上了久违的猪肉”。“第二天早上刚出发，就有人来告状，说他的猪被红军杀了。后来一了解，那猪不是地主的，而是富农经商买卖的猪。毛委员听了汇报后很生气，命令有关部门向那商人赔礼道歉，并退还了猪款。晚上，毛委员召开干部会议，对此事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怒斥“我们不作调查就杀了商人的猪，就违反了党的商业政策，是土匪行为！”刘安恭“听了毛委员的批评后很不满意，觉得这次批评是冲着朱军长。因为朱军长知道此事，却没有制止，也有一些责任。会后，刘安恭在军长面前挑拨离间，说毛委员对你怎么能这样，说前委书记在政治上干预太多了。军队是司令部对外，政治部门不能对外，政治部门不能直接干预军队的事”。<sup>2</sup>

刘安恭是中央刚派来的高级干部，4月初到达红四军军部。他是四川人，早年留学德国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在欧洲加入共产党，1924年回国在川军杨森部任参谋，1926年帮助朱德在杨森部从事兵运，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失败后被派到苏联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回国。由于红四军对中央的信任

<sup>1</sup>江华：《追忆与思考》，第70页。

<sup>2</sup>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第93页。

以及干部人才缺乏，他刚刚到达就被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5月下旬又被任命为刚恢复办公的临时军委书记。刘安恭和朱德是四川同乡，又有共同的留欧经历，还曾经在杨森部共事，加上朱德的亲和力，刘安恭和朱德在思想和感情上都比较接近。同时，见多识广的刘安恭也没把未曾留洋、有些土气的毛泽东放在眼里，这使他成为朱毛之争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刘安恭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后，在朱德等的支持下，立即毫不客气地向前委书记毛泽东发起了挑战，在军委会议决议“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实际上架空了前委和毛泽东。萧克回忆：“对这条决定，许多人就觉得不合适，下级怎么能决定上级的权力范围呢？从而议论纷纷。”<sup>1</sup>5月底，在福建永定县湖雷举行的红四军前委会议上，争论爆发了。刘安恭、朱德等批评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是“家长制”，这当然是直接针对毛泽东的。毛泽东等人认为，当时工作的重心还是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应取消军委。当时争论激烈，意见无法统一，没有做出决议，但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的权威大大动摇了。<sup>2</sup>

萧克回忆：“湖雷会议起，大会小会进行讨论，有时甚至争论起来。那时党内不忌讳争论，党的文件、党章都规定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党员对问题有看法，在未作出决定之前，可以自由讨论。我们刚刚学习过的中央第六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章说，‘在未经决议以前党内的一切争论问题，可以自由讨论’，还说‘可以举行争论’。所以，大多数人从关心党、爱护党的角度出发，发表自己的看法，展开争论。”<sup>3</sup>

红四军一边打仗一边争论，毛泽东发起反击，6月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前委不过十多个人，白砂会议扩大到了四十一人。毛泽东正式提出书面意见，并且情绪激烈地提出辞职。他认为，在军委架空前委的情况下，“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批评他的反对者“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然后激烈地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sup>4</sup>朱德表示拥护一切工作归支部

<sup>1</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9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第277页。

<sup>3</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89页。

<sup>4</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上卷，第278页。

的原则，并认为红四军在原则上坚持得不够，成为一切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对外代替群众机关，对内代替各级党部。<sup>1</sup>刘安恭刚到红四军就担任要职并挑起争论，引起包括陈毅在内的很多干部不满，而且在游击战争时期，地方政权相关事务不多，前委主要就是领导军队。会议最终以 36 票赞成、5 票反对的压倒优势决议撤消临时军委，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当然自动免职，他兼任的政治部主任一职也由李任予（后由陈毅）接任。

### （三）红四军七大与毛泽东被迫离开红军

但是白砂会议并未解决问题，红四军中的争论越来越激烈，参加争论的范围也越来越大，不同意见尖锐对立，严重影响了军队的团结。6月 19 日第三次攻占龙岩后，红四军领导人决定 6 月 22 日在龙岩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希望大会能够解决争论、统一思想、实现团结。

在红四军七大之前，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已经公开了，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等都写了公开信，发表在《前委通讯》上。这四封信中，毛泽东的信见于公开出版的《毛泽东文集》，根据毛泽东、朱德、陈毅的年谱、传记等资料，他们争论的问题和观点是基本清楚的。这几封信是由林彪的第一封信引起的，一纵队司令（原 28 团团长）林彪本是朱德的旧部，但在这次争论中他站在毛泽东一边。6月 8 日白砂会议前，林彪写信给毛泽东，信中提出“党管理一切”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支持权力集中，而且是集中到政治领导。<sup>2</sup>信中也有一些人身攻击的成分：“现在四军里实在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同志又比较在群众中是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派），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sup>3</sup>林彪在信中还鼓励毛泽东不要消极辞职，应与不良现象斗争。

林彪的信给困境中的毛泽东“很大的感动”，他在 6 月 14 日给林彪的回信中表示：“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在信中，毛泽东回避了集权、分权问题，重点谈了军事观点和政治观点的冲突，并对

<sup>1</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 148 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 150 页。

<sup>3</sup>林彪：《给毛泽东的信》（1929 年 6 月 8 日），《朱德传》，中央文献、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178 页。

朱德等做了一些偏于个人意气的攻击。<sup>1</sup>

毛泽东对单纯军事观点提出深刻批评，认为“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有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拔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sup>2</sup>

在另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毛泽东隐瞒了自己的集权主张，也没敢公开批评过度的民主化，这显然是民主气氛高涨情况下委曲求全的策略，对于针对他的“家长制”的批评，他只是被动地进行了辩解。其实毛泽东在 4 月 5 日给中央的信中，不但强调政治观点，而且很明确地主张集中权力，反对“无政府”，他谈到：“红军无论在什么时候，党及军事的统一指挥机关是不可少的，否则陷于无政府，定要失败。”<sup>3</sup>但在 6 月 14 日的公开信中，毛泽东只是说：“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sup>4</sup>

毛泽东在信中也批评朱德等以个人领导代替党的领导，但这种批评并没有多

<sup>1</sup>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64 页。

<sup>2</sup>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69 页。

<sup>3</sup>毛泽东：《红四军前委致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于瑞金），《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298 页。

<sup>4</sup>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 年 6 月 14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73 页。

少依据，带有个人意气的成分。毛泽东认为朱德的个人威望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sup>1</sup>

朱德比毛泽东晚一天，在6月15日也写了公开信，表示不同意“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认为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必然使党脱离群众，认为“此口号——党管理一切——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党的组织最高原则，请看第六次大会的组织决议案（已印发），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修改。至于我个人如稍有不合原则的，即可以铁的组织纪律决绝”。“过去有党代替群众机关直接管理一切的问题。如宁都、永新、遂川游击时，已成通例口号。我们反对此口号”。“一切工作归支部，此原则我是极端拥护的”，“要打破家长制及包办制。一切实际工作集中于前委，前委开联会开了数日，各级党部坐等命令到来，以便遵照办理，这样何尝有工作归支部呢？”<sup>2</sup>

在争论期间，朱德对于毛泽东以个人凌驾于党组织的倾向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党员在党内要严格执行纪律”，指出“恰恰在这个问题上，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做好，不仅自由发表意见，自由漫骂同志，而且对中央和省委的指示也不认真执行”。<sup>3</sup>刘安恭则把红四军分成两派，认为朱德是执行中央指示的，毛泽东是自创原则不服从中央指示的，为了反对家长制，应该限制毛泽东的权力，进而提出“完全选举制度及党内负责同志轮流更换来解决纠纷”。<sup>4</sup>

红四军各级干部战士都积极参加到讨论中来。萧克回忆：“各纵队、支队党委讨论得更热闹了，甚至连朱毛去留问题都提出来了。四军驻新泉的七八天，连

<sup>1</sup>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5-67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150、151页。

<sup>3</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91页。

<sup>4</sup>《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6月22日），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4页。

以上尤其是支队、纵队干部天天开会，老是争论这么几个问题：党应不应管理一切？是管理一切、领导一切还是指导一切？等等。当时，领导上号召大家发表意见，放手争论。但得不出结果，大家觉得该由上边领导人来管了，多数干部希望停止争论”。“蒋桂战争已结束，蒋冯已妥协，我们意识到敌人要来进攻”，“红四军第七次党代表大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着这样的目的召开的。”<sup>1</sup>

在这场充满民主精神的讨论中，支持朱德的人占了优势。到 6 月中三打龙岩的时候，前委已经被架空，毛泽东很孤立，被迫退出军事决策圈。江华提到：“军委在小池开会研究部署三打龙岩的作战计划，通知谭震林参加，而党代表毛泽东没有接到通知。当时，谭震林同志建议毛泽东同志也去参加，毛泽东同志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sup>2</sup>

1929 年 6 月 22 日，红四军在龙岩召开第七次党代表大会，政治部主任陈毅主持会议，参加的支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四五十人，其实和白砂会议规模差不多，大会只开了一天，通过了陈毅主持召开的《红军第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否定了前委下再设军委的意见，批评刘安恭“把四军党分成派，说朱同志是拥护中央指示的，毛同志是自创体系到不服从中央指示。这完全不是事实，是凭空臆断的”。决议也批评林彪的信“是不对的”，“不要离开党而谈党的严重问题，因为这样不但不能解决党内纠纷而更使之加重”，信的内容“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这是错误的”。<sup>3</sup>

决议认为毛泽东、朱德都有错误，各打五十大板。毛泽东的错误有七条：“英雄思想；固执己见；过分自信；不接受批评；有报复主义；对同志有成见；工作态度不好；小资产阶级色彩浓厚。”朱德的错误也有七条：“相信私人；有迎合群众造成个人信仰的倾向；无形间有游民无产阶级行动的表现；工作不科学，无条件，无计划，马马虎虎；无形中夸大英雄思想的表现；不能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注意军事训练，不注意维持军纪。”决议结论是：“此次争论，朱毛两同志都有同等的错误，但毛同志因负党代表与书记之工作，对此次之争论应负较大的责任”。关于朱毛的去留，决议提出：“由中央处置，在中央未派人来以前可继续工作。”决议给“毛泽东同志予以严重警告，朱德同志予以书面警告。”<sup>4</sup>大会选举了陈毅、

<sup>1</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 93 页。

<sup>2</sup>江华：《追忆与思考》，第 89、90 页。

<sup>3</sup>中央文献研究室：《朱德年谱》，第 152 页。

<sup>4</sup>赖宏：《毛泽东与红军》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第 195-196 页。

毛泽东、朱德、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及各纵队士兵代表等 13 人组成的新前委，在前委书记选举中，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新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明确表示不满：“会议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辩，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sup>1</sup>

陈毅主持红四军七大希望通过调和来统一思想、促进团结，但并没有实现目的，两派原则上的分歧并未解决，甚至已经无法再继续共事。毛泽东落选后不愿在前委工作，激愤地要求离开红军到福建地方，准备去苏联留学，支持毛泽东的谭震林、江华、蔡协民、曾志等也随同离开。曾志说：“在争论期间朱军长曾找过我，问我的观点如何。我当时只凭着自己入党学到的一些理论知识和实践体会，回答说：‘党在军队中应起核心领导作用，大革命时，党在人民群众中，在国民党军队中都是如此。’这样，在红四军的‘七大’后，我被划到毛泽东那一边去了。我看已无法再呆在红四军，也就跟着毛委员去了福建。”<sup>2</sup>江华也提到：“我们离开部队由龙岩出发时，把我的马也扣留下了，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sup>3</sup>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重大挫折，在三十年后 1959 年庐山会议上，他谈到红四军七大还余怒未消地说：“司令部惹不得，党委不能讨论，不然叫越权”，“还是旧军队东西，名为前委，只能管政治，不能管军事。”<sup>4</sup>

虽然由于干部战士认识水平等条件限制，红四军七大没能达到结束争论、加强团结的目的，但它表现出的民主精神在中共历史上是非常突出的。萧克多年以后还兴奋地说：“那时候，不管上级还是下级，有意见在党内指名道姓批评。好不好？我看，一个组织，如果主要领导人讲了定性的话，不管正确与否，就没有人敢讲话了，那就危险了，如果犯错误就是大错误。四军‘七大’的决议案批评四军在位的主要领导人是有利于党的事业的。我曾向一位老同志谈过，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sup>5</sup>的确，民主制度常会犯错，但是也有纠错的能力，这是其最主要的优点，纠错机制失灵的政治制度是危险的。

<sup>1</sup>陈毅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发言（1971 年 9-10 月），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第 203 页。

<sup>2</sup>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上），第 94 页。

<sup>3</sup>江华：《追忆与思考》，第 97 页。

<sup>4</sup>李锐对 1959 年 8 月 1 日政治局常委会的记录稿，《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98 页。

<sup>5</sup>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 98 页。

### 三、中共中央对民主的认识和对毛泽东的强力支持

#### (一) 中共中央对党内民主的认识

中国是缺少民主传统的国家，建党初期的中共党员虽然是接受民主观念的新青年，他们同样缺少运用民主制的经验。在六大前后，红四军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孤立的，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很多党组织都出现了类似的内部纷争，比较突出的有北方顺直省委的长期纷争、江苏省委的派别活动，甚至还出现了陈独秀领导的托陈派分裂活动，这些问题严重削弱了共产党在严酷环境下的生存和斗争能力，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已经着手从思想和组织上反对极端民主化。

顺直省委是中共在北方的领导重心，指导范围包括华北数省。但是从 1927 年开始，顺直省委陷入了长期纷争，特别是工、学矛盾尖锐，以彭述之为代表的的知识分子干部和工人干部难以合作。政治局委员蔡和森 1927 秋到 1928 年初两次改组顺直省委，提拔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干部受到排挤，引起彭述之等的强烈不满，双方激烈争斗。蔡和森和彭述之给中央写信相互控告，甚至出现保南另立省委事件，党组织在内斗中几乎陷入瘫痪状态。中央派高级干部陈潭秋、刘少奇到北方解决顺直省委纷争，都没有完全成功。

刘少奇在 1928 年 9 月报告中说：“极端民主化的结果是什么？是发展同志的个人自由和纠纷，破坏党的组织和权威。党的决议可以不执行或改变或反抗，命令可以不服从，党的纪律完全破产，我看见好几次省委给同志的警告信，同志接了看见是警告，还不等看完即勃然大怒，将信撕碎，掷入丙丁，大骂一顿。北京市委要发传单，有一个组说没有经他们通过，他们不发。保南同志说：省委改组他们没有代表参加，他们不承认省委，省委不合法。京东活动同志会的决议案几次催促要省委‘执行’，天津同志提出许多意见要省委执行，省委没有执行即便大骂，大家是英雄好汉，骄兵悍将，省委做他们的尾巴还做不好，到处可以听见骂省委的呼声”。<sup>1</sup>

中共中央在 11 月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严厉批评顺直省委：“自去年九月北局成立及和森同志到北方巡视以至六次大会前，省委经过两次改组，但顺直的党，

<sup>1</sup> 《刘少奇关于最近顺直党内状况的报告》（1928 年 9 月 7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一），中央档案馆 1990 年，第 461-462 页。

不仅没有进步，反而退化糟糕至不可救药”。“组织上则极端民主化，用金钱收买同志，闹经济问题，小资产阶级意气的争，派别的纠纷，在京津党部中，闹得一塌糊涂，因此群众工作多被放弃，省委对下级党部又失信仰，对外县多失联系，保南则自立省委与省委对抗”。中央政治局因为顺直之错误，和森同志及藻文、仲一同志应负最严重的责任，决定开除和森政治局及常委工作，开除藻文、仲一两同志中央委员资格”。<sup>1</sup>直到 12 月周恩来到天津，经过耐心细致的说服，顺直纷争才基本停止。

1928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用了很大篇幅讨论组织原则，其中第一条要反对的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其中谈到“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及到改造党的时候，许多地方又走向极端民主化的方向，同志对于党的决议，可以随便不执行。上级机关发一传单，没有交支部通过，支部居然提出质问。同志不得党的许可，可以自由行动。这种小资产阶级极端自由的思想，可以把党的组织打的粉碎，以至于消灭。”<sup>2</sup>

《告全体同志书》对各种无原则纠纷也提出严厉批评，包括个人意气之争、小组组织倾向、工学界限等：“把对政治变成专门对人，便成了闹不清的意气之争了。因意气而攻击他人，因意气而不接受他人的批评，甚至有不站在党的立场去考查同志的意见与工作，专以意见去推测他的动机而造成党内无穷的纠纷”。“现在党内许多小组组织的倾向，都是由私人感情的结合，或部落的观念形成的。少数有领袖欲的人，想造个人地位，利用这些结合，攻击地位较高或地位相等的人，因此资产阶级种种政客官僚的卑污恶浊手段，一例发生了。这是破坏党的最恶劣的倾向。”<sup>3</sup>

在 1929 年 6-7 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上，极端民主化成为重要议题之一。在《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的不正确观念中，第一就是“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批评“有些同志不顾党的主观条件如何，不顾党的秘密存在与严厉的白色恐怖，要求无条件的实行党内民主化，甚至常借此反对指导机关的决议和指示，闹党内纠

<sup>1</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国际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720 页。

<sup>2</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704-705 页。

<sup>3</sup>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体同志书》（1928 年 11 月 1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4），第 705-706 页。

纷问题，削弱指导机关的威权，”认为在“党员政治水平线低微的条件下，加以客观上白色恐怖严重，党内民主化的执行限度是应当有条件的”，提出“最高机关的决议，下级机关应当无疑地执行。在必须的时候下级党部的要员与书记，上级党部可以指派。”<sup>1</sup>

1929 年也是托陈反对派积极活动、走向决裂的时期，争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组织原则问题，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中，这种剧烈的内部斗争已经威胁到党的生存。8月5日，陈独秀致信中共中央，批评中央“老是固执你们的褊狭性，而不顾及党内德谟克拉西的重要性，而畏不同的意见如蛇蝎，而企图用中央威权霸蛮的造成你们意见的一致，对于不同的意见，禁止讨论，或消极的不在党报上公表出来”。陈独秀要求“在组织上，尽可能的扩大党内需要的德谟克拉西，例如支部及区委都实行选举制，如有可能，省委也不可例外；党员对于党的政策有‘自我批评’的自由，各级党部开会有讨论政策及工作方法的自由，党员间政治上意见不同的争辩，准其在党报上发表。”<sup>2</sup>

在 9 月 20 日江苏省委会议上，托陈派的彭述之三次发言，与中央宣传部秘书长恽代英激烈辩论，声称“铁的纪律”是“废话”、是“官僚压迫群众”的工具。托陈派还积极活动，“不放弃任何一个关系，拉共产党员转向托派”。<sup>3</sup>托陈派“要求公开讨论一切不同路线的意见，要求把反对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意见都公开在党报上发表，要求从支部到中央都实行民主的选举”，抨击中共中央“命令主义”、“一贯的命令主义”。中央 10 月 5 日反托陈派决议则认为：“党的民主化的限度是要依据客观和主观的条件来决定的，如果客观的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时候，而要求超越可能的民主化，只是‘帮助俄皇宪兵’（列宁这样说过）的办法”。<sup>4</sup>11 月 13 日，中央发出致全党的公开信，抨击托陈反对派“积极进行破坏党的一致和分裂党的活动”，“以极端民主化来鼓动同志反对上级指导机关之指导”。<sup>5</sup>11 月 15 日，中央宣布开除陈独秀、彭述之等五人的党籍，这是这个时期中共中央与极端民主化斗争中采取的最严厉措施。与中共决裂以后，主张民主化的托陈派

<sup>1</sup> 中共六届二中全会《组织问题决议案》（1929年7月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 216-217 页。

<sup>2</sup> 《陈独秀关于中国革命问题致中共中央信》（1929年8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740、742 页。

<sup>3</sup>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 1994 年，第 75 页。

<sup>4</sup> 《中央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主义反对派的决议》（1929年10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 503 页。

<sup>5</sup> 《中央给各级党部及全体同志的一封公开信》（192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 543-544 页。

无法适应残酷的斗争环境，大多数干部很快被国民党捕获，政治上趋于消亡。

综上，中共中央从实践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害，为了维护党组织的生存和战斗能力，已经倾向于集中权力，这种纵览全局的高度是在深山里奋斗的红四军干部难以达到的，这也是中央能够指导红四军解决朱毛之争的重要前提。

## （二）陈毅上海汇报与中央“九月来信”对毛泽东的支持

1929年初，受到共产国际的影响、也因为当时红军确实处境艰难，中央对形势做出了悲观的判断，在“二月来信”中提出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把红军分散成若干小的游击队。中央4月指示信中仍要求毛泽东、朱德准备离军，先派重要干部到中央汇报工作。红四军七大之后，新当选的前委书记陈毅承担了到上海汇报的任务。在去上海之前，陈毅专程到福建蛟洋向毛泽东征询意见，并请他回红四军主持前委，但“两人在交谈中又争论起来，各执己见，未能统一”，<sup>1</sup>毛泽东不同意回红四军，陈毅8月上旬动身，朱德代理前委书记。

在陈毅与中央接上关系之前，中央已收到红四军七大文件和内部纷争的报告，并于8月21日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虽然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红四军并未收到这封信，但此信代表了中央对红军组织原则的认识。指示信不仅明确批评朱德的极端民主化倾向，而且认为毛泽东也没有勇敢地捍卫集权制：“玉阶主张固然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便是润之的答复也还不能对于军队中之党的支部工作，尤其是在目前转战千里之红军中党的支部工作有一明确的答复。对于集权制没有勇敢的回答他是在目前与敌人肉搏的环境中所绝对必需。”信中对“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提出严厉批评，并且指示刘安恭离开红四军，“调来中央”。<sup>2</sup>

陈毅经厦门、香港，于8月17日左右到达上海，21日以后与中央接上关系。他在上海奋笔疾书，写了五个书面报告，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几年苦斗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的最后，陈毅提出如果中央能派两人替代，则朱、毛可同时离开，如果不能派出两人，可“先派一人担任前委书记，毛可先走，朱可暂留工作”。<sup>3</sup>中央对红四军的经验非常重视，政治局决定由李立

<sup>1</sup> 江华：《追忆与思考》，第94页。

<sup>2</sup> 《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21日），《党的文献》1991年第2期，第39-42页。

<sup>3</sup> 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版，第59页。

三、周恩来、陈毅组成委员会，专门研究相关问题，并提出决议草案。在上海期间，陈毅把红四军在艰苦奋斗中创造的独特经验提供给中央，同时在与周恩来、李立三的深入讨论中，也开阔了视野，了解到党的全面情况，自我感觉是上了一个学习班，特别是认识到极端民主化是对全党的严重威胁，红四军的纷争也是出在这个问题上，心悦诚服地转变了观点。

中共中央 1929 年 9 月 28 日发出了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此信由陈毅执笔起草，周恩来、李立三、陈毅讨论定稿，史称“九月来信”。指示信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的极端民主化问题，推动了古田会议的召开，强化了红四军中政治领导以及毛泽东的权威，对红军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确立有深远影响。

指示信明确提出红军应集中权力。“红军不是与工会农会同等的组织，他是经常与敌人在血搏状态中的战斗组织，他的指挥应该集中。固然红军的兵士应该以政治教育发动他们自觉向上，但绝不能动摇指挥集中这个原则。军队中民主化只能在集中指导下存在，并且实行的限度必须依据客观条件来决定伸缩，不应漫无限制，以妨害军纪之巩固。”对于士兵委员会的职权，指示信也做出了明确限制：“其职权规定为监督军队经济，参加军队管理，厉行士兵政治教育，做群众工作，与军事机关的关系用报告建议而不能直接管涉。发生特别事件政治委员有解散兵委之权”。<sup>1</sup>

关于所谓“家长制”，指示信明确支持毛泽东。“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前委对于一切问题毫无疑义应先有决定后交下级讨论，绝不能先征求下级同意或者不作决定俟下级发表意见后再定办法，这样不但削弱上级指导机关的权力，而且也不是下级党部的正确生活，这就是极端民主化发展到极度的现象。”<sup>2</sup>

针对红四军自下而上全体参加争论的现象，指示信认为：“红军是生长在与敌人肉搏中的，他的精神主要的应是对付敌人。前委对于朱毛两同志问题，没有引导群众注意对外斗争，自己不先提办法，而交下级自由讨论，客观上有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精神”。“这次扩大会及代表大会的办法是削弱了前委的权力，客观上助长极端民主化的发展”。“对朱毛问题没有顾及他们在政治上的责任之重

<sup>1</sup>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83-484页。

<sup>2</sup>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86页。

要，公开提到群众中没有指导的任意批评，使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发生影响。再则一般同志对朱毛的批评大半是一些唯心的推测，没有从政治上去检查他们的错误，这样不但不能解决纠纷而且只有使纠纷加重。”<sup>1</sup>

指示信明确要求以毛泽东为核心建立政治委员制度。“党代表名称应立即废除，改为政治委员，其职务为监督军队行政事务，巩固军队政治领导，副署命令等。军政治委员可由前委书记兼”，并且明确指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虽然指示信对朱毛两人都提出了温和的批评：“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sup>2</sup>但是毫无疑问，指示信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了毛泽东，要求在红四军建立权力集中的政治领导，并明确指定毛泽东以前委书记和政治委员的身份成为政治领导的核心。

## 四、古田会议与政治委员权力的上升

### （一）中央指示信的传达与古田会议的前期准备

红四军七大之后，毛泽东离开红军，新任前委书记陈毅也很快去上海汇报，红四军的政治领导明显削弱了。代理前委书记的朱德作风民主，但当时红军还是创建不久的农民队伍，干部战士各方面素质都有限，甚至相当多的人是文盲，在这种情况下，红四军陷入众说纷纭的混乱之中。

9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攻占上杭，在上杭太忠庙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熊寿祺在1930年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八次大会前后，前委为了请调工作问题（当时很多同志请调工作），常常讨论几个钟头，无法解决”。“各纵队同志在会场上为了调人调枪这些问题，当然要为自己说话，于是争论起来了，没法解决。前委负责人，只说些调和话”。“当时有许多同志说，前委是各纵队联席会。但是前委的负责同志还以为要这样才对，才是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八次大会时为了一个红军法规中的党代表权力问题，讨论了两天仍旧没法解决，结果还是决定请示中央”。“总之，当时前委什么事都是民主，大家要怎样干就怎样！前

<sup>1</sup>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88页。

<sup>2</sup> 《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5），第483、488-489页。

委事先对于选举没有丝毫意见”，“实行所谓‘由下而上的民主制’，一开会就得争论半天，前委还认为这样才是无产阶级的办法。因此当时全军政治上失掉领导的中心，对政治分析也是大家来议，各级同志又没有报看，哪里议得出！在上杭时天天为调人调枪争论。这样极端民主化的领导，一直到陈毅同志回来之后得着中央指示，才改变了一大半。”<sup>1</sup>

毛泽东也收到开会通知，但他拒绝到会，回信说：“我不能够随便回来”。大会命令他必须到会，正患严重疟疾的毛泽东服从命令，坐担架赶到上杭，但到达时大会已经结束。“大家见他身体虚弱，浑身浮肿，让他继续养病。”<sup>2</sup>毛泽东这次确实病得很重，据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黄琳（即江华）8月29日给福建省委的信，毛泽东感染疟疾后，“因无西药医治，延长到今更为沉重。毛同志已带数名同志伏在山中休养。他的身体经过数年军队的艰难跋涉，弱及不胜风飘，须要长期休养。而休养时没有西药医治，真急得我们束手无策。”<sup>3</sup>10月18日朱德给中央的报告中也提到：“毛同志久病，现虽起床，尚不能行走。”<sup>4</sup>共产国际刊物甚至误信传闻，发表了毛泽东的讣告。

10月下旬，朱德率红四军南下出击东江，正好遇到从上海回来的陈毅，于是连夜召开了前委会。陈毅传达了中央指示，前委致信请毛泽东回红四军重新担任前委书记。10月31日，红四军在广东梅县遭遇严重挫折，撤回福建。此时政治领导很薄弱，连广东省委派到四军的代表都注意到了，省委接报深感忧虑，给中央写信要求派人加强四军的政治领导：“这次攻梅失利，虽受一相当打击，然而损失不过二百余；但退出东江，红军士兵的逃跑给我们一个惊人的数目，竟达战争死亡数倍以上，甚至井冈山出来的老兵士，都有逃跑者。这个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军事方面固然是反攻梅城的失策和退走的失败情绪所致，尤其充分的证明四军中的政治和党的工作的破产。所以攻梅失败，在军事上失败少，而在政治上失败尤大，因此省委请求中央无论如何都要派一个政治上能负责的同志主持前委工作”，“万望中央能够接受这个意见，这是四军的成败所系”。<sup>5</sup>

<sup>1</sup>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sup>2</sup>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第286页。

<sup>3</sup>村田忠喜著，任常毅摘译《1929年的毛泽东》，《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12期，第24-25页。

<sup>4</sup>《红四军前敌委员会关于开往潮梅一带游击情况的报告》（1929年10月18日于上杭），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4），第234页。

<sup>5</sup>《中共广东省委关于红四军工作意见给中央信》（1930年1月16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7），第32页。

此时毛泽东病情已经好转，11月26日在福建长汀与红四军会合。红四军28日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就准备召开第九次代表大会贯彻中央指示达成了共识。当日毛泽东心情愉快地致信党中央：“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sup>1</sup>

为了红四军党的九大能取得成功，前委做了深入细致的准备工作。12月上旬在连城新泉整训期间，毛泽东每天召集调查会，调查红四军存在的问题。“参加调查会的，有各纵队、大队、大队政委，连队支部书记和士兵。每次到会十余人，在一间民房的小厅里开会。”毛泽东“要求到会同志如实反映平日所见所闻的官兵思想情况，作为整顿军队的依据”。当时军队风气民主，官兵们“大胆发言，知啥说啥；说到好笑处，就哄堂大笑，无拘无束。记得罗荣桓和赖传珠同志反映的情况最多。罗荣桓同志平日很留心部队官兵的思想情况，经常作详细的笔记。调查会上，侃侃而谈。他把记录材料原原本本向毛委员反映，毛委员十分满意，时时微笑，向他点头，对他的关心部队政治情况表示嘉许。”<sup>2</sup>

由于敌情变化，红四军12月中旬转移到上杭古田。刚到古田，毛泽东就招集各级党代表开了准备会。赖传珠回忆：“开到古田的前一天，忽然接到通知，要我到军部开会。到了军部一看，各支队、纵队的党代表全到了。此外还有一部分大队的党代表”。毛泽东宣布“这次会议是为了彻底肃清四军党内存在着的各种不正确倾向”，接着“分组讨论。我参加了研究如何克服非组织观点的小组。”

“经过十多天的讨论，大家不但对错误思想的产生根源及其危害性取得了一致的认识，而且找到了纠正的方法。这次会议虽然才开了十多天，但是我却感觉到就像进了一次学校，各方面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回到十二大队之后，立即召开了支部委员会，传达了会议的精神”。<sup>3</sup>熊寿祺也谈到：“九次大会的各种提案都是在大会前由前委召集支队以上的书记、宣传、组织开会起草，前委审查以后提到大会的”。“这样一来，九次大会便有精神了，只开了两天，决定了很多的工作路线，绝不像八次大会时无组织状态的开了三天毫无结果。”<sup>4</sup>

<sup>1</sup>《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第26页。

<sup>2</sup>吴仁声：《古田会议前后散记》，《重评古田会议》，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第54-55页。

<sup>3</sup>赖传珠：《古田会议前后》，《重评古田会议》，第34-35页。

<sup>4</sup>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1930年5月），《党的文献》1999年第2期，第70页。

## （二）古田会议强化政治委员，但仍重视士兵委员会

由于中央的指示信和长达一个月的细致准备，红四军中关于重要问题已经基本统一了认识，接受了中央的指示，所以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古田会议”召开的时机已经成熟。实质工作在会前已经完成，会议本身只是形式上的认可，开了两天就顺利结束。会议决议案涉及了很多方面，但中心内容是关于权力结构的两个方面，这部分列在决议的前面：第一，红军权力应该集中；第二，权力应该集中于政治领导。

第一，红军应集中权力，决议是通过批评“极端民主化”来阐述的。决议指出：“红军党在接受中央指示之后，极端民主化的现象，确实减少了许多，例如党的决议之比较能够执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先交下级讨论，再由上级决议’等口号之没有人说了”。“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在于损伤以至完全破坏党的组织，削弱以至完全毁灭党的战斗力，使党担负不起斗争的责任，由此走到革命的失败”。“在组织上，厉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生活。其路线是：1、党的领导机关要有正确的指导路线，遇事要拿出办法，以建立领导的中枢。2、上级机关要明了下级机关的情况，及群众生活情况，成为正确指导的社会来源。3、党的各级机关决议事情，不要太随便。一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sup>1</sup>

第二，权力应集中于政治领导，也就是各级政治委员，是党指挥枪，不是党和枪平行，更不是枪指挥党。关于这一点，决议是通过批评“单纯军事观点”来阐述的。决议严厉批评“军事领导政治”的倾向，指出有些同志“承认军事政治二者的对立，不承认军事只是达到政治任务的工具之一。甚至还有说‘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的，则更进一步而承认军事是政治的领导了”，强调“离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政权等目标，就是完全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根本失去了红军存在的意义”。决议批评某些干部“把政治工作机关隶属于军事工作机关，提出‘司令部对外’的口号。这种路线发展下去，便有走到脱离群众、以军队垄断政权、离开阶级地位的危险，如像国民党军队所走的道路一样”。<sup>2</sup>在决议最后，硬性规定“军事机关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

---

<sup>1</sup>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81-82页。

<sup>2</sup>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78-79页。

副署”，<sup>1</sup>在制度上确立了政治领导的权威。

重新当选前委书记的毛泽东 1930 年 1 月 6 日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谈到：“十二月一个月前委的工作”是“召集九次大会接受中央的指示”；“用各种方法，建立红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倾向”。毛泽东欣慰地说：“此一月的光阴易过，红军在表面中在于政局没有惊人的动作，但于今后的斗争，却建立了基础。”

<sup>2</sup>中央 2 月 1 日给广东省委的信中也提到：“四军前委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前委一切问题已解决。润之来信很积极，发展方向他们亦接受中央指示”，“润之现已复职，中心的政治领导亦已确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sup>3</sup>

古田会议后政治委员的地位越来越高，以政治委员为中心集中权力成为红军的基本原则，这是党指挥枪的实际体现。中共中央 1930 年 3 月给鄂豫皖红军的指示信明确规定：“政治委员是代表政权与党两方面来领导军队的，政治委员在政治上、在党的立场上比军官权限大，即在军事上一切问题亦应得政治委员的副署。”<sup>4</sup>

当然，红军权力结构从分散到集中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古田会议虽然批评了极端民主化，但士兵权力和士兵委员会也受到重视。古田会议特别通过了保护士兵人身权力的《废止肉刑问题》决议，严厉批评“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这是红军最大的污点”，决议决定“由最高军政机关会衔发布废止肉刑的通令，并颁布新的红军惩罚条例”。<sup>5</sup>

《废止肉刑问题》决议明确规定了士兵委员会的监督权：“由士兵会召集士兵代表会议，除拥护这个改革，以后要自觉地遵守纪律外，并要森严群众的纪律制裁，以达到肉刑废止后的良好的收获”。<sup>6</sup>士兵委员会的监督权给军官不小的压

<sup>1</sup>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124 页。

<sup>2</sup> 《红四军前委员向中央的报告》（1930 年 1 月 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4），236 页。

<sup>3</sup> 《中央关于红四军问题给广东省委的指示信》（1930 年 2 月 1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14），第 238 页。

<sup>4</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 年 3 月 18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422 页。

<sup>5</sup>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117-118、120 页。

<sup>6</sup> 《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 年 12 月），《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120 页。

力。耿飚担任红三军九师教导队长兼指导员时，一名队员不但迟到，而且言语顶撞。年轻气盛的耿飚忍不住火，“顺手给了他一拳”，“这事成了士兵委员会的议题，他们当晚便召集了军人大会，对我实行‘弹劾’”，“士兵委员会事先显然做了准备，对‘民主’程序安排得很有板眼。先是轮流念《古田会议决议》、《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条文，每念一段，士兵委员会的主席就宣布‘耿飚同志’犯了第几条，并由大家举手认可”。“我犯的错误是‘军阀主义’、‘官长打士兵’和《八项注意》中‘不许打人骂人’的前半部。‘说话和气’一条，大家认为可以忽略不计。”最后，士兵委员会决定对耿飚罚款一元，这大约是半个月的零花钱，他在几十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教训。<sup>1</sup>古田会议后大约一年多的时间内，士兵委员会仍然有相当大的权力。

可以说，古田会议一方面在高层加强政治委员的集中领导权，同时在基层保障士兵的基本权力，从而压缩了中层干部的权力空间，改变了以往中层干部对上可以抗拒领导，对下可以打骂士兵的权力过大现象。中层干部的权力过大是造成部队组织松散的主要方面，普通士兵的的权力保障加强了士兵的忠诚，增加了红军的凝聚力，使得士兵能够对军官起到监督作用，所以红军中屡有叛变的干部，但是他们一般都无法拉走军队。

毛泽东有明显的平民倾向，对基层群众比较信任，而对中层干部和中间机构比较怀疑。他直到晚年仍对士兵委员会念念不忘，在文革前一年重上井冈山时忧虑地说：“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现在工厂的工会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王卓超回忆谈话情景时说：“那天下午，毛主席情绪激动，又有几分忧郁”，一直说了两个多小时。<sup>2</sup>由此可见，红军时期士兵委员会的经验与毛泽东在文革时期尝试群众性直接民主是有关联的。

---

<sup>1</sup> 耿飚：《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第 131-132 页。

<sup>2</sup> 马社香：《“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王卓超回忆 1965 年毛泽东在重上井冈山期间的一次谈话》，《党的文献》2006 年第 3 期，第 23-24 页。

## 五、政治委员与士兵委员会的消长——红军的权力集中趋势

### （一）共产国际指示强化政治委员，撤销士兵委员会

从 1929 年到 1930 年，国民党各派军队陷入持续混战，红军和苏区形势好转，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分散的游击队迅速整编为正规红军的大部队。1930 年夏天，中央要求红军中的党组织完全公开：“红军是中国革命主要动力之一，在目前猛烈扩大红军路线之下，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是保障中国革命胜利主要条件之一，因此党在红军中必须完全公开，改变过去秘密组织方式”。<sup>1</sup>党组织直接出面领导军队，士兵委员会等群众组织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1930 年 7 月中央第 147 号通知要求红军集中权力，这预示随着苏区政府的巩固和大规模战争的开始，红军建军初期权力分散阶段走向终结。“红色区域的军事政治指导机关，无疑要采用绝对的强有力的集中形式。这不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雏形，而且是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时期战争区域必然要采用的指挥形式”。

“红军本身的指导机关即由政委，党的书记，军事主管官三人组织军事政治苏维埃（即现在的前委），以政委为主席，决定一切工作。”通知明确批评极端民主化的危害：“小资产阶级分子，时常借口党内民主不够，要求扩大党内民主，主张无限制的实行自我批评”，“扩大无原则的斗争，这是极危险的危害党的倾向，在客观上必然走到瓦解党的道路”。<sup>2</sup>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苏联经验对中国红军建设影响很大。俄国 1917 年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通过士兵委员会瓦解了旧军队，但正式红军大规模建立之后，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建立了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也被逐渐取消。随着中国红军和苏区进入新发展阶段，共产国际也指示中共强化政治委员制度，逐步取消士兵委员会。马马耶夫 1930 年 4 月谈到中国红军时说：“我觉得，政治部和支部为士兵委员会制度所取代了”，“士兵委员会的职能不仅是管理方面的，士兵委员会还干预指挥员的任用。这是十分严重的弱点之一”。“政治委员的问题同样提得不突出、不明确，也就是说提得很不好。我不知道他们那里是否有政治委员。在毛泽东的军里有政治委员，但其他部队有无政治委员我不清楚”。

<sup>1</sup> 《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组织任务》（1930 年 7 月 22 日全国组织会议通过），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527 页。

<sup>2</sup> 《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1930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 178-179、188 页。

“我们应该告诉党，政治委员是一把指向指挥员太阳穴的手枪。政治委员是党和革命政权的代表”。“我毫不怀疑，士兵委员会作为瓦解敌军的手段是好的，但士兵委员会作为组建新红军的手段则不太好。”<sup>1</sup>马耶夫后来对蔡和森明确说：“是否需要士兵委员会？”，“在拥有坚强的党政机关的军队中，不要士兵委员会”。<sup>2</sup>

在 5 月下旬上海召开的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的指示已经传达，不过当时没有直接取消士兵委员会，而是先提出限制到连级以下。中共中央大概是吸收了各地红军代表的意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了渐进取消的政策。广东省委在会后给东江红军的信中提到：政治委员的职权比军长大，士兵委员会限制在连一级，“连以上如营、团、师、军等不用有兵士委员会之建立。”<sup>3</sup>

关于红军建设，共产国际 7 月 29 日给中共发出系统全面的指示信，其中特别强调政治委员制度。“作为党的代表的政治委员制度在军队中是与党组织平行存在并且高于这些组织之上的”。“团、师、军政治委员对于党支部和他下属的政治委员都具有上级党组织的一切权力，领导他们的党的工作，如果支部工作中出现反党倾向可以解散支部。”“政治部设有政治部主任，他完全服从该部队政治委员的领导。在战斗环境中，政治委员本人要最大限度地关注作战问题”。共产国际甚至认为，在极端情况下，政治委员有权处决同级指挥员：“政治委员作为党的代表与指挥员享有同等权力，他监督指挥员，使指挥员的作战行动符合革命的利益。一旦发现有叛变嫌疑，政治委员有权将指挥员交审判，如有明显的叛变行为，政治委员有权处决。指挥员的命令如无政治委员的签字和该部队加盖印章是无效的。”<sup>4</sup>

在指示信中，共产国际明确提出撤销士兵委员会。“如果说苏联组建红军时士兵委员会起了瓦解沙皇旧军队的作用，从而保证了尽快向建立红军的过渡，那么在中国军阀部队中士兵委员会也将起这样的作用。在中国组建红军的情况下，士兵委员会起着政治上团结军队中普通士兵、提高他们阶级觉悟的作用。但是，由于这样的委员会与党组织平行存在，他们试图履行监督、指挥和进行政治工作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第 14 号记录》（1930 年 4 月 1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115-117 页。

<sup>2</sup> 《马耶夫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1 年 1 月 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0 页。

<sup>3</sup> 《中共广东省委、中央军部南方办事处给东江、惠属两特委及十一军、十二军军委信》（1930 年 6 月 15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8），第 61 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 年 7 月 2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38-239 页。

的任务，所以它们隐藏着最坏意义上的‘委员会至上’的因素，潜伏着士兵委员会对抗党组织的危险。这就是为什么党在开始时保留士兵委员会”，“而以后党的任务是彻底撤销士兵委员会。”<sup>1</sup>

## （二）六届三中全会后，政委获得最后决定权，士兵委员会走向消亡

周恩来和瞿秋白从苏联回国后，1930年9月下旬主持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强调提高政治委员权威，取消士兵委员会。周恩来在9月30日关于红军问题的报告中说：“过去对政治委员的职权不提高，政治委员等于虚设或只做政治工作，这样决不能建立政治委员的威信”。“提高政治委员的权威，建立政治委员的制度，巩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红军中只容许党在政治上之唯一的领导，故政治委员的作用是异常大的”。周恩来也传达了取消士兵委员会的指示：“士兵委员会要把上层组织完全取消，连的兵委组织要逐渐减少它的职权，一直做到取消。”<sup>2</sup>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是共产国际指示的具体落实，政治委员的权力得到强化，士兵委员会走向消亡：“党在红军中的领导，要提到最高度”，“首先便是政治委员应有的权限要完全实现起来，他要成为一军的主干，他有监督军事指挥员的权力，他有管理政治部与指导党的组织的权力。过去有不少红军对于政治委员的职权还不甚予以尊重，甚至还有因袭国民党的残余习惯，视政治委员为无足轻重的，这是最不应容许的事。原有士兵委员会的组织，要使他的权限逐渐缩小一直做到消灭。”<sup>3</sup>

在《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草案》中，政治委员获得了超越同级军事长官、凌驾集体领导的最后决定权：“政治委员不仅是苏维埃政权在红军中的政治代表，而同时是中国共产党在红军中的全权代表。他是代表政权及党的双重意义，执行党在红军政治路线及纪律的完全负责者。”“政治委员有监督一切军事行动、军事行政的权力。”“政治委员在与同级军事指挥员有争持时，政治委员有停止军事指挥员命令之权”，“在未得上级指示以前，须依照政治委员的意见执行”。“在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就红军建设和游击运动问题给中共中央的指示信》（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39-240页。

<sup>2</sup>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540页。

<sup>3</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61页。

发现该部一切人员（由同级军事指挥员以至战斗员）有反革命或以破坏军队组织为目的的行动时，政治委员有执行革命法律之权”。<sup>1</sup>据曾任七军政治委员的龚楚说，情况紧急时下级政委甚至有权处决上级军官：“如同级指挥员有背叛革命行动时，政委有将之逮捕之权，甚至因情况紧急，不及逮捕时得指令特务员枪杀指揮员之权，甚至下级政委对上级指挥员亦有权指令特务人员捕杀之”。<sup>2</sup>

到这个阶段，政治委员毛泽东已经不再和朱德平起平坐，取得了明显优势地位。据富田事变后到上海报告的段良弼说：“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sup>3</sup>朱德曾向彭德怀、黄公略等指挥员抱怨说，他“没有任何权力，毛泽东不拿他当回事，他什么事也干不了。”

<sup>4</sup>段良弼的报告是夸大的，但也不完全是虚构。

不过当时各地红军与中央联络困难，独立性仍比较强，中央政策的传达需要一定时间，红军的士兵委员会在 1930 年仍有很大权力。王平回忆，在 8 月下旬一、三军团会合后讨论第二次进攻长沙时，士兵委员会仍然很活跃：“那时，部队军事民主比较好，各连都有士兵委员会。各级领导的作战意图都向士兵委员会公开，有时还听取他们的意见。我当时是机枪连士兵委员会委员长，听到传达彭德怀、滕代远不同意打长沙的意见。士兵委员会权力很大，在连队对干部还有监督权，甚至可以提出意见罢免连排长。”<sup>5</sup>

1931 年初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央着手推动在各地红军贯彻新方针。1 月 29 日《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提出：“兵委的组织要从他的权限缩小直做到完全消灭为止，团营以上的兵委，现在便应取消。十军现在已进到大规模的红军组织了，故兵委的存在，多少总要妨碍集中制的执行，为战争的利益，应将它取消而更提高党的威权。”<sup>6</sup>3 月 10 日《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要求“政治委员的领导在红军中必须提高起来，他要成为监督行政代表党指导政治工作的中心人物”，<sup>7</sup>3 月 30 日皖西教导二师报告也提到：“在政治工作人员联席会议上，决定将士兵

<sup>1</sup> 《中国工农红军政治工作暂行草案》（1930 年），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02-603 页。

<sup>2</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399 页。

<sup>3</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 年 2 月 1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62 页。

<sup>4</sup> 《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秦邦宪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1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76 页。

<sup>5</sup> 王平：《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23-24 页。

<sup>6</sup> 《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1931 年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111 页。

<sup>7</sup> 《中央给湘鄂西特委信》（1931 年 3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181 页。

委员会改为红色战士委员会，渐次缩小其职权”。<sup>1</sup>

从共产国际指示到中共中央决议，再到各地红军落实，用了一年多时间，耿飚被士兵委员会罚款事件发生在 1931 年上半年，另据十二军干部张南生的日记，他所在部队 5 月 6 日还改选过士兵委员会。<sup>2</sup>欧阳钦在报告中谈到，他 7 月 20 日离开中央苏区前连级还有士兵会：“士兵会（现在叫做士兵会）现在仍有，以连的单位组织，没有上层机关，在政治委员领导下工作，他们的工作审查经济文化运动——识字壁报娱乐等，参加区中工作及帮助维持军风纪等，但对于军事行（动）则不干预。”<sup>3</sup>可见，此时中央苏区的士兵委员会已经取消了军、师、团、营级组织，只保留连级以下机构，职权也大大压缩了。

在这个时期，红军的政治气氛也发生了很大变化，1930 年 12 月毛泽东领导了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1931 年上半年中央派来的邓发、左权等在闽西红军也大规模肃反。中央苏区前后有数千人被捕被杀，未被牵连的人也谨言慎行，不敢再轻易批评上级，红军建军初期的宽松环境已不复存在，取消士兵委员会并未遇到太大的阻力。大致是在 1931 年下半年以后，除了在新建红军或国民党军起义部队（如宁都起义），红军中一般不再建立士兵委员会，以前建立的士兵委员会也逐步取消，由政治部、列宁室等机构替代其职能，<sup>4</sup>政治委员集权制从此确立为红军的核心制度。

## 六、小结

中国共产党在南昌起义初创军队，但来不及改造国民党军队的传统，起义军缺乏严密组织和精神力量，在优势敌军的围攻之下难以生存，潮汕溃败是难以避

<sup>1</sup> 《皖西教导二师编组与部队素质等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3 月 30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69 页。

<sup>2</sup> 张南生：《一个红军战士的日记》，《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20 页。

<sup>3</sup>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373-374 页。

<sup>4</sup> 鄂豫皖红军的红色战士会至少保留到 1933 年，在 7 月 2 日中央代表邵达夫向鄂豫皖省委、红军师级干部沈泽民等传达中央指示时，省委干部都反对取消红色战士会，见《邵达夫给中央的报告》（1933 年 7 月），《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359 页。1932 年 1 月 3 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曾翻印《中国工农红军士兵会章程》，知否仅限于教学不可知，此处存疑，见《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0），第 1046 页。解放战争时期，连队士兵委员会在 1947-1948 年新式整军运动中恢复，1949 年定名为革命军人委员会。

免的。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余部的改造才是红军——这一新式军队诞生的关键，在毛泽东、朱德、陈毅、叶镛等红军领导人的艰苦探索中，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导下，红军树立了宏大的政治理想，建立起高度民主的权力结构，各级党委实行集体领导，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平等分权，士兵拥有权力很大的士兵委员会，军队中重大决策要经过党的代表大会。在这种民主气氛中，干部、战士焕发了主动精神，被塑造成有信仰、有尊严的革命者，以党代表、党委、党支部为主体的政工制度则是红军的灵魂，使红军有能力在极端险恶的斗争中生存下来，并抓住有利时机迅猛地发展壮大。

但民主分权结构在严酷的斗争中也暴露出决策困难、迎合群众意识等弊端，并造成了惨重损失。1929年，红四军领导人朱德、毛泽东等在红军的建军原则上发生重大分歧，毛泽东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坚持民主分权。在红四军七大的民主讨论中，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离开红军。同一时期中共各级组织中普遍发生了极端民主化的问题，常常造成组织的瘫痪甚至分裂，以周恩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认识到了这一问题，在朱毛之争中强力支持毛泽东。1929年底召开的古田会议是红军走向集中权力结构的关键一步，而政治委员制度的贯彻意味着权力逐步集中于政治领导人，“党指挥枪”的原则在这种体制之下大大强化，但士兵委员会仍受到尊重。

1930年以后，随着苏区政权巩固和红军规模扩大，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强化政治委员制度，取消士兵委员会。政治委员集权的趋势不断加强，直至取得了凌驾集体领导的“最后决定权”，这一过程中有时甚至引发激烈党内斗争和代价高昂的肃反。红军终于被打造成一支高度集中统一、拥有铁的纪律和强大精神力量的军队，这支军队最终决定了中国的命运。

然而，在革命战争中形成的高度集中的权力机构，却给建国后的和平年代埋下了隐患。在民主集中制中，民主和集中的平衡应随形势的变化而调整。在残酷的战争年代，偏于集中是险恶环境中必需的；到了和平建设年代，过度集中就未必适合了，最终导致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的灾难。对中共历史上民主与集中复杂关系的深入研究，可以为现代中国提供宝贵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和深化中国人的政治智慧。

## 第五章 红军崛起与革命重心向苏区转移

1927年下半年，中共在各地发起大规模武装暴动，创建了红军。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失败之后，共产国际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的第一个高潮已经过去，进入了类似俄国1905年到1917年的十二年沉闷期。布哈林认为，在这个时期中共的主要工作是耐心争取群众、发展组织，等待下一个高潮。此时红军即使可以在偏僻山区勉强生存，也很难有大的发展，这是1928年2月共产国际九次全会到6月中共六大的主流观点。<sup>1</sup>

斯大林虽然比布哈林更重视红军，但也认为近期很难建立政权。他在六大前接见周恩来、瞿秋白等中共领导人时说：“俄国1905年以后，农民运动也有发展，可是整个说来，它没能动摇政权”，“只有当我们开始攻占最重要的城市的时候，才能够说，革命运动处于高潮”。“农民运动最重要的结果，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最重要的是争取那些参加战斗的人们来建立人数众多的红军。在目前时期，在总的领导革命的事业中，这是最主要的问题。”<sup>2</sup>“农民游击战争是农民革命行动的宣传。过去有的，将来也是有的。是不是它们可以取得一省政权？不可能的。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sup>3</sup>可见，斯大林对红军的重要性有深刻认识，但认为短期内还难有大的作为。

布哈林是中共六大的实际领导者，他更重视群众运动，而不是红军，他与斯大林的差别在1926年11月共产国际七次全会就有所表现。布哈林在六大政治报告中说，“在这一个阶段上，我们已经被打伤了，失败了”，应当休养生息，暂时退守，“聚集自己的力量，整顿我们的队伍”，他要求红军分散成小的游击队，流动作战，不要集中在一个地方，成为农民的经济负担，把“最后一个老母鸡吃了”。<sup>4</sup>1928年底到1929年初，各地红军在敌军围攻中处境艰难，似乎印证了布

<sup>1</sup> 九次全会还承认中国城市和农村革命不平衡，农村有发展，城市严重挫折，对红军前途更乐观一些。六大总体更悲观，所以周恩来后来认为六大比九次全会有后退，主持六大的布哈林不如斯大林。

<sup>2</sup> 《斯大林同志同中共代表瞿秋白、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谈中国革命问题》（1928年6月9日），《党的文献》1988年1期，第3-6页。这个记录与周恩来的记录大体一致，内容和词句略有差别。

<sup>3</sup>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1928年6月9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7），第479页。

<sup>4</sup> 布哈林：《国际代表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关于政治报告的结论》（1928年7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11），第183、180页。

哈林的看法，所以中共中央发出“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贺龙等著名红军领导人离开军队，把红军分散成小的游击队。

但中国革命发展却出乎共产国际的预料，毛泽东、彭德怀、贺龙等红军领导人一致对“二月来信”提出异议，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红军的形势大为好转。红四军在赣南和闽西开辟出大片新的苏区，初步奠定了中央苏区的规模，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年底广西百色起义之后又建立起红七军。红军成长为中共组织中最有力的部分，对全国政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毛泽东在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建设农村革命政权、逐级扩大红军、波浪式扩大，甚至要一年夺取江西，这已经包含了“农村包围城市”的基本要素，是与俄国革命完全不同的战略，显示出中国革命已经在实践中逐渐探索出新道路。斯大林在1930年夏天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在7月共产国际新决议中要求中共把苏区和红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实行从城市到农村的战略转变。斯大林的认识比毛泽东晚半年，在周恩来回国之前，他当面叮嘱要把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的第一位。<sup>1</sup>六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逐步实行从城市向农村苏区的战略转移，这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影响深远。

## 一、红军在组织中地位演变与中国革命新道路

红军是中共在1927年武装暴动中创造的新生事物，对中共组织产生了强烈冲击，各级党组织与红军之间出现了各种矛盾冲突，最终红军在中共组织中的位置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同时，红军在组织建设上的探索也为中共组织成长做出了重要贡献。

### （一）红军初建，活动于偏远农村，定位模糊

在与国民党左派的最后合作中，中共掌握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一些部队，并利用这些军队为骨干，先后发动了1927年8月南昌起义、9月秋收起义和12月广州起义。这些起义虽然先后失败，但起义军余部撤退到农村地区继续斗争，

<sup>1</sup>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83页。

创建了最初的红军。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军 25 师余部撤往湘南，董朗率领南昌起义军 24 师余部撤往海陆丰，毛泽东率领湖南秋收起义余部撤往江西宁冈井冈山，叶镛、徐向前率领广州起义余部撤往海陆丰，这四支军队是最早的主力红军。

在农民运动势力强大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等地，地方党组织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农民暴动，参加的农民动辄数万，组建了相当规模的农民自卫军。这些暴动也在国民党军队的镇压中先后失败，国民党军和地主武装严厉清乡，到处追杀农运干部和革命农民，很多人被迫逃亡深山，但仍然伺机反攻，有时深夜回乡杀戮地主，有时袭击民团夺取枪支，他们成长为大大小小的红色游击队。

红军选择的落脚点多是受农运影响的地区，红军与农运相结合，形成了中共最早的农村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海陆丰是第一个苏区，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两支余部汇聚于此，结合澎湃经营多年的乡村势力，本来实力最强，但是由于地形不利和军事策略失误，很快在强敌进攻中失败。朱德领导的红军发动湘南起义后在当地难以立足，1928 年 4 月撤往井冈山与毛泽东部会合，后又会合彭德怀部和赣南红军，开辟了中央苏区。鄂豫皖几支红色游击队在中央派来的徐向前、许继慎、曾中生等领导下，整编成红军，开创了鄂豫皖苏区。贺龙、周逸群受中央委派到湘鄂西，召集旧部，整编游击队，开创了湘鄂西苏区。三大苏区之外，还有方志敏开创的赣东北苏区、百色起义后开创的左右江苏区等一些小的苏区。

1928 年夏天，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中共通过代表大会重建了中央机构。但六大仍以城市工人运动为中心，对红军和苏区并不重视，加上工人干部替换知识分子的倾向，选举产生的新中央领导中工人显著增加，向忠发成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在这一时期，中共组织实际上分成了两个部分：在城市，中共中央以上海租界为基地，努力恢复城市工人运动，但频频遭遇挫折，各地城市组织经常被国民党破获，工作难以开展；在农村，红军和苏区虽然也屡遭挫折，却获得了长足发展，积累了很多成功经验。城市的中央与各苏区红军联系时断时续，中央难以了解各苏区的情况，红军也难以得到中央的指示。

红军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革命的核心力量，但最初无论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各级组织、还是红军领导人自己，都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此时红军在中共组

织中的定位不明确，红军在革命中将发挥怎样作用也不清楚，甚至长于战略思维的毛泽东对红军前途的认识也很模糊。在毛泽东 1928 年 11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有这样的感叹：“我们一年转战各地的经验，深感全国革命潮流之低落。一方面有少数小块地方建设了赤色政权，一方面全国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权”，“红军每到一地，冷冷清清的”。“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与完成，乃是必经的道路。”<sup>1</sup>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虽然毛泽东在一年多农村武装斗争中，创造出一套建设红军、建设根据地的独特方法，自信红军和小块区域红色政权可以生存，不易被敌人消灭。但他当时也没有看清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远大前途，并没有把红军看成中国革命的决定性力量，仍寄希望于城市民权运动的高涨，希望在全国沸腾的民权革命中，结束连报纸都看不到的寂寞农村游击生活。

## （二）与地方组织关系不顺，红军常遭受损失

红军在建立初期，与中央的关系、与省委的关系、与地方组织的关系都没有理顺，甚至可以说矛盾重重。有时中央、省委、地方组织给红军带来很大帮助，有时也带来很大麻烦。中共组织体系对容纳红军这个新生事物没有经验，在不断的磕磕碰碰中，红军的重要性才显现出来。

初创时期的红军几乎游离于组织之外，与中央、省委和地方组织的联系都不紧密。红军常遭优势敌军围攻，不得不四处游击，党组织找到红军都很困难。从 1927 年秋天到 1928 年夏天几个月里，中央与各地红军之间没有建立有效联系，有的红军队伍最少时只剩几百人，甚至几十人，在偏僻山区孤独奋斗，各自为战。中央既无法了解红军的情况，也无法将指示送达。1927 年 12 月中央给朱德的信提到：“自从三河坝与潮州的交通被敌人切断后，党的指导机关即与二十五师全体同志失了联络。潮州失守后，省委曾两次派人追赶到你们，及你们退武平，转入江西信丰时，江西省委又派人前往接洽，最后知道你们已越大庾岭而入湖南，中央乃又命湖南省委派人与你们接洽。但一切都是徒劳，始终未得赶着你们。现

<sup>1</sup>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 年 11 月 25 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59 页。

时你们的踪迹，但从报纸上的记载和辗转传来的消息，似乎正驻扎在桂东和桂阳一带，惟仍未能证实”。<sup>1</sup>

江西省委于 1928 年春天与朱毛红军建立了联系，决定成立赣西南特委，让毛泽东当书记，以便于省委指挥红军。但由于“军队关系是流动的性质”，特委不能跟着流动，又决定改为其他人。但毛泽东却来信要求组织前敌特委，以便红军指挥地方组织。省委拒绝了这个要求，认为“没有组织的必要，一切的工作可委军委以负担”。<sup>2</sup>可见，江西省委与红军在建立联系的最初阶段，就在权力划分上出现了分歧。

中央领导人通过江西省委得知朱毛两部会合后很高兴，于 1928 年 6 月写信给红四军：“现在党内的情形的确已有很大的变化”，“同时全国政治也有很多的变化，只可惜这些材料不能达到你们，以前中央虽曾派人来找你们，但以交通的关系而终无一次能与你们接头，以致中央和你们彼此间的意见互不能达到。这次由江西省委转来你们的信知道你们的近况中央甚为欣慰！”<sup>3</sup>直到 1929 年 3 月，中央与湘鄂西的联系仍很困难，中央知道贺龙那里缺少干部，想多派军事人才过去，但是“因为交通的阻碍，你们的驻防地又无一定，所以尚未派人去。”<sup>4</sup>

当红军和党组织建立起联系时，有时却带来麻烦。红军往往活动在国民党控制薄弱的各省边界三不管地区，几省省委都想指挥，往往形成多头领导的矛盾。这从各个苏区的名称就能看出来：湘赣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湘鄂赣苏区等等。井冈山根据地在毛泽东的报告里一般叫“湘赣边界”，横跨湖南、江西两省。1928 年 5 月，湖南省委发来指示，要求井冈山红军受湖南省委指挥：“兄处即成立军事委员会，指挥所属一切部队。委员会主席指定为润之同志，由七人组织，人选由兄处决定报告省委”，“军委在党的方面，是最高的军事组织，暂时受湖南省委指挥”。<sup>5</sup>

6 月中央又发来指示，要求井冈山同时受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指挥：“如前委

<sup>1</sup> 《中共中央给朱德并转军中全体同志的信》（1927 年 12 月 21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31 页。

<sup>2</sup> 《中共江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28 年 5 月 10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第 248、253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致朱德、毛泽东并前委信》（1928 年 6 月 4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5 页。

<sup>4</sup> 《中共中央给贺龙及湘鄂西前委的指示信》（1929 年 3 月 17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193 页。

<sup>5</sup> 《湖南省委来信》（1928 年 5 月），《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 106 页。

在江西境内时受江西省委指导，在湖南境内时受湖南省委指导，同时与两个省委发生密切关系”，“前委每十天须送一报告到两省委的接头处”。<sup>1</sup>毛泽东在给两省省委的信中说：“吉安来信，始知江西省委已批准湘赣特委之组织（茶陵、攸县、酃县、宁冈、莲花、永新、遂川），批准于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召集各县代表大会”，“两省委及中央之派人即可召集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sup>2</sup>井冈山根据地上述七县，茶陵、攸县、酃县属于湖南，宁冈、莲花、永新、遂川属于江西，湘赣边界特委既要受湖南省委领导，又要受江西省委领导。

但是，省委的指示常常是脱离实际的，有时甚至是荒谬的。湖南省委对武装斗争毫无经验，一系列脱离实际的指示给红军带来很大损失。1928年6月26日，湖南省委给井冈山发了两封指示信，给四军军委的信要求“毫不犹疑的立即执行！”“先解决永新之敌军，然后再杀出一条血路，向湘南资兴，耒阳，永兴，郴州发展”，并且异想天开地认为到了湘南“四军可立即扩充到十二团”。<sup>3</sup>同日给湘赣边特委的信也要求“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sup>4</sup>

毛泽东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信中愤怒地说：湖南省委对井冈山的指示，“六七月间数星期内，曾三变其主张。第一次袁德生送信来，赞成中段政权计划。第二次杜修经、杨开明送信来，主张红军毫不犹豫的向湘南发展，只留二百枝枪会同赤卫队保卫边界，并谓是‘绝对正确’的政策。第三次袁德生又来，相隔不过十天，这次信上除骂了我们一大篇外，却主张红军向湘东去，亦谓是‘绝对正确’的政策，而且亦要我们‘毫不犹豫’。我们接受了这样硬性的指示，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当第二次信到时，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认为往湘南危险，决定不执行省委的意见。乃数天之后，却由杜修经、杨开明坚持省委意见，利用了第二十九团的乡土观念，二十九团乃以省委命令为借口，把红军拉攻郴州，致边界和红军一齐失败。红军战斗力约损失一半，边界则被焚之屋、被杀之人不可胜数，各县相继失陷，至今未能完全恢复。”<sup>5</sup>

<sup>1</sup> 《中央给前敌委员会的信》（1928年6月4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第121页。

<sup>2</sup> 《毛泽东给湖南江西省委转中央的信》（1928年6月16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5页。

<sup>3</sup> 《中共湖南省委给红四军军委的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6），第68、69页。

<sup>4</sup> 《中共湖南省委给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6），第67页。

<sup>5</sup> 毛泽东：《井冈山前委对中央的报告》（1928年11月25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62页。

毛泽东能力强、在党内地位也高，对省委的瞎指挥很不满，不过当领导人能力较弱时，却对根据地没有明确主管感到困惑。1929年8月邓乾元在报告中抱怨：“一年来边界党成了共产党不要的儿子，简直没有人来照顾，虽然此一区的工作与湘赣两省都有不可脱的关系，但必须确定究竟谁是湘赣边界特委的主管者，以免再成为边界独立党。”<sup>1</sup>

地方党组织常常不考虑红军实力有限，希望红军冒险进攻城镇，赤卫队和群众跟着进城捉地主、收获战利品，导致彭德怀几次吃了大亏，差点全军覆没，他对地方党组织的火气比毛泽东还要大。彭德怀在报告中说：“五军失败中所得所见的最大教训”之一，“是地方主义，足令红军有瓦解的危险”。1928年8月1日“第一次地方党部请求进攻长寿街”，“令赤卫队瞒没敌人之数量，说敌只有二三百人，待接触时已有朱耀华三团之众，这次被打得落花流水，几难收拾！而平东的党不但不将散兵收集，反将散兵的枪支缴了，反令赤卫队将士兵暗杀，希图扩大赤卫队的武装组织。同时地方同志有在红军里拖枪一杆回县者，党部即赏洋一元，因此使红军里的士兵对工农怀疑和怨恨！”8月15日“第二次进攻长寿街”，“受黄金洞（平江东部）党部请求，说敌不过一营，待接触后乃知有陈光中之一师，是役损失几使全军覆没到尽”。“这些事实都是证明当时地方党部并没有把帮助红军行动看成是自己的责任和自己的工作”，“不仅有害于红军，同时有害于党。”<sup>2</sup>

### （三）红军不同意中央“二月来信”，毛泽东提出革命新战略

毛泽东对红军受地方组织制约很不满，提出主力红军应由中央直接指挥，他在1929年4月给中央的信中说：“超地方性质的红军，不但不宜受县委与特委的指挥，并不宜限定受某一省委指挥。五军在平浏，四军在湘南及湘赣边界多次的失败在地方主义指挥之下。超地方的红军必须在中央直接指挥之下，才能适合革命环境的需要，而不受地方主义的累害。”<sup>3</sup>

当时各省省委非常薄弱，往往就是几个人住在城市，深居简出，靠中央汇款

<sup>1</sup> 邓乾元：《湘赣边界五月至八月工作报告》（1929年8月），《湘赣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sup>2</sup> 彭德怀：《关于平江暴动前后情况和经验教训》（1929年10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309页。

<sup>3</sup>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4月5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61页。

勉强生存，在白色恐怖下难以开展工作，经常被军警破获，不断有人牺牲和叛变。这样的省委机关没有能力领导红军，其主要作用就是在中央和红军之间传递消息。潘心源 1929 年 7 月要求改组湖南省委时说：“现在的省委，算不到一级政治的组织，只能说是由中央到各地方党部中间之一个交通机关，或者还不能算是一个好的交通机关，因为许多国际及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有时不能达到下级党部”。<sup>1</sup>

红军领导人很盼望和中央建立联系，把红军的情况报告中央，同时得到外部信息和中央指示。毛泽东在 1929 年 4 月信中提到：“从去年八月起共有三个报告给中央，一个是去年八月毛泽东在边界失败时写的一封长信，讨论割据问题及湖南省委的政策，由湖南省委转中央”，“一个是去年十一月起接到中央六月来信红军须重回湘赣边界时前委做的一个报告，历史的叙述湘赣边界斗争的经过及割据问题政策计划等，由湘赣二省委附上”。“以上两重要报告，中央一个也未收到，无怪对我们情形完全隔膜了”。“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在湘赣边界时因敌人的封锁，曾二三个月看不到报纸，去年九月以后可以到吉安、长沙买报了，然亦得到很难，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路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我们亦至少每月给中央一信报告。”<sup>2</sup>

但是，当红四军在 1929 年春攻占闽西，与中央建立起直接联系时，中央“二月来信”却让红军分散成小部队，毛泽东、朱德离开红军。在 4 月 5 日回信中，毛泽东直率提出不同意见：“我们感觉党在从前犯了盲动主义极大的错误，现时却在一些地方颇有取消主义的倾向了”。“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前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都是失败的。因为：（一）红军不是本地人”；“（二）分开则领导机关不健全，恶劣环境中应付不来，容易失败。（三）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五军在平浏，四军在边界，在湘南因分兵而被敌人击破者共有五次之多。（四）愈是恶劣环境，部队愈须集中，领导者愈须坚强奋斗”，“只有在好的环境里才好分兵游击，领导者也不如在恶劣环境时刻不能离。”<sup>3</sup>

<sup>1</sup> 《潘心元致中央组织部信》（1929 年 7 月），《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 206 页。

<sup>2</sup>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61-62 页。

<sup>3</sup>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55-56 页。

彭德怀也认为中央指示不妥，他在 4 月 4 日信中说：“在反革命高潮时不宜分兵。分则气虚胆小，以致卖枪脱逃；因红军不是本地人，又不全是好党员，即平日是好党员，到危急时也有许多不坚决的。领导人能力亦大有关系，有些同志是忠实的，但到了紧急时想不出办法，以致被消灭。这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严重时期，只有领导者下决心与群众同辛苦，同生死，集中力量作盘旋式的游击，才能度过难关，万万不能取藏匿躲避政策，否则就立刻上了消灭之途。”<sup>1</sup>毛泽东和彭德怀当时都在江西瑞金，他们给中央回信的时间只差一天，应该是事先经过讨论达成一致的。

贺龙在湘鄂西接到内容相同的中央指示信，独立提出了相似的反对意见。他在 4 月 17 日给中央回信中说：“关于中央指示的：(A) 中央要我们把红军分散成为数十人一队之队伍，因此间环境关系及同志缺乏单独带队的经验，暂难办到”。  
“(B) 云卿同志（即贺龙）因红军无人负责及路途阻隔之故，暂难去中央工作，这并不是云卿不愿意去沪，而是实际的困难。”<sup>2</sup>

党指挥枪是红军的基本原则，毛泽东虽明确提出不同意见，但对中央关于他个人的安排却表示服从，并欢迎中央派人来视察，以此表示红军是党的军队，而不是个人的军队。毛泽东说：“现在党的指导机关是前委，毛泽东为书记，军事指挥机关是军司令部，朱德为军长。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的意见，刘伯承同志可以任军事，恽代英同志可以任党及政治，两人如能派来，那是胜过我们的。中央去年六月来信说派贺昌同志来视察，不知为何没有来，现在从福建来交通极便，以后务望随时派人来视察。”<sup>3</sup>彭德怀、贺龙直言不能离开红军，而毛泽东虽不同意分散红军的政策，但表示个人服从中央安排，说明他对列宁主义革命党的组织原则有更深的理解。

中央对红军情况了解不多，没有固执己见，接受了几位红军领导人的意见，同意红军脱离地方组织领导，由中央直接指挥，也不再要求红军分散、领导人离队。周恩来后来说：二月指示信“朱德、毛泽东同志不同意。后来蒋桂战争起来了，我们觉得红军有可能发展，就作罢了”。<sup>4</sup>湖南省委也不再要求指挥红军，在

<sup>1</sup> 《彭德怀给党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4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195 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前敌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4 月 17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206 页。

<sup>3</sup> 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 年 4 月 5 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第 57 页。

<sup>4</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

1929年9月决议中规定：“五军军委归中央直接指挥，湘赣两省委派负指导之上的责任，将来五军在湘赣边界特委所管辖的区域工作时，湘赣边界特委得派三个在五军会议席上有表决权之代表，参加五军各种工作及行动上的计划讨论及决定”。<sup>1</sup>这说明，红军的经验和实力逐渐得到了中央和省委的认可，省委已经接受和红军的平行关系，红军在党组织中的地位越来越高。

周恩来、李立三、陈毅共同讨论定稿的1929年9月中央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说：“红军存在于反动政局走向崩溃及土地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中国的地势广阔也是一个条件，从你们过去的艰苦经验中就可以证明。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sup>2</sup>“九月来信”中的这一段主要是肯定红军可以生存，反对取消观念，类似毛泽东1928年10月在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中的意思，这个决议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就定名为《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九月来信”比毛泽东一年前起草的决议更进了一步，提到红四军经验证明农村红军能建立城市政权，但当时红四军经验中的所谓城市政权也只是长汀、瑞金等小县城的政权，中共中央仍没有把红军看成决定革命前途的主导力量。

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人对红军及农村根据地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周恩来对这个过程有清晰的回顾。六大时，“布哈林对中国苏维埃、红军运动的估计是悲观的。他认为只能分散存在，如果集中，则会妨害老百姓利益，会把他们最后一只老母鸡吃掉，老百姓是不会满意的。他要高级干部离开红军，比方说，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去学习。所以我们回国后就指示要调朱德、毛泽东同志离开红军”。毛泽东在1928年“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工作作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1930年1月“给林彪的信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斯大林比毛泽东晚了半年，“他把中国红军问题放在中国革命问题的第一位，不是在一九二八年，而是在一九三〇年红

---

料选辑》(11)，第244页。

<sup>1</sup> 《湘赣边界目前工作任务决议案》(1929年9月6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69页。

<sup>2</sup>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1929年9月28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军打长沙的前夜，这是接受了一九二九年红军发展的经验。”<sup>1</sup>周恩来的叙述揭示了红军、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三个层次的互动，展现出中国革命在这种互动中从积累经验到战略转变的过程。

毛泽东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实际开创者，他总结红军和苏区两年多来发展的经验，在 1930 年 1 月 5 日给林彪的信中，明确提出了与苏联道路不同的全新革命战略。毛泽东批评林彪“认为在距离革命高潮尚远的时期做建立政权的艰苦工作为徒劳，而有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政治影响，等到全国各地争取群众的工作做好了”，“来一个全国暴动，那时把红军的力量加上去，就成为全国形势的大革命。你的这种全国范围、包括一切地方的、先争取群众后建立政权的理论，我觉得是于中国革命不适合的。”毛泽东批评的这种战略，其实就是斯大林、布哈林原来设想的类似俄国十月革命式的道路。毛泽东在实际经验中总结出了全新的战略，即“朱毛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的建设政权的”，“扩大武装组织从乡暴动队、区赤卫大队、县赤卫总队、地方红军以至于超地方红军的，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扩大的政策”。<sup>2</sup>这已经包含了“农村包围城市”战略的基本要素，显示出毛泽东确实是中国革命实际斗争中产生的杰出战略家。而斯大林远在莫斯科，在 1930 年夏天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放弃了自己原来的想法，指导中共实行战略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推进发挥了重要作用。

## 二、革命形势好转，红军集中整编，从边缘走向中心

从 1929 年开始，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产生了乐观情绪，认为革命高潮将要再起，但城市工人运动仍是关注重点。9 月 25 日，苏联《真理报》发表了《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的社论，提到“1928 年中国参加罢工的总人数也至少有四十万人。对于革命失败后工人运动处于低潮的中国来说，这个数字毫无疑问是具有极其重要的象征意义的”。“1929 年头几个月上海码头工人举行了罢工，天

<sup>1</sup>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 244、240、241 页。

<sup>2</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 年 1 月 5 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 128-129 页。

津、香港的铁路员工举行了罢工，天津和上海的电车工人、发电厂工人、矿业工人、纺织工人以及缝纫工、店员也举行了罢工。”社论最后认为：“这些事实确实证明，出现这种巨大高潮的前提条件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形成。转折的时刻已经到来。”<sup>1</sup>

1929年10月，共产国际致信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中国各省群众的农民土地运动，一般的是在生长，以及苏维埃区域保存着，而且最近更在扩大并巩固起来，南方有着不断的游击战争——这都成为革命潮流之中的一个支流，顺着这个支流，将要生长成为全国革命运动将来强有力的高度”。“共产党如果不在自己队伍里面，战胜一切种种小资产阶级的动摇，那就不能执行发动，组织和领导新的革命高潮的作用。”<sup>2</sup>很明显，共产国际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已经好转，正在从退守时期转入进攻时期。

从1929年春到1930年，国民党连续发生派系战争，南京政府遭遇严重危机。中共中央也认为中国革命在复兴之中，而且对在农村发展壮大的红军越来越重视。为了加强对红军的领导，让红军承担更重要的任务，中央着手把分散的游击队集中整编成主力红军。但李立三、向忠发等整编红军的目的是进攻大城市，而不是巩固发展农村根据地，甚至由于把游击队都编入红军，脱离苏区向外进攻，从而削弱了苏区武装，导致地主武装乘机反扑，这时中共中央在战略上还是城市中心论，但红军日益成为革命的主力。

### （一）中共中央强力推动红军集中整编

中央军事部在1929年还比较低调，对红军主要是间接指导，没有直接指挥各地红军作战的计划。10月工作大纲提出“加强对全国军事工作的指导”的办法，只包括“通告与公开指导信”，“开始军事上的巡视工作”，“有计划的分别调各省负责同志及有直接关系的同志来中央谈话”，“召集专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对各省各部队的问题很迅速的予以指导或答复的信件”，创办《军事通讯》“以供给各地军事问题的材料，解释军运策略，答复军事上的问题，使成为训练

<sup>1</sup> 《中国即将出现新的革命高潮（真理报社论）》（1929年9月2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573、576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委致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信》（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578、582、586页。

一班同志军事头脑的刊物。”<sup>1</sup>

1930年3月初，周恩来去莫斯科汇报，李立三在向忠发支持下控制了中央大权，开启了盲动冒进的所谓“立三路线”时期。3-4月间，中共中央连续发出指示，强力推动红军集中统一整编，力图将全国红军指挥权集于中央军委，以便发动全国规模的攻势。中央4月3日通知认为，“在全国红军的发展指挥统一问题，已非常严重而必要，过去因为没有严格的规定，对各地红军，除中央指挥外，各省省委以至特委都可以指挥，于是指挥的系统既紊乱而决定又常不免有抵触，比如中央决定江西之二、三、四团及二游击大队为第三军，而现在前委又决定为第六军。阳新大冶红军中央决定为第八军，而广西又自己组织第八军。又如中央根据全国的政治形势，决定某部红军向何方发展，而省委或特委又有与中央不同的方向的决定”。“因此中央决定关于红军的指挥问题，以后各地已组织的正式红军，一切指挥权完全统一于中央军委”。“地方的赤卫队游击队及一切地方性的武装，均应渐次集中组织为红军”，“成立红军后则指挥权应移交中央军委。”<sup>2</sup>

集中整编是中央加强对红军领导的主要措施。在中央的直接指示下，鄂豫皖三支在不同区域发展起来的红军，被集中整编成第一军。1930年3月中央指示信提到：“边特境内原有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的红军，三十一、三十二两师且有长期的斗争历史。可是过去三师红军是各自为战的，是不相联系的，是束缚在地方观念、保守观念的深渊里”。“中央认为在目前要配合湘、鄂、赣等省先胜利的工作准备，无疑的要把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红军在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原则之下联系起来，将这三师编成第一军”。中央鼓励鄂豫皖红军“冲破保守观念、地方观念”，特别批评“三十二师的地方观念更是异常严重问题，他们拒绝与各方革命力量的联合，他们认为三十二师是商城地方的军队，这是非常错误的；三十一师一样的还有很浓厚的保守观念”，“如果不肃清这些倾向，是无法扩大红军的。”<sup>3</sup>

中央指定了鄂豫皖第一军的领导机构和人选，重要职位由中央派去的曹大骏、许继慎、徐向前等担任。指示信要求“立即将中央派来成立第一军的工作人员分

<sup>1</sup> 《中央军事部关于目前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29年10月1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297页。

<sup>2</sup> 《中央通知第一〇三号》（1930年4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55-56页。

<sup>3</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18-419页。

往各师整理，再经过三师的代表联席会议成立前委与军部。前委应由政治委员兼书记、军长、副军长、政治部主任、兵士同志二名、三师的师长、边特的一人成立之。中央更指定曹大骏同志为政治委员兼前委书记，许继慎同志为军长，徐向前同志为副军长，熊受暄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兵士同志李桂良同志参加前委，余一人另选定，边特一人由边特决定。三十一师徐向前同志兼师长，三十二师仍以周维炯同志充师长，三十三师调刘英同志充师长，李荣桂同志为政治委员”，“三十一师政治委员仍旧，三十二师政治委员中央派来王培吾同志充当，三十一师师委书记仍旧。以上的名单，中央巡视员与边特召集三师师委会议上当然可以斟酌出人，但必须经过中央的核准。”<sup>1</sup>

中央规定红军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红军前委与地方边区特委和省委是平行的，不受省委领导。“前委与边特的关系是横的关系，前委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故边特与省委只能以横的关系供给前委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指挥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边委与省委的支配，意见有不同时，直接决之于中央，在未受到中央指示时，前委有自己处决的权力。”<sup>2</sup>实际上，此时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已不满足于与省委平行，而是倾向由红军前委领导地方组织，这导致他和江西省地方干部产生尖锐矛盾，是引发富田事变的诱因之一。

中央军委制定了统一整编全国红军的宏大计划，明确规定各军番号和发展方向，仍把武汉、南昌、广州等大城市作为进攻目标。军委规定：“第一军：统一三师的指挥”，“三十一、三十二两师集中力量向着京汉铁路发展，三十三师向着长江发展”；“第二军：坚决的由湘西拖出，由宜都公安石首向着长江下游发展，与六军取得密切的联系”；“第三军：猛烈的扩大，集中力量向着赣江下游发展，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第四军：转变路线，猛烈的扩大，急进的向外发展，扩大全国的政治影响，使成为全国红军的模范，现在应领导第三军，协同动作向着赣江下游夺取吉安、南昌、九江”；第五军：“应由湘赣边界向着湖北的长武铁路方面发展。与八军取得密切联系”；第六军：“注意与二军联系，向着长江下游发展，集中各游击队到红军中来，准备成立第十军的基础”；第七军：“应从柳州桂林取道湘桂边界向着广东的北江发展，总的目标是广州”；第八军：“注意在交通区域

<sup>1</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21-422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年3月1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22页。

游击时常打断武长铁路的交通，扩大政治影响，总的目标是向武汉。”<sup>1</sup>

中央军委也开始酝酿在中央苏区、湘鄂西等有不止一个军的地区，在各军之上建立更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军团。“全国的红军都应集中指挥于中央军委之下，同时为适应斗争环境各军协同动作起见，必须成立军团以上的统一指挥机关，目前应该准备成立的这种机关有三：一是湘鄂赣交界的三、四、五等军，一是湘鄂边界二、六、十等军，一是闽粤桂十一、十二、七等军，其他为第一军以及苏浙皖等省的红军，候其发展程度如何再定。”<sup>2</sup>

1930年4月《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提出了年底前扩大红军到五十万的宏伟规划，并且具体规定了各军在5月30日前和年底前的扩军人数。这个计划明显带有空想色彩，很能体现李立三的领导风格，五十万的数字并非根据红军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定，竟然是这样确定的：“斯大林同志曾说过，中国革命成功，须要有红军五十万，我们现在即以五十万红军为我们发展的标准数目。”<sup>3</sup>

1930年4月中央军委扩大红军计划表

	现有人数	到5月30日扩大人数	本年年底扩大人数
第一军	4500	7000	21000
第二军	5000	7000	21000
第三军	4000	7000	21000
第四军	10000	14000	35000
第五军	4000	7000	20000
第六军	4500	10000	30000
第七军	6000	12000	30000
第八军	4000	7000	15000
第十一军	3000	6000	15000
第十二军	7000	13000	30000
第十三军	2000	5000	15000

<sup>1</sup>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32页。

<sup>2</sup>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31页。

<sup>3</sup> 《中央军委军事工作计划大纲》(1930年4月1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433-434页。

第十四军	2000	5000	15000
其他全国红军赤卫队 游击队农民武装等	48000	100000	250000
合计	104000	200000	518000

## （二）各地红军迅猛发展，成为影响全国的新兴力量

中共中央的恢弘扩军计划也并非全是空想，1927 年朱德的南昌起义余部只有七百多人，毛泽东的秋收起义余部也只有七个连不到一千人，当时全国红军加在一起只有几千人。1928 年下半年形势非常险恶，各地红军和游击队都在为生存斗争。但从 1929 年春季开始，国民党主要军事派系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矛盾加深，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战争，顾不上围攻红军。苏区周围敌军兵力空虚，红军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各地红军抓住时机积极进攻，迅速壮大。

周恩来 1930 年 3 月说，红军已经发展到 6.27 万人，2.89 万支枪，广泛分布于南方 127 个县。<sup>1</sup>比如湖北阳新县党组织在 1927-1928 年遭到国民党残酷镇压，残存的红军游击队活动非常艰难，但到 1929 年形势大为改善，9 月 3 日县委报告中提到：“游击战争近几个月来已由黑夜暗杀行动变成白天干，打杀豪绅地主案件及收税人员不下数十次”。<sup>2</sup>1930 年何长工带红五军五纵队到鄂东一带，收编阳新、大冶等地游击队，程子华领导大冶兵暴又带来几百人，很快创建了实力不俗的红八军。

1930 年初，红四军进军江西，旗开得胜，2 月 25 日在东固歼灭唐云山独立十五旅。当时红四军军委代理书记熊寿祺说：“这一个时期是前进的形势，群众非常热烈，士气亦很壮盛，政治上经济上群众都感觉向前了，以前一个月不上两元零用钱，现在有了三四元，以前在山边走，现在到了平原”。“在富田养精蓄锐，天天叫准备‘进攻敌人’，士兵早晚点名都是说进攻敌人，前几天的口号是‘攻取吉安’，这几天的口号是‘进攻敌人’。六个口号：1.进攻敌人消灭军阀混战。2.进攻敌人武装维护苏联。3.进攻敌人建立赣西南苏维埃政府。4.进攻敌人彻底

<sup>1</sup> 周恩来：《红军的数目与区域》1930 年 3 月，转引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党的文献》2000 年第 2 期，第 72 页。

<sup>2</sup> 《中共阳新县委工作报告》（1929 年 9 月 3 日），《湖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0），中央档案馆、湖北省档案馆 1985 年，第 128 页。

分配土地。5.进攻敌人扩大工农武装。6.进攻敌人夺取江西全省政权。”<sup>1</sup>

全国红军中，中央苏区红军实力最大，主力红军就有四、五、六三个军。为了各军联合打大仗，毛泽东在 1930 年 2 月推动成立了高一级的领导机构，当时叫做“共同前委”，这与中央建立军团的计划不谋而合。熊寿祺称：“前委派代表三人组织代表团赴陂头赣西特委处，遂提前于‘二七’在陂头开赣西特委，四、五、六军军委的联席会议”。“国内革命高潮的勃兴”，“尤其是江西的发展形势，有在南方各省中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遂决定组织四、五、六军共同前委，指导四、五、六军及赣西南、闽西、东江。准备四、五、六军大集中，夺取江西全省政权。”<sup>2</sup>

“共同前委”是毛泽东等顺应形势发展自行成立的，必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本来中央 4 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无论如何，必须出来一次”，到上海参加 5 月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sup>3</sup>不过后来还是熊寿祺被派去上海，他汇报了成立“共同前委”的情况，请求中央批准：“纵队之上从前是前委，现在是军委。因为‘二七’时陂头联席会成立了一个四、五、六军的共同前委，四军前委即改为军委，归现在的前委指挥。毛泽东同志脱离四军军委，专任前委工作”。“前委成立后仍然随四军走，现在前委是同四军一块的。前委委员遍布于赣西南、赣东、赣北、闽西、东江，四、五、六军都有委员”，常委五人是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候补常委黄公略、彭德怀。前委日常办公的只有毛泽东、朱德、曾山，“这个前委在斗争上是很需要的，希望中央能够批准，我来时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对我说的。”<sup>4</sup>

实际上，中央 4 月听取五军政委滕代远当面汇报，已经认可了共同前委。滕代远在报告中谈到：“二月初，朱毛部队亦由闽来赣南之东固。集四、五、六军的兵力，汇合赣西南有组织的群众百八十万的伟大力量，真有夺取南昌的趋势和可能性，吉安当不攻而自下了。四军前委召集赣西南特委，四、五、六军委联席会议于东固”，“对于军事行动，主张四、五、六军集中兵力先解决抚州，可以进

<sup>1</sup>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 1929 年 7 月到 1930 年 4 月》（1930 年 5 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801 页。

<sup>2</sup>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 1929 年 7 月到 1930 年 4 月》（1930 年 5 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472-473 页。

<sup>3</sup> 《中央给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 年 4 月 24 日），《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493-494 页。

<sup>4</sup> 熊寿祺：《红军第四军状况——从 1929 年 7 月到 1930 年 4 月》（1930 年 5 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493-494 页。

窥南昌，或速击刘和鼎，与赣东方志敏取联系。党决（定）西特、南特、边特合并为赣西南特委，下设南路行委、西路行委、北路行委。四军前委扩大为四、五、六军的前委，以已成立的赣西苏维埃进行筹备江西省苏维埃”。<sup>1</sup>中央 4 月 24 日写信确认，成立总前委“与目前对红军的中心任务——集中组织、统一指挥、向外发展、猛烈扩大，是相符合的。”<sup>2</sup>可见，毛泽东、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在集中统一红军上意见相同。

红军集中整编的政策很快贯彻到了地方，各地红军都开始从分散的小股游击队整编成较大的队伍。中央的激进很快引发地方狂热，闽西苏维埃政府 5 月宣传大纲称：“闽西政府主要计划，是接受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将一、二、三、四、五、六各团编为中国红军第十二军”，“头一步打下潮汕，与第十一军汇合，发动东江全境群众起来；第二步向惠州发展，与广西红军第七军联合进攻广州，促成广东全省总暴动。各县要马上集中武装，增编赤卫队常备队，加紧训练向外游击”，“谁怀疑扩大红军，谁反对统一指挥，谁不执行集中武装，谁便是放松了夺取潮汕扩大斗争的路线，那么客观上便等于帮助反革命派。”<sup>3</sup>

1930 年夏天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中央在各地成立行动委员会，集中统一指挥红军和地方组织。7 月 21 日第 147 号通知提出：“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对集中，完全以军令行之，下级党部绝对服从上级，党员绝对服从党的命令”，“目前党的组织都要适合此种组织形式才能在严酷的阶级战争中动员全党争取革命胜利。”通知要求党和团暂时打破各自组织系统，成立“行动委员会”集中一切权力，“行动委员会在行动中，是最有权威的集中的组织，下级绝对服从上级执行一切命令”。<sup>4</sup>“行委”的设立，打乱了党的组织系统，为 1930 年下半年江西党内冲突埋下了隐患。

### 三、立三路线挑战共产国际，六届三中全会确定战略转变

<sup>1</sup> 《红军第五军军委滕代远给中央的报告》（1930 年 4 月 27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443 页。

<sup>2</sup> 《中央给四军前委并转三、四、五军总前委的信》（1930 年 4 月 2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801 页。

<sup>3</sup> 《闽西苏维埃政府关于扩大斗争宣传大纲》（1930 年 5 月 10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462 页。

<sup>4</sup> 《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1930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 205-206 页。

### （一）李立三命令进攻大城市，与共产国际发生激烈冲突

共产国际 7 月 23 日决议案提出了以苏区和红军为中心的新思路，要求建立苏维埃中央政府，这是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决议案认为：“暂时我们还没有全中国的客观革命形势。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浪潮还没有汇合起来。这些运动总合起来还不能够保证必需要的力量，去袭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农民的革命斗争，现在能够胜利的，还只不过在南部几省发展着”。 “苏维埃的运动，已经对于党提出组织苏维埃中央政府，以及调节这一政府的行动的任务。这个任务是有第一等重要意义的。对于中国工农苏维埃政府的问题，党应当注意到：要在最有保障的区域建立起真正的红军——完全服从共产党的指导而能够做这一政府的支柱的红军”。<sup>1</sup>

共产国际认为虽然中国革命形势高涨，红军也日益强大，但还没到攻占大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阶段，应该先巩固已经建立的苏区政权，提高红军的质量，而不是盲目扩大规模。共产国际 8 月 8 日电报强调“建立一支坚强的、组织严密的、政治上坚定的、有充分保障的红军，是中共工作中目前的中心环节”。“中共在支持游击运动并促进其发展的同时，决不应放松解决当前中心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课题——先建立一支人数不太多，但组织严密的‘铁的’红军。”<sup>2</sup>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在对革命形势高涨的判断上、在红军集中和加强政治领导上，意见基本一致。但是在 1930 年 6 月至 8 月期间，中共中央在李立三的狂热领导下陷入空想之中，认为短期内有占据几个省的可能，命令各地红军集中起来攻打武汉等中心城市，同时命令上海、南京等地下党举行暴动。政治局在李立三主导下 6 月 11 日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激进决议。 6 月 12 日，中共中央致信共产国际，要求在国际决议上确认中共的激进路线：“恩来同志并转共产国际主席团：中国革命猛烈发展，已接近直接革命形势，中央决定坚决执行对军阀战争的失败主义的路线，极力争取一省与几省的首先胜利，要求在国际对中国问题的决议上确定这一路线，中央不同意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等

<sup>1</sup> 《共产国际执委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议决案》(1930 年 7 月 23 日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210-211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电报》(1930 年 8 月 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78 页。

类的割据观念。”<sup>1</sup>

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逐步升级的激烈冲突，事后共产国际大大强化了对中共的控制，这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来中共从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经费资助，按照列宁主义的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应该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但是，当时李立三等人表现出了强烈的、但很不成熟的独立性，认为共产国际不懂中国国情、错误判断了中国革命形势，拒绝听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意见，甚至当面发生激烈争吵，同时对何孟雄、王明等持不同意见的干部进行打压。

中共中央的激进计划进入实施阶段后，与共产国际的争论日益尖锐。7月18日，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发电：“中国共产党为坚决将军阀战争变为国内战争，决定在南京组织士兵起义，在上海准备总罢工，在武昌举行暴动”。<sup>2</sup>7月23日共产国际回电：“我们坚决反对在目前条件下在南京、武昌举行暴动以及在上海举行总罢工。”<sup>3</sup>7月29日，共产国际专门做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认为中共中央“表现出了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领导的错误态度；中央无视远东局的禁令发表自己的政治决议，从而破坏了共产国际的纪律；中央错误地对待代表团留下的成员（罗同志等）所作的必要批评”。<sup>4</sup>

7月27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这大大鼓舞了李立三、向忠发等的狂热激情。在一份通报中，共产国际对当时的中共中央做了如下描述：“占领长沙之后，政治局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把中央的一切权力交给该委员会。这样一来，政治局实际上被解散了”。“党火速地被改编成一种军事组织，为首的是李立三所领导的行动委员会。他们甚至解散了共青团中央，把共青团与党组织合并，并论证说，这样做是出于统一行动的需要。”<sup>5</sup>

李立三、向忠发等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也更加强硬，进而发展到公开对抗，在

<sup>1</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主席团信》（1930年6月1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6册，第136页。

<sup>2</sup>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7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19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0年7月23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25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1930年2月17日至8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的决议》（1930年7月29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36页。

<sup>5</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关于中共内部状况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通报》（1930年10月9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65页。

8月1日、3日会议上两人与远东局代表激烈争吵。斯托利亚尔8月5日信中详细描述了当时的情况：“在目前十分危急的时刻，存在着现时领导人和中共同共产国际决裂的很大危险”。“李立三动员所有的负责同志和全党来反对共产国际。他公开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他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而政治局不顾并反对共产国际的坚定不移的指示。通过了十分重要的关于时局的决议，在李的领导下要求共产国际如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纠正路线。”李立三在8月1日和3日会议上说：“共产国际不仅不理解中国目前的形势，而且不理解中国革命总的倾向”，“忠于共产国际的电报，但我们会对中国革命犯罪”。“中央不顾共产国际电报，已经决定在南京、汉口等地开始举行暴动。还必须在北京、天津、开封等地举行暴动”。更令人震惊的还有：“我们的战略应是挑起国际战争”，“共产国际现在应转而采取进攻政策，首先是苏联。苏联应全力准备作战”，“蒙古应宣布自己为苏维埃中国的一部分并派军队进攻华北”。<sup>1</sup>

中共中央在8月5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以强烈的语气拒绝莫斯科的指示电，要求支持中共的激进路线：“国际无从明了实际情况，自然要反对现在组织武装暴动与总同盟罢工。所以再将现在革命猛烈发展的情形电告，（请）求国际批准中央的决定，并立刻动员各支部猛烈扩大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是予我们以实力的援助。”<sup>2</sup>

8月6日，远东局紧急召集与中共政治局的联席会议，会上远东局成员不仅严厉批评中共中央，而且鼓动共青团起来反对中共中央。“远东局向中央委员会向它认为需要找的同志发出呼吁。共青团的同志有全权捍卫共产国际的路线”。“李立三很清楚他实行的是与共产国际路线相对立的政策”。斯托里亚尔警告中共政治局“存在危险的倾向，试图把党和共产国际对立起来”，“任何把某种路线与共产国际的路线对立起来的尝试，任何动员党反对共产国际、削弱共产国际威信的尝试都会导致将这些尝试的始作俑者逐出共产国际的行列。”<sup>3</sup>

李立三和向忠发并未屈服，当面激烈对抗。李立三针锋相对地反驳：“远东局认为，政治局犯了严重错误，这种看法不对”。“我们只是想让共产国际和中共

<sup>1</sup> 《斯托利亚尔给洛佐夫斯基的信》（1930年8月5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57-260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报告》（1930年8月5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228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1930年8月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265-268页。

(布)了解和懂得形势和事态的发展。驻莫斯科的中国代表没有向共产国际说清楚中国革命发展速度有多快”，向忠发“大声喊叫，不让发言者继续发言。”<sup>1</sup>

在联席会议争吵后，远东局 8 月 7 日向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汇报，特别强调中共中央的对抗态度将导致共产国际失去领导权，并明确提出将李立三撤职：“共产国际有可能丧失领导权”，“问题不仅在于政治局拒绝了你们的电报，而且还在乎它是如何被拒绝的。请认真读一下 8 月 1 日和 3 日政治局两次会议的记录”，“李立三动员政治局和全党反对莫斯科的决议”。“我们向全体中央委员和共青团发出了附在后面的激烈反对李立三的宣言并越过政治局开始与其他同志讨论形势”，“应该解除李立三的领导职务”。<sup>2</sup>远东局的埃斯勒还于 8 月 9 日紧急乘飞机到武汉，试图阻止暴动，与长江局书记项英发生激烈争执，项英在 10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毛子于昨日抵此，真是荒唐”，“真气煞人”。<sup>3</sup>

8 月 8 日，向忠发绕过共产国际组织体系，直接写信给斯大林，继续坚持总罢工、暴动和进攻大城市的主张：“远东局的同志们对罢工运动的巨大规模表示怀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不同意这一决定，我理解这是因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当时对中国的实际状况了解不够详细，没有收到关于革命飞速发展的详细报告”，“我们还请求您给予支持。这不仅对于中国革命，而且对于世界革命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sup>4</sup>

## (二) 立三路线的破产及其最后抵抗

李立三和向忠发在 1930 年夏天表现出惊人的独立精神，可惜这种自信心并没有成熟的判断力作为支撑。8 月 13 日，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的电报中做出了激烈回应：“中国人的倾向是荒诞的和危险的。在当前形势下，在中国举行总暴动，简直是胡闹。建立苏维埃政府就是实行暴动的方针。但不是在全中国，而是在有可能成功的地方。中国人急于攻占长沙，已经干了蠢事。现在他们想在全中

<sup>1</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联席会议记录》(1930 年 8 月 6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67-268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 年 8 月 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75-277 页。

<sup>3</sup> 《江钧向中央的报告》(1930 年 8 月 10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一九二七年、一九三〇年)，第 227、228 页。

<sup>4</sup> 《向忠发给斯大林的信》(1930 年 8 月 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83-284 页。

国干蠢事。决不能容许这样做！”<sup>1</sup>

8月25日，苏共政治局会议完全否定了中共中央的政策，决定李立三解职到莫斯科接受审查，会议记录中有：“这种情况下还没有占领大城市的重大机会。现在号召工人在汉口、上海、北京、奉天等大城市举行武装暴动（就像李立三所希望的那样）是最有害的冒险主义”。“我们一再建议政治局坚决放弃这样的计划。必须一天也不迟疑地集中一切力量组建坚强的、装备精良的、清除了富农分子的和真正置于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并在业已占领的地区为它建立哪怕一两个真正牢固的据点，而不要热衷于试图立即扩大苏维埃根据地”。“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以前同中共中央代表团完全一致制定的所有决议和指示仍然有效。李立三同志务必尽快到这里来。”<sup>2</sup>

中国形势发展也与李立三的预期背道而驰，彭德怀占领长沙仅十天就被迫撤出，上海、南京、武汉的总罢工和暴动根本无法实现，进攻武汉更是毫无可能。周恩来8月19日回到上海，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新战略，在内外不利形势的压力之下，李立三等人不得不屈服。政治局8月25日给共产国际写信，承认错误，但还有相当保留，不肯承认路线错误，也不肯解除李立三的职务：“政治局在听取伍豪（即周恩来）同志的报告和解释后，完全同意共产国际对以下问题的意见”，“以前在这些问题上所存在的分歧，现在已不复存在了。政治局通过决议，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指示，并要同一切企图把政治局或政治局某个委员的政治观点与共产国际路线对立起来的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政治局请求共产国际执委会允许李立三同志不去莫斯科。”<sup>3</sup>

李立三在当时的中共中央有很大的影响力，纠正李立三错误并非易事。9月8日，中共中央再次致电共产国际，虽然承认错误，但强调右倾分子的活动，仍然抵制李立三解职去莫斯科：“中政局完全同意来电的指示，承认最近期间的策略是有害的。正在坚决的执行转变”。“在这一转变中，右倾机会分子已利用之作反中央的活动，将中央路线与国际路线对立起来。中央坚决在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执行策略的转变，坚决反右派及调和派的斗争”，“政治局因为工作需要的关系请

<sup>1</sup>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电报》（1930年8月13日于索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00页。

<sup>2</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5号（特字第×号）记录——致中共中央》（1930年8月25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31-332页。

<sup>3</sup>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1930年8月25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33-334页。

准立三暂不来国际”。<sup>1</sup>所谓右倾分子，显然指何孟雄、罗章龙、王明等反对李立三的人。

但远东局不能容忍桀骜不驯的李立三继续留在中共中央。9月12日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的电报强调，李立三虽然开始承认自己的错误，但仍然在耍手腕，“这种手腕以及他不久前的明确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使他不可能继续留在政治局和中国，因为这会给纠正所犯的错误和执行决议造成极大困难。我们坚持要求把他召到莫斯科来。请用相应的回电给予支持。”<sup>2</sup>远东局9月16日写信给周恩来和瞿秋白，对六届三中全会做了详细指示，要求务必肃清李立三的影响，硬性规定李立三10月15日前必须动身去莫斯科：“即将召开的全会，除对形势作出评价和提出党目前的任务外，还应该研究这些错误，评估李立三同志所犯的这些错误对你们的工作产生了什么影响”，“这次会全是在代表大会之后的最高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应该对党的一切缺点进行最严厉的布尔什维克式的批评”。“李立三同志动身的最后期限定在10月15日。”<sup>3</sup>

### （三）六届三中全会布置革命重心向苏区转移

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4-28日召开，由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参加的中央委员、各地方组织、各党团代表共30多人。虽然名为三中全会，但六大选出的36名中央委员中实际到会的只有14人，却补选了15名新的中央委员。值得注意的是，红军领袖毛泽东被补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被补选为中央候补委员，这说明红军开始受到重视。

全会重点是传达共产国际最新指示，纠正立三路线，把中共工作重心从城市向苏区转移，这是中共建党以来根本性的战略转变，说明共产国际在帮助中共把握方向上确实起了重要作用。周恩来在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中说：“我们要巩固现有的苏维埃区域，将分散的苏维埃区联合起来，集中与加强红军的领导，发动更广大的农民群众，建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向工业中心城市发展。换句话说，就是要有巩固的基础向前发展，要深入的向外扩大，中央过去对此工作之注意不足，

<sup>1</sup> 《中央政治局接受国际关于停止武汉南京暴动的指示致国际电》（1930年9月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266页。

<sup>2</sup>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0年9月12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47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周恩来和瞿秋白的信》（1930年9月16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349-350页。

中央只注意到红军的发展与扩大，可是放弃了巩固与加强，尤其是对苏维埃区域，中央直接的指导是很不够的”，“过去中央对于苏区的中心任务注意得不足”，“一定要使红军成为国内战争的主要力量”。<sup>1</sup>

六届三中全会结束后，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报告：“全会一致接受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切指示，并根据这些指示以真正布尔什维克的勇气对党在所报告的时期内的全部工作进行了自我批评。李立三同志也同样对自己进行了无情的批判。”

“李立三将在 10 月中动身。”<sup>2</sup>但实际上，六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李立三的冒险路线，也解除了李立三的职务，但对中央领导机构并没有大的改组。当初狂热支持李立三的领导人，自总书记向忠发以下，都没有承担多大责任，李立三的重要支持者李维汉和贺昌补选为中央委员，李维汉还直接进入了政治局。

自从中共六大强调工人成分以来，很多如向忠发这样文化不高、领导能力有限的工人进入中共领导层，形成了不太成熟的领导集体。周恩来 1944 年曾谈到，在六大选举中，“有多选工人为中央委员的倾向。三十六个中央委员中就有二十一个工人。过去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工人领袖虽然不少，但党对他们的教育不够，而知识分子干部中有许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做了许多实际工作，有经验的不少。由于太强调工人成份，很多较好的知识分子干部参加中央工作就受到了限制，如刘少奇同志只被选为审查委员会的书记，没有被选为中央委员。恽代英同志也没有选上，到二中全会才补上。这和后来中央很弱是有关系的。”<sup>3</sup>

正因为中共中央整体水平不高，知识不多的工人干部比例较大，而李立三在早期工人运动中影响很大，所以才会出现李立三冒险路线主导中央的局面，这也导致中央的威信遭到各级组织的严重质疑，其中反对最激烈的是王明为首的留苏学生群体和以罗章龙、何孟雄为首的老干部群体。

#### 四、革命重心移向苏区：加强联系、派遣干部、建立中央局

<sup>1</sup>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 年 9 月 2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314-315、319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电报》（1930 年 10 月 5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358 页。

<sup>3</sup>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 年 3 月 3、4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 245-246 页。

### (一) 加强与苏区的联系：无线电与信使

六届三中全会后，远东局认为中共党内问题已经解决，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帮助中共实现向苏区和红军的战略转移，包括建立可靠联系、从城市派遣大批干部到苏区。但当务之急是尽快把最新指示送到苏区，由于联络困难，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的方针并没有及时到达红军，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的红一、三军团仍在争论进攻长沙或南昌，贺龙在湘鄂西消息更加闭塞。

当时中央与红军的联系很不可靠，甚至出现了很奇特的情况，红军通过敌军之手才得到了中央的指示。毛泽东 1930 年 9 月给中央的报告提到：“中央长江局及军事委员会 8 月初给我们的信由张辉瓒搜得，报告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发往各省，何键发往各县，因此我们在株洲拾得一份。我们讨论结果，认为中央的指示完全正确，夺取武汉是全国性质的阶级大战”。<sup>1</sup>八月初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这个指示当然是让红军进攻武汉。

远东局对新指示难以到达红军十分焦虑，10 月 30 日写信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和朱德指挥的我们的军团在准备进攻南昌”，“彭德怀的军和受他影响的部队好像也在向长沙进发”。“在长沙失败之后还没有得到足够加强的兵力去攻占像南昌和长沙这样两个由敌军加强设防的较大中心城市”，“指挥红军的这种战术，除再次遭到失败外，不会有任何别的结果”。“在江西，我们在 30 个县拥有苏维埃政权，而只有 10 个县城在我们手里。在其余的 20 个县城，政权掌握在有产阶级的手里。我们的领导同志不去夺取这些县城和建立连成一片的苏区，而是热衷于攻占大城市”。“在后方不巩固的情况下热衷于‘攻占’大城市来建立根据地——这是冒进，是超越当前的某些现实任务。另一方面，这也证明，中央的指示，根据最近一次全会的决定还没有传达到地方”。“毛泽东、朱德和彭德怀的行动再一次有力地说明，在上海和苏区之间尽快建立通讯联络机构和在苏区建立坚强的军事政治领导是必要的。”<sup>2</sup>

由于红军日益重要，共产国际派经验丰富的盖利斯担任军事顾问，专门指导中共军事工作。盖利斯在 12 月 3 日信提到：“以前李立三的方针虽然在上海这里正在被根除并在很大程度上已被根除，但仍在那度着自己的蜜月”。“毛泽东于

<sup>1</sup> 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 年 9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446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 年 10 月 3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43-445 页。

今年 10 月 14 日即我们的军队放弃吉安之后所写的一封信中有很明显的反映”，“他指出，6 月以来他没有接到中央的指示。最近一个指示是李立三的指示，是在 6 月份收到的。党的会议和领导人讨论后认为它是正确的。既然李立三的指示是正确的，那么占领南京和汉口也就是当时最迫切的任务了”。<sup>1</sup>盖利斯后来又提到：“存在过简直是荒唐可笑的局面”，贺龙那里直到 1930 年 12 月才在接到并讨论李立三 5 个月前的指示，“我们已经在声讨李立三了，而在那里他的指示还被认为正确的，并且加以贯彻执行。”<sup>2</sup>

中共中央 12 月 10 日给红军发出新训令，要求纠正李立三路线：“过去中央在立三同志左倾盲动路线领导之下（这路线已被共产国际和中央最近决议痛加批评了），对于根据地问题，犯了很大的错误。我们当时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于占领大城市（长沙，南昌，武汉等），我们简直未注意到巩固后方，建立具有坚固组织的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苏维埃政权之根据地”。“因此我们错过了许多可以增强自己和削弱敌人的好机会。红军和苏维埃政权机关的关系很不密切有时竟至没有关系。”<sup>3</sup>但是新训令能否及时到达红军仍是可疑的，很多红军部队仍在按以前李立三的指示行动。

为加强对红军的领导，远东局把建立无线电联系当成重点。10 月 20 日盖利斯在信中谈到：“无线电台比我所指出的价格贵得多”，“一部电台需要 700 到 750 美元。而一部用于向海参崴发报的 100 瓦的大型电台需要 1200 美元，现在我已经为自己预订了一部 100 瓦的电台、为上海预订了一部 50 瓦的电台和为各军预订了两部 15 瓦电台。我所有的钱都用在这上面了。100 瓦的电台过三周就能做好，50 瓦的也一样，而两部 15 瓦的电台要经两个月才能准备好，这些电台都是从美国订购的”。<sup>4</sup>

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的两个月（1930 年 12 月-1931 年 1 月），激烈党内斗争严重干扰了向农村战略转移的步骤。四中全会之后，盖利斯 1931 年 2 月 4 日对中央军事部提出了严厉批评：“没完没了地开会、辩论，提出问题大都不够具体，

<sup>1</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 年 12 月 3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16-517 页。

<sup>2</sup>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长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 年 5 月 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81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 年 12 月 1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 509-510 页。

<sup>4</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 年 10 月 2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17 页。

而关于派人到苏区的具体的实际的工作、同红军建立联系、领导苏区和红军、由地方党组织派人和提出瓦解国民党军队、在靠近前线的地带和凡有条件的地区开展游击运动的具体任务等等却很少过问。时间在流失，军阀已开始对苏区发动第二次进攻，而在这样的工作状态下我们不能同红军一起较为认真地参加打退军阀进攻的斗争。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是这场斗争的消极旁观者”。<sup>1</sup>

盖利斯直接给中央军事部布置任务，要求建立每两周联系一次的制度。“现在同红军的联系是极不可靠、极不正常的。没有联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通过党、苏维埃系统以及军队系统进行的领导。应该组建联络局，使上海每两周就能从红军各单独行动的部队和单独的苏区获得情况报告”，“并且要求苏区根据此表每两周报告一次。只有在这样的联络体制下才能对红军和整个苏区进行符合实际的领导”。“为了做到这一点，应当由绝对可靠的人在下列地点：上海、香港、汕头、天津、厦门、广州、汉口，九江（或南昌）设立联络中心”。“无线电台应该连同无线电报务员一起立即从汉口调往贺龙处”，“三部电台和无线电报务员调往毛处，立即将电台从天津调往第 1 军。无线电报务员的培训工作，应看作是一项最重要的战斗任务，要非常积极地加速办理这件事。”<sup>2</sup>中共中央很快按盖利斯的要求制定了问题表，3 月写信给各苏区，要求按表回答问题，“每月初一及十五做报告给中央”。<sup>3</sup>

建立无线电联系是重中之重，当时还处于准备阶段，主要是给红军购买、运送电台和培训技术人才。周恩来 2 月 19 日向远东局汇报了工作进展：“除两人外，他们都已动身前往，但只是去香港，下面的路程眼下还没法定。有两人留下来给贺龙运送电台。三天前我们就已决定，他们应在最近一周内动身”。“关于无线电台”，“我们买了一台大的、两台小的。大的是给毛买的，两台小的是为第 7 军和第 8 军买的。随后我们打算从香港和天津给贺龙和第 2 军运去无线电台。但结果发现，香港和天津的电台没有马达，它们只有靠电力才能运转，贺龙那里没有电，因此需要为贺龙购买新的带马达的电台。”<sup>4</sup>米夫 3 月 28 日的信提到：“关

<sup>1</sup>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 年 2 月 4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44-45 页。

<sup>2</sup>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 年 2 月 4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45-46 页。

<sup>3</sup> 《中央为建立交通关系及报告制度给各苏区及红军的信》（1931 年 3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553 页。

<sup>4</sup> 《雷利斯基同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87-88 页。

于无线电设备。第 1 军有一台收报机。已给贺龙、朱毛活动地区及其他地区送去了收报机。现在干部问题十分尖锐。无线电收发报员不够。这里没有可能进行速成培训。我们的第一所学校垮了。第二所在培训，但学员至少要过两个月才能毕业。”<sup>1</sup>

1931 年 3 月，中央派出的无线电人才武云甫、曾三、涂作潮经香港到达中央苏区，他们与龙冈大捷中俘获的技术人才王诤、刘寅等一起成为红军无线电技术骨干，但是由于电台功率太小，无法建立苏区和上海的联系。直到第二次反围剿缴获公秉藩部的 100 瓦电台之后，无线电联系才终于在 1931 年秋天建立起来。<sup>2</sup>虽说上海为苏区买了一些电台，但很难通过封锁线送到苏区，甚至密码都要记在脑子里带进去，即使在闽西通道也是如此，“小商贩很愿意把火柴、食盐和煤油从白区运往我区，因为这些商品在苏区价格昂贵。不过军阀们禁止这样做。因此他们对所有货物都检查得很仔细。很难将无线电设备运到那里。”<sup>3</sup>中央苏区后来的几部电台多数是战斗中从敌军缴获的，还有就是宁都起义部队带来了八部电台。<sup>4</sup>鄂豫皖苏区的几部电台也是在战斗中缴获的，湘鄂西苏区的电台是上海送去的，与鄂豫皖和湘鄂西建立无线电联系大致是在 1932 年春天。<sup>5</sup>

1931 年秋天以前，上海与苏区之间主要联系方式还是信使，但信使往返一次要两个月时间，而且承受着巨大的风险，通常一半的信使会被敌人抓住。米夫给莫斯科的信中提到：“我们有信使服务，而且这种服务在不断改善。只是很难找到可靠的、适应当地条件的人。通常有 50% 的信使落入敌人手中，这对工作是很大的损失。”<sup>6</sup>

## （二）中央决定派 60% 干部去苏区，红军给上海送来大笔经费

革命重心转移也体现在人力投入方向的变化，也就是把大批干部从城市派往

<sup>1</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04 页。

<sup>2</sup> 李强：《一次划时代的通信革命》，《红军的耳目和神经——土地革命时期通信兵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4 页。

<sup>3</sup>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1931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83-184 页。

<sup>4</sup> 王诤：《从半部电台开始》，《红军的耳目和神经——土地革命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 53-54 页。

<sup>5</sup> 李文采：《洪湖电波》，《红军的耳目和神经——土地革命时期通信兵回忆录》，第 208-209 页。

<sup>6</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04 页。

苏区和红军。但是由于国民党的严厉封锁，这项工作最初遇到很大困难。盖利斯在 1930 年 10 月 20 日信中提到：“一些人陆续被派往苏区，但是他们离开上海后就再也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一个半月前，中央派关向应经武汉去苏区建立中央局，但是“目前他回来了，因为他无法找到我们的部队”，“在存在警察、军阀、富农和豪绅的道道搜查情况下，他无法穿越斗争地带。他说，在搜查时我们的许多同志被逮捕了，凡是不能对警察或当地农村资产阶级卫队提出的到哪里去和去干什么等问题作出令他们满意的回答的人，统统枪毙”，“在靠近前线的地带笼罩着最野蛮的恐怖气氛。”<sup>1</sup>

中共中央决定把大部分干部派往苏区。向忠发提到：“对于苏区工作的加紧，现在正依照国际的指示，要从中央政治局起以百分之六十的干部力量去加强与巩固苏区的领导”。“军事干部不论是在莫学过军事的或在国内做过军事工作的，都要以百分之九十以上派往苏区。”<sup>2</sup>派干部去苏区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断了一个月，会后又继续进行，而且到达的比例也明显提高，说明联系通道更加可靠了。据周恩来 1931 年 6 月份的报告：从 1930 年 9 月至 1931 年 4 月，中央共向苏区派了 228 人，其中 172 人到达。其中：向中央苏区派了 67 人，57 人到达；向鄂豫皖第 1 军派了 48 人，43 人到达；向湘鄂西第 2 军派了 39 人，18 人到达；向赣东北方志敏的第 10 军派了 19 人，10 人到达；向何长工的湘鄂赣第 8 军派了 4 人，全部到达；向孔荷宠的湘鄂赣第 16 军派了 11 人，9 人到达；向第 9 军派了 14 人，12 人到达；向闽西第 12 军派了 14 人，12 人到达。派送和抵达的情况见下表：<sup>3</sup>

向苏区派遣干部统计表

派送年月	派送数量	抵达数量	比例
1930 年 9 月	29	19	65.5%
1930 年 10 月	21	16	76.2%
1930 年 11 月	32	19	59.3%
1930 年 12 月	36	23	63.9%

<sup>1</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 年 10 月 2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11、414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134 页。

<sup>3</sup>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 年 6 月 1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323 页。

1931 年 1 月	0	0	——
1931 年 2 月	36	31	86.1%
1931 年 3 月	35	33	94.3%
1931 年 4 月	39	31	79.5%
总计	228	172	75.4%

军事顾问盖利斯也积极筹划进入苏区，直接指导红军，但外国人通过封锁线困难更大，最终没能成功。盖利斯说：“我们去苏区的问题——这是我们局以及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议的议事日程上不断提出的一个问题”，“外国人现在进入苏区要比中国人更困难。我向中国人提供 1000 美元作为这项工作的费用，并指出，我们准备步行几百俄里，不要求任何舒适的条件”，“即使只有 20-30% 的成功机会也准备行动”，“那里极其需要领导。”<sup>1</sup>中共后来尝试由任弼时和王稼祥陪同他去苏区，不过盖利斯刚上船就被识破假身份，没能离开上海。<sup>2</sup>

闽西通道是当时联系中央苏区的最重要交通线，在沟通信息、输送人员和资金上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条通道是从上海经香港到汕头，然后沿韩江北上到达福建永定，进入闽西苏区。3 月 27 日，中共政治局向远东局报告：“从闽西派人到中央区是很容易的，已派许多人到那里去了”。护送任弼时和王稼祥的信使已经返回，“他们俩是 3 月 15 日到达闽西的。到那里是很容易的。在上海和汕头都没有遇到任何困难”。<sup>3</sup>5 月 7 日，盖利斯在报告宣称：“现在已经同各苏区建立起这样的联络线路。这种联系正在进行。不管怎么说，现在我们有可能把自己的人派到苏区去，把我们的指示发到那里。”<sup>4</sup>

苏区成为革命中心的突出标志是红军能够经济上自立，甚至还可以支援中央，这也是中国革命从共产国际支配下走向独立的关键一步。以往中共中央经费几乎全靠共产国际支持，中央再把经费分配给各省省委。1930 年 11 月，盖利斯信中提到：当时中共中央平均每月从莫斯科收到 1.5 万美元，大约相当于不到 5 万中

<sup>1</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 年 10 月 2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18 页。

<sup>2</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 年 2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49-150 页。

<sup>3</sup>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1931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83-185 页。

<sup>4</sup>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长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 年 5 月 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81 页。

国元，“它要用这笔款项支付自己机关费用，要开展工作，往苏区派遣人员，租用住房，出版报纸、杂志、传单等出版物。显然，这笔钱是不够用的，难怪每一次会见周恩来的时候，他都提出经费问题。”此时红军已经相当强大，有很多缴获，可以支援中央，“在苏区的各军中都有些值钱的贵重物品（例如第 10 军，据由那里来的一位同志报告说，它积攒有价值 10 万墨西哥元的贵重物品）”。<sup>1</sup>

实际上，早在 1930 年 5 月毛泽东派熊寿祺到上海汇报时，就让他给中央带去了一些在南雄、大余缴获的金子。<sup>2</sup>红一军团 10 月攻占吉安，缴获很多，毛泽东又爽快地承诺：“对中央款子，决付十万元金子，汇五万元现款”。<sup>3</sup>当时设在香港的南方局是重要中转站，闽西苏区 11 月 1 日给南方局的信中提到：“简××同志已达到否？他去时带去金子一百二十两”，“朱毛付给中央汇单五万元。此单有期限，不能在此停留，故我即着伟×同志带单到你处转中央”。“赣西南有十多万金子要付给中央，已在闽西组织一百名参观团到赣提款回来，我写信要他们即筹四十万元给南局中央，他们的钱很多”。<sup>4</sup>南方局 11 月 16 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了这笔钱：“送上信，系杜同志由闽西来信及五万元的汇单交大姐带来，请查收”，“我们收到的金子约值八九〇〇，暂留作南局整个经费、送香港工人到红军去及交通站一大份费用，所以没有带来”。<sup>5</sup>

到 1931 年 2 月，中央收到来自苏区的经费已相当可观。贺龙没等中央开口就主动送来 2 万元，在苏区也非常贫穷的情况下，这体现了红军将领对党组织的忠诚。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中提到，“从贺龙那里得到的 2 万元应分摊给军事部各个方面的工作”，应派专人带着指示到毛泽东、贺龙以及第 10、16、1 军去，“从那里带来钱或者贵重物品。他们在这方面能够帮助上海。贺龙未经请求就这样做了。毛也想送来，第 10 军准备给钱。钱是有的，只是需要拿到手。”<sup>6</sup>2 月下旬，中央提款员易尔士把中央苏区的资金带到上海，米夫给共产国际的信提到：“工作将会进行得更快些，因为现在有钱。中央从毛泽东那里得到了价值约 10

<sup>1</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0 年 11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80、479 页。

<sup>2</sup> 萧克：《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7，第 130 页。

<sup>3</sup> 毛泽东：《给中央的报告》（1930 年 10 月 1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506 页。

<sup>4</sup> 《杜××自闽西给南方局信》（1930 年 11 月 1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8），第 191-192 页。

<sup>5</sup> 《中共南方局致中央信》（1930 年 11 月 16 日），《中共南方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1985 年，第 106 页。

<sup>6</sup>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 年 2 月 4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49 页。

万墨西哥元的黄金，从贺龙那里得到了 1.5 万墨西哥元的黄金。”<sup>1</sup>

1931 年 5 月 7 日，盖利斯在莫斯科作《苏区和红军》报告时，很兴奋地谈到这个问题：“送钱这个事实说明苏区对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在中国，让一个将领给某地送钱，这简直是闻所未闻的事情。相反，将领们只从事夺取钱财的活动。当我们的中央提出关于经费支援的问题时，它在不长的时间里就从 1 军团和 3 军团，从贺龙军团和毛泽东军团那里得到了 20 万元”。<sup>2</sup>

### （三）革命重心转向苏区：筹建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

1930 年 8 月，周恩来从莫斯科回来传达国际指示后，中共中央立即提出了在苏区设立中央局的初步构想。中央在 8 月 29 日给长江局并转各省前委、行委的信中提到：“中央决定在湘鄂赣这一广大苏维埃区域中成立中央局，其管辖区以所有苏维埃区域为范”。<sup>3</sup>中央决定派政治局候补委员关向应去主持中央局，“一月后可更有人去，直接由中央指导”。<sup>4</sup>关向应带着中央 9 月 1 日指示信到武汉，中央让他与长江局“讨论此信后，应立即动身前往苏区组织苏区中央局”。<sup>5</sup>但当时两湖地区战事紧张，敌军盘查严密残酷，关向应没能穿越封锁线，被迫回到上海。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国革命重心向苏区转移的进度加快，其中重要举措就是在各苏区建立中央机构：在中央苏区建立中央局，在鄂豫皖和湘鄂西苏区建立中央分局。1 月 17 日，共产国际在报告中指出：“为了保证切实和尽快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建立地区苏维埃根据地和组建正规红军核心的指示，责成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在预定作为苏维埃政权和扩充军队根据地的地区真正组建中共中央局”。<sup>6</sup>中共政治局 1 月 20 日决议也提出：“最高限度的集中并巩固我们在苏维埃区域斗争的领导。为着达此目的必须增加并巩固苏维埃区域中央的成

<sup>1</sup>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 年 2 月 22、23、25、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43 页。

<sup>2</sup>《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 年 5 月 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80 页。

<sup>3</sup>《中央关于再度占领长沙的战略与策略给长江局并转湘省委、湘鄂赣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 年 8 月 2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1054 页。

<sup>4</sup>《中央关于在湘、鄂、赣三省区域成立中央局给长江局的信》（1930 年 8 月 2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1055 页。

<sup>5</sup>《中央给长江局的信》（1930 年 9 月 1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1083 页。

<sup>6</sup>《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1 年 1 月 1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35 页。

份”。<sup>1</sup>

在苏区建立中央机构的重要原因是担心红军各自为战，无法建成强大统一的军事力量。盖利斯谈到，彭德怀“指挥该军作战时没有同毛泽东商量，没有制订共同的计划。结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他孤军奋战，而毛泽东却在看着。在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没有协调行动。没有共同的有计划的指挥行动”，“在同一个苏区，甚至在同一个军内，行动也不协调，直到最近还出现这种情况。”<sup>2</sup>

建立中央局是这一时期的关注焦点，在莫斯科、远东局和中共中央的通信中频繁出现。盖利斯 2 月 4 日写信催促周恩来：“派中央局成员去苏区（毛泽东和贺龙那里及第 1 军）之事已久拖不决，难以容忍。派人的可能性是有的。应该立即将所有已经任命的人派去。”<sup>3</sup>米夫信中也强调，如果“有坚强的有威信的中央局，那么所有这些缺点大都是可以克服的。”<sup>4</sup>共产国际 2 月 20 日又催促中共要立即建立中央局：“我们认为再拖延苏区中央局和苏维埃民政当局的建立是极端危险的，有碍于建立根据地和纪律严明的红军。请采取果断措施，立即在赣南建立有威望的中央局”。<sup>5</sup>向忠发 2 月 22 日向共产国际报告：“对苏区中央局，已决定再派政治局委员三个人去和其他得力同志，成立九个人的苏区中央局。对鄂西、鄂豫皖两处，亦决定组织中央分局，派两个中央委员去主持分局。”<sup>6</sup>

远东局的设想是，政治局仍设在上海，但当政治局与苏区联系中断时，由中央苏区的中央局领导其他苏区的中央分局。雷利斯基 3 月 2 日说：“在军事问题上中央苏区的中央局将起主要作用”，“苏区所有的局都应该同上海的政治局及其他所有的局建立密切联系。当这些联系中断，而同中央区中央局的联系还存在时，那么显然中央区的中央局要把领导权抓到自己手里。”<sup>7</sup>中央 3 月给各苏区的信中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军阀进攻苏维埃区域的决议案》（1931 年 1 月 2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53 页。

<sup>2</sup> 《盖利斯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处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所作的〈苏区和红军〉的副报告》（1931 年 5 月 7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78-279 页。

<sup>3</sup> 《盖利斯给周恩来的信》（1931 年 2 月 4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47 页。

<sup>4</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04 页。

<sup>5</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12 页。

<sup>6</sup> 《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134 页。

<sup>7</sup> 《雷利斯基同沈泽民、张闻天和赵容（注：康生）谈话记录》（1931 年 3 月 2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63 页。

提到：“苏区有中央局，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朱德同志为红军的总司令，各苏区的报告（给中央的报告）也应送给他们。”<sup>1</sup>米夫 3 月 28 日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建立中央局和中央分局的进展：“项英 10 月就走了，12 月他已在第 12 军地区”，任弼时、王稼祥和顾作霖也已动身前往那里，夏曦已前往贺龙那里，沈泽民已前往第 1 军，张国焘将于 4 月 1 日或 2 日出发。<sup>2</sup>

实际上，项英已于 1931 年 1 月 15 日与毛泽东会合，并立即宣布成立苏区中央局，担任代理书记，毛泽东、朱德、曾山为委员。4 月份，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也进入中央苏区，进一步加强了苏区中央局内的中央成分。夏曦于 3 月到达湘鄂西苏区，成立了湘鄂西中央分局。张国焘也于 4 月到达鄂豫皖苏区，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

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不完全是共产国际和中共的主动选择，也是受实际形势的逼迫。在城市，国民党统治力量集中，中共一年内经过立三路线、罗章龙分裂和顾顺章叛变等严重挫折，革命力量损失惨重。据 1931 年 2 月中共中央的报告：“过去上海党员有一千三百多，现在清查结果，要以能工作与到会缴费的才算党员恐不到八百人。香港经过大破获，中上级干部被捕四十多，现在工作方开始恢复，党员只一百五六十人，而真正能做工作的恐亦不及百人。武汉累次破获后，市委都难立足”。“长沙、岳州、九江、南昌等地的工作，始终没有恢复。天津党员在生产中的不及二十人，只唐山矿工党员较多点，但也没有健全的支部生活。满洲大破获后，仅抚顺、大连、营口有点党的工作，但亦甚微弱。总之，一切非苏区的中心城市工作，经过立三路线及调和主义的时代给了很大的损害后，到现在都还没有很好的转变。”<sup>3</sup>

远东局在叛徒迭出的上海遭遇极大危险，3 月 30 日电报显示：“我们面临出现新的叛变的危险。盖利斯和米夫继续逗留是非常危险的”，“请注意，这里只剩下远东局两名成员了”。<sup>4</sup>掌握中央机密的特科负责人顾顺章 4 月被捕叛变后，中共中央和远东局都面临被捕的直接威胁，雷利斯基在 6 月 10 日信中说：“四中全

<sup>1</sup> 《中央为建立交通关系及报告制度给各苏区及红军的信》（1931 年 3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553 页。

<sup>2</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 年 3 月 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04-205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 年 2 月 2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527-528 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1931 年 3 月 3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10 页。

会后我们有很多人被捕。光上海一地我们就平均每天损失三人。”<sup>1</sup>总之，革命力量在城市越来越难以立足，在苏区却有巨大发展空间，革命重心向苏区和红军转移，既是共产国际高层的战略决策，也是形势演变的结果。

无论如何，中国革命的重心已经不在城市，而在红军和苏区了。从 1930 年开始，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逐步走向战略转变，中央领导干部部分批进入苏区，力图通过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更加集中的组织体系。但是事情并非像米夫料想的那样，中央机构的建立可以消除摩擦和分歧，在权力结构从松散到集中的转变中，中央领导与地方干部之间发生了激烈冲突。在当时残酷危急的战争环境中，这种冲突有时甚至会引发严重的后果。

## 五、小结

中共在 1927 年下半年的暴动中创建了红军，红军与农运结合开创了农村革命根据地。但是在最初的两年多时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并没有把红军当做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红军在中共组织中处于边缘地位，和中央、省委、地方组织的关系没有理顺，各级组织给红军的指示常常脱离实际，甚至给红军带来损害。在不断磨合的过程中，红军的重要性日益显示出来，在中共组织中的地位也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

1930 年是中国革命战略转变的关键之年。国民党各派军队发生了大规模内斗，最后演变成关系各派存亡的中原大战。红军获得了巨大发展空间，迅速成长为影响全国政局的重要力量，同时全球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产生了全面的恐慌。巨大的发展机遇使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对革命形势做出了乐观的判断，但同时也引发了权力结构混乱，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间、各级党组织和中共中央之间、各部红军之间都产生了严重分歧。中共组织体系经受了激烈冲突的考验，走向进一步的集中和强化。

中共中央和各地红军感到形势大好，抓住机会迅猛发展，这时以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产生了强烈的独立倾向，不顾远东局和莫斯科的反对，试图自主发

<sup>1</sup> 《雷利斯基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1 年 6 月 10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318 页。

动城市暴动，同时命令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等大城市。但是李立三的极不成熟的尝试没有成功，对大城市的进攻先后失败，中共在城市的力量也在冒险盲动中损失惨重。

毛泽东 1930 年 1 月首先提出以红军和苏区为重点的中国革命新道路，半年以后斯大林也认识到中国革命的特点，做出了把革命重心从城市向农村转移的重大决策，提出把红军和苏区放在第一位。六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李立三的领导，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把工作重心放在战略转移上，努力建立与苏区的无线电联系，大批干部被派往苏区，并筹划建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六届四中全会后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这是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转变。

毛泽东等红军领导人在中国农村开创的事业影响了世界革命战略，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了中国革命的特殊性，把中国红军当做世界革命的最重要成果之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在 1931 年 3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十一次全会发言中骄傲地说：“在中国，革命危机加深的实际表现是，在拥有数千万人口的土地上建立了苏维埃和红军。这是当前中国革命高涨的决定性因素，它使中国站到整个殖民地世界的民族革命运动的最前列，这是革命高涨的最高形式”。<sup>1</sup>

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库西宁表现出对中国革命特殊道路的极大兴趣，他在 1931 年 4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说：“革命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而在每个单独的国家，它自然也是以独特的方式进行的，何况是在中国。但要理解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并不那么容易”，“现在我们应该学习说中国话”。“中国党内工人只占 5-6% 时，几乎所有的同志都会感到惊奇”，“这样的事实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中国的红军是跟任何别的地方完全不一样的。苏维埃也是完全不同的”。

“在中国我们见到的是完全不同的顺序。先是个别共产党人组建红军支队，而这些支队建立起新的无产阶级政权。然后建立苏维埃的基础，后来开始——只是今天才开始——建立党的中心；然后着手组织贫农，最后才解决最重要的任务——发展广泛的无产阶级阶层”。“一切看起来都跟我们最年轻的马尔丁诺夫同志在这里所说的一样：这仿佛是奇迹。他甚至说这是魔法”。<sup>2</sup>

---

<sup>1</sup> 《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会发言》（1931 年 3 月 26 日晚），《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597 页。

<sup>2</sup> 《库西宁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会议上的讲话》（1931 年 4 月 15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237-238 页。

## 第六章 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另立中央

1931 年 1 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中共党史上影响很大，米夫派留苏学生从此进入中央领导层，在中国革命从城市向农村战略转移的关键阶段，开启了长达四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本来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之后，中共中央已经把工作重点放在战略转移，但是共产国际收到最新报告后，对李立三的批评上升到路线斗争，同时罗章龙、何孟雄、王明等对三中全会未能改组中共中央，反而继续压制反对李立三的人也很不满。米夫到中国后，王明等留苏学生得到重用，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的要求则被拒绝，他们在六届四中全会后愤而走向分裂，发生了党史上罕见的罗章龙另立中央事件。

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大致形成于 1930 年 9 月六届三中全会前，但他们在全会上遭到了压制。国际来信和米夫 11 月到上海后，中共中央最初只向共产国际认错，继续压制反对派。但是从 12 月中旬开始，中央转而向反对派公开认错，12 月 23 日九十六号通告开启了党内民主高潮。反对派以紧急会议为号召、以全总、江苏省委、苏淮会等为基地，试图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取得中央领导权。华北党组织也在九十六号通告影响下在天津自发成立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夺取了省委权力。但莫斯科最终确定召开四中全会，米夫拒绝了反对派要求，计划保留多数原中央领导、引入少量留苏学生、同时吸收部分反对派，组成一个三结合的新中央。六届四中全会上发生了激烈冲突，失败的罗章龙派愤而走向决裂，他们成立“非常委员会”，引发全总、江苏、华北、东北等不少党组织分裂，但由于自身局限、中共分化瓦解和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很快失败。激烈的党内斗争使中共白区党组织元气大伤，悲观失望情绪弥漫，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中共在白区的影响急剧衰落。

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从形成到走向分裂，既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组织上的原因。反对派的形成，大致是因为政治上反对立三路线；反对派最后走向分裂，则主要是在组织上不满米夫改组中央的计划以及对党内民主的压制。本章力图重建反对派从形成到失败的基本史实，并尝试分析当时中共在组织上的两难处境：李立三强调集中却犯下重大失误，罗章龙呼吁民主却走向组织分裂，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不得不面对艰难的选择。

## 一、反对派初步形成，中共中央持续压制

### （一）反对派在六届三中全会前初步形成

1930年5月到8月是立三路线最狂热的时期，以6月11日政治局决议《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为标志，李立三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要求各地都采取进攻路线，白区党组织在这种盲动之中损失惨重。在这个阶段，反对派还没有形成，只有个别人公开提出不同意见。何孟雄一直是中共党内具有独立思想并敢于公开表达的高级干部，他本来是江苏省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但是在1929年反对中央兼江苏省委的纷争中，被降职到上海担任沪东区委书记，后来又调任沪中区委书记。

在立三路线统治时期，上海通常每周开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有时中央领导也参加。据时任闸北区委书记的黄理文回忆，在一次区委书记会议上，李立三公开宣称“工人要大干，不要小干，只要有人领导，一呼百应，罢工就能罢起来”。何孟雄当场起来反驳，认为“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在另一次区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江苏省委常委、上海工联党团书记王克全也说过类似的话。<sup>1</sup>

但像何孟雄、王克全这样公开质疑的很少，还算不上一个派别，后来属于反对派的很多人当时并不反对立三路线，甚至是立三路线的支持者。比如罗章龙就没有公开反对，在7月9日中央工作人员会议上，起来反对6月11日决议的是王明、博古、王稼祥、何子述等几个留苏学生，王明后来说：“罗章龙那天虽然也出席了，可是没有说一句反对这个决议案的话，而且声明同意这个决议。”<sup>2</sup>据向忠发的报告，后来反对派的不少重要骨干都曾支持立三路线，比如“蔡伯真同志当时因为努力反对何孟雄同志而取得沪中区委书记，等到国际来信后，蔡伯真同志却又投入右派的营垒”；“戴晓云一向是立三路线执行者，等到立三路线揭发之后，他也由‘左’而跑到右”；“李求实、张昆弟、林育南等同志都是立三主义统治时期被称许为很进步的同志，但以后都成为右派中的健将”。<sup>3</sup>

<sup>1</sup> 黄理文：《1930年江苏省委和闸北区委的一些情况》，《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辑，第28页。

<sup>2</sup>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0页。

<sup>3</sup> 向忠发：《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报告》（1931年2月22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30 年 8 月下旬周恩来、瞿秋白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后，传达了共产国际 7 月 23 日决议，批评了李立三的错误。在准备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的时期，反对派初步形成，在何孟雄周围逐渐聚集了一些人。9 月 1 日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何孟雄再次与李立三发生激烈冲突，何孟雄提出了“立三路线”的说法，他认为：“发生了许多工作上的弱点，是立三指导路线得来的结果。斯大林同志所分析的”，“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形势，与立三所说的不同。”<sup>1</sup>但是李立三不但没有接受意见，反而粗暴禁止何孟雄继续发言，骂他是“取消派的暗探”，并且会后把何孟雄撤职。产委书记、印刷工人领袖沈先定在会上声援何孟雄，要求公布共产国际指示，也遭到压制。<sup>2</sup>

但何孟雄等人并未屈服，他们已经知道共产国际对李立三的批评。9 月 8 日，何孟雄给中央写了《政治意见书》，而且意见书“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写的，而是开小组组织会议讨论后写的”。徐锡根参加了这个小组组织会议，他是政治局委员，较早听到周恩来、瞿秋白传达共产国际决议对李立三的批评，很可能是他把消息扩散了。<sup>3</sup>何孟雄在意见书中明确说：“我在工作检阅中有许多地方又遇到中央路线行不通，最近听说国际对于中央路线也有根本指示（决议案和电报），因此，要求中央宣布交全党讨论”。<sup>4</sup>李立三坚持认为自己大体正确，只是策略失误，并说服周恩来、瞿秋白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不能承认路线错误。在 9 月 12 日上海活动分子会议上，周恩来批评何孟雄如果“把国际路线和中央路线分开”，“可以动摇同志”。<sup>5</sup>

在 9 月底六届三中全会上，周恩来作传达共产国际决议的报告，报告内容应该是远东局、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等协商妥协的结果。报告否认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有根本的路线分歧，认为只是个别策略上出现错误：“中央的错误，是否路线上和国际不同呢？完全不是的。路线上没有什么不同的，中共党的目前任务是在夺取广大群众，集中革命力量，组织革命的战争，积极准备武装暴动，去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这些是和国际的指示无

---

<sup>1</sup> 第八册，第 76 页。

<sup>2</sup> 何孟雄：《在上海区委、产委联席会议上的发言》（1930 年 9 月 1 日），《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第 174 页。

<sup>3</sup> 《江苏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 年 12 月 23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9），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 1984 年，第 544 页。

<sup>4</sup>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 213 页。

<sup>5</sup> 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 年 9 月 8 日），《何孟雄文集》，第 186 页。

<sup>6</sup> 何孟雄：《在上海活动分子会上的发言》（1930 年 9 月 12 日），《何孟雄文集》，第 186 页。

丝毫的不同，而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因为对目前的革命发展形势在程度与速度上有了过分估量，遂致造成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sup>1</sup>

报告用了相当篇幅批评何孟雄等人右倾：“我们是接受国际批评，指出立三同志在思想上多负责一些，但不能允许任何同志的挑拨，如孟雄同志那样说‘立三主义’等话”。“他们利用中央个别的错误，加以造谣诬蔑，他们主要的是发挥自己路线”。“右派的路线是什么呢”，“对革命形势有过低的估计，不相信革命新高潮的到来”，“对于农民战争的意义看得非常之轻，认为攻长沙是一个部落的行为，认红军为流氓土匪”，“对于主观力量悲观，认为不能领导任何斗争”，“对于政治罢工的观念动摇”。“因为何孟雄的活动，以及政治观念不清楚的，或者真是有自己路线暗藏着的人，它们怀疑中央与国际的路线是否相同，在江苏已有陈韶玉（即王明），刘峻山等同志已表显出它们调和的倾向，这也是党要和它们坚决斗争的”。<sup>2</sup>

六届三中全会决议案认为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致的”，只有一些策略失误，比如“忽略苏维埃根据地的重要，忽略工业区域日常斗争和政治问题的联系。”<sup>3</sup>决议却用相当篇幅批评右倾分子，“说城市工人没有革命的斗争，没有同盟罢工的可能，只能实行日常的经济的小斗争”；“说农民战争是‘部落式的暴动’”；“造谣挑拨说党内实行纯粹的委派制度，‘弄得同志都不敢讲话’，发展煽动无原则的派别斗争”；“利用中央政治局策略上组织上的个别错误，不但造谣诬蔑挑拨离间，进行小团体的活动，而且宣传中央的路线和国际是不一致的”，“这些分子的领袖，又正好就是从二中全会以前、江苏问题的争论、反对陈独秀斗争的最初阶段以来，一贯的是反对中央的”，<sup>4</sup>这显然指何孟雄。

在瞿秋白的政治讨论结论中，罗章龙与何孟雄都受到点名批评，这说明罗章龙也已成为反对派的代表人物。瞿秋白明确批评罗章龙右倾：“并不是以前过于注意总同盟罢工、武装暴动，而现在是要将他放的很遥远的前途去。如果以为现

<sup>1</sup>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314页。

<sup>2</sup>周恩来：《关于传达国际决议的报告》（1930年9月2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325-326页。

<sup>3</sup>《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65页。

<sup>4</sup>《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1930年9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478-479页。

在占第一位的是‘小范围的斗争’，那就是客观上是犯了右倾。章龙同志认为政治罢工和总同盟罢工现在不应当占‘第一位’，就是犯了这种错误。”<sup>1</sup>瞿秋白对何孟雄的批评更是升级到反党高度：“中共中央最近有一点错误，绝不是总的政治路线不正确，而右派机会主义的分子却利用来反党。我以为孟雄的立场显然是这样的”。<sup>2</sup>

三中全会结束不久，中央就在 10 月 12 日九十一号通告重复李立三的言辞，猛烈攻击何孟雄等：“三全扩大会公开的指出何孟雄同志在上海区书联席会上利用中央政治局的个别错误，加以造谣污蔑，公开的向中央进攻，这完全是取消派在党内暗探的作用”。“何孟雄同志这一发动，完全不是偶然的，它自从江苏代表会后累次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意见，多是从右倾的观点出发的”，“这些观点的汇合，遂形成了一贯的系统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sup>3</sup>

在六届三中全会上，中共中央不仅在政治上压制了反对派，在组织上也是如此。这是一次扩大会议，出席的中央委员只有 14 人，中央审查委员 2 人，列席代表则多达 20 人，结果补选出 15 名新的中央委员，立三路线支持者江苏省委书记李维汉和北方局书记贺昌都当选中央委员，李维汉直接进入政治局。李立三虽然被要求去莫斯科接受批评，但仍保留了政治局委员的位置。这很难让反对派服气，何孟雄在 10 月 5 日给总行委的信中说：“不是我的意见，如何承认，替人承认错，万事罪已，这种认错的态度不是布尔什维克党员认错的态度”，<sup>4</sup>这明显是拒绝承认六届三中全会的结论。

## （二）国际来信后，中共中央筹划紧急会议，但继续打压反对派

1930 年 8 月以前，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李立三的错误上升为路线斗争，7 月 29 日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与远东局分歧的决议中，第一条就说“中共中央总的说来执行了正确的方针”。<sup>5</sup>但周恩来、瞿秋白离开莫斯科后，共产国际陆续收到

<sup>1</sup> 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 年 9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 528 页。

<sup>2</sup> 瞿秋白：《中共扩大的六届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1930 年 9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 520 页。

<sup>3</sup> 《中央通告第九十一号》（1930 年 10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24 页。

<sup>4</sup> 何孟雄：《政治意见书》（1930 年 10 月 5 日），《何孟雄文集》，第 190 页。

<sup>5</sup> 《关于远东局与中共政治局之间在 1930 年 2 月 17 日至 8 月期间接连发生的分歧》（1930 年 7 月 29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235 页。

后续报告，特别是 8 月 1 日和 3 日李立三等激烈对抗远东局的会议记录，认为中共中央拒绝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破坏了布尔什维克组织体系。共产国际 10 月写信给中共中央，把批评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认为“在中国革命最重要的时机，有了两条原则上的不同的政治路线互相对立”。“立三同志的发言之中，有最危险的精神”，“就是说共产国际不知道当地情形，说中国的例外情形，说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的理论。他竟敢于把对于共产国际的忠实和对于中国革命的忠实互相对立起来，他在八月三日政治局会议上说，忠于共产国际，遵守共产国际的纪律是一件事，忠于中国革命又是一件事”，这是“敌视共产国际的言论。”<sup>1</sup>

共产国际不是各国共产党的松散联盟，而是高度集中的列宁主义革命党，执委会作为最高权力机构，在向各支部提供经费的同时，也要求各支部严格服从。马季亚尔严厉批评中共领导人：“史大林对你们说——不要到长沙去，要不好的。莫洛托夫说：现在拿大城市是红军力量所不够的。中国同志都同意了。到了中国，又发命令要第二次进攻长沙。第二次没有成功，中央又发通告要第三次进攻”。“我可以数出好几个议决案，对于中国革命都是对的；都是中国同志所签名的，后来却是不实行”。“这种情形必须取消，然后国际的议决案和指示再不会变成一纸空文。”<sup>2</sup>马努伊斯基更尖锐指出中共的独立倾向如果不制止，将导致共产国际的灭亡：“你们表现了很厉害的地方主义”，“说苏联有狭隘的民族成见，说俄国人不了解中国情形”。“最危险的是，表面上是同意我们的决定，实际上执行自己的路线”。“议决案只管通过，到了中国仍旧执行自己的路线。如果这种情形是国际与共产党的互相关系的基础，那么，我们可以使国际灭亡。”<sup>3</sup>

中共中央接到指示信之前，青年团的王盛荣、陈昌浩、陈绩之、凯丰、宋磐铭等留苏学生刚好准备回国，青年国际负责人要求他们自下而上反对中共中央的错误路线。<sup>4</sup>这些留苏学生大约 11 月初回到国内，传播了共产国际的新指示，何孟雄、罗章龙、王明等闻讯士气大涨。一时间党内暗潮汹涌，他们到处表达不满，

<sup>1</sup> 《共产国际执委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 年 10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351、360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 年 12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405 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 年 12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416 页。

<sup>4</sup>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第 352 页。

积极进行小组组织活动。温裕成提到：“一些同志从青年共产国际学校回到祖国后，他们说，萨法罗夫同志召集他们进行谈话，他讲到：‘在中国党内有盲动主义错误，以及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这条路线是很严重的，你们回到祖国后应该同它进行斗争。’现在基层有许多奇怪的情绪，无疑是因这些人散布了上述谈话。此外，他们还说，已经看过孟雄的声明并认为他的声明是正确的，而中央的声明是错误的”。<sup>1</sup>

中共中央 11 月 16 日接到国际来信后，表示接受批评，但同时继续压制反对派。11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只承认三中全会“对于立三同志路线显然不充分的揭发，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决议仍坚持“集中全力反对党内机会主义的消极态度和实际工作上的机会主义”，拒绝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路线的要求，并强调“反对露骨的机会主义的曲解的企图”，这显然是针对反对派的。中央并不想召开新的会议，只想把决议“用通信方法询问所有的中央委员是否同意”。<sup>2</sup>

中央也不得不认可何孟雄的部分观点，但批评他的活动在组织上起着破坏作用。11 月 18 日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说：“应该召集那些已经知道共产国际来信的同志们（例如，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开一个会，并号召他们站在巩固党和帮助中央领导的立场上开展自己的工作。不允许他们不经组织同意采取分裂党的方式”。“关于孟雄的问题，需要紧急作出答复，而且这个答复应该是总的答复。他所提出的正确思想，我们应该承认是正确的，但是他攻击党的活动是以破坏党为出发点的。党应该彻底调查，他在支部工作中是如何进行活动的，并应该在一些支部中同他的破坏活动进行斗争。”<sup>3</sup>

11 月，王明奋笔疾书，写出了好几万字的《两条路线》，猛烈抨击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27 日，陈原道、王明、博古更是成立了留苏学生反对派组织“临时小组”，并起草了《临时小组的决定》，这是一份与中央决裂的意见书，态度非常强硬，夺取领导权的意图显露无疑：“我们在讨论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三中全会决议、11 月 16 日共产国际来信和 25 日中央政治局决议之后，一

<sup>1</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 年 11 月 1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61 页。

<sup>2</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1930 年 11 月 25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362-363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0 年 11 月 1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58-459 页。

致通过以下决议”，“三中全会怯懦地采取了机会主义的、‘市侩式的’和妥协的方针”，“把共产国际路线和李立三路线混为一谈”，“李立三路线在领导机关中仍然很有势力。政治局 11 月 25 日决议只是要外交手腕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们认为党中央领导已经垮台”，“应该把那些坚决支持李立三路线的不肯悔改的机会主义分子驱逐出（中央、各局、省委）领导机关”，“应该把那些在与李立三路线和其他错误倾向的斗争中表现坚定的同志推举和吸纳到领导机关中来”。<sup>1</sup>

但是，12 月 11 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在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调和主义之后，仍然拒绝党内“公开辩论”，继续攻击反对派是党的主要危险，号召“党必须坚决的斗争反对这种露骨的机会主义曲解的企图，反对这种最有害的右倾机会主义”，“要实行绝不调和的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左’倾和右倾的机会主义，集中火力对付右倾的主要危险，”<sup>2</sup>不过这次没有再提以中央委员通信通过新决议，因为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启动了。

新任远东局书记米夫 11 月中旬也到达上海，他的使命是否定三中全会，改组中共中央，指导中共实现战略转移。担负如此重要职务和重大责任的米夫此时只有 29 岁，比王明大三岁，比周恩来小三岁。在上海指导中共的这段时间，米夫确实表现得年轻气盛、不够成熟老练。12 月 2 日米夫从上海给共产国际写信，详细报告了立三路线的危害、三中全会不成功的原因，赞扬了他的得意门生王明等的正确立场，并在结尾要求从莫斯科派张国焘、蔡和森前来助阵。米夫认为三中全会没有成功，主要是周恩来和瞿秋白回来之后，“遇到了组织严密的李立三集团，他们开始有些动摇，因而采取了调和主义态度”。<sup>3</sup>

根据远东局指示，中共中央 12 月 9 日做出《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提出通过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纠正三中全会的错误：“政治局认为必须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纠正三中全会的严重错误，而彻底明确的完全遵照国际路线来规定党的任务和策略”。<sup>4</sup>远东局在 12 月 10 日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明了“紧急党代表会议”的详细计划，这个设想和后来召开的四中全会明显不同。

<sup>1</sup> 《临时小组的决定》（1930 年 11 月 2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68-470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告全党同志书》（1930 年 12 月 11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 744 页。

<sup>3</sup> 《米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 年 12 月 2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03 页。

<sup>4</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召集中央紧急会议的决议》（1930 年 12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450 页。

计划主要是纠正三中全会，批判立三路线，只提出李立三退出政治局，没有触及瞿秋白，还特别把帮助苏区反围剿当做主要任务。紧急会议的设想如下：“远东局得出结论：紧急召开为期一天的党代表会议（应遵守一切必要的保密规划）是适宜的，参加人员为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各省委代表和共青团中央局成员。远东局认为，这次代表会议应该通过一个包含下列内容的简短决议”：“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来信的精神对李立三同志的路线作出评价”；“提出把新干部，首先是工人积极分子提拔到领导岗位上的任务”；“提出党动员各个方面力量来反击对苏区的总围剿问题，将此作为最主要的任务”；“指出中共领导对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所采取的不老实态度”；“远东局认为，让李立三同志退出政治局是适宜的”。<sup>1</sup>

### （三）王明等留苏学生准备上台

米夫对中共中央的不信任由来已久，1928年中共六大期间就曾尝试把自己的学生推上中共领导岗位，当时没有成功。周恩来说：米夫“散布了一些对中国党负责人轻视、不相信的话，有影响。在‘六大’筹备选举时，他在筹备选举的委员会中说过，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王明、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当然，当时是没有什么人理他的（后来传出去说，米夫要提他们当中央委员），可是这种说法却起了影响，造成了东方大学等校学生对党的负责人轻视，以致后来发生了反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斗争。”<sup>2</sup>

六大时米夫想让王明等进入中共领导层还得不到普遍认可，但到1930年12月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共产国际看来，王明等人在立三路线时期和三中全会前后的表现说明，这些年轻学生的政治水平和对共产国际的忠诚，不仅高于犯了严重错误的李立三和向忠发，也高于领导三中全会不力的瞿秋白。在12月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中，皮亚特尼斯基重点谈了留苏学生进入中共领导层的问题，这说明立三路线闹独立性之后，提拔更受信任的留苏学生进入领导机关已经是共产国际高层的共识，而非米夫的个人意见。

皮亚特尼斯基说：“在苏联有许多学校有好几百中国同志在那里学，他们之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0年12月1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528-529页。

<sup>2</sup>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1944年3月3、4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1），第245页。

中有很好的同志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他们回去了，但是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为什么？我们以前不明白，而现在明白了，因为有一种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费了很多力量和钱才能够把他们派回中国去，然而秋白或者立三不要他们做党的工作，我以为这是无论如何是不能够允许的。”<sup>1</sup>远东局的埃斯勒对王明等在 1930 年的作用也大加赞赏：“戈卢别夫（即王明）和其他许多中国同志，特别是几个月前刚刚从苏联回国的青年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起了特别积极的作用。他们是保证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政策的动力。”<sup>2</sup>

事实上，在王明等人回国之前，米夫等已给他们布置了逐步取得中央领导权的重任，后来王明一跃进入政治局、博古不是中央委员却主持中央不是偶然的，而批判立三路线大大加快了王明等人的上升速度。**1930** 年罗章龙和王明两派都对立三路线和中央很不满，**10** 月王明主动找机会与罗章龙在虹口公园进行了一次谈话，透露了米夫对改造中共领导层的一些想法，特别是王明等留学生的重大使命，寻求罗章龙的支持。据罗章龙回忆：“从谈话中知道他是有充分准备的，所以谈话条款分明，他一气谈了一点多钟，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1）王首先宣称他这次是负有国际特别使命回国来的”，“中国党的领导必须撤换，从上至下要彻底改组换班才能执行国际路线。（2）王对目前国内内外革命形势说右倾是主要危险”。“（3）王明特别着重介绍旅莫支部的英勇斗争事迹”，“眉飞色舞，感到自豪”。 “（4）王说全总是工人干部精华所在”，“要求全总同志和他们一道完成国际所交付的重大任务”。“（5）王表示受国际委托回国进行上项工作，国际指定他与国际通讯用特别邮政信箱”。<sup>3</sup>

王明最自负的是自己的理论优势，他认为中共中央所以屡犯错误，就是因为缺乏宏大的理论视野。王明认为：“中国的党向来没有革命的理论，因此也谈不上革命的行动。只有像他们这样具有‘高度理论修养’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掌握了中国党的命运，才会有真正的中国革命。”<sup>4</sup>罗章龙回忆：这一时期王明、博古曾多次找他谈话，希望拉拢全总工人干部组成改造中共中央的同盟。王明、博古“说话间必称米夫，意思是说他们就是米夫的代言人，一切是奉命而行的。

<sup>1</sup> 《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1930 年 12 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430 页。

<sup>2</sup>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93 页。

<sup>3</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溪流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55 页。

<sup>4</sup> 罗章龙：《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 年 10 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733 页。

他们强调全盘改组中共各级领导机构”，“希望在中央工委系统和全总党委系统得到有力的支持”，“王又说他们这次回来奉有特殊使命，所谓特殊使命不是回来做一般工作，而是做中央领导工作”。<sup>1</sup>

共产国际信任自己训练的留苏学生并不奇怪，中共中央早已经有刘少奇、任弼时等留苏学生，他们曾经留学苏联，而且回国较早，已经积累了不少实际经验。但是从四中全会的结果来看，米夫虽然也让刘少奇、任弼时进入政治局，他重点提拔的还是自己的亲信——米夫派留苏学生，尤其是把毫无经验的王明连越几级、火箭式提升到领导岗位，这说明米夫的派别倾向相当明显。

## 二、党内民主爆发，反对派争夺领导权

### （一）九十六号通告与党内民主爆发

远东局批评了中共中央的“不老实态度”，来自下面的抗议压力也越来越大，中共中央对反对派的态度在 1930 年 12 月中旬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先是 16 日通过了向何孟雄和王明等认错的决议，然后又在 23 日九十六号通告中号召自下批评、党内民主化，这大大鼓舞了反对派的气势。反对派更加积极活动起来，准备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取得领导权，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大问题——党内民主。

1928 年中共六大强调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但是在实践中却出现很多弊端，中共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江苏省委和顺直省委都发生混乱，红四军也发生了“朱毛之争”，毛泽东甚至一度被赶出红军。为纠正偏差，中共中央在整个 1929 年一直反对“极端民主化”，逐渐建立起比较集中的权力结构。但是在权力集中以后，同样发生了严重偏差，李立三利用中央权力推行盲动路线，对下级不同意见采取处分、撤职等高压政策，独断专行的结果是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惨重损失，也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于是党内民主的呼声又高涨起来，无论是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还是王明派，都要求扩大党内民主。可以说，罗章龙、何孟雄等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的尝试，就是这次党内民主爆发的直接产物。

苏淮会党团书记林育南得知紧急会议计划后，给中央写信强烈呼吁党内民主：

<sup>1</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456 页。

“‘家长式的领导’、‘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等等都继续扩大起来，这完全是违反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的组织原则，这使党员达到消极、达到盲从，使党脱离群众，减弱党战斗力量”。“紧急会议上应明白指出过去党组织制度的根本错误，从此应坚决彻底的改正，肃清一切家长式领导的命令、委派、惩办等制度，保证党内必要限度的‘民主化’，发展党内布尔什维克的‘自我批评’和‘政治讨论’，尽量在秘密工作条件许可之下实行党的选举。总之必须以正确的‘民主集中制’代替‘家长制度’，以说服和教育同志的态度去执行‘铁的纪律’以代替‘惩办制度’。”“紧急会议上必须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sup>1</sup>王明在《两条路线》中同样要求“在组织上实行布尔什维克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坚决反对家长制度、命令主义、委派制度、惩办制度”。<sup>2</sup>

12月16日，政治局通过了向反对派认错的《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决议与11日《中共中央告同志书》完全不同，转而承认“何孟雄同志政治意见书一般的是正确的，是合乎国际路线所要求的观点，来反对当时中央立三路线的观点的”。“中央代表发言上给孟雄同志以取消派暗探作用和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批评和攻击，是很大的错误”。“江苏省委总行委停止孟雄同志的工作，后来省委扩大会没有要孟雄同志出席并开除其后补省委委员，这是严重的错误，并且这些攻击与处分，完全是抑制自我批评的家长制度与惩办的具体体现——这本是立三路线的组织原则。”<sup>3</sup>同日，中央也做出了《关于取消陈韶玉、秦邦宪、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的处分问题的决议》。

12月23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后来追悔莫及的《中央通告九十六号》，这是向全党公开彻底承认错误。通告承认接到国际来信后，中央政治局在11月25日、12月9日“两决议案中，在中央告同志书中，还是保持着调和主义的态度”，“中央政治局现在公开承认这些错误，并暴露这些错误于全党”。通告承认中央压抑党内民主，“家长制度的统治抑制了党的自我批评，打击了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同志”，“使布尔什维克党的生活变成了毫无生气的官僚机关，使党的领导走上一错再错的覆辙”。通告号召“自下的自我批评，而反对抑制与恐惧自我批评，必须坚决实行党内民主化”，提出“采取非常紧急的办法，在适合秘密条件下，产

<sup>1</sup> 林育南：《给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51页。说明：《罗章龙回忆录》中不准确的地方很多，使用必须非常小心，尽可能用其他资料核对。但其附录里保存了不少有价值的文献。

<sup>2</sup> 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1-1932），《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177页。

<sup>3</sup> 中共中央《关于何孟雄同志问题的决议》（1930年12月16日），《何孟雄文集》，第215-216页。

生新的政治决议来代替三中全会的一切决议”，<sup>1</sup>这显然是指紧急会议计划。

中央抵抗了好几个月，突然向反对派认错，明显是受到了远东局的压力，而米夫似乎只想到批评立三路线和调和主义，没有预料到中央丧失威信可能引发严重后果。后来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承认九十六号通告“在反对右倾分子的斗争中，解除党的武装”，“这个通告说政治局一直到最近只是在继续和加强立三路线”，“更使党在中央领导之下去实行反对理论上实际上的立三路线的斗争发生困难。”<sup>2</sup>仅仅一个月以后，王明领导江苏省委通过的《对于中央第四次扩大会议总结及目前党的任务的决议》中就反过来批评极端民主化了，指责罗章龙派“要求极端民主化，以便于他们反党活动，实行他们分裂党的阴谋，”<sup>3</sup>可见九十六号通告引发的后果让米夫和中央深感后悔。

中央在 12 月中下旬的连续认错中威信扫地，党内民主声势大涨，长时间受到压抑的反对派爆发了。他们不满足于自下而上的批评，在群情激奋的情势下，开始自下而上改组领导机构，争夺领导权。中共江苏省委是立三路线时期由江苏省委升级而来的，是中共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组织，领导范围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原书记李维汉因为追随立三路线已经丧失威信，12 月 23 日江苏省委常委会议不经中央许可，自行改选领导机构，新常委会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很强硬：“今日省委常委全体会议决议部分改组省委指导机关，克全代理书记，并通过常委名单七人：何孟雄、王克全、夏曦、蒋云、许畏三、沈先定、陈资平，‘望政治局立刻批准。’”<sup>4</sup>

新当选的代理书记王克全是当时很受推重的工人干部，1930 年 8 月武汉长江局项英感觉人手不足，写信给中央说：“请求中央在上海派一最好干部（如王克全之类）来此，参加主席团，负工会总责。”<sup>5</sup>不过，江苏省委和中央同在上海，中央迅速做出反应，力图重新控制局势。中央拒绝承认江苏省委违反组织原则的改选，12 月 25 日任命王明为代理江苏省委书记，此时王明还不是中央委员，但事实上已经进入中共领导层。

<sup>1</sup> 《中共中央紧急通告（中央通告九十六号）》（1930 年 12 月 23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七册，第 747-748 页。

<sup>2</sup>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决议案》（1931 年 1 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八册，第 18-19 页。

<sup>3</sup>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 年 5 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馆藏，第 18 页。

<sup>4</sup> 《江苏省委关于部分改组省委给中央政治局的报告》（1930 年 12 月 23 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9），第 543 页。

<sup>5</sup> 《中共长江局关于目前武汉形势与工作状况向中央的报告》（1930 年 8 月 20 日），《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第 251 页。

中央陷入了墙倒众人推的尴尬境地，各主要领导 12 月 28 日分别参加上海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会上都遭到围攻，甚至被要求“开除党籍”，只有徐锡根因与反对派早有联系，境遇较好。何孟雄说：“昨天召开了五个区的积极分子会议”，在沪中区周恩来代表政治局讲了话。会议决定，撤消周恩来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还提出了把他开除出党的要求。瞿秋白出席了闸北区的会议，“会议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理由是：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而回到中国后背叛了共产国际。向忠发同志出席了沪东区会议。会议决定撤消他的总书记职务”。关向应出席了法租界的会议，同样也决定撤消他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徐锡根同志出席了沪西区会议并发表了反对政治局的讲话。全体与会人员都赞成他的意见，并且欢迎他站出来反对政治局中的李立三分子。电话局支部作出决定，要求撤消所有容忍三中全会犯错误的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sup>1</sup>

反对派不满足于中央在九十六号通告的退让，不仅继续猛烈攻击原中央领导，而且也开始攻击王明等留苏学生。以罗章龙为书记的全国总工会党团 1931 年 1 月 1 日开会通过《关于对中央九十六号紧急通告的异议及意见》，认为“中央的威信是丧失得干干净净，中央的领导在政治上早已完全破产”，要求“立即停止中央行使权威”，“根本改造政治局”，废除三中全会决议及补选的中央委员，对“严重错误主要责任的中央领导人”，“给予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决议要求由国际代表领导组织临时中央机关，速即召集紧急会议，“要求坚决的实行引进工人同志及群众组织能干的干部到领导机关参加工作，肃清自中央到各级党部的工人同志为招牌，小儿和书生为实质的最虚伪的恶劣方式。”<sup>2</sup>这意味着反对派不仅与原中央决裂，也与留苏学生派决裂了。

九十六号通告传到天津，也立刻引发了华北党组织的混乱。当时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机构设在天津，立三路线时期设立了贺昌为书记的北方局。立三路线遭到批判后，中共中央于 12 月 9 日决定“北方局的组织取消”，成立河北省委，负责范围包括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陕西、甘肃，<sup>3</sup>与江苏省委并称为中共白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 年 12 月 2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65-566 页。

<sup>2</sup>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时期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收藏，第 4-5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关于取消北方局组织的决定》（1930 年 12 月 9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407 页。

区重要地方组织。

互济会顺直办事处党团 1931 年 1 月 1 日致信中央和远东局，要求“立即停止中央政治局，由远东局直接召集临时代表大会（紧急会议）”，“立即停止河北省委职权，由反立三路线最坚决的党部和党团，发起召集各党部、党团联席会议，暂行代替省委职权”。<sup>1</sup>在 1 月 3 日天津市委扩大会议上，本来中央已决定调往上海的曹策突然发起挑战，“开会时曹策和另外一个常委临时提议今天的会议要改为紧急会议，一致通过，赵茨平主席，曹策报告人”，童长荣作为立三路线执行者受到批判，也“没有抵抗”。天津紧急会议认为，立三路线的第一个来源是六大产生的中央，“第二个来源是党的家长制度”；会议宣布“党的领导，中央、省委和天津市委的领导破产”，“停止中央和省委的职权，号召各地党部一致斗争”，速来天津“召集紧急会议”。会议宣布童长荣被撤职，选出了新的天津临时市委，曹策、赵茨平、赵普为常委。<sup>2</sup>

1 月 5 日，曹策、阮啸仙、张昆弟等宣布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曹策（天津）、蒋晓海（互济会）、李友才（唐山）、徐树文（共青团）为常委，张昆弟为筹备委员，李友才为秘书长，蒋晓海为宣传部长，曹策为组织部长。<sup>3</sup>1 月 7 日，河北省委机关开直属支部组长联席会，筹备处派人参加，“曹策出席作了四小时以上痛哭流涕的报告，煽动省委工作人员自由选择工作，对省委罢工怠工，为筹备处工作。啸仙同志代表省委出席，在会议上正式决议直支加入筹备处，派吴华梓作代表参加筹备处工作，承认筹备处总的精神正确，组织上是群众反立三路线的布尔塞维克创作，指出省委阻碍反立三路线斗争，政治上组织上都完全破产”，“省委机关整个动摇，秘书长起直至大部分工作人员都加入筹备处”。<sup>4</sup>

阮啸仙是代理河北省委副书记、张昆弟是省委委员，吴华梓（吴化之）是省委秘书长，由于九十六号通告的影响，河北省委多数干部没有反对“紧急会议筹备处”，反而帮助它夺取了华北党组织的领导权。“紧急会议筹备处”在天津成立之后，派人到北京、唐山、山西、陕西等地活动，曹策后来说，他们派人到各

<sup>1</sup> 《革命互济会河北办事处党团关于立三路线问题致中央和国际远东局的信》（1931 年 1 月 1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2），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 1999 年，第 114 页。

<sup>2</sup> 《童长荣关于河北反立三主义路线的斗争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的报告》（1931 年 2 月 3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24-26 页。

<sup>3</sup>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筹备处反省委反中央问题的报告》（1931 年 3 月 12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118-119 页。

<sup>4</sup> 《最近一个月的河北情形》（1931 年 3 月 14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127 页。

地是准备召集大会。<sup>1</sup>虽然大会议划没有成功，但在各处都引发了党组织的混乱，中共在华北的组织体系基本瘫痪。

## （二）反对派争夺领导权，远东局尝试说服未果

紧急会议的计划已经公开，在中央权威崩溃的情况下，各级组织已经开始自发准备紧急会议，试图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执委会却最终确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莫斯科的决定很可能是在 1930 年 12 月 23 日以后的几天内到达上海的，因为 23 日的九十六号通告还是延续着召开紧急会议的意思。

共产国际给远东局的电报草稿标明不早于 12 月 18 日，从草稿到正式稿、再到发出，上海要晚几天才能收到电报。共产国际指示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是：“（1）无条件地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电报和信函中提出的路线”；“（2）修改和批判三中全会的决议”；“（3）团结全党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路线”，“应取消三中全会进行的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拉进中央的补选”，把瞿秋白“赶出政治局，用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达到新老干部的团结并坚决消除他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可能”。从电稿可以看出，四中全会最重要的任务是改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明确要求提拔“新的力量补充中央委员会”，预料到准备四中全会有一定难度，特别提到如果“需要推迟一段时间的话，我们将不反对。”<sup>2</sup>

此时共产国际是维持中共党内秩序的主要权威，但米夫和远东局面对的局势有点棘手。中共中央已经在连续认错之后威信扫地，而四中全会的主体显然是原中央委员，其中还包括已被宣布为错误的三中全会增选的 15 个中央委员，由这些人开会来决定中共的新领导机构和新政策，很难说服已经在民主热潮中动员起来、群情激奋的反对派。不仅如此，米夫早就想把王明等得意门生提拔到中共领导岗位，而且在批判立三路线之后，这个想法已经得到共产国际高层的认可，但王明等留苏学生经验和资历都很不够，在中共党内很难得到罗章龙、何孟雄等反对派资深干部的支持。

所谓罗章龙、何孟雄反对派并不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只是在反立三路线和调

<sup>1</sup> 曹策：《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与北平天津党组织》，《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北京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5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草稿》（不早于 1930 年 12 月 18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43-544 页。

和主义大旗下聚集起来干部群体，他们力图通过党内民主自下而上改组中共中央和各级组织，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并不一致，其中很多人并没有成熟的政治思想，他们的要求主要是在组织上争取领导权。具体讲，反对派的基地包括以两任党团书记罗章龙、徐锡根领导的全国总工会，以何孟雄、王克全为核心的江苏省委及上海地方组织，以党团书记林育南、秘书长李求实为核心的苏淮会，还包括铁总、海总、互济会、华北地方组织等。反对派多数是有长期斗争经验和历史功绩的干部，很多是中国工人运动的骨干，其中不少是中央委员，他们看不起王明等毫无经验的留苏学生，自以为有资格取代屡犯错误的中央。

米夫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谈到了当时王明派和罗章龙派斗争的情况：“旧的领导被排挤到了一边，整个党内斗争实际上是由其他两派人在进行”。一派是号称“青年共产国际派”的王明、王稼祥、沈泽民、夏曦、陈原道等，“公认这一派在共产国际来信前早就对李立三路线进行了原则性的斗争”；另一派包括全总的几名工人领袖，“以何孟雄和罗章龙为首，在四中全会前夕活跃起来。起初，这两派以‘不成文的协议’（或未商定的联盟）方式共同反对立三主义和立三派分子。但很快——越往后越明显——暴露出了这两派之间的分歧。在反立三主义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实际上党内展开了这两派之间的斗争，这实质上构成了四中全会前夕（12月）和全会期间整个党内斗争的内容。”<sup>1</sup>

此时原中共领导已经失去威信，为顺利召开四中全会，远东局成员不得不亲自出马做何孟雄等的工作。在 12 月 29 日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温裕成的谈话中，何孟雄明确反对召开四中全会，坚持召开能容纳更多本派代表的紧急会议，他认为“出席四中全会的将是一些旧中央委员，他们不了解群众在做什么，党内群众在想什么”，原政治局成员应撤职，王明等缺乏经验，应该由反对派的代表人物进入新的政治局。谈话记录中有：“在回答需要撤消哪些人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职务时”，何孟雄回答，应该撤销周恩来、瞿秋白、向忠发、关向应、项英的政治局委员，撤消李维汉和贺昌的中央委员职务。何孟雄还说：“所谓的青年派”王明等人“只会写点东西，而且常常写一些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在回答同志们会建议什么人进入政治局以取代他们建议开除的那些政治局委员时”，何孟雄说：“来自实际工作中的工人积极分子”。很显然，何孟雄不能接

<sup>1</sup>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17页。

受毫无经验和功绩的年轻留学生后来居上，担任中央领导。远东局成员谈话后形成了这样的印象，何孟雄“是个精力充沛型的人，政治上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位明白事理的人。但是他给我留下一个狡猾的印象，他善于利用工人与政治局作斗争，他自己想当领袖。”<sup>1</sup>

12月30日，埃斯勒同徐锡根进行了谈话，徐虽然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此时倒向了反对派。他在谈话中猛烈攻击中央，同时攻击王明等留苏学生，想要掌权的意图十分明显：“目前在党内，特别是在上海，形成了非常危急的形势。基层党组织反对中央并要求坚决进行改组。我的意见以及工人同志的意见是：应该解决政治局和中央改组的问题。一切错误都是中央犯的”。“这个中央是没有希望的。基层党组织不信任这个中央。对回来的大学生也一点儿不信任，在基层党组织中对他们存在着强烈的反感情绪。当然，他们会写，但是他们没有任何实践经验。戈卢别夫（即王明）曾经在上海工作过，但是他进行过无原则的斗争。”<sup>2</sup>

徐锡根甚至代表全总提出了新政治局和中央委员名单，谈话记录中有：“问：关于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组成你有什么建议？答：我们在自己内部曾讨论过多次，我这里有一份完整的名单。”中央领导人中应该撤职的有：李立三、项英、关向应、罗登贤、李维汉、温裕成、瞿秋白、周恩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应该由这些同志组成，政治局：陈郁，张国焘，罗章龙，卢福坦。中央委员会：李庆强，徐炳根，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杨立安，宁迪卿，汪第万，周逸群，刘林元，刘达潮，曾山，滕代远，王首道，刘希奇，李财舍，林育南，刘子载，何孟雄，萧明，陈云，李震瀛，李富春，徐阿梅，孟坚。“问：这个名单你是怎么拟定的？”“答：我们在中华全国总工会讨论过这个名单，它是讨论的结果。”<sup>3</sup>

1931年1月3日，埃斯勒又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进行了谈话，这三人是远东局准备提拔进入领导核心的工人干部，徐锡根、陈郁将被提升为成政治局委员，王克全将被提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谈话的核心是四中全会的代表组成和新中央的人选，但这三个人的意见明显接近反对派。徐锡根提出罗章龙等应该进入新政治局：“有些同志建议增加两名政治局委员。应该进入政治局的还有罗章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与何孟雄和温裕成的谈话记录》（1930年12月2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567-568页。

<sup>2</sup>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1930年12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569-570页。

<sup>3</sup> 《埃斯勒同徐锡根谈话记录》（1930年12月3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571-572页。

龙和卢福坦。”陈郁则提出：“不能同意四中全会的人员组成，我认为，曾经支持过李立三的中央委员应该退出中央委员会。”王克全也认为：“四中全会的大多数应该由与李立三进行过斗争的人员组成。他们应该拥有表决权。我们反对周恩来，他对南京起义负有责任。向忠发所犯的错误太多，他不应该留在总书记职位上。必须改组所有领导机构。”<sup>1</sup>

从这份全总讨论产生的中央领导名单可以看出，罗章龙等确实有全面掌握中央领导权的意图。他们力主召开紧急会议，反对召开以原中央委员为主体的四中全会，以便容纳更多本派的支持者，在会议中取得多数优势，彻底改组中央。中共中央 12 月中旬让步过大，反对派的期望值很高，不会轻易满足了，共产国际成员与反对派主要代表的多次谈话都没有取得满意结果。让远东局更为不满的是，他们和李立三一样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不像王明等人那样完全服从，这使得反对派很难得到共产国际的信任。

反对派的危险倾向使得米夫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四中全会，与反对派无法合作，只能采取分化瓦解的方法，孤立罗章龙、何孟雄等知识分子领袖，力争把受他们影响的工人干部拉过来。在后来给共产国际的信中，米夫对反对派做了政治分析：反对派“要求立即撤消所有中央委员的职务并将他们开除，立即停止政治局的活动，紧急召开代表大会，它把从原则高度同立三主义的斗争完全转化为狭隘小集团的、纯粹个人的斗争”。何孟雄在同雷利斯基同志谈话时，“完全否认党内右的危险”，而郭妙根则“重复了陈独秀关于红军是匪帮的胡言，他公开讲中国苏维埃运动没有前途，共产国际七月来信的方针和决定是不正确的”。我们很清楚，第二派“只是利用这一斗争和打着这一斗争的旗号追逐小集团的而不是党的利益，它所谓的反对立三主义的斗争不是从共产国际的立场出发的，而主要是从右派立场出发的。”<sup>2</sup>

米夫的方案是由原中央领导、王明等留苏学生、从反对派分化的工人干部组成三结合的新中央。他在 2 月底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明了改组中央的思路：“为旧领导中的优秀分子保留领导工作机会”；“把坚定地为共产国际路线而斗争的所谓‘青年人’推上负责工作岗位”；“使工人同志离开罗章龙，使他们脱离派

<sup>1</sup> 《埃斯勒与徐锡根、陈郁和王克全的谈话记录》（1931 年 1 月 3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585-586 页。

<sup>2</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 年 2 月 22、23、25、2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18 页。

别分子的影响，争取使他们同‘青年人’和旧领导中的优秀部分联合在一起。关于后一项任务，即关于分化罗章龙派的必要性再说两句。何孟雄和罗章龙是陈独秀式的旧知识分子干部的典型代表。但他们这一派包括部分工人。其中有徐锡根、陈郁、余飞、王克全，他们都是中央委员”，“被罗章龙拉进了不是追求党的利益的派别。虽然他们不是党内优秀的工人分子，但失去他们毕竟没有任何意义，相反，应使他们脱离罗章龙的影响，同时还应把他们推上重要的领导岗位。”<sup>1</sup>

### 三、六届四中全会与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

#### （一）六届四中全会上的激烈冲突

米夫分化反对派、成立三结合中央的计划有其合理性，但落实计划需要时间，也需要合适的人来做细致的说服工作。实际上，张国焘已经动身回国，他和反对派领袖罗章龙、何孟雄是北大同学，一起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在工人干部群体中有很深的历史影响，是与反对派沟通的最佳人选，连周恩来都认为：如果张国焘早点回来，“和他们事先谈谈，可能一切迎刃而解。”<sup>2</sup>也许是米夫对共产国际的权威过于自信，也许是白色恐怖下党内混乱状态拖下去太危险，六届四中全会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召开了。

1931年1月7日，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sup>3</sup>的直接领导下召开，会议开了一整天。“到会的人数三十七人：工人成分二十二，农民一，中央委员二十二人，非中央委员十五人。”<sup>4</sup>不少学者认为米夫通过增加列席代表才操控了四中全会，但实际上15名列席代表中7人属于反对派。下面是四中全会出席名单和他们在全会前后对远东局的态度，当然这里的“支持”或“反对”是相对的，比如瞿秋白、李维汉、贺昌受到降级处分，他们的“支持”未必心甘情愿，只是

<sup>1</sup>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18-119页。

<sup>2</sup>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460页。

<sup>3</sup>杨奎松在《王明上台记》中根据俄国档案中署名艾伯特的德文总结发言，认为是远东局新来的德国人艾伯特主持。不过，1930年7月29日共产国际决定的远东局组成6人名单中无艾伯特，四中全会前后和中共接触的远东局代表大多是德国人罗伯特（埃斯勒），1931年2月20日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汇报四中全会过程的也是他，当时革命者用很多别名，或许艾伯特是罗伯特（埃斯勒）的别名。

<sup>4</sup>《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3-524页。

遵守纪律，不敢对抗共产国际而已，具体投票时有些人的选择可能受到会场气氛影响。此表是根据会议前后档案材料中对各人表现的记录，结合罗章龙、李维汉、张金保、陈郁等会议参加者的回忆综合而成，大致如下：

(A) 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2人，其中6人为三中全会补选）：

支持派（14人）：向忠发、周恩来、关向应、罗登贤、任弼时、顾顺章、温裕成、陈云、周秀珠（女）、徐兰芝、袁炳辉、瞿秋白、李维汉、贺昌

反对派（6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

动摇派（2人）：徐锡根、陈郁

(B) 列席人员（15人）：

支持派（8人）：王明、沈泽民、王稼祥、陈原道、夏曦、博古、柯庆施、顾作霖

反对派（7人）：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sup>1</sup>

四中全会的准备是秘密的，这也许是白色恐怖下的安全考虑，也许是故意不让反对派有机会事先准备。罗章龙等到会场后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他们公开表示异议，罗章龙、韩连会、王凤飞提议改为召开紧急会议，国际代表则坚持按原计划召开四中全会。向忠发主持表决，会议记录显示：“赞成国际代表意见的十九票”，“反对国际代表提议的，无”，这大概就是罗章龙等后来说会上有十九人集团的由来。<sup>2</sup>其实无论是紧急会议，还是扩大的四中全会，都只能由远东局召集，出席名单由远东局确定。会场上出席人员已经很难改变，名称的差别意义有限，投票有一定随意性。反对的“无”，当然不是说无人反对，罗章龙等不想刚开会就与国际代表决裂，他们最关注的还是涉及权力分配的领导机构改组。

全会开了一整天，政治报告和政治讨论占用了主要时间，其中虽然有争论，但总体还算顺利进行。向忠发做了政治报告，表示既要反对立三路线，也要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王明作了很长的理论性的发言。瞿秋白、周恩来、李维汉等作了自我批评的发言，多数代表都发了言，大致都批评立三路线和三中全会。<sup>3</sup>反对派

<sup>1</sup> 出席六届四中全会37人名单据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145-146页。

<sup>2</sup>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第212页。

<sup>3</sup>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325-328页。

虽然也表达了一些不同意见，罗章龙谈到“目前没有革命高潮”，何孟雄说“不要夸大了右倾危险”。<sup>1</sup>但总的来说，反对派对共产国际的政治路线表示支持，并没有提出独立的政治主张，何孟雄还在发言中说：“我同意忠发同志报告。”<sup>2</sup>

最激烈的对抗发生在领导机构选举过程中。在政治局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十六人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二十一票通过远东局提出的中央政治局名单”；在中央委员会选举中，远东局提出了一个名单，史文彬提出了另一个名单，会议记录显示：总表决结果，“赞成远东局名单的二十票，反对二票”，通过；“赞成史文彬名单七票”，否决。<sup>3</sup>远东局的政治局和中委名单拒绝了反对派的大部分要求，他们非常失望，愤而退场，虽然被人拉住，但拒绝参加表决。罗章龙描述了当时激烈混乱的场面：“座中诸同志不耐，以脚擦地板，会场上一片嘘声四起，登时秩序紊乱。”<sup>4</sup>工人代表袁乃祥对提升王明参加中央领导极为愤怒，“声色俱厉”说：四中全会“是充满欺骗、诡诈、奸谋的丑恶把戏，你们背叛党章，违反全体党员的意志。”<sup>5</sup>王明对这一场景也印象深刻，说袁乃祥当时“拍案咆哮”。<sup>6</sup>

远东局掌握了会场上的多数，在混乱中勉强完成了选举。分化反对派的策略发挥了一定作用，徐锡根、陈郁等反对派的重要人物勉强接受了四中全会，他们当选政治局委员。陈郁说：“我深刻考虑和分析了当时情形，当时我想若我还继续反对中央立场，显然是违背党利益，所以自己决定不反对，主张开会，另方面我还是希望四中全会可能会解决目前党一些需要的任务，所以自己转变了过去反对立场”。<sup>7</sup>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汇报时也说：“工人小组领导人陈郁和徐锡根同志在这次全会上表现得信心不足，但比较守规矩。”<sup>8</sup>

毫无疑问，六届四中全会的主要任务就是改组中共中央，选举结果：李立三、瞿秋白、李维汉退出政治局，陈郁、任弼时、王明、刘少奇、王克全五人加入政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 1 月 17 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 年 1 月 20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475 页。

<sup>2</sup> 《在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的发言》(1931 年 1 月 7 日)，《何孟雄文集》，第 213 页。

<sup>3</sup>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 年第 11 期，第 207-208 页。

<sup>4</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460 页。

<sup>5</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628 页。

<sup>6</sup>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奋斗》，《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714 页。

<sup>7</sup> 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678 页。

<sup>8</sup>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97 页。

治局；中央委员会退出了李维汉、贺昌，而补选了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王尽仁、黄苏、王明、沈泽民、夏曦、曾炳春九人。从改组结果看，多数中央领导继续留任，但也让不少反对派的工人干部进入中央，陈郁、王克全进入政治局，韩连会、沈先定、许畏三等进入中央委员会。但反对派的灵魂人物罗章龙、何孟雄被刻意压制，反对派要求罗章龙进政治局、何孟雄进中央委员会未被接受，大概是考虑到这两位北大出身的知识分子不像工人干部那样容易控制。留学生进入中央领导层的并不多，王明、沈泽民、夏曦进入中央委员会，王明直接进入政治局，博古则连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政治局 16 人名单包括：正式委员 9 人（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候补委员 7 人（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这就是米夫计划的由旧中央、留苏学生、工人干部三方结合的新领导集体。

## （二）罗章龙等反对四中全会的分裂活动

实际上，罗章龙预料到远东局不会接受本派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前已经提出了分裂的主张，而且开始了分裂的准备。徐锡根说，“四中全会前，罗章龙、何孟雄便找徐锡根、王克全、陈郁等同志开小组织式的会议，讨论党的前途，罗章龙即主张分裂”。<sup>1</sup>徐锡根后来在声明书中说：“四中全会以前，我曾经与文虎（即罗章龙），孟雄，大汉（即李震瀛）等同志最初谈过一次话，主要的是对紧急会议与四中全会问题，大家一致主张开紧急会议，同时说到党的前途问题”，“文虎主张离开党与分裂党的斗争”。<sup>2</sup>

米夫也提到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已开始做分裂的准备：“罗章龙早在全会以前就有意识地、精心地和深思熟虑地拼凑了反党集团，采取了分裂党的方针。从涉及派别分子的一些声明中和根据现在发现的一系列事实可以清楚地看到：(1) 罗章龙在四中全会前一周就将总工会印刷厂转移到了另一个只有他知道的地方；(2) 他把工会的资金留在他自己那里；(3) 他在四中全会后立即编写和出版了他那本有名的小册子；(4) 在全会后第二天他在一家旅馆里召开了这个派别领导人的会议，罗章龙在会上作出了关于开始公开反对中央、反对四中全会和反对我局的

<sup>1</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 年 2 月 2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524-525 页。

<sup>2</sup> 《拥护四中全会宣布脱离右派的声明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549 页。

决定；(5)早在四中全会前他就成立了自己的上海省委”。<sup>1</sup>

1931年1月8日，四中全会后仅一天，反对派即召开“反对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参加此会的自称十六代表，大致包括四中全会上持反对派立场的十三人：罗章龙、史文彬、张金保（女）、王凤飞、王克全、余飞、何孟雄、韩连会、许畏三、沈先定、肖道德、邱泮林、袁乃祥，加上会后又倒向反对派的二人：徐锡根、陈郁，以及到上海后却没能参会的东北中央委员唐宏经。会上通过了罗章龙起草的《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成立了由罗章龙、何孟雄、徐锡根、王克全、王凤飞五人组成所谓“临时中央干事会”，开始在组织上准备分裂。<sup>2</sup>

反四中全会代表团会议开过以后，罗章龙的小册子《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大纲》“即由全总印厂铅印分发，经全总交通路线发到各省各工会中去，江苏经王克全的活动，连敌人士兵支部中都散进去了。”<sup>3</sup>罗章龙回忆，《大纲》提出后，“在纲领上签名者有九十六人，包括上述第九项各级党组织负责人”，“铅印五千份，分送党内各支部作为报告讨论之用。同时将纲领转寄各苏区支部。纲领译文送第三国际、赤色职工国际、少共国际以及各国兄弟党。”<sup>4</sup>

《大纲》集中表达了罗章龙等的政治主张，首先就是要彻底改组整个中共中央，“从根本的解决政治上组织上诸问题。”《大纲》声称反对派阵容强大，“包含有中央委员之一部分，全总党团，海总党团，铁路总工会办事处党团，上海工联党团，上海反帝同盟党团，苏维埃区代表团全体同志，苏准会工作全体同志，江苏省委外县委员会书记全体同志，北方天津党部，山东省委，青岛市委，上海各区委（闸北沪东沪西法南护中等）及上述各地的所属多数产业支部，中心支部，中央直属小组以及全国积极的工会干部同志等（青岛上海天津武汉海员铁路苏区厦门等地）”。<sup>5</sup>

《大纲》抨击四中全会违反民主原则，没有合法性，“是丝毫没有民主化的

<sup>1</sup>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21-122页。

<sup>2</sup>《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5页。

<sup>3</sup>《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5页。

<sup>4</sup>《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87页。

<sup>5</sup>《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64-465页。

包办式的会议”；同时指责四中全会没有完成改组中共中央的任务，保留了多数犯错误的原中央成员，而新选入的王明等人毫无经验：“周恩来、向忠发、项英、任弼时等仍旧继续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李立三、瞿秋白仍使其隐藏中央委员会之内，对于毫无工作经验同样犯有立三路线错误的陈绍虞等，使其加入政治局负领导重责。”罗章龙派不敢反对共产国际，把矛头指向了米夫，抨击米夫曲解国际路线，刻意提拔自己的私人亲信王明等人，“坚决的要求国际撤换他的职务，纠正他的错误”。<sup>1</sup>

值得注意的是，在四中全会上没有表示反对的徐锡根、陈郁，仅仅一天之后又倒向反对派，说明这些工人干部政治上确实不太成熟。陈郁回忆：“我对中央新成分那些人，他们过去没有做过什么工作，又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中锻炼，那时我对那些人是没有一点信仰的情绪”。“四中全会后，在全总党团会议上，自己的发言是坚决反对这个会议，主要内容是这次会议没有解决问题。”相对于王明等人，徐锡根、陈郁等受长期领导工人运动的罗章龙等影响更大。陈郁说：“罗章龙那些人在他们未分裂党之前，我个人对他们信仰当然比较好，主要是我知道他是工运工作很长历史，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干部”。“当时我思想上认识对中国革命重要性主要是工人运动，自己的重视党内干部也是从工人运动中有锻炼的干部是较相信的，的确我有些偏向是过分看重大人运动和不足够认识革命其他部分的倾向的毛病”。<sup>2</sup>

在反对派的积极活动下，很多党组织都受到了影响，甚至发生了分裂，其中比较重要的是江苏省委、全总党团等。王克全、许畏三、蒋云、陈资平、吴国治、刘瑞龙“在江苏省委发动，反对四中全会后新中央政治局改组的新省委，而占领省委机关，召集江苏二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一部分省委委员成立第二省委”；“王凤飞便在上海的闸北，蔡伯真、彭泽湘在上海的中区，蒋云便在外县来上海的同志中成立他们的第二区委，宣告外县工作独立，来反对省委来分裂党”。<sup>3</sup>王克全等“还侵占工会经费作为第二党第二工会的活动费”。<sup>4</sup>“全总党团大多数同志在罗

<sup>1</sup> 《力争紧急会议反对四中全会报告大纲》(1931年1月)，《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67-469页。

<sup>2</sup> 陈郁：《反立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78-681页。

<sup>3</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5页。

<sup>4</sup> 《关于开除王克全党籍决议案》(1931年1月3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99页。

章龙、徐锡根、余飞三同志领导之下，公开的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在国际路线下的领导”。<sup>1</sup>

当时在江苏省委工作的刘晓回忆：“王克全带了几个人闯到老靶子路十号的省委秘书处的秘密机关，要接收省委文件。负责省委财务工作的彭休士和我都在场，我们拒绝交出，他们就吵吵嚷嚷不肯罢休。”<sup>2</sup>李初梨担任上海沪东区巡视员，是王明的支持者，据他回忆：“沪东区是何孟雄等人的大本营，反对四中全会的人最多，只有张琴秋一人拥护四中全会”。1月17日他和张琴秋去华德路小学参加支部会，参加者有二三十人，大家情绪非常激动，“都是昏头昏脑。支部大会作出决议反对四中全会，这时张琴秋站起来宣布：我代表区委解散你们支部大会”，说完两人赶紧离开会场，不然很可能挨一顿打。<sup>3</sup>

### （三）共产国际说服反对派的最后尝试

远东局为阻止党的分裂，1月17日召集全总党团二十多人在沪西一个花园别墅开会，罗章龙后来称其为“花园会议”，但是会上仍然是激烈对抗，当场决裂。中共中央报告提到，“全总党团在罗章龙、徐锡根领导之下于一月十七日会议席上公开反对四中全会，反对国际代表，并成立与党对立的决议”。<sup>4</sup>

罗章龙回忆，在会上“国际代表轮流发言，作了长篇讲话，态度极为强硬”，讲话主要意思包括：“当前中共党内主要问题是右倾”，“对国际应绝对服从，国际指示是绝对正确的，四中全会是体现国际正确路线的”，“王明虽然犯过组织纪律错误，但他们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很正确，中国革命离开他们是不行的”。但是反对派并未屈服，“国际代表发言后，在坐的中委、干部都积极发言，也讲了几个钟点”。他们的发言内容包括：“王明本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是辨别党内大是大非的原则性斗争，我们要求国际代表以中国革命为重，对四中全会决议收回成命，定期召开七大会议或紧急会议”；“坚持不同意王明当选中央委员”。国际代表最后宣称：“你们反对国际路线，反对四中全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74页。

<sup>2</sup>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红色往事》第一册，济南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sup>3</sup> 李初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纪实》，《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09页。

<sup>4</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5页。

会就是反党、反国际”。<sup>1</sup>

埃斯勒报告也提到工人干部的动摇和全总党团会议上的决裂：“四中全会后，在有一名右派参加的编辑委员会内，这名同志拒绝了他在一天前投票赞成的决议。徐锡根和陈郁又开始摇摆不定，他们成了企图把上海组织和工会抓到手的右派集团的工具。全会后一两天，海员工会党团领导人、政治局委员陈郁同志就作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报告。四中全会后几天还召开了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会议，出席会议的大约有 20 名同志。另一名政治局委员同时又是红色工会领导人的徐锡根同志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那里开展了反对四中全会的斗争，这次会议变成了精心策划的攻击共产国际及其政策的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的决议案“被否决，这时他们就离开了会场。”<sup>2</sup>

张金保回忆，表决中只有罗登贤、关向应、杜作祥和唐某四人支持国际代表的决议案。<sup>3</sup>会议通过了反对四中全会的《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明确反对“引进同样犯有坚决执行立三路线、调和主义、丝毫无实际工作经验的陈韶玉等负政治局领导重责”，同时强烈抗议国际代表“对于多数同志们提出的政治意见，不采用党内正确的思想斗争的方式，而实行一种无原则的漫骂、挑拨、诬蔑同志的宣传和煽动，并且一再强迫同志通过其无理由的决议”，“要求国际撤换负四中全会主要错误责任的代表，另派真正能够执行国际路线的代表来领导中国革命”。<sup>4</sup>

## 四、罗章龙等成立“非常委员会”及其对各地影响

### （一）中共中央发动反击，反对派在上海遭遇挫折

罗章龙等的分裂活动很快遭遇意外挫折。当时白色恐怖很严重，国民党特务机关非常狡猾，如果被捕中共党员叛变，答应做特务工作，可能被很快释放，此

<sup>1</sup>罗章龙：《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 年 10 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734-735 页。

<sup>2</sup>《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97-98 页。

<sup>3</sup> 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第 169 页。

<sup>4</sup>《全总党团对于四中全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 年 1 月 17 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 247-248 页。

人就不知不觉成了潜伏的暗探。<sup>1</sup>但中共有严格的安全工作规则，一般是纵向单线联系，所以暗探的破坏也有限。但当党内斗争达到高潮，很多安全规则都被打破，横向联系增加，到处串联谈话，轻率召开人数众多、人员混杂的会议，这就给国民党特务机关大规模破获创造了机会。

1931年1月17日，反对派在东方饭店举行江苏、上海活动分子会议，显然由于叛徒告密，参会者遭到了租界巡捕的突袭，后来又有多人在中山旅社等地被捕，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三十多人很快被移交国民党政府，其中24人被上海警备司令部2月7日枪杀于龙华。被捕遇难者大多是江苏、上海的地方干部，其中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实、龙大道等几人是反对派的重要骨干。不过出席四中全会的反对派主要成员十几人中，只有何孟雄一人被捕，加入反对派的中央委员都安然无恙。东方饭店事件确实对反对派造成严重打击，但这个打击还不是致命的。

面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中共中央迅速展开了分化瓦解工作，积极争取各个地方组织和反对派重要成员，很多组织和个人又回到中央领导下。1月17日，王明主持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了《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批评王克全“在政治上既走上与右倾机会主义一致的立场，当然不可免地在组织上要走上分裂党的统一，和破坏党的组织的行动的地步。”<sup>2</sup>刘晓回忆，在争夺上海地方组织的斗争中，王明为首的省委派他去和沪西区委谈判，威胁如果反对省委，就要停发生活费。当时多数党的工作者都没有职业，没有其他收入，很多人为了生活所迫，不得不服从组织，与何孟雄等反对派断绝关系。<sup>3</sup>反对派控制的印刷厂也很快被夺走，罗章龙说：“劫夺印厂是由临中派政治保卫科负责人顾顺章亲率十余人伪称工部局包探，引便衣武装前往印厂搜查，首先进厂把全体职工禁管。李梅羹时正生病，卧床不起，彼等进屋，不由分说，将印厂机器设备及纸张等全部装上预先准备好的几辆汽车运走。”<sup>4</sup>

1月20日，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号召全党，要有布尔塞维克的坚定性，要像一个人

<sup>1</sup> 徐恩曾：《我和共产党斗争的回忆》，《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85页。

<sup>2</sup> 《拥护四中全会反对右派分裂党的行动的决议》（1931年1月17日江苏省委常委会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72页。

<sup>3</sup> 刘晓：《党的六届三、四中全会前后白区党内斗争的一些情况》，《红色往事》第一册，第128页。

<sup>4</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13页。

一样，坚决的反对这一反党反国际的右倾机会主义行动”。决议宣布撤销王克全在江苏省委和上海工联的领导职务，撤销罗章龙、徐锡根、余飞在全总党团的领导职务，改组全总党团和上海工联党团。海总领导陈郁虽然在政治局承认了错误，仍被要求召开海总党团召开会议，在会上书面检讨，海总党团也被改组。<sup>1</sup>

陈郁是反对派三个政治局委员中第一个承认错误的，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放弃了反对派立场。陈郁说：“我当开始反对四中全会时，自己是没有估计到罗章龙等人，把这个非委会去分裂和建立第二党”。“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四中全会后几天）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时候，我是承认自己所作的行动是错误，声明放弃自己反对四中全会立场”，“但政治局委员徐锡根，王克全两人在会议上仍坚持他们原来反对四中全会立场”。<sup>2</sup>陈郁脱离反对派后，许炳良、谭寿林、马骥、朱宝亭等气愤地写信谴责：“双方决胜关键时刻，你忽见利忘义，临阵脱走”，“你一念之差不仅丢尽工人阶级的体面”，“还贻误自己一生名誉。”<sup>3</sup>

1月25日，中央向全党和共青团发布《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书》，号召“给一切派别和小组织以无情的反抗”，“不要听信那些人召集你们去作继续不断的讨论和谈话，去开秘密的分裂党的会议”，并威胁要把这些分裂分子开除出党。<sup>4</sup>1月26日，改组后的全总党团通过决议：“全总党团常委会完全同意中央对罗章龙、徐锡根撤销工作立刻停止小组织活动的决议，如果他们仍继续分裂党的小组织的活动，党应给他们以组织上的制裁。”<sup>5</sup>

1月26日，王明主持召开上海活动分子会议，通过决议支持四中全会，谴责王克全、蒋云等另立省委，要求中央开除王克全政治局候补委员；谴责闸北区委书记王凤飞和朱秀英等另立区委，要求中央开除王凤飞中央委员；谴责沪东区委书记钱静安立场不稳，反复无常；最后提出“迅速召集各种会议（区委会，活动分子会，支书联会，各部会，各委员会，各党团会，团的各种会议）及广大的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1月17日全总党团会议与江苏省委报告的决议》(1931年1月20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76页。

<sup>2</sup>陈郁：《反思三路线中我的错误经过——陈郁同志在延安中央党校时思想总结的第三部分》，《罗章龙回忆录》(下)，第679-680页。

<sup>3</sup> 《许炳良、谭寿林、马骥、朱宝亭等给陈郁信》1931年，《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9页。

<sup>4</sup> 《中央委员会为肃清李立三主义、反对右派罗章龙告全体党员和共青团员书》(1931年1月25日),《六大以来》(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3-124页。

<sup>5</sup> 《全总党团常委决议案》(1931年1月26日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81页。

教育说服工作”，反对分裂，维护党的统一。<sup>1</sup>

2月4日，江苏省委书记王明报告了反对派在上海的失败：“右翼反对派已被粉碎，并已完全投降”。2月3日，“反对派省委决定解散并回到党内。王克全写了声明，请求同陈绍禹会见并进行谈话。上海右翼反对派领导人作出这个突然决定，主要是因为最近一周内上海的几乎所有区委和关键性支部、三个省的某些县委和市委在弄清右翼反对派的分裂和诋毁活动后立即脱离了反对派”。“在曾经是清一色反对派的沪中区，所有支部现在都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昨天举行了该区积极分子大会，有7个支部的代表参加。大会通过了反对反对派的分裂活动、反对王克全、支持四中全会、支持中央和省委的决议”，沪北、沪南、沪西区也实现了类似的转变，“只有东区情况不妙。”<sup>2</sup>米夫也提到沪东区是反对派最后的基地：“罗章龙的支持者将自己力量都集中在沪东区。他们在其他组织中不再起任何作用。至于沪东区，他们起初利用自己原有的联系保留了三个支部。近几天才把他们从那里赶走。现在他们没有一个支部，只是在两三个支部内有个别几名成员。”<sup>3</sup>

中共中央在2月22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详细叙述了反对派重要人物的转变过程：“徐锡根同志则经中央政治局多次解说之后，现在正式宣告脱离右派小组织，向党写过两次声明书”，王克全则在被开除后，“向党声明他愿立刻停止第二省委活动”。“中央省委对他们加紧斗争，右派便在党内宣告破产，所以全总党团中余飞等同志便开始承认错误，海总党团彻底转变”，“江苏省委中沈先定、刘瑞龙等同志亦诚恳的承认错误，各区委中外县工作人员中亦多部分转变过来，尤其是上海各支部最初被右派蒙蔽而反对四中全会的，现在亦已多回到国际路线下来，而拥护四中全会，并反对右派。”<sup>4</sup>

中央宣布反对派回党的三项条件：1、立即停止反党小组织活动，并写声明书承认错误；2、在党指定的会议上和工作中去承认和改正自己的错误；3 把原来担负的工作组织交待清楚并公开向党宣布自己参加罗章龙右派活动的经过及自

<sup>1</sup> 《上海活动分子会议关于扩大的四中全会总结与上海党的目前工作决议案》（1931年1月26日），《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6），第169-175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成员同陈绍禹谈话记录》（1931年2月4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38页。

<sup>3</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1年3月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206-207页。

<sup>4</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526页。

己所知道的关于这反革命派的一切情形。<sup>1</sup>米夫还提到把徐锡根和王克全等送去莫斯科学习的计划：“将来我们可能要派一些人去莫斯科。例如，徐锡根和王克全的问题就可能是这样，在四中全会上，我们曾有点轻率地把他们推举为政治局候选人，现在他们请求去学习。”<sup>2</sup>

## （二）罗章龙被开除党籍，成立“非常委员会”

到1月底，反对派不少核心成员已经屈服，徐锡根和余飞写了拥护四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央政治局1月27日通过决议，永远开除罗章龙党籍，决议称罗章龙“利用全总机关作为进行第二党组织与活动的大本营”，“决定开除罗章龙的中央委员与永远的开除罗章龙的党籍，并报告共产国际请求批准。”<sup>3</sup>

罗章龙等人被开除党籍后，反抗更加激烈，于1931年1月31日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罗章龙说，非常委员会“是国际代表和临时中央宣布开除许多同志的中委、党籍，并停止他们的工作以后，才被迫成立的”，“主要是中共六大中委、全总、铁总、海总、上总以及北方、东北区、江苏、山东和全国苏维埃准备会议委员等在上海的老干部”，<sup>4</sup>主要成员有：罗章龙、史文彬、李震瀛、王仲一、唐宏经、袁乃祥、沈先定、张昆弟、王凤飞、谭寿林、张金保等。

“非常委员会”3月4日写信给共产国际，<sup>5</sup>要求“迅速撤换米孚，收回成命，解散非法成立的临时中央”，“迅速派公正人员查明四中全会事件经过，对肇事人员予以纪律制裁”。<sup>6</sup>“非常委员会”还发出了《告全党同志书》，号召“各支部根据非委‘提纲’通告文件内容开展全党讨论”，“以实际革命行动为表率批判米、王集团”。<sup>7</sup>同一时期，“非常委员会”在《致中共各苏区信》中，呼吁“禁止米、王死党进入苏区”，“米孚、王明、向忠发等罪行重大，如派人窜入苏区，对首恶应处理制止，以平民愤”。<sup>8</sup>

<sup>1</sup>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第10页。

<sup>2</sup> 米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2月22、23、25、2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40页。

<sup>3</sup> 《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决议案》（1931年1月27日中央政治局通过），《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493-494页。

<sup>4</sup> 罗章龙：《致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函》（1979年10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735-736页。

<sup>5</sup> 《中国共产党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的信》（1931年3月4日），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第249页。

<sup>6</sup>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共产国际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4页。

<sup>7</sup>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6页。

<sup>8</sup> 《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致中共各苏区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7-498页。

“非常委员会”有许多资深的工运领导人，他们走向分裂后，派人到各地联系，华北、东北党组织受到较大影响。罗章龙说：“非常委员会”宣布“伪中央及其一切决议与命令一律无效。党的一切问题听候召集临时会议（即紧急会议）成立七大会合理解决”。“非委中央乃派人分途出发，前往北方、南方与中部地区布置新任务与新工作。决定文虎赴北京、唐山、辽沈、哈尔滨各地”，“又决定苏淮会代表迅速回到本苏区开展武装与工农群众工作。”<sup>1</sup>

### （三）罗章龙分裂活动对北方党组织的影响

“非常委员会”虽然在上海成立，但 2 月以后在江苏和上海就走向衰败，受影响时间更长的是北方党组织。1931 年 1 月 5 日天津成立“紧急会议筹备处”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召开四中全会。1 月 21 日袁乃祥回到天津以后，带来了四中全会的消息，并鼓动筹备处反对四中全会。张金刃（即张慕陶）、韩连会、王仲一等从上海回来后，与曹策等一起成为筹备处的核心人物。在 1928 年蔡和森写的北方干部简历中，张金刃、韩连会、吴雨铭被认为是顺直地区最强的三个干部，<sup>2</sup>此时三人都加入了反对派，对华北党组织破坏之大可以想见。

筹备处在张金刃等的领导下，宣布自己就是省委，除了早已控制的天津市委，还派吴华梓去北平，郝清玉去直南，曹振华去山西、保属，叶善之、袁乃祥、张昆弟去唐山。在筹备处的影响下，北平召开代表大会“通过加入筹备处与反四中全会”，赵作霖、肖鸣等成立第二市委，北京大学、中国大学等重要支部倒向反对派；顺直互济会党团加入筹备处；<sup>3</sup>保属特委在曹振华、徐步云等领导下加入筹备处，“太原特委表示积极参加筹备处，直南特委承认筹备处精神正确”。除了京东唐山党组织对筹备处进行抵制，华北多数党组织倒向反对派。<sup>4</sup>

在 2 月 6 日《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给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信》中，筹备处明确支持罗章龙等的“非常委员会”，认为党内存在“两个绝不相同的鲜明旗帜，一方面是真正布尔塞维克的营垒——由反四中全会十六个代表所领导的全国各地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彻底肃清立三路线、反调和主义斗争的党部和党团。一

<sup>1</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487-488 页。

<sup>2</sup> 《蔡和森关于北方干部简历》（1928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一），中央档案馆 1992 年，第 143 页。

<sup>3</sup> 《最近一个月的河北情形》（1931 年 3 月 14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130-132 页。

<sup>4</sup>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筹备处反省委反中央问题的报告》（1931 年 3 月 12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第 122-123 页。

面是小资产阶级的集团——由十九个人所领导的李立三派及陈绍禹派的小组织。”<sup>1</sup>筹备处甚至认为罗章龙等不够勇敢，建议“非常委员会”宣布代行中央职权：“1、中央非常委员会的组织，应立刻公开号召全党，它是目前党的最高领导机关。2、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应确定执行中央临时政治局职权，制定各项决议，领导全国工作，统一全国斗争，并迅速准备全国紧急会议的召集。”<sup>2</sup>

筹备处在支持“非常委员会”的同时，也要求经费支持，2月10日给“非常委员会”的信提到：“紧急会议的筹备及陕西去人都万分急需经费，此间零星接待万难维持，望急设法寄款为要，并望即批准预算”。<sup>3</sup>筹备处确实派人去了陕西，本来陕西省委接到中央四中全会文件后，2月15日表决接受四中全会决议，但是从山西来的筹备处代表到达并报告后，陕西省委又“开始动摇犹豫了，由常委会又成立一决议，反对四中全会”，“参加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但是到3月28日，陕西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又转向拥护四中全会，回到中共中央旗下。<sup>4</sup>

1月底，徐兰芝、陈原道、贺昌等组成的中央代表团到达天津，2月6日召集会议并决议成立河北省临时省委，同时宣布“解散右倾机会主义分裂党行动的筹备处组织及天津临时市委”。<sup>5</sup>河北临时省委以徐兰芝为书记，陈原道为组织部长，这时站到临时省委一边的人数不多，包括阮啸仙、余泽鸿、贺昌、蒋晓野、周启敦、侯镜如、胡锡光、陈复、北平市委书记刘锡五等，临时省委还派陈原道去唐山，派阮啸仙去北平，派吴正廷去直南，派薄一波去保属，传达四中全会精神，努力使地方组织脱离筹备处的影响。<sup>6</sup>当时华北党组织陷入混乱，幸而北方军委（省军委）有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作系统，临时省委借此与各地方组织恢复联系，与筹备处展开艰苦的争夺。<sup>7</sup>临时省委2月18日决议开除张金刃、韩连会、曹策、叶善之党籍，2月24日又开除吴华梓党籍。

在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提到，罗章龙等“派张金刃、韩麟（连）会、王仲一到顺直去，唐宏经到满洲去；李震瀛到香港去，进行第二党的活动。”“惟

<sup>1</sup> 《河北紧急会议筹备处给中央非常委员会干事局信》（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9-51页。

<sup>2</sup> 《河北省紧急会议筹备处关于工作情况及经费问题致中央非常干事会的信》（1931年2月10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58页。

<sup>3</sup> 《陕西省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决议案》，《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3），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1992年，第326页。

<sup>4</sup> 《河北省临时省委拥护四中全会与接受中央对河北党工作指示的决议》（1931年2月6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47页。

<sup>5</sup> 《河北省临时省委报告》（1931年3月4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3），第88-90页。

<sup>6</sup> 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

顺直党中，机会主义根基较深，而右派一些领袖又多在顺直做过工作，如吴雨铭、韩连会、张金刃、袁乃祥、李希逸、张昆弟、王仲一甚至韩磷符，他们都集中在天津，并且还影响了一些干部，所以那里的斗争还很艰苦，中央现在更派负责同志去巡视。”<sup>1</sup>这位负责同志，就是刚从苏联回来的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他于 2 月下旬在天津召集“北方区紧急会议”，一定程度稳定了北方党组织。<sup>2</sup>但是，一直到三月份，虽然河北临时省委逐渐占据优势，一些参加过筹备处活动的人开始回到党内，但是筹备处还在继续活动。

4月8日，双方的斗争以出人意料的方式结束。在狂热的党内斗争中，秘密工作规则失效，人心动荡之中也容易出叛徒。当天河北临时省委召开常委全体会议，同一天筹备处也召集秘密会议。国民党天津公安局显然获得了准确情报，同时搜捕了两处会场，逮捕了河北临时省委徐兰芝、陈原道等 13 人，也逮捕了紧急会议筹备处张金刃、吴华梓等 11 人。<sup>3</sup>筹备处无力重建，基本覆灭；河北临时省委虽然迁往北平之后重新建立，但下层组织经过大动荡之后损失惨重。当时北平基层党组织主要是在各大学，在这场党内斗争中，“北大支部整个瓦解了”，有的跟筹备处跑，有的消极了。当杨纤如受命恢复组织时，有人伤感于党内斗争翻脸无情，表示只想安心读书，有人说暗探时常出没不要再来，有人三言两语打发，有人甚至直接将其推出门外。<sup>4</sup>华北党组织元气大伤，短期内难以恢复。

东北党组织受到分裂活动的影响也比较大。1931 年 1 月下旬，唐宏经和徐文雅夫妇回到沈阳进行分裂活动，受到了满洲省委抵制，“省委已严厉拒绝与他们发生任何组织关系，指斥他们的错误，反对他们这种活动，禁止他们在满洲党内作任何活动。”<sup>5</sup>但是唐宏经在北满有深厚基础，他 2 月 7 日到哈尔滨积极活动，影响了一批人，在 2 月 16 日北满特委会议上，参会 8 人中只有 3 人支持四中全会，另外 4 个特委成员和共青团领导人张乃文都支持反对派，他们占据了特委机关。<sup>6</sup>虽然满洲省委后来开除唐宏经等人党籍，重建了北满特委，但损失已经难以

<sup>1</sup> 《中共中央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电——报告四中全会经过》(1931年2月22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2)，第 525-527 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第 475 页。

<sup>3</sup> 《河北临时省委关于省委被破坏情况致中央的信》(1931年4月21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7)，第 192-193 页。

<sup>4</sup> 杨纤如：《30年代初北平地下党斗争片段录》，《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第 42-43 页。

<sup>5</sup> 《中共 满洲省委紧急通知》(1931年1月31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7)，中央档案馆等 1988 年，第 58-59 页。

<sup>6</sup>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1)，第 35-51 页。

挽回，“哈尔滨从前听说有七个士兵支部，但都是把持在右倾小组织的分子手里，所以现在一个也没有了。”<sup>1</sup>

在上海失败后，罗章龙 1931 年春季亲自到哈尔滨，此时唐宏经虽已被捕，但反对派仍有一些基础。罗章龙准备利用士兵支部策划兵变，但没有成功。据他说：“文虎与当地非委在哈尔滨军事策划布置已有头绪，但事为罗登贤所侦知，便极力从中加以破坏”，“当丁超得知部下有异图时，便采用严厉镇压手段，将军中地下党组织主持人捕去，更利用哈尔滨投敌的中共党员作眼线，继续破坏非委的组织”。<sup>2</sup>

分裂活动对南方影响不大，李震瀛以全总巡视员身份到香港后，受到广东省委的冷遇。广东省委 2 月 1 日给中央的信提到，广东省委与李谈话并看了全总文件后，决定“省委未有接到中央已开四中全会通告及四中全会决议案以前，省委对四中全会的政治上组织上的决议无从讨论”，全总文件“不发到各级党部，对全总党团的意见在未接到四中全会的通告和决议以前亦不应讨论。”<sup>3</sup>

#### （四）罗章龙尝试影响苏区但没有成功

虽然罗章龙派认为城市工人运动是革命的重心，对苏区和红军比较轻视，但“非常委员会”仍试图通过“苏准会”影响苏区党组织。中共原计划 1930 年 12 月 11 日广州起义纪念日召开全国苏维埃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苏准会”是为全国苏维埃大会制定文件的筹备会，有各苏区代表参加。苏准会秘书长林育南和党团书记李求实都是反对派骨干，很多苏区代表受到了罗章龙派的影响，1 月 7 日《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也提出“彻底改造党的领导机关”，和全总 1 月 1 日决议立场一致。<sup>4</sup>“在四中全会党内斗争期间，苏准会代表首先在反四中全会提纲文件上签名赞成，并立即加入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作为非委成员之一”。<sup>5</sup>

3 月中旬，中央苏区在苏准会的代表肖道德、胡家珍、戴辰生从上海回到赣

<sup>1</sup> 《中共满洲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4 月 24 日），《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8），第 46-47 页。

<sup>2</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693 页。

<sup>3</sup> 《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31 年 2 月 1 日），《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9），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 1982 年，第 15-16 页。

<sup>4</sup> 《苏准会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 年 1 月 7 日，见杨祖培：《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 年 2 期，第 72 页。

<sup>5</sup> 《罗章龙回忆录》（下），第 485 页。

西南，其中肖道德曾作为列席代表参加六届四中全会。他们“在特委宣传四中全会的不好”，很明显是在传播罗章龙等人的主张。中央局此时虽没有得到四中全会的文件，但严厉制止他们反中央的宣传，后来又发现他们只有苏准会的介绍信，“料知他们非中央派回，是与右派有关系的”，将他们作为AB团逮捕。<sup>1</sup>

罗章龙还试图利用和各苏区领导人的个人关系，进行分裂活动。罗章龙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长期在中央担任重要工作，和各个苏区的领导人都比较熟悉，他给中央苏区的毛泽东、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湘鄂西苏区的夏曦、贺龙都写了信，试图拉拢他们支持自己的分裂立场。

毛泽东是和罗章龙私交最深的苏区领导人，他们在长沙共同创建新民学会，在北京游学期间更是一个锅吃饭、一张床睡觉，是年轻时的亲密朋友。罗章龙另立中央后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如果说当时作为堂堂之党，正正之旗的中共中央及全党，对此竟万马齐喑默无声，不加评论，不加抨击，不仅宁非咄咄怪事！如果是这样下去，不仅是中国革命蒙上奇耻大辱，而且适足以证明全党无人了！这难道是无关轻重的小事，可以坐视不理吗？！”罗章龙称赞毛泽东“对革命忠心耿耿，疾恶如仇，是党的中流砥柱”，希望毛“对此小撮坏人篡夺行径，毁党叛革命奸谋”，“奋起反击，树之风声则群小慑服，全体党员闻风响应”。<sup>2</sup>但毛泽东不但没有支持，反而毫不客气地批评罗章龙过分在意“鸡虫得失小节”，表示自己“决不预闻个人恩怨门户之私”。<sup>3</sup>

罗章龙与张国焘私交也很深，两人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接受了共产主义，共同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共同开创了北方工人运动，又一起在中央共事很久。但是，当张国焘回国后试图劝说罗章龙时，罗一直避而不见，也许他在何孟雄等被捕牺牲后，担心遭到暗算。这种担心也不无道理，张国焘提到，当时远东局代表波兰人（应该指雷利斯基）确实曾提出暗杀罗章龙。<sup>4</sup>不过后来在张国焘夫人杨子烈来访之后，罗章龙给已去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写了一封信，希望张国焘“反戈一击，肃清内奸”，同时希望张重用受自己影响的苏准会代表，“郑芹瑞、钱伯符、曾中圣、徐朋云诸同志均属革命英才，应加垂青，予以爱护”。<sup>5</sup>

<sup>1</sup> 《苏区中央局报告》（1931年7月8日写发，11月6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1677页。

<sup>2</sup> 《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残件）第二件》，《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2页。

<sup>3</sup> 《罗章龙致毛泽东信（残件）第一件》，《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1页。

<sup>4</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二），第461页。

<sup>5</sup> 《罗章龙致张国焘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499-500页。

罗章龙给湘鄂西领导人贺龙也写了信。信中说：“湘鄂西出席苏准会代表团已会毕返原防驻地，此间近日情况当由他们当面转，一切请按非委‘提纲’施行。”

<sup>1</sup>夏曦与罗章龙在参与湖南新民学会时就比较熟悉，四中全会后曾经受命去劝说罗章龙。夏曦前往湘鄂西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后，罗章龙给夏曦的信中说：“石庐见访，倾谈竟日，非委提纲已蒙理解”；“德昌为人极为明白通达，智勇兼资，缓急可以相助”；希望夏曦“挥兵靖难，拨乱反正”。<sup>2</sup>

但是，罗章龙这些对苏区领导人的分化都没有成功。“非常委员会”既要面对国民党的残酷镇压，又要面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分化瓦解，他们拥有的资源有限，逐渐力不从心，分崩离析。共产国际对中共处于支配地位，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当时中共中央的绝大部分经费是由共产国际提供的。反对派拒绝服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后，很快被断绝了生活补助费，他们的基本生活陷入困境，政治活动更难开展。非委女工部长张金保回忆：“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由此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有的卖光了自己家中有限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睡在地板上，经常饿肚子，有的只好到救济难民的地方去喝一点施粥度日。我则依靠金泽霖沿街叫卖瓜子、小孩玩具来维持生活。”<sup>3</sup>

罗章龙在东北活动一年，在哈尔滨难以立足，1932年潜回上海。九一八事变和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群众运动出现复兴之势，他也曾尝试重整旗鼓，但收效不大，于1933年4月被捕。<sup>4</sup>罗章龙被蔡元培保释出来后，一直在大学教书，退出了政治生活。虽然罗章龙反复辩解说国民党中央社发布的《罗章龙自首声明》是马邵武伪造的，他并不知情。<sup>5</sup>但是自首声明公开发表后，残余的罗章龙派失去首脑，很快走向消亡。福州本来没有罗章龙派，在北京参加过罗章龙派活动的学生高凡民来到后，联合一些被中共开除的党员，成立第二市委，甚至组织起有27支枪的闽东北工农游击队第三支队，但是“自从罗章龙自首以后，颇有兔死狐悲之感，活动没有从前那样积极了”。<sup>6</sup>

先后参加反对派的重要人物中，罗章龙、李震瀛、邱泮林脱离政治活动；张

<sup>1</sup> 《罗章龙、王仲一致贺龙、贺锦斋》，《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0页。

<sup>2</sup> 《罗章龙、刘鄩致夏曦信》，《罗章龙回忆录》（下），第501页。

<sup>3</sup> 张金保：《张金保回忆录》，第173页。

<sup>4</sup> 《社会新闻》2卷4期（1933年1月），转引自《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年5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第72-73页。

<sup>5</sup> 《致中共中央政治局函》（1979年10月），《罗章龙回忆录》（下），第738页。

<sup>6</sup> 《中共福州中心市委关于职工反帝工作和罗章龙派活动情况报告》（1933年5月5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3），79页。

金保、唐宏经 1940 年代重新回到中共，史文彬也想重回中共，但病死在去延安的路上；张金刃 1932 年曾一度恢复党籍，但 1933 年被再次开除，他继续在西北军和东北军中从事革命活动，1941 年被国民党杀害；张昆弟死于湘鄂西肃反；王仲一病死在国民党狱中；更多的人包括徐锡根、王克全、余飞、沈先定、许畏三、吴雨铭、韩连会、袁乃祥等则对革命前途绝望，被捕后成了叛徒，他们的特务活动给中共白区党组织造成了严重破坏。

反对派虽然走向了失败，但是失去了这些经验丰富的工运骨干，中共在工人运动中的组织也受到很大损失。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会议说：“党和工会完全脱离了群众。我们同工人罢工和日常斗争的联系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薄弱。我们不能认真地开展某种运动，不能动员基层组织进行工作。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其领导已经重新改组）很快就失去了会员。例如，上海如今才 600 名工会会员，也就是说比党员还少。”<sup>1</sup>

## 五、小结

中共是民主集中制的革命党，但民主和集中之间本有内在矛盾，何时应该民主，何时应该集中，是始终需要面对的难题。中共六大之后强调民主，但引发了很多混乱，于是转向集中，反对极端民主化。但中共当时并没有成熟的、众望所归的领袖，李立三等集中权力以后，却推行脱离现实的空想政策，造成惨重损失。据张国焘说，“本来共产国际寄望于周恩来”，希望他“担负起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责任”，1931 年特别“邀请他去莫斯科，以便面授机宜”，“谁知后来，他回到中国以后，仍不以第一首脑自居”。<sup>2</sup>周恩来有自知之明，而瞿秋白书生气很重，结果六届三中全会不但没能完全纠正立三路线，反而把李立三的支持者李维汉、贺昌等补选进中央委员会，同时继续压制不同意见，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仍然难以获得全党的信任和尊重。

罗章龙、何孟雄在五四运动中接受了民主思想。在 1921 年中共建党之初，

<sup>1</sup> 《埃斯勒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的报告》（1931 年 2 月 20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92 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438-439 页。

何孟雄本来接近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集权，当罗章龙劝他加入时，他特别强调“须以党内实行充分民主为条件”，罗章龙回答：“只要大家意志坚强统一，内部谁敢专制？万一将来党内发生妄人，群众自然把他打倒”，<sup>1</sup>这段对话可以看成后来另立中央的思想源头。1930年他们对李立三等拙劣的、灾难性的集权领导非常不满，希望通过党内民主改组领导机构，这甚至一度得到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某种程度的认可，所以才有九十六号通告的发布。但当时中共毕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党内民主是受限制的，共产国际是中共的上级，提供了中共中央绝大部分经费。罗章龙等的要求被独断专行的米夫拒绝后，愤而走向组织决裂。但他们自视过高，仍把城市工人运动当做革命的重心，轻视红军和苏区，对政治形势的判断完全脱离实际，等待他们的是白色恐怖下的残酷现实。他们当中有的心灰意冷、退出了政治活动，更多的被捕后成了叛徒，帮助国民党抓捕昔日同志，中共组织也因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干部遭受重大损失。

共产国际在中共组织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是复杂的，一方面中共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建立的新组织，初期并不成熟，既没有众望所归的领导核心，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纪律，经常陷入内部混乱之中，共产国际是全党公认的权威，在中共组织的稳定和建设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共产国际领导人是在莫斯科遥控指挥的外国人，对中国国情终究隔膜，对不熟悉的中国领导人不信任，无论是六大选拔大量工人干部进入中央，还是六届四中全会后重用留苏学生，都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

远东局领导米夫只有29岁，不够成熟老练，也是导致六届四中全会后发生组织分裂的原因。在米夫的指导下，中共中央在1930年12月中旬对反对派让步过大，几乎是缴械投降，自陷于被动地位。当反对派的民主热情被激发起来，米夫却没有耐心与之充分沟通，只是居高临下的强制命令，仓促召开四中全会，体现了其傲慢自大和对中国干部的轻视。他过于急切地把毫无经验和功绩的留苏学生王明等人提拔到领导岗位，是难以服众的。虽然中国共产党当时仍年轻幼稚，但已有十年斗争历史，领导了规模巨大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武装斗争，涌现出不少有杰出才能和历史功绩的领导人。王明等人才二十多岁，回国工作只有一年多，期间没有表现出杰出才能，也没有显赫功绩。罗章龙、何孟雄等有经验、

---

<sup>1</sup> 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第104-105页。

有才能的干部很难心悦诚服地接受王明等的领导，这和后来毛泽东对王明、博古等的愤怒情绪是一样的。

米夫不惜失去一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把得意门生王明扶上了中共领导人的地位。但是，无论是王明，还是后来在中央苏区实际掌权的博古，很难说他们有独立的政治思想、有自己的路线。正如罗章龙、何孟雄等批评的，他们只是些缺少经验的年轻学生，他们只会写点文章，而且是写一些他们自己都不太明白的文章，以他们的才能和威望根本不可能在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他们完全是共产国际特别的米夫强加给中共的听话的代理人。王明、博古自己也认为他们只是坚决贯彻国际路线，1931-1934 年的所谓“王明路线”时期，实际就是共产国际试图通过留苏学生严格控制中共的时期。

## 第七章 红军争论、黄陂肃反与苏区中央局的初建

困难形势是对组织的考验，迅猛发展的形势也同样如此。1930年国民党大规模派系战争给中共带来巨大机遇，但尚不成熟的中共组织在急速发展中出现了混乱。在城市，李立三主导的中共中央与上级、下级都发生激烈对抗，结果中央丧失威信，被共产国际改组，留苏学生进入领导层，心怀不满的罗章龙派走向分裂。在农村，红军在集中整编方面取得巨大进展，先是中央苏区红军在毛泽东领导下成立了共同前委，然后各地红军又在中央指示下建立了军团和方面军，但红军各自为战的情况仍很严重，不同来源的红军会合时，常常爆发激烈争论，造成决策困难。同时，红军与地方组织关系紧张，毛泽东与江西行委之间出现严重分歧，这是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的诱因。苏区中央局的建立是革命重心向农村转移的关键一步，中共中央力图借此解决矛盾冲突，整合各种力量，在苏区建立党、政、军一体化的军事政治体系。

### 一、红一方面军统一指挥权过程中的激烈争论

1929年底古田会议之后，中央苏区红军的权力结构趋向集中，政治委员的权威明显上升，毛泽东取得主导地位。但红军中的民主气氛仍很浓厚，政治委员还没有凌驾集体领导的最后决定权，重大决策需要集体讨论决定，特别是当两支独立活动的军队集中统一指挥时，常常会发生激烈的争论，决策相当困难。毛泽东、朱德的一军团和彭德怀的三军团在1930年夏秋实现统一指挥，成立了一方面军，为第一次大规模反围剿战争奠定了组织基础，但这也是一个伴随着激烈争论的曲折过程。

#### （一）红军二攻长沙失败，峡江会议争论激烈

1930年2月陂头联席会议上，红军四、五、六军（后改称三军）和赣西特委决定成立共同前委，毛泽东为书记，朱德、彭德怀、潘心源、刘士奇、陈毅、黄

公略为常委。<sup>1</sup>但在 1930 年上半年，四、六军在赣江以东，五军和新建的八军在赣江以西，几支主力红军还是各自为战。7 月份，按照中央指示，毛泽东将四军、三军（原六军）、十二军编为一军团，彭德怀将五军、八军编为三军团。

7 月底，彭德怀率部攻占长沙，但仅十天又在优势敌军反攻下败退出来，这时毛泽东的部队在南昌附近，无法配合作战。毛泽东和彭德怀部当时并没有建立有效联系，更谈不上统一指挥了。毛泽东是根据“报载何键向五军前进”，才“决定去浏阳”援助五军，<sup>2</sup>半路在一张缴获的明信片上看到“彭匪确已占领长沙”这样一句话，才知道五军攻占了长沙。<sup>3</sup>周恩来谈到这个问题时痛心疾首地说：“指挥问题，也是一严重问题”，“六个月来，这样的教训真太多了，就最近进攻长沙来说，没有一个总司令部，彭德怀规定计划后，只以友军的态度通知朱毛红军以及第二集团军等，结果不但这一计划在时间上发生问题，在行动联系上更完全不能实现配合的作用。如果我们能早在六月以前就注意到这一问题，那么至少也不像现在这样的现象。所以，在今天如果仍忽视这一问题，真要成为罪恶了。”<sup>4</sup>

8 月 23 日，从长沙撤出的三军团与赶来支援的一军团在浏阳会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朱德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总政委。红一方面军前委会议讨论决定再攻长沙，8 月 24 日发出《向长沙推进的命令》。“当时有些同志看到三军团第一次攻打长沙取得很大胜利，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物资，部队武器装备大大改善，个个穿起崭新的军装，面貌焕然一新，十分羡慕，认为三军团仅一个军团的兵力就能攻下长沙，现在两个军团合兵一处，打下长沙更没有问题；加之当时党内军内总的指导思想仍然是要攻打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因而攻打长沙的主张便占了上风。”<sup>5</sup>

长沙敌军凭借工事固守，红军围攻十几天进展不大。9 月 10 日晚，全军对长沙发起总攻，激战一夜未能得手，伤亡很大，被迫从长沙撤围。一打长沙之后，三军团的八军和五军就闹分家，而且闹的相当激烈。二打长沙失败后，长期独立

<sup>1</sup>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 年 4 月 5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 93 页。

<sup>2</sup> 毛泽东：《给赣西南特委并转中央信》（1930 年 8 月 1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401 页。

<sup>3</sup> 赖毅：《从井冈山到赣南》，《回忆中央苏区》，第 50 页。

<sup>4</sup>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 年 9 月 30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539 页。

<sup>5</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第 111 页。

活动的一军团和三军团有再次分家的倾向，红军的集中统一计划遇到严峻挑战。

彭德怀在这一时期受立三路线影响，对进攻大城市比较积极。当时八军政委邓乾元对进攻长沙比较消极，在第一次占领长沙败退以后，不仅“主张五、八军分家”，而且“提出一个书面意见”，批评彭德怀“部落领导和个人独裁”，“在八军中鼓动群众反对彭德怀”。<sup>1</sup>结果彭德怀以邓乾元说“打长沙是军事冒险、夺取武汉更是遥遥无期”为由将其撤职，留党察看三个月，让比较激进的袁国平接任。<sup>2</sup>二打长沙时，彭德怀还以违抗命令的罪名，处决了与邓乾元观点接近的八军四师师长卢匿才，直接在稻田里用刀砍了，吓得全军“鸦雀无声”。<sup>3</sup>

红军从长沙附近撤到江西后，红一方面军和江西地方党组织也爆发激烈争论。毛泽东主张打吉安，但赣西南干部认为这过于保守，主张打南昌。赣西南特委报告中提到，“前委派来传达布置攻吉安与扩大红军等意见同志毛泽东、朱云卿等参加讨论的结果，我们对总行委自动提出如下建议”，“一、三军团入赣第一步作战计划，应当先夺取南昌、九江”，“吉安敌人留给二十军消灭，二十二军仍应迅速立即向抚州前进，夺取抚州并进攻南昌”，“我们只有火速打下南昌、九江，才能完成一军团争取革命首先在武汉胜利，夺取全国革命前途”。“当时代表前委来的毛泽东同志等反复申述先打吉安、樟树理由，意见要争取武汉胜利，必须建立江西政权，要能即刻建立政权，必须先打下吉安”。“我们认为，他们这一申明有如下错误见解”，“忽视了打九江、南昌之迫切”，“不彻底明了主要城市可以爆发一个广大群众革命斗争的新策略”。<sup>4</sup>当时立三路线虽已在上海受到批评，但消息并没有传到苏区，赣西南干部挥舞立三路线的大旗，毛泽东对中央路线也不好公开反对，“反复申述”四个字生动揭示了他贯彻军事战略的艰难。

9月29日袁州会议上，“三军团有的同志提出不打长沙就去打南昌。毛泽东同志坚决反对。一军团的干部早有教训，也同意不打南昌。但当时三军团的干部、湖南省委书记王首道同志、长江局代表周以栗同志却都赞成去打南昌，使毛泽东同志处于为难地位”，不少人质问毛泽东：“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执行不

<sup>1</sup> 《中共湖南省委给长江局的报告》（1930年10月3日），《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8），第238页。

<sup>2</sup> 《红三军团前委书记彭德怀向中央的报告》（1930年9月20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78页。

<sup>3</sup> 王平：《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页。

<sup>4</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报告》（1925年10月2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124-126页。

执行中央路线”。<sup>1</sup>袁州会议最后决定，一军团先进攻防守较弱的吉安，三军团进攻樟树并担任警戒任务，有机会再合兵进攻南昌。两军虽暂时分开，但相隔不远，可以配合作战。

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吉安。15日，红一军团离开吉安北上，在17日峡江总前委全体会议上，又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甚至提出辞职。何长工说：“周以栗以长江中央局代表的身份拍着桌子要我们按立三路线去打大城市，袁国平同志也同意。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同志说，这样，我这个总前委书记不好当了”。

“后来，对到什么地方去落脚的问题又争论起来了”，“毛泽东同志说，江西的敌军都是客军，对地方的守备并不那么热心；当地的靖卫团不是红军的敌手，易于击溃。从地理环境看，湘江赣江之间有两条铁路，一是粤汉路、一是南浔路，敌军易于调集；而赣江与闽江之间则没有这样的铁路，而且有武夷山、罗霄山脉做屏障，敌军不易调集，也难于对付我们。从群众条件来看，闽赣也有广泛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数约有二十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滕代远、袁国平和我、邓萍、张纯清、谭震林、罗炳辉、罗荣桓、古柏、蔡会文、黄公略、李井泉、刘作农、宋乔生、李文林、曾山、曾炳春、谭政等。由古柏和李井泉做记录。到会的还有长江局代表周以栗”。<sup>2</sup>

峡江会议上争论的焦点是过江问题，三军团主要是湖南人，不想东渡赣江远离家乡，彭德怀、何长工也主张三军团在赣江与湘江之间，提出“井冈山就不要了？！”这样尖锐的问题。毛泽东没有最后决定权，只能耐心说服。“会议情绪激烈，开了一夜，天都快亮了，我们持不同意见的同志才基本上同意部队东渡赣江。毛泽东同志坚持以理服人，为了使一、三军团团结奋斗，他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不但会上做，而且在会后仍然坚持做。思想工作是比较长期的复杂的，为了适应我们持反对意见的这部分同志的思想有一个转变过程，结束后，没有将部队马上东渡赣江，一军团反而向袁水流域开展工作的三军团靠拢。”<sup>3</sup>峡江会议决定了往江西发展的大方向，虽然仍提到进攻南昌，但说服三军团过江，就避免了一、三军团再次分家，为集中主力打第一次反围剿的大歼灭战奠定了基础。

<sup>1</sup> 滕代远：《袁州、罗坊会议前后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129页。

<sup>2</sup> 何长工：《回忆三次反‘围剿’前后的几次重要会议》，《回忆中央苏区》，第131-132页。

<sup>3</sup> 何长工：《回忆中央苏区的有关历史》，《回忆中央苏区》，第99页。

## （二）第一次反围剿在即，“诱敌深入”战略艰难确立

1930年10月下旬，蒋介石取得了中原大战的胜利，开始调集重兵准备进攻中央苏区。得到敌情变化消息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10月25日在罗坊召开联席会议，讨论应对策略，最终决定放弃进攻南昌，不在苏区边缘作战，采取“诱敌深入”方针，撤退到苏区腹地寻找战机。这是决定苏区命运的重大决定，整个过程争论非常激烈，决策很艰难。谭震林回忆：“撤离长沙后，一路上开了许多会。那不是一次会、两次会，还是三次、四次会，而是开了许许多多次的会。每到了一个地方都开会，做一些同志的思想工作。”<sup>1</sup>毛泽东后来总结说：“战略退却，在没有经验时，说服干部与人民的问题是更加困难的问题。当军事的领导还没有达到对战略退却这样的问题可以而且应该集中到最少数人乃至一个人手里而为干部所承认时，困难问题就发生了。”<sup>2</sup>

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等担心“诱敌深入”使大片苏区被敌军占领蹂躏，三军团不愿远离湖南家乡。但是，在苏区边缘作战没有把握、风险很大，一、三军团分开则很难打大的胜仗，易被优势敌军各个击破。在中央新指示没有到达的情况下，毛泽东无法公开反对立三路线，不得不耐心说服。郭化若说：“罗坊会议开了好几次，最后一次非常重要。这次会议，彭德怀同志没有参加。会上正式决定了‘诱敌深入’的方针，颁发了‘园前村命令’。会议的内容和决议均由周以栗同志转告彭德怀同志。因为周是长江局的代表，是代表中央说话的，地位很高，彭德怀同志只好同意了。”<sup>3</sup>

三军团政委滕代远说的更详细：“毛泽东同志说服和争取了周以栗同志，然后和周以栗同志一道来说服三军团干部”，“我们的转变并不是开一次会议就解决了的，而是毛泽东同志费了很大功夫，尽了最大的耐心，开了许多次会”。“面对强敌的进攻，怎么打？在什么地方打？当时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是主张把战场摆在峡江一带，一军团在赣江东面、三军团在赣江西面，东西两路夹攻敌人；另一种是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主张诱敌深入，退却到根据地作战，把敌人放进来打。两种意见进行了争论。最后，毛泽东同志说服了大多数干部，彭德怀同志也同意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三军团渡过赣江，两个军团向根据地的中心区域——

<sup>1</sup> 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回忆中央苏区》，第147页。

<sup>2</sup>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毛泽东集》第二版（5），第136页。

<sup>3</sup> 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138页。

宁都的黄陂、小布地区退却集结，准备粉碎敌人第一次大‘围剿’”。<sup>1</sup>在这段时间，周以栗利用中央代表的权威，并充分发挥能言善辩的特长，在确立“诱敌深入”战略上给毛泽东帮了大忙，也引发了江西行委干部的不满。

三军团领导勉强接受了新战略，但要说服中层干部也不容易。三军团在 1930 年获得巨大发展，实力今非昔比，总兵力超过一军团，心态自然也和 1928 年底几百人投奔井冈山时不同了。5 月下旬，赣西南特委报告就提到“五军有六个纵队，最近他们枪支大发展，比四军还要多一千左右”。<sup>2</sup>三军团 7 月底攻占长沙后，缴获很多，装备大大改善，彭德怀在信中提到在长沙“军用品有充分的补充”，“服装做了，军容为之一整”。<sup>3</sup>三军团的发展壮大让一军团羡慕不已，三军团干部当然更加自信，更倾向于独立活动。

彭德怀比较顾全大局，虽然他本人也有疑虑，但还是靠个人威望在三军团执行了罗坊会议决策。周以栗、滕代远、袁国平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渡江动员，六师师长郭炳生<sup>4</sup>说：“到了江东，地形、人情又不熟，部队非垮不可。你们这个办法是冷水洗屁，越洗越小”，这种粗话引得哄堂大笑。“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争论非常激烈，发言的大多是军事干部，言词也比较偏激；而政工干部多数从组织原则方面考虑，认为总前委已经作出决定，即使遇到一些困难，也应该服从上级的决定”。“傍晚，彭德怀从江边回来参加会议，看到会场上乱哄哄的有点生气，马上叫大家安静下来，耐着性子说服大家。”<sup>5</sup>

### （三）中央坚持集中红军，毛泽东取得龙冈大捷

虽然中央批判了立三路线，但李立三领导时期集中整编红军政策却得到延续，以后也从未改变。立三路线时期，集中红军是为了进攻大城市，六届三中全会把重点转向巩固苏区、稳步发展。周恩来在 9 月 30 日报告中强调：“我们党的中心任务，具体说来，就是一方面把苏区整个地联系起来，集中指导到全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权之下，集中红军，加强红军，在几个主要苏区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而

<sup>1</sup> 滕代远：《袁州、罗坊会议前后的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 127-130 页。

<sup>2</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给红四军前委的信》（1930 年 5 月 22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 155 页。

<sup>3</sup> 《彭德怀来信》（1930 年 9 月 21 日），《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第 481 页。

<sup>4</sup> 郭炳生 1932 年任五军二师师长时试图带队叛变，但部队大都被政委彭雪枫追回，他只拉走很少一部分。

<sup>5</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24-125 页。

向外发展。”<sup>1</sup>新战略与毛泽东的意见基本一致，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并不完全信任，还是要从中央派人建立中央局，直接领导苏区。

10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是这一时期关于红军和苏区的纲领，其中反复强调集中统一的重要性。计划指出：“集中与统一的军事指挥”是先决问题，“战略只有在各部分红军在统一的指挥之下一致行动与相互配合的基础上，才能收到实效。过去各不相顾的现象，在现在敌人进攻红军的过程中，只有更易给敌人以各个击破的利便。在这里，我们要指责过去各个集团军尤其是第二集团军不能与一三集团军一致行动的错误”。“军事上最重要缺点便在没有伟大规模战争的准备，军事指挥还不能集中，行动还不能一致”。“红军现时的作战已超过了过去游击战的范围而开始进入大规模的战争状态；因此，小规模的游击队已不复能成为这种革命战争的主力”。<sup>2</sup>

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直接掌控各苏区红军。“中央政治局便决定在中央苏区立即设立中央局，目的在指导整个苏维埃区域之党的组织，同时，并在苏区成立中央军事委员会以统一各苏区的军事指挥”。“革命军事委员会有全权指挥所属的红军与一切武装力量，只有其上级政府与党的苏区中央局或特区委员会可以变更其决定。地方政府与地方党部均无权干涉。”<sup>3</sup>

中央指定在项英到达苏区之前，由毛泽东代理中央局书记，这对强化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有很大作用。10月29日《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规定：“苏区中央局在江钧同志（即项英）未到达前，可先行成立，暂以泽东同志代书记。委员名单另附。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中央军委暂不组织，候江钧到后再成立，目前一切政治军事指导统集中到中央局。”<sup>4</sup>

中央指示的反围剿策略也与毛泽东的思路基本一致。12月10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指出：“现在反动统治阶级，进攻红军的兵力计算将调往和已调

<sup>1</sup> 周恩来：《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1930年9月3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534页。

<sup>2</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30、435、459页。

<sup>3</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431-432、440页。

<sup>4</sup> 《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问题给一、三集团军前委诸同志的指示》（1930年10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82页。

往的在十师以上，来与红军第一三军团作战，企图消灭红军的主力”。“第一三军团在目前情况之下，应以赣南和赣东南为作战地区；而以闽粤赣为后方地”，“该两军团在防御时或由防御转为攻势时的兵力部署，须集中主力于主要决战方面。极力避免分散兵力（放弃吉安的战况），否则会有被敌人各个击破的危险”。“一三军团及第十二军均在红军前敌总司令朱德同志及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同志直接统一指挥之下行动，第七军和第十军在与一三军团取得联系后，亦须立即听受其指挥。”<sup>1</sup>

红军权力机构逐渐趋于集中后，早期官兵生活绝对平等的政策也发生改变。**12月10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提到：“在有些部队中，曾有一种极端民主化的倾向，无论那一方面，指挥员和战斗员都是一样，这是要废除的。要估计到，指挥员是负有战斗的配备和指挥的重大责任，他们比战斗员要多劳力和劳心。因此站在他的工作效力上说，无论在物质上，勤务上，应当比一般战斗员有较好的条件。”<sup>2</sup>

政治委员集权体制的建立在不同的红军部队存在差别。多数政治委员是书生出生，缺少军事经验，邓中夏在二军团担任政治委员就不成功，经常不顾贺龙等将领的意见，固执己见，导致军事失败。贺龙说：“邓很孤立，其他军、师长、政委都同意我的意见。但邓一定要打，使用了他政治委员的最后决定权”，结果打了败仗。<sup>3</sup>当指挥员在政治、军事能力都很强的时候，他们在各自部队中仍起中心作用，比如三军团司令彭德怀和一军团司令林彪，政治委员只能起辅助作用，难以成为中心。刘作抚报告提到：“五军政治委员滕代远同志忠实勇敢，不过性情懦弱，虽然在五军几年了，都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就是五军士兵群众中也没有什么深厚的印象，”五军全部士兵“信仰彭德怀个人”。<sup>4</sup>

毛泽东无疑是当时红军最重要的政治委员。虽然他也是书生出身，但经过**1927**年以来的艰苦历练，他不仅积累了丰富军事经验，而且逐渐显示出杰出军事才能。**1930**年秋冬，毛泽东说服了众多不同意见，克服了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带来的军心浮动，指挥一、三军团撤退到苏区中心设下埋伏，**12月30日**一举歼

<sup>1</sup> 《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511-512页。

<sup>2</sup> 《中共中央给红军的训令》（1930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517页。

<sup>3</sup>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1期，第13页。

<sup>4</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35-236页。

灭张辉瓒第十八师九千多人，这就是红军历史上战果空前的龙冈大捷。毛泽东诗兴大发，写下“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此役打破了敌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令人信服地强化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龙冈大捷后，“部队在讨论中发言很热烈，有的在行军途中还边走边讨论，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仗打得真过瘾，诱敌深入才能打大胜仗；对总前委、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方针从心里信服了。这时，苏区群众的情绪也很高，纷纷传说‘红军里头有能人，毛泽东赛过诸葛亮’。”<sup>1</sup>

当然，当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还没到不可挑战的程度。本来他并不想杀龙冈大捷中俘虏的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但在群众大会上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张辉瓒还是被杀了，“主要原因是群众对他太愤恨”。<sup>2</sup>“毛泽东同志已经交代过，张辉瓒放下武器后，愿意捐款捐枪捐医药，请求免他一死，可以不要杀。但中央宣传部个别同志仍然把他交给群众去开大会，结果被愤怒的群众一刀割下脑袋，放在门板上顺赣江漂流下去”。<sup>3</sup>十八师被红军歼灭、师长张辉瓒被杀的消息传开之后，在国民党统治区引起极大震动。自 1927 年以来，蒋介石认为共产党已不足为患，他到这时才猛然醒悟，真正厉害的对手不是李宗仁、冯玉祥和阎锡山，而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 二、黄陂肃反与富田事变

肃反发生的原因很复杂，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是政策前提，直接诱因是 1930 年 10 月红军攻占吉安之后，毛泽东在缴获的材料中发现苏区有奸细与敌军通信，据此认为在敌军大规模进攻之际，必须先清除内奸。同时，毛泽东在集中指挥权的过程中，始终面对激烈纷杂的不同意见，感觉十分棘手，这也让他怀疑这些不同意见中包含有敌人奸细的作用。同时，农村环境中形成的简单粗糙作风大大加剧了肃反的破坏性。

<sup>1</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37 页。

<sup>2</sup> 李志民：《中央苏区反一、二、三次大‘围剿’的片断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 149 页。

<sup>3</sup> 耿飚：《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第 120 页。

### （一）红一方面军黄陂肃反

字面意义上的 AB 团是 1926 年底由段锡鹏、周利生、程天放等人在江西成立的反共组织，到 1927 年 4 月以后已经不复存在。<sup>1</sup>但是，在江西党内文件中，还是习惯于把各种反对革命的势力泛称为 AB 团、改组派，一般是把支持蒋介石南京政府的称为 AB 团，把接近汪精卫国民党左派的称为改组派。

赣西南苏区肃 AB 团是从 1930 年 5 月从地方组织开始的，很快走向失控，9 月份达到高潮，抓了几千人，上千人被杀。10 月 13 日赣西南特委会议记录提到：“党过去杀一千多 AB 团，内中一定含有很多可以教育过来的”，<sup>2</sup>不过这个阶段肃反对红军影响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后来被打成 AB 团的从允中等人，此时却是肃反的领导者，他们在 8 月二全会议后很积极地整肃 AB 团。“从允中说过他从南京调江西工作，路过九江看见码头上挂着段锡鹏的红布标语，又在‘二全会议’后，从允中杀害丘会培、凌开招等一批同志时，说他们就是 AB 团反革命”。<sup>3</sup>二全会议是江西党内斗争非常激烈的一次会议，从允中在会后肃反杀人，不能排除他借肃反打击反对派的意图。红军刚开始肃反时，赣南地方组织还专门派人来帮忙，“赣南特委派左基中、周高潮、马木彬来红三军团专门组成一个办公室，动员打‘AB 团’”。不过后来纠正肃反错误时，红三军团又召开公审大会，把这三个人杀了。<sup>4</sup>

一军团 10 月 4 日攻占吉安，缴获不少间谍在苏区活动的材料，怀疑已经有大批奸细混入苏区。这也并非多虑，蒋介石的亲信、剿匪司令部秘书长邓文仪认为，情报工作是国民党围剿苏区战争获胜的重要因素。当时蒋介石的谍报机关主要是中统、军统和秘书处第三科，邓文仪说：“我们也派了些人打入渗透共匪的组织和工作”，“共匪的群众组织都有我们的细胞，我们在前方与军队党政工作人员密切联系，在后方情报都很迅速确实，反间谍反情报工作成效卓著，这是当时反共斗争胜利的主要因素。”<sup>5</sup>虽然邓文仪是在谈到围剿鄂豫皖苏区时说的这些话，而且不免有夸大的成分，但说明国民党派间谍进入苏区、渗透群众组织的情况确实存在。

<sup>1</sup> 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40 页。

<sup>2</sup> 《赣西南会议记录》（1930 年 10 月 1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631 页。

<sup>3</sup> 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 95 页。

<sup>4</sup> 《王平回忆录》，第 25-26 页。

<sup>5</sup> 邓文仪：《武汉反共斗争怎样转败为胜》，《反共斗争经验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2 年版，第 155-156 页。

不少红军干部也认为间谍活动是真实存在的，只是没有后来抓的那么多。郭化若认为：“AB 团在当时肯定是有。我们从两个迹象可以看出：1、红十二军成立之初军长伍中豪在福建遭到地主武装袭击，就是 AB 团告密的；2、小布埋伏打不成，被谭发觉，也是由于 AB 团告密。这说明有反革命。”<sup>1</sup>李廷序说：“应该肯定，当时反革命分子是混到我们队伍里来了。这也说明肃反是必要的。”<sup>2</sup>李志民也认为：“当时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复杂，国民党特务机关通过各种渠道派遣特务对红色根据地进行渗透、破坏，这是客观事实”。<sup>3</sup>

在大军压境的险恶形势下，红军处于弱势地位，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肃清间谍被当作极为紧迫的任务，一切违反纪律、牢骚不满、意见分歧等都成为疑点，成为追查奸细的线索。“四军在赣东与敌接战时，某部队上火线发谣风逃跑，由此找到红军中的线索，破获了整个方面军 AB 团组织”。<sup>4</sup>1930 年 11 月底，红一方面军三万多人在黄陂开始了全军肃反，这是红军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肃反。

李志民对这段历史有生动回忆：“我是军党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也是肃反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参加过审讯，领导叫怎么搞就怎么搞，当开始审出‘AB 团’成员时，我曾大吃一惊，认为自己过去思想麻痹，敌人已经钻进我们军部来了还没有察觉。可是，过了几天，‘AB 团’越抓越多，我便逐渐产生了怀疑，不相信会有那么多‘AB 团’；特别是对刑讯逼供的做法看不惯，心想：古代小说中写过许多‘屈打成招’的冤案，我们怎么能搞这一套呢？但在当时的形势和政治气氛下，谁也不敢提意见，谁提了意见，轻者说你‘右倾’，重者会引火烧身，也被当成‘AB 团’抓起来，招来杀身之祸”。<sup>5</sup>

农民出身的干部战士擅长冲锋陷阵，却并不擅长精密细致的反间谍工作。在野蛮粗糙的环境中，捕风捉影、刑讯逼供成了抓 AB 团的主要方法。“那时候抓‘AB 团’的做法，完全凭主观想象和猜测，不调查、不研究、不分析、不讲事实，甚至把队伍集合起来，排成一列长队，首先宣布‘AB 团’是反革命组织，‘AB 团’特务必须自首才有出路，然后察言观色，看有胆怯、畏缩或脸变色的

<sup>1</sup>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 142-143 页。

<sup>2</sup>李廷序：《对于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装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 45 页。

<sup>3</sup>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38 页。

<sup>4</sup>《赣西南的（综合）工作报告》（1931 年 9 月 20 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21 页。

<sup>5</sup>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40-141 页。

人，就命令出列带走，进行诱供、刑讯逼供。”<sup>1</sup>“用烧红了的烙铁烙背部，哪个滋味可不好受哇！”熬不过酷刑招认的大都被枪毙，坚决不招的还有机会活下来，二十七团书记官周贯五一连两天大刑都挺了下来，最终熬过了肃反。<sup>2</sup>

有的亲历者认为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原因是没有执政经验。黄克诚说：“我对‘AB团’的存在及其危害性，对‘阶级决战’的口号和所谓‘地主富农钻进革命阵营破坏革命’的事实，开始一段深信不疑，对上级的指示和部署，完全是自觉地遵照执行，从而铸成遗憾终生的大错”。<sup>3</sup>李廷序也说：“当时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呢？主要是没有经验。反革命头上又没写字，我们初掌政权，过去又没有做过这项事情。但段时间不长，只几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杀错不少人”。<sup>4</sup>

知识分子大多富裕家庭出身，在肃反中更容易受到怀疑。三军九师肃反最积极的是矮个子炊事班长，他是师士兵委员会主席，也是肃反委员会委员。他的理论是：“文化高的人肯定家里有钱，有钱的人就是资产阶级”，“像宣传队长呀、卫生队长呀、书记官呀、参谋呀，都是文化高的人，十有八九是AB团分子。像我这样苦出身大字不识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是AB团！”<sup>5</sup>于都县委的秘书黄维汉“经常去看别人写字，字写得好的人就作‘AB团’杀了；还经常去听别人说话，若是说话的人讲得有条理，也作‘AB团’杀了。在他手上错杀了很多很多人。”<sup>6</sup>“师一级都成立了肃反委员会”，“杀人权就放在师级，往往是凭口供就杀人，也没有什么申诉和辩护。三军团打下长沙时，从监狱里出来跟队伍走的知识分子被杀了不少。讲怪话也有掉脑袋的危险。”<sup>7</sup>

肃反使部队陷入恐怖之中，普通战士也惶惶不可终日。当时只有十几岁的小战士邱会作留下了终生难忘的记忆：“运动开始没几天，八连政委就被抓走，听说他是‘AB团’。没几天，我们的二排长也不见了，不久又有几个班长没了，被抓走杀了。看到这些熟悉的人一夜之间就成了‘反革命分子’丧了命，我有点紧张”。“前几天传来的消息，说已经调到省里当共青团巡视员的黑子也是‘AB团’，而我正是他介绍入团的，这会不会牵连到我？”“晚上我就病倒了”，“三班长来

<sup>1</sup>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139页。

<sup>2</sup>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98页。

<sup>3</sup>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86页。

<sup>4</sup>李廷序：《对于都北部地方革命武装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45页。

<sup>5</sup>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第97页。

<sup>6</sup>曹金山：《陈毅同志救了我》，《回忆中央苏区》，第206页。

<sup>7</sup>江华：《追忆与思考》，第109页。

了，向我做了解释，我这时才明白了我参加的不是‘AB 团’的团，而是共青团的团”。“打‘AB 团’活动不久就停止了，但红军中相当一批中下层指挥员被无辜地杀掉了，使初建不久还很弱小的红军大大地伤了元气。这场政治大灾难，有政治路线错误的原因，这是主要的，但是以落后地区农民组成的红军部队的愚昧也加重了这场风潮的灾难性。”<sup>1</sup>

随着肃反的展开，被捕被杀的人越来越多，红军损失惨重。“因为‘AB 团’出在江西的富田、东韶一带，而红五军中多数是湖南平江、济阳一带的人，所以抓‘AB 团’的重点对象大多找我们东渡赣江以后在江西参军的新战士”。“新战士入伍不久，认识的都是同乡，于是，抓到一个‘AB 团’就供出一大片同乡、同学，像滚雪球似地越供越多”。“经过刑讯逼供的人大多屈打成招，一承认是‘AB 团’，不几天就枪毙了。当时红五军不到一万人，肃反就误杀了二三百人，搞得人人自危，严重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sup>2</sup>“李井泉、杨立三同志当时负责审问总司令部直属机关的 AB 团”，“到达黄陂时，总司令部有五个副官，肃 AB 团时杀了两个”。<sup>3</sup>“一个在无意中戴歪了军帽的战士也被抓，他在酷刑之下胡乱地供认该连队有不少 AB 团，但又推脱说记不起名字。矮个子班长威迫全连列队，逼迫他逐个指认，他在昏昏迷迷中，把五十多人指认为 AB 团”。<sup>4</sup>

关于黄陂肃反被捕、被杀总人数的史料很少。毛泽东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提到：“此次红军中破获 AB 团四千四百以上”。<sup>5</sup>1931 年 2 月《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提到：“中央提款员在返回途中（在长沙地区）宣读了毛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军队清洗了约 4000 名 AB 团分子，因此它在政治上和在作战能力方面大大加强了。”<sup>6</sup>同日《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也提到：“最近撤出吉安后，我们军队的同志——毛、朱、彭——对军队进行了清洗，他们清除了大约 4000 人，有的被枪毙，多数被逮捕”。<sup>7</sup>

有的学者认为被捕的 4400 人全部被杀，但这种说法难以成立。在各苏区肃

<sup>1</sup> 邱会作：《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0-22 页。

<sup>2</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39-140 页。

<sup>3</sup> 刘恋：《红一方面军总司令部在宁都黄陂、小布、青塘等地活动情况》，《回忆中央苏区》，第 169 页。

<sup>4</sup>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第 99-100 页。

<sup>5</sup>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4 页。

<sup>6</sup>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81 页。

<sup>7</sup>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84 页。

反中，从没有把被捕人员全部处决的政策，一般都允许工农出身的士兵自首，很多人被红军开除，他们在部队中消失了，但并未被杀。还有干部虽然被逮捕，但坚决不承认，后来不但被释放，还官复原职，比如红三军 27 团团长李聚奎和副团长陈华堂，他们获释后立刻带队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sup>1</sup>雷利斯基谈话中也提到，多数只是被捕，被杀的是一部分。按前面李志民的说法，五军不到 1 万人杀了 200-300 人；萧克提到，工农出身的可以自首，十二师抓了 100-200 人，分两次杀了 80 多人，当时四军共 7000 多人，抓了 1300 多 AB 团，杀了约一半，就是 600 多人。<sup>2</sup>

不同部队肯定是有差别的，大致五军杀的少些，三军杀的多些，四军在两者之间。欧阳钦 1931 年 9 月报告称：“红军中的 AB 团在一次战争前只第三军及廿军比较严重，其他各军比较少，但三军经过大的破坏已经渐次肃清，其他各军亦有破坏”，<sup>3</sup>《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也提到“三军的 AB 团，特别布置的多”，<sup>4</sup>这说明出自赣西南的三军在肃反中被杀比例肯定更高。红一方面军当时包括红一军团约 16500 人和红三军团约 17000 人，<sup>5</sup>总共约 33500 人。少量新部队未集中，黄陂附近大约有 30000 人，被捕 4400 人，约占 15%；粗略估计，其中可能有一半被杀，大约 2000 人，占总人数 7% 左右，这是相当严重的损失。

有一点值得注意，黄陂肃反被杀总人数比较多，但其中高级干部相对较少。鄂豫皖红军白雀园肃反和湘鄂西红三军肃反被杀人数大约是几百人，但鄂豫皖白雀园肃反被杀的有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潘炳佛、高建斗、王则先、萧方、王明、魏孟贤六个团长，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吴精赤、刘性成五个团政委，十个团政治处主任，陈昌浩肃反报告中提到的团级以上干部有 23 人；湘鄂西红三军肃反被杀的师级以上干部就有段德昌、唐赤英、宋盘铭、盛联钧、王一鸣、胡慎己、傅光夏等，夏曦四次肃反中仅第一次就整肃了团级以上干部 28 人，有威望有能力的干部大多被杀；<sup>6</sup>相对于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中央苏区红一

<sup>1</sup>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第 91-95 页。

<sup>2</sup> 文宏（搜集整理）：《关于富田事变及江西苏区的肃反问题》，《江西文史资料选辑》1982 年 2 辑，第 110 页。

<sup>3</sup> 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 年 9 月 3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385-386 页。

<sup>4</sup>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4 页。

<sup>5</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1930 年 11 月 3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9），第 490-492 页。

<sup>6</sup> 见本书第九章、第十章。

方面军的黄陂肃反中高级干部被杀的不多，李志民说：“这一次肃反在红五军中没有误杀到团以上干部还算万幸。”<sup>1</sup>

## （二）富田事变的诱因——赣西南领导人与毛泽东的分歧

1929年初，毛泽东因敌军重兵围攻带红四军下井冈山，2月中旬在赣南初遇李文林领导的二、四团，当时他对赣西南党和红军评价很高，认为虽然公开武装割据是长远目标，但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不公开建立政权的赣西南模式更符合实际。他在4月给井冈山边界特委的信中大力推荐东固经验：“两年来的经验，在全国至少有一省用总暴动方法推翻统治阶级以前，小区域苏维埃政权公开的割据，是有害而无利的。如湘南，如醴陵，如平江，如永新、莲花、遂川，不仅失掉群众，连党亦几乎失掉完了”，“农村城市的经济基础一齐毁坏完了”。

“这番我们到东固，则另是一种形式，反动势力是驱逐了，权力完全是我们，但公开的政权机关和固定的赤卫队却没有。邮路是照常的，商业贸易是照常的，边界所受的痛苦此间完全没有。敌军到来寻不到目标，党的组织和群众的组织（农民协会）完全秘密着。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这种形式是最好的。”<sup>2</sup>

萧克的回忆更加生动：“据说是进苏区了。奇怪的是，这儿没有苏区那种热闹场面，看不到苏维埃的名义，也没有农民协会招牌，尤其明显的是没有烧房子的现象”。“红四军所到之处，总是要打土豪，要烧掉旧的衙门、警察所等等国民党行政机关，在东固地区却没有这种事。然而，红四军三千余人一到就有军需供给，不仅有饭吃，还有蔬菜、猪肉吃，经常有人送东西来，我们住了六七天，没打土豪，但生活得比较好”。<sup>3</sup>

但到1930年，国民党发生大规模派系战争，苏区周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毛泽东的想法变了，认为必须顺应形势，建立公开割据政权。他在1930年1月信中批评林彪不注意建立政权的游击思想，强调“有计划建立政权”，“政权发展是波浪式向前扩大”，甚至要“一年争取江西”，<sup>4</sup>这标志着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战略初步成型，于是他对不公开建立政权的赣西南模式态度就不同了，认为这在新形势下是消极右倾。

<sup>1</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140页。

<sup>2</sup> 毛泽东：《前委来信（摘要）》（1929年4月13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第15页。

<sup>3</sup>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第132-133页。

<sup>4</sup> 毛泽东：《给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泽东集》第二版（2），第127-129页。

此时在赣西南苏区，刘士奇是激进派，江汉波是保守派，他们围绕进攻吉安、整编红军、土地政策等发生激烈争论。刘士奇批评省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取消为攻吉安而组织的总行委及红军总司令部，主张二、四团分开游击”，“反对群众热望的没收一切土地平均分配”，认为“否认政权的急需也是江同志最大的错误”。<sup>1</sup>二七会议后赣西南特委报告提到：“江汉波的思想确实代表了赣西南党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影响斗争不小”，“故西特正确主张的执行发生了许多阻碍，致形成党内的分裂，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各项中心工作都因此停顿在半生半死的状态中。正在这样党内政治纷争不能解决的严重关头，四军前委率四军由闽来赣”，帮助赣西南打开了局面。<sup>2</sup>

毛泽东率四军到赣西南后，1930年2月7日主持召开陂头会议，明确支持激进派刘士奇，认为赣西南部分领导人过于保守。“土地迟迟分配是极端严重的机主义”，“平分能夺取群众，否则不能夺取全部群众，据他处各处的经验，皆如是”，会上发生了“严重的争论”，“结果按毛同志的意见通过”。<sup>3</sup>会议决定建立公开的苏维埃政权，彻底分配土地，扩大红军，进攻赣西南中心城市吉安，赣西、赣南、湘赣边三特委合并成赣西南特委，由刘士奇担任书记，王怀、李文林、肖道德、丛允中为常委，并且“由前委负责开除江汉波的党籍”。<sup>4</sup>

但受到批评的赣西南领导人并不服气，而且新特委书记刘士奇性格急躁，“有不满意的地方即乱骂，在乱骂的言词中常有‘枪毙’的话语”，<sup>5</sup>这也加剧了赣西南的党内斗争。在立三路线时期，李文林5月到上海参加了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他回来后再次与刘士奇发生激烈冲突。刘士奇拒绝李立三对赣西南“农民意识浓厚，保守观念，武装不集中”的批评，“说中央指示不对”，不肯召集会议让李文林传达中央指示。在8月5日召开的赣西南二全会议上，刘士奇遭到多数干部反对，从第二天起就拒绝出席，结果会议决定开除刘士奇党籍，选举曾山为书

<sup>1</sup> 刘士奇：《中共赣西南特委书记刘士奇给曾觉非同志的信》（1930年2月28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88年，第51-52页。

<sup>2</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中央档案馆、江西档案馆1988年，第60-61页。

<sup>3</sup> 《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巡视赣西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4月5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92页。

<sup>4</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1930年3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61、67页。

<sup>5</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扶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54页。

记，王怀、李文林、郭承禄、肖道德为常委，郭贞、陈婉如为候补常委。<sup>1</sup>赣西南领导人自以为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对毛泽东的总前委也不很尊重了，此时立三路线代表中央，毛泽东自己也被批评为农民意识、不积极进攻，拿赣西南领导人没有办法。

红军 10 月攻占吉安后，赣西南党、团、工会等按立三路线指示合并，成立江西省行动委员会，李文林为书记，曾山、段良弼、从允中等为常委，李白芳为秘书长，实际上就是新的江西省委。李志民说：“江西省总行动委员会（省委）某些领导人对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放开两手诱敌深入，大量消灭敌人’的战略方针抵触较大，认为这是‘右倾机会主义’，是‘退却路线’；而他们‘打到南昌去’的方针才是革命的进攻的路线”。“他们利用根据地群众惧怕敌人烧杀抢掠、搞白色恐怖的心理，欺骗、控制群众，不让群众同红军见面，对我们进行封锁。所以，当我们红三军团逐步向永丰以南的黄陂、小布地区收缩时，越向苏区中心地区，越见不到群众，有时甚至连带路的向导也找不到。”<sup>2</sup>

这更让毛泽东怀疑争论不是简单的意见分歧，而是有人故意破坏。很多赣西南领导人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毛泽东进而怀疑他们受家庭影响，站到了土地革命的对立面。按当时的革命道德，这就可以划为敌人了。据当时毛泽东的秘书徐复祖回忆，毛泽东早就“批评从允中做了三年特委书记，脚不越雷池一步，工作没有发展，就是不抓武装，就是不分田。”<sup>3</sup>随着国民党大军压境，形势越来越紧张，毛泽东和江西省行委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

从组织结构的角度来看，江西省行委与红一方面军前委之间权力划分模糊也是爆发冲突的重要原因。立三路线时期，中央在 1930 年 3 月的指示中规定：“前委与省委的关系也是横的关系，而直接隶属于中央军委。故边特与省委只能以横的关系供给前委的政治领导而不能指挥前委，前委更不能直接受边委与省委的支配，意见有不同时，直接决之于中央”。<sup>4</sup>中央 7 月 21 日通知又赋予行委很大权力：“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全党形成一个军营，一切指挥绝

<sup>1</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朱昌谱给中央的工作报告》（1930 年 10 月），《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 133-137 页。

<sup>2</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128-129 页。

<sup>3</sup> 徐复祖：《毛泽东同志关怀边区武装》，《回忆中央苏区》，第 80 页。

<sup>4</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1930 年 3 月 18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422 页。

对集中”，“行动委员会在行动中，是最有权威的集中的组织”。<sup>1</sup>“行委”的设立，带来了组织系统的混乱，江西省行委试图干预红军作战，而红军是苏区的决定性力量，前委希望地方组织配合红军，双方的上下级关系不清楚，都想指挥对方，这引发了尖锐矛盾，成为富田事变的重要诱因。

### （三）黄陂肃反波及地方，富田事变爆发

红军 1930 年 10 月在吉安缴获的材料中涉及了李文林等，于是毛泽东把敌人奸细和土改滞后、战略分歧等争论联系到一起，把赣西南当成了肃反的重点地区。离开吉安之前，毛泽东 10 月 14 日给中央写信说：赣西南党“呈一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路线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 AB 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为 AB 团富农所充塞”。为要“肃清富农领导，肃清 AB 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决不能挽救这一危机”。<sup>2</sup>

中央代表周以栗与毛泽东意见一致，也主张坚决肃反，他对陈正人说，八月赣南特委二全会议“是 AB 团操纵”。<sup>3</sup>他在 10 月 19 日给湘东特委的信中说：“在赣西南自党团的最高机关、西南两特委、西南苏府直至支部与赤卫队、红军、红色邮局，充满了 AB 团，很有计划的与邓英等联络一举消灭赣西南苏区的大暴动。幸此吉安夺取，这一阴谋被破坏镇压，这是多么严重的教训！”<sup>4</sup>

吉安缴获的名单在肃反中起了关键作用。“占领吉安时发现了在党、苏维埃政权和军队中活动的 AB 团分子的名单。根据这份名单，许多省委委员都是 AB 团分子。很难断定名单中指出的人真是 AB 团分子还是这里的 AB 团分子的挑拨离间，要使我们的同志倒在枪口之下。这份名单在通过毛关于逮捕省委的决定时起了很大作用。”<sup>5</sup>据朱德说，吉安缴获的文件“涉及 AB 团，这是国民党的秘密特务组织，在整个苏区进行破坏和组织暗杀网”，“AB 团员的名字都是密码，共产

<sup>1</sup> 《中央通知第一四七号》（1930 年 7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 205-206 页。

<sup>2</sup> 毛泽东：《给中央的信》（1930 年 10 月 1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505 页。

<sup>3</sup> 《关于李文林被错杀的情况调查》，《江西党史资料》（1），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7 年，第 332 页。

<sup>4</sup> 周以栗：《给尺冰同志转湘东特委诸同志信》（1930 年 10 月 19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507 页。

<sup>5</sup>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82 页。

党在好几个月内都译不出来。但文件也有不少疏忽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线索。例如，有一张收条便是由东固——兴国苏区的一个地主用真名签字的。这一地区的共产党领袖之一李文林，就是这个地主的儿子。”<sup>1</sup>

肃反很快波及江西省行委和新建立的二十军，总前委根据吉安缴获的材料，11月首先逮捕了江西省行委书记李文林，又根据肃反中得到的供词，于12月3日派总政治部秘书长李韶九带毛泽东的信和一连士兵到江西省行委驻地富田。李韶九此时执掌肃反大权，深受毛泽东的信任，但实际上他却是不值得信任的人。刘作扶7月给中央的报告就提到李韶九担任三军一纵队政委不称职，他一方面揽权包办，另一方面却“只于未出发前的训话非常的勇敢，作战则畏惧怕死”，“一纵大部分人不满意他”，“最不满于李的是北路地方党部与群众”，“北路已向特委建议撤销他的工作给与处分”。<sup>2</sup>毛泽东重用品质不好的李韶九，也是肃反严重扩大化并激起富田事变的原因之一。

毛泽东让李韶九带给省行委的信中说：“党内地主富农成分现在举行大规模叛变，此问题在赣西南还是异常严重，必须运用敏捷手段立即镇压下来。红军中危机已得挽救，地方的危机必须迅速挽救”。“特派李韶九同志率兵一连代表总前委及工农革命委员会帮助省委省苏捕捉李白芳等，并严搜赣西南的反革命线索，给以全部扑灭”。“省委接到此信务必会同李同志立即执行扑灭反革命的任务，不可有丝毫的犹豫”。“赣西行委及红军学校方面须防AB团闻信暴动，故处置亦须迅速，二十军须找得线索来一个大的破获，二十二军已大批破获”。“各县各区须大捉富农流氓动摇分子，并大批把他们杀戮。凡那些不捉不杀的区域，那个区域的党与政府必是AB团，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负责人捉了讯办。”<sup>3</sup>

仅两天之后，根据龙超清的最新口供，毛泽东12月5日又致信李韶九：“异常严重的党内地主富农反叛已经形成了极普遍的局面，你们需下决心给他一个扑灭。为了要找得线索不可和前次破获特委机关一样将首要杀得太快了。本日据龙超清供称段良弼是省委机关总团长，袁肇鸿是宣传科长，组织科长是江克宽，除江克宽现在东韶即由我们去捉外，段良弼、袁肇鸿是重要犯须立即捉起详审外，

<sup>1</sup>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322页。

<sup>2</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扶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7月22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234页。

<sup>3</sup> 《总前委致省行委信》（1930年12月3日），转引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98页。

再则李白芳更比段袁重要，谅你们已捉了，并且你们要从这些线索找得更重要的人。”<sup>1</sup>

李韶九 12 月 7 日到达富田后，会同曾山、陈正人，抓捕了省行委和二十军几个重要领导人，包括省行委常委、赣西南团特委书记段良弼、省行委秘书长李白芳，省行委军事部长金万邦，省苏维埃财政部长周冕、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等，几天之内抓捕了一百多人，紧急处决了四十多人。

从毛泽东的两封信可以看出，他对形势做了极为严重的判断，认为在敌军大举进攻的严峻情况下，党内潜藏的敌对分子正在策划大规模叛乱。毛泽东似乎完全相信了刑讯逼供中得到的口供，认为党内存在一个系统性的反革命组织，认为这些高级干部不可能随便乱供。他在《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中说：“如果段、李、金、谢等是忠实革命的同志，纵令其一时受屈，总有洗冤的一天，为什么要乱供，陷害其他同志呢？别人还可以乱供，段、李、金、谢这样负省行委及军政治部主任责任的为什么可以呢？”<sup>2</sup>

毛泽东似乎没有想到刑讯逼供可以让人承认任何罪名，段良弼的陈述生动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觉得人生在世死是不可免的，不过迟早的关系与死法的不同耳。于是两个大手指几被其打断，身体已被烧烂，几成体无完肤了。忽然停止打，李韶九道：良弼你要死我不给你死，无论如何你要承认是 AB 团与说出你们的组织，否则给你一个不生不死。”段良弼听此话，心理上再也无法承受，说“承认好了”。李韶九“马上拿我从打地雷公的刑场解下来，拿起笔来要我承认，我握笔写了我是 AB 团。但李韶九不许，还要写出 AB 团的组织，否则再受第二套刑罚”。“于是执笔隔了大约一小时，心中总是在思索如何是好，偶然心生一计，我料到此次被捉的人恐无生存，于是我写了李白芳是的，写完之后心悔不该，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行动，但李韶九令士兵将我解到囚房里面去，后提李白芳审问也受了同样的惨刑，结果也承认了，俟后一一提审与受刑罚，结果被捉者皆体无完肤。”<sup>3</sup>

12 月 9 日，李韶九押解谢汉昌到东固二十军军部肃反，会同军长刘铁超，

<sup>1</sup> 《总前委给韶九同志并转省行委信》（1930 年 12 月 5 日），转引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 99 页。

<sup>2</sup>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4 页。

<sup>3</sup> 《省行委紧急通告第九号》（12 月 15 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 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 104 页。

准备大批抓捕二十军干部。二十军是刚从赣西南农民游击队升级而来的，并没有经过多少组织纪律训练，也缺少合格的干部，编成正规红军的条件并不成熟。刘作抚 7 月报告认为“编二十军不对，应当扩充四、六军才正确”。<sup>1</sup>刘士奇 10 月报告说得更详细：“二十军是地方赤卫队（特务队）编成的，有枪两千五百枝”，“军事政治干部非常不够，地方主义的色彩比较要浓厚点”，“政治水平比三军还差得远”。<sup>2</sup>二十军干部战士思想简单，政治上不成熟，突然遇到肃反被冤的复杂局面，出现了过激反应。174 团政委刘敌 12 月 12 日带领独立营武力反抗，抓捕了李韶九和军长刘铁超，又和谢汉昌一起带二十军直属队占领富田，释放了被捕的二十多人，然后把二十军拉到赣江以西，并把红军学校缴械。更为严重的是，他们不仅自己走向分裂，还向地方组织和群众公开发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试图制造红一方面军的更大分裂。

段良弼、丛允中、李白芳等在吉安附近的永阳仍自称江西省行委，并在 12 月 28 日按立三路线精神发出进攻吉安通告：“以武汉为中心争取一省与数省政权的首先胜利，是有十二万分的可能”，“现在敌人已进至赤色区域，即是我们围缴敌人的枪的时机到了，就是夺取吉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时刻到了”。“决定一九三一年一月一日起至七号止为拥护全国苏维埃纪念周，各县区须开群众大会拥护，七号为夺回吉安总攻击。”<sup>3</sup>他们在 1931 年 1 月 1 日的决议中提到合法性问题：“省行委是合法的，因为省行委的委员除陈正人、曾山以外其中的委员皆存在，因此省行委是合法的，即是过去的省行委”，“省行委毫无疑问的要存在，并且要领导广大劳苦群众坚决夺回吉安，争取江西首先胜利。”<sup>4</sup>

在富田事变中，赣西南红军和地方组织都受到影响。“赣西特委书记王怀同志也受到谢汉昌、刘敌等人的影响，后来与他们结成了一伙，还召开了所谓赣西特委扩大会议，指出红二十军在富田举行事变打省苏维埃政府不是反革命行为”，谢汉昌，刘敌、段良弼、李白芳等人“在河西苏区宣传他们的所谓党内正在进行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两条路线斗争的谬论，使河西苏区党员和群众的思想极端混

<sup>1</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 年 7 月 22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一）甲，第 237 页。

<sup>2</sup> 《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 年 10 月 7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 88 页。

<sup>3</sup> 《江西省总行委紧急通告》（1930 年 12 月 28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二）甲，第 160-161 页。

<sup>4</sup> 《江西省行委第二次常委会扩大会议决议案》（1931 年 1 月 1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甲，第 4-5 页。

乱，甚至还影响到河东苏区部分人民和部分党员的认识也渐渐模糊起来。”<sup>1</sup>

红一方面军在苏区遭到了如同在白区的形势。谭震林说：“为什么不去东固？因为东固、富田有 AB 团。他们造谣，说我们逃跑，不打白军，使那里的群众产生怀疑，不信任我们。”<sup>2</sup>赣南新成立的三十五军回到信丰城，看到“城里出现很多标语，‘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赣南行委宣’”。<sup>3</sup>赣南行委郭承禄、肖国璋、马荣澜等伪造了陈毅的信，要求三十五军支持反对毛泽东的活动，但三十五军罗贵波等识破了伪信，反把郭承禄等三人扣留，派人洗涮反毛标语。<sup>4</sup>

从允中还伪造了毛泽东的信件，信上说要逮捕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企图孤立毛泽东，制造红军分裂。彭德怀识破了伪信，宣布支持毛泽东，对维护红军团结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当即写了一个不到二百字的简单宣言，大意是：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性质的”，“阴谋分裂红军，破坏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一、三军团在总前委领导下团结一致，拥护毛泽东同志”。但黄公略听了彭德怀的讲话，只和邓萍说了句“老彭还是站在毛这边的”就走了，没有和彭德怀交流，<sup>5</sup>这说明他的看法有所不同。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出自赣西南，也许受军队情绪的影响，他曾经有过犹豫，但后来还是决定和朱德、彭德怀一起支持毛泽东。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公开宣言支持毛泽东，避免了主力红军的分裂，中央六届三中全会指示的及时到达也发挥了作用。12月17日朱彭黄宣言称：“我们敢说毛泽东同志是没有错误的，尤其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总前委的工作路线，完全与中央最近三全大会的路线相符合”。“我们敢大叫一句‘朱毛彭黄’团结到底，打倒反革命的 AB 团取消派”。<sup>6</sup>18 日，朱彭黄又给赣江以西的曾炳春、王怀、段起凤并转二十军一封公开信，强调诱敌深入“是整个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策略，已不是泽东同志个人意见，所谓反对泽东同志右倾，等于无的放矢，尤其所谓毛泽东好用政治手段造成一系势力的谣言，更是不从实际说话，挟意攻私，小人伎俩，不值一辩”。“革命潮流低落的荒谬理论，就使一般小资产出身的革命分子，对革命动摇悲观加入 AB 团，骑墙起来。革命胜利他们是共产党领袖，革命失败他们

<sup>1</sup>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 19 页。

<sup>2</sup> 谭震林：《谈中央红军反第一、二、三次大“围剿”》，《回忆中央苏区》，第 146 页。

<sup>3</sup> 陈必达：《回忆三十五军和独立三师》，《回忆中央苏区》，第 104 页。

<sup>4</sup> 罗贵波：《忆在反“围剿”斗争中诞生的红三十五军》，《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第 247-248 页。

<sup>5</sup>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 165-166 页。

<sup>6</sup>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为富田事变宣言》（1930 年 12 月 17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601-602 页。

是 AB 团，所谓进了保险团，红白都去得。一种最无聊最可耻的卑鄙行动”。<sup>1</sup>

在敌人大军围攻的危急形势下，富田事变领导者公开提出“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的口号，并且召开扩大会议，公开说“毛泽东想作党皇帝”，“毛泽东布置要将江西的忠实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江西毛党”。<sup>2</sup>从允中等还伪造信件，试图分裂红军，这可能给红军带来全面崩溃的危险，是富田事变被定为反革命事件的重要原因。当然，富田事变导致红军发生局部分裂混乱，同时给国民党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造成了错觉，他以为有机可乘，轻率孤军深入，反而给毛泽东送上了险中取胜的机会。这样复杂的因果关系是任何人都预料不到的。

### 三、苏区中央局的初建与中央肃反政策的实施

#### （一）项英初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相对宽容

毛泽东得到富田事变的消息非常愤怒，认为是反革命暴动，派十二军去追击，幸而二十军过到赣江以西，两军没有实际交战。毛泽东认为富田事变恰恰证明了 AB 团确实存在，肃反非常及时。《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强调：“AB 团已在红军中设置了 AB 团的总指挥、总司令、军师团长，五次定期暴动，制好了暴动旗，设不严厉扑灭，恐红军早已不存在了。”<sup>3</sup>

虽然毛泽东领导红军取得龙冈大捷的辉煌战绩，但黄陂肃反和富田事变还是对他的威望产生了不利影响。黄克诚、李志民等干部已经对肃反产生了怀疑，不相信这么多熟悉的同志竟是暗藏的 AB 团，痛惜枉杀战友，朱德、黄公略等高级将领也有保留意见。据龚楚回忆，朱德曾对他说：“杀 AB 团引起的富田事变，也完全是老毛一个人所弄出来的。许多同志全给自家人杀害了”，“现在好了，中央迁到苏区来了，一切由党来解决，不能由一个人来决定了。”<sup>4</sup>

项英于 1931 年 1 月上旬到达苏区，1 月 15 日在小布宣布建立苏区中央局，

<sup>1</sup> 《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给曾炳春等一封公开的信》（1930 年 12 月 18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9），第 604 页。

<sup>2</sup> 《中央局给西路同志信》（1931 年 2 月 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2），第 1372 页。

<sup>3</sup> 《总前委答辩的一封信》（1930 年 12 月 20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4 页。

<sup>4</sup> 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 1954 年，第 266 页。

并在周恩来未到的情况下，代理中央局书记，此时中央局只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三人能在一起开会。中央局成立的第二天即通过决议，认为：“富田事变在客观上说，正是反动的 AB 团取消派等及党内一般动摇分子相汇合的一种反党反革命的阴谋总的爆发”。“虽然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等仍然打着红旗，声称拥护中央，但是富田事变在事实上是毫无疑问的是一种反革命的行动；即使在组织上还没有证明他们全部是 AB 团取消派，但是他们反党破坏革命的行动在客观上是与 AB 团取消派等的联合一致的反动行动”，并且把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刘敌、金万邦五人开除党籍，决议同时也批评总前委在肃反中刑讯逼供和扩大化错误。<sup>1</sup>

决议认为没有在组织上证明富田事变领导者是 AB 团，只是客观效果上是反革命行动，与毛泽东的说法显然不同。这个决议能够在中央局通过，表明项英和朱德不同意原来毛泽东的看法，甚至毛泽东自己可能也有所转变，或许他也意识到肃反错杀了很多同志。毛泽东非常自信，极少承认错误，但是在红军肃反问题上，他后来曾不止一次公开承认错误，承认杀错了人，进而主张党内斗争不开杀戒。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公开说：“内战时期，我就打过 AB 团”，“那时候杀了许多人，应该肯定地说，许多人都杀错了”。<sup>2</sup>他在中共八大预备会议上谈及江西苏区肃 AB 团时又说：“肃反时我犯了错误，第一次肃反肃错了人。”<sup>3</sup>

1931 年 2 月，邓小平、李明瑞率红七军从广西抵达赣南，刚好赶上富田事变发生不久，当时赣南行委曾一度支持富田事变，被三十五军强行改组。新成立的赣南临时行委进退两难，宣布与毛泽东的总前委和富田事变后的永阳行委都断绝关系。赣南党组织后来在报告中说：“赣南党受富田事变的影响，东西河交通关系断绝和敌人的进攻，所以当时虽然建立了苏区党的最高指导机关——中央局，和建立了赣西南党的领导机关——赣南特区委，也无从和他们发生关系，接受他们的指导，这一时期，赣南党活似一个没有爹娘没有依靠的小孩子一样”。<sup>4</sup>

邓小平接触了赣南干部，为解决冲突做了一些工作，他 4 月底到上海汇报时

<sup>1</sup> 《中央局通告第二号》（1931 年 1 月 16 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 14 册，第 639-640 页。

<sup>2</sup>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1945 年 5 月 31 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22），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第 517 页。

<sup>3</sup> 《党的文献》1991 年第 3 期，第 7 页。

<sup>4</sup> 《中共赣西南特区委西河分委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 年 6 月 16 日），《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一年甲，第 80 页。

的报告对富田事变有清晰的叙述。邓小平一方面坚决反对分裂红军，同时也对肃反扩大化提出批评，持相对客观的立场。他说：“过去总前委与省行委向来有冲突，如对军阀混战的分析，引敌深入的战术，开除刘士奇等问题，省行委常骂总前委是右倾，总前委常指省行委中有 AB 团的作用，故有富田事件之爆发”。“此事发生后一般同志特别是干部非常恐慌，人人自危以致不敢开口，特别不敢批评总前委。赣南临时行委对此问题的处置是在中央未解决此问题前，与总前委、省行委均断绝关系。我到后与他们讨论到此问题，批评他们这种脱离组织的解决办法不对，仍须与两方发生固有组织关系，但声明富田事件候中央解决”，“他们同意了这个意见”。“我对总前委之反 AB 团的方式亦觉有超越组织的错误，这种方法事实上引起了党的恐怖现象，同志不敢说话”。<sup>1</sup>

七军在解决富田事变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而二十军发动富田事变，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再保留番号。中央 5 月决定把二十军编入七军，同时提醒七军前委：“在改编二十军时，应当很谨慎的、很周到的不使二十军的群众发生了误会，要把 AB 团的阴谋在群众中揭发出来，要把二十军中拥护总前委的可靠的干部和士兵群众夺取过来，合编为七军”。<sup>2</sup>红七军从广西转战千里到达江西，损失很大，由此得到相当的补充，而二十军被取消了番号，大部分干部后来被处决。

## （二）段良弼上海告状，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做出严厉决议

谢汉昌、段良弼、李白芳等带二十军过到赣江以西后，认为只有中央才能解决问题。1931 年 1 月，段良弼等出发去上海找中央告状，力图推倒毛泽东，他们于 2 月初到达上海。段良弼报告说：“军阀发起第一次进攻时，毛泽东和朱德主张采取不战而放弃阵地的策略。例如放弃东固。农民中产生了很大的不满情绪。数万人同红军一起走了”。“省委立即召开了省委全会。全会决定建议红军指挥部开始同敌人作斗争。省委书记李文林同志把这一决定转达给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毛把他抓了起来。此外，毛还立即派出一个连去逮捕省委全体成员以及苏维埃政府的全部机关工作人员和政府成员”。“这个连还被毛派往红 20 军”，于是引发了

<sup>1</sup>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 年 4 月 29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90-691 页。

<sup>2</sup> 《中央给七军前委信》（1931 年 5 月 14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612 页。

富田事变。<sup>1</sup>段良弼极力夸大毛泽东与朱德、彭德怀等的分歧，暗示朱德、彭德怀等同情他们，“毛泽东使朱德处于单纯执行自己命令的地位，剥夺了他作为总司令的几乎所有权力”。“毛同彭德怀在进攻方向问题上存在重大分歧。”<sup>2</sup>

2月中旬，湘东南党委书记刘士奇和中央提款员易尔士到达上海，他们带来了对毛泽东有利的报告，他们并不是毛泽东派出的，这更增加了报告的可信性，而段良弼却在上海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任弼时2月向远东局汇报时提到：“中央司库还有湖南委员会的代表团，在动身前都没有跟毛打招呼”。“湘东南委员会尽管不了解事件的真相，还是做出了反对暴动分子的决定：不承认永阳的省委，解除红20军湖南独立师的武装，支持毛”，“带来了下列文件：（1）朱、彭、黄（彭的政委）的声明；（2）他们告20军红军战士书；（3）毛给省委书记的信；（4）20军暴动团长给中央的信；（5）毛的呼吁书”。“朱、彭和黄在声明中称20军的行动是反革命行为。他们指出，以他们为一方同以毛为另一方的意见分歧是AB团分子的挑拨离间，不存在任何分歧——他们是团结一致的”。<sup>3</sup>

中共中央和远东局综合分析后，接受了刘士奇代表团的说法，虽然他们认为毛泽东的肃反也有些过火。远东局谈话记录提到：“根据第二个代表团提供的信息，第一个代表团、或AB团的或受AB团影响的代表团把我们都给迷惑了”。“根据毛、朱、彭等人在东固附近一起与军阀作战”，“从三人的声明中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没有重大分歧。AB团分子在制造分裂”。“政治局已作出决定，赞同毛在同阶级敌人斗争方面的路线，但他的行动有些过火”。<sup>4</sup>

段良弼的告状甚至起了反作用，他们并不清楚立三路线已被清算，批评毛泽东不攻打大城市，反而证明毛泽东早已自觉反对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不谋而合。向忠发、周恩来向远东局汇报时提到：“‘AB团’根据自己的需要很好地利用了李立三的政策。他们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为什么不执行中央的方针，不去攻打大城市，而呆在农村”。“领导同志中的分歧在去年6月（注：应为8月）江西省委举行第二次全会时就发生了。这次全会讨论了中央关于党的路线的来信”，“这

<sup>1</sup> 《别斯帕洛夫同温裕成秦邦宪谈话记录》（1931年2月11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73-74页。

<sup>2</sup> 《盖利斯给别尔津的信》（1931年2月10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62-63页。

<sup>3</sup>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79-80页。

<sup>4</sup> 《盖利斯、米夫和马雷舍夫同任弼时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82页。

封信中谈到，让红军夺取农民的所有武器，没有讲加强苏区，而是讲占领大城市。毛反对这个路线。他就此写信给全会，证明这个路线是错误的。他建议首先清除苏区的一切反革命组织”，“他说，现在去大城市，会使现有的根据地变得不巩固”。<sup>1</sup>很明显，毛泽东的主张更加符合共产国际的政策。

中央决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代表团，加强苏区中央局，解决富田事变，2月23日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指示信称：“中央特决定立即派出代表团前往苏区组织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团以全权调查与解决这一问题。在中央代表团没有到达以前，从总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红军党部一直到各地党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这一争论，无条件的服从总前委的统一指导，一致的向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中央代表团到达以后，中央局立即组织起来，各地党的组织与红军必须统一于这一指导之下，应绝对服从中央局关于这一事变的解决。”<sup>2</sup>

3月18日，远东局做出正式决议，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肯定了毛泽东的立场：“看了我们所掌握的关于江西十二月事变的全部材料之后，远东局得出以下看法：1、红20军的暴动”“毫无疑问是阶级敌人及其主要战斗组织——反布尔什维克联盟策划和进行的反革命活动”，“一定数量的党员同志乃至整个红军支队（20军）受到‘AB团分子’的蒙骗，被卷入到阶级敌人的这场罪恶活动中，这一事实决不能减轻这场活动的反革命本质”。“2、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前委同阶级敌人作坚决斗争的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同革命敌人毫不妥协地作斗争的方针应该在今后贯彻下去。”<sup>3</sup>

远东局要求立即解散永阳的省行委，20军回到军部指挥之下，否则武力解决：“逃跑的永阳省委作为这次反革命活动的领导者应该立即解散，其活动应该停止。对它不听从这种要求的行为必须用毫不留情的符合革命利益的斗争进行回击”。“现在的20军领导应该使全军返回红军并绝对执行总部的一切命令。不履行这一（要求）将会引起同该军的残酷武装斗争”。“革命军事委员会应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把20军重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允许我们的其他军事部队将

<sup>1</sup> 《雷利斯基同向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年2月19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83-84页。

<sup>2</sup> 《中央给第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1931年2月2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141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75-176页。

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sup>1</sup>

从红军权力结构的角度，远东局强调红军必须集中权力，公开批评上级是不允许的：“20军暴动的惨痛经验使我们不得不认为，并不是军队中的所有党组织都领会了中央和全党赋予它们的使命”。“军队党组织的基本任务是维护红军部队的革命纪律和战斗力”，“每个党员和共青团员的首要的和基本的任务是执行由上级机关任命的指挥员和政委的命令”。“不执行命令、批评作战命令和计划、批评最高指挥员的策略是绝对不允许的”，“公开批评（在会议上、用公开信等）红军指挥部的作战计划和命令是不允许的，即使在红军以外的党组织（即在非军事党组织）内也不允许。”<sup>2</sup>

从党的组织体系角度，远东局强调决不允许通过分裂红军来解决党内分歧，武装反抗上级必须受到最严厉惩罚：“十二月事变表明，受反布尔什维克联盟引诱和欺骗的20军部分党员认为，他们所发现的党内分歧可以通过分裂军队来加以解决，所以走上了使20军脱离红军部队并同苏维埃机构和其他红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的道路”。“必须毫不含糊地宣布，任何党内分歧，无论是关于红军问题的还是关于我们的一般经济、土地和组织政策问题的分歧，都决不应引起不仅是军队的分裂，更不要说脱离，而且还不应造成拒绝执行最高军事指挥部指令的行为和军队纪律的下降。对于我们的党员拒绝履行这种起码的义务的行为，作出的反应应该是实行最严厉的惩罚。”<sup>3</sup>

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深入阐发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对中共军队建设影响非常深远。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在3月28日做出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其内容与3月18日远东局决议基本一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的态度。<sup>4</sup>

### （三）中央代表团到达，新中央局推动肃反再度升温

1931年4月，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中央局所在地宁都县青塘，传达了远东局

<sup>1</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77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78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定》（1931年3月1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178-179页。

<sup>4</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203-209页。

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任弼时等推翻了项英主持通过的富田事变决议，组成了新的中央局。新中央局认为：“中央局关于富田事变的解决，也是错误的。中央局的通告说：‘不能肯定富田事变是 AB 团取消派的暴动’，又说：‘富田事变是由党内无原则派别纠纷演进而成的’，这是模糊了富田事变的反革命性，没有认清富田事变是 AB 团领导的，立三路线的一部分拥护者的参加的反革命暴动，而用‘党内派别斗争’来解释这个事变。这种解释是非常错误的，脱离阶级立场的，这种解释是放松了反 AB 团的斗争，使 AB 团能够在这种错误的解决之下，能继续活动，继续发展他们的组织，所以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

1

据曾山回忆：项英“责成曾炳春同志亲自到河西永新苏区去把二十军带过河东来，并随带中央局指示，通知赣西特委负责人和参加富田事变的领导人过江来苏区中央局开会。他们以为富田事变仅仅是党内斗争，并且认为他们可以得胜，同时更错误地估计项英同志是支持他们的。所以，除段良弼做贼心虚，拐了大批现款，借口到上海党中央去告毛泽东同志而逃走以外，其他人都过河东苏区来了。王怀同志也来了。这时，江西省苏维埃政府正在苏区中央局领导下举行各县苏维埃联席会议”，“联席会议决定首先把富田事变头子刘敌执行枪决，然后进行公审富田事变的几个头子谢汉昌、李白芳等。由周以栗同志主持公审，各县都派有代表参加，我也参加了。在公审中，毫无逼供现象，被审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谈他自己的意见。他们不承认是反革命组织，而肯定是一个反毛团的组织。”<sup>2</sup>

富田事变的主要参与者最后基本都被处决了。郭化若说：“我当时是肃反委员会秘书长。我记得第二次反‘围剿’后，抓到李文林。我参加了审问。李文林说：‘你们不要动刑。我不是 AB 团分子。我在上海汇报时见过陈独秀，我是陈独秀单派的。’审问后，我向毛泽东同志作了汇报。根据他的口供，看来不是 AB 团，于是把他放了。以后王明路线搞肃反扩大化时还是把他杀了”。“我又把丛允中抓来，这回没动刑，只是向他交待政策，并用了‘诱供’（比‘逼供’更厉害）。这样，他自编了一些谎话，我们信以为真，就把他杀了”。“刘敌回来后，总部开庭审问他。那时主持审问的是朱德同志和董必武同志。审问时，要刘敌说出‘为什

<sup>1</sup> 《中共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决议第一号——关于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1931 年 4 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95-696 页。

<sup>2</sup> 曾山：《赣西南苏维埃时期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回忆中央苏区》，第 20 页。

么要把部队带到河西去’。他招认是 AB 团。于是把他杀了。”<sup>1</sup>

1931 年春夏，国民党连续发动第二次、第三次“围剿”，几十万敌军深入到苏区腹地，形势极为险恶，苏区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为巩固政权，新中央局再次强化肃反，似乎没有接受前一年肃反扩大的教训，没有考虑到肃反在农村落后环境中可能导致的失控。吴德峰的肃反工作报告提到：“在三次战争前后，把 AB 团扩大到无以复加，如各机关打了一次 AB 团大部被捕后，从他处调一部分人来，不久又被供为 AB 团而全部被扣留（如邮政局）”。“当时把 AB 团的力量估计得太大，看得太神秘，以致弄得脚忙手乱。对消极怠工分子，不采取教育的方式，提高他的积极性，不考察他消极的来源，一律认为这些分子都是 AB 团，有计划的来捣鬼，如夜间说梦话，不挑禾草，不去开会（胜利县），因家中有困难不愿意出席全苏会（兴国）等认为是 AB 团而被扣。因之造成动辄得咎的形势，弄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蝉”。“打 AB 团最激烈的时候，两人谈话，都可被疑为 AB 团，所以彼时的党团员如果没有上级来人参加，都不敢开会。在三次战争中，省保卫处有一个奇怪的意见，就是认为富农全体有被认为 AB 团的可能，提出把富农完全扣留起来，待战争结束后，再审查释放，甚至于公开的说，宁肯杀错一百，不肯放过一个”。<sup>2</sup>

在这一时期，肃反机构成了超党超政府的无上权威的独裁机构，肃反成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因为对 AB 团估量过分，所以当时一切机关都认为打 AB 团是中心、最中心的任务，把一切工作停顿起来，用全力去打 AB 团”。“省保卫处自认为是代表党、代表政府的，一切问题独断独行，形成一个超党超政权的组织”，“更有凭借肃反权利而实行其假公济私的，如雩北区有一个村肃反委员与一苦力争野老婆，将苦力捉来说他是 AB 团用严刑拷打”。<sup>3</sup>

这一轮肃反深入波及到地方，当时地方干部普遍文化水平不高，作风粗糙强硬，加上战争环境的紧张残酷，刑讯逼供再次成为主要手段，指名问供、草率处决普遍存在。吴德峰在报告中提到：“所有 AB 团的破获完全是根据犯人的口供去破获的，并没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证，审犯人的技术，全靠刑审”。

<sup>1</sup>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 141-142 页。

<sup>2</sup>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79-480 页。

<sup>3</sup>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80-481 页。

“犯人招供的，必须要他工作一级的反革命的反革命组织完全招出”，“犯人不(得不)在各机关捉熟人诬供，没有熟人的，则看见过某机关袖章上人名的，即据以招供，所以在当时所有工作人员在袖章上不是把名字涂去，就是把他放在袋子里面，有许多被供人与供他的人对质时，彼此都不认识的（如胜利县）”，“甚至有开一名单——向犯人提问的，有用暗示的方法，要犯人招供的”。“凡被两个犯人以上供出的人，不论事实是否符合，更不耐心去另找旁证证明招出的口供忠实与否，即将被供人拘来（如零北区象这样拘捕共计不下千余人，各县大都如是），依样葫芦的来审讯，尤有怪者，在三次战争剧烈之时，天天在行动中，而拘捕之人犯，又多无时间来审讯，于是把拘捕的人犯或被 AB 团供有组织的机关内工作人员站队点名，询问，如承认加入 AB 团的，即允许自首自新，不承认的即认为是 AB 团坚决分子处以死刑（省保卫处置一次整个保卫队，就是这个办法）。”

1

1931 年夏天第三次反围剿战争后期，中央觉察到肃反简单化和扩大化的危害，8 月 30 日发出给苏区指示信：“中央肯定反 AB 团的斗争是绝对正确而必要的”，“但不是每一个地主残余或富农分子便一定是 AB 团”。“农民中的落后意识，群众中党员中的不满情绪和腐化现象，常常被 AB 团拿来利用，但不是每一个党的错误路线执行者和拥护者，每一个落后的农民，每一个犯有错误倾向或行动的党员或群众便一定是 AB 团”。“你们对 AB 团的斗争一方面是将他简单化了”。“另一方面你们又将 AB 团扩大化了”，“过分夸大敌人的破坏力量与减弱我们自己阶级的坚信心，这是有危害的。”<sup>2</sup>

#### （四）闽西苏区肃社会民主党

在远东局和中央强化肃反政策的影响下，闽西也很快肃出了所谓“社会民主党”。1930 年 12 月，邓发、左权、肖劲光等先后到达闽西，在坑口召开党代表会议，成立闽粤赣省委，邓发担任闽粤赣特委书记，左权任十二军军长、肖劲光为参谋长。这些中央派来的干部执掌军政大权后，积极贯彻中央路线，12 月闽粤赣代表大会把傅柏翠开除党籍，是闽西肃反的先声。

<sup>1</sup>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 477-479 页。

<sup>2</sup>《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1931 年 8 月 30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372-374 页。

事实上，傅柏翠参加革命确实有些勉强，他在政治上是改良主义者，对中共激烈的阶级斗争政策并不认同，最初因为与陈祖康、罗明是好朋友被拉入党，陈祖康叛变、罗明调走以后，他越来越表现出脱离中共的趋向。上杭北四区完全是傅柏翠的势力范围，他被开除党籍后，一个月的时间内，“上杭北四区二百多党员在傅柏翠的领导底下，全体退出党籍，区委支部宣布取消”，“区乡苏维埃宣布取消，另行成立农民联合会”，还提出了“土地、和平、自由三大要求”。<sup>1</sup>

闽西肃反大致从 1931 年 2 月开始，在闽粤赣特委书记邓发和闽西苏区裁判部长林一株的推动下，很快扩大化。3 月中央已经得到报告，其中提到傅柏翠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活动。“以傅伯翠为首的主力已经脱离 12 军。傅伯翠是福建的农民领袖，地主的儿子。他现在正在我区招募部队同我们作斗争”，“他们拼凑了所谓的‘新共产党’。工作常常是以社会民主党的名义进行的”。“反对我们的第一次暴动是在广州起义周年日之际在傅伯翠的领导下进行的。此后又发生过另外几次骚乱”。王稼祥和任弼时到达当地的那天，刚好发生了一次暴动。“傅伯翠的人夺走了 10 条枪，解除了警卫的武装，还拿走了钱和食品。他们寻找党的书记和司令部长官，打算把他们杀死”。“在乡村贫农中作口头宣传时，傅伯翠的人使用了这样的口号：‘你们为苏维埃政权奋斗了三年。现在你们没吃没穿。这是给你们的钱，拿去吧，给自己买点吃的穿的。’他们把钱散发给穷人。”<sup>2</sup>

中央代表团对闽西肃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 3 月 15 日到达永定虎岗与闽粤赣特委会合，正碰上闽西党与傅柏翠的冲突。三人在 3 月 23 日给中央的信中说：“十二军内的许多政治工作人员，以及红军党的中级干部，各级苏维埃政府机关负责的”都是社会民主党，“我们认为这次特委破获社党一般是对的，所捕人都是根据三个至五个人的口供而实行逮捕的，许多与抄出的名单是相符合。被捕的大多数，并未经拷打”。“我们是主张采取严厉的制裁。一切加入社党而负有责任的”，“一切加入社党而在党团、政府及工会、红军中负责的，均实行枪决”。“现在的情形很严重，然在邓发来后，总算某部分工作中是有进步的”，“尤其是最后社会民主党的破获等，这都算是进步的工作”。<sup>3</sup>

<sup>12</sup> 《中共闽粤赣特委给罗明的信》（1931 年 1 月 30 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中央档案馆 1984 年，第 27 页。

<sup>2</sup> 《雷利斯基同周恩来、张国焘和向忠发谈话记录》（1931 年 3 月 2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184 页。

<sup>3</sup> 《家、弼、霖自闽粤赣苏区来信》（1931 年 3 月 23 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 72-76 页。

邓发得到中央代表团的支持后，肃反更加坚决，在党、政、军系统中一批又一批地破获了所谓“社会民主党分子”，地方党组织损失惨重。5月27日，杭武县东五区发生武力反抗的坑口事变，很快遭到严厉镇压。闽粤赣省委7月15日工作报告称：“永定的党一贯来受社会民主党的把持”，“龙岩的社党，十一次破获他们的县委”，“龙岩党大部分是社党，负责人大部分是社党负责人”，“龙岩二千的党员现在只剩二百，一千的团员现在只剩二十余人了”。“杭武县委也只剩下了一个书记（还是我们派去的），其余的人员也没有”。“汀连的县委及各机关，在最近的半月来也破获了大批的社党，县委书记外，全体是社党，县苏主席、肃委主席、军委主席也是社党，各群众团体也是社党把持”。“我们在六月总共枪决了八百二十四个社党，入模范监狱的有二百六十六人，释放的有一百人，半年来所扣留的社党不下四千人（整个闽西），枪决的也不下二千人了”。<sup>1</sup>中央巡视员8月3日的报告更为惊人：“据新从那边来的同志的谈话，现在被我们捕杀的已有三千人，拘禁的仍不算”。<sup>2</sup>

中央逐渐对肃反扩大化有所警觉，8月29日写信提醒闽西党组织：“中央认为你们坚决反对社会党是对的，但你们对社会党的认识和处置是不够而且有许多的错误：第一，你们把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和肃反工作的对象只认为是社会民主党（从你们的文件和工作中可以看得出），这显然是把复杂出问题简单化了”，“你们把社会党组织看着无微不入神妙不可测了”。“第二，因为你们把苏区一切不好的现象都只看作社会党的作用，所以苏区的党，团，苏维埃以及种种群众组织，在实际工作中的错误和缺点，都就不能得到正确的仔细的检阅和纠正，自然亦就不能发展真正的自我批评。”<sup>3</sup>

虽然7月邓发去江西担任中央局委员，但闽西肃反至少持续到9月。中央巡视员余泽鸿在8月31日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此间昨日开群众大会纪念彭杨，白沙到近两千人，我参加。下午枪决社党二十余人，我也打了两个，痛快！”“政治保卫处林一株（是副处长），最近发现是社党特委书记，最近扣留，我也去拷问的，他已承认，说出许多材料”。<sup>4</sup>在中央的干预下，罗明、郭滴人等开始纠正肃

<sup>1</sup> 《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三号》（1931年7月15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226-232页。

<sup>2</sup> 《中央巡视员巡视福建情况报告》（1931年8月3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7），第326页。

<sup>3</sup> 《中央致闽粤赣苏区省委的信》（1931年8月29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350页。

<sup>4</sup> 《中央巡视员余泽鸿自闽粤赣苏区给中央的信》（1931年8月31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290页。

反扩大化，林一株 9 月被以社会民主党罪名处决，标志着肃反基本结束。闽西肃反杀了三千人左右，结果是“干部的缺乏真是万分困难，过去县委县苏的负责人，现在留下不上十分之一，区委区苏的负责人，至多也留不上十之三”。<sup>1</sup>

1931 年底周恩来经过闽西苏区，实地了解到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12 月 18 日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很沉痛的信。信中说：“我入苏区虽只三日，但沿途所经，已见到闽西解决社党所得的恶果是非常严重的”，“现在许多群众不敢与共党接近，恐怕结果又是社党。究竟社党与共党之别在哪里，何种情形方可算罪，群众简直答不出。扩大红军，说群众不积极，十二军团团长政治委员亲口对我说闽西群众不好，而他们一下子便拘捕五六十人（在一百人之中全都是农民而且多是贫农），给以严刑（只据别人一点口供，还说不打不招，等审问清白，连释放都难，因为身体已伤），对群众将成如何影响！这样难怪现在扩大红军之遇到最大的困难了”。<sup>2</sup>

中央 1932 年 1 月 21 日致信闽西省委，严厉批评闽西党在肃反中捕杀大量工农，犯了严重政治错误：“中央认为闽西党目前最大的任务是在同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做最坚决的斗争。党要绝对禁止对于没有确切的反革命证据的工农分子实行逮捕，严刑拷打与杀戮”。“难道在一个支部内因为书记或其他少数分子是社党，所以能以此证明其他的同志都是社党，以致要逮捕整个支部的同志，而加以严刑拷打吗？”“我们党的力量是建筑在群众对于党的信仰与拥护上，而绝对不是建筑在我们的枪杆子上。恐怖政策，绝对不能消灭苏区内部的反革命。却正相反，恐怖政策的继续，正是在替反革命分子造成良好的环境！”<sup>3</sup>

中央局的建立本来是要在苏区加强统一领导、解决纷争的，但是由于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做出了严厉的决议，同时从上海来的领导人并不熟悉农村环境，也没有充分吸收原来苏区肃反的经验和教训。结果在 1930 年肃反刚刚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中央苏区肃反在 1931 年又很快重蹈覆辙，再次出现严重的扩大化，不得不再次纠正。可见，执掌政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常常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之后，才能逐渐取得一点进步，慢慢学会建立有效的政治秩序。

<sup>1</sup> 《中共闽粤赣省委报告第十四号》（1931 年 8 月 20 日），《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第 250 页。

<sup>2</sup> 《纠正肃反中的严重错误——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1 年 12 月 18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835 页。

<sup>3</sup> 《中央为肃反问题致闽西省委信》（1932 年 1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64 页。

## 四、小结

中央苏区是中共最重要的根据地，它是由毛泽东的队伍、朱德的队伍、彭德怀的队伍、李文林的队伍等许多独立活动的红军共同开辟出来的。随着苏区的发展，独立活动的小队伍开始整编成统一指挥的大队伍。各支部队在走向集中统一指挥的过程中，不断在融合中发生纷争，也不断在纷争中走向融合。

1930 年，苏区和红军都获得重大发展，但毛泽东与赣西南领导人的矛盾也日趋尖锐，在立三路线支持下，李文林为书记的江西总行委与毛泽东的总前委在政治、军事方针上都有重大分歧。国民党中原大战结束，开始调集重兵准备进攻苏区，红一方面军和中央苏区面临空前严重的威胁。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方针，艰难说服了红军中的不同意见，但遭到李文林等江西行委干部的质疑和反对。红军攻占吉安后缴获了一些敌人间谍的材料，引起毛泽东的警觉，认为有反革命分子打入红军和苏区内部，于是发动了大规模肃反。

肃反发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肃反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扩大化，这和当时革命队伍生长于野蛮环境，多数干部战士文化不高、思维简单粗暴有很大关系。1930 年 12 月初的黄陂肃反演变成红军历史上一场大灾难，刑讯逼供盛行一时，红一方面军 30000 多人的队伍，竟有 4400 人被捕，被杀的人数难以有精确的统计，粗略估计达到 2000 人左右，造成了严重损失，并引发了富田事变。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深入阐释了“党指挥枪”的原则，影响深远。决议认为，集中的权力结构是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力量来源，虽然毛泽东领导的肃反有些过火，但富田事变武装反抗上级更加不可容忍，党内分歧绝不可用分裂红军的军事手段解决。项英初建中央局时苏区肃反有所缓和，但中央代表团到达后，新苏区中央局再次推动大规模肃反，并深入波及整个苏区，闽西肃反短短几个月竟然杀了 3000 多人，这是指上级领导的集中肃反，在各地基层群众性肃反中被杀的人数就很难统计了，苏区中央局在建立初期就在肃反问题上出现了较大的偏差。

在残酷战争中，中共既要通过肃反来巩固苏区和红军，又要避免肃反扩大化的严重后果，不得不在两难之中寻找平衡。在付出了高昂代价之后，中央苏区和

红军才逐渐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从苏联经验出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认为肃反是苏区建立政权的必要手段，强调“站在巩固苏维埃政权的观点上，各苏区应厉行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应该注意政权内部政府机关中，红军赤卫队中，工农劳动团体中，文化教育经济机关中，甚至共产党青年团中有无阶级的敌人反革命的侦探暗藏在内，有无进行破坏政权破坏党尤其是破坏红军的阴谋和组织”。“各苏区在革命胜利的第一秒钟便应有肃清反革命委员会的组织，施行对反革命的镇压，同时就要逐渐的开始筹备并建立自上而下有系统的、经常的、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和工作”。“肃反委员会要随着它自己工作的深入与有系统，逐渐开始政治机关中红军中各级‘政治保卫局’的建立”。<sup>1</sup>

相对于精密细致的现代工业社会，传统农业社会比较简单，成长于农村环境的中共干部不免作风简单粗糙。他们在战场上勇猛无畏，但并不擅长反间谍这种精细工作，同时紧张残酷的战争环境中也不可能详细调查案情，结果每次大规模肃反都走向失控，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共产党人追求最新的政治理想，但是他们却不得不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建立基地，而且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时刻面对关乎生死存亡的战争，在巩固政权、建立政治秩序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在探索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有努力深入到当时的情境当中，才能获得比较全面确切的理解。

---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1930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6），第440-442页。

## 第八章 中央苏区集中体制的全面建立

中共中央逐步迁入苏区，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移到农村。1931年1月苏区中央局成立，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正式建立了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国家政权。苏区政府的控制和动员能力是非常惊人的，其中肃反和政治保卫制度发挥了很大作用，这是中共在力量悬殊的反围剿战争中，能以小小苏区对抗重兵围攻数年之久的重要原因。

中央领导机构的权力集中趋势也很明显。在中共中央进入苏区以前，毛泽东在苏区集中权力的努力得到了中央的支持，但是随着中央领导人分批到来，他们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毛泽东对自己的能力和经验非常自信，认为新来的领导人经验不足，在一系列冲突之后，他在宁都会议上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博古和李德相继进入苏区之后，这两个经验不足的年轻人依靠共产国际的信任执掌了苏区领导权。中共建立了控制动员能力超强的集中体制，但在顶端掌握最高权力的却是不合格的领导人，这给中国革命前途带来重大危机。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建立集中政治保卫制度

#### （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治保卫局系统

中央苏区初期的肃反及富田事变带有一定偶然性，随着政治保卫机构逐步建立，政治监督成为系统性和制度性的日常工作，苏区的政治气氛趋于严肃，红军和苏区早期宽松的民主气氛逐渐消失。1931年6月《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要求：“苏区内部肃清反革命的工作，必须变成经常性的系统工作，必须立即在各苏区建立起‘政治保卫处’专门组织”。<sup>1</sup>

1931年11月，苏区党和全国代表大会接连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党代表大会决议肯定了肃反是伟大胜利，同时也批评了肃反扩大化和肃反中

<sup>1</sup> 《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193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303页。

心论，是一个相对平衡的决议，预示着政治保卫制度向正规化发展：“大会完全同意中央和中央局扩大会对富田事变的决议：富田事变是 AB 团反革命的暴动。当时党的领导机关对于这个事变的处置方法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肃反工作中仍旧有很大的错误”，“把一切反动分子，一切不满分子，一切犯了错误的人都当做 AB 团看待”，“党内生活与群众政治生活落入非常状态。这是把反 AB 团的斗争简单化了，并且过分估量 AB 团的力量，轻视革命力量，因此发生恐怖，而把 AB 团扩大化了，并且在处理 AB 团时未能每次都把领袖与被欺骗被威胁的分子分别开来。这一切错误形成了一种非常错误非常有害的‘肃反中心论’”。“肃反的专门组织不健全，破获反动的工作不能成为一种专门的特殊工作”，“这一切都是极严重的错误。”<sup>1</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把制止肃反扩大化、建立秩序作为当务之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 12 月 13 日第六号训令中提出：“临时中央政府成立，苏维埃政权已经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巩固，在这个时候苏区中有一件急于要做的事，就是建立革命秩序，保障群众的权利”。训令规定：“一切反革命的案件，都归国家政治保卫局去侦查逮捕”，然后向国家司法机关（法院或裁判部）提起诉讼，由司法机关判决。县级司法机关没有判决死刑的权力，省级司法机关判决死刑之后，被告人也可以向中央司法机关上诉。训令还特别规定，除了建立苏维埃不满六个月的新区，地方苏维埃政府不得擅自逮捕反革命嫌疑犯，发现情况只能报告当地政治保卫局。<sup>2</sup>

地方干部是苏区肃反中出现严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六号训令严格限制地方的肃反权力，就是为了制止地方上乱抓人、乱杀人的现象。当时苏区地方干部大都是工农出身，革命立场坚决，但文化程度很低，多半不识字，没有管理经验，作风简单粗暴，“对上级的命令和文件，多半不能了解，也就不能执行”，受到批评就说：“我是工农，我也不晓”。1932 年 3 月《人民委员会命令第六号》专门规定：“每一区、县、省苏都要设识字班，所有的委员和工作人员，都要强迫他们努力识字”。<sup>3</sup>“强迫识字”的效果毕竟有限，当时受过教育的大都出身于地主富

<sup>1</sup> 中央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450、456-457 页。

<sup>2</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六号》（1931 年 12 月 13 日），《红色中华》1931 年 12 月 28 日。

<sup>3</sup> 《人民委员会训令第六号》，《红色中华》1932 年 3 月 2 日。

农等敌对阶级，革命政权不得不大量提拔思维简单粗糙的工农干部，这样的执政条件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都带来了负面影响，而在苏区肃反中这个问题造成的损失尤其严重。

新建立的政治保卫局系统集中了苏区的肃反大权。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是邓发，侦察部长钱壮飞，执行部长李克农，预审科长胡底，秘书长欧阳毅，总务处长雷经天，保卫大队长吴烈。<sup>1</sup>1932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规定：“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任务，在以其集权的系统组织与革命群众的信赖和帮助，经常的系统的执行检举和消灭一切公开的尤其是秘密的暗藏的反革命的组织和行动，以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新的苏区一般的都要经过肃反委员会的工作阶段。在肃反委员会存在的地方，国家政治保卫局应与其发生系统上的管辖关系，且要逐渐转变其成为政治保卫局的下级组织。”<sup>2</sup>政治保卫局向各级政府和军队派出特派员，特派员是公开的，“以便各革命团体与群众告密”。<sup>3</sup>

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高度集中，垂直领导，无论是红军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权干涉。“国家政治保卫局的组织原则，是完全集权的”。“国家政治保卫局的上下级关系，除了特别障碍以外，是一贯的垂直系统，下级对上级的命令须绝对服从”。各分局各特派员、分局长“工作的关系上绝对隶属于国家政治保卫局。地方政府及红军指挥机关无权改变或停止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命令，如有抗议只能提到人民委员会解决。”<sup>4</sup>在这种垂直制度下，即使在权力集中的军队里，领导人也难以保护自己的部下。当时“军团这一级设立保卫局，作为同政治部平行的机构。师以下设特派员。保卫部门实行垂直领导，即特派员受上级保卫部门领导，而不受同级政治机关领导”，二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发现政治部的秘书长、宣传部长、师直总支书记都被特派员抓起来了，又没有什么证据，但也只能对特派员说：“如果你坚持要杀，我们也可以向上级反映”。<sup>5</sup>特派员拥有让人畏惧的权力，以至于红军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天不怕，地不怕，就怕特派员来谈话”。

<sup>1</sup> 《欧阳毅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6页。

<sup>2</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1932年1月2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16页。

<sup>3</sup> 《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1932年1月2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6），第171页。

<sup>4</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组织纲要》（1932年1月2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16-17页。

<sup>5</sup> 罗东进：《我的父亲罗荣桓》，辽宁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9页。

红军中政治保卫人员和军政领导发生了很多矛盾，军委不得不于 1933 年 2 月 1 日发布训令，强调权力边界：“如犯军事纪律者而同时又为反革命犯，则处罚其犯军事纪律之权属于军事指挥员及政治委员，而处理其反革命犯事宜概归政治保卫局。这一切必须分别清楚，不得混乱。”<sup>2</sup>军委 2 月 9 日训令则强调保卫系统的独立性：“在红军中的特派员是保卫局在红军中活动的一个基本单位，他所担负着的任务是极其重大”。“六十一团不经过保卫局组织上的允许，擅自调动特派员工作，这是在组织上破坏保卫局建制的错误”，“必须保持保卫局的独立性，保持保卫局一贯的垂直系统”。“各部红军军政首长，应该尊重特派员权限，并尊重保卫局的组织系统”。“保卫分局及特派员行使职权时，如逮捕、拘留乃至审讯、制裁等问题，同级军政首长应完全尊重分局及特派员的意见，如不同意，只能向上级陈述，而不能妨害分局长及特派员行使职权”。<sup>3</sup>

江西政治保卫局吴德峰的报告详细回顾了省级政治保卫机构的建立过程。1930 年 11 月攻下吉安后，省及各县都成立了肃反委员会。三次反围剿战争中，省肃反委员会于 1931 年 7 月改为省保卫处，公略、永丰、万泰等县也改为政治保卫处，“兴国、赣县、雩都等县，仍为肃反委员会，其他各县尚未成立肃反机关”，“组织系统未经统一，省保卫处亦未积极去领导和指示下级的工作，关系上不密切，形成各自为政的独立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地方上很容易出现乱杀人现象，“拘捕之反革命分子先后由各县保卫处或肃反委员会审判处置”，“表上所列的数目是有册可稽的，如省保卫处处决两次整个的保卫队，完全没有登记，各县处置人犯，亦没有完全登记，如公略县报告处决的人数，据调查所得，东固一区也不止此数”。三次反围剿时，许多县丢失了处置犯人记录，“各县联席会议时各局长口头报告，各县处死刑估计在有册可稽的一倍以上。”<sup>4</sup>

江西省政治保卫处于 1932 年 1 月 1 日改组为政治保卫局江西省分局，下设四科：第一、二科科长吴德峰，第三科科长李克农，第四科科长周兴，“旋因周兴

<sup>1</sup>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第 115 页。

<sup>2</sup>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关于明确红军中国家政治保卫局及特派员的权限的训令》（1933 年 2 月 1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322 页。

<sup>3</sup> 《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国家政治保卫局训令》（1933 年 2 月 9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328-329 页。

<sup>4</sup> 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 476-477 页。

过去有助长李韶九错误的事实，由总支决定留党察看，并停止其工作”。“二月中接到中央政府国家保卫局的组织纲要，依照组织法将内部改组，吴德峰兼任侦察部，李克农担任执行部。四月底李克农调去中央局，两部由吴德峰一人兼办”。 “省保卫局委员会由李富春、陈毅、吴德峰三人组织之，除常事务外，一切行政、组织、审判，都由委员会通过执行”。保卫队有士兵 70 名，其中贫农 58%、工人 24%、雇农 13%、中农 5%。各县也陆续建立起政治保卫局，局长大多选择贫农出身的干部担任，县以下各区设特派员。<sup>1</sup>

## （二）政治气氛出现四个月缓和期（1931 年 12 月——1932 年 3 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政治保卫机构逐渐正规化，政治监督成为日常工作，疾风暴雨式的群众性肃反告一段落，政治气氛在 1931 年 12 月至 1932 年 3 月之间出现了四个月的缓和时期。政治保卫局秘书长欧阳毅回忆：“我到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时候，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已近尾声，正在纠偏。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纠正肃反的扩大化、简单化倾向。我们虽然仍然担负着肃清反革命的任务，但非常强调政策，要重证据，严格禁止逼供信。杀一个真正的罪犯，要层层上报，最后经过党中央批准。滥捕滥杀现象得到遏制”。<sup>2</sup>

据江西省的报告：“在苏大会后，十二、一、二、三几个月中”，“扩大化简单化的错误，逐渐走到停顿状况，群众看见过往所谓 AB 团的分子，一批一批允许自新自首了，甚至豪绅地主富农也快些出来了”，于是群众认为工农分子加入 AB 团都不要紧，“不捉不打不杀”，看见富农豪绅因无证据也有释放出来的，认为“不肃反了”、“现在不要杀人了”。根据中央政府的训令，区乡政府不能随便拘捕人犯，区乡干部及群众认为“不要捉人了”、“群众无权了”。<sup>3</sup>

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 1931 年底到达苏区后，为纠正肃反扩大化做出了努力。在缓和的形势下，中央局为了争取人心、减少恐怖气氛，公开处分了对肃反扩大化负有直接责任的李韶九，而对负有领导责任的毛泽东只作了不点名批评。1932 年 1 月《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认为：“李韶九同志在肃反

<sup>1</sup>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 481 页。

<sup>2</sup> 《欧阳毅回忆录》，第 127 页。

<sup>3</sup>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补充（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 487-488 页。

工作中所做的严重错误一般的是在党当时错误的领导之下造成的，而他加以扩大，甚至违背上级的决定去独断独行以致形成极错误的肃反中心论”。“中央局决定予李韶九同志以留党察看六个月的处分，派到下层去（做）群众工作”。“过去党的指导机关对于检查党员工作与生活这一任务完全忽视。这种错误就使像李韶九同志这样犯有严重错误的人竟能继续主持江西肃反工作至八九月之久”。<sup>1</sup>

在几个月缓和时期，政治保卫机构工作逐渐正规化。1932年3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提到：“过去的错误，如随意捕人、偏信口供、使用肉刑等，已有大的转变，并且对于过去政治犯在县苏已遵照第六号训令正式开庭审判，革命秩序相当建立”。<sup>2</sup>刑讯逼供的审问方法被废除，政治保卫工作的重点是布置工作网和清理积案。当时江西省的大部分积案是所谓“罚款犯”，也就是为筹款被抓起来的地主，可见初期的肃反委员会还有经济职能。吴德峰在报告中说：“省局在三月以前，大部分工作是帮助胜利、兴国二县清理政治积犯案。先后共清理了九百四十九案，帮助胜利县清理罚款犯六百余，並將各县罚款犯拨交县苏处理，因为过去政治犯罚款犯都是由保卫局处理的”。“工作网者，复已有相当的布置，永丰、赣县、兴国、胜利已建立了一部分”，“五月二十八日将各县侦探部长，调到省局授以技术”。“审讯犯人之刑审，在三月以后，完全废除，审判技术，除宁都、雩都、乐安外，其余各县，均有相当的进步”。“截至五月止，省局及各县审理反革命案件，统计一千二百四十案”。“省局及县局审理犯人预审终结后，作成控诉书向省或县苏控诉，经裁判部审理判决，报告上级政府批准后执行。”<sup>3</sup>

在和平建设气氛中，政治保卫机构办事程序制度化，不再轻易批准杀人，处决犯人要经过严密的审查手续。据江西省报告：“苏大会后的二三个月，中央政府的一切工作，带着和平建设的倾向，而对肃反工作，也偏重于和平的建立革命秩序上。富田事变的重要AB团的首领经过五六月不杀，有些应该处死罪的反革命分子，却很轻的处罚，地方上（如瑞金）所拘捕的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民团团长群众恨之刺骨的，要求中央政府处决的，而中央政府却以证据不足为词，一个

<sup>1</sup> 《关于处罚李韶九同志过去错误的决议》1932年1月25日，转引自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第210-211页。

<sup>2</sup> 《中央执行委员会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1932年3月29日），《红色中华》1932年4月6日。

<sup>3</sup> 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84页。

都不批准。”<sup>1</sup>

在缓和时期，很多人避免了被错杀的命运。曹金山回忆，1931年11赣西南特委书记陈毅在于都县说：“现在党的政策好了，即使是‘AB团’分子，也准予自新自首，不会杀头了”。陈毅“动员大家自报，是不是‘AB团’分子。这时会场沉默，鸦雀无声，是有一个小时没有人讲话。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拿出笔记本来点名。点到了名字的，就站到天井里，由武装人员跟随着。这样，一共点到了几十个人的名”。“这次也点到了我的名，搞得我思想很紧张，全身出汗。接着，当场提审，清楚一个就放一个。不一会，被扣押的人全部放了。所有口供也当场烧毁了”。陈毅说：“这个是‘AB团’，那个是‘AB团’，实际上的‘AB团’分子很少。我们要接受教训。希望今后要慎重，再不要乱杀人了。”<sup>2</sup>

这时红军中地主富农子弟或纪律不好的，一般是开除军籍。军委1932年2月训令提到：“红军中对淘汰和开除红军太随便了，许多人开除回到家乡，或有些外省人不能回去，流落在边区，地方党部和政府只知是红军出来的，如何出来不知道。他们不能走出去，还是流（浪）在苏区之内，甚至发生不满的怨言，当了几年红军，身经数十战，结果如是，别人听了也寒心，”<sup>3</sup>这样温和的训令大概只能出现在这四个月的缓和期。

### （三）政治保卫再度强化，判决中强调阶级意识

但是，政治保卫程序正规化与严酷的战争环境产生了矛盾。特别是在斗争尖锐的红白交界边区，地方干部和群众希望通过严厉政策震慑敌对分子，对限制很多的温和肃反政策意见很大。苏区北部边缘广昌附近的南广县委报告：“县苏裁判部单凭审问犯人来判决犯人，将许多要犯释放出去，造成群众中恐惧不敢报告而与反动势力苟安的严重形势。甘竹、长陂、大株等区的群众为这一问题对政府不满意”。<sup>4</sup>

据江西省报告：“对于处决犯人，省政府保卫局核准的，还要待国家政府保

<sup>1</sup>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补充（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88页。

<sup>2</sup> 曹金山：《陈毅同志救了我》，《回忆中央苏区》，第206-207页。

<sup>3</sup> 《中革军委关于纠正扩红工作中缺点的训令》（1932年2月16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55页。

<sup>4</sup> 《中共南广县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报告》（1932年10月），《江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二），第97页。

卫局的审查，因为手续的繁重”，“一个要杀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准要经过一二月。在四月以前，也未注意分别赤色腹地与边区的形势不同，而不了解在残酷的革命战争环境，和群众的阶级仇恨，而偏讲条文组织手续，因此反革命分子不能得到即时的处决，甚至有些地方（如雩都、寻邬），反革命的主要分子脱逃冲狱等事都发生”。“兴国县保卫局只凭犯人口供而将豪绅地主、民团团总释放。边区不能即时的处决反革命分子，而要等待上级的指示，违反群众的意识，如是新发展区域群众斗争还未起来的，看见了释放豪绅地主出来，表示得更消沉，甚至不敢要地主的田，在老苏区如兴国龙沙区则表示对政府不满，边区群众则愤于等待遂至走到群众秘密的将反革命分子杀了，才报告政府”。省委听到下层的意见后，“一方面将首要犯处决，将捣乱造谣的豪绅、地主、富农重新拘捕，一方面利用在各地处决首要，进行加紧肃反的群众运动，动员群众参加公审，举行群众大会来处决反革命分子”，“四月以后，对肃反工作的停顿，才有相当的转变”。<sup>1</sup>

1932年3月，苏区中央局再次作出强化肃反的决议，强调“因为对肃反的停顿，一般被群众打落了的非阶级份子又乘机活动，企图翻案抬头，因此右倾错误，成为目前斗争中主要危险，我们要集中火力来克服”。“目前肃反停顿的错误，不是偶然的，而是来源于党内对革命发展形势的估量不足，不了解某区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形势，不了解革命战争的环境”。<sup>2</sup>

于是，政治保卫工作再次进入紧张时期，直到长征前再也没有明显的缓和。萧克说：“许多不该处理的人在三二年三、四月又给处理了。”<sup>3</sup>边区干部和群众对没有处决权意见很大，政府不得不于1932年6月发布第十二号训令，更改了六号训令，再次把处决权下放到县级：“1931年12月13日中央执行委员会所颁布的第六号训令，其第二项有‘县一级司法机关，无判决死刑之权’的规定。但当目前发展革命战争的时期，在事实上，县裁判部都不判决死刑，省裁判部在工作上，要发生许多困难，很难按照这个规定去执行，因此本执行委员会决定改为，县一级裁判部有判决死刑之权，但没有执行死刑之权，判决死刑后，必须得省裁判部的批准后才能执行，倘若有些县与省的中间被白区所隔断，则县一级裁判部

<sup>1</sup> 《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补充（1932年5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488-489页。

<sup>2</sup> 《中共江西省委接受中央局肃反工作决议的决议》（1932年3月10日），《江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第56页。

<sup>3</sup> 萧克：《关于中央苏区的几个问题》，《回忆中央苏区》，第198页。

才有判决死刑和执行死刑之权。”<sup>1</sup>

1932年4月，中央局取消河西特委，成立河西道委，派贺昌担任书记，管辖赣江以西的上犹、崇义、遂川、南康等县，这是敌我斗争尖锐的边区。贺昌到达不久，即开展红五月运动周，在上犹、崇义举行了两次公审大会，判决了一百多人，“处决了四五个，判决徒刑的有一些，自新释放较多”。<sup>2</sup>可见，在肃反正规化以后，即使是在紧张时期，判处死刑的比例也不高。任弼时在1944年湘赣工作座谈会上也提到：“第二次肃反则比较有秩序些，捉的也比较少一些”，“因为第一次高潮时社会秩序没有建立起来，区乡都可以杀人，后来秩序渐渐建立，已经不像过去一样混乱”，“裁判部已经设立了，不能随便杀人”。<sup>3</sup>

江西省保卫分局统计了省局和万泰、永丰、乐安、公略、兴国、于都、赣县、胜利、宁都九县1932年5月处置犯人数据，经整理如下：

江西省政治保卫分局省局及下辖九县1932年5月处置犯人统计表<sup>4</sup>

成分	处决	监禁	罚苦工	释放	合计
豪绅地主	29 (51.8%)	4 (7.1%)	20 (35.7%)	3 (5.4%)	56 (100%)
知识分子	3 (8.8%)	3 (8.8%)	5 (14.7%)	23 (67.6%)	34 (100%)
富农	20 (16.4%)	7 (5.7%)	40 (32.8%)	55 (45.1%)	122 (100%)
流氓	12 (25%)	4 (8.3%)	19 (39.6%)	13 (27.1%)	48 (100%)
中农	8 (5.4%)	4 (2.7%)	16 (10.9%)	119 (81%)	147 (100%)
贫农	15 (3.2%)	5 (1.1%)	47 (10.2%)	395 (85.5%)	462 (100%)
雇农	0	0	2 (3.4%)	56 (96.6%)	58 (100%)
工人	6 (3.2%)	3 (1.6%)	29 (15.5%)	149 (79.7%)	187 (100%)
其他	15 (12.1%)	2 (1.6%)	31 (25%)	76 (61.3%)	124 (100%)
合计	108 (8.7%)	32 (2.6%)	209 (16.9%)	889 (71.8%)	1238 (100%)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肃反政策中贯彻了鲜明的阶级区分。雇农释放比例高达

<sup>1</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训令第十二号》1932年6月9日，《红色中华》1932年6月16日。

<sup>2</sup> 《中共河西道委给苏区中央局的综合工作报告》(1932年5月17日)，《江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第110页。

<sup>3</sup> 任弼时：《回顾湘赣苏区工作》(1944年10月26日)，《江西党史资料》(1)，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年，第149页。

<sup>4</sup> 《江西省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一九三二年(一)，第126-127页。

96.6%，死刑没有；贫农释放也高达 85.5%，死刑只有 3.2%；而豪绅地主释放只有 5.4%，死刑则高达 51.8%；贫农被释放的比例是豪绅地主的 16 倍，而豪绅地主被判死刑的比例是贫农的 16 倍，阶级对比相当悬殊。

在苏区人口的阶级构成上，穷人数量远多于富人，贫农远远多于地主。这表现在被处置的犯人中贫农有 462 人，地主只有 56 人，贫农是地主的 8 倍；大致属于中共依靠阶级的贫农、雇农、中农、工人合计 854 人，而属于敌对阶级的地主、富农合计 178 人，前者是后者的 5 倍。由于中共在肃反中对工农依靠阶级比较温和，而工农阶级在处置犯人中占 70%，所以总体释放比例高达 71.8%，死刑 8.7%。

在判处死刑的情况下，当时政策是召开群众大会公开处决，反对秘密处决。保卫局希望处决能够发挥政治影响，让群众看到过去的统治阶级被消灭，产生彻底翻身的感觉。吴德峰在报告中提到：肃反初期“处决人犯仅有一小部分是在群众大会处决，其余都是借口群众怕死老，于夜间处决”，“处决犯人，间有残酷办法，剖腹剜心（各县都有此现象）”，“造成群众恐怖”。肃反工作正规化之后，“凡判决之案，内经过公审执行，在公审中，得到不少的效果”，“如兴国、雩都、公略、胜利等县犯人隐瞒事实，因处置较轻者，群众均补事实来证明他的罪恶”，“在永丰处决了罗焕南以后，群众说，现在是真正的革命，有几人自动来当红军，打破了和平保守和悲观失望的观念。”<sup>1</sup>

即使肃反又进入紧张时期，正规制度还是防止了基层大规模滥杀的发生，在主管干部比较谨慎的情况下，这一点尤其明显。福建省裁判部长张华先连续发布训令禁止刑讯逼供，1932 年 8 月 27 日训令称：“我们苏维埃的法庭，是要废除一切肉刑，用口才上的技术工夫来审问犯人，并且要到各方面去搜查材料，证实犯人的犯罪行为”。<sup>2</sup>9 月 9 日训令再次强调：“中央执行委员会办法第六号训令，严格的废止肉刑历时已愈半载，但是各级政府对该项训令之执行非常不够”，“以后各级政府及地方武装如再有用肉刑的事情，当以非常苏维埃法令治罪！”<sup>3</sup>9 月 12 日训令要求各县裁判部报送省裁判部批准的死刑案件，如果仅报审判记录和

<sup>1</sup>吴德峰：《江西苏区中共省委工作总结报告（续二）～肃反工作》（1932 年 5 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第 479、484-485 页。

<sup>2</sup>《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裁字第二号》（1932 年 8 月 27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5），第 315 页。

<sup>3</sup>《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裁字第三号》（1932 年 9 月 9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5），第 339 页。

判决书，“很难断定该项判决书是否正确，容易弄成错误”，“必须将原有的材料和证据全部送来，否则不批准”。<sup>1</sup>

#### （四）政治保卫制度巩固苏区和红军，但也会伤及无辜

政治保卫工作的重点是巩固红军，特派员在部队中发展秘密工作人员，形成工作网。连一级设工作网队长，排、班设工作网员。<sup>2</sup>当时高级干部的警卫员都要经过保卫局的训练，警卫员不仅有保卫的职责，也有监视的职责。<sup>3</sup>

国民党起义部队由于成分复杂、旧军队传统深，成为监控的重点，比如广西百色起义成立的红七军。邓小平在报告中提到：“七军本是和平转变来的，转变后的改造工作非常不够，致有三次叛变事实之发生，都是旧的基础（包括兵油子）没有肃清的结果。”<sup>4</sup>红七军后来经历了严厉的整肃，曾任七军政委的龚楚回忆：“红七军初到江西时，毛泽东要调整红七军的干部，为全军同志所反对。他们就指红七军内有改组派的反动组织”，“要在红七军进行‘肃清改组派’的清党运动。起初杀了二十多个干部，其中还有两个高级政治干部”。<sup>5</sup>不过即使如此，还是会有擅于伪装的漏网之鱼，比如来自宁都起义 26 路军的干部胥江汉，红军长征前后，他取得组织信任被任命为闽赣省军区参谋长，靠着个人经验和能力，“闽赣省军区实际上操纵在胥手里，大大小小的权都被胥的人掌握了”。在苏区失败后的混乱中，胥江汉带队到福建仙游叛变投敌。<sup>6</sup>

严厉的政治气氛对巩固部队起了相当作用，红军对间谍和叛变的警惕性很高。广昌独立师的师长兼政委龙普霖是黄埔学生出身，1932 年 4-5 月间他带部队向国民党驻扎的南丰开进。当天晚上，突然发现国民党的队伍包抄过来。早就对这次行动存有疑心的三个团政委聚在一起，包括十一团政委胡楚夫、十团政委李纯安、十二团政委赖际发。他们认定师长龙普霖想要带领队伍投敌，带人到师部把龙普霖抓了起来，然后带着部队快速撤出险境。后来发现，“龙普霖同国民党勾结大概已经有三、四个月了，国民党还派来一个奸细到龙普霖那里当副官”。“经

<sup>1</sup> 《福建省苏维埃政府训令裁字第四号》（1932 年 9 月 12 日），《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5），第 343 页。

<sup>2</sup> 陈复生：《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 年，第 50 页。

<sup>3</sup> 陈复生：《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第 59 页。

<sup>4</sup> 邓小平：《七军工作报告》（1931 年 4 月 29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692 页。

<sup>5</sup> 龚楚：《我与红军》，第 243 页。

<sup>6</sup> 马步英：《忆闽赣军区始末》，《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第 267-268 页。

临时中央苏维埃最高法庭审判，将龙普霖和国民党派来的那个奸细一起枪毙了。”

<sup>1</sup>

中央给所有苏区都施加了很大压力，没有大规模破获反革命组织的赣东北苏区受到严厉批评。1932年9月《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咄咄逼人地指出：“我们不能相信在赣东北苏区内没有像闽西、中区、鄂豫皖、湘鄂西各苏区那样总的领导机关。零星的破获固然需要，然而我们必须从这种零星的破获一直追踪到总的领导机关。比如关于弋阳县委的事件”，“这是最露骨的反革命行动。敌人所以能够黑夜长驱深入直达县委机关，当然不单是还有外人告密，而县委委员中某些人也是这一阴谋的直接参加者。对于这些县委的委员，省委当时应有极迅速的行动，严密的从这些委员那里寻找更多的线索，而不能以留党察看三个月了事”，“需要更多的无产阶级的警觉性与坚决性，不放松在每一事件中反党与反苏维埃的分子，而把一切可疑的事件追究到底。”。<sup>2</sup>

在极度紧张的战争环境中，红军要全面清除阶级异己分子。即使本人没有任何可疑的表现，只要出身于地主、富农等敌对阶级，就被认为有叛变危险，是需要清除的阶级异己分子。1932年10月《中革军委关于清洗出阶级异己分子的训令》认为：“中国的革命运动，目前已是进到了残酷的阶级武装斗争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一切动摇不可靠的阶级异己分子都会而且必然或早或迟的叛变革命而跑到敌人的营垒中去，故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革命武装队伍——红军，必须最坚决的一开始就把这些分子排斥出去，以严整自己的队伍”。“三军团的作战科长舒适于本月二十三日在前线上逃跑了。查舒适原系平江地主出身，他的父亲是被赤卫队杀了的，这样很明显的叛变前提摆在面前，乃我们一些同志，特别是领导的同志，对阶级斗争发展为革命战争认识不够，以致对于阶级的异己分子，不但没有采取最严厉的必要的手段，而且给予了他们以很重要的工作。过去郭炳生、侯中英叛变的教训，痛犹未止，现在又忽视如故，这是何等严重的错误呢？！”<sup>3</sup>

政治保卫局的监督范围不限于间谍、叛逃等严重问题，而是扩大到包括消极怠工、贪污腐化等现象。湘赣苏区一度甚至“把杀人当成完成任务的一种手段，

<sup>1</sup> 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第23页。

<sup>2</sup> 《中央给赣东北省委的信》（1932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487页。

<sup>3</sup> 《中革军委关于清洗出阶级异己分子的训令》（1932年10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245页。

筹款、扩红、动员归队都要杀人”。<sup>1</sup>李克农在 1933 年 1 月《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密令第二号》要求各级分局“迅速严密的审查各级分局干部成份及政治坚定性和其工作状况。坚决撤消一切消极怠工、阶级异己、贪污腐化的分子。”

<sup>2</sup>高度集中的政治保卫制度大大加强了政权的控制力和动员力，几乎把苏区的人力、物力都发挥到了极限，对抗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长期围攻。

但是，在严厉气氛下，独立思考、爱提意见的干部不易生存，上级一旦发生偏差，也难以得到纠正。黄克诚提到何笃才“在古田会议之前朱、毛的争论当中，反对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从此便不受重用”。“他曾对我说过，毛泽东这个人很了不起！论本事，还没有一个人能超过毛泽东；论政治主张，毛泽东的政治主张毫无疑问是最正确的。我问他：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站在反对毛泽东的一边呢？”

“他说：毛泽东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何笃才还举例说，像李韶九这个人，品质很坏，就是因为会顺从，骗取了信任，因而受到重用”。后来，虽然有师政委黄克诚的极力保护，何笃才还是在 1931 年的第二次肃反中被杀，黄克诚也因为抵触肃反被撤职。<sup>3</sup>

1933 年初，国民党发动了对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战争。为应对险恶形势，苏区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3 月 15 日发布二十一号训令，不再强调肃反由政治保卫局专门负责，而是要求一切机关共同参与。训令指出：“革命与反革命的战争已进到生死决战的时候，敌人除开军事力量以外，更有计划的在苏区内部组织反革命活动”。“苏维埃政府及一切革命机关，要施行武装的及群众的保卫。为了镇压反革命，对于重要反革命分子，要不犹豫的迅速的给以逮捕和处决”。“边区各县的裁判部，对于已捕犯人，凡属罪恶昭著证据确实的分子，首先是这些人中的阶级异己分子，应立即判处死刑，不必按照裁判部暂行组织和裁判条例第二十六须经上级批准才能执行死刑的规定”。“对于敌人进攻区域及边区内的地主富农分子，应该分别处置。其有反革命事实的，应立即逮捕，严厉惩办，不让他们有丝毫活动的余地。”<sup>4</sup>6 月 1 日，司法人民委员部也发布命令，要求各级裁判机关“坚决地执行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十一号训令，各级裁判机关应定出具体的执行

<sup>1</sup> 王首道、王震、萧克等：《湘赣根据地革命斗争的回忆》，《江西党史资料》（1），第 165 页。

<sup>2</sup> 李克农：《国家政治保卫局中革军委分局密令第二号》（1933 年 1 月 20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322 页。

<sup>3</sup> 黄克诚：《黄克诚自述》，第 100-102 页。

<sup>4</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第二十一号》（1933 年 3 月 15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第 640-641 页。

办法。对于罪恶昭著，事实确凿，群众要求处以死刑的阶级异己分子，应速即执行死刑”。<sup>1</sup>自此以后，苏区的肃反气氛越来越紧张，可见在残酷激烈的战争环境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初期的正规化和法制化成果很难保持。

## 二、共产国际远程操控，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

在政治保卫系统建立起对苏区全方位控制的同时，中共中央权力集中的趋势也继续发展。随着中央领导逐步迁入苏区，毛泽东与中央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项英到达苏区之前，毛泽东和中央在集中权力上是一致的，他有力地集中了中央苏区党和红军的权力，领导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辉煌战果。但是，随着中央把革命重心迁移到苏区，先是 1931 年 1 月项英到达并成立苏区中央局，4 月任弼时等陆续到达，11 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整个中央机关逐步迁到中央苏区，毛泽东逐渐与中央其他领导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矛盾，终于在 1932 年 10 月宁都会议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实际上被排除出核心决策圈。

### （一）反围剿连续获胜，毛泽东出任中央局书记和政府主席

项英到达苏区成立中央局之后，很快就和毛泽东出现分歧，批评毛泽东领导肃反出现严重偏差。不过中央局建立初期，机构很薄弱，曾山在赣西南，“连会议都不能参加”，毛泽东和朱德主要精力用于军队，“事实上在中央局做工作的只有项英一人”。项英对苏区和红军工作都缺少经验，只能做几个决议，实际管不了什么事。军事委员会的情况也差不多，“事实上只有项英一人跳进跳出，结果形成中央局与革命军事委员会是一而二，二而一，除发了口号通令，在工作上没有建立起来”。<sup>2</sup>郭化若说：“苏区中央局的书记和中央军事委员会的主席虽然是项英同志，但事实上还是毛泽东同志在管事。”<sup>3</sup>

1931 年 4 月，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达苏区，17 日召开了中央局扩大

<sup>1</sup> 《中央司法人民委员部命令第十四号》（1933 年 6 月 1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7），第 763 页。

<sup>2</sup> 《苏区中央局报告》（1931 年 7 月 8 日写发，11 月 6 日带到），《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674、1679 页。

<sup>3</sup> 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 143 页。

会议，传达四中全会的决议。远东局和中共中央都对毛泽东领导的肃反表示支持，项英不得不承认错误。扩大会议还选举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sup>1</sup>、陈毅为中央局委员，请求中央批准。<sup>2</sup>显然，毛泽东等认为外来领导人不熟悉苏区和红军，要求在中央局中增加本地干部表决权。中央没有直接答复，但在5月《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中规定：“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是代表中央的，他有权可以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中央局或中央分局只能由中央派遣或指定”。<sup>3</sup>

扩大会议后不久，中央局就围绕第二次反围剿战略发生激烈争论。郭化若说：“苏区中央局形式上是项英同志掌权，实际上权力掌握在任弼时同志手里，由王稼祥同志出主意，顾作霖同志打先锋”。“当敌人第二次‘围剿’快要来到的时候，项英同志得悉蒋介石兴兵二十万，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开到四川去。”<sup>4</sup>欧阳钦也提到：“到了青塘，苏区中央局便开会。讨论的问题是第二次反‘围剿’打不打，先打哪一路敌人和选择在哪个地点打。当时我任苏区中央局的秘书，开会时我做记录”。“毛泽东同志主张要打”，有些人“主张退出中央苏区，到四川去，说斯大林都讲过四川是最好的根据地。所以，会上支持毛泽东同志意见的是少数”。<sup>5</sup>

据欧阳钦1931年9月报告，4月中旬第一次讨论二次反围剿时，最初决策是“分兵退敌”，过几天的第二次讨论时，又决定“应该打一仗再分”，多数人主张打十九路军，但“泽东同志意见认为在进攻我们的人中，蒋蔡比较是强有力的，在历史上未曾打过败仗”，“我们现在主要的是择敌人的弱点打破，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我们应打王金钰这路”。4月31日第三次讨论时，“由泽东同志先报告，这一次讨论的精神则完全转变了，认为目前全国革命是高涨的，我们应取积极进攻策略”，“并且承认过去的‘分兵’策略是机会主义”。<sup>6</sup>

在第二次反围剿战争中，项英提出放弃中央苏区到四川，而毛泽东显示出杰

<sup>1</sup>曾山主持江西省苏维埃工作，他在项英到达时的中央指定中央局9人名单里，在任弼时抵达时中央新指定的7人名单里又没有了。

<sup>2</sup>《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情况的报告》（1931年4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1576页。

<sup>3</sup>《中央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1931年5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269页。

<sup>4</sup>郭化若：《回忆第一次反“围剿”期间的有关史实》，《回忆中央苏区》，第140页。

<sup>5</sup>欧阳钦：《回忆苏区中央局“青塘会议”》，《回忆中央苏区》，第160页。

<sup>6</sup>欧阳钦：《中央苏维埃区域报告》（1931年9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册），第367-368页。

出军事才能，领导红军取得横扫七百里的大胜。在夏天更大规模的第三次反围剿战争中，毛泽东指挥红军再次险中取胜。任弼时等认为，项英“犹豫不决（特别在军事行动上），领导战争能力弱”，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sup>1</sup>中央局 10 月 11 日致电中央：“项英因解决富田事变完全错误，认为是党内派别斗争，因此丧失信仰；工作能力不够领导，中央局决以毛泽东代理书记，请中央批准”，<sup>2</sup>同时再次提出增加五人的请求。中央 10 月下旬回电明确拒绝中央局增加成员，强调“地方干部对于中央局的成分无任意变更之权”，“中央局成分无扩大之必要”，但同意“中局书记由毛泽东代理”，<sup>3</sup>共产国际也在 11 月 3 日会议“批准中共政治局关于任命毛泽东同志为苏区的书记”。<sup>4</sup>

反围剿战争连续取胜之后，毛泽东凭借才能和功绩重新成为苏区领导核心，不仅取代项英担任了中央局代理书记，而且在 11 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选政府主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在共产国际的指示下成立的，中央 1931 年 6 月训令提到：“国际屡次指示中国党在苏维埃区域必须建立起临时中央政府，中央亦屡次指示中央苏区要定期召集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并要其他苏区选派代表到中央苏区去”。<sup>5</sup>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政府主席人选时，逐渐确认两点：一需要有全国威信，二是现在苏区工作。最后会议倾向于毛泽东。10 月，中央电告苏区中央局：“人民委员会主席一人，决定毛泽东”。<sup>6</sup>11 月，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大致相当于列宁去世前在苏联担任的职务。

当然，共产国际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中国的列宁。六届四中全会上，共产国际不惜中共中央发生分裂，把王明等年轻留苏学生提拔到中共领导层，就是为了避免李立三对抗莫斯科的历史重演，要求中共对共产国际绝对服从。毛泽东是有极强独立见解的人，显然并不符合这种要求。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把革命重心迁到

<sup>1</sup> 《任弼时在延安整风会议上的发言提纲》（1943 年 11 月 4 日），转引自章学新：《任弼时提出“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86 页。

<sup>2</sup> 《苏区中央局十月真电》（1931 年 10 月 11 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792 页。

<sup>3</sup>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电（复中局 10 月真电）》（1931 年 10 月 30 日前），《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3），第 1813 页。

<sup>4</sup>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65 页。

<sup>5</sup> 《中央给红军党部及各级地方党部的训令》（1931 年 6 月 1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312 页。

<sup>6</sup> 《中央致苏区中央局第一号电》（1931 年 10 月），转引自章学新：《任弼时提出“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93 年第 1 期，第 88 页。

苏区，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要把苏联经验搬到中国来，在中国建立一个类似苏联的国家。既然建立了国家，当然一切都要正规化，但苏区实际情况与苏联相差极大，毛泽东等苏区干部感到苏联经验未必符合实际，在 11 月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同时，毛泽东的所谓“狭隘经验论”就成为批评对象。

军事和政治制度的正规化包含相当的合理性，但实际战争决断则更多是从经验中得来，需要对敌我实际情况的深入了解和敏锐洞察。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很难根据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合理的战略，而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缺乏军事经验，对共产国际盲目服从。战争胜败关乎苏区存亡，毛泽东自恃军事才能过人，顽强坚持自己的独立见解，与中央局其他成员的矛盾一步一步走向激化。

## （二）共产国际要求进攻城市，苏区中央局出现严重分歧

1931 年 11 月《米夫给斯大林的信》标志着共产国际的战略发生变化。米夫认为虽不应像立三路线那样进攻全国中心城市，但应进攻分隔苏区的地区中心城市。米夫说：“我们曾建议中国红军在开始时期不要占领大城市”，“中国红军击退了敌人的第一、第二和第三次进攻。因此，关于一些中心城市的问题已经有所不同了”。“我们不能就此停留，而应该从防御转入进攻，乘胜追击，以便巩固我们的胜利，这就要求占领一些中心城市”。“把分散的苏区联结起来，把分散作战的红军军团集结起来，以及成立中央苏维埃政府和广泛开展它的活动，也要求我们占领中心城市。”<sup>1</sup>米夫是共产国际中国事务主管，他的意见被共产国际接受，成为 1932 年指导红军和苏区的主要战略。

1931 年春季，中共中央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和总书记向忠发等先后被捕叛变，使中央机构和远东局遇到极大危险，几个月无法正常运作。远东局书记米夫、军事顾问盖利斯、中央领导人王明等重要人物先后撤到苏联，年底周恩来也去了苏区，只留下相对不重要的博古、张闻天等组成临时中央。他们冒着被捕牺牲的危险坚守岗位，维持中央运作，但他们也知道自己不是决策者，主要是在莫斯科和苏区之间起联络作用。

进攻地区中心城市的新战略传到上海后，临时中央 1932 年 1 月 9 日通过决议：“中央苏区不但恢复了第一次‘围剿’前的区域并占领了赣南会昌、寻乌、

<sup>1</sup> 米夫：《米夫给斯大林的信》（1931 年 11 月 2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78-79 页。

安远、信丰各县，并且正在围攻赣南的中心城市——赣州”，要求“必须依照中央最近的军事训令来努力求得将中央区、闽粤赣、赣东北、湘鄂赣、湘赣边各苏区联系成整个一片的苏区，并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sup>1</sup>

1932年初的赣州战役是莫斯科方针影响苏区的结果。赣州是隔离中央苏区主体与湘赣苏区的主要障碍，被选作首先需要攻占的地区中心城市，这引发了毛泽东与中央局其他成员的激烈争论。毛泽东何尝不想把苏区连成一片，实际上早在1929年3月他就提出：“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sup>2</sup>4月他又强调：“江西我们力量的现状，赣西、赣北、赣南、赣东，各个孤立，不相联属”，“红军有一个工作的总目标，使孤立的各地互相联属起来。”<sup>3</sup>1930年3月，毛泽东率红四军攻打赣州，但没有成功。他从实战经验中认识到，红军实力有限，没有重武器，进攻重兵防守的城市伤亡很大，即使攻下来也很难长期占领，更好的选择是避开交通便利的城市，先在偏远地区建立牢固的根据地。他在1931年底的中央局会议上提出“沿福建、广东、江西和湖南边界上的三山建立苏区的计划”，但遭到多数人反对。<sup>4</sup>

在1932年1月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力陈赣州地形不利进攻，敌军防守坚固，援军很近，不打为好，但被与会多数否决。“毛泽东同志是希望前线指挥作战的同志根据实际情况发言，帮忙做做工作，说服左倾机会主义放弃打赣州的错误意见。结果彭德怀同志帮了倒忙。他说二十天能打开赣州。这一说正符合了中央局任弼时、顾作霖、王稼祥等同志的意见。”<sup>5</sup>结果，红军围攻赣州一个多月，3月初遭到敌人强大援军反击，损失惨重。赣州战役危急时，项英亲自到东华山古庙，请正在休养的毛泽东立刻冒雨下山到前线参加决策。<sup>6</sup>赣州战役失利使毛泽东对外来干部的不满加深了，更加坚信自己的军事才能无可替代。

3月中旬，军事委员会又否决了毛泽东集中兵力的建议，把红军分成两路。

<sup>1</sup>《中共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1月9日），《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九册，第35、41页。

<sup>2</sup>毛泽东：《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1929年3月20日），《毛泽东军事文选》第一卷，第54页。

<sup>3</sup>毛泽东：《前委来信（摘要）》（1929年4月13日），《党的文献》2008年第2期，第15页。

<sup>4</sup>《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5月3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146页。

<sup>5</sup>萧克：《关于中央苏区的几个问题》，《回忆中央苏区》，第198-199页。

<sup>6</sup>《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67页。

虽然毛泽东率东路军 4 月攻占闽南重要城市漳州，缴获大量物资，但是因兵力不足又被迫退出，未能进一步扩大战果，毛泽东仍是不满意的。据龚楚回忆：进攻赣州失败后，军事委员会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反对分散兵力：“打赣江西岸，打福建，我都同意，但须集中兵力打一处，五军团亦须参加作战，若能集中三个军团的兵力，攻打一面，即攻无不克，若分散兵力，恐怕无一可达到目的”，但他的意见被否决。毛泽东认为分兵战略“大错特错”，在漳州战役后激愤地说：“攻福建没有成功，阻碍了革命力量的发展，他们这班书生”，“要负完全责任！”<sup>1</sup>

1

1932 年 5 月，毛泽东和中央局多数成员的矛盾激化了。毛泽东在赣州战役失败后尖锐抨击进攻赣州是“李立三路线的继续”，而 5 月 3 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朱德给上海的电报则激烈批评毛泽东的“政治路线乃是百分之百的右倾机会主义，它低估了目前的形势，完全背离了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中央局所有其他委员都反对这条路线”，“我们决定同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斗争，并在党的机关报上进行批评。”<sup>2</sup>从这封电报可以看出，在中央局中以毛泽东自己为一方，以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朱德、邓发为另一方，双方的分歧已经尖锐化了，多数人主张在苏区公开批评毛泽东。

但共产国际却要求团结毛泽东，上海临时中央把共产国际的指示转给了苏区中央局。<sup>3</sup>毛泽东从漳州前线回来后，中央局在 6 月初的会议上按照国际指示实现了和解。中央局在给上海的电报中称：“毛泽东同志表现出很好的态度，深刻承认了自己以前的错误，完全放弃了自己向东北扩张的意见。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们的讨论是在同志式的气氛中进行的，只限于中央局委员之间。这并不妨碍毛泽东的领导工作。目前我们正齐心协力地执行中央的指示，不会再有任何冲突。”<sup>4</sup>

毛泽东与中央局其他成员和解后，仍被委以在前线领导红军的重任。周恩来在 6 月 10 日给上海的电报中说：“毛泽东身体极弱，他仍留在高山地区工作，他

<sup>1</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446 页。

<sup>2</sup> 《周恩来、王稼祥、任弼时和朱德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5 月 3 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147-148 页。

<sup>3</sup> 《中共中央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电报》（1932 年 5 月 27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156 页。

<sup>4</sup>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 年 6 月 9 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164 页。

失眠，胃口也不好。但他和部队一起活动，在主持作战行动时精力充沛，富有才华。（中央）局决定派他去前线策划军事行动，他也希望去前线。”<sup>1</sup>

### （三）宁都会议争论激烈，毛泽东失去军事指挥权

1932年6月，苏区中央局决策集中红军主力向北进攻，与鄂豫皖、湘鄂西呼应，力争在赣江流域取得大突破。6月17日决议提出：“中央苏区红军的行动，必须达到最高度的积极化，必须与其他苏区红军更加有互相配合”，“全国主力红军的统一指挥系统必须建立起来，红军的主力必须集中”。“要努力做到解除红军主力‘分散’筹款‘分散’做地方工作的任务”，“使红军用全力于决战方面，到白色统治区域去开展胜利的进攻”，“依据中央新的军事训令，中央苏区红军，应迅速的求得赣江流域的连续胜利，以夺取赣州，吉安，樟树，南昌，九江等城市为目的，来配合目前尚隔断着的几个苏区，以开展江西的首先胜利”。<sup>2</sup>

6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重新集中，取消东路军、西路军番号，恢复红一方面军总部，这符合毛泽东的想法。7月初，红军在南雄、水口战役中击退了南部广东部队的进攻，稳定了南线战局，然后全军向北。7月21日，周恩来到达江西信丰红军总部，与毛泽东、朱德、王稼祥一起担任红军前线领导，任弼时在后方代理中央局书记。中央局成员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但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7月25日联名致电中央局，仍推毛泽东担任总政委：“我们认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革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sup>3</sup>

中央局派周恩来到前线本身就暗示了对毛泽东的不信任，他在前线经常自作主张，并不完全服从中央局的指示。按理周恩来作为中央局书记不应亲自出马，但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不懂军事，只有周恩来军事经验比较丰富。其实所谓中央局意见，很大程度就是共产国际通过上海转达的意见，周恩来在党和红军中威望很高，又是遵守纪律的典范，自然是控制前线红军、贯彻国际指示的最

<sup>1</sup> 《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1年6月10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166页。

<sup>2</sup> 《苏区中央局关于争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1932年6月17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249页。

<sup>3</sup> 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提议由毛泽东任总政委》（1932年7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178页。

佳人选。

中央局最初仍坚持周恩来任总政委，但周恩来回信认为，如果这样无法发挥毛泽东的才能，“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做”。“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玉阶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sup>1</sup>中央局接受了周恩来的意见，中革军委 8 月 8 日发布通令：“奉中央政府命令，特任毛泽东同志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sup>2</sup>

但是，周恩来到前线后，仍无法解决前方和后方的矛盾。周恩来比较谦虚谨慎，觉得自己到苏区不久，经验不足，对开创苏区的领导人比较尊重，坚持推毛泽东为总政委，但这也使国际指示难以贯彻。8 月 10 日左右，红一方面军秘密北上发动进攻，17 日攻占乐安，20 日攻占宜黄，23 日攻占南丰，红军连战获胜，消灭国民党西北军高树勋部第二十七师三个旅。但是新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毛炳文、李云杰、许克祥等部在南城附近集结了十七个团的重兵。红军总部根据情况变化放弃了进攻南城的计划，命令红军后撤至南丰、宜黄附近，分兵发动群众、筹款，等待时机，但这显然违反了 6 月 17 日中央局决议中红军主力集中作战，不再做地方工作的决定。

8 月底，周恩来致电中央局并转上海临时中央，报告了红军的行动。9 月 7 日中央局来电对红军后撤待机表示不满，指示红军进攻永丰。红军总部 8 日回电表示异议，认为“西袭永丰不仅疲劳未回复，且敌军将先防我西进，袭取永丰将成为不可能”。“方面军现在小布、安福、平田一带休息七天绝对需要，已令二十二军及十二军在宜乐、宜南之间广大发展游击运动与新苏区。”<sup>3</sup>

1932 年 8-9 月，湘鄂西苏区和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重兵围攻下苦战失利，陷入绝境，红军主力被迫突围，两大苏区相继陷落，中央局对一方面军长时间没有发动进攻策应湘鄂西和鄂豫皖非常不满。红军总部 9 月 23 日提出的计划仍然是等待时机，中央局 25 日坚决反对，认为“在目前全国苏区红军积极行动艰苦作战中，我们不同意你们分散兵力，先赤化南丰、乐安”，“这实际上将延缓作战时间一个月以上”，“可以演成严重错误”。<sup>4</sup>

<sup>1</sup>周恩来：《南雄水口战役的初步总结及组织问题》（1932 年 7 月 29 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9 页。

<sup>2</sup>朱德、彭德怀、王稼祥：《中革军委关于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毛泽东已到军工作的通令》（1932 年 8 月 8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196 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第 384-385 页。

<sup>4</sup> 《毛泽东年谱》（1893-1949 上卷），第 386 页。

周恩来在前方红军总部和后方中央局之间努力调和，逐渐感觉力不从心。9月24日，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局发了一封电报，提出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彻底解决军事指挥问题。周恩来一向性格温和，但这份电报措辞相当激烈，可见他对争论不休的困局已经忍无可忍：“前方组织既不是集权于个人负责制，各人能力又均有长有短，许多事件既不能决之于个人。而且时常变更其解释的原则，尤令人无所适从，有时争论则不胜其争论”。“我以为既主张在前方开会，则须开全体会，彻底解决一切原则上的问题而不容再有异议，否则前方工作无法进行得好，尤其是军事行动上，必须行专勿疑，大家都不放心，事情一定做不好，即使有错，也要在检阅时予以批评，遇事干涉，遇事不放心，即不错也会弄错！”“再则前方负责人太多，我意与其各执一见，不如抽出人来做前方与后方的群众工作，或到河西去都可，我想我还是到后方来，否则必须有另一办法解决”。“我亟望中央局全体会能在前方开成”，“根本解决这一困难问题。”<sup>1</sup>

红军总部25日致电中央局，坚持认为不能盲目进攻：“攻城打增援部队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从事，结果反会费时无功”。“我们认为打开目前困难局面，特别要认识敌人正在布置大规模的进攻中区，残酷的战争很快就要到来，必需勿失时机地采取赤化背面地区”，同时提议立即在前方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但中央局26日回电，仍坚持“攻城打增援部队”的指示，同时拒绝召开中央局全体会议：“项英、邓发已去闽西参加会议，你们亦须随军前进，中央局全体会议不可能开。”<sup>2</sup>

但是，红军总部没有执行中央局指示，反而发布了继续待机的训令。中央局收到训令后勃然大怒，29日致电前方：9月26日训令收到，“我们认为这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行动，立即在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sup>3</sup>任弼时等30日动身当天，电告上海临时中央：“毛泽东同志对扩大中央苏区、占领中心城市和争取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斗争表现动摇。他的扩大苏区到……东部山区的机会主义路线仍在继续，他常常试图加以实施，忽视党的领导，而提拔干部是从私人关系出发”。虽然周恩来“在那里，但他实际上很难贯彻局的意见”。“我们坚决而公开地批评毛同志的错误，并想把他召回到后方苏维

<sup>1</sup> 周恩来：《亟须解决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问题》（1932年9月24日），《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第186-187页。

<sup>2</sup>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86-387页。

<sup>3</sup>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388页。

埃政府中工作”。<sup>1</sup>

10月上旬，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召开，这次会议实际上成了对毛泽东的批评会，重点批评毛“等待观念”、“不尊重领导机关”等，批评的主力是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等。毛泽东并不服气，据理力争，周恩来努力调和分歧，但并不成功，最后通过了周恩来取代毛泽东担任总政委的决定。据《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会议中批评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之不正确观点”。“会议中批评了泽东同志过去向赣东发展路线与不尊重党领导机关与组织观念的错误，批评到前方同志对革命胜利估计不足，特别指示泽东同志等待观念的错误”，“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对前方战争领导，留在后方中央局同志对于过去前方领导不能统一，认为战争领导必须求得专一独断，迅速决定问题，提出由恩来同志负战争领导总责，泽东同志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因恩来同志坚持要毛同志在前方助理或由毛同志负主持战争责任，恩来同志亦在前方负监督行动总方针责任。在大多数同志认为毛同志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最后是通过了恩来同志第一种意见，但最后批准毛同志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sup>2</sup>

10月12日，中革军委发布通令，解除了毛泽东总政委职务：“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所遗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同志代理。”<sup>3</sup>宁都会议被撤销总政委职务，是毛泽东在红四军七大落选前委书记后又一次重大挫折，自此以后直到遵义会议，毛泽东在两年多的时间里被排挤出了党和红军的核心决策圈。

上海远东局和临时中央对毛泽东的态度很矛盾，此时埃韦特已经到上海担任新的远东局领导人，他在10月8日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说：“毛泽东迄今还是有声望的领袖，因此为实行正确路线而与他进行斗争必须谨慎行事”，“反对目前撤销毛泽东的职务”。<sup>4</sup>临时中央11月给中央局的电报一方面批评“泽东及其他纯粹防御路线的拥护者，没有充分看见国内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求

<sup>1</sup> 《中共苏区中央局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2年9月30日于瑞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210页。

<sup>2</sup> 《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1932年10月21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529-530页。

<sup>3</sup> 朱德、彭德怀、王稼祥：《中革军委关于红一方面军兼政委毛泽东暂回政府工作遗职由周恩来代理的通令》（1932年10月12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231页。

<sup>4</sup>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年10月8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217-218页。

对毛泽东“以说服的态度，设法争取他赞成积极斗争的路线”，并且明确说：“我们反对现在将他召回。如果他服从党的纪律，在目前采取这一步骤，将给红军与政府以极严重的影响”，“争取领导的一致，这是斗争成功的前提。”<sup>1</sup>

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领导人经验更为丰富，考虑问题更全面，他们保护毛泽东的态度更坚决，甚至对他的战略思想也抱有几分同情。共产国际 1933 年 3 月给中共的电报说：“在保卫苏区时，对于中央苏区来说特别重要的是要保持红军的机动性，不要以巨大损失的代价把红军束缚在领土上。应该事先制定好可以退却的路线，做好准备，在人烟罕至的地方建立有粮食保证的基地，红军可以在那里隐蔽和等待更好的时机。应避免与敌大量兵力发生不利遭遇，要采取诱敌深入、各个击破、涣散敌人军心和使敌人疲惫的战术，还要最大限度地运用游击斗争方法”。“对于毛泽东，必须采取最大限度的克制态度和施加同志式的影响，为他提供充分的机会在中央或中央局领导下担任负责工作。”<sup>2</sup>

### 三、博古推动反罗明路线，李德执掌苏区军事大权

#### （一）博古等到达苏区，反罗明路线打击地方干部

毛泽东与任弼时、项英等发生矛盾不是偶然的，这在当时各苏区普遍存在。中共把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后，大批中央干部进入苏区，这些外来干部对于苏区情况并不熟悉，往往对困难估计不足，急于求成，与苏区本地干部发生矛盾。为了维护集中的组织结构，中央发动了党内斗争。本来毛泽东是所谓“狭隘经验主义”的最大代表，但他是政府主席，国内外影响很大，也很受共产国际重视，而且毛泽东基本遵守党纪，虽在高层会议上固执己见，但并未公开违反组织决议。所以他在高层受到内部批评，被解除了军事指挥权，但没有受到公开批判。福建临时省委书记罗明、江西干部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选作了“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受到公开批判，一场严厉的党内斗争席卷了中央苏区。

1933 年 1 月，临时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博古、张闻天等进入苏区与中央

<sup>1</sup> 《中央关于军事路线给苏区中央局的指示》（1932 年 11 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 542-544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3 年 3 月 19-22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353-354 页。

局会合，自此中共中央完全迁入苏区。中央局 2 月 15 日对福建省委提出严厉批评，撤销了罗明的领导职务，揭开了反罗明路线斗争的大幕：“中央局检阅了福建省委工作之后，认为省委是处在一种非常严重的状态中，在省委内一小部份同志中，显然形成了以罗明同志为首的机会主义路线。这一路线对于目前革命形势的估计是悲观失望的，对于敌人的大举进攻表示了张惶失措，认为在杭永岩苏区内群众的革命斗争已经低落”。中央局决定“在党内立刻开展反对以罗明同志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sup>1</sup>

博古当时只有 26 岁，由于得到共产国际特别是米夫和王明的信任，成为中央负责人。他刚进入苏区就大力鼓吹进攻路线，批判罗明、杨文仲为代表的所谓“退却路线”。他 2 月 16 日在给红军学校的报告中说：面对敌人的大规模的第四次围剿，“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sup>2</sup>

博古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警告中间派不要动摇，不要站错立场：“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去的退却逃跑的路线”。“对于这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澈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的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外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sup>3</sup>

罗明的主要罪名，就是说边区敌强我弱，群众生活得不到保障，情绪低落，很难扩大红军。罗明提到：“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请我们

<sup>1</sup> 《苏区中央局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1933 年 2 月 15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94-95 页。

<sup>2</sup>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1933 年 2 月 16 日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463 页。

<sup>3</sup> 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1933 年 2 月 16 日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467-468 页。

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列宁同志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澈底转变群众的情绪。”<sup>1</sup>结果罗明被撤销一切职务，成了取消主义退却逃跑路线的代表，福建与罗明观点接近的军区司令员谭震林、苏维埃主席张鼎丞、省委常委郭滴人、组织部长刘晓等都被撤职。<sup>2</sup>

通常认为，批判“罗明路线”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毛泽东，但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并不准确。张闻天当时也在中央局刊物《斗争》上发表了《什么是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罗明路线在江西》，不过他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期的《反省笔记》中说：“当时我反对罗明路线时，主观上并未想到这是为了要反对毛泽东同志。当时我觉得毛泽东同志已经不在位，再去反已经没有什么意义。这从我写的文章中也可看出”，以追查“江西小组织系统”为名，“直接针对毛泽东同志的”，是李维汉。<sup>3</sup>毛泽东读完《反省笔记》后，专门到张闻天住的窑洞对他说：“我一口气把它读完了，写得很好！”<sup>4</sup>这说明毛泽东对张闻天的说法也大致认可。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毛泽东以非凡的勇和毅力亲手开创了中央苏区，取消主义的罪名确实很难加到他的头上。

1933年初，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周恩来、朱德、彭德怀、林彪等指挥红一方面军于2月27日、3月16日两次采用大兵团伏击战法，歼灭黄埔系主力部队11师、52师及59师、9师一部，取得中央红军历史上空前的大捷。赣州战役危急时项英等不得不请毛泽东下山助战，这次胜利似乎证明：没有毛泽东，红军照样可以打胜仗，甚至可以打更大的胜仗，因而使得毛泽东东山再起的机会更加渺茫了。同时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博古等进攻路线的鼓吹者，他们掀起更大规模的反退却路线的斗争，开始打击一切不同意见，建立权力更加集中的体制。

当反对罗明路线扩展到江西的时候，影射毛泽东的意思日益明显，他的弟弟毛泽覃也被公开点名批评。在4月江西三个月工作总结会议上，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被选作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对他们的批判也更加上纲上线，提升

<sup>1</sup>博古：《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1933年2月16日在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生的党团员大会上政治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464-465页。

<sup>2</sup>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1982年第2辑，第257页。

<sup>3</sup>张闻天：《反省笔记》，转引自《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sup>4</sup>刘英：《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8页。

到了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高度。李维汉在 5 月 6 日《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中，称会议“揭发了在江西的罗明路线（即‘单纯防御路线’），并一致给了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以严重的打击，他们是罗明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同时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sup>1</sup>

李维汉文中透露出，苏区干部对外来干部非常不满，称他们是只会“找岔子”的“洋房子先生”，这很符合毛泽东的一贯态度。李维汉称：“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等在四中全会后，不仅没有承认自己执行立三主义的错误，而且造成一种胡说：‘大城市上产生了立三路线，我们苏区的山上，却全是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党大会前后，提出了机会主义的口号，进行反对中央局的活动。拿‘洋房子先生’的口号反对中央局的领导，拿‘找岔子’的口号，反对中央局和省委对工作的批评。抵抗和破坏指导机关的指示，‘合我的口味就执行，不合就不执行’”。“他们的通讯、谈话和讨论，完全向党秘密起来”，“明显的是一种小组织形式的结合”。<sup>2</sup>这个受到批评的所谓“小组织”，显然就是指所谓“毛派”，他们的罪名主要不是取消主义，而是结成小组织反对上海来的中央领导。

在反罗明路线的同时，中央宣传部又发动了反叛徒斗争，用意很明显，就是警告那些“悲观失望”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果不改正错误，就可能成为叛徒。1933 年 3 月《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宣称：“在这一个生死的战斗中，混入我们队伍中的小资产阶级分子，革命的半途伴侣，不可救药的机会主义者，以及一切投机的败类，不是自觉的自动变节，便是在国民党严刑拷打或威迫利诱之下投降”。“中国革命的波涛，一泻千里，一批一批地把那些残渣败滓都淘汰下去。陈独秀、彭述之等的落伍，谭平山、施存统之流的‘别树旗帜’，组织第三党，罗章龙、何孟雄等的取消革命，徐锡根、胡均鹤、余飞之投奔南京，恨与刽子手蒋介石‘相见之晚’，以至孙际明等的‘唯三民主义足以救中国’，皆莫不是‘时代的必然产物’”。<sup>3</sup>

在残酷的路线斗争中，苏区笼罩在紧张气氛中，任何可疑点都是危险的，如

<sup>1</sup> 李维汉：《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1933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491 页。

<sup>2</sup> 李维汉：《为党的路线而斗争——要肃清在江西的罗明路线，粉碎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1933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497-498 页。

<sup>3</sup> 《中央宣传部关于反对叛徒斗争的提纲》（1933 年 3 月 1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120 页。

果和白区通信就可能受到怀疑。据龚楚回忆，周恩来以严肃的口吻说：“你以前在广西工作时，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走进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道路。现在又对农民政策没有彻底的认识，保持狭隘的农民保守观念，动摇了同志们的意志”，“党中央已决定开除你的党籍一年，并给你一个学习机会，希望你能彻底转变”。后来中央还在红军总部召开规模很大的思想斗争会，斗争龚楚和同样被撤职的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朱德特别关切地提醒龚楚：“不要写信回家，因为政治部已截留了由白区家里寄来的信，应在苏区另外找一个思想前进的女同志作老婆，以免给人以攻击的口实。”<sup>1</sup>应该说，党组织对孔荷宠和龚楚的判断是准确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叛徒。

“右倾机会主义者”不仅被批判撤职，有的还受到劳动改造的处罚。红军长征后，在三年游击战争初期发挥关键作用的曾纪才对陈毅说：“他们斗争我，说我是机会主义，劳动改造了两年。如今队伍打散了”，“想去找队伍，又怕他们说我是机会主义，不要我。还怕他们夜里把我杀掉。”<sup>2</sup>曾纪才后来被捕，不屈而死，最终证明自己是坚定的革命者，但是在真正的考验来临之前，谁会叛变，谁不会叛变，事先很难预料。这就是中共长期不得不面对的两难抉择，在力量悬殊的残酷斗争中，严厉的党内斗争可以强化组织，但同时也会造成误伤。

## （二）李德进入苏区，执掌军事大权

通过严厉的党内斗争，中共建立起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推动了红军的正规化，如果由杰出的领导人来指挥，应该能够发挥很大效能。毛泽东在 1934 年 1 月《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中也认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建立，统一了全国红军的领导，使各个苏区各个战线的红军部队，开始在统一的战略意志之下，互相呼应与互相配合地行动起来。这是由散慢的游击队的行动进到正规的与大规模的红军部队的行动的重要关键。”<sup>3</sup>

但实际情况是，苏区在建立起空前强大的集中体制的同时，领导权却落在了一个缺少经验的青年和一个不懂中文的外国人手里，这样的结果显然是灾难性的。在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中，一方面有利于杰出领导人发挥才能，不受干扰地迅速

<sup>1</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501 页。

<sup>2</sup> 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第 508 页。

<sup>3</sup> 毛泽东：《武装民众与建设红军》（1934 年 1 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563 页。

决策；另一方面，如果领导人不合格，则很难自下而上地纠正错误，这种权力结构的最大弱点不幸成了当时中央苏区的现实。

从组织原则上讲，博古上面还有上海远东局和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但由于距离遥远，二者实际上很难发挥领导功能。苏区的军事行动在 1932 年受到的外来干涉不多，虽然要接受共产国际确立的大方针，但具体行动主要由苏区中央局几领导人讨论决定。原来的军事顾问盖利斯 1931 年离开后，远东局在上海没有军事顾问。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不懂军事，对干预军事行动比较慎重，他在 1932 年 10 月给莫斯科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试图由此来干预军事行动的领导，甚至把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是完全错误的。这样做缺乏一切前提条件，而且由此进行干预也是完全不可能的。”<sup>1</sup>

1933 年春天，新的军事顾问弗雷德到了上海，开始积极指挥苏区作战。他当过中级军官，有一定军事经验，但是他是外国人，又不在军中，很难知己知彼，提出的计划往往脱离实际。弗雷德在夏天提出两个拳头打人的战略，把主力红军分为东、西两路军，以东路军进攻福建十九路军。博古不懂军事，对上海的指示完全服从，领导东路军的周恩来、朱德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不同意见。6 月 21 日博古等却回电丝毫不许变通：“看了你对沪指示提出的提议，我们仍持原电的意见”。“沪指示编组东方军团及其作战纲领，主要的是改进从前一手打人的单一作战线，而成为更有利的配合各方的两根作战线”。“你对于目前的利益和虑及如沪所预见的地形，甚至行军的困难，只令东方军团在泰邵作战，而束缚其主力向东南面进展，结果将不能达到沪所说的前途。”<sup>2</sup>

博古等 6 月 22 日再次致电周恩来，否定前线领导人的变通计划：“新计划长电已接到，这计划我们认为不适合的”，“粤敌目前尚不是我们改变上海总计划的理由，而且更急迫要我们执行上海计划之第一步，以威胁十九路军右侧翼”，“上海电最主要的为建立两作战线，以准备八九月之总进攻”。<sup>3</sup>严守纪律的周恩来 6 月 23 日复电服从命令，不过表现出明显不满情绪：“廿二日两电悉。绝对服从你们命令，并立即执行。我要求在部队调动中回瑞一行，面陈不同意见或改在博生

<sup>1</sup> 《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1932 年 10 月 8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218 页。

<sup>2</sup> 《秦邦宪、项英、王稼祥、刘伯承对上海军事指示之说明》（1933 年 6 月 21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245 页。

<sup>3</sup> 《苏区中央局对新作战计划之意见致周恩来电》（1933 年 6 月 2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248 页。

开军委会或中局会。因许多问题非电文所能详，许多批评完全不是我们原意也。”<sup>1</sup>

<sup>1</sup>朱德、周恩来 7 月 11 日给军委的电报又要求“请勿急，尤请勿直接命令彭滕，使他们无所适从，时时请命，反束缚不能机断专行。”<sup>2</sup>

博古不懂军事，只能机械服从上海远东局的指示，甚至直接转发上海指示给红军领导人。9 月底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围剿，东方军不得不回师江西，《苏区中央局转发上海关于近期内作战方针的来电》称：“沪电如下”，“我们特别关心的是黎川周围的战争”，“东方军在迅速的完成集中以后，应沿着福建的边界向前推进，以便在黎川以北与敌人作战。”<sup>3</sup>

博古等为了贯彻弗雷德在上海制定的作战计划，在 1933 年秋“向各地区各部队派遣大批‘钦差大臣’，去进行所谓‘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对提意见不听话的干部“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大批地进行惩罚和撤换，随意提拔同他们气味相投、只知随声附和的人”。<sup>4</sup>当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滕代远仍然提出不同意见时，10 月 27 日军委电告朱德、周恩来：“军委已决定了战役问题，望转告彭、滕，停止建议。”不久，滕代远被调出红三军团，彭德怀的中革军委副主席的职务也在 1934 年 1 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免去。<sup>5</sup>

1933 年 10 月，弗雷德的助手李德进入苏区，成为唯一在苏区的共产国际代表。李德是德国人，1900 年生于慕尼黑，1932 年春天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被苏联红军参谋部四局派往中国，秋天到上海参加远东局工作。<sup>6</sup>从李德的履历来看，他并没有多少实战经验，只在一次大战后的德国革命中参加过短期街垒战，所以他只能做军事顾问弗雷德的助手。李德的工作态度积极负责，在 1933 年 3 月的工作报告中，严厉批评王明过分夸大苏区和红军的实力，认真核实出红军总数只有 8 万，装备很差，与国民党对比悬殊。<sup>7</sup>10 月，李德冒着生命危险穿越封锁线，期间在小船舱里平躺了两天两夜，终于到达苏区。<sup>8</sup>这是几次宣称要回国参加五中全会的王明没做到的，也是以前的军事顾问盖利斯和他的上级弗雷德

<sup>1</sup> 《周恩来复中央局电》(1933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249 页。

<sup>2</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211 页。

<sup>3</sup> 《苏区中央局转发上海关于近期内作战方针的来电》(1933 年 10 月初)，《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第 355-357 页。

<sup>4</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221-222 页。

<sup>5</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 228 页。

<sup>6</sup> 王新生：《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近代史研究》2009 年 1 期，第 146 页。

<sup>7</sup> 《布劳恩关于中央苏区军事形势的书面报告》(1933 年 3 月 5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330-336 页。

<sup>8</sup>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第 40-42 页。

没能做到的。

李德身在苏区和红军当中，比上海和莫斯科都更了解情况，这使他敢于对抗自己的上级弗雷德，成了博古的主心骨。李德刚到苏区，博古就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弗雷德的军事计划，在 10 月 20 日给上海远东局的电报中说：“收到你们 14 日电报后，军事委员会在 18 日进行了讨论”，“由于计划建立在放弃内线作战和绕过敌人翼侧向前推进的基础之上，军事委员会不能同意这个计划”，“这种战术是极其危险的”，“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全力保卫我们的主要地区”。李德“只是解释了你们的电报，但没有积极坚持执行这个电报。<sup>1</sup>这是委婉的说法，李德后来在回忆中明确说自己“反对这个计划”。<sup>2</sup>

上海和莫斯科的领导人明白自己远离战场，很可能脱离实际，只好给李德和博古留出更大权力空间。远东局接到博古的拒绝电报后，不但没有坚持，反而在 30 日电报中说：“我们的建议不意味着干涉革命军事委员会共同一致的决定”，“你们在当地，应该根据你们的判断行事”。<sup>3</sup>对于上海和瑞金的分歧，莫斯科在 1934 年 1 月电报中从原则上支持了瑞金：“关于我们提出的作战问题的建议，或者我们从上海提出的这种建议，你们只应看作是建议。无论从这里还是从上海都不能像你们那样清楚地了解战场上的形势。因此与战场上的形势有关的所有问题，都应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你们的部队应该避开蒋介石的进攻部队，在迅速重新部署后，从北面和南面同时打击进攻 19 路军的蒋介石部队的翼侧和后方，最好是在它们之间发生冲突的时候。重复一遍，这只是建议，你们可以改变或根本不采用。”<sup>4</sup>

李德和博古得到莫斯科的支持后，更不把上海的弗雷德放在眼里。远东局领导人埃韦特 2 月向莫斯科报告了双方的冲突：“最近频繁出现这样的情况：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实行弗雷德提出的建议时，往往做一些改动（有时是大的改动，有时是小的改动，但同样都具有重要意义）”。“弗雷德对此作出的反应越来越多”，“越来越主张批评瓦格纳（即李德），进而宣布取消他的代表资格，原因是瓦格

<sup>1</sup> 《秦邦宪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的电报》（1933 年 10 月 2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555-556 页。

<sup>2</sup>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第 85 页。

<sup>3</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给中央苏区的电报》（1933 年 10 月 30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578 页。

<sup>4</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电报》（1934 年 1 月 2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第 7-8 页。

纳不执行他的指示”。“存在这样的危险性：弗雷德和瓦格纳之间的意见分歧可能演变成同中央和其他组织关于各种错误或关于未利用局势和对局势利用的不够的更严重的意见分歧。”<sup>1</sup>由于弗雷德和埃韦特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埃韦特有时甚至拒绝发出弗雷德给苏区的电报，弗雷德就这样逐渐失去了影响力，李德在博古的支持下几乎是独掌军事大权。

然而，李德和博古虽然比上海和莫斯科的人更了解情况，但三十出头的李德刚从军校毕业，只是见习军官的水平，他自己后来也承认：“我没有经验，对在中国受委托的工作没有做好准备”。<sup>2</sup>他完全不懂中文，对红军和国民党军队都不可能深入了解，完全做不到知己知彼。二十几岁的博古则连基本的军事常识都没有，但他们却看不起红军领导人。毛泽民 1939 年在莫斯科说：“朱德和毛泽东同志没有博古和李德同志那样深厚的政治知识，没有进过李德上过的那样军校，没有读过博古和李德读过的那些德文版和俄文版的马列著作”，“在很有学问的博古和李德同志的眼里，朱德和毛泽东好像是‘农村傻瓜’”。<sup>3</sup>

本来李德只有建议权，并没有决定权，但博古把李德奉若神明，把他的所有建议都当成决定，从不提出异议。就这样，李德执掌了苏区军事大权，而当时苏区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就是战争。李德自己也说：“实际上我掌握了红军行动的决定权。这大大超出了我的工作范围，在客观上篡夺了红军在一年期间的指挥权。表面上看，我没有摆出大人物的样子。我不只一次强调说，我作为顾问没有任何权力”，“而实际上我对每个涉及红军的问题都提出了建议，并且直到红军进入贵州省之前，我的所有建议均被采纳”。<sup>4</sup>

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了步步为营的碉堡战术，红军很难得到机会打自己擅长的伏击战，博古、李德专权又无能，更加重了前线将士的困难。当时博古、李德“不给前线指挥员临机应变之权，特别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每次战斗都要由坐在瑞金的李德按一份很不精确的作战地图进行部署，甚至有时连一门炮、一挺机枪应配置在什么位置上，都要由李德在电话里按地图标定。正

<sup>1</sup> 《埃韦特给皮亚特斯基的信》（1934 年 2 月 13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4），81-82 页。

<sup>2</sup>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 年 9 月 22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 351 页。

<sup>3</sup> 《毛泽民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 年 8 月 26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 326 页。

<sup>4</sup> 《布劳恩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书面报告》（1939 年 9 月 22 日于莫斯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5），第 344 页。

因为他不了解情况，经常朝令夕改，来回折腾，搞得前线指挥员手足无措，往往延误战机。周恩来总政委对此十分气愤，不得不给博古、项英发电，请求在相当范围内给予部署命令之全权。”<sup>1</sup>

林彪也对军委指挥的呆板和琐碎非常不满，1934年4月3日写了一封很长的意见信。他认为“决心迟缓这是军委最大的缺点”，“以致失了不少的可以取得胜利的机会”。“军委对各部任务的规定及执行的手段过于琐细，使下级无机动余地。军委凭极不可靠的地图去规定部队位置”，“很多地方错的一塌糊涂，特别是偏僻的地域或大山中更错的厉害，因为那些画图的家伙是很马虎的，他遇着那种地方大概仅仅调查一下，并未实地测绘”。军委“一直干涉到很多小的战术部署，则是无论如何不适用的”。<sup>2</sup>

但是，李德傲慢自大，看不起中国人，拒绝接受意见。后来遵义会议决议严厉批评李德“领导方式是极端的恶劣。军委的一切工作为华夫同志（即李德）个人所包办，把军委的集体领导完全取消，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发展，自我批评丝毫没有，对于军事上以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下层指挥员的机断专行与创造性是被抹杀了。”<sup>3</sup>李德年轻气盛，修养不足，对红军干部的态度都非常粗暴，经常发脾气骂人，他的翻译伍修权都感到难以忍受，多次要求调动工作。<sup>4</sup>

博古在六届四中全会连中央委员都没选上，在主要领导人离开上海的情况下进入领导层，李德只是军校新毕业生，他们执掌中共领导权的合法性显然大有疑问。中共中央从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在白区遭到连续破坏，损失惨重。16个政治局委员中，罗登贤、温裕成牺牲，徐锡根、卢福坦、顾顺章、王克全叛变，向忠发叛变后被杀，陈郁犯了严重错误，仍然担任中央领导职务的只剩下8人：正式委员5人（周恩来、项英、张国焘、任弼时、王明）、候补委员3人（关向应、毛泽东、刘少奇）。王明在莫斯科，张国焘在四方面军，任弼时在六军团，关向应在二军团，在中央苏区的只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刘少奇4人，中央领导机构显然需要补充。

<sup>1</sup> 李志民：《李志民回忆录》，第236页。

<sup>2</sup> 《林彪关于作战指挥和战略战术问题给中革军委的信》（1934年4月3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军事系统》（13），第3268-3270。

<sup>3</sup>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遵义会议）》（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69-470页。

<sup>4</sup>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109页。

六届五中全会 1934 年 1 月在瑞金召开，确认了博古等人的领导权。这是中共在自己政权范围内召开的第一次中央全会，标志着中共成了拥有军队和政权的党。在政治局改组中，在位的 8 个政治局委员都留任，留苏学生在中央的支配地位得到认可。四中全会上，只有王明一人从非中央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委员。五中全会上，博古、张闻天、王稼祥、凯丰、李竹生、顾作霖、康生多达七人从非中央委员跃升为政治局委员，他们当中五人是留苏学生，顾作霖和康生虽不是留苏学生，但政治倾向与他们接近，这使得留苏派在政治局中取得优势。红军领袖的地位也有所上升，毛泽东从候补委员晋升正式委员，朱德直接成为政治局委员，彭德怀当选中央候补委员。原政治局中的工人干部损失很大，虽补充了陈云、邓发，但工人干部占优的局面不复存在。新的政治局成员包括：正式委员 13 人（王明、博古、张闻天、周恩来、项英、张国焘、任弼时、毛泽东、朱德、陈云、邓发、康生、顾作霖），候补委员 4 人（刘少奇、王稼祥、凯丰、李竹生）。<sup>1</sup>名单是由共产国际确认的，博古等人执掌苏区大权获得了合法性。

毛泽东“因病”没有参加六届五中全会，却参加了几天之后召开的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并且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作了长篇报告。虽然二苏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仍选毛泽东为主席，但又选了一个原来没有的中央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张闻天为主席，实际上分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毛泽东作为政府主席被进一步架空了。

到 1934 年夏天，战局越来越被动，苏区被一点点压缩，陷入不利的阵地战，博古和李德难以应对这样的局面。毛泽东认为自己的军事经验能发挥作用，在会议上也更活跃了一些，但是博古、李德的主导地位并未改变。1934 年 6 月上旬，政治局召开了一次扩大会议，讨论军事问题，各军团高级干部从前线回来参加。“当讨论第一个战略问题时，毛泽东曾热烈发言，他说：这个战略提案比较正确，但仍嫌不够彻底，他认为根本可以不设防，要设防亦仅能派地方部队守备。红军主力应集结于北面之闽赣边区之宁化、石城间，待敌深入。然后选择有利目标及有利战场，以三倍至五倍以上之兵力向敌突袭”。但李德等“坚持要以红军主力之一部担任防守北面防御阵线，而将提案通过。”<sup>2</sup>甚至 10 月长征开始以后，朱

<sup>1</sup>王健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组中央考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 年第 10 期，第 117-118 页。

<sup>2</sup> 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第 541 页。

德给项英电报中还有“训令因李德同志病，尚未写”的话，<sup>1</sup>可见不经李德之手，红军总司令朱德是无法发布军事训令的。

博古、李德的经验和能力都不足，他们执掌苏区最高权力一年多，让毛泽东、周恩来等才智出众的领导人服从指挥，完全是靠共产国际对他们的信任，甚至是米夫和王明对博古的个人信任。在 1934 年，这四个实际执掌中共大权的人都相当时年轻：米夫 33 岁、王明 30 岁、李德 34 岁、博古 27 岁，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高层虽然几次要求保护毛泽东，但终究不能真正信任他，这几个年轻人即使经验和能力有限，但他们是懂俄语的、能够深入交流的、值得信任的，而毛泽东、李立三、罗章龙等是有独立性的、难以信任的。共产国际是中央集权的严密组织体系，但是它有一个弱点：由于不同国家语言和文化的差别，这个国际组织内部难以建立相互信任，这给作为共产国际支部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 四、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和苏区的紧张状态

1933 年 9 月，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战局逐渐恶化，中央苏区被压缩得越来越小，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才能抵抗重兵围攻的巨大压力，整个苏区进入高度紧张的状态。人力的动员很快达到极限，中共在总人口只有几百万的苏区，提出了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1934 年 1 月，六届五中全会决议提出“动员一切力量一切资源，发扬党和群众的积极性到最高限度，来扩大和巩固红军，将一切其他的任务围绕在这个任务的周围。一切党的工作应该在‘一切为着国内战争前线上的胜利’的列宁的口号之下进行。尖锐的革命形势要求我们在尽可能的短时期内实现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sup>2</sup>

在极度紧张的状态中，苏区的政治气氛也越发严厉，在扩大红军中成绩不佳的干部都受到处罚。1934 年 1 月，《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称：“扩大红军的动员是同开展残酷的阶级斗争不能分离的（许多地方对于破坏扩大红军的分子，采取了自由主义的态度），因此在我们的动员中表现了各地方工作

<sup>1</sup> 《朱德关于赣南军区地方部队配合野战军突围战役致项主席电》（1934 年 10 月 20 日），《江西党史资料》（2），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1987 年，第 13 页。

<sup>2</sup> 《目前的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1934 年 1 月 1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 39 页。

不平衡的严重现象”。“给军委过去宁化突击队长杨岳彬同志以最后严重警告，全总执行局突击队长黄子刚同志以严重警告，中央政府过去会昌突击队长古柏同志交中央党务委员会讨论他的党籍问题，福建省委书记谭秋同志撤消工作。”<sup>1</sup>

2月9日，张闻天签署人民委员会第五号命令，“给予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分局在下列条件下有直接拘捕处决反革命之特权”，也就是不经司法机关审判即可处决。命令规定：边区保卫局、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军侦探、地主叛变分子、刀匪首领、地主富农出身的刀匪，可以“不经过法庭，采取直接处置”，而且其他政府机关、军政首长都无权干涉，有争议只能上报人民委员会。<sup>2</sup>

由于战事始终被动，红军中悲观动摇情绪开始出现，以往少见的叛逃现象越来越多。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日记中从1934年初频繁出现战士甚至干部叛逃的记录，比如1月10日，“召集警备连连长、指导员作了一次深刻又严肃的谈话，为的是消灭逃亡问题。该连近二、三日来一连逃跑了五个战士”；2月21日，“友军逃跑干部数名，敌已知我企图”；2月23日，“卅九团昨（廿二日）晚逃走一人，系五十九师俘虏，并带枪弹”；3月5日，“卅七团逃走（带枪）一连指导员”；3月7日，“卅七团又发现拖枪逃跑三人”；3月8日，“卅七团不到半月连续拖枪投敌者十一名，情形极为严重”。<sup>3</sup>

《红星报》1934年2月报道：“最近仍然发现个别部队有极少数份子拖枪投敌的现象。特别是第七团发生了一个班长、一个连长投敌的事实，主要的原因是由该团负责人官僚主义的领导与阶级警觉性的缺乏，政治委员更要负主要的责任。因此，军委已将该团政委庄纪凤同志撤职，并调至军团政治部讨论他的错误和责任问题，团长刘家钰同志亦撤换工作。某师亦发生了一个侦查长投敌，甚至某师还发生一个指导员投敌的可耻现象”。“以镇压反革命的严厉手段来对付这些卑污可耻的叛徒，拿出过去七军和独立四师的红色战士对付李明瑞、龙普林的手段来对付这些叛徒是绝对必要的。”<sup>4</sup>

红军十人团成为政治保卫局的重要基层组织，对巩固部队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十人团的任务是“克服和预防逃跑现象的发生”。“十人团的团员必须是政治

<sup>1</sup> 《中央关于扩大红军突击月总结的决定》（1934年1月5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4、6页。

<sup>2</sup>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第五号》（1934年2月9日），《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政权系统》（8），第1419页。

<sup>3</sup> 《陈伯钧日记·文选》上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年版，第72-87页。

<sup>4</sup> 《完全消灭个别投敌现象》，《红星报》（1934年2月25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687页。

坚定、作战勇敢、工作努力热心，并在红军战士中是有信仰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及完全具备上述条件的红军战士，但十人团团长必须是共产党员”。“十人团以连（伙食单位同）为单位组织之，吸引群众自愿报名加入，经过全连军人大会通过，和连指导员审查，获得团政治委员批准成立之。”十人团的具体任务是：“察觉人员中的可疑行动，应立即报告首长和政治部并注意监视”；“在驻军时辅助军政首长查街、巡夜和禁止任何人自由外出和外宿”；“在行军时防止故意落伍或装病掉队的分子”；“在战时对胆小、畏怯、喜发谣风的分子应经常注意，随伴他们，鼓起他们的胆量和勇气，防止他们的恐慌和骚乱；对于自由离开火线逃往后方的分子，应鼓动并督责他们携着武器到前线去，同时要防止怕死的分子，借着装病、自残（自己打伤自己）、假装送伤兵、送信、采买等虚伪办法，离开火线躲在后方。”“十人团有权逮捕逃跑的分子，并得解除个别的或集体的逃跑者的武装，但只能逮捕送交上级军政首长转相当机关处分”。<sup>1</sup>

第二补充师的十人团在护送新战士到前线的路上发挥了很大作用。出发前，每个十人团员和政治战士都接受了具体任务。行军时，他们合理分工，分布在队列不同位置，带领战士讲笑话、唱山歌，提高大家的情绪。“十人团的同志，每个都具有很高的阶级警觉性和责任心。如九连有个战士在中途回答群众欢迎的口号，有意无意的喊‘消灭共产党’，该连的十人团员立即揭发，并派人监视考察其行动；第六连的十人团员能关心二连两个迷途的战士，把他送回二连驻地；第二连的十人团员看见一个地方连长与他同乡战士在房子里鬼头鬼脑的谈话，能立即向指导员报告”。“八团一千三百多新战士，一百五六十个运输员，自兴国出发到了前线，竟没有逃亡，没有一个病员和掉队的”。<sup>2</sup>

模范连十人团的警觉性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抱怨吃的不好可能被逮捕，甚至上厕所跑的远一点都受到怀疑。一个战士说红军苦，没盐吃，立即被报告。一个故意丢炸弹丢枪的，“查出是混入红军的地主，报告上级逮捕枪决了”。一个人企图投敌，被十人团发觉；“一个当过大刀会开过小差，工作一贯消极的坏蛋，也被十人团发觉，把他逮捕送上级”；一个卫生员说红军没油盐吃，上高山没钱用，白军好有钱用，十人团发觉逮捕送裁判所；“有一个跑很远的地方去解手，实际

<sup>1</sup> 《红一方面军关于反逃跑十人团的组织与工作纲要》（1933年7月1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415-416页。

<sup>2</sup> 《第二补充师护送工作的进步》，《红星报》（1934年6月20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795页。

上没有解手，十人团当时发觉了以后，便与之谈话”。<sup>1</sup>

为了在危急形势下巩固苏区，政治保卫被提到了新的高度。随着国民党军步步进逼，在苏区革命中遭到打击的地主富农残余势力活跃起来，准备响应敌军。党组织号召“对于这些反革命的活动必须采取最无情的镇压。加强肃反机关的工作，扩大保卫队的武装力量，严密赤色戒严，来肃清新区边区土匪、民团、大刀会、童子兵以及敌探与反革命组织的活动”。“必须最大的提高革命的警觉性，揭发隐藏在苏维埃机关内进行暗中破坏活动的阶级异己分子与害虫，给他们以严厉的革命的制裁。”<sup>2</sup>

随着肃反气氛越来越紧张，很多“反革命分子”被查了出来，由于边区形势严峻，查出反革命分子可以不经裁判部审判，直接处置。**1934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规定：“边区的地方保卫局，在战线上的红军保卫局，对于敌人的侦探、法西斯蒂分子、刀匪、团匪及反革命的豪绅地主，有权采取直接处置，不必经过裁判部。在严重的紧急的反革命案件上，国家政治保卫局及其地方分局、红军分局、军区分局，有权采取紧急处置”。**<sup>3</sup>

红军总政治部**1934年6月**发出关于检举的训令，认为随着敌人向核心苏区逼近，战争愈加紧张残酷，必须把隐藏在部队中的阶级异己分子与不可靠的分子检举出去。“对于那些隐瞒成分，假冒工人、农民混入部队，或者过去虽然表现过积极努力，而现在却表现出政治动摇的地主、富农出身的分子，应该坚决从部队中检举出去，绝对不能再容许这些分子存留在部队中”。“在检举与洗刷阶级异己分子和坏分子的过程中，要加紧肃反斗争。因为这些分子，往往与反革命分子有关系，或者被反革命分子所利用，甚至有时他们自己就是反革命分子。因此必须有极高度的阶级警觉性，协同保卫局采取坚决的手段，处置反革命分子”。<sup>4</sup>

在生死存亡的决战中，气氛紧张到极点，任何不满都可能被当成反革命活动，绝对服从上级命令才能生存。**1934年8月，袁国平在《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强调：“我们要坚决在中革军委统一意志领导之下，团结像一个人一样的行动起**

---

<sup>1</sup>刘志坚：《巩固红军模范连十人团工作的检查》（1934年8月1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871页。

<sup>2</sup>《五中全会给二次全苏大会党团的指令》（1934年1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第77页。

<sup>3</sup>《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司法程序》（1934年4月8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718页。

<sup>4</sup>《总政治部关于检举问题的训令》（1934年6月16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786页。

来，绝对服从上级指挥，与坚决执行上级一切命令。”<sup>1</sup>红军出发长征之前，陈毅受了重伤，住在医院，没人敢告诉他关于长征的消息：“当时有些高级干部来看我们，他们不好讲，我也不问，问起来使他们狼狈，讲了便是泄露了秘密，那时要杀头的。”红军长征之后，陈毅被任命为留守司令，他提出必须转变思路，从正规作战转向游击战，但没人敢响应，陈毅回忆：“我讲了后，有些人还是有顾虑，很害怕，怕说他是动摇分子，怕杀，不敢暴露思想”。<sup>2</sup>

但是，即使红军和苏区建立起高度集中的强大组织系统，把苏区的人力和物力动员到最大极限，也很难扭转当时国共之间悬殊的力量对比，更何况集中一切领导权力的还是博古、李德这样不称职的领导人。到 1934 年秋天，战局越来越严峻，苏区被大大压缩，中共中央不得不于 10 月率领红军踏上长征之路。

## 五、小结

从 1930 年夏天开始，斯大林认识到红军和苏区代表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决策把中国革命重心从城市转到苏区。六届三中全会接受了国际指示，筹划建立苏区中央局，六届四中全会后战略转移的速度大大加快。

中共中央迁入苏区是逐渐进行的，领导人项英、任弼时、周恩来、博古等分批进入。苏区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建立的目的，就是加强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政治保卫局系统对建立集中领导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区依靠这种高度集中的体制动员一切力量，对抗国民党数十万大军的持续围攻。

新来的领导人由于对苏区实际情况理解不深刻，往往急于求成，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当地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在 1932 年 10 月的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取消了军事指挥权，博古等人还通过发动反罗明路线斗争打击地方干部，进一步集中权力。但大权独揽的博古、李德却不是合格的领导人，他们经验不足，才能有限，给反围剿作战和苏区的命运带来不利影响。

在反围剿战争的巨大压力下，红军和苏区处于持续的高度紧张状态。中共政

<sup>1</sup>袁国平：《高虎脑战斗的政治工作》（1934 年 8 月 14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 860 页。

<sup>2</sup>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第 496、530 页。

治保卫系统通过建立“十人团”等严密的组织，实现了对人力、物力最大限度的控制和动员。但由于力量过于悬殊，加上领导不力，红军无法打破国民党的第五次围剿，不得不在 1934 年 10 月突出重围，开始传奇性的艰险长征，中国革命也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 第九章 鄂豫皖中央分局与白雀园肃反

1931年1月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共加快了战略重心向农村转移的进程，除了在中央苏区建立中央局，还决定在鄂豫皖苏区和湘鄂西苏区建立中央分局。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经历了一些变化，最初名单中并不包括后来的核心张国焘。<sup>3</sup> 3月10日，中央做出《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规定：“未与江西中央苏区打通以前，中央分局完全直隶于中央政治局，其职权系代表中央政治局而高于各省委”。“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后，原鄂豫皖边特即应取消。鄂豫皖中央分局应经过党团领导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工作，在政府下组织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直接受中央分局指导”，“红军第四军及皖西独西立师统归特区军委会指挥”。<sup>1</sup>

决议案指定了中央分局成员名单，刚当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沈泽民担任书记，曾中生担任军委书记。“中央分局的组织定九人，中央政治局除决定沈泽民，舒传贤，旷继勋，方英，曾钟圣，柯庆施六同志外，并决定由当地边特中推选三人。此外，青年团的负责人（书记），亦须加入中央分局，为当然委员，报告中央批准。分局以泽民同志任书记，传贤同志任组织，方英或庆施同志任宣传，钟圣同志任军委书记”。因曾中生曾经积极支持立三路线，决议还特别提到：“钟圣同志，必须在坚决的放弃立三路线与对立三路线调和主义的错误，而坚决执行国际路线的条件下，才能参加中央分局，与担任军委书记。”<sup>2</sup>

但中央很快决定改派张国焘去主持鄂豫皖中央分局。沈泽民的经验和威望都明显不足，而张国焘是资深的中央领导人，四中全会后从莫斯科回国，再次进入中央核心决策圈，分量显然比沈泽民重得多，更有能力代表中央去加强对鄂豫皖的领导。张国焘和陈昌浩在负责安全的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亲自护送之下，4月初从上海出发，4月10日左右到达鄂豫皖苏区，4月17日与从另一方向到达的沈泽民会合。中央在5月6日决议中规定：“中央局的责任，应该是中央在当地的直接的代表，他有权力否认党委的决议，甚至有权力解散党委”，“中央指定

<sup>1</sup> 《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186-187页。

<sup>2</sup> 《关于鄂豫皖苏维埃区域成立中央分局决议案》（1931年3月1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188-189页。

张特立、沈泽民与陈昌浩为中央局的委员，特立为书记，特立同志兼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泽民同志兼鄂豫皖省委书记。”<sup>1</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号通知发布于 5 月 16 日，宣布即日取消鄂豫皖特委。<sup>2</sup> 中央分局委员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舒传贤、旷继勋、方英、曾中生、柯庆施、郭述申、周纯全、高敬亭十一人，同时成立军事委员会，成员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旷继勋、曾中生、徐向前、郑行瑞七人。张国焘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成为鄂豫皖苏区最高领导人。<sup>3</sup>

## 一、中央分局发现鄂豫皖红军存在严重纪律问题

鄂豫皖红军的成长有一定特殊性，它不像中央苏区红军那样包含秋收起义和南昌起义的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由农村游击队发展而来的，带有浓厚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缺点，要把这样的农民队伍建设成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是需要一个过程的，而且其中似乎难免要经过一个严厉整肃的阶段。

1931 年 4 月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进入鄂豫皖建立中央分局时，鄂豫皖红军主力已经由几支分散的游击队整编为红四军，辖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师和彭杨军校。军长旷继勋（后改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各师师长分别是刘英、周维炯、许继慎和徐向前，彭杨军校校长为蔡申熙。红四军虽然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在正规化上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是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特别是存在相当多的诱奸甚至强奸妇女的行为，而且这种行为存在于不少高级干部，这时的鄂豫皖红军很难说是合格的红军。

皖西领导人方英在 1931 年 7 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到：“旷继勋和中生在河口命令地方党部布置路线，准备找六个女子共同分配，但因种种原因，中生的事幸没有完成。在扩大会时，泽民同志提议组织‘审查此问题’，在常委中虽然收集了很大材料，但国焘同志不同意此种小题大做，所以没有通过。红军与苏维埃

<sup>1</sup> 《中共中央关于成立鄂豫皖省委以及根据地与红军建设等问题的指示》（1931 年 5 月 6 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一册，第 703 页。

<sup>2</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一号》（1931 年 5 月 16 日），《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中央、湖北、河南、安徽档案馆 1985 年，第 2 页。

<sup>3</sup> 《张国焘关于鄂豫皖区情况给中央政治局的综合报告》（1931 年 5 月 24 日），《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2 页。

尚未有建立亲密的联系，以为苏维埃是红军招待所，尤其对于妇女的关系恶化非常。四军到麻埠时有七区一个十六七岁少女被红军强奸，十二师卅六团到霍山”，“也发生强奸少共团员事件。红军南下时，到各处都有强奸事发生，还有少数女子心为拥护红军是解决性的问题，是唯一要务。自动把慰劳红军的妇女分配给团长、参谋长睡觉。”<sup>1</sup>事实上，这种风气在鄂豫皖苏区由来已久，地方干部中早就存在类似的问题，何玉琳在 1929 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提到：“安、麻、陂、光党里负责人除最少数外，约有四分之三的多数，总与数十、数百女人发生性的关系，因此养成进步妇女向堕落、腐化、浪漫方面走”。<sup>2</sup>

从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红四军还带有明显的传统农民起义军的特点，带有野蛮落后的印记，即使象曾中生、旷继勋这样的红军高级领导人，也难免在对待妇女上存在问题。当年的革命者多有些“英雄”气概，有些人比如师长许继慎就认为“爱好醇酒美人，乃是英雄本色”。<sup>3</sup>高级干部如此，下级干部和士兵的纪律就更难保证了，红四军当时还达不到纪律严明的标准。29 岁的沈泽民比较书生气，在 6 月扩大会议上准备展开斗争，倒是张国焘更老练一些，大概觉得下车伊始，不宜马上斗争当地干部。但中央分局扩大会的决议中还是明确提出：“扩大会特别指出一部分红军干部及战士对妇女的不正确的关系是极严重的错误行为，这种行为要引导到红军脱离群众，应当严格纠正，并且指出党的组织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对于这种行为不加纠正，是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以后同志中犯此错误者，应照行党的纪律范围以外的制裁。”<sup>4</sup>在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总结报告中再次提出：“反对不正确的两性关系，对妇女的昏乱行为，特别是红军中负责同志首先改正去影响士兵。”<sup>5</sup>

不仅如此，鄂豫皖红军的有些部队是收编民团、土匪、帮会等发展而来的，成分极其复杂，组织结构上深受帮会影响，纪律更难改善。特别是皖西红军三十二、三十三师，一度几乎脱离了党的领导，上级委派担任师委书记、党代表的徐

<sup>1</sup> 《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7 月 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79 页。

<sup>2</sup> 《何玉琳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9 月 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65 页。

<sup>3</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 97 页。

<sup>4</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政治决议案》（1931 年 6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96 页。

<sup>5</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总结报告》（1931 年 6 月 30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135 页。

子清、徐其虚、戴亢君三名高级干部先后被擅自杀害。1929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中提到：“三十二师是由民团拖出来的几十支枪及农民收缴土匪所埋藏的枪支二十余支”，“成份流氓分子太多，政治工作可以说没有做，对外影响不太好，很多农民说他是土匪”。<sup>1</sup>1930年六安县委的报告中也提到：“三十三师的军纪是不大好的，尤其是这次（打）英山、霍山为最坏，差不多形同土匪。”<sup>2</sup>

1930年鄂豫边特委《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中》提到：“商城方面，过去青红帮的组织很多，因此党内多参有帮的组织，同时各种份子异常杂紊，因此组织都不健全”，“一切不纯的份子如红帮内份子都在党内军内负重要责任，一般同志的地位思想和地方观念充满党内，前次解决徐□□，二次解决戴□□（三十二师党代表，商，同志），都是这些份子的这些观念的造成，王子渥、徐澜亭、徐泉、崔海峰、崔德伟等不经组织决定，不令旁人知道秘密解决的，因此弄得一般同志人人自危，谈话，开会，做事，都是相互留心，猜疑敷衍。”<sup>3</sup>徐向前也提到，第一次和商城部队会合时，由于对方“以前发生过枪杀特委委员的事，我们也有顾虑，晚上睡觉枕着枪，以防意外”，第二天早晨发现商城部队不辞而别，“他们有戒心，也不奇怪。”<sup>4</sup>可见，当时鄂豫皖红军不同部队之间，相互都能感觉到类似江湖火并的危险气氛。

1930年1月，商城还曾发生八名干部险些被杀、被迫出逃的严重事件。1929年12月25日，三十二师攻下商城，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和刘英等来到部队，准备整顿三十二师，调原师长周维炯到上海受训，改由刘英担任师长。不料在会议中，参与杀害徐子清、徐其虚、戴亢君的李梯云、王泽渥、徐乾等极力煽动阻挠，控制会议，气氛极为紧张。会议期间，县委书记孔文彬接到士兵委员会常委项弱的秘密报告：李梯云、王泽渥、周维炯、肖方等私下开会，“说我们都是第三党，信阳中心县委也是第三党，决定马上扣留解决我们”。结果，中央巡视员郭树勋、师委书记郭天民、师长刘英、县委书记孔文彬、党代表吴荆赤、政治部主任李荣桂、九十八团党代表王子良、九十七团党代表金佛广等八人连夜出逃。<sup>5</sup>

<sup>1</sup> 《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29年），《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66-67页。

<sup>2</sup> 《六安县委军事报告第二号》（1930年4月15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4），第139页。

<sup>3</sup> 《鄂豫边特委关于成立鄂豫边革命委员会经过的报告·附5：关于商城三十二、三十三师的报告》（1930年初），《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80页。

<sup>4</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第82页。

<sup>5</sup> 《郭树勋巡视河南商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28-333页。

中央巡视员郭树勋逃到潢川以后，1月19日写信给中央，不仅报告了被迫出逃的过程，而且提到周维炯“不愿来上海受训练”，“怕中央处分他们”，“对党表示不满”，“三十二师商城同志完全反对接受开动军队的命令”，认为“三十二师和商城党的危机，严重得非常，指导机关充满了投机分子和腐化的东西。三十二师被流氓等所把持，军队的前途危险非常，真有共产党员不能起作用，因此我们对商城和三十二师的党，要用极大的力量来改造”。<sup>1</sup>

郭树勋2月19日给中央写出更详细的报告，对三十二师提出尖锐批评：师委常委刘殿元“英雄思想很浓厚”，“在农村奸诱农村妇女，士兵非常不满意，因为士兵犯了受处分，上级犯了，一点处分也没有”。“司令部闹得乌烟瘴气，是他吞烟吐雾的地方，红军中吸食大烟真是奇怪现象；一般流氓在司令部自由往来，戏子成天挂着红军徽章在到处耀武扬威”。“我以后参加了军队中许多支部、小组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中，知道党在军队中没有影响，同志比群众还落伍些，当攻下商城的时候，同志为着抢东西互相打架，有的把金钱带回家去，甚至有许多因为暴富了，脱离队伍放弃革命了，这主要的是没有建立起党的政治影响和树立党的纪律。”<sup>2</sup>

1930年春天红一军成立，三十二师改编为二师，三十三师改编为三师。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又提到：“二师是由几个同志在商城民团内工作，拖出来一部分”，“利用‘帮’的路线收编一些小股土匪，所以二师的成份，十分之六是农，十分之四是土匪”，“成立封建的组合、部落的组合、姓氏的结合、‘帮’的结合等。负责人互相发展私人势力，互争领袖等，因此以前有排斥外来同志等行动”。“三师开始是二师在六安、霍山游击，缴了一些武装交给六安编成游击队，后又收编了一部土匪编成的，士兵成份，内面大部分是农民，小部分是土匪”。“一师因为士兵的成份较好，在群众中的行动较好一些，二、三师参加（杂）土匪成份，到处行动不好，如买东西不给钱，偷农民家的东西等，弄得农民说二、三师是土匪”，“二师尾大不掉，故意与军部为难”。<sup>3</sup>

1931年初，红一军和十五军合编为红四军。虽然在成立红一军和成立红四

<sup>1</sup> 《豫南巡视员郭树勋关于商城及三十二师党内纠纷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1月19日），《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1983年，第217-220页

<sup>2</sup> 《郭树勋巡视河南商城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2月19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5），第322-325页。

<sup>3</sup> 《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编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92、194页。

军两次整编中都曾进行混编，力图改善部队的成分和纪律。但是，由于没有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主要干部仍是原来的，有些部队的风气积重难返，甚至有些党派去的干部也受影响腐化堕落了，红军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纪律问题。在军队的整肃中，温和的批评教育往往难以取得显著成果，严厉的肃反却可能短期内彻底改变部队的组织结构和作风。

肃反决不仅仅是表面的“逼、供、信”，沈泽民的报告中透露出肃反的深层意味：“反对那种只知道从反动分子口中查问口供的简单的肃反方法”，“红四军中肃反的经验告诉我们，那些改组派、AB团、第三党等等反动分子，平素引进富农，打击工人、贫农成分的积极干部，经济上浮支滥费，侮辱妇女，劫夺贫苦农民的粮食肥猪，在军事上故意违反命令”。<sup>1</sup>从沈泽民的报告中可以解读出这样的意思，他把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都列为整肃的对象，到底是不是真的改组派、第三党，到底有没有AB团，倒未必要深究了，实际上是凭借肃反这样一个严厉手段来整顿纪律。

## 二、红军公开对抗中央分局引发白雀园肃反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击败国民党，其根本原因是在“党指挥枪”的原则之下，建立了集中统一、纪律严明的强大军队；而国民党则由于党权屈服于军权，军队成为黄埔系、桂系、西北军、东北军、晋军等不同派系的松散联合，无法形成强大统一的力量。

但是共产党贯彻“党指挥枪”原则绝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严重的斗争，鄂豫皖肃反某种程度上也是这种斗争的一部分。由于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残酷围剿，中共中央和红军的联系很困难，领导也就相应削弱了。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进入苏区建立中央分局，实际就是要贯彻“党指挥枪”的原则，代表中央加强对鄂豫皖红军和苏区的领导。但是，他们却受到某些红军将领的抵制，1931年7月方英报告提到红军对中央分局的态度：“四军在国际路线领导之下，在会议上不得不承认其错，而是在实际上用种种办法来破坏中央分局之威信，如说国焘

<sup>1</sup> 《肃反工作与两条战线》（党中央 1931 年 12 月 24 日收到），《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535 页。

同志不懂军事，泽民同志太书生不能领导等等，弄成军委在四军中没有什么威信”。

<sup>1</sup>

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之间很快在发展方向上产生了分歧。由于前两年战争的破坏，1931年春夏鄂豫皖苏区发生了严重饥荒，当年的长江大水灾又加重了危机。麻城县委报告提到：“现在赤区已有五六千人没有饭吃”。<sup>2</sup>苏区遭受如此大的困难，与1930年红军按立三路线向外进攻也有关系，虽然红军在苏区外获得很大胜利，实力增长，但“后方黄麻苏区阵地大受敌军蹂躏，粮食被毁，生产破坏”，“群众遭受很大的损失”。<sup>3</sup>1931年春中央分局成立后，下大力气发起粮食运动，号召在苏区每一片土地上播种。到夏秋粮食将熟的时候，苏区周边的白军和地主武装都蠢蠢欲动，要到苏区来抢收粮食，保卫粮食成为一个严重问题，所以中央局不希望红军主力远离苏区。

但是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等认为，苏区经济困难，“两次‘包剿’以来，全军不但没发过一个零用费，而且衣服草鞋都弄到非常困难的地步。这样全军士气遂呈每况愈下的危险现象，兵士潜逃日有所闻”，红四军必须南下向外发展才能解决给养问题。在6月扩大会议上，反对南下的沈泽民与曾中生、余笃三、许继慎等发生了激烈争论，由于“得到了国焘同志赞成”，南下计划“最后以多数意见表决”通过。<sup>4</sup>

但是，张国焘同意南下也着眼于帮助中央苏区对付第三次围剿，所以命令红四军主力攻下英山后，向东出潜山、太湖，“威逼安庆，威吓南京”，而且要求红军及时回来保卫秋收，“大致规定这一行动以一月为期”。<sup>5</sup>陈昌浩在1931年8月8日向中央报告：“红军主力现有十、十一、十二师之各两团及军部教导团一团共七团向南行动，主要目的是援助中央苏区，占据英山，近逼安庆。”<sup>6</sup>

但是，红四军南下主力8月1日顺利攻下英山后，并未按原计划向东进攻潜

<sup>1</sup> 《方英关于红四军和苏维埃政权建设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7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279页。

<sup>2</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通知第七号》（1931年6月10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60页。

<sup>3</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政治决议案》（1931年6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89页。

<sup>4</sup>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358页。

<sup>5</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367页。

<sup>6</sup> 《致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8月8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191页。另外，此信编者所加题目有误，从信的内容看，是给中央的信。

山、安庆方向，而是自行决定继续向南，占据蕲水，缴获“二十余斤金子，千八百斤银子，数万现洋”，“相当的解决衣服问题”，<sup>1</sup>这大大改善了红军的物质条件，却违背了中央分局的军事计划。红四军领导人也知道违反军令，8月20日直接写信给党中央，解释改变计划的原因。

中央分局得知红四军擅自改变计划后非常不满。当时张国焘病重濒危，分局书记由沈泽民代理，8月27日沈泽民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信，<sup>2</sup>提出严厉批评，认为红四军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问题，“放弃援助中央苏区，抗拒分局指示，放弃后方赤区，给敌人以良机紧攻中央苏区，给敌人以可能扰乱后方赤区与秋收，使后方二百万群众不能安全秋收，这样解决经济问题，是工农红军绝不出此，是负责党与苏维埃的使命来领导红军的同志绝不应当出此”，进而批评红四军“对这次分局指示完全采取了一种外交式的接受，实际上走到公开的抗拒”，命令红四军“接信后火速回来，不能有丝毫的停留”。<sup>3</sup>

9月初收到中央分局的信以后，红四军领导人很不服气，在回信中激烈批评“分局的这种指示，完全凭借片面的根据和纯主观出发，与我们前方行动的事实意义和客观环境是绝对不相符合的”，质问中央分局：“进攻安庆威胁南京，是这样轻率不加准备而可发出军令吗？”进而抨击中央分局：“命令合近代编制一师不足的红军去取安庆威逼南京，这恐近于共产党之夸大狂了”，“未免太近于纸上谈兵了”。<sup>4</sup>

红四军的对抗行动很快进一步升级，曾中生在鸡鸣河召集了全军连指导员以上干部大会，会上“群情激愤”，<sup>5</sup>通过了猛烈攻击中央分局的决议，并且把对抗中央分局的回信散发到了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鸡鸣河会议是一个严重事件，改变了争论的性质和范围。上下级之间发生争论，在共产党的组织原则上是允许的，即使言辞激烈一些，在革命队伍中也不算大错，彭德怀骂过李德，徐海东骂过沈泽民，林彪在会理会议前写信批评过毛泽东，这些争论都限制在少数领导人之间，是正常的工作争论。但是，红四军领导人召集大会，通过反对上级领导的

<sup>1</sup>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359页。

<sup>2</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98页。

<sup>3</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军委会给曾中生、徐向前的信》（1931年8月27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1），第224-225页。

<sup>4</sup> 《红四军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0月21日带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389-390、392-393页。

<sup>5</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1页。

决议，印发反对上级领导的文件，性质就完全不同了，等于是军队公开对抗上级党的领导，这就和 1935 年 9 月 15 日张国焘煽动反对中央的“阿坝会议”很类似了。鸡鸣河会议显然违反了“党指挥枪”和“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由于中央分局直接代表中央，红四军连“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也一并违反了。

中央政治局 1931 年 3 月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已明确规定：“红军中的各级党部的主要任务是保持和加强红军的革命纪律和战斗力。因此执行上级机关、指挥员与政治委员的命令是每一个党员团员第一步的基本任务”。“不执行命令，批评这种命令和行动计划，批评上级指挥员的战略，是绝对不允许的”。“即在红军以外的党部，亦不容许在公开会议或公开文件中批评红军指挥部的行动计划和策略”。“绝不容许拒绝执行上级军事机关的命令和破坏军事纪律，我们军队中的党员，对于这种拒绝执行基本任务的行动，应采取最严厉的制裁。”<sup>1</sup>

中央分局担心红四军抗命不回苏区，任命陈昌浩代替曾中生担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两次乘“列宁号”飞机空降未果的情况下，于 9 月 13 日飞马赶到红四军驻地，接管了指挥权，“在四军干部反对昌浩同志的空气之下，昌浩同志在迅速进行肃反”。<sup>2</sup>红四军回到苏区白雀园以后，中央分局通过了关于红四军错误的决议。决议在军事计划上做了一定的自我批评，承认“选择安庆的目标，而不首先详加考虑从英山至潜山至安庆，一般地形与群众斗争状况的不利之点，在决定战略上，是疏忽的”，但重点是批评红四军在组织上的错误，认为鸡鸣河会议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这是最危险最有利于敌人的行动，这种行为如果继续下去，足以破坏党、红军和整个苏区”。“这个会议上竟将四军答复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信印刷散发，事后调查这个文件竟散发到了皖西的地方党部和非党组织中去。中央分局严厉的指出，这是反党的、罗章龙右派所首用过的斗争方式。”<sup>3</sup>

综上所述，中央分局和红四军干部关于进军方向的争论是正常的工作分歧，甚至四军的意见更符合实际。但是中央分局是四军的上级，是代表中央来领导红四军的，四军在没有迫不得已的理由的情况下，应该服从中央分局的领导，这正

<sup>1</sup> 《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1931 年 3 月 28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第 207-208 页。

<sup>2</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张国焘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11 月 2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58 页。

<sup>3</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1931 年 10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376-378 页。

是“党指挥枪”原则的体现。四军领导人认为中央分局领导不懂军事，轻率地违反了分局和军委的命令，在遭到批评后，不但拒绝接受，反而召开大会，进行激烈的对抗，这显然是严重违反了共产党的建军原则。

当时的四军军长徐向前晚年谈到鸡鸣河会议时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十二师政治部主任吴焕先同志不同意这种做法，认为在组织上、行动上应执行分局的命令北返。”徐向前本人也认为，鸡鸣河会议“是下级组织召开活动分子会议反对上级组织的指示，这是不妥当的。结果，给张国焘抓住了把柄。”<sup>1</sup>徐向前、倪志亮 1945 年撰写的《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也承认：“当时军部在组织上确有反抗分局命令的现象。对分局的命令如有不同意见，可以由军部向分局提出，不应召集支书、指导员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反对执行分局命令的讨论，这在军事组织上是不允许的。”<sup>2</sup>

军事策略正确与否，是可以讨论的，但是红四军在组织上无疑违反了“下级服从上级”原则，特别是还违反了更为严格的“党指挥枪”原则，这无疑是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共中央在得知中央分局与红四军的冲突以后，在 1931 年 11 月 3 日信中严肃地指出：“四军领导干部违抗中央局的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进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在组织上四军违抗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自由的更改军事计划，拒绝中央分局的正确指示，召集非党会议来反抗中央局的决议，印发中央局的决议到地方党部及军队下级党部去，并且不经中局向中央报告，企图蒙蔽中央，是严重的反党的错误。这种错误非但是布尔什维克党所不能容许，而且是污辱了工农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的光荣”。<sup>3</sup>

事实上，以鸡鸣河会议为高潮的红四军抗上事件是引发白雀园肃反的主要原因。前面曾经提到，即使发现了四军领导人中存在严重侵犯女性的问题，中央分局也只是公开提出批评，在被批评者承认错误的情况下，并未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受到批评的干部仍担任原职。但“党指挥枪”是共产党建军的根本原则，如果有人触犯了这一条，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必然会引起上级党组织的震怒，遭到严厉的处分，加上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让中央分局怀疑有敌对势力混入红军，于是直

<sup>1</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 151 页。

<sup>2</sup> 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45 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 34 页。

<sup>3</sup> 《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 年 11 月 3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05-406 页。

接引发了大开杀戒的白雀园肃反。

### 三、当时政治派系极为复杂也是肃反诱因

重大历史事件往往不是单一原因的，肃反中发生很多冤案，只有放在 1930 年前后复杂的政治派系斗争的背景中，才能获得全面深刻的认识。1927 年国共分裂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先后发生了自身的分裂，国民党左派先后成立了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邓演达为核心的第三党，共产党也先后分裂出以陈独秀、彭述之为首的托陈派和另立中央的罗章龙派。这些人都曾是大革命期间并肩战斗的战友，很多人之间都有深厚的私人关系。当时胜负未定，这些派别都在积极活动，招募成员，扩大组织。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很容易在不同组织之间发生摇摆，组织上也很容易对成员的忠诚产生怀疑。中国共产党在整肃组织方面最为严厉，这是发生冤案的重要原因，但也正是这种严厉态度使中共锻造出最为严密的党组织。

在鄂豫皖苏区的肃反中，被视为主要危险的是改组派和第三党，陈昌浩 1931 年 11 月总结肃反的文章即名为《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 团》，<sup>1</sup>AB 团在 1927 年后早已不复存在，但改组派和第三党确实是 1928 年到 1931 年间很有影响的国民党左派组织。改组派是 1928 年由汪精卫派的陈公博、顾孟余、王乐平等人创建，他们以上海为基地，创办《革命评论》、《前进》等刊物和大陆大学，提出“民生革命”、“民生政治”等主张。改组派 1928 年冬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并建立了各地支部，号召反蒋，在对南京政府感到失望的知识青年中有很大影响。每当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实力派起兵反蒋的时候，往往以汪精卫和改组派为政治招牌。在 1929-1930 年历次反蒋战争先后失败后，1931 年 2 月因在约法问题上产生分歧，蒋介石囚禁胡汉民于汤山，引发广东、广西通电反蒋，汪精卫为首的反蒋派系聚集广州，成立广州国民政府，改组派再次活跃起来。

鄂豫皖苏区临近武汉，受 1927 年国民党左派的武汉政府影响较大，是改组

---

<sup>1</sup> 《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 团》(1931 年 11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76 页。

派较为活跃的地区。在 1929 年苏区创建初期，共产党和改组派的斗争相当激烈。舒传贤 1929 年给中央的报告提到：“霍山国民党在十七年直至今年四月，都倾向汪精卫派，到今年四月后正式加入改组派，他们一方面抓政治机关，一方面抓群众”。“六安的国民党在过去派别很多，现在国民党分两派，一派属改组派，一派属蒋派的，但他们时常内讧，又只见抓政治机关以及城市群众，不大注意乡间的群众。”<sup>1</sup>1929 年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几次破坏改组派组织，杀死改组派“湖北省委一人，特派员两人，河南省委一人，县委、区委及活动分子七、八十人”。<sup>2</sup>鄂豫边特委 1930 年 2 月给中央的信中提到：“曹大骏同志在信阳介绍黄安反动首领、湖北改组派省委车若愚入党，请中央注意考查介绍原因，因为鄂东北各县受改组派的破坏不小。”<sup>3</sup>1930 年 5-6 月间是鄂豫边特委反对改组派最紧张的时期，“一般同志都是全部动员，当时举行‘反改运动周’，进行广泛的宣传”。<sup>4</sup>

由于当时形势错综复杂，敌我斗争很残酷，党内形成了严厉的风气，往往仅凭猜疑就从严处置。1927 年湖北省委全省暴动计划中就明确提出：“在乡村中杀尽豪绅、地主、政府官吏，应当取斩草除根的态度，不要丝毫姑息。宁愿误杀几个，不要少杀一个”。<sup>5</sup>1929 年 8 月，深受信任、担任军委秘书的黄埔四期生白鑫叛变，致使中央农民部长彭湃、军事部长杨殷等五人被捕遇害，周恩来临时有事没去开会才幸免于难。1931 年 4 月，政治局候补委员、负责机密安全的顾顺章叛变，造成很大损失，危及了整个中共中央的安全，接着总书记向忠发也被捕叛变。血的教训让中共不得不以最严厉的态度来整肃组织，对任何可疑的行为都不放过。在残酷的斗争中，这严厉态度逐渐成为传统。

早在 1929 年，鄂东北就发生了特委常委卢玉成等作为改组派被杀事件。1929 年春天，“卢带两个湖南人做军事工作的来，卢向鄂东北特委报告，他因过去同学反动派认得被捕至汉口，只监禁了半天，他自己因和鲁涤平的参谋长写信请他援救，他登时派二人持条前来将他释放。他在汉口有许多旧相识，在政治上有势力，于是趁势在汉口多住住，以便多探看反动政局的情势和找一找武汉旧的失掉

<sup>1</sup> 《舒传贤关于六、霍党务、军事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9 月 2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4），第 2-3 页。

<sup>2</sup> 《鄂豫边革命委员会报告》（1929 年），《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第 62 页。

<sup>3</sup> 《鄂豫边特委给中央信》（1930 年 2 月 16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第 113 页。

<sup>4</sup> 《鄂豫边特委给湖北省委的报告》（1930 年 9 月 20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2），第 132 页。

<sup>5</sup> 《湖北省委关于全省总暴动计划》（1927 年 12 月 3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 151 页。

联络的同志”。“汉阳公安局长是他的老同学，知道他是 CP 分子，劝他不要干，他也装做说不干了，这局长因和他交情极好，百事任他的便”。卢玉成带胡勋和段中玉到苏区后，被委以重任，分别担任特委常委、团长、团政治指导员。但是很快有消息说“被捕释放者是反动收买的奸细”，特委又在三人的言行中发现了一些所谓“疑点”，于是“先审卢玉成，用重刑，卢始终抗辩，不承认有叛党事”，卢勋则未经审问，直接在睡梦中被打死，三人先后被杀。“鄂东北特委认定卢玉成、胡勋、段中玉是改组派”，<sup>1</sup>但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特委却没有提到任何确切的证据，这很可能是个冤案，由此案可以看出在残酷斗争环境下党内形成了极易产生冤案的严厉气氛。

第三党大致是指 1930 年夏天邓演达回国后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成员是一些曾与中共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左派和前中共党员。他们虽然坚决反对蒋介石，但也不认同共产党的道路，批评中共的武装斗争是“乘此机会行其盲动乱动的阴谋，以加大破产的速度，以陷全国人民于死地。”<sup>2</sup>他们要在共产党和蒋记国民党之外走第三条道路，其核心主张是“平民政权”，相信“只要本党的农民政纲土地政纲实现出来，平民政权建设起来，则所谓红军必然自溃，而红军威劫下的农民必然和真正代表他们的革命行动握手拥抱。”<sup>3</sup>第三党计划通过“黄埔革命同志会”建立自己的军队，夺取全国政权。黄埔革命同志会的骨干既包括陈烈、余洒度等脱党的前共产党员，也包括很多国民党员，甚至蒋介石的亲信陈诚由于与邓演达关系亲密，不仅其领导的十八军不少重要将领如罗卓英、周至柔、萧乾等与第三党有关系，陈诚还从十八军公积累金中每月支 5000 元作为第三党活动经费，邓演达先后派庄明远、陈烈、邱新民、曹金轮、胡一、施方白等多人到十八军开展工作。<sup>4</sup>

1931 年 2 月，蒋介石囚禁胡汉民，引发宁粤分裂，政局动荡起来。5 月，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陈济棠等成立广州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分庭抗礼。7 月，蒋介石调集 30 万军队发动对中央苏区第三次围剿，

<sup>1</sup> 《鄂东北特别区委员会给中央的报告》（1929 年 9 月 8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5），第 173-175 页。

<sup>2</sup> 邓演达：《二十年四月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1931 年 4 月），《邓演达先生遗集》，香港：杨逸裳发行 1932 年版，第 208 页。

<sup>3</sup> 邓演达：《怎样去复兴中国革命——平民革命？》（1932），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315 页。

<sup>4</sup> 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60 页。

陈诚的十八军是参战主力。第三党认为机会来了，7月中下旬拟订了“以江西为中心，武汉、西北、华北同时响应”的武装起义计划，派人到各地联络黄埔革命同志会会员参加军事行动。广东方面孙科表示支持起义计划，并答应给予经费援助，改组派和第三党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合作。<sup>1</sup>

1931年8月20日，红四军领导人曾中生、徐向前在给中央的报告提到：“打下英山后，有名钟蜀武者，自称来找许继慎的，经我们秘密审讯以后，他说名义上是从南京政府派来运动许继慎倒戈，实际上他是第三党，受邓演达之命来找许继慎的。这一问题，我们除了密报到中央分局外，还有一件事要报告中央的，就是他加入余洒度（黄埔一期学生，第三党的）所主办之黄埔革命同学会，是共产党员袁镜铭、刘庭杰两人介绍，袁、刘二人过去中生在中军工作时曾知道党派过他们工作（刘庭杰到南通工作），可见这些第三党的分子还是夹在党内的，应请中央加以特别的注意。钟某我们还在密禁着，将解到中央分局去，由中央分局处办。这里我们要负责。许继慎在组织上当然不会有什么问题，然而许多社会关系不能打断这一点，我们已严重警告他。”<sup>2</sup>

许继慎自1927年5月武汉保卫战负伤以后，在上海生活了将近三年。在上海期间，许继慎的社会关系比较复杂，与很多方面都有联系。他是安徽六安人，在当地青年中很有威望，中央应地方要求派他到鄂豫皖。徐向前在回忆录中提到：“倪志亮同志从上海开会回来，曾悄悄对我说过：中央打了招呼，说许继慎这个人关系复杂。”<sup>3</sup>中央1931年11月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中也提到：“许继慎，中央除得到你们的报告外，并得到情报说：‘改组派曾声称如北伐军到达两湖，许继慎部即可响应’，又许曾致信王保需担保释放其父（被我们逮捕的土豪）。据此，中央局对许应作严厉的考查。”<sup>4</sup>

许继慎与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朱蕴山关系相当密切，据说在许继慎去鄂豫皖临行前，“朱蕴山千方百计地筹集了一万元送给许继慎”，<sup>5</sup>可见关系非同一般。朱蕴山是老同盟会员，是北伐期间是与邓演达关系密切的国民党左派，与中国共产党

<sup>1</sup> 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第259、262页。

<sup>2</sup> 《徐向前、曾中生关于红四军情况及行动方向的意见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363-364页。

<sup>3</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6页。

<sup>4</sup> 《中央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信》（1931年11月3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407页。

<sup>5</sup> 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版，第88页。

的关系也相当友好，甚至还参加了南昌起义。<sup>1</sup>朱蕴山协助邓演达创建了第三党，是第三党最核心的成员，许继慎与朱的关系如此密切，又掌握兵权，在 1931 年夏天第三党的军事计划中很可能被看作潜在的争取对象。

后来被当作许继慎“通敌”证据的信全文如下：

“继慎吾兄无恙。

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幸荷察纳，钦佩无极！比得钟同志返命，即为详呈校座，奉批照办。匍匐来归之子，父母唯有涕泪加怜，或竟自伤其顾之不周耳，宁忍加责难于其子哉！苍苍者天，于孝行役。分无再见，乃复来归。虽犹千里，心实欢喜。只所须名义防地，俟钟俊同志赴赣请示校座，自当照给。校座返京百务待决，故一时未能缕缕呈耳，顾吾兄之勿虑也。西望停云，我心劳结。诸希自珍，以候宠命。并颂戎安！

弟曾扩情再拜  
九月十九日”<sup>2</sup>

此信是以黄埔一期同学曾扩情名义写给许继慎的，有的研究者认为此信是曾中生、徐向前 8 月 20 日信中提到的钟蜀武带来的，但这与此信的落款 9 月 19 日显然矛盾，而且其中还有“前由钟俊同志奉书吾兄”、“钟同志返命”等内容。关于被派到英山联络许继慎的钟蜀武，史上存在很多的疑点。陈昌浩说钟蜀武就是信中提到的钟俊，虽然确实被捕，但并未押送中央分局，而是“出一个假布告说钟蜀武是蒋介石派来的侦探，现已执行枪毙。其实老许放他走了，并给有信和路费路单。还有一个钟梅桥是钟俊之弟，在十二师政治部住三十一天，走的时候给了他一个出来的介绍信”。<sup>3</sup>综上，可以推测曾扩情带信给许继慎应该不止一次，至少是两次，8 月 20 日以前是第一次，送信人钟俊虽曾被抓，但可能又被放走了，确实如曾扩情信所说曾经“返命”，钟梅桥后来也离开了。9 月 19 日以后第二次带信时，肃反已经开始，带信人不明情况，结果被人信俱获。

由于相关史料缺失太多，许继慎冤案的许多细节难以完全搞清，只能尝试对现有材料进行解释。曾中生、徐向前 8 月 20 日信中提到钟蜀武（钟俊）的供词有一定可信度，即他名义上受曾扩情委派，代表蒋介石南京政府，实际上是代表

<sup>1</sup> 胡允恭：《忆朱蕴山前辈》，《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240 页。

<sup>2</sup> 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第 135-136 页。

<sup>3</sup>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46 页。

第三党来争取许继慎参加邓演达的军事计划，8月1日红四军攻下英山，正是第三党使者四出、积极策动武装起义的时候。邓演达7月13日给黄琪翔的信中说：

“近日消息甚多，都说‘快动’，但是我恐怕‘草头’（注：蒋介石）还是会败于红军手上，使我们动手更易些”。<sup>1</sup>第三党人物是国民党左派中的左派，他们和中共的关系相当友好，自邓演达、朱蕴山以下后来大都被当作“共产党的朋友”。许继慎在上海时与第三党的核心人物朱蕴山关系极为密切，许本人又是比较重视私人感情的人，前面提到他给一个叫王保需的朋友写信担保释放其父，所以虽然钟蜀武（钟俊）被抓捕、送交军部审问，但在许继慎的影响下还是被放走了，钟俊回去后自然要向曾扩情复命，于是才有了第二封信。

张国焘、陈昌浩等虽然查获了代表“校座”蒋介石的曾扩情第二封信，但并未轻信这封信的内容，没有相信许继慎投靠蒋介石，实际上仍然主要怀疑他与第三党的关系。陈昌浩称：“许继慎，是由上海来的，他当时就与第三党有很密切的关系。因此，那时中央派人与他谈话，老许表示悔过，结果中央派他来当第一军军长，实际上许继慎又奉了第三党中央的命令而来。”<sup>2</sup>由于许继慎在上海确实曾与第三党的核心成员关系密切，又放走了自称第三党的联络人钟俊，党中央和中央分局对他与第三党的关系产生了很深的怀疑，于是引发了许继慎被杀的著名冤案。

#### 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并非2500人

关于1931年9-11月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中说：“白雀园‘大肃反’，是鄂豫皖根据地历史上最令人痛心的一页。将近三个月的‘肃反’，肃掉了两千五百名以上的红军指战员”。<sup>3</sup>据此，许多研究者认为白雀园肃反有2500多人被杀。

但是，主管肃反的是政治委员陈昌浩，军长徐向前当时无权过问，他只知道

<sup>1</sup> 《邓演达一九三一年致黄琪翔的两封信》（1931），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第284-286页。

<sup>2</sup>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1931年11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444页。

<sup>3</sup> 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152页。

红四军经过肃反少了 2500 人，但并不知道这些人的具体命运。陈昌浩才是最直接的见证人，他提到整肃人数的主要有三份材料：

材料一：1931 年 13 期《红军周刊》有署名“昌浩”日期 1931 年 11 月的文章《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 团》，其中提到：“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八百个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分子，不仅是摧残了反革命的几乎全部干部，不仅是捉了许继慎、周维炯、肖方、姜镜堂这般反革命的首领，而且是根本破坏改组派、AB 团、第三党的反革命组织，而且是淘汰了大批反革命的分子——富农（约二千人）”。<sup>1</sup>

材料二：《列宁报》63 期（1931 年 12 月以前）有署名“陈昌浩”的文章《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其中有：“我们的胜利，不仅是逮捕了一千个改组派、AB 团、第三党分子，不仅是一般消灭了反革命组织，不仅是擒住了反革命的首领周维炯、许继慎、萧方、姜镜堂，不仅是铲除了一千以上的富农、流氓、地痞”。<sup>2</sup>

材料三：1931 年 11 月 22 日《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中提到：“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后面又说：“我们的胜利，不仅是肃清了一千个改逆、AB 团、第三党分子和将近两千个富农”。<sup>3</sup>

分析上面三份材料，我们可以看出，三份材料都涉及两个数字，一个是作为反革命组织成员的人数，一个是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人数。陈昌浩有时用准确数字，有时用大概数字。八百人、一千五六百人应该是准确数字，一千、两千这样的大概数字是从准确数字衍生出来的。据此，红四军白雀园肃反应该是查出了反革命组织成员约八百人和富农等异己分子一千五六百人。

作为富农等异己分子的一千五六百人是否被杀了呢？我认为在此处以往存在对史料的误读，这一千五六百人是被驱逐出红军，遣送回原籍，当时并未被杀。实际上，即使在政策最偏激的时期，也没有仅仅因为是富农就要杀掉的政策，1927 年暴动时期有些地方曾经出现过杀地主的阶级灭绝行为，但是短期的、局部的，后来最多不过是“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鄂豫皖中央分局 1931 年 10 月决

<sup>1</sup> 《肃清改组派、第三党、AB 团》（1931 年 11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77 页。

<sup>2</sup> 《红四军中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533 页。

<sup>3</sup>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45、451 页

议明确提出要“彻底淘汰红军中的富农分子。富农出身的分子，除对政治上特别坚定作战特别勇敢，有长期革命斗争历史的以外，一概洗刷出去”。“被淘汰的分子，一概须交军委会发给各县苏维埃，送回原籍，并通知各红军组织以后不再吸收。”<sup>1</sup>鄂豫皖苏维埃政府 11 月 8 日通知规定：“对红军淘汰出来的富农分子的好土地，在本政府通知二十二号已说明了，应当收回另给以坏的土地”，“各县苏维埃要严格的防止这些富农分子再混入红军中去”。<sup>2</sup>12 月 2 日又发出通知：“如发现富农、被淘汰的富农和反动嫌疑份子再混入到我们的组织中去时，即唯县苏是问，即应予以革命纪律制裁。”<sup>3</sup>很显然，红四军中查出的富农分子是被送回原籍了，并未被杀。

那么，约八百人的反革命组织成员是否全部被杀了呢？也不一定。1931 年 11 月鄂豫皖苏区《改组派自首条例》规定：“改组派的首领，除潘炳佛、程新山、丁超等外，其余改组派的群众，一律准其自首，绝对保障其生命的安全，并予以政治上的出路。”<sup>4</sup>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中笼统说“这次共计肃清改逆一千人，富农及一切不好的分子计一千五六百人”。<sup>5</sup>既然富农并未被杀，那么“肃清”并不等于“杀”是很明显的。由此可以推断，被定为改组派、第三党群众的被捕人员也并未全部被杀，红四军白雀园肃反被杀的人数应该少于 800 人。

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是这样说的：“这次的肃反案，被捕者约六百人，军人占三分之一；实际被整肃的有许继盛（慎）等百余，其中判死刑者约三十人，判处各种刑期的徒刑者约百人。”<sup>6</sup>张国焘的回忆录是多年之后凭记忆在香港写的，当时没有多少参考资料，而且有开脱自己责任的倾向，所以这些数字未必准确。但是，他提到“被捕者约六百人”和实际被捕者八百人相比，误差并不算很大，所以他的说法也并非完全没有史料价值，至少这和《改组派自首条例》规定的惩办首领、准许改组派群众自首的政策是相吻合的。根据《改组派自首条例》，并参考重要当事人张国焘的回忆，白雀园肃反被杀者很可能是被捕八百人中的少

<sup>1</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关于红四军的决议》（1931 年 10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384-385 页。

<sup>2</sup>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二十三号》（1931 年 11 月 8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第 180 页。

<sup>3</sup> 《鄂豫皖苏维埃政府通知第二十四号》（1931 年 12 月 2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3），第 185 页。

<sup>4</sup> 《改组派自首条例》（1931 年 11 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63 页。

<sup>5</sup> 《陈昌浩在彭杨学校报告肃反经过》（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45 页。

<sup>6</sup>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第 107 页。

数，但是要确定具体人数在现有的史料基础上还比较困难，有待于新史料的发现和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肃反被杀者中干部比例很大，给鄂豫皖红军干部队伍造成了超过半数的重大损失。当时红四军总共只有四个师十二个团，遭到整肃的就有许继慎、周维炯两个师长，潘板佛、高建斗、王则先、萧方、王明、魏孟贤六个团长，封俊、江子英、袁高甫、吴精赤、刘性成五个团政委，十个团政治处主任（从 28 到 37 团），还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营长、连长、连指导员。<sup>1</sup>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虽然白雀园肃反被杀人数远不到以往认为的 2500 人，但给鄂豫皖红军造成的损失仍然是非常惨重、难以弥补的。

## 五、地方干部在肃反扩大化中起了重要作用

肃反的机器一旦开动起来，总是难免扩大化的结果，中下层干部的作用不可忽视，这却又是常常被人忽视的。以往人们往往把肃反归因于高级领导人打击异己，比如鄂豫皖苏区的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对红四军领导人的不满。

但是，能够挑战张国焘领导权的，无非是几十个军、师、团级干部，肃反在基层和地方铺开后，数以千计的人被杀，这并不是发动肃反的高级领导人希望看到的，而且对抗中央分局的主要人物曾中生当时只是被当成犯错误的同志，在白雀园肃反中并未被杀。实际上，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动力是中下级干部，他们或者由于个人恩怨，或者由于思想偏狭，或者为了整顿纪律，也很热衷于肃反。还有很多人因为文化不高和政治素质不足，作风简单粗暴，缺乏最基本的判断力，很容易在狂热中失控滥杀。

鄂豫皖苏区的创始人之一戴季英就很喜欢搞肃反，当红四方面军突围西进以后，他在新组建的红 25 军担任 74 师政委。当时的师长徐海东提到：“师政委戴季英亲自下手，把 220 团的政委、参谋长等 49 名党团干部捆起来”，“把 79 团特务连指导员吊起来，拷打逼供不成，又绑在板凳上用刑。那个指导员曾任过皖西北少共道委宣传部长，参加革命只有 17 岁，聪明活泼，能力很强，他怎么是反

<sup>1</sup> 陈昌浩：《红四军反对反革命的伟大胜利》（1931 年 10 月），《鄂豫皖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532 页。

革命呢？当政委百般拷打问不出口供时，叫他的警卫员拉出去杀。我急了，忙说：‘政委，一点儿口供没有，为什么杀人家？’他说：‘你不懂肃反的事，没有口供这证明他是反革命坚决分子，不愿说出他们的组织来。’”“49个人，被杀了，我知道以后，落下泪来”，“越想越难过，一夜没睡，两个眼泡都哭肿了。”<sup>1</sup>在25军进入陕北苏区后，戴季英又积极参与了针对陕北地方领导人刘志丹等的肃反，直到中央红军到达才被制止。

当时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知识水平很低，作风简单粗暴，在肃反中很容易乱杀人。鄂豫边特委报告提到：“在破坏改组派方面，开始决定的原则是：解决改组派的活动分子及首领，夺取其群众”，“但在执行上，一般同志因为没有在城市内过惯复杂生活，对农村加入改组派稍有一点能力的，即认为活动分子不敢释放，因此造成过分的屠杀”。<sup>2</sup>鄂豫边特委还提到，“当地方党部反富最激烈的时候，大批富农和动摇的群众，往红军中跑，红军说地方党乱杀人”。<sup>3</sup>1945年徐向前、倪志亮在《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也提到：“六安独立团的肃反中，有一次班长以上的干部一律以反革命罪名逮捕了，这一次一下子就捕了二百余。这说明在地方武装中肃反逮人杀人也是很厉害的”。<sup>4</sup>

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9个县的党组织在肃反中几乎垮台，大部分干部都被当成“反动分子”，中心县委甚至粗暴地提出整个党组织都要推倒重来。县委在1932年1月报告中说：“反动分子充满了各级领导机关”，“如皖西整个特委会剩下方英同志、一二事务人员；少共特委军事委员会几乎完全是的；英山党团中委会只剩下党团书记、党团妇委书记、交通、火夫，其余完全是的；各县如六安、霍山、商城只剩下少数同志，其余全盘是的。”英山中心县委领导下有英山、罗田、太湖、蕲水、蕲春、宿松、黄梅、广济、潜山九个县，“整个党组织完全被第三党破坏了”，“八个区书记同时是第三党书记，支部书记有半数以上是第三党，甚至整个是第三党的支部”，最后的结论竟然是“英山领导下之各县，皖西北的各县也是如此，整个的党还要在群众中重新创造。”<sup>5</sup>

<sup>1</sup>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2-23页。

<sup>2</sup> 《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编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62-163页。

<sup>3</sup> 《鄂豫边特委综合报告（续）》（编者判定1930年12月），《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第198页。

<sup>4</sup> 徐向前、倪志亮：《鄂豫皖苏区红军历史》（1945年），《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上）》，第36页。

<sup>5</sup> 《英山中心县委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1月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

在黄安县政治保卫局的高压之下，仙居区曾经爆发过反抗肃反的群众暴动，最后被镇压。“政治保卫局在仙区首先逮捕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祝凤阶和熊海峰、秦国珍等人；接着又抓走了 10 余名乡干部，进而捉到村苏一级。”这激起了仙居区干部和群众的愤怒，“1932 年 2 月 20 日，县保卫局一行 9 人携带手枪、绳索到仙区抓人。当他们进入王家冲时，周围各村几百名男女老少手持冲担、锄头、扁担，‘呵吼’喧天跑了出来”，“大家一涌齐上，解除了保卫局人员的武装，并将他们捆绑起来。”虽然在区委书记徐德聪等的劝说下，群众放了保卫局人员、还了枪，但是 3 月 8 日黄安县保卫局还是在禹王城召开群众大会，将徐德聪等 63 人以“改组派”罪名一次性集体处决。<sup>1</sup>

中央分局觉察到地方上的粗暴风气，曾于 1931 年 11 月写信给鄂豫边特委，制止乱杀人的行为。信中指出：“你们党内用枪毙来做执行党的纪律的一种方法，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方法”。“在党内有死刑，结果一定要引到消灭自我批评与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要转到成为家长统治与寡头专制”。“一旦以如此严峻的纪律相绳，必然人人自危造成党内恐怖，一旦形成党内恐怖，党的分崩瓦解就不远了。”<sup>2</sup>从这封信也可以映射出当时地方干部在推动肃反扩大化中所起的作用。

## 六、小结

肃反是中国革命历史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重建史实已有相当的难度，寻求理解更是难上加难。在敌强我弱的残酷斗争中，革命力量原本不足，而 1930 年代各个苏区的革命队伍却都发生了大规模自相残杀的惨剧，造成革命力量的严重损伤，这实在是让人难以理解。历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任何一个重大事实都往往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而是多种内因与外因交错编织而成。在鄂豫皖苏区肃反的惨烈历史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一支成长于野蛮环境的农民队伍，在错综复杂的内外矛盾中，向纪律严明的革命军队的艰难痛苦的蜕变。

---

<sup>1</sup> 时期（下）》，第 472-474 页。

<sup>2</sup> 《“仙区事件”的爆发》，《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下）》，第 475-476 页。

<sup>2</sup> 《鄂豫皖中央分局给鄂豫边特委信》（1931 年 11 月 24 日），《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第 437-438 页。

鄂豫皖中央分局的使命是加强中央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分局领导人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等确实发现鄂豫皖红军中存在很多严重纪律问题。更为严重的是，红军在南下行动中公开召集大会对抗分局的领导，严重违反了“党指挥枪”的组织原则。再加上当时政治派别错综复杂，经常出现叛变，于是肃反就成为整肃纪律、强化组织的重要手段，鄂豫皖苏区的白雀园肃反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六届四中全会后上台掌权的留苏派，虽然由于他们的经验不足和教条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很大损失，但是他们在严密党的组织纪律和加强红军的正规化建设上，还是做出了相当的努力，而组织严密的党和军队正是革命成功的最重要条件，因此留苏派在中国革命史上的作用，也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 第十章 湘鄂西中央分局与夏曦四次肃反

中共中央在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派重要干部到苏区建立中央局、中央分局，强化对苏区和红军的领导。1931年春夏之交到湘鄂西苏区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后，由于经验认识的差别，由于对权力分配的歧见，由于领导能力的不足，甚至由于个人品格的缺陷，与开创苏区的地方领导人万涛、段德昌、贺龙等发生了激烈冲突。万涛等违反组织原则，发动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的活动，在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几乎成功，但在中央干预下最终失败。为维护领导地位、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夏曦发动了残酷的肃反，前后约三千人被捕。夏曦领导能力严重不足，无法象张国焘那样在肃反后建立牢固的权威，以至于勉强维持领导地位，在1932-1934年间先后四次肃反，湘鄂西重要干部大多被杀。夏曦直接领导的肃反杀了大约几百人，多数是干部，贺龙回忆中说上万人被杀是夸张的，或者是用了比较宽泛的统计口径。

湘鄂西肃反主要发生在1932年5月到1934年6月，苏区失败和激烈动荡的战争环境使得相关史料保存很少，只有少数档案和多年后的回忆。本章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尽量收集相关材料，重建基本历史事实。同时，笔者也尝试突破两条路线斗争为主线的简单分析框架，试图通过中共努力建立集中统一的组织结构、并由此引发激烈权力冲突的角度，重新探讨湘鄂西苏区肃反发生的深层原因。

### 一、中央分局成立前的湘鄂西初期肃反

蒋介石在1928年控制南京政府后，拥护汪精卫的部分国民党左派成立了改组派，从事既反蒋也反共的政治活动。国民党左派曾在武汉建立政府，因此改组派在武汉附近地区比较活跃。在1932年夏曦领导的大肃反之前，湘鄂西苏区就有针对改组派的斗争，这些初期肃反规模也不小，但手段还比较节制。

改组派是大革命时期与中共较为接近的国民党左派，不少人与中共党员私交不错，他们确实曾尝试与红军合作，甚至想渗透进红军内部。1930年，湘鄂西特

委在“六军中发现了改组派组织，已枪毙了几个分队长、兵士，据探的消息，里面已有三十余人的组织。”<sup>1</sup>沔阳县委提到，改组派“在团防里面有一部分的活动，尤其是商团，一方面利用脱党的份子与我们党内接洽合作、同盟，收编我们的红军，帮助红军子弹和经济等等的可笑举动，他们想利用这种种方法以混入红色区域里面来活动。”<sup>2</sup>

1930 年，湘鄂西苏区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肃反，被逮捕的有 500 多人，但审问发现多数只是自称改组派，并不是真正的改组派，后来以自首的形式释放了。湘鄂西团组织报告称：“现在鄂西闹的最凶的，便是改组派的问题。经我破获改组派的审讯结果”，“他们所组织的，大半是被党团所处罚不满意党团的分子，不过他们曾在外面受到改组派一点影响，他们以为改组派是反党的，他们反党就是改组派，所以有许多不知改组派是什么，只觉我是反党的，就是改组派，而自己承认。现在如各处捉到一个改组派来审讯，便要供出许多人，以鄂西江、石、监、沔各县来计算，现以改组派的罪名而被押的，已有五百多人。党对这一问题的决定，采取自首政策”。<sup>3</sup>

当时农村革命骨干大多是没受过教育的年轻贫农，他们革命勇敢坚决，但也难免有简单粗暴的缺点，这是后来肃反扩大化和发生各种残暴行为的群众基础。沔阳县委报告鲜活地表现出这一点：“自中央“八七”会议以后，沔阳党完全走于盲动，发展的党员亦未有深刻的训练，那时候忙于烧房子、杀人、绑票的紧张工作里面，也无有功夫来训练同志”。“他们都是自称为活阎王，谁不是威严赫赫，群众都呼为爹爹们，同志们听得这种名词，也感觉非常荣誉和愉快，结果就成了群众中的特殊阶级，每一个党员在群众中都成了阎王地位，高呼一声，群众就俯首应喏，只怕连头也不敢抬吧！”<sup>4</sup>

1931 年，湘鄂西苏区继续有针对改组派的肃反斗争，但规模不大。中央分局 8 月报告提到：“最近破获改组派甚多，逮捕数十人。从前二军中在此下级干部多已加入，并牵及红军中干部一、二人。现在一方面加紧反改组派宣传，一方面正在严格审讯。惟改组派在湘鄂西有较大组织，不可否认。黄极会、白极会等，亦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特委给中央的报告》（1930 年 6 月 10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中央、湖北、湖南档案馆 1987 年版，第 342 页。

<sup>2</sup> 《中共沔阳县委报告》（1930 年 11 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第 406 页。

<sup>3</sup> 《团湘鄂西第二次代表大会主席团致团中央的信》（1930 年 12 月 18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3），第 43 页。

<sup>4</sup> 《中共沔阳县委报告》（1930 年 11 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4），第 409 页。

系改组派领导，最近在消灭这些组织颇有成效。”<sup>1</sup>宋盘铭在 11 月的报告也提到：“党内还存在有少数阶级异己分子、敌人，如改组派这种分子潜伏在党内，在潜江还发现过党的区委秘书和区政府的秘书是改组派，被破获了，还有党区委负责的同志也是改组派的暗探。这样看来，在党的组织内潜伏的反动分子还是有的”。<sup>2</sup>总之，在 1932 年以前，湘鄂西苏区肃反斗争已经开始，但在革命阵营内部影响还不算很大。

## 二、万涛等推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的尝试及失败

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徐锡根成为政治局正式委员，夏曦是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央派他们去湘鄂西苏区，本来是徐锡根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任省委书记，与鄂豫皖苏区张国焘和沈泽民的搭配类似。1931 年 5 月 31 日湘鄂西分局报告提到：“锡根同志来说，中央决定此间另组织湘鄂西省委，中央分局另行组织，锡根任中央分局书记，夏曦任省委书记”，“锡根同志第二次申明书未见。他近两月来政治态度若何，请中央稍为通知。但是我们因为信仰中央，对锡根同志口头传达之组织改变，我们完全执行。”<sup>3</sup>

徐锡根参加了罗章龙派分裂活动，虽然后来退出，但也很难再得到信任。1931 年春夏之间，顾顺章、向忠发等接连叛变更加快了工人干部的失势。徐锡根不久即被调离湘鄂西苏区。宋盘铭报告提到：“中央从前决定要锡根同志负责，但锡根被派到江右去了，以后又生病，实际上是没有做多少工作”。<sup>4</sup>对徐锡根的怀疑是有道理的，他果然在 1932 年叛变，为国民党特务机关工作，抗日战争期间给中共南方党组织造成重大损失。

夏曦 1931 年 3 月到达湘鄂西，先建立起中央分局，担任书记。当时远东局决定派夏曦去湘鄂西还有特殊原因，他是“贺龙的私人朋友，因此把他派到那里

<sup>1</sup> 夏曦、杨光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8 月 18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78 页。

<sup>2</sup> 宋盘铭：《宋盘铭关于湘鄂西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739 页。

<sup>3</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5 月 3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644-645 页。

<sup>4</sup> 宋盘铭：《宋盘铭关于湘鄂西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742 页。

去也是好的。”<sup>1</sup>徐锡根 5 月到来，但又很快离开，夏曦坐稳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的位置，成为湘鄂西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人。但从实际结果看，夏曦的经验和才能都不足以担当这样重要的责任，领导能力不足和加强领导的任务之间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是湘鄂西连续四次肃反的重要原因。

夏曦领导能力不足从他刚到苏区就表现出来了，有时悲观失望，有时犹豫不决，引起了段德昌等重要干部的不满。“段德昌率九师打周老咀和老新口两个据点，准备把周老咀、老新口、新沟咀联成一片。正当九师节节胜利向前发展之际，夏曦在周老咀把伤病兵遣散了，段对夏这种做法表示不满意，批评夏曦同志是退却逃跑和悲观失望，并说这种情绪会把苏区搞失败的。”<sup>2</sup>夏曦“每次会一晚开不完，因此有些同志都怕开会。有的说：‘夏曦又要念经了。’的确，夏曦顾忌很周到，但正因为太顾前顾后顾左顾右了，所以每每遇事不决，或决而重变”。“军事长官（九师师长段德昌等）对夏曦不满”，段德昌气愤地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了个邓中夏来，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了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sup>3</sup>

1931 年秋天，湘鄂西围绕九师行动、三军错误、发展方向等发生激烈争论，以万涛为首的多数地方干部对夏曦的不满爆发了，严重的对立情绪使万涛等违反组织原则，策划了自下而上推翻夏曦领导地位的行动，而且行动显然得到了贺龙等军队干部的同情，这一事件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起因。

### （一）围绕“九师行动”和“三军错误”的激烈争论

1930 年 12 月，湘鄂西主力红二军团在澧州和松滋杨林寺遭遇惨败，被迫脱离洪湖核心区，在邓中夏、贺龙带领下先向西、再向北，撤到鄂西北山区房县一带，红二军团缩编为红三军，原二、六军缩编为七、八师。但是原六军军长段德昌留在了洪湖，他收集伤病员和在杨林寺打散的红军余部，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又建立起九师，成为洪湖苏区新的主力红军。为了壮大革命力量，苏区一直希望红三军返回，夏曦 1931 年 6 月写信给贺龙：“三月间，中央派我到湘鄂西及二军

<sup>1</sup> 《雷利斯基同忠发和周恩来谈话记录》（1931 年 2 月 19 日于上海），《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0），第 87 页。

<sup>2</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52-653 页。

<sup>3</sup> 庄东晓：《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4 年 1 月 23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374、363-364 页。

团工作，代理中夏同志职务”，“亟盼你率队回来指挥湘鄂西整个军事行动，务希依照中央分局决定执行”。<sup>1</sup>

1931年夏天，长江中游发生了历史罕见的大水灾，湘鄂西苏区陷入严重困境。长江以北的苏区主体绝大部分被淹没，吃饭都困难。长江以南情况好些，但是秋收时可能面临敌人抢谷的危险。九师原计划过到江南，后来觉得太冒险，最终决定向北发展。夏曦、杨光华8月报告中提到：“监利、沔阳、汉川、江陵苏区（江左全体苏区）百分之九十五被水淹没，一片汪洋，如困大海，灾民近百万。江右亦淹没一部分”。“华容苏区情形严重，正在秋收，敌人×有乘机抢谷之势。江右我×只有三百左右，尚可发动游击战争，所虑者敌人掠夺谷米而去。九师原本准备渡江右，因水势涨，而且作战没有把握（过江右只能胜利，败则无退路，水势更涨，更经危险），因此，中止过江。在江左苏区，红军已成饥军（有十来天没有吃饭，吃的杂粮），因此决定移师潜江、天门，并消灭徐德佐旅。”<sup>2</sup>

1931年8月2日，湘鄂西军委做出《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决定由万涛带领九师主力向北部潜江、天门进攻，扩展苏区。“九师目前唯一的任务就是在巩固和扩大苏区的原则之下，保存红军基本实力的条件之下图军事上的发展，因此决定以二十五团巩固后方，二十六团向潜江、天门发展。二十六团的具体任务是：1、最主要的任务首先必须以极大决心给徐德佐旅以严重打击，消灭其实力，击破敌人‘围剿’我们之一方。2、发展潜江、天门游击战争（从夺得敌人武装中分一部分武装给当地农民），并使潜江、天门与监利、沔阳、汉川边区联成一片。3、尽可能的占领天门，巩固这一区域。4、保证随时（在后方有必要时或前方失利时）可以回到赤区。5、保持与后方之一定的交通线，以便输送和取得政治消息与指示”。“军委主席万涛同志到部队中去指挥一切工作，他对于一切政治、军事有最后决定权。”<sup>3</sup>

万涛是湘鄂西苏区重要创始人之一，此时被任命代替邓中夏担任三军政委，和段德昌一起率九师主力出征，拥有最后决定权。在出发前的谈话中，夏曦提到北进过程中如能联系贺龙，就争取让三军回来。如果三军主力返回，湘鄂西红军

<sup>1</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给云卿的信》（1931年6月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647页。

<sup>2</sup> 夏曦、杨光华：《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8月18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87-88页。

<sup>3</sup>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关于九师最近行动的决议》（1931年8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673-674页。

壮大几倍，形势必然大为改观，这显然也是重大任务。此时夏曦对万涛很信任，对地方干部也比较尊重，他在 8 月给中央的报告提到：“三军政治委员我不能兼顾，中央分局决定派万涛同志担任，他已随九师出发。万涛，四川人，由湖北省委派到洪湖工作已两三年，去年任二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在特委任组织部长，现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主席团三人，即贺龙、夏曦、万涛）。他前曾到过中央，恩来同志大概认识他。就此间同志说，以他为适宜。请中央批准。”<sup>1</sup>

九师北进相当顺利，“八月十五占领潜江城，一部于十七日占领沙洋，一部于二十一日占领荆门。徐德佐旅已消灭二团。潜江已成立革命委员会。我们计划将鄂中钟祥、京山、天门、潜江、荆门各县造成赤区，南与汉川、沔阳、监利老苏区打成一片，北与鄂北特委取联系，东与鄂豫皖联络，西与三军取联系，在军事上颇有把握。”<sup>2</sup>但是，九师占领沙洋以后，得到了三军的消息，临时决定改变原来向东进攻天门的计划，转而向西进攻荆门，希望联系上红三军。经过一些曲折之后，九师 9 月 28 日在刘猴集与三军会合，传达中央指示后，和三军一起返回了苏区。综观九师北上行动，确实由于把重点转到联系三军而放弃了开拓天门的任务，但是毕竟打了胜仗，重创了徐德佐旅，用缴获的武器扩大了一个团（27 团），并且接回了红三军，使苏区红军增加了数倍，总体上是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

但是夏曦的看法却大不相同，据杨光华回忆：“省委得知红三军主力回洪湖的喜信，我（当时任临时省委代理书记）找来团中央代表宋盘铭同志和省苏维埃主席崔琪同志商量，由军委和省委共同主持召开一个声势浩大的军民联欢大会”。 “我们三人商量妥当后，满怀喜悦地去请示中央分局的夏曦，令人扫兴的一去了就碰上夏曦大发雷霆。我们问其原因，夏把万涛的报告向我一扳说：‘你看，把中央分局、军委主席团、省委都当成他的后勤部，岂有此理！’”。 “次日听说夏曦到前方去了。第三日万涛同志从前方回来，持中央分局兼军委主席夏曦的命令和派遣信来到省委，说夏曦派他回来做省委宣传部长工作，代理三军政委被撤职。”

<sup>3</sup>

夏曦的不满大概来自两个方面，首先九师北进确实未能按计划完成扩张苏区

<sup>1</sup> 夏曦：《夏曦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8 月 27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91 页。

<sup>2</sup> 夏曦：《夏曦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8 月 27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90 页。

<sup>3</sup> 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723 页。

的任务。夏曦发现在前方将领自作主张的情况下，在后方很难指挥红军，这与宁都会议上任弼时、项英等对毛泽东的不满类似。此时夏曦已决心亲自领导红军，因此一定要夸大九师错误，把万涛撤职。其次，江南苏区秋收时遭到敌人蹂躏，中央来电责问。本来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保卫江南苏区几乎不可能，夏曦本可如实汇报，但他却把责任推到万涛带九师北进脱离苏区。这样没有担当的领导作风很难赢得下级的尊重，显示出夏曦缺乏领导人应有的气度。

夏曦到前方和红军会合后，给自以为得胜归来的九师领导当头一棒，宣布处分决定：“九师打下沙洋后，即违反省委决议，实际是脱离苏区不要后方的冒险轻进的行动。万涛、德昌、培英同志应负责任，现由军委会公开明令撤销万涛同志政治委员之职，调后方工作，德昌、培英两同志予以警告。”<sup>1</sup>同时，夏曦对刚回苏区的三军也提出严厉批评，并且宣布改组三军，取消军部、师部，编为五个大团，干部降级使用，这些不成熟的举措引起各级干部强烈不满，也使夏曦陷入孤立境地，双方产生了强烈对立情绪。

三军军长贺龙对夏曦的批评很不服气：“夏曦说我们（彭之玉带的材料）南下是一贯错误，这是没根据的。我们当时主要是肃清立三路线，到苏区才个把月，打了胜仗，什么‘一贯错误’？但他们却只批评”。“他指使省委决定把整个部队编为五个大团，取消军部，所有干部一律降级。我即与夏争论，我说：省委无权决定，我是中央分局委员，军委副主席。是分局领导省委？还是省委领导分局？你们凭什么决定？这个决议是错误的。我可以不执行的，我又说：请召开个党员大会，大家投票，如果赞成你，我回中央去。”<sup>2</sup>

九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的处分也很不满。“九师出去时只有一个多团，回来时又扩大了一个团，这些功绩夏曦一概抹杀，并令省委作出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挑起他们反对段德昌（省委当时有杨光华、彭之玉、崔琪、马武等人）。主要争论是关于江南失守，也联系了立三路线和退却逃跑。段德昌不同意这个决议，他责问夏曦说江南苏区失守是你的事还是我的事？部队可以调你为什么不调？你谈话在先，决议在后，你谈完话我们就走了，怎么怪我们？况且当时平地皆是水，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0月15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123页。

<sup>2</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二七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2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48页。

在襄河两岸怎么开展游击战争？夏曦同志无言以对。”<sup>1</sup>

夏曦与多数红军干部发生了严重对立。贺龙说：“实际上他是与整个新前委争论，新前委有万涛、刘鸣先、孙德清、段德昌、陈培英和我，万涛任书记。在竹根滩打了六天仗，就争论六天，部队无人指挥。会上党的同志、军事干部都批评夏曦”。“我说我是军分会主席、三军军长，可是省委却可以随意作出决议取消军部、师部，你说是执行不执行？你谈话和决议是两个东西是不是阴谋？江南失守是谁之过？处分了段德昌又不去通知他对吗？三军南下错在那里？我说你来洪湖才几天，地形不熟，与红军关系不深，与群众不熟，组织三军前委不要万涛同志参加是非驴非马的组织，你给所有干部以处罚，今后怎么再与他们见面。你办的几件事，那一件是有党性的对得起党的”，“夏曦在当时是十分孤立的”。<sup>2</sup>

万涛对夏曦的不满是最激烈的，他以三军政委名义率九师主力 26 团北进，回来时不仅九师扩大一个团，还把三军主力七、八师都带回来了，苏区军事实力大增，自以为功劳不小，结果却遭到羞辱性的撤职处分。万涛被赶出红军、回到地方后，在省委会上听夏曦的爱人谭国甫提到“中央由于东山失守的真象不明而问夏曦的电文，以及夏曦对中央复电的电文（谭国甫管电台，翻译电码）”，了解到夏曦在江南失守问题上推卸责任，他的怨愤更加激烈了。<sup>3</sup>

万涛不仅公开表示对处分的不满，还把官司打到了中央。他 10 月 18 日写信给中央：“出沙洋，折入京山，造成天门的赤区，这固然是军委的决定。要与三军取联系同样是军委的决定”，“事实上，九师不去取联系，三军绝对不会下来的”。“夏曦同志对二十五团负责同志说：‘不要提九师了，九师反革命了！’”“反革命的罪名，我是绝对不承认的。”<sup>4</sup>10 月 25 日，万涛再次致信中央：“关于九师行动问题，十月十九日在潜江举行省委谈话会（因省委代理书记未到会），完全同意了我书面报告上的意见”。“我们承认在沙洋时急于去联系三军，放松了主要任务是错误的。但其他非事实的罪名，我们在未了解以前是不承认的”。“我请求中央

<sup>1</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53 页。

<sup>2</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53-654 页。

<sup>3</sup>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724 页。

<sup>4</sup>万涛：《湘鄂西万涛关于九师行动的报告》（1931 年 10 月 18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131-132 页。

根据最近各种材料作出结论”。<sup>1</sup>

## （二）万涛发动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

在“九师行动”争论尚未平息的情况下，1931年11月因在红军的发展方向上出现新的分歧，万涛发动地方干部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其根本目的是推翻夏曦的领导地位。

洪湖核心苏区虽然群众条件很好，但是距离武汉很近，水路交通发达，利于敌人进攻，而不利于防守，洪湖苇荡虽能隐藏游击队，却很难容纳万人以上的主力红军。红三军讨论是否回洪湖时就有人认为，洪湖地区“湖港纷岐，大部队难以展开，大部队当然不能躲藏，躲藏是自取灭亡”，“不顾一切冲入江、石、监、沔赤区，无异是自投罗网”，“从井救人，人固不救，救者亦死”。<sup>2</sup>红三军回洪湖一年就不得不再次突围撤出，证明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事实上每次只要国民党内部停止派系战争，湘鄂西苏区就会很快遭到围攻而失守，这个区域在客观条件下是难以长期坚持的。

当面临敌人新的围剿时，段德昌提出向北部山区发展，这个建议得到了夏曦的支持。从湘鄂西红军一次又一次被迫上山才能生存的事实来看，这个发展方向是比较符合实际的。当然，红军主力离开意味着洪湖苏区再次遭到敌人蹂躏，这是苏区地方干部和群众最不愿意看到的。因此唐赤英向省委传达红军决策时，引起万涛等地方干部强烈不满，他们把矛头直指夏曦，掀起了批判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运动，进而到中央告状，力图推翻夏曦。

据省委书记杨光华回忆：“夏曦派唐赤英（军委参谋长）到省委来传达前方的意见，省委才召开常委会议，听取唐的传达，唐出人意外地说出了中央分局、军委关于反第四次‘围剿’的决定，要把红军主力拉到鄂豫边区去，洪湖只留游击队和敌周旋，还说省委是否搬家的问题，特来征求省委的意见。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感到惊奇，还没有来得及仔细考虑时，万涛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就骂：‘娘的，邓中夏把红军主力带走，搞逃跑主义，害得我们好苦啊！夏曦又要搞逃跑主义，把红军主力带走，让我们再吃立三路线时的苦头！难道中央代表都是这样帮倒忙

<sup>1</sup> 《湘鄂西万涛为九师行动问题致中央信》（1931年10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737页。

<sup>2</sup> 《红三军经营荆当远新根据地的计划》（1931年4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636页。

的吗？’”<sup>1</sup>

省委干部提出反对意见后，夏曦基本放弃了原来的想法。但是万涛并未善罢甘休，发动了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的斗争，在中央分局和省委联席会议上又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清算夏曦右倾逃跑主义路线问题，被万涛弄的满城风雨。湘鄂西的领导干部，听到夏曦要重复邓中夏右倾逃跑主义路线，无不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一直闹到召开由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在联席会议上，万、夏发生了激烈争论”，“尔后就一直闹到诉之于中央，两次派人到中央打‘官司’。第一次，中央分局和省委共同指派宋盘铭同志去中央，万涛控诉夏曦的罪状是：（一）夏曦不执行并违反中央的路线，自己搞一条右倾逃跑主义路线；（二）关于九师行动的决议问题，欺骗中央，事后又对九师及万涛同志的错误处理问题，省委对他进行了批评；（三）中央分局、省委联席会议决定，不同意夏当三军政委，应回分局主持全部工作，要求中央派人来，担任三军政委”。<sup>2</sup>

万涛趁夏曦与贺龙率军到前线的机会，11月20日组织召开省委扩大会议，试图利用地方干部的不满情绪，自下而上否定夏曦的领导，从中共当时的组织原则来看，这几乎是一次“造反”。“会前关于夏曦要抛弃洪湖根据地的意见，已传到各地党部”，“讨论最热烈的问题还是军事问题。第一个是夏曦想抛弃洪湖根据地，第二个是右江失守的问题”。“扩大会并一致同意调夏曦离开军队，决定魏士筠来中央报告一切”。“扩大会后，各地充满了对夏曦的不满，同时中央分局的威信大大降低。省代会前和他由部队回后方后这一时间中，夏曦的信仰差不多扫地”。

<sup>3</sup>

省委在扩大会议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对夏曦提出严厉抨击，实际上は要求中央撤换夏曦：“这次省委扩大会议（十一月二十日），关于中央分局的领导问题，争执甚烈，各地到会的代表，绝大多数对中央分局的领导公开表示怀疑”，“他们大多数一致的意见，认为：夏曦同志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有的说是一贯的取消主义”。“夏曦同志在红军中的领导，省委认为不适宜的，曾托宋同志向中央报告，同时红军中一般干部均对军部不满，当然对夏同志的信仰也很低，请中

<sup>1</sup>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4-725页。

<sup>2</sup>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5-726页。

<sup>3</sup>庄东晓：《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368页。

央迅速解决这一问题。至于夏曦同志在中央分局的领导，省委没有具体意见，的确他有些观点是成问题，请中央酌量解决。但现在中央分局事实上早已没有了，中央须派人来建立和加强对湘鄂西党的领导。”<sup>1</sup>

省委在万涛影响之下 12 月 1 日做出了关于九师行动的新决议，推翻夏曦原来的处分决定，这等于是下级公开对抗上级。省委决议称：“省委起初未看清九师行动的错误，自己应负主要责任，而把一切错误归于九师负责同志和万涛同志的身上。同时不去考究事实，竟凭空提出许多非事实的批评”，“当时撤销万涛同志政委职权是不正确的”。“组织前敌军委，不要政委参加，更是不正确的，这是破坏了红军政委制度，这是儿戏的处理军事。同时决定九师同志的处罚，又不当面宣布，这是非布尔什维克的组织方式。”<sup>2</sup>

扩大会议前，省委已经派出宋盘铭到中央告状，宋盘铭在上海写了报告，其中提到：“最近有很多的争论，主要的是三军出去不出去的问题。在潜江失败后，夏曦就提出向外发展，红军的主力到京山去，可以把鄂北作后方去造新的根据地”。“省委大多数的同志认为这样是退却的意见，我们是不同意的”，“我提议一定要很快的加强湘鄂西中央分局的领导。”<sup>3</sup>扩大会议后，万涛等认为宋盘铭还没有掌握最新情况，于是又派省委秘书长蔚士钧到上海，要求他务必说服中央处理夏曦。

### （三）万涛等试图在湘鄂西四大推翻夏曦，但在中央干预下失败

1932 年 1 月 22 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在监利周老咀召开，大会代表 127 人，代表湘鄂西苏区两万多名党员。万涛、潘家辰等反对夏曦的人显然在会前有充分的联络，贺龙等高级将领也支持他们，这次大会在前期成了声讨夏曦的大会，夏曦的领导地位在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自下而上推翻夏曦的计划接近成功。

夏曦作为中央分局书记、湘鄂西党的最高领导人，在刚开会做了 6 个钟头政治报告以后，接下来两天始终处于遭围攻的境地。当时“空气紧张到极点，大部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的报告》（1931 年 12 月 3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747-748 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九师行动结论的决议》（1931 年 12 月 1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150 页。

<sup>3</sup> 宋盘铭：《宋盘铭关于湘鄂西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1 年 11 月 22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一），第 744 页。

分是对军事问题对夏曦的不满。”<sup>1</sup>“部分同志反夏曦同志的情绪，加之潘家洵派别分子的从中活动，将政治问题中心完全集中到夏曦同志是主张‘退却路线，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一点上，要夏曦同志承认这一错误”，夏曦始终“受到严重的攻击，政治问题讨论的三天中完全在闹这些问题”。<sup>2</sup>“到会代表几乎一致批评夏曦，有七十多个人向夏曦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如土改侵犯中农利益，地主杀全家，富农送出苏区，发展苏区、江南失败、军队改编、处分整个红军、打老新口时遣散伤员及地方干部等等，把夏曦同志整的没有办法。下面拍桌子，夏在上面像死人一样。”<sup>3</sup>

大会原计划第四天上午做结论，一共 127 名代表，公开发言批评夏曦已经有 70 多人，没发言的还有不少，反对夏曦的远远超过半数，可以想见大会将做出怎样的决议。但是在大会的第三天，到中央告状的蔚士钧和中央代表关向应赶到，他们带来的中央精神使形势发生了戏剧性的大逆转。

在中共中央看来，虽然夏曦的领导有不成熟之处，但万涛、潘家辰等自下而上推翻中央分局领导的错误更大，因为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中共集中统一的组织体系。作为一个列宁主义的革命党，依据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等原则建立的严密组织体系是中共力量的源泉，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是不容挑战的。中央从 1931 年 1 月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试图加强对苏区的领导，夏曦是中央分局书记，是代表中央来领导湘鄂西的，万涛、潘家辰等推翻夏曦的尝试，自然被当作对抗中央、违背组织原则的严重错误。

1932 年 1 月《中央给湘鄂西党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可以看作对万涛等的回答，中央虽然认为夏曦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但强调组织原则不允许有任何质疑：“中央分局的组织是中央在四中全会后加强对苏区领导的一种方式。现在许多光荣的胜利，已经证明这种领导方式的伟大成功。同样在湘鄂西亦已表现他显著的成绩。中央分局是中央的代表机关，他代表中央直接指导苏区工作，他在苏区有最高的权力”。“中央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只有中央分局才能保证湘鄂西党真正去执行国际和中央的路线，他无条件是应当而且必须存在，怀疑中央分局的的路线与

<sup>1</sup>庄东晓：《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4 年 1 月 23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369 页。

<sup>2</sup>《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 年 3 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302 页。

<sup>3</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54 页。

组织的正确性，甚至提议取消中央分局是极端严重的错误”。<sup>1</sup>

大会在蔚士钧和关向应赶到后休会了一天半，主要由关向应、蔚士钧、夏曦召集高级领导人传达中央精神。大会重新开会后，形势完全逆转，其中蔚士钧对万涛的揭发和他报告在上海思想转变的过程起了关键作用，蔚士钧的角色类似1929年“朱毛之争”中去上海汇报并转变思想的陈毅。“蔚士钧说：派我去中央是万涛挑选的中间人物，但动身之前万对我私下吩咐，去控告夏曦，务必得到中央处理夏曦的决定。我把万的要求向中央讲明以后，中央认为万涛指控夏曦是别有用心的，为此留我在中央受训，使我提高了认识，明辨了是非，明白了万涛反对夏曦就是反对党中央。中央派我回来揭露万涛的反党阴谋，我向大会表示，我受了万涛的影响，经中央教育后，坚决与万涛的反党行为划清界限，争取做一个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sup>2</sup>

关向应是另一个起到关键作用的人，他是政治局候补委员，直接代表中央，为了维护湘鄂西中央分局的威信，他来给级别较低的夏曦当副手。“关说：中央认为以万涛、潘家辰为首的小宗派反党活动，是反中央的，反国际路线的阴谋活动，中央命令立即制止这种反党行为，不许用任何理由加以辩护，以免混淆是非，从而维护党的统一领导，这是我党更加布尔什维克的崇高纪律。中央号召湘鄂西党在中央分局统一领导下，对反党分子进行严肃批判，给予无情打击。这个命令一宣布，会场气氛大变，从反夏曦一变而为反万涛、潘家辰。杨成林在主席台上更是把万涛、潘家辰骂得狗血淋头。贺龙同志在主席台上没有发言”。“最后，通过了夏曦的《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政治报告和《为党的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决议”。<sup>3</sup>

会后省委向给中央详细报告了大会逆转的经过：“第四天上午准备做结论，恰好关同志及魏士筠同志已到会场”，“即宣布停止会议。当晚由夏、关二同志召集万涛、光华、崔奇分头个别谈话，指出反中央分局及派别分子潘家洵企图从中活动”。“次日上午，由中央分局关、夏、宋、贺四同志召集主席团及旧常委光华、崔奇、马武，杨成林、温荣亲、彭之玉各同志开会”。“这次开了一天，次晨召集

<sup>1</sup> 《中央给湘鄂西党中央分局和省委的信》（1932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第77页。

<sup>2</sup> 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7页。

<sup>3</sup> 杨光华：《湘鄂西党的‘四大’前后》（1981），《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27页。

全体旧省委及全体主席及各地总代表开一会议，关于同志中进行反中央分局斗争问题及同志中的错误”。“万涛同志在这次会议中的报告，承认错误的程度很不够。在这次会议中又重新指出万涛同志的态度的错误，继续进行大会，先由光华、崔奇、之玉、士筠等同志说话，向大会报告这一斗争内容及揭发反中央分局的错误”，“潘家洵同志不但不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企图在大会上反攻，漫骂这般自动承认错误的同志是卑鄙，诬害”。<sup>1</sup>

万涛、潘家辰等推翻夏曦的计划在中央干预下失败，《中共湘鄂西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对万涛、潘家辰等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万涛同志以领导者的地位在自己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在扩大会议开始向中央分局作复仇的斗争，采用两面派的手段来反对中央分局，企图将省委与中央分局对立，团结了反党的分子（如潘家洵），用种种谰言去动摇党和红军领导”。“万涛同志根据自己不正确的观点去反对中央分局正确的领导，去作复仇的斗争，完全是反党的斗争”。“万涛同志在大会的表示是不够的”，“特别是潘家洵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sup>2</sup>

四次大会后，夏曦、宋盘铭于 2 月 25 日给中央写了报告，特别强调“潘家洵在大会完全没有承认错误；万涛承认亦不彻底。”<sup>3</sup>3 月 8 日，夏曦又发表文章，抨击“万涛同志自己影响之下，团结了一部分同志（如尉士均、彭国才、李良耀、栩栩等同志），大呼特呼中央分局是一贯的取消主义的领导，省委书记是调和派。万涛、潘家洵同志反又用两面派的手段来掩盖是反中央分局斗争的领导者”。“省四次代表大会在中央指示之下，揭露了万涛同志的保守主义”，“万涛同志还不肯承认自己承认的错误。”<sup>4</sup>

在决议、文章和给中央的报告中，夏曦反复强调万涛、潘家辰没有完全承认错误，联系到四次大会转向批判万涛、潘家辰后，贺龙并未发言表示支持。很显然，夏曦并不认为在四次大会上获得了彻底的胜利，湘鄂西党内斗争的已经终结。相反，夏曦认为反对他的人并未真正服气，只是被迫服从中央的权威，事实也确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给中央工作报告》（1932 年 3 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302-303 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省第四次代表大会政治任务决议案》（1932 年 1 月 27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 219-220 页。

<sup>3</sup> 夏曦、宋盘铭：《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2 年 2 月 25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150 页。

<sup>4</sup> 夏曦：《中共湘鄂西省委扩大会议的政治错误》（1932 年 3 月 8 日），《红旗》副刊《布尔塞维克》第一期，《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170-171 页。

实如此。因此，从“九师行动”和“三军错误”争论开始，中间经过省委扩大会议和四次代表大会，直到后来的残酷肃反，是一场连续的党内斗争。肃反扩大化不是偶然发生的，贺龙说得很清楚：“三军回洪湖后的一些问题的争论是四大会上的争论和‘肃反’杀人的根子。”<sup>1</sup>

### 三、夏曦领导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

湘鄂西肃反是在中央指示推动下展开的，1932年1月中央专门作出关于肃反的决议，一方面强调要“最坚决”、“最无情”的开展肃反；另一方面也提醒防止像中央苏区特别是闽西那样肃反扩大化。决议提出：“要从最坚决的阶级立场上，把一切阶级的异己分子从党内苏维埃内与职工会内洗刷出去。要最无情的对付一切反革命团体的领导分子”，“必须用很大的决心，成立政治保卫处，有计划的与有组织的同这种反革命团体做斗争。”决议同时也强调：“我们绝对要防止夸大这些反革命团体的力量”，“对于他们内部的领袖与群众，应该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罚他们，应该把主动与被动者严格的分别开来。”<sup>2</sup>

湘鄂西苏区肃反是从地方开始的，中央分局在1932年4月决议中强调不要扩大化、最好不用刑审、允许自首、县级没有杀人权。决议称：“湘鄂西党对于肃反工作还没有明确的工作路线，表现着许多错误和弱点”，“对付反革命斗争的方法，没有思想的斗争，没有系统的检查，只是逮捕和拷打、枪决，而且没有根据的乱捕、乱打、乱杀。对于怀疑党、苏维埃策略的，甚至对于批评党、苏维埃的，就以反革命对待，造成群众中的恐怖心理”。“有时夸大了反革命团体的力量，把一切消极怠工的分子、犯错误的分子都怀疑是改组派，造成一种恐怖状态”。

“目前必须采用下列的办法”，“立刻颁布自首条例及苏维埃的被欺骗加入反革命团体自首的传单，号召自首”，“各县政治保卫处不准处死刑，最好不用刑审。”<sup>3</sup>

湘鄂西军委4月发出改造红三军的训令，肃反运动进入红军。训令称：“中

<sup>1</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58页。

<sup>2</sup> 《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1932年1月1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11-12页。

<sup>3</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党在湘鄂西苏区同反革命团体斗争决议》（1932年4月16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196-198页。

央苏区的富田事变和红四军肃反的教训，很严重的教训了我们，各种反革命的派别，如改组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托洛斯基派、罗章龙派，他们总是想打入红军和破坏红军。他们破坏红军的方法是组织拖枪到白军去，泄漏军事秘密供给白军，在火线上打死自己的人，故意造谣动摇军心，故意打败仗来牺牲战士，违抗上级的命令”。“我们从前在二军团时代曾经破获过一批改组派，同时我们三军内拖枪到白军去的也间或发觉，并发生有连长拖枪的事。我们也发觉有个别反革命分子利用我们经济的困难来煽惑我们的战士，想来瓦解我们红三军，帮助着徐源泉的进攻。因此就不能说红三军中没有反革命的活动，我们大家必须估计到反革命分子在部队中的捣乱”。<sup>1</sup>

5月，肃反愈演愈烈。据杨光华回忆：“襄北在天门、汉川县委所在地捕获了一个敌军营长名张锡侯，经过审讯，他供出天汉县委军事部长杨国茂是他们同伙，张又供出八师参谋长胡慎已。夏曦以军委主席团主席身份，命令在前方组织军事法庭，并任命朱勉之为军事法庭庭长。”<sup>2</sup>贺龙说：“红三军的‘肃反’是军部住在吴堰岭时开始的。红八师的特务队长犯纪律——杀鸡、杀牛吃，关向应同志把他捉来一整，他承认了是‘改组派’，第二天就捉了胡慎已，这时后方的‘肃反’已经大规模展开了。‘肃反’是后方先开始的。不久，军部回到洪湖，卢冬生同志的特务队就被调去周老咀专门看‘改组派’犯人去了。”<sup>3</sup>杨光华和贺龙的说法有一定差别，不过他们都认为胡慎已被捕是红军肃反开始的重要标志。

从5月到6月，夏曦“成立了一个警卫团，以罗统一为团长，直属军委主席夏曦指挥，逮捕了省政治保卫局局长彭国才，从前方调朱勉之带领在押‘犯人’到后方，调监利县委书记马武为政治保卫局局长，朱勉之为政治保卫局审判长，组织了新的政治保卫局机构而开始向省委进攻，逮捕了省委常委万涛。”<sup>4</sup>

肃反由政治领导人夏曦、关向应直接指挥保卫局进行，即使是军队中的肃反，贺龙等军事领导人也无权过问。贺龙说，夏曦“下令捉了孙德清，孙是在与我一同到七师师部时被捉的。同时被捉的还有七师的政治部主任孙之涛，孙是四大文

<sup>1</sup> 《湘鄂西省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关于改造红三军的训令》（1932年4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二册，第111-112页。

<sup>2</sup> 杨光华：《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1984年10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30-731页。

<sup>3</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57页。

<sup>4</sup> 杨光华：《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1984年10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31页。

豪之一。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文家墩战斗之后，在红三军中大肆捉人。”<sup>1</sup>

虽然中央分局 4 月决议里还说最好不用刑审，但肃反大规模展开后，实际上还是以刑讯逼供为主要方法。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杨嘉瑞回忆：“他们对我用了刑，将我的手拇指和脚拇指用很细的绳索扎了起来，放在一条板凳上，两头狠劲一拉，痛得我头昏眼花，接着就指问口供，要我‘自首’。我不肯‘自首’，他们就用皮鞭抽打我，将我打的昏死过去。醒来后，他们又拿出事先写好的名单，念一个，要我重复照念，这就算是我的口供了。这些名单绝大多数我不认识。”后来杨嘉瑞利用小便的机会逃跑，到抗日战争时期才重新归队。<sup>2</sup>

当时省委干部、潘家辰夫人庄东晓回忆：“每当深夜，所谓‘犯人’被打的呼叫声，吵得我几乎没有一夜能合眼，只有利用白天来补睡。一天中午，大概看守的人饭后休息去了，我朦胧中只见一个满身是伤似人非人的阴影在蠕动，这是谁？我几乎叫出声来，见他频频摇手示意，细看之下，才认出原来是红九师政委戴君实。他走前几步细声对我说：‘庄同志，您大概不要紧的，希望您能照着列宁主义的路线来发展中国党的事业！我是摧残党的，当打得我受不住、他们指着名单叫我认的时候，我那时昏了，我都认了，凡是我知道的和我听说过名字我都认了。’”<sup>3</sup>

杨成林本来是夏曦的支持者，但是他亲眼目睹刑讯逼供之后，竟吓得逃跑了。杨光华说：“我们派杨成林同志去监审。所反映的情况更是可恶已极，不但严刑逼供，还指名问供，各种毒刑无所不用”。“监审第三天，杨成林就告诉我说：‘不得了，他们要供到我们头上了。’谁知他留了一个条子给夏曦就跑了”，“上面写道：夏胡子，我杨成林决不是反革命，也绝对不作反革命，永别了！”<sup>4</sup>

大批红军干部被打为改组派，省委 5 月底向中央报告：“红军中已破获改逆最高领导机关——军事委员会，以胡慎己负总责（系红八师参谋长），以九人组织，其余委员系邓希禹（系八师二十四团参谋长），朱寿谦（系红八师特务长）、

<sup>1</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57 页。

<sup>2</sup>杨嘉瑞：《在监利的日子里》，《湘鄂西风暴——监利革命历史回忆》，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7 页。

<sup>3</sup> 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湘鄂西风暴——监利革命历史回忆》，第 97-98 页。

<sup>4</sup>杨光华：《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1984 年 10 月 24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733 页。

傅光夏（红八师政治部主任）、谢锡章（红八师二十四团第一营营长）、刘树植（红七师二十团团长）、黄正金（红九师参谋）、李孝侯（红九师二十七团参谋长）、樵继汉（红八师二十四团政委），此外有刘革非（红七师十九团政委）、朱璧容（红九师副官长）、熊管理员（红九师的，名字未详）、罗汉（红军第三团补充团长），以上名单已逮捕”。“红军中破获之起源，则由红七师二十一团之一排在新沟咀鸣枪罢岗（全排不放哨，系排长领导）及中央分局所发之改造红三军决议在部队中发表，发动反军阀制度的残余的斗争，引起群众的积极性，按破获案件之供词与部分的自动报名自首而扩大，我们估计中级干部亦不少，现只破获领导机关，正在继续进行破获中。”<sup>1</sup>

6月，潘家辰因拒不认错被开除党籍。<sup>2</sup>7月，夏曦宣称已查获反革命数百人，其中军队干部150以上、地方干部300左右。夏曦向中央报告：“自省四次代表大会后，我们对于肃反已有相当注意，五月间开始在天汉县（汉川之襄北天门之东的区域）破获，以至破获三军中全部反革命组织，又因此线索破获全苏区整个反革命组织”。“红军中之反革命是以第三党为主干。八师参谋长胡慎己（原九师参谋长）是一九三〇年中央派到湘鄂西工作，他当时就是第三党的分子，他到湘鄂西同时是邓演达派来的。”红三军共查获重要反革命分子团级以上军事干部19人、政治干部9人，下级干部百余人；军委直属机关共查获军事干部13人、政治干部4人、医生6人，军队干部总共150多人。地方组织主要在省委、县委查获重要干部23人，事务技术人员40-50人，地方干部总共300人左右。<sup>3</sup>

湘鄂西苏区失败后，省委书记杨光华逃到上海，1932年12月他给中央的报告显示，到苏区失败以前，大部分军队和地方干部都被打成反革命了。当时中央还没有批评湘鄂西肃反，杨光华是把肃反当作成绩来炫耀：“省委常委中有两个（万涛、杨成林），还有一个嫌疑□□；执委中除夏曦、贺龙及一个实际负江南县委书记之工人方国生，江陵县委书记之工人李家芬（曾经做过省总委员长）及□□系嫌疑外，其余都是反革命分子。省委机关中从组织部长杨成林，一直到干事是清一色”。“各县：沔阳县委全部，江陵县委全部，川阳县委全部，江南县委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破获改组派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5月26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412、414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开除潘家洵党籍的决议》（1932年6月19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437页。

<sup>3</sup>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关于肃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226-233页。

只书记不是，潜江县委书记有嫌疑，其余都是，天汉县委全部，天潜县委全部，京山、荆门、云孝县委书记都是（县委中记不清楚），监利县委除书记外，其余大部分是的。宜昌特委全部。襄北特委，襄北特委除一个团的是嫌疑外，其余都是的”。“红军中一个师长，三个师政治委员，一个军参谋长，另□□□□嫌疑，三个师参谋长，三个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部组织科长、宣传科全部，政治、社会两科记不清楚，但主要负责人大部分都是。团长、政委、参谋长大部分是的。”

1

肃反被捕者被集中关押在中央分局和省委所在地瞿家湾，第一次肃反被捕总数约为两千人。杨光华说：“各县及红军中的主要反革命首领都集中到保卫局了，各县则没有处决权。”<sup>2</sup>庄东晓也提到：“大批在军队中捕起来的都一齐押到瞿家湾（省委、中央分局所在地），省的机关都空出以押犯人”。“不几天，省各机关的肃反也开始了，各机关内集体办公室内坐着办公的与吃饭的人数与日减少，省苏的秘书长、土地部长、文书科，省委的组织部长、文书科、发行科、互济会、反帝大同盟、工会的工作人员皆相继不见”，“此时确有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景象”，“据说当时被捕犯人将及两千”。<sup>3</sup>

当时党内阶级观点占有优势，肃反被捕的重要干部多数受过教育，出身于相对富裕的家庭，他们大都被杀，而工农分子大多通过“自首”被释放。省委5月紧急通知提到：“并不是凡有之改组派等执行杀尽，而是要根据省苏所颁布之自首条例，作广大宣传，号召误入者自首，自首者概免杀罪。”<sup>4</sup>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东道委的指示也提到：“你们的斗争方法还只是逮捕、枪毙，这是异常不够的，你们可详细参考中央关于与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案”，“你们必须展开苏区内部的阶级斗争”，“分化那些被欺骗的群众，以孤立反动领袖”。<sup>5</sup>省委6月做出决议：“对于反革命分子的处置，要从阶级的立场去处置，号召工人、贫农××分子自首”，“对于工人、贫农、中农分子则完全××教育方法为原则，组织训

<sup>1</sup> 杨光华：《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338-339页。

<sup>2</sup> 杨光华：《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343页。

<sup>3</sup> 庄东晓：《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4年1月23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371、374页。

<sup>4</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紧急通知》（1932年5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317页。

<sup>5</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鄂东道委的信》（1932年3月），《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187页。

练队、生产队，使他们了解自己的错误。”<sup>1</sup>夏曦在7月给中央的报告也提到：“同时定出有自首条例，发表传单，号召被欺骗压迫加入反革命派之分子自首”。“在肃反当中我们已经表现明显的阶级路线，分别出工农阶级与地主富农阶级，分别出主动的与被动者，下层工农分子现已有三百人恢复自由”。<sup>2</sup>

1932年7月，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对湘鄂西苏区的第四次围剿，由于敌人兵力强大，同时也由于肃反削弱了红军和党的力量，战局始终被动，苏区逐渐缩小，在被敌人占领的区域，肃反当然无法再进行了。到9月初，中央分局、省委所在地瞿家湾被敌军攻占，苏区全面失败，红三军主力八、九两师和七师分别突围到襄北，夏曦带地方部队独立师退入洪湖，但也无法立足，被迫撤离苏区。撤退过程损失惨重，“中央分局、省委和苏维埃政府的大批干部几乎全部被抛弃在沦陷了的鄂西地区内。就连夏曦最信任的政治保卫局和政治保卫队，也只带出了几个人。”<sup>3</sup>

在失败撤退的混乱之中，肃反被捕者有的被杀，有的被放，有的趁乱逃走。据杨光华1932年12月给中央的报告：“在肃反得出总结的时候，就发出举行公开审判的通告，决定各方由群众会议选派代表参加，但因敌人进攻紧急环境上的关系，没有举行成功。敌人进攻新沟咀时，很忙的将犯人全部遣到洪湖当中，后敌人攻破柳关占领瞿家湾时”，“夏曦同志留洪湖同马武同志解决反革命，除将主要首领与做过毒辣工作的处决”，“其余自首的及欺骗的下层分子都释放了。”<sup>4</sup>又据杨光华1984年回忆：“省委机关的非武装人员，在没有计划退却的情况下，向洪湖逃去。有的被俘。（谢觉哉同志也被俘。据他亲眼看见夏曦杀人，来不及就用麻袋装着往湖里沉，真是惨不忍闻。）”<sup>5</sup>

从柳直荀的命运也可见当时的混乱情况。谢觉哉说：“一九三二年又看到他在湘鄂西省苏当财政部长”，“一天，忽不见了，初疑其因事出发，后知其被捕，被捕原因，未及宣布而苏区失败，直荀同志及其他很多同志都从此不知下落。”<sup>6</sup>

<sup>1</sup> 《中共湘鄂西省委关于同湘鄂西反革命团体斗争和纠正肃反中错误的决议》（1932年6月19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2），第442-443页。

<sup>2</sup>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夏曦关于肃反等问题给中央的报告》（1932年7月8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242-243页。

<sup>3</sup> 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第213页。

<sup>4</sup> 杨光华：《关于湘鄂西具体情形的报告》（1932年12月19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343页。

<sup>5</sup> 杨光华：《罪恶肃反的起源及其实际经过》（1984年10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736页。

<sup>6</sup> 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731页。

甚至主持肃反的夏曦也搞不清状况，到 1934 年 3 月还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询问：“据传闻柳克明、潘家辰现逃上海，请中央查有无其事。”<sup>1</sup>当然，根据后来的调查，柳直荀、潘家辰都未能幸存。

潘家辰和庄东晓夫妇是很受信任的留苏学生，共产国际高层很早就对夏曦肃反提出了质疑。共产国际 7 月 14 日收到湘鄂西肃反的报告，其中提到潘家辰和庄东晓，马季亚尔 19 日就给政治委员会写信表示怀疑，认为二人是“很有名的人物，也是很老的党员”，必须谨慎处理，同时提到他们和夏曦有分歧，暗示夏曦借肃反打击不同意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皮亚特尼斯基 8 月 9 日亲自致电中共，过问二人情况。<sup>2</sup>中共中央为此给湘鄂西发了电报，因此夏曦不敢处决他们两个。庄东晓在苏区失败后，“天天随着保卫队跑兵”，此时保卫队已濒临溃散，她体力不支掉队，被国民党军俘获，后趁乱逃出，1933 年在张家口抗日同盟军中才重新找到党组织，<sup>3</sup>而潘家辰很可能是死于乱军之中。

## 四、红军退出洪湖地区后的第二、三、四次肃反

### （一）湘鄂西红军第二次肃反

1932 年 10 月，夏曦带领独立师余部与三军主力会合于六房嘴，在败退的混乱之中，红军纪律难以维持，失败情绪严重，夏曦解决这些问题没有别的办法，还是肃反。他在会合之后几乎立刻开始了新的肃反，即湘鄂西红军第二次肃反。1932 年 11-12 月间，红三军在敌军围追堵截之中无法立足，只好继续向北，转战于秦岭、巴山之间，行军 7000 余里，中间只休息过两天半，处境极其危险，而夏曦的二次肃反始终不曾间断。

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此次正是我们失败之后，差不多每天有敌人追击，每天战争和行军，部队的建制也是破坏了，完全失却统率的机能，完全不能听从指挥，枪一响建制即完全紊乱。所以每天部队中丢枪、抛弃军用品以及少数

<sup>1</sup> 《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3 月 1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571 页。

<sup>2</sup>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第 265 号记录》（1932 年 8 月 9 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3），第 194-196 页。

<sup>3</sup> 《庄东晓的信》（1933 年 12 月 19 日），《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 12），第 354-355 页。

的拖枪投向敌人都随时发生，军旗都在此时被改组派分子抛给敌人。尤其严重的是阶级路线的破坏，在农村中，破坏了阶级利益，到小的街道上，所有的东西完全没收一空”。“二次肃反，亦是这时开始”，“一直继续到长途行军的终结”。“二次肃反共逮捕二百四十一人。这二百四十一人中，有一个师长王一鸣，一个军参谋长唐赤英，其次即是团长、营长以及一次肃反中所残余的政治机关人员，连长这一级是很少数的。”<sup>1</sup>

据红三军卫生处长贺彪回忆：“被捕的‘改组派’、‘反革命’约 200 人。为了看管、审问方便，看押人员将我们分门别类。凡从洪湖突围出的地方干部被编为一个连，因为这些人中不少曾任过乡、区、县的苏维埃主席，因而被称为‘主席连’。红军干部编成一个连，称之为‘干部连’。我是红 3 军卫生处长，自然被编在‘干部连’。此后，在向湘鄂边转移的 7000 里征途中，我一直作为犯人随部队行动。行军时，脚镣才被取下，但手铐要戴着。为了防止‘犯人’逃跑，战士们看押方便，我们每个人脖子上系着麻绳，然后用一根长绳把全连人拴到一起”。

“12 月末，部队到达巫山县，准备翻越巫山，渡过长江。一天晚上，‘干部连’的犯人被按不同情况分别关押在几个地方。第二天早上，除了我和两名年轻的副团长外，‘干部连’的其他‘犯人’统统被处决；行军时我发现，‘主席连’也少了许多人。”<sup>2</sup>

夏曦的不断肃反让贺龙非常不满，双方爆发激烈冲突，夏曦几乎对贺龙下手，贺龙也准备反抗，在关向应的苦心调和之下，才没有彻底决裂。贺龙说：“在行军过程中，部队是很苦的，没有东西吃，吃柿子、核桃、高粱秆子，但夏曦同志还不断杀人。对段德昌、王炳南等皆不相信，开会不找他们，并且两次企图下我的手”。“一次在王店，夏曦同志企图加害于我，要我写申明书”。“我说：你给我写申朗书，民国十二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身分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十万块钱。我请你吃饭开了旅馆，还给你五万块钱。这虽然没有收条，但是事实。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党员？你给我写申明书。闹的下不了台。关出来调停”。“另一次是在竹林关。他把我和关的警卫员枪皆下了，还逮捕了两个警卫员，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你的警

<sup>1</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25 页。

<sup>2</sup> 贺彪：《贺彪回忆录》，第 71-72 页。

卫员枪不下？我把身上带的一支白朗林手枪，也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那时枪皆上了顶门火了，时刻准备着”。<sup>1</sup>

## （二）第三次肃反与解散党组织

1932年12月底，红三军在巴东南渡长江，到达湘鄂边的鹤峰。1933年1月，中央分局在毛坝召开会议，会上贺龙提出停止肃反，并对关向应说通过自下而上的选举变更领导，但遭到关向应严厉批评，认为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中共中央是最高领导机关，可以在遵义会议以民主方式变更领导，但湘鄂西中央分局是中央派出机构，只有中央才能变更其领导。贺龙回忆：毛坝会议讨论后，我向夏曦提出“肃反停一个时期，有了反革命再说么！他不同意。这时我第一次向小关提出‘你当书记。我们开个会选一下么！选他是选谁。’小关批评我无组织无纪律，批评的很严厉。”<sup>2</sup>

1933年1月13日，红三军进占桑植，但是28日又在优势敌军进攻下被迫撤出，退回鹤峰毛坝。这时夏曦又开始了第三次肃反，九师与鹤峰地方干部大受摧残。在连续失败之下，夏曦领导威信荡然无存，由于害怕反对者借党的会议联络反抗，他竟提出解散红军的党组织。九师师长段德昌对夏曦提出激烈批评，后又和宋盘铭写联名信提出返回洪湖。夏曦为了维护自己的领导地位，拿不出别的办法，还是肃反，以“分裂红军”的罪名杀了段德昌。

夏曦给中央的报告说：“三次肃反是退出桑植后，在恢复与发展巴东、建始、施南的苏区过程当中，当时改组派的口号：‘立即回洪湖去’，山上不能创造苏区，包谷饭不好吃，山路不好爬”。“从桑植退出后，在走马坪与独立师会师，独立师主要是湘鄂边独立团编制成的”，“周小康、陈叶平、杨英等在湘鄂边的改派差不多是公开活动”。“三次肃反的开始，从破坏独立师的改组派的组织，一直到段德昌”。“三次肃反共逮捕了二百三十六人，主要是段德昌与军参谋处长和湘鄂边独立团的改派分子”。“在三次肃反以后，党的组织解散了，因之党的工作与政

<sup>1</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59页。

<sup>2</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60页。

治工作是完全停顿的。”<sup>1</sup>

贺龙的回忆更加生动：“退出桑植开第二次毛坝会议，夏提出解散党，创造新红军。大家都不同意；我讲解散党我不同意，我在旧军时就想参加党，到南昌暴动才加入；我只晓得红军是党领导的，解散党我不同意，别的道理我说不出。段接着也补充发言，段不满意，说：‘你把红军搞完了，苏区搞垮了，你是革命的功臣还是罪人？！’小关不断的插话，想叫我们不讲。宋盘铭也讲了，他说：‘我从小被党送到莫斯科，在莫斯科加入党，解散党我不同意’”，“以后到金果坪就解散党了”。“段德昌、宋盘铭写信来建议回洪湖。夏就说段德昌要带九师跑，我说他不会跑，要跑他还写信回来。结果还是调回来，在邬阳关调回来，在金果坪杀了”。<sup>2</sup>

在 1933 年 3 月 24 日巴东县金果坪会议上，夏曦不顾其他领导人的反对，下令解散党组织。按当时组织原则，夏曦作为政治领导有最后决定权，他认为：“到了三次肃反以后，感觉到党在没有清洗以前，党的活动，供了改派的利用，当时觉得改造党已经不能依靠旧的干部，因此决定解散，重新登记”。<sup>3</sup>《清洗条例》规定：“因为反革命派别暗藏在党内活动有几年的历史，并且在肃反的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干部加入了反革命派别，因此决定将地方上、红三军中、游击队中、各级党的委员会、支部干事会一律解散，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清洗期间红军中以一个月为限”。<sup>4</sup>

夏曦名义上说清洗后重新登记，但解散后很长时间并未重新登记，造成历史上罕见的、一支主力红军没有党组织的怪现象。廖汉生说：“多数党员在肃反中被杀，以为当时党员都是改组派，及至发展到解散全党，取消一切政治机关及连队支部，当时全军只剩下四个党员（贺龙、关向应、夏曦、芦冬生——芦为与中央联络之交通），司令部之组织亦无形取消，由于没有参谋人员与政治机关，打仗则依靠几个警卫员去传达贺之口述命令。”<sup>5</sup>

<sup>1</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25-626 页。

<sup>2</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 年 4 月 18-20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60-661 页。

<sup>3</sup>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424 页。

<sup>4</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中共党员青年团员清洗条例》（1933 年 3 月 24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542-543 页。

<sup>5</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82 页。

解散党组织后，夏曦继续在鹤峰扩大肃反，这时把肃反中没有被杀的“改组派”组成“自首连”，竟成了战斗力最强的骨干，这表现出干部战士的忠诚，也揭示了肃反扩大化的荒谬。廖汉生回忆：“由于肃反，很多主要干部被杀，回鹤峰后肃反仍未停，部队恐怖逃跑之现象甚严重”。“过去当过团长者除贺炳炎一个人外（贺炳炎也押了二十九天）再无别人，人皆不愿当干部，不愿当党员，人皆不愿扩兵，因扩兵及介绍了熟人来，出了问题怕受连累，在毛房二人相遇一说话即有嫌疑，一块买些花生吃，即以‘好吃会’之名杀掉，在队列前号召自首，如不自首即指名拉出杀之，鹤峰郊外每日皆有被杀之尸体十数具不等”。“每团辖三连，每团内有一个‘自首连’，都是过去所谓自首后未杀之改组派排连营干部，但打仗专靠自首连打，缴到武器弹药后得送给其余两个连。”<sup>1</sup>

在鹤峰的肃反不仅在红军中进行，也波及到地方干部，不少在当地有经验、有威望的干部被杀，使红军失去了与群众的联系。鹤峰本是有深厚群众基础的老根据地，山区地形也比较有利。鹤峰苏区的失守，虽然是敌军重兵围攻的结果，但肃反破坏了群众基础也是重要原因。当地一位老干部说：“周小康、陈协平、陈奇谋、董朗、郭天明等同志，肃反被诬，死于江北”，“鹤峰、桑植、石门老根据地，没有熟悉情形的老干部去联系群众。苏区不能恢复，只能在湘鄂川黔边境，长期游击”。<sup>2</sup>

### （三）第四次肃反和关向应的转变

1933年5-6月间，夏曦又开始了第四次肃反，杀害了九师政委宋盘铭、七师师长叶光吉、七师政委盛联均等。据夏曦报告：“四次肃反，一共逮捕一百七十二人，主要的是宋盘铭以及七师师长叶光吉同师政治委员盛联均和军政治部政务科长以及军管理科科长江器也”，“这一次肃反的开始是起于九师二十七团以及师部各部处联合着反对师长拥护宋盘铭。”<sup>3</sup>

1933年夏天，敌军围攻红三军，形势恶化，在鹤峰也站不住脚了。贺龙在银石坪会议又提出停止肃反，得到关向应的支持，谷志标等被释放。不过当贺龙再

<sup>1</sup>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82-683页。

<sup>2</sup>猎人：《湘鄂西红军游击纪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97-698页。

<sup>3</sup>《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9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26页。

次提出变更领导、由关向应主持工作时，又一次遭到坚持组织原则的关向应拒绝。贺龙说：“银石坪会议没斗，那时候他俩是悲观失望，特别是夏曦，我鼓励夏曦，并说再肃反不行了，才放了谷志标。到银石坪我也提了要小关搞。”<sup>1</sup>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组织原则有潜在危险，一方面集中统一的组织在对敌斗争中很有力量；但另一方面，当领导者发生错误时，很难自下而上纠正。

谷志标回忆：“1933年7月，我被当成‘改组派’分子抓了起来，其罪名是‘与改组派分子盛联钧有来往’。熟悉情况的同志都知道，盛联钧是党的优秀干部，是七师政委。当时我作为军部的参谋，曾请盛联钧介绍过七师经常活动的宣恩一带的地形，并根据他的介绍绘制出该地区简单的线路图，以备行军打仗使用。就是因为这一点‘来往’，夏曦便决定将我抓起来，准备送鹤峰的燕子坪砍头处死。后经关政委查证后，才将我释放，使我得以幸存至今。”<sup>2</sup>

当时对于贫农出身的所谓“改组派”分子，一般不会杀害，而是仿照鄂豫皖苏区的做法，把他们开除军籍、赶出红军。但当时苏区已经沦陷，地主还乡团正在疯狂报复，“开除了他们的军籍，这对他们来说就等于只有死路一条了”，“让他们离开自己的队伍，就无异于把他们送给反革命‘还乡团’。他们有家不能归，离开红军就无出路。很多同志苦苦哀求，不要让他们离开红军。但‘左’倾分子最后还是把他们大部分赶走了。”<sup>3</sup>

7月，红三军缩编为两个师后分开行动，贺龙、关向应带领军部和九师，夏曦、卢冬生带领七师，到12月会合时，红三军总共只剩下三千余人。失败退出洪湖后，关向应对肃反的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分开行动后，关向应和贺龙在一起，思想也逐渐与贺龙接近。本来关向应是受中央派遣，专门到湘鄂西来支持夏曦的，在1932年1月湘鄂西四大上，他对维护夏曦的领导地位起到了关键作用。在肃反初期，关向应对夏曦也是支持的。但是随着肃反的恶果逐渐暴露，他积累了经验，也开始怀疑夏曦的不断肃反，转而保护一些人。李文清说：“我和吴子杰、谭友林、刘林、杨秀山、成均、樊哲详、罗坤山、谷志标等人，都是关政委从虎口里营救出来的。”<sup>4</sup>关向应的这种转变得到红三军干部战士的拥护，所以肃反纠

<sup>1</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61页。

<sup>2</sup> 谷志标：《回忆红军时期的关向应》，《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2002年版，第291页。

<sup>3</sup> 黄新远：《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湖南党史资料通讯》1982年第9期，转引自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第241页。

<sup>4</sup> 李文清：《红三军的一面旗帜》，《关向应纪念文集》，第299页。

正后，受到普遍憎恨的夏曦无法继续在二军团工作，而关向应一直留在原部队、并始终享有很高威望。

1934年初，红三军几乎丧失了全部根据地，被迫在湘西龙山、永顺、桑植、大庸、慈利等地游荡，但肃反仍没有停止。红三军此时处于最危险的境地，部队只剩三千多人，子弹极少，几乎没有能力打硬仗，随时都有覆灭的可能。一年多时间连续四次肃反，大批骨干被杀，红军元气大伤，党组织也被解散。在险恶的情况下，红三军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一方面靠干部战士的忠诚和勇敢，另一方面贺龙作为领袖的个人威望和军事才能也起了关键作用。廖汉生认为：“当时部队恐怖逃跑很严重，捆杀了很多，取消了政治机关与党的组织之保证，部队未全垮而能保存下来，固然赖于在土地革命斗争中之觉悟所鼓舞，然而端赖贺龙同志个人威望所维系”。<sup>1</sup>

## 五、在中共中央和任弼时干预下结束肃反

在1934年初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夏曦不但没有反思自己的错误，为了维护他领导肃反的正确性，甚至还在2月写了《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其中炮制出一个“反革命大联合”的荒谬概念，不但认为各种反共派别在湘鄂西都有代表，而且这些彼此敌对的派别还结成了大联合：“反革命的大联合——改组派造成了清一色的系统1、改组派——周逸群、万涛为首要；2、第三党——胡慎己、唐赤英为首要；3、托派——刘鸣先、潘家辰为首要；4、陈独秀派——侯蔚文为首要；5、秋白主义者——李剑如；6、罗章龙派——张昆弟、王进之；7、AB团分子——零星的发现；”以上各派“均加入改组派、并且又用新共产党的名义活动”。<sup>2</sup>

1934年3月，夏曦在给中央的报告里宣扬了肃反成就：“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因是决定解

<sup>1</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83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肃反总结与清党的决议的报告大纲》（1934年2月1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566页。

散党和青年团的下级组织，举行清党清团重新重记。”<sup>1</sup>夏曦不仅认为自己肃反成绩很大，还要帮助中央和其他苏区肃反，提醒中央注意一些人可能是改组派：“肃反中得到过去湖南省委之田子厚口供，现在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在湖南省委时为改派，言之确凿。段德昌供，听说邝继勋是改派”。“唐赤英供刘伯承政治上不坚定，但未确指其与改派有关。唐赤英又供他是在上海时由中央和运处一个王文清介绍入改派，又湘鄂赣省委宣传部长龙秀寅是改派，又据人说，孔荷宠处有一个人经常来往长沙形踪可疑；听说孔部肃反亦多，故提出，请注意。”<sup>2</sup>

但这两个文件已经是夏曦领导肃反的尾声了，关向应等重要领导人已经转变，对肃反的抵制力量越来越大，而夏曦自己也在连续失败之中丧失了信心，日益消极，不再力图强化领导，逐渐失去了肃反的动力。当然，这个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有一个权力逐渐转移的过程。1934年春，红三军挺进到贵州东部，廖汉生回忆：“夏曦同志之领导，（一九三四年春）在贵州沿河印江之间之南腰界开会检讨，夏承认自己错误，但有人质问他怎样错误时，夏大发脾气又与贺龙同志争吵起来，未果而散。”<sup>3</sup>

1934年6月在贵州沿河县召开的枫香溪会议是重要转折点，类似于中央红军的遵义会议。枫香溪会议决定停止流浪，利用贵州东部敌军薄弱的有利条件，着手创建黔东苏区，同时停止肃反，恢复党组织。贺龙回忆：“到了枫香溪以后，我说再也不能这样走了。我先与小关交换了如何创造黔东根据地；怎样争取神兵的问题，在会上提出后，夏曦不同意争取神兵的工作，同意建立黔东根据地，晚上召开干部会议”。“小关在会上作了报告，报告内容：登记党、团员，恢复党的组织，派一批干部去作地方工作，小关主要是以自我批评的方式讲的”。“夏曦在黔东时期，一直是消极的，行军到宿营地就是吃饭、睡觉。没有做什么工作”。

“黔东这个时期的工作，是红三军的一个很大的转变，肃反停止了，提拔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党，恢复了政治机关，在各县建立了游击队和独立团，扩大了红军，建立了根据地”。<sup>4</sup>

<sup>1</sup> 《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570页。

<sup>2</sup> 《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1934年3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570-571页。

<sup>3</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年12月15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83页。

<sup>4</sup> 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62页。

在枫香溪会议后恢复党组织过程中，关向应发挥了重要作用。黄学忠回忆：“在枫香溪会议上，决定要立即恢复红三军各级党组织和政治机关”。“关向应来到我们一连，参加了两天军人大会，他来我们连是为恢复党、团组织，进行党团员登记的”。“由于连续不断进行‘肃反’，部队中广大官兵感到人人自危，民主生活早就被恐怖气氛所代替，说错了话，或者给上级提条意见，往往被当成‘改组派’抓起来，谁敢有什么说什么呢？开了大半天会，大家低着头默不作声。曾经吃过‘肃反’苦头的同志，则泪流满面，泣不成声。看到这种情景，关向应宣布休会，第二天继续开。当晚，他找连里原是党员的连长、副连长、排长个别谈话，对他们进行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晓之以理，要他们在第二天的军人大会上带头讲话”。“当时我心里顾虑重重，怕提了意见，再次被抓起来。关向应在旁看见后，笑着对我说，有什么委曲就说出来，憋在心里是很难受的。我和连里十多个原是党员、团员的，都一个一个把憋在心里的委曲和意见讲了出来，关向应同大家一起欢畅地笑了。”<sup>1</sup>

枫香溪会议虽然停止了肃反，但由于并未触动夏曦的领导地位，军中的恐怖气氛难以消散，转变的过程是缓慢的。1934年7月，中央通讯员到达贵州沿河红三军总部，带来中央5月6日的指示信，动摇了夏曦的领导地位，大大加快了转变的进程。其实早在一年前的1933年7月21日，中央就已经在指示信中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提出了严厉批评，可惜红三军早已失去联系中央的电台，而这封信也未能送到。这封信中明确批评“湘鄂西党的工作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在五月五日的信中你们以为‘湘鄂西苏区的失败’，是因为‘党，苏维埃和红军的大多数干部是改组派’。这种见解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少数”。

“把苏区内反革命派，看作是‘了不起’的力量，结果在肃反中犯了许多错误”。<sup>2</sup>从这里可以看出，高度集中的权力结构，一方面有强大力量，同时也存在严重弱点。只因沟通不畅，电台联系中断，一封关键的指示信未能送达，湘鄂西红军的肃反就又持续了一年，损失巨大，各级组织几乎丧失了自主纠正错误的能力，只能消极被动地等待中央指示，如果中央出现偏差，就更加难以纠正。

1934年5月6日，中央再次写信严厉批评湘鄂西肃反：“除了你们自己少数

<sup>1</sup> 黄学忠：《怀念关向应同志》，《关向应纪念文集》，第312-313页。

<sup>2</sup> 《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信》（1933年7月2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547、549页。

人外，完全不相信群众与自己的同志，解散了所有的地方党部与团部，而将反革命的力量反扩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以至使你们终日陷入疑神疑鬼的恐怖中生活着，这种恐怖遂造成了你们把肃反当作一切工作中心的根本错误！实际上你们是作了反革命挑拨离间的俘虏，取消了两条战线的思想斗争，这是极大的罪恶！而且你们这样的肃反如继续向前发展，可以走到你们自己少数人也相互怀疑，猜忌与不信任的结果。我们绝对不能同意你们的意见：‘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这种估计完全是不正确的，夸大的！事实上改组派只是最少数”。<sup>1</sup>

湘鄂西中央分局接到中央来信后，表示完全服从，8月4日通过了接受中央指示的决议：“中央分局认为五六日的指示信，首先是对于我们的错误与罪恶严厉的指斥，是我们转变工作的主要枢纽”。“一九三三年三月金果坪中共分局会议，犯了不可容许的机会主义的错误。首先便是解散红军中、地方上党和团的组织，举行重新登记，取消省苏维埃政府的名义”，“这便是等于解除了自己的武装。”<sup>2</sup>9月，中央分局又通过恢复党籍、团籍的决议：“最近中央来信严厉批评我们解散党和团的错误，中央分局完全接受中央的指示”。“红军中的党与团现已恢复，在清党的过程中，尚有个别自己未登记的党团员应即恢复”。“在肃反过程中有被改组派供过的党团员，而只仅仅是供过，没有事实证明，而这个党团员在实际工作中表现好的，仍可恢复党籍和团籍。”<sup>3</sup>

中央来信严厉批评后，夏曦的领导地位已经动摇，中央分局通过决议纠正夏曦错误以后，关向应逐渐成为新的政治领导核心，放手进行恢复党团的工作。廖汉生回忆：“接到中央五中全会指示，夏曦错误才逐渐被人认识，在关向应同志之主持下来恢复党的组织，关自认支书，介绍了一些党员入党，由于在肃反中杀的多为党员，故多数人不敢入党，过去之老党员亦不敢承认自己为党员而重新登记，有的人要他入党，即以双腕绳捆之疤痕出示，如杨秀山（现晋绥独四旅政委）重新登记后因畏惧被杀而逃跑至三里之遥，后念及在敌人统治下何处可逃，故又返回，又如原大青山骑兵团长蔡九，可以英勇战斗不畏牺牲，但决不入党，

<sup>1</sup> 《中央给湘鄂西中央分局信》（1934年5月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581页。

<sup>2</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接受中央指示及五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934年8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05-606页。

<sup>3</sup> 《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关于红军中党团员党籍、团籍问题的决议》（1934年9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19页。

直到 1938 年由贺龙、关向应介绍解释方入党。”<sup>1</sup>又据杨秀山回忆：“由于夏曦搞‘肃反’的影响，许多领导同志和党团员惨遭诬害，我也因为参加团的活动，当成‘改组派’被抓了两次。那时党团都被取消了，承认是团员不是自找麻烦吗！所以，我不敢说自己是团员。后来关向应再三询问，我不敢撒谎，才承认我早就是团员了。”<sup>2</sup>

1934 年 10 月 24 日，率先西征的红六军团在贵州印江县与红三军会师。会师对两军都有重大积极意义，遭到围追堵截的红六军团得到了休整机会，而红三军得以利用红六军团的电台与中央恢复联系，并且在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的主持下，取消了夏曦的灾难性领导，纠正了肃反造成的党和军队组织混乱状态。廖汉生回忆：“六军团到后人数很少，疲劳不堪，由二军团掩护其休整。两个军团相比，六军团政治领导很好，但纪律很差；二军团由于肃反后，政治领导差，但能拖，纪律好，相互影响对二军团有很大帮助。”<sup>3</sup>按廖汉生的说法，肃反的恐怖至少带来一个好处，二军团的比较守纪律。

会师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番号，二、六军团合力进攻湘西，占领了永顺、大庸、桑植等县，在四省交界创建了湘鄂川黔苏区。1935 年 1 月下旬在大庸县丁家溶，任弼时主持召开了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彻底清算夏曦的领导错误，撤销了他的职务。“在任弼时同志主持下，开检讨会，清算了夏曦同志之右倾机会主义领导，夏曦被撤职，除贺龙及关向应同志外，其余二军团干部犹有余怖，仍皆未敢发言。”<sup>4</sup>

在会上，任弼时对夏曦领导的肃反扩大化提出严厉批评：“夏曦同志当时夸大反革命力量，在反革命活动面前，惊慌失措，认为部队中连长以上的干部，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改组派，逮捕的在二千人以上”，“没有详细审查而逮捕枪决，或开除军籍”。“夏曦同志同样认为，湘鄂西地方党、苏维埃区、县、省级的干部，也有百分之八、九是改组派。只是由于退出苏维埃太张惶仓促，没有来得及把他们都拘捕和枪决，只好以命令来宣布解散这些组织”。“把工作中同志们所有的

<sup>1</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83 页。

<sup>2</sup> 杨秀山：《回忆关向应》，《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283 页。

<sup>3</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84 页。

<sup>4</sup> 廖汉生：《红二军团历史片断》（1946 年 12 月 15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684 页。

错误缺点都看成是反革命捣鬼，因而取消了思想斗争，造成党和部队中严重的肃反恐怖现象。把战士和党团员的自发性、创造性、积极性完全抑制下去，同志们有意见不敢说，甚至互相猜疑。夏曦同志在那时恐怕只能相信自己一个人是唯一坚决革命的，其他的似乎都不可靠了。在这种恐怖与不信任、以肃反为一切工作中心的下面，没人敢说话，或自动去工作，人人觉得有被人认为是改组派而遭拘捕杀头的危险。这种情况的严重，的确可以走到自己解体的危险前途。”<sup>1</sup>

中央接到任弼时的报告后，不同意撤掉夏曦的全部职务，要求在批评他的错误后，保留他在领导机关工作。中央 1935 年 3 月给任弼时电报称：“最近期内夏同志在实际工作中新犯的错误，应该指出批评，在领导机关内部开展斗争是应该的。但你们所采取的组织结论，是不恰当的”，“苏区目前是处在一个极端困难的环境，领导机关内的团结一致，比什么都重要”。“夏曦同志必须继续在领导机关内工作，以同志的态度，在实际工作中说服与纠正他的错误”。任弼时对夏曦采取了团结的方针，保留了他湘鄂川黔边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和省委委员的领导职务，1935 年 5 月又任命他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sup>2</sup>

夏曦卸下湘鄂西最高领导人的重担后，似乎又恢复成正常的高级干部。据当时六军团领导人萧克说，夏曦“到六军团当政治部主任，做了很多工作。他平易近人，我和王震同志都承认他有水平，尊重他。一九三六年三月，我军退出毕节，在野马川、七星关地区，他去归附我们的绿林部队席大明部工作，该部背弃诺言，反水，夏曦同志过河时不幸溺水牺牲”，“在批判他的错误的时候，不能过分强调个人责任。”<sup>3</sup>曾有传闻说夏曦落水后，战士由于对他以前肃反不满，故意不去救他，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对夏曦不满的是二军团战士，牺牲时夏曦已调到六军团工作。

夏曦本人也屡次对肃反杀害同志表示悔恨。二方面军开始长征后，“战斗不断，伤病员增多，给部队行动带来了很大困难。当时医疗条件差，对每位伤员的照顾难以周全”。夏曦在六军团卫生部和同志们的谈话中，提到自己在湘鄂西主持肃反时的扩大化错误，沉痛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

<sup>1</sup> 任弼时：《在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5 年 1 月 2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四），第 52-53 页。

<sup>2</sup> 《中共中央给任弼时并转省委电》（1935 年 3 月 31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10-411 页。

<sup>3</sup>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第 17-18 页。

帐啊。一定得解决好伤员问题，受伤的同志都是有功之人，不能再让我有负于伤员啊。”<sup>1</sup>

## 六、夏曦肃反被杀人数考辨：几百人被杀，大多是干部

湘鄂西苏区肃反被杀人数是关于这段历史的基本问题，但是却出现了不同的说法。由于当时局势的动荡和管理的粗糙，绝大部分史料没有保存下来，最终的精确数字难以确定，不过还是可以通过努力接近历史真相。

关于被杀人数，由于贺龙元帅的权威地位，他 1961 年回顾二方面军历史时谈到的一个数字流传很广。贺龙说：“夏在洪湖一直杀了几个月，只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sup>2</sup>按贺龙的说法，单是第一次肃反就杀了一万多人，不少人据此认为湘鄂西是肃反杀人最多的苏区。但是，贺龙当年作为军事领导人并不参与肃反领导，领导肃反的是政治领导人夏曦和关向应。贺龙自己也说：“那时捉人都是夏曦给关一个条子，关即按照夏的指示捉。条子根本不给我看。”<sup>3</sup>贺龙谈到的这个数字并没有得到其他史料的支持，他回忆时肃反已过去三十年，很可能是痛惜激动之下的夸张说法。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贺龙使用的是广义的肃反概念，也就是说把基层组织和群众为巩固政权大规模杀戮地主、富农等的激烈行为也包括了。任光明在文章中提到了另一个数字：“1985 年至 1987 年，中央组织部清理落实肃反被错杀人员时，仅洪湖所在的荆州地区有名有姓被错杀的人员就有 2850 人。”<sup>4</sup>但笔者认为，在苏区失败的混乱之中，甚至夏曦本人都搞不清楚是否杀了柳直荀、潘家辰，1985 年距离洪湖肃反发生已过去 53 年，当事人大多都已去世，几十年后不太可能搞清谁被错杀，谁是死于其他原因。在 1980 年代的大和解时期，按照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本有“一风吹”的倾向，落实政策会给家属带来好处，难免把各种原因死去和失踪的人上报为错杀人员，各级机关也很难核实。

<sup>1</sup>宋威：《改正错误中的夏曦》，《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第42-43页。

<sup>2</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57-658页。

<sup>3</sup>贺龙：《贺龙关于一九三〇年冬至一九三四年间湘鄂西武装斗争问题的谈话》（1961年4月18-2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657页。

<sup>4</sup>任光明：《“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红岩春秋》2011年6月，第13页。

这个时期调查使用的肃反概念也比较宽，得到的数字往往夸大。

本书中使用的是狭义的肃反概念，主要指在党、政、军系统内部的集中肃反，不包括针对地主富农等敌对势力的肃反。夏曦 1934 年 9 月向中央汇报了肃反被捕和被杀人数，使用的大致就是狭义肃反概念。当时肃反亲历者贺龙、关向应等都在，记忆仍很清晰。任弼时自两军会合后，即随二军团行动，同时调夏曦去六军团。到 1935 年 1 月丁家溶会议，任弼时已经在二军团工作了近三个月，亲自做了大量调查，他在报告中采用了被捕二千人以上这个数字，应该是经过贺龙、关向应认可的。因此，夏曦报告即使有掩饰错误的倾向，也不敢偏离事实太多。

夏曦在报告中说：“一次肃反的材料，失败时没有带出来，逮捕的约计千余人，处死刑者约百数十人，这些分子，最大部是一九三一年以前加入的。二、三、四次肃反逮捕的总数，共六百四十九人：二次二百四十一人；三次二百三十六人，四次一百七十二人”。“审判的结果：二次十四人（不确）处死刑，三次处死刑的五十六人，四次处死刑的四十一人。因病死的共二十八人；其余大部分自首释放；有四十余人开除红军军籍送出苏区。二、三、四次未书明如何判决的：二次一百九十八人，三次六十九人，四次二十六人。未书明如何判决中，在二次里有一部分是处死刑的或逃跑，三、四次则系立即开释的或开释未书明的”。“对于下层的干部，一、二、三次从连长以下大部分准其自首，战士完全不逮捕，至第四次，团长有几个准其自首，恐怖情绪也减弱了。”<sup>1</sup>按照夏曦报告中的说法，四次肃反加起来，总共被捕人数约两千人，被杀和病死的约三百余人，最后情况不明的（被杀或逃跑）也有约三百人。

夏曦提到的数字可能有所缩小，实际被捕人数可能约三千人，不是两千人。半年之前，夏曦 3 月 17 日曾向给中央报告肃反成就：“湘鄂西苏区及红三军经过四次肃反，前后逮捕三千多人”。<sup>2</sup>笔者认为被捕约三千人的数字比较可信，当时夏曦把肃反当作成绩，没有掩饰的心理，这个数字得到了其它史料的支持。庄东晓 1934 年 1 月 23 日给中央写的报告谈到：“据说当时被捕犯人将及两千”。<sup>3</sup>庄东晓说的是自己亲历的第一次肃反，加上后三次肃反被捕人数，大致与总共约三

<sup>1</sup> 夏曦：《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9 月 15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429-430 页。

<sup>2</sup> 《夏曦、贺龙、关向应给中央的报告》（1934 年 3 月 17 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二），第 570 页。

<sup>3</sup> 庄东晓：《庄东晓关于湘鄂西苏区情况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4 年 1 月 23 日），《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1），第 374 页。

千人数字吻合。夏曦报告中提到二次肃反逮捕 241 人，也与贺彪的回忆大致吻合，贺彪说：“像我这样被捕的‘改组派’、‘反革命’约 200 人。”<sup>1</sup>

综上，夏曦领导的湘鄂西四次肃反被捕总人数约为三千人，被杀人数缺少其他材料，只好暂时采用夏曦报告的数字，因为当时肃反管理很严，被捕人员不容易逃跑，如果把情况不明的大部分算作被杀，则被杀人数约为六百人，至少是在数百人这个数量级。当然，虽然湘鄂西肃反的领导比较集中，但是地方干部肃反中擅自抓人、杀人的情况也很难避免，实际受害人数肯定会高于这个数字，基层群众自发杀戮地主、富农的数量就更难以统计了。

湘鄂西肃反受害人集中于党员干部，部队中连以上干部 90% 被当成改组派，地方党和苏维埃县级以上干部也是 90% 被当成改组派，苏联留学回来派到湘鄂西的四十多个学生几乎都被当成改组派，他们大多被拘捕杀害，<sup>2</sup> 苏区有威望、有能力的干部大部分都被杀了，革命骨干损失非常惨重。

## 七、小结

六届四中全会前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为了把革命重心转移到农村，为了加强对红军和苏区的集中统一领导，先后派项英、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组建中央局，派张国焘、沈泽民、陈昌浩到鄂豫皖，派夏曦、关向应到湘鄂西，建立中央分局。

这些代表中央的领导人到达苏区后，在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过程中，都与开创红军和苏区的地方领导人发生了冲突。在中央苏区，毛泽东在宁都会议被取消了领导权；在鄂豫皖，张国焘通过残酷的肃反取得了绝对控制；湘鄂西肃反也是这种权力冲突中的一部分。由于农村革命队伍中简单粗暴的风气，肃反严重扩大化了，远远超出了为建立统一领导的必要程度。

夏曦领导湘鄂西肃反还有其特殊的悲剧特点，那就是夏曦领导能力的严重不足，与中央赋予他建立集中统一领导的使命之间，形成了无法克服的矛盾。张国

<sup>1</sup> 贺彪：《贺彪回忆录》，第 71 页。

<sup>2</sup> 《任政治委员在红二军团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的报告》（1935 年 1 月 27 日），《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件汇集》（1934-1936），湖南、湖北、四川、贵州档案馆 1984 年，第 256 页。

夏曦有较强的领导能力，在通过肃反打击了部分反对者之后，他在四方面军建立了牢固的权威。但是夏曦缺乏必要的领导能力，他通过肃反打击了反对者，却没有能力赢得下级的敬畏，以至于为了勉强维持领导，不得不先后进行四次肃反，几乎把湘鄂西有威望的干部杀光了。他最后只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在中央不满、全军愤恨中黯然离开。从这个角度来讲，夏曦也是一个被放错了位置、身不由己的悲剧人物。

夏曦从 1921 年入党到 1935 年牺牲，总共有 14 年的革命历史，在其中 12 年中他被认为是个不错的干部，而在 1932 到 1934 这两年中，他却成了湘鄂西干部战士眼中的恐怖象征。但肃反的不仅仅是夏曦，甚至在肃反中被杀的朱勉之、周小康、蔚士钧等，本身也参与过肃反。或许可以说，在某些特殊的环境下，平时的正常人可以变成魔鬼，比如南京大屠杀中的日本兵、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人性中的黑暗深不可测，在正常时代里，古老的、现代的文明规则制约着这种黑暗。一旦在激烈、紧张、野蛮、混乱的特殊环境催生出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一旦绝对权力冲破了基本的文明规则，一旦生死存亡的巨大压力扭曲了人性，世界将变成人与人互相迫害和仇杀的黑暗地狱。如何防患于未然，避免这种极端环境再次出现，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深刻教训。

## 余论：弹性集中体制的有效性和适应性

1934 年的中国共产党看起来前景黯淡，三大苏区先后陷落，失去了绝大部分根据地和群众，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事实上已不复存在。几支主力红军在国民党军队围攻中处境险恶，最后经过长征 1936 年在陕北会合时，剩余部队大约只有四万人，此时白区力量损失殆尽，绝大多数中共党员都在这里了。然而，这些百战淬炼的革命者积累了丰富军事政治经验，很多红军里长大的小伙子已经成长为能独当一面开辟根据地的将才，1949 年的建国领导人和一千多位开国将军大都在这四万人里，中共核心团队虽然历尽艰险，仍然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经过十年武装斗争中血与火的锻造，中国共产党建立了高度集中统一的严密组织，“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指挥枪”成为神圣原则。依靠这些原则，中共在动荡的南方农村建立了新的政治秩序，进而把农民中蕴藏的巨大力量动员起来，创造了十几万主力红军和上千万人口的苏区政府，抵抗国民党重兵围攻数年之久。虽然南方苏区在力量悬殊的国共战争中最终失败，但中共已经显示出惊人的政治建设和动员能力，远非派系纷杂的国民党所能比拟。当然，锻造组织的过程中也始终伴随着激烈的矛盾冲突，并且在残酷肃反中付出了痛苦高昂的代价。

1937 年全面抗战爆发，长征到北方的红军改编成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在当时的敌后沦陷区，国民党军政机构大多崩溃，日军也只能守住城市和交通线，广大农村陷入兵匪横行的混乱之中，八路军凭借红军时期锻造出来的强大组织，迅速重建了政治秩序，吸收大批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加入革命队伍，中共军政力量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到 1945 年日本投降时，中共军队已经达到一百万，控制了山东、河北、江苏、山西、陕西等省的大片区域，领导下的广大群众多达一亿人。

缺少成熟领导集体，始终是早期中共组织的大问题。中共建立初期是共产国际的支部，得到经费、组织和政策上的帮助，但共产国际领导人不熟悉中国实际情况，也不信任中国干部。中共历任领导人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博古都难以胜任，一方面中共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强大组织，另一方面在组织顶端却缺少成熟的领导集体，不仅难以发挥组织的潜在力量，甚至会因权

力过于集中造成灾难，这在李立三、博古领导时期非常明显，夏曦在湘鄂西的集权领导也造成了惨重损失。

在 1935 年初的遵义会议上，民主机制发挥了作用，博古、李德下台，毛泽东进入领导核心。在先后战胜了张国焘和王明的挑战之后，经过共产国际的认可，毛泽东在 1938 年 10 月六届六中全会上成为中共领袖，他与周恩来、刘少奇等组成了中共第一个成熟的领导集体。中共在抗日战争中发展顺利，领导威望越来越高，在 1945 年中共七大上，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获得全党的由衷拥戴。

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时期已建立严密组织，又在抗战时期获得了广大群众和成熟领导集体，中共的组织优势已经足以抵消兵力劣势，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最强大的军事政治力量。不过由于表面上国民党拥有四百万军队和三亿多人的国统区，甚至中共自己都没有认清这一点，所以在国共谈判中不断让步，只谋求建立地方自治政权。当谈判破裂，国共两党 1946 年夏天爆发全面战争之后，中共的强大力量很快显现出来，仅仅两年半时间就横扫几百万敌军，推翻了国民党政权。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革命战争中锻造出来的强大组织体系，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础，对中国命运产生了深远影响。

巴林顿·摩尔在《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中提出，世界各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现代化进程中，难以避免由于新旧势力无法妥协发生暴力革命，有些国家即使避免了革命，代价也同样巨大。<sup>1</sup>英国、法国、美国都曾发生大规模内战，德国和日本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避免了国内革命，但由于旧势力过于强大转向对外侵略，引发了血腥的世界大战，只有当旧势力被外国力量摧毁之后，德国和日本才真正成为现代国家，而印度则由于没有足够内外力量扫除保守势力，在现代化道路上步履艰难。

中国和俄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出现了特殊情况，在新势力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旧势力的时候，旧势力就在内外力量的冲击之下倒台了，于是在广袤国土上出现了政治秩序的大崩溃。中国在 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之后，无法建立新政治秩序，长期深陷在军阀混战之中。俄国在一次大战中损失惨重，1917 年沙皇被迫退位，也陷入政治混乱。正如亨廷顿所说的，“共产主义的政治功能不是推翻权威，而是填补权威的真空”，<sup>2</sup>列宁凭借布尔什维克革命党的严密组织，迅速

---

<sup>1</sup>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第 3 页。

<sup>2</sup>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 307 页。

创建红军，在几年之中击败其他军政势力，建立起党领导的国家，开创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新政治模式。

中国与俄国的情况相似，都是幅员辽阔的发展中大国，各种割据势力有很大回旋空间，重建政治秩序比大多数国家更为艰难。中国从俄国道路获得了启发，也获得了实际帮助，新兴的国民党和共产党都试图学习列宁主义模式。初期国民党占有先机，依靠军事力量取得优势，但最终还是被组织力更强的共产党击败。

1949 年建国之初，中共凭借强大组织力量迅速消灭敌对势力，建立新政治秩序，并且在普及教育、控制传染病、男女平权等社会建设上取得显著成就。但是强大组织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如果出现偏差，也能造成巨大损失，接下来中国遭遇了大跃进、三年困难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挫折。

民主集中制是富于弹性的制度，民主和集中的平衡点可以适时移动，顺利的时候集中权力减少纷争，困难的时候则通过民主来纠正错误。虽然中共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偏于集中的传统，但民主机制也顽强地发挥着作用，在某些重大历史关头，甚至发挥扭转乾坤的决定性作用。这特别体现在 1935 年遵义会议和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这两次充满民主精神的会议都撤换了不称职的最高领导人，推出了更有能力的新领导集体，带领中共走出困境，开辟出新的大发展期。这说明民主集中制有很强的适应性，民主的纠错能力可以挽救危局。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把国家从阶级斗争转到现代化方向。事实证明，中共强大的组织力在经济建设中也同样有效，中国在四十多年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而印度作为与中国可比性最强的国家，由于保守势力根深蒂固，虽然保存了丰富多彩的多元文化，也拥有形式上的现代民主制，但是由于政府效能不足，在经济、教育、基础设施等现代化指标上已明显落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发展，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人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高考招生人数从 1977 年的 27 万增加到 2022 年的 900 多万，九千多万中共党员中超过 50% 拥有大专以上学历，中国以及中国共产党生存和发展的内外环境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深刻变化。根据英格尔哈特的实证研究，社会进步“最可能的情况是通过代际人口更替”<sup>1</sup>，随着教育程度更高的年轻一代不断成长，富于弹性的民主集中制也将不断进步，推动中国现代化到达新的高度。

---

<sup>1</sup>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第 10 页。

## 参考文献

### 一、史料：

-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1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9—1992 年。
-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2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年。
-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1-6)，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7—1998 年；(7-12)，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13-21)，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7—2012 年。
- 《湖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湖南省档案馆 1984 年。
- 《江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西省档案馆 1986 年。
- 《福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福建省档案馆 1983 年。
- 《江苏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江苏档案馆 1984 年。
- 《中共中央长江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1985 年。
- 《中共中央南方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1985 年。
- 《中共中央北方局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1992 年。
- 《河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河北省档案馆 1992 年。
- 《陕西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 1992 年。
- 《东北地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辽宁、吉林、黑龙江档案馆 1988 年。
- 《广东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广东档案馆 1982 年。
- 《鄂豫皖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湖北、河南、安徽档案馆 1985 年。
- 《湘鄂西苏区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湖北、湖南档案馆 1987 年。
- 《闽粤赣革命历史文件汇集》，中央档案馆 1985 年。
- 《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文件汇集》(1934-1936)，湖南、湖北、四川、贵州省档案馆 1984 年。
- 《六大以来》，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 《红色中华》，1931—1934 年。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上、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7 年。
-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上、中、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
- 《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1-13)，中央文献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1—2015 年。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4、13、14册。

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

王健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

姜华宣等编：《中国共产党会议概要》，沈阳出版社1991年。

《江西党史资料》（1—18），江西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7—1991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鄂豫皖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广州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85年。

《马日事变资料》，人民出版社1983年。

《南昌起义资料》，人民出版社1979年。

《八七会议》，中共党史出版社1986年。

《平江革命历史文献资料集》，中共湖南省平江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办公室1983年。

《“围剿”中央苏区作战秘档》，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海陆丰革命史料》第二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中共中央北方局·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一辑），人民出版社1985年。

《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批判资料》1972年5月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

《反对罗章龙右倾分裂主义资料汇编》（文革时期铅印本），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图书馆藏。

《列宁选集》第一卷、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问题》，联合出版社1949年。

《毛泽东集》第二版（1—5），苍苍社1983年。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版社重印1984年。

《毛泽东年谱》，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张仲举编著：《毛泽东诗词全集译注》，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89年。

《朱德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朱德传》，中央文献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任弼时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言论集》(1923.8—1944.10)，人民出版社资料室 1967 年。

《蔡和森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0 年。

《方志敏全集》，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

郭德宏编：《王明年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 年。

黄仲芳、罗庆宏主编：《井冈山斗争口述史》(上、下)，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5 年。

《何孟雄文集》，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星火燎原》(1)，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 1979 年。

《星火燎原未刊稿（1）》，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红军反“围剿”·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 1994 年。

《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近代史研究》1981 年第 1 期。

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近代史研究》1980 年第 1 期。

徐海东：《生平自述》，三联书店 1982 年。

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 1991 年。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1986 年。

罗章龙：《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 1989 年。

《罗章龙回忆录》，溪流出版社 2005 年。

《徐向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7 年。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何长工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江华：《追忆与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伍修权：《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龚楚：《我与红军》，香港：南风出版社 1954 年。

滕代远：《中国新军队》(1936 年)，解放军出版社 2008 年再版。

《周士第回忆录》，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 《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 《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 1978 年。
- 《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1 年。
- 《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8 年。
- 《程子华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5 年。
- 《陈再道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9 年。
- 《李志民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3 年。
- 《叶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 《杨得志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 《李聚奎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 《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5 年。
- 《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9 年。
- 《邱会作回忆录》，香港：新世纪出版社 2011 年。
- 《贺彪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2001 年。
- 《张金保回忆录》，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 《谢觉哉日记》，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关向应纪念文集》，大连出版社 2002 年。
- 《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 《刘英自述：张闻天夫人口述历史》，人民出版社 2012 年。
- 《陈伯钧日记·文选》，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年版。
- 《文强口述自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 年。
- 《中共党史人物传》精选本（1），人民日报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 《李先念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 《红军的耳目和神经——土地革命时期通信兵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1 年。
- 《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二辑，北京出版社 1991 年。
- 《红色往事》第一册，济南出版社 2012 年。
- 《中共重大历史事件亲历记》第一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2010 年。
- 袁林：《征途漫漫——我的红军生涯》，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 陈复生：《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0 年。
- 罗东进：《我的父亲罗荣桓》，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 蒋伯英：《萧克将军访谈录》，《党史研究与教学》2009 年第 2 期。
- 罗明：《关于“罗明路线”问题的回忆》，《中共党史资料》1982 年第 2 辑。
- 萧扬整理：《胡乔木谈毛泽东与张闻天》，《炎黄春秋》2011 年第 8 期。

- 李锐：《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 何方：《何方谈史忆人：纪念张闻天及其他师友》，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0 年。
- 袁溥之：《往事历历》，《广东党史资料》第三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朱道南口述、于炳坤整理：《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年。
- 邹贤敏、秦红主编：《博古和他的时代》，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
- 《湘鄂西风暴——监利革命历史回忆》，长江文艺出版社 1986 年。
- 《重评吉田会议》，中共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印 1984 年。
- 《邓演达先生遗集》，香港：杨逸棠发行 1932 年。
- 曾宪林、万云主编《邓演达历史资料》，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 杨资元、冯永宁：《邓演达》，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
- 夏莲瑛访谈记录、胡志伟翻译校注：《张发奎口述自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年。
- 鲍劲夫：《许继慎将军传》，解放军出版社 1986 年。
- 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 黄嘉模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4 年。
- 蒋永敬编：《北伐时期的政治史料——一九二七年的中国》，台北正中书局 1981 年。
- 《细说中统军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92 年。
- 《反共斗争经验谈》，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72 年。
- 《党的文献》1988 年 1 期、4 期，1991 年 2 期、3 期，1999 年 2 期，2000 年 2 期，2001 年 6 期，2006 年 3 期，2008 年 2 期、3 期
- 《党史资料丛刊》1981 年第 3 辑。
- 《党史研究资料》(5)，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 《广东文史资料第 42 辑——中国国民党“一大”史料专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984 年。
- 《罗易回忆录》，商务印书馆，1978 年。
- 《罗易赴华使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1 年。
- 《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年。
- 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萨坡什尼柯夫：《1924—1927 年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 年。
-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 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 1932—1939》，现代史料编刊社 1980 年。
-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年。
- 《罗易对大革命失败的回忆》(1938 年)，《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 7 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

罗素：《中国到自由之路——罗素临别讲演》，《罗素谈中国》，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年。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

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三联书店1979年。

## 二、著作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

王奇生：《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

余伯流、凌步机：《中央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何友良：《苏区制度、社会和民众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凌步机：《中央苏区军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

蒋伯英：《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年。

王健英：《红军史疑难考辨》，中共党史出版社2009年。

黄少群：《周恩来在1927至1935年》，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戴茂林、曹仲彬：《王明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

黄焜：《革命与乡村——从暴动到乡村割据：1927—1929》，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陈德军：《乡村社会的革命——以赣东北根据地为研究中心1924—1934》，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任伟：《中共军队早期形态研究》，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16）。

戴向青、罗惠兰：《AB团与富田事变始末》，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

万振凡等：《苏区革命与农村社会变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唐宝林：《中国托派史》，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4年。

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毛泽东与古田会议》，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

袁德金：《毛泽东与陈毅》，中国青年出版社2008年。

赖宏：《毛泽东与红军》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

贺彪：《湘鄂西红军建立史略》，华夏出版社1988年。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史》，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 1992 年。
- 蔡少卿：《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 邵雍：《中国近代绿林史》，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 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年。
- 张永：《梁启超与护国运动》，天津人民出版社 2022 年。
- 陈佑慎：《持驳壳枪的传教者——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北：时英出版社 2009 年。
- 萨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 1989 年。
- 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43 个国家的文化、社会与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
- 巴林顿·摩尔：《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华夏出版社 1987 年。
- 费正清：《伟大的中国革命》，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0 年。
- 史华慈：《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 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 2007 年。
- Lucien Bianco : Peasants without Party , New York: M. E. Sharpe, Inc. , 2001.
- 毕仰高：《第六章 农民运动》，《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3 年。
- 亚历山大·潘佐夫：《毛泽东传》，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
- 菲尔·比林斯利（美）：《民国时期的土匪》，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 年。

### 三、论文

- 杨奎松：《王明上台记》，《民国人物过眼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9 年。
- 金冲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三次“左”倾错误的比较研究》，《党的文献》2000 年第 2 期。
- 陈永发：《中共早期肃反的检讨：AB 团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17 期，1988 年。
- 陈永发：《政治控制和群众动员：鄂豫皖肃反》，《大陆杂志》86 卷 1、2、3 期，1993 年。
- 陈耀煌：《中共湘鄂西苏区的发展及其内部整肃（1927—1933）》，《国史馆学术集刊》第 15 期。
- 应星、李夏：《中共早期地方领袖、组织形态与乡村——曾天宇及其领导的江西万安暴动为中心》，《社会》2014 年 5 期。
- 应星：《苏区地方干部、红色武装与组织——东固根据地与延福根据地的对比研究》，《开放时代》2015 年 6 期。

- 黄文治：《民众动员视野下的中共与富农——以鄂豫皖苏区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开放时代》2010年10期。
- 曹仲彬：《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的日期、地点、出席人数问题》，《党史资料丛刊》1981年第3期。
- 李海文：《东方旅社事件与李求实等人的被捕牺牲》，《中共党史拐点中的人物与事件》，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
- 戴茂林：《六届四中全会前后有关王明研究的几则史实辨析》，《中共党史研究》2011年第11期。
- 章学新：《任弼时提出“以毛代项”为中央局代理书记始末》，《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1期。
- 王新生：《李德来华的身份及任务新探》，《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
- 王建英：《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改组中央考析》，《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0期。
- 姜义华：《论一九三一年鄂豫皖苏区的“肃反”》，《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 陈锡华：《浅谈列宁时期的清党经验》，《理论战线》第195（1983年）。
- 江林平：《浅析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的地域分布》，《珞珈史苑》2015年。
- 谢黎明、陈东：《中央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匪和会道门的争取和斗争述论》，《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
- 杨会清：《土地革命时期党对土匪的政策与策略演变——以革命动员的视角》，《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 徐保琪：《对有关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几个史实的补正》，《党史研究资料》1984年第11期。
- 卢庆洪：《罗章龙策划“第二中央”始末》，《文史精华》2008年第8期。
- 杨祖培：《反立三路线、反调和路线之剖析》，《近代史研究》1982年第2期。
- 郭煜中：《张国焘在鄂豫皖根据地的肃反经验及其恶果》，《安徽史学》1987年第3期。
- 敏志：《张国焘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错误“肃反”》，《江淮文史》1994年第3期。
- 张建德：《略述湘鄂西苏区反“改组派”的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2年第3期。
- 任光明：《“万夏之争”与湘鄂西苏区肃反》，《红岩春秋》2011年6月。
- 宋威：《改正错误中的夏曦》，《党史研究与教学》1991年第2期。
- 王建强：《红军时期的士兵委员会制度探析》，《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5期。
- 村田忠喜：《1929年的毛泽东》，《党史研究资料》1987年第12期。
- 石川祯浩：《走向农村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策略与共产国际》，《中国近代历史的表与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責任編輯：章明  
封面設計：石慶華

ISBN 978-988-31266-0-1



9 789883 126601

定價：HK\$ 175元